李斯特

传记小说

LISZT

[匈]加尔·久尔吉·山道尔 著

朱安康 李孝风 符志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LISZT

传记小说

李斯特

〔匈〕加尔·久尔吉·山道尔 著

朱安康 李孝风 符志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学娅
封面设计：袁银昌

李 斯 特

〔匈〕加尔·久尔吉·山道尔著
朱安康 李孝风 符志良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125 插页 平8 精9 字数491,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册（内胶精装 1,100 册）

书号：11078·3005 定价：硬精 6.15 元 软精 4.30 元

译 者 的 话

《李斯特》是描写十九世纪匈牙利伟大音乐家李斯特·费兰茨生平的长篇传记小说。

李斯特(1811—1886年)是欧洲新浪漫主义乐派的创始人。自幼表现出杰出的音乐天才，受到贝多芬的赞赏。四十年代即已驰誉全欧。他在艺术上勇于追求，敢于革新，首创“交响诗”体裁，创作了大量标题音乐，为西洋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音乐艺术思想对德国著名作曲家理查·瓦格纳[1]等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作为当时欧洲最优秀的钢琴表演艺术家，他曾对钢琴演奏技术进行大胆的改造与创新，大大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据时人记载，他的精湛演奏艺术常常使听众如痴如狂，为之倾倒。

李斯特不仅是世界音乐史上的艺术大师，同时也是匈牙利民族的骄傲。他一生中在匈牙利居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心始终同祖国紧密相连。他作为匈牙利的“艺术使者”，运用自己的音乐艺术武器，在国外广泛传播匈牙利的民族音乐和艺术思想，为当时处在异族统治下的祖国争得了荣誉和同情。他积

---

① 理查·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早年即致力于歌剧创作。一八四二年任德累斯顿宫廷乐长。后受费尔巴哈、巴枯宁的影响，于一八四九年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事败后流亡瑞士，转向妥协。主要歌剧作品有《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尔》、《黎恩济》、《汤豪塞》、《罗恩格林》等。

极推动创建匈牙利音乐学院，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材，对匈牙利音乐艺术的发展和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李斯特思想上深受圣西门①空想社会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参加过圣西门派的政治活动，后来还加入了共济会。他曾以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起义的斗争口号"不是劳动以生，就是战斗而死"为主题思想，谱写了钢琴曲《里昂》。一八四八年，他热烈拥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支持民族独立斗争，并计划返回匈牙利参加反对哈布斯堡王朝②专制压迫的独立战争，后因中途受阻未果。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思想曾有些消沉，但在艺术创作中仍常表现出对独立战争的英雄们的崇敬和对异族统治的憎恨。

李斯特的生活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他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攀上了音乐艺术的高峰，博得当时欧洲许多君王的青睐，得以跻身于上层社会，交游于王公贵族、名媛佳丽之间，但他也接触过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和下层社会群众，因此对人民的贫穷苦难有一定了解，对专制统治是憎恶的。他向往真理，追求正义，同情革命，但有时又惆怅彷徨，悲观失望，甚至一个时期把精神和希望寄托在宗教上。他虽生于匈牙利，对匈牙利怀有深厚感情，但早年远离祖国，长期飘零异乡，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在匈牙利扎根定居，终于老死他邦。所有这一切对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

① 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贵族出身。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同情法国革命。他抨击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不了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反对暴力革命，幻想通过宣传、教育，以及科学、道德和宗教的进步，即可实现理想社会。

② 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上的王朝。起家于瑞士阿皋州的哈布斯堡（意即"鹰之城堡"）。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一些小王国、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王朝告终。

本书作者加尔·久尔吉·山道尔是匈牙利著名作家和音乐史家。生于一九〇七年。毕业于匈牙利音乐学院。曾在匈牙利、弗多尔音乐学校任教，并兼任多种报刊的编辑，长期致力于音乐的普及工作。主要著作有《音乐史》、《星星在召唤》(小说)、《舒柏特》(小说)、《威尔第生平传记小说》、《李斯特》(生平传记小说)、《维也纳的森林在诉说》(约翰·施特劳斯生平传记小说)、《牧神午后》(德彪西生平传记小说)、《祖国，祖国，你是我的一切》(艾克尔·费兰茨生平传记小说)、《歌剧指南》、《轻歌剧手册》、《通俗音乐美学》、《现代歌剧手册》等。

作者擅长用抒情的文学笔调撰写著名音乐家的生平传记和介绍音乐作品。从三十年代开始，即从事李斯特的研究。他的《李斯特》一书内容丰富，情节动人，深受匈牙利读者欢迎，并在一些国家先后译成外文出版。匈文版自一九六八年初版以来，已发行了六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着意结合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地描绘了许多与李斯特同时代的著名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如肖邦①、瓦格纳、柏辽兹②、帕格尼尼③、

---

① 肖邦 (Fryderyk Franciszek Chopin, 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毕生憎恨沙俄对波兰的民族压迫和奴役，不少作品反映了他对故国家园的怀念，对民族独立的期望和忧国伤时的悲愤心情。也有一部分作品流露出个人感伤的忧郁情调。后期思想有时陷于消极。他在发挥钢琴性能及和声表现力方面有较大创造，对后来的西洋音乐，特别是钢琴创作有深远影响。

② 柏辽兹(Hector Berlioz, 1803—1869)，法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早年同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四十年代末期转向消极，后期创作有宗教神秘气息。他是西洋音乐史上致力于标题音乐创作的浪漫派作曲家。

③ 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 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一七九三年即首次公开演奏。其创作和演奏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对同时代的李斯特、舒曼、柏辽兹等浪漫派作曲家的创作，以及小提琴、钢琴演奏艺术和乐队配器等，均有较大影响。

乔治·桑①、艾克尔②等等，使读者能够从中形象地了解到十九世纪欧洲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文化艺术思想的发展，这无疑更增加了本书的价值。

译者水平有限，翻译中肯定会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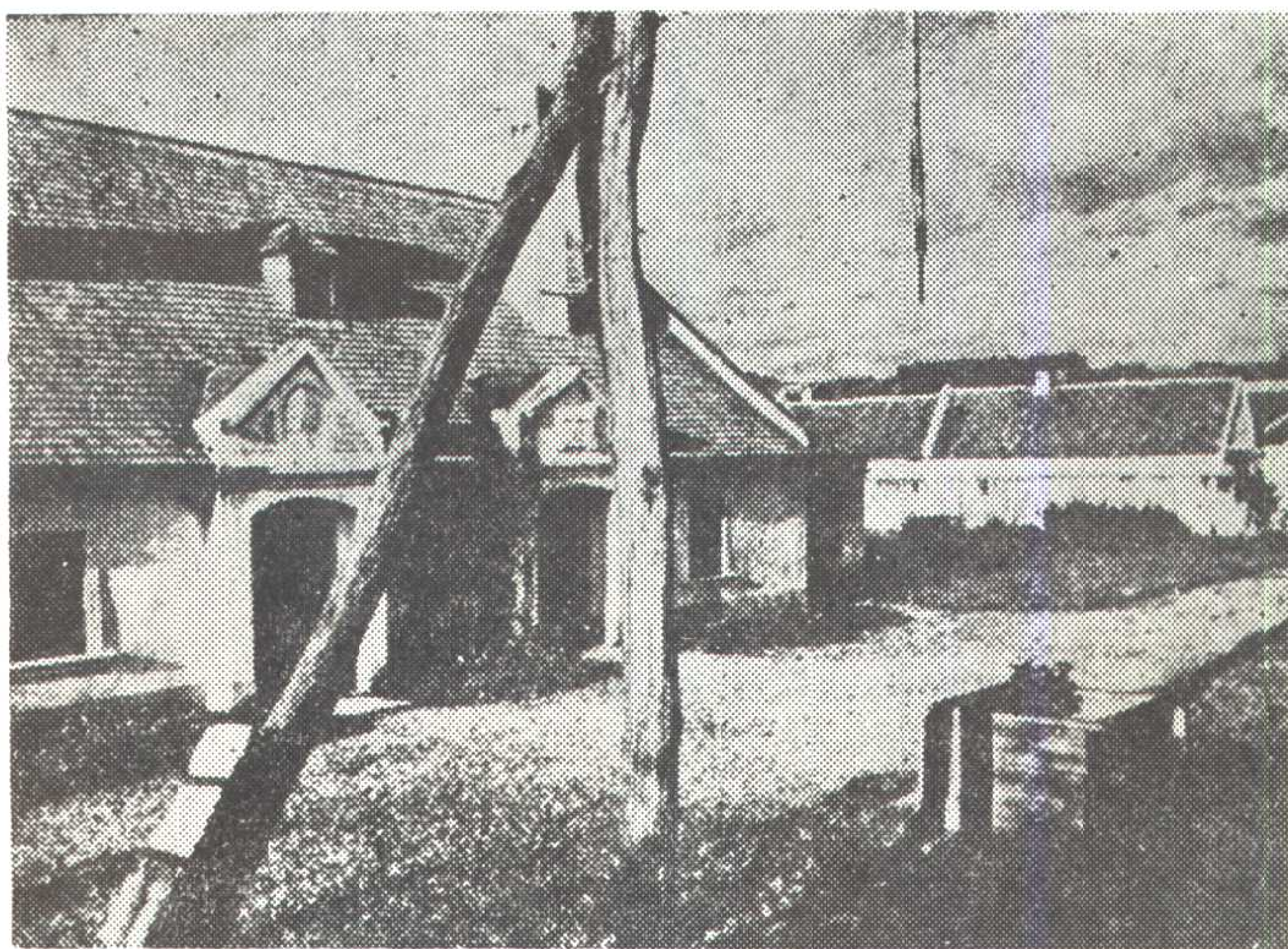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① 乔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法国女作家。早期受卢梭影响，倾向浪漫主义。小说作品《印第安娜》等，捍卫妇女权利，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受革命斗争的鼓舞，写了不少批判资产阶级剥削的优秀作品。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隐居乡间，作品转向描写田园生活。

② 艾克尔(Erkel Ferenc, 1810—1893)，匈牙利作曲家，曾任匈牙利国家剧院指挥、布达佩斯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致力于发扬民族文化。主要作品《胡约第·拉斯洛》、《班克总督》、《拉科齐进行曲》等，均以反抗异族压迫的历史为题材。一八四五年谱成匈牙利国歌，沿用至今。



1820 年的李斯特



李斯特出生的房子



李斯特的母亲
安娜·李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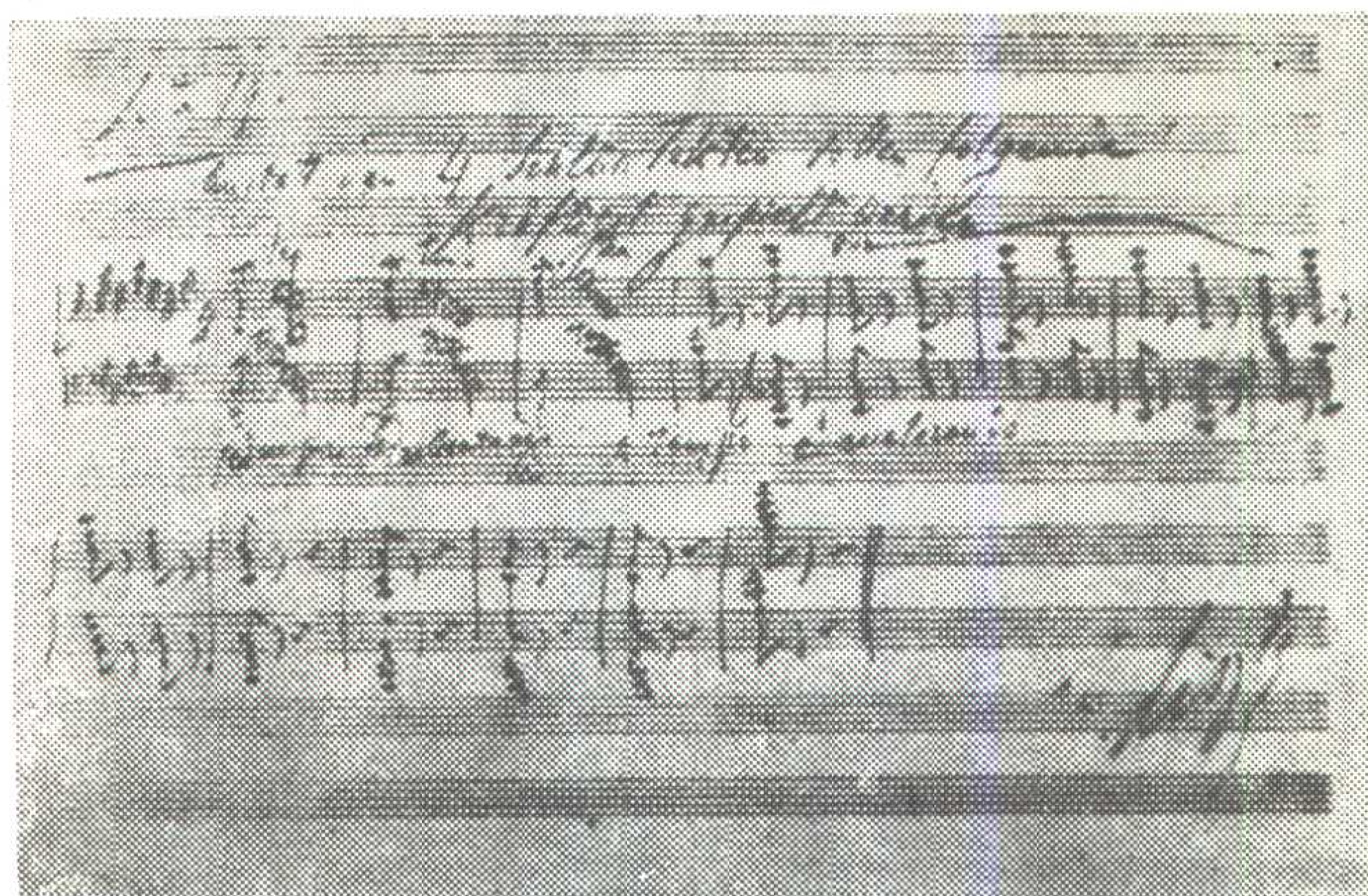
李斯特的父亲
亚当·李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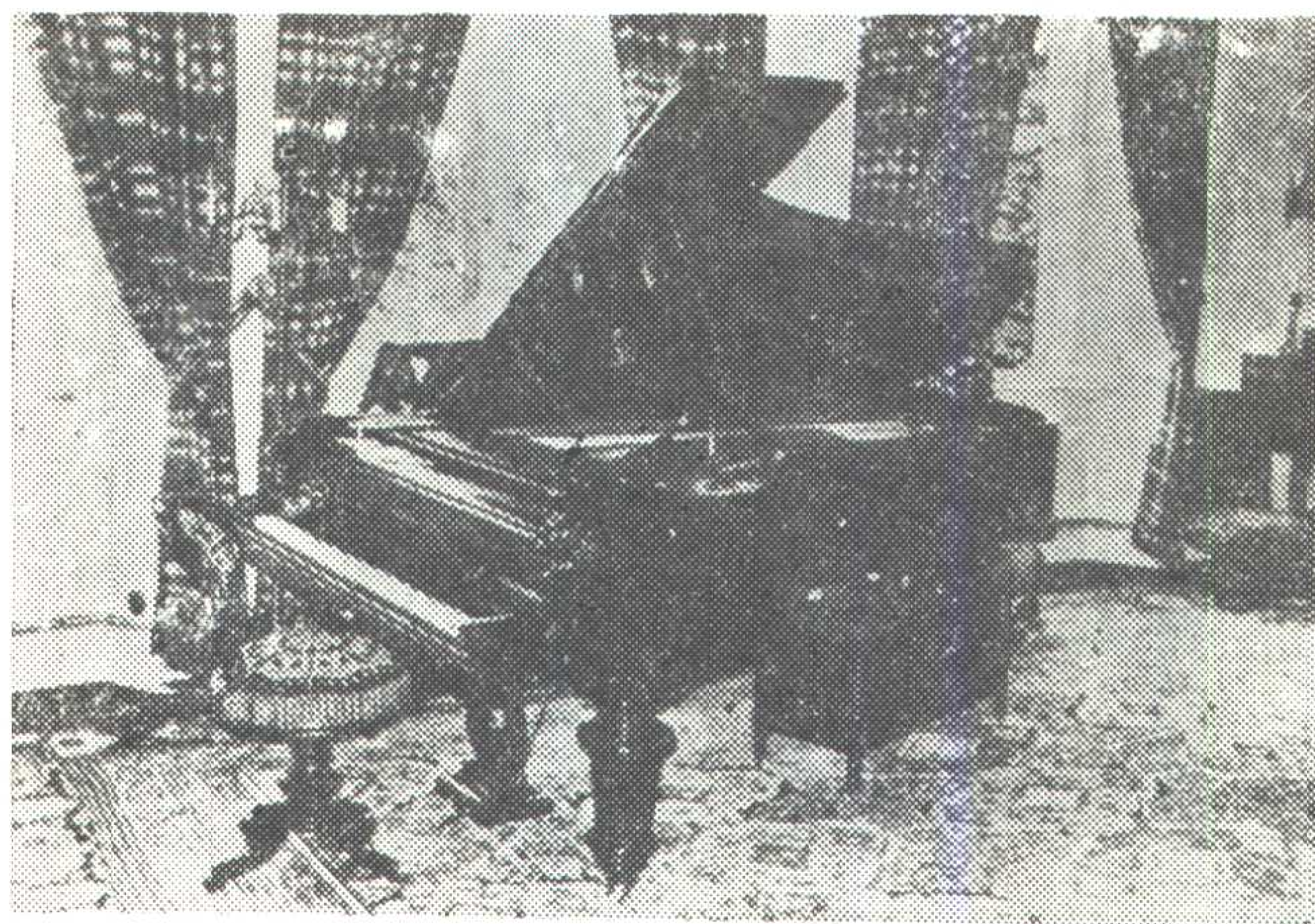
1838 年的李斯特



《玛捷帕》



李斯特的手稿



李斯特的钢琴



李斯特和他的朋友们



李斯特画像

目　录

第一章 兀 鹰 旗

一八一三年三月十日，当正午的钟声在埃斯代尔哈兹家族[①]的庄园上空响起时，弗拉克诺古堡上升起了饰有埃斯代尔哈兹家族族徽的旗帜：蓝色的草地上站着头戴金冠的兀鹰，一只爪子抓着盾牌，另一只爪子握着三枝红玫瑰。

钟声在继续响着。但象大河吞没了小溪的水似的，这长舌妇式的金属钟声，渐渐被这一带的山川、田野和草地所湮没。

村民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那面飘扬在三月寒风中的旗帜和正在古堡上走上走下的士兵。升起的旗帜和巡哨的卫兵都说明：公爵老爷突然回来了。埃斯代尔哈兹的仆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大老爷到底是为什么回来的？肯定不是为了打猎，因为大地还被融雪后的烂泥覆盖着，甚至连马走进去都要陷到肚皮。是为了参加传统的冬日娱乐活动或者到弗尔都去溜冰、玩雪橇？不是的，因为湖面上结成的冰已经很薄了。也许是为了躲避战争？……

上千双眼睛都注视着那面兀鹰旗：公爵大人从维也纳会带来好消息（这种可能性很小）还是坏消息？

---

① 埃斯代尔哈兹家族，匈牙利大贵族地主家族。十七世纪前只是小贵族，后因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专制统治而逐渐成为势力遍及全国的大贵族家族，直至一九四五年匈牙利全国解放才解体。

公爵命令办事人员们在弗拉克诺古堡内的骑士大厅里集合。现在他还在等他们，因为飞马传令的亲兵们刚在几个小时之前才出发。那些庄头、牧主、管家和会计，从领地的四面八方踏着满地泥泞的路，赶到古堡的吊桥还需要一段时间。在那个有八扇窗户和三十根柱子的长形骑士大厅里，现在只有三个人：公爵，他的亲信卡涅尔和公爵派驻基什马尔顿地区的畜牧主任圣戛依。卡涅尔坐在一把靠椅上，正在打盹。但就是在梦中，他额头上的皱纹也显示着他是那样忠于职守。卡涅尔长着一副猪脸，从满脸扎人的猪鬃般的须发，就可以猜测出他那肥胖的油膘有多厚。这人已经有两天没躺下过了，现在可该睡一会儿作个梦了。此刻他正鼾声大作，靠椅上的毛皮褥垫热得他浑身淌汗。

圣戛依是个瘦弱的人，动不动就脸红。孩子般的蓝眼睛给人以梦幻诗人的印象，一点也不象个铁腕似的畜牧主任。此刻他正忙于自己的公务，至少是装出这种样子，因为他不敢打扰公爵老爷。大老爷在偌大的大厅里来回踱步，偶尔在一幅幅悬挂着的画像面前停一会儿。画像上都是埃斯代尔哈兹家族的祖先……。

突然，公爵无情地叫醒了正在安详呼噜着的卡涅尔：

“喂，伙计，该醒醒啦！”

梦是很听话的，要它走，它马上就离去了。卡涅尔象在自己卧室里一样，伸伸懒腰，打了个喷嚏，直到他把眼睛睁大了些，才瞧见大老爷，于是立刻象士兵那样，“啪”的一个立正：

“请您吩咐！”

公爵现在坐在桌子的顶头。象他所习惯的那样，为了引人注意，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好象故意在压抑听众的呼吸。老爷的

脸象一只漂亮而熟透了的苹果。线条分明的嘴巴垂下了嘴角，大而明亮的眼睛围着黑圈。他频频地抚摸着肥大而挺直的鼻子，好象它上面长了些什么，又好象是在抗议这些人的在座或者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他急促地喘着气说话，吞掉了一切逗号和句号：

"人们再过几分钟就到这里了……在他们来到之前，我想澄清几个问题。圣戛依先生还全然不知道，这从他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他作出各种各样的承诺，但从来不是为了今天，更不是为了马上兑现。卡涅尔，你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情况吧！"

卡涅尔尽管勉强支撑，可是刚才的梦还在拖他走向朦胧的深潭。他只好痛苦地边想边说：

"两年前，我们的国库受到了巨大的震动。皇帝陛下的政府采取措施，把银行流通货币的价值贬低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今天，我们这些同埃什凯来什、孟德逊、贝特曼或法兰克福的罗茨契尔德银行一起工作的人，都感到——尽管还没有发生过手头拮据的情况——财源枯竭，周转困难。我们曾向巴黎的阿瓜多银行求援，但他们拒绝借款。有人建议我们把各家大银行联合起来，要他们共同来担保埃斯代尔哈兹家族的财务支出。这个谈判本已成功，但在最后一刻却又变了卦。罗茨契尔德先生突然死亡，他的合伙人撤销了协议。"

下边的城门响了。一辆接着一辆的马车驰过了吊桥。埃斯代尔哈兹家族的管家们吵吵嚷嚷地拥入大厅，但当他们看到公爵之后，嘴巴一下子就全都闭住了。一会儿工夫，人们全都聚集在骑士大厅里。

公爵宣布开会：

“我们是为一件重要事情来开会的。”公爵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他那过敏的鼻子。“我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作出重要决定的前夕。”

圣戛依以一种被告人的姿态深深地向前倾着身子。他明白：判决只能对他不利。林务主任克劳茨切克象个木偶似的坐在那里。这是个爱红脸的大块头。隆起的肌肉紧绷着上衣，大腿好象要从马裤里蹦出来。只有这位林务主任知道，是什么风把公爵老爷刮回庄园的。因为他的大儿子在维也纳首相府供职，早就向他通风报信了。他已经作好了向公爵进行解释的准备：行窃、窝赃、违法乱纪、亵渎上帝、雅各宾党①人的思想影响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在破坏着世界，毁坏着埃斯代尔哈兹家族的领地。

现在还只是公爵一个人在说话。但克劳茨切克也很想说话，就象装在炮膛里的火药一样，只是在等待火绳的烧近。

“皇帝陛下光荣的战争，”公爵小声地吸着气说，“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我们流了许多鲜血（公爵感动地闭了一下眼睛，好象他想起了埃斯代尔哈兹家族的雇工们似的，因为正是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国家），损失了大量的金钱。现在，我们要采取一切严厉手段，以弥补令人痛心的损失。下面，我想听听圣戛依先生的想法。”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以其全部力量压迫着这位驼背、瘦弱的老管家。他十分为难，但终于还是畏畏缩缩地开口说话：

“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竭尽全力工作，以不辜负公爵老爷

---

① 雅各宾党，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大的政治组织。因会址设于巴黎雅各宾修道院得名。一七八九年成立。起初成份复杂，分化后，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中心，其成员称雅各宾派。雅各宾派专政时为革命政府的支柱。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被解散。

的信任。”

克劳茨切克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森林中习惯于从几里路之外发出伐木命令或者吆喝人们干活，现在他的大嗓门又打开了。讲话时，他的脖颈先是涨得通红，接着染紫了面孔，最后连额头和头顶都发红了。

“我来说说，”林务主任的嗓门跟雷鸣差不多，“畜牧主任先生只知道戴着手套拉缰绳，他忘记了我们古老的真理：你要骑稳公马，就要知道用鞭子！说那些愚笨的农民已经懂得干活，那不过是自欺欺人，对他们没有任何强制力量。当我要他们修理某座破桥或补好某一段道路时，他们会派些老头老太婆来，既不能拉车，也不能伐木，而且对我哭起来就没个完：尊敬的老爷，这里已经没有能劳动的人啦，因为同圣经里的巴尔神一样，用人血喂养起来的拿破仑和战争把他们吞没了。”

这时，圣戛依长吁了一口气，打断了林务主任熊吼般的讲话：

“克劳茨切克先生，他们说的是真话啊，您能回答他们什么呢？”

林务主任象一座肉塔，以绝对的优势朝对方吼起来：

“先生，您以为我会和他们饶舌？我的算盘很简单。假如没有拿锹、拿镐、拿锄头的男人，那就要他们的孩子来干活。我要他们用五个、十个孩子顶一个全劳力。干活是不容拖延的。”

第二天，人们到处盛传，圣戛依差一点被解雇；林务主任克劳茨切克已经从他那小小的木头房子搬到一所明亮的管家住宅去了。到第三天，消息传来说：施密特先生不仅被任命为弗拉克诺庄园和基什马尔顿庄园的管家，而且更重要的是，施密特还当上了经常在基什马尔顿别墅花园演出的歌舞团团长。

对待施密特先生，连公爵也无法摆出一副帝国公爵的架子。施密特先生脚有点跛。他不但不掩饰这一点，而且还有节奏地摇动他的头，开玩笑似地眨巴眼睛，以陪衬上漆皮鞋的走步声。施密特先生不是猫着腰，而是还在走廊上就先把躯体折成两截，象用鼻子擦着那东方地毯似地走进老爷的工作室。这位团长先生不是在问候，而是在叨念自己编好的一套祈祷词来颂扬公爵老爷，诸如：在您一个人身上集中了赫尔麦斯的智慧、阿波罗的美貌、战神的勇敢、大力神的力量和诗神的艺术灵感等等。

"有什么事吗？施密特！"公爵发问。公爵用一种比较高兴的眼神看着这位可怜人。他还一直猫着腰，等待公爵大人允许他直起身来。

"我听说老爷发出命令：要节约、节约，第三个还是节约。我担心这会不会……"

公爵挥了一下手，示意他可以直起腰。

"是的！"公爵抢过话头，"采取一定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

卑微的管家居然忘记了宫廷礼仪，打断了公爵的话：

"我已经筛选下一些我可以不用的乐师、舞蹈和歌唱演员，尽管我非常心痛。"

公爵站起身，在房间内踱了几步，然后面向这卑微的人说：

"我的朋友……现在的措施可比你想象的还要严格啊，施密特！我把你的歌舞团一锅端了。"

这位矮小的团长在紧张中居然忘记了他掩饰（或者突出）跛脚的惯技，突然直起身来，就象单腿独立的鹭鸶那样，把那条略短的腿从天蓝色的燕尾服下露了出来。

"您不要说得那么严重，我的老爷！那会把诗神赶跑的。"他索性哭了起来，"那将会使我施密特和孩子们无家可归。"

公爵回到写字台旁，说：

“施密特！我会照顾你们的。你说六百福林够用吗？”

“哦唔！”施密特团长以一种喜剧性的动作立刻破涕为笑。他再也不说什么了，心中已经演出了一幕哑剧：吝啬鬼发现，一切混乱即将平息，各种罗网都会解除，结局是光明的，心灵中充满着幸福的和谐。

根据克劳茨切克林务主任的报告而在会计室进行的审问工作，可远远不象上面说的那样顺利。案件都是些法学家行话中称之为偷鸡案的事情，例如：某会计员曾到林业禁区偷了一根木头，另一个人从古堡废墟搬走了几块石头去补宿舍的墙，等等。从这些火膛里是掏不出什么火星来的。唯一倒霉的是一个可怜的穷汉：管事李斯特·久尔吉·亚当。

审问正在基什马尔顿城堡别墅的会议厅里进行。这间会议厅还完全保持着意大利建筑师的风格。哥特式的基柱、拱门和窗饰，装点着这个监狱似的地方。

绿呢面的桌旁坐着克劳茨切克、圣戛依和两个其貌不扬的书记员。克劳茨切克主持审问，他故意装腔作势，好象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李斯特·亚当（其实在他们见面的时候，李斯特·亚当正五十八岁，他为埃斯代尔哈兹家族已经工作了四十年）。

克劳茨切克（以下简称克）：“姓名？”

李斯特·亚当（以下简称李）：我叫李斯特·久尔吉·亚当。生于一七五五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地是来卡村（李斯特是个肩膀宽厚、性格坚毅的人，岁月的犁头已在他的额头上深深地耕下了沟渠，无疑这是严峻而坎坷的生活的印记。他说话口齿不清，因为大部分牙齿都脱落了，但目光却炯炯有神。他局促不安，窥测探望，但却透着

某种骄傲——如果说在这种屈辱难熬的考验中一个人还可以骄傲的话)。

克：对您的控告，可以说是材料成堆。这里手头上就有一份报告，说您在圣久尔吉村任教员时，因村民的要求而被赶出学校。我们的公爵大人派圣戛依先生去进行调查，发现村民们果然都反对您留在那里。

李：我对普通村民没做什么过不去的事。校长不满意我，说我抢了牧师的生意，怪我启迪了孩子们和老人们的思想；领唱赞美诗的人也不满意我，因为只要我坐在管风琴旁，所有的人就都听我的了。

克：所有的人都反对您！

李：我的良心却不认为是这样。

克：我们的公爵大人一贯仁慈为怀。他好心改派您到马尔茨的伐木场去工作，可是后来却发现那里丢了好多建筑木材。

李：他们为这事还把我抓了起来。最后多亏工头格吕克先生帮我说了话，证明许多木板和雕刻的木柱都在他的场地上，所以库房的账目才显得短缺。

克：但是您以后一直在发牢骚，不断上告……弄得基什马尔顿的总管一天到晚都忙于处理你那些糊涂乱写的材料。

李：(挺直了身子，这时才使人看到那是多么匀称修长的身材)尊敬的先生！我一年的工资只有六十七福林，靠这六十七个福林我要养活十四个孩子。先生，当那些没有靴子、没有短皮袄的小孩在冬天围着您呼天号地时，您会作何感想?！

克：您还可以得到十二公担小麦、三十公担大麦、四十五公

担干草、六罐葡萄酒和五立方木材嘛！靠这些东西，任何正派人都是活得下去的。

李：(再也按捺不住)干草不能绑在孩子脚上当靴子。粮食不能都让他们吃掉，小生灵还要治病。大麦也换不来教科书。最多我能把葡萄酒卖掉，可酒是如此之酸，连米醋都比不上它。

克：酒还不至于那么坏吧？您不是多次喝过吗？据记载，您还曾为此从马头上摔下来过。要不是上帝的奇迹救了您，那受惊的马也许会把您踩个粉碎。

李：(艰难地喘着气，看得出来他在克制自己)不错，那马是把我摔下了马鞍。但您为什么不问问，一个伐木场的书记员为什么要骑马呢？因为从我的住处到伐木场要走一个小时，先生！我只能骑马来回奔跑，尽管那种道路是任何有经验的驭手都要躲着走的。我是摔下了马，而且在冰冻的泥潭中跌断了三根肋骨。我一年的工资才六十七福林，这次光是医生就拿走了二十福林！

克：您的行为总是和常人不一样，现在作为一个例证，我想提一下您的婚姻问题……

圣戛依(以下简称圣)：(慢慢抬起视线，注视着克劳茨切克)这种问题恐怕不该我们过问吧？

克：那怎么不该呢？先生！(抄起了一张纸读道)您埋葬了第一个妻子斯来扎克·波尔芭拉之后，又埋葬了第二个妻子魏宁格尔·波尔芭拉。总管大人补贴过安葬费。不久您又第三次结婚，娶的是李赫特·玛格多尔娜，但您没有申请批准。要知道，在埃斯代尔哈兹的领地上，没有公爵大人的允许，任何当鳏夫或寡妇的佣人都是

不得结婚的。

圣：（很不耐烦地）林务主任先生，这个问题请您提交给公爵大人吧……我还有许多事要办，不能奉陪了。

克：我要说的话也快结束了，畜牧主任先生。所有我说的这些，用我们的宗教语言说，都是可以赦免的罪过。但不可饶恕的罪过是：李斯特·亚当把分给他的取暖劈材换了钱，然后自己跑到森林中拾枝桠当柴烧，就象那些捡树叶的乞丐一样。这简直是丢人。还有，他从庄园的牛圈里单拨一头奶牛，挤奶给自己的孩子吃。本来公爵大人照顾他，让他私人养牛养马，而他却让一头庄园的牛只给自己而不给公爵挤奶。这也是不可饶恕的。

李：我自己的奶牛没有奶了，尽管我解释给孩子们听，但他们不愿听空话，还是要奶吃。

克：您还给自己收摘过水果。

李：那是掉在地上的烂果子。

克：（继续读着，而且象读判决词似的不时还强调某些词句）根据埃斯代尔哈兹·米克洛什公爵老爷的指示，纳吉马尔顿的会计员李斯特·久尔吉·亚当应立即革职。他在金库里的一百五十福林存款要一直扣留到案情真相大白为止。李斯特·亚当在接到本判决后必须马上离开纳吉马尔顿的会计室。我们宣布了他的行为不忠，但不打算再采取其他措施。我以埃斯代尔哈兹·米克洛什公爵的名义……

李斯特·久尔吉·亚当正在又湿又滑的密林中漫步。他已经从基什马尔顿走到纳吉马尔顿，脑子里还一直在考虑着越来

越临近的穷困威胁。求助于谁呢？两个最大的姑娘玛格多尔娜和罗莎虽然已经出嫁，但她们也都是穷人。波尔芭拉呢？她嫁给了猎人维茨柯·拉约什。这位女婿看待当会计员的丈人就象穿开裆裤的小孩看学校的校长一样，就是为了维护这点尊严，也不能去向他求助。至于弗里德里卡、扬诺什和山道尔还都是小孩子。多尼学了修表的手艺，已能自立门户，因而流落到维也纳谋生去了。可以去投奔他，但总不能拖着一大帮孩子。马叶尔海姆·费兰茨倒是李斯特·代蕾兹娅的忠实丈夫，可是岳父和女婿不知为什么顶过嘴，想也想不起来了，真该死；就这样，连走路也得绕开马叶尔海姆的房子。唯一能看作是帮手的，那就是最大的儿子青年李斯特·亚当了。他刚刚结婚两年，在多波尔扬庄园做事，也许能收容他的亲爸爸住上个把星期。

李斯特·久尔吉·亚当停下脚步，他根本没觉察到天气已经变坏了。

这时，透明的天空突然卷起了乌云，先是染黑了天穹的下半部，接着把地平线也笼罩在它那黑色丧服之中。云团直向泽尼特方向扑来。风的方向也变了。起先还只是从天上洒下一些混着冰凌的雨点，转瞬间就下大了，成千上万珍珠似的冰粒如瓢泼一般，击打着李斯特·久尔吉·亚当的破旧短大衣。

他耐心地等待着。

突然，在这倒霉的时刻，他仿佛听到了某种交通工具走动的响声。天变得越来越暗，最后，嘶哑的嗓音和生锈的铁器间的摩擦声终于临近，原来是一辆农民用的大车。

"上哪去？老乡！"

从浓重的雾里传来了回答：

"就到那边去，多波尔扬……"

"车上装得下我吗？"

“可以。”

李斯特·久尔吉·亚当跳上了车，在一片叽哩嘎啦的声响中，随车奔向多波尔扬。

晚上十点钟左右——这对习惯早起的村民来说已经是很晚了——多波尔扬牧羊场的会计员、青年李斯特·亚当仍伏在案头读着书。油灯的火焰正向一本法文书上投射着光芒。透过封冻的窗玻璃看去，那闪烁着的都是一种有特殊光焰的星光。这些星光可以作证：青年李斯特·亚当每晚都在读书或核对帐目，要不然就是“研究”某种语言。他继承了爸爸的宽肩，但身材秀美，具有这个时代人们常说的那种俊美的脸、纤细的手和轮廓分明的嘴——大概这是一种母性遗传吧。而他的性格、气质、人生观和哲学，却处在父母的两极之间。他继承了父亲好幻想的天性，也继承了生母斯来扎克·波尔芭拉突出的坚韧不拔的美德：历尽艰辛也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青年李斯特·亚当离家已有十二年了。他上过波若尼市的教会中学。曾准备作为一个农村青年穿着破衣烂靴去见校长。他也退一步想过，就是在学校烧火，给别人擦皮靴，给岁数大的学生当佣人，或者去帮厨都行，只要能学习就成。他在波若尼教会中学度过了四年。在这四年里，他吃了不少面包，也消化了许多书籍。父亲的血液总在激励着他：把那些愚蠢的书向墙壁甩过去；在生活中要当着那些压迫自己的人的面讲自己的心里话。但母亲的教导却刚好相反：你什么事都不要介意；假如人家唾了你的脸，擦掉就是了；如果人家训诫你，要洗耳恭听；你要不断向上，因为在下边，生活对抱有晋升梦想的人是不堪忍受的。他就是这样地在教会中学里受了四年的磨难。一七九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申请去马拉茨卡的教会学

校。这仍然是他母亲的思想。他希望成为比一般神父更重要些的人物，甚至当主教。那时，人们就会说这是一个乞丐似的小职员儿子的飞黄腾达。为了这一切，他努力学习哲学、拉丁文和一些有关希伯来语的知识，了解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和忏悔规程。看来，他母亲波尔芭拉的血液取得了胜利。只是在最后一刻，老李斯特的遗传因子才起了作用，因为这个青年再也不能忍受教会学校非人的清规戒律和对人的独立思想的残酷蹂躏。青年李斯特·亚当不堪忍受学校的欺诈虚伪和卑躬屈膝而开始造反。教会方面先是诋毁，继而惩罚，最后由于他坚不屈服，索性把他赶到大街上。这个顽强坚持梦想的青年后来报考了大学（在纳吉索姆巴特市的巴兹玛尼·彼得大学这时正好迁往国王的加冕城市波若尼），他果然是个出色的学生。他并不满足于只学习本科知识。他每周两次去找波若尼著名的管风琴专家里格来尔·费兰茨·帕尔，学习和声学和对位法，探索乐器和作曲的艺术。

他在大学学习了一年，除学习普通德语之外，还掌握了克劳南斯朵克、海德尔和莱辛① 的语言。在这些充满幸福阳光的日子里，他学习了法语、历史和修辞学。在漫游图书馆书海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读书人的哥仑布式发现——他接触了古希腊的经典著作：柏拉图② 象古老的醇酒一样使他陶醉，亚里士多德③

①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和剧作家。为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清除宫廷贵族的影响和盲目崇拜法国古典主义的倾向，进行了长期斗争。他的理论和创作，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对德国文化发展有重大影响。

② 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为贵族奴隶主统治下的社会秩序辩护，对唯心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影响极大。列宁把唯心主义发展路线称为“柏拉图路线”。

③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马克思赞他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他不仅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而且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基本形式，被恩格斯称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除哲学外，他在艺术、教育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方面均有贡献。

开扩了他的眼界，使他把视线瞄向图书馆书架的最高层。

但他在大学里只度过一个幸福的年头。把他赶出校门的既不是教授们，也不是大学内的显贵学生。尽管他在大学里碰到了最卑鄙和最庸俗的敌人，他始终是不可战胜的。可是现在这个敌人是饥饿！青年李斯特·亚当念中学时，家境就不佳，但那时还可以从家里得到一些熏肉、面包、腌菜、葡萄酒，以及母亲亲自烤制的点心。母亲去世后，父亲娶了第二个妻子，从此以后这种食物补充供应开始脱期，后来干脆就完全中断。青年李斯特这一年的大学生活是在饥饿状态下捱过来的。在饥饿的压迫下，他还是屈服了，他不得不向法国田园风作品、柏拉图、希腊文化以及历史科学挥泪告别，而去当埃斯代尔哈兹庄园的管事。

他停留的第一站是考普瓦尔。在这里他经历了一件特别的事。考普瓦尔是典型的匈牙利城市。尽管青年李斯特掌握了三、四种欧洲语言，而且很熟练，他却必须为学会匈牙利语而努力奋斗。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因他以匈牙利人自居，所以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在书信、申请书或文件中改正他的德文拼写法。例如他必须把用德文拼写的亚当·李斯特改写成匈文拼写的李斯特·亚当。虽然他尽了最大努力，考普瓦尔人还是难于理解他的语言，于是他不得不迁居弗拉克诺，最后才在基什马尔顿定居下来。

青年李斯特·亚当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梦想。在基什马尔顿的"宫廷"里（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称为"国王的宫廷"），他结识了洪梅尔·涅波穆克（虽说仍保持着三步的距离）并与他经常交谈。洪梅尔发现青年李斯特的中提琴拉得很好。在一个幸福而难忘的冬日早晨，埃斯代尔哈兹公爵的乐队指挥洪梅尔，终于发信邀请青年李斯特参加"宫廷乐队"的排练。排练之后，他将有可能参加基什马尔顿乐队的演出。洪梅尔手下的埃斯代尔哈兹

乐队的第二把手是夫什先生。他让青年李斯特·亚当做抄乐谱的工作，因为阿维·玛利娅的原谱丢失了。青年李斯特抄写时加了配乐，夫什先生认为加得不坏。

青年李斯特·亚当又在幻想了：必须由乐队的后排升到前排、第一排，由第一排再升为第二指挥，在此之后则将是无限广阔的前途。

有一天，总管家召见。他既没有说明也没有解释，只发了一个简短的命令：下月一号到多波尔扬报到，就任会计员。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或拖延不走的余地，只好出发。

青年李斯特·亚当又走上了去多波尔扬的放逐之途。当他途经纳吉马尔顿——他父亲的工作地点时，他们曾一起写了一份申请书：青年李斯特·亚当愿承担一切牺牲，愿拿最低的报酬，只望能允许他回到基什马尔顿，回到乐队中去。但他们从未收到过答复。

在他们写最后一次申请的时候，老李斯特·亚当突然心事重重地问儿子道：

“我的孩子，你还是独身一人吗？”

“当然是一个人，爸爸。”

“你应该结婚啦。”

农村人是没有什么可以更多考虑的，在附近选择一个待嫁的姑娘就行了。老李斯特经常去作客的人家当中有个做肥皂的拉格尔·费兰茨。那时，如果羊群中死了牲口，可以由管理羊群的会计员自由卖掉。为了省些钱，肥皂匠拉格尔经常买这些死羊，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友情。拉格尔身边收养了一个孤女，是他的堂妹。这个生在克来姆斯、名叫拉格尔·安娜的姑娘，在维也纳讨过饭，后来在有钱人家里当过使女，最后投奔到纳吉马尔顿的堂兄家，为这个老光棍堂兄管理菜园。

有一天，老李斯特前来探询：

"你们家的姑娘该出嫁了吧？"

面目凶狠的肥皂匠按照老规矩，表面上还得拒绝一下：

"那要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才能让她嫁人。"

"你总不至于让她老死在你家中吧？"

"她还来日方长哪！"

下一次由青年李斯特送油脂给拉格尔。肥皂匠在谈话中主动探问：

"你到现在还是孤孑一身吗？"

"是的，我还是个未婚男人。"

"别再等了，青年小伙子也会老掉牙的。"

"我也是这么说，大哥。"

从这开始到求婚就只有几步了。当老李斯特正式提出订婚时，拉格尔虽没有表现出喜形于色，但也承认纳吉马尔顿肥皂匠是不能违反天理的。

一八一一年一月十一日，在罗基教堂举行了婚礼。由于老天对这对年轻人的急切关怀，当年十月二十二日就让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李斯特·费兰茨。

差不多近半夜时，那农民的大车才到多波尔扬。老李斯特来到儿子的窗外叫门，一两分钟之后，小门窸窸窣窣地打开了，父子俩既没有问候寒暄，也没有说明来意就紧紧拥抱在一起了，随后一起走进屋里。

"亲爱的爸爸，您这是上哪去？"

"今天，我被埃斯代尔哈兹家辞退了。"

一时之间没有更多的话可说。青年李斯特陷入了沉思：

"应该给老爷写一份恭顺的申辩书去向他说明。"

"你写吧，我的儿子，我的思想已经干涸了，什么都不知道

了。既不会祈祷，也不会骂人。”

青年李斯特·亚当立即坐到桌旁，用最打动人心的语言讲述了这位上年纪的多子女的家长的不幸，以及他如何被抛到了这冬日的大路上。

李斯特·久尔吉·亚当早就放弃了斗争，但那血管中流着斯来扎克·波尔芭拉血液的儿子，对于把这个五十八岁的老头被抛到冬日的大道上，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他送去一份接一份的申辩书，文字越来越恭顺，内容越来越绝望：

“李斯特·亚当和妻子玛格多尔娜以一颗破碎了的心恳求公爵大人照顾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罪恶，但您决定的处分对我们是一种不堪设想的压力，而把我们开除出人群之外的耻辱，尤难忍受。”

没有回音，更无答复。这更加激起了青年李斯特·亚当的愤慨。他继续围攻基什马尔顿的总管家。

申辩书全篇都是央求，最后采用了希腊格律诗的体裁又写了一大段：

“与自己父亲深有同感的青年李斯特·亚当怀着愁苦的心情给您写信，请求公爵大人宽恕。只要能让我拯救自己的父亲，我愿接受您的惩罚和您加给我年迈而多子女的父亲的一切屈辱。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尽管胆小怕事的圣戛依发言赞成，逊宁格尔管理员仗义执

言，公爵的总管家仍不肯改变态度，所以一切请求都毫无结果。唯一的结果只是对逊宁格尔也采取了纪律措施。

老李斯特·亚当在纳吉马尔顿住了一些时候。不久，一个由莫逊州调来的名叫普朗考维尔的职员最后取代了老李斯特·亚当的职务。究竟是由于他的后继者残忍还是由于总管家的决定，老李斯特无从知道，但是几小时之内就得搬家腾地方，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们立即动手收拾那些干了四十年活才勉强购置起来的破烂家什，总起来一辆大车就装下了。他们全部的动产只有一个小衣柜，拆成两块木板的床，一个带抽屉的橱，一块坏了半边的镜子，一个挂钟和几本书。简单的炊事用具统统塞进了几个给孩子们当被褥用的口袋里。

当这辆搬家的大车来到多波尔扬的会计所时，青年李斯特·亚当和他的妻子都赶来迎接。他们先把小孩子接下车，然后殷勤地把老人扶进屋里。

青年李斯特·亚当的妻子拉格尔·安娜是个质朴忠厚的女人，她从来不爱多说话，这次也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爸爸，我们住得虽不宽敞，但只要是我们有的，我们心甘情愿地同你们一起分享。"

一间小房接待了这批无家可归的人（这间屋子比耳房只略宽一点）。它左首是锅台，右首是居室，就是这么个空间里，要容纳四个大人和孩子们的活动床。屋里是夯实的地面，放床的地方是木头地板，唯一奢侈点的东西就是一个绿色的陶瓷炉子，它给全家人带来了温暖。青年李斯特就是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也喜欢户外活动，因为房间里的空气实在太潮湿：晾着的衣服、孩子的衫裤甚至床上的一切，都任其在这既是厨房又是卧室的空

间里蒸腾着。

他不得不停止夜读，因为老李斯特最小的儿子奥洛约什刚刚两岁，搬家时正在发烧。为使孩子减轻痛苦，睡个好觉，他不敢让昏暗的灯光照射或惊醒小家伙。

青年李斯特仰面躺在地铺上，丝毫没有睡意。他又陷入沉思：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该怎么办呢？也许应该在公爵大人一年一度经过多波尔扬时拦他的马车进行申述，以两人共同信仰的宗教名义请他宽恕？要求他发发连异教徒的心也能被软化掉的慈悲？他就这样地躺着，听着小弟弟在发烧中的呻吟和翻滚，听着老父母愁闷而伤心的叹息；听着单调的音乐——房檐上的冰柱融化成水滴的声音……。这表明冬天已经结束，春天终于降临人间。

就在这些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老父亲。他思路敏捷，然而慌乱急躁，这就使他不能从头至尾跟定任何一个思想的漩涡。他性情温和，但是不能容忍别人手里有真理，哪怕是在很小的事情上也如此。他敏感而爱面子，却又不能照顾别人的敏感和面子。他常常面对面地对别人讲真话，至少是讲自认为的真话。头一天他还是个怕羞的客人，甚至连桌子的末席都不肯坐，但第二天却俨然以家长自居，开始对儿子和媳妇发号施令。

一八一四年一月，青年李斯特·亚当得到命令，要他去鲍多格索尼领地执行任务。那里虽然也有房子和厨房，但他不能携带父亲一帮人。老头子最后还想交涉一下，就同儿子一起驱车到卡博第村去了一趟。这里有尼茨基伯爵的一个庄园，差不多被埃斯代尔哈兹公爵的领地包围着。他家的一个听差常到多波尔扬来，与青年李斯特虽说不上是朋友，但也算得上是个熟人，

所以就去找他了。青年李斯特带着父亲同那人进行了诚挚的交谈。他说：

“我父亲曾经当过会计员，现在您随便给安排个书记员或助理书记员都行。我坦率地说，就是为了面包和生活。”

“我尽力帮忙，但伯爵大人无论如何也不会不要担保金哪。”

青年李斯特伸出手说：

“担保金由我负责。”

老李斯特的生活道路坎坷曲折，就是他的儿子也难于理解。在卡博第工作了一段，因为同别人打架而不得不到另外一个小村去住；后来又跟顶头上司动了拳头，结果就不是离开而是逃走。他先逃到都布林，以后在基赫伯爵家供职，最后又跑到波颠杜布夫去碰运气。在这里，他当了个最低等的小职员，实际上是呢绒工厂的体力劳动者。青年李斯特来这里看望过他，也给了他和孩子们一些零钱和衣物。青年李斯特最后一次来看他时，老头不在家，老太婆说可能到教堂去了。青年李斯特·亚当跟着就去找。

他跨进农村小教堂的大门后，立刻听到了一阵揪心的音乐声。在昏暗的大厅里，管风琴在狂叫。音乐中透露出某种光芒。青年李斯特认为这是给沉湎于梦幻中的信徒以光明的启迪。他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静悄悄地沿着合唱队上台的台阶走向管风琴。

老李斯特一点也没有发觉，继续演奏着。最后他终于发现来客是谁，于是马上停止弹琴。他带着一种羞涩的微笑对儿子说：

“我在和上帝谈话……我们彼此都有许多帐要算。”

青年李斯特的工作地点也难于固定下来，总管家几乎是不停地把他由这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基什马尔顿、弗拉克诺、考普瓦尔、多波尔扬、鲍多格索尼以及奎特维耶什等。

一八一五年夏天，青年李斯特又回到多波尔扬。这次他真要给自己做一个安乐窝了。肥皂匠拉格尔虽然不免要罗嗦一通以拖延时日，但终究还是给了堂妹安娜早就期待着的嫁妆。这真是一笔大资本——一千个银福林！

基什马尔顿总管家的金库也给了青年李斯特一笔补贴：单现金就等于他爸爸当年工资的一倍，整整一百三十福林；此外还有二十四公担小麦，四十八公担燕麦，十罐葡萄酒，十抱劈材以及有新时代气息的新燃料——二十公担煤炭。

现在可称之为小康之家了，也可以宴宾请客了。由朋友、老乡、哥们和同事组成的小圈子，常在冰封雪冻的冬日里到这里来寻求一点欢乐：现在有可以碰杯的人了；有可以谈论国家和世界命运的对象了；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贬恶扬善了。有时葡萄酒烧热了他们的心田，他们就唱起歌来。大家忘掉了语言的隔阂，匈牙利文和德文都用上了。

李斯特一家经常爱在他们一个好朋友、弗兰根堡管事家作客。此外还有一位上尉奈斯涅尔·尤若夫（他的名字上还必须加上冯·格律封贝尔格），他那华丽的装束真为弗兰根堡的小房间增光生色。上尉先生很注意等级差别，处处总要显示出国王军官和领地雇员之间的差别。他还雇了一个仆人。他的军官制服有点破，沾有泥巴的旧皮靴也与他崇高的地位不相称。他有时在邻居们面前并不隐瞒：他的仆人还兼做他家的护院人，整日巡游在牲口圈旁的粪堆、菜园和农具保管室的周围。但不管怎样，他毕竟有个仆人，这就可以提高上尉先生在村子里的身份。

在孩子的房间里，小家伙们也在聚会：弗兰根堡的名叫多尔

菲的儿子、上尉的两个孩子古斯达夫和玛利娅、基什马尔顿税务官霍弗尔的儿子拉约什以及青年李斯特·亚当的儿子李斯特·费兰茨。

其他孩子都象农家子弟一样健壮。多尔菲正吵着要骑马，催他爸爸快点套马，别心疼鞭子。上尉的孩子玛利娅才七岁。古斯达夫十岁，俨然象个小兵，在家里每天早上一蹦下床就向厨房跑，在那里洗冷水浴。

李斯特·费兰茨就在这帮人中间。他的脸色白白的，好象一块白布；眼睛亮晶晶的，连他妈妈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发烧引起的，还是因为在生人当中不习惯。也可能是眼泪洗刷的结果，因为小费兰茨特别爱哭。

成年人对孩子们的恐惧心情和孤独感是不大注意的。弗兰根堡的客人们更是缺乏这种敏感性。当夏日来临，他们坐在枝桠繁茂的老桑树下碰杯时，小费兰茨与其说是他们的伙伴，还不如说是他们的欺侮对象。如果需要追赶谁的话，他们肯定是追他。假如小霍弗尔又要给谁起个诨名取笑人，肯定又是针对小费兰茨的。所以脸色苍白的小李斯特·费兰茨总是远离他的小伙伴，背靠着牲口圈的大墙，随时准备应付那些对别人是玩笑而对他则是痛苦的恶作剧或游戏。

大人们都在老桑树下开怀畅饮，谁也不瞧孩子们一眼。当奈斯涅尔上尉到小菜园去的时候，这可是好时机，孩子们开始用土块摔小费兰茨，打得那刚粉刷过的牲口圈的土墙泥尘四溅。上尉先是摆手制止自己的孩子，之后跑到那些围攻者面前（因为这种围攻的参加者还有邻居的小孩子们）：

"你们这算什么游戏?!"

孩子们马上跑散了，使他抓不着他们，但他自己的孩子仍留在那里。上尉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这个小孩?”

奈斯涅尔·玛利娅(她的家长不允许其他孩子把她叫作玛利什卡或者玛尔恰)胆怯地回答说:

“我们不是欺负他,只是想同他玩……”

上尉站了一会,无可奈何地打量着三个孩子。别的孩子早跑散了,现在只有他自己的儿子、女儿和小费兰茨在场。这个老军人拉过自己的儿女,然后在他一生中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了直到现在还贴墙站着的小费兰茨。孩子的额头白得象纯净的大理石,眼神却象是成年人的,一股纤细的早熟的线条挂在他那秀美的嘴角上,似乎不必向上翘起,就把世人都看透了。

“他们欺负你啦?”上尉问他。

“没有……”孩子回答。

“我看见他们用土块摔你。”

“那是开玩笑……”

“你为什么不讲真情?”

“我不想出卖别人。”

老军人再一次把自己的儿女拢到胸前,悄声地说了几句话:“你们放开他吧!他觉得自己和你们不一样,他不象你们,他将成长为另外一种人。”

青年李斯特·亚当就是另外一种人。他把得到的一千个银福林严严实实地收藏了一段时间,而且每天还要数几次。有一天,他请了假,雇了一辆车,直奔绍普隆市。他跑遍整个城市,终于买到了一架钢琴。这架钢琴整整花了他六百福林,也就是说,夫人嫁妆的一大半都浪费在这个“带琴键的打琴”上了。

李斯特·亚当从基什马尔顿的总管家那里收到一封接一封表扬他的信件,但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反复地向人们表

明，他不同于他父亲，是另外一种木头雕成的；任何情绪和嗜好都不能触动他，就象秋风吹不掉的叶子一样。这位多波尔扬的会计员把每分钟的闲暇时间都花在钢琴上。搞音乐演奏，是需要有伴的。如果不能与别人的相碰，那算是什么酒杯呢？而不能立刻了解其影响的，那又算是什么音乐呢？青年李斯特·亚当显然是没伴的，他的夫人安娜尽管常常坐在钢琴旁边，但从来不说话，不叹气，不笑也不流泪，好象音乐对她毫无影响，既无欢快也无痛楚。她坐在那里机械地翻动着毛衣针。风暴翻滚的乐音对她来说似乎只是时光消逝的呼啸。

原来李斯特·亚当演奏的是莫扎特①、海顿②的作品。他还弹洪梅尔先生写的十分难弹的乐曲，也常常翻动一种十分珍贵难得的乐谱，它的封面上写着“钢琴复调，冯·约翰·谢巴斯蒂安·巴赫（原为德文）③”。此外，他还演奏贝多芬④和克莱门蒂、吉洛维茨和杜谢克的作品，当然有时也根据记忆弹奏他青年

---

① 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自幼从父学钢琴、小提琴，并开始作曲。他深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写了具有鲜明反贵族倾向的音乐作品，如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作品还有交响曲四十九部、各种独奏乐器的协奏曲、钢琴奏鸣曲等。

② 海顿(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刻苦自学作曲。其创作广泛吸取奥地利、波希米亚等地民族、民间音乐素材，风格质朴。主要作品有交响曲一百余部以及大量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各种独奏乐器的协奏曲、清唱剧等。

③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德国作曲家。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又深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毕生刻苦钻研，创作异常勤奋。其大量作品对西洋近代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④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即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不少作品反映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热情及其理想中的英雄性格。晚年部分作品流露消极隐退情绪。他在欧洲音乐史上，继承海顿、莫扎特的传统，吸取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成果，集古典派之大成，开浪漫派的先河，对近代西洋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主要作品有交响曲九部、钢琴奏鸣曲三十二首、钢琴协奏曲五部、弦乐四重奏十六部、一些歌剧的配乐等。

时期在夫什老师身旁学艺时记得的那些优美旋律。

青年李斯特·亚当就这样默默地演奏着。他只好强迫安娜去睡觉，有什么必要坐在那里熬夜呢？如果什么时候有点兴趣了，就是在另一间屋子里也可以听嘛。安娜对此并不表示异议。她顺从地安歇去了。亚当在演奏的间歇中，甚至可以听得到年轻妇人健康而略带细微声息的呼吸。

有一天晚上——亚当正叫妻子去睡觉——小儿子费兰茨突然毕恭毕敬地吻了吻爸爸的手，问道：

“我可以在这里呆一会儿吗？”

安娜把儿子拉向自己，说：

“这种时候小孩子应该在床上。”

孩子潮湿的双眼捕捉着爸爸的视线：“您说一声让我留下吧！”

亚当微笑着对妻子说：

“那就让他留下吧！”

从这时起，父子俩每天晚上都能在一起呆上一会儿。安娜早就进入梦乡，小费兰茨却活跃在钢琴旁。他的眼睛半闭着，头略微向后扬，嘴角不停地颤抖，好象音乐中的痛苦感情正在折磨着他的身心。

一天晚上，爸爸问他：

“你记住了一些曲调吗？”

小费兰茨奇怪地望着爸爸，说：

“怎么是‘一些’呢？我全都记住了！”

一八一六年十二月的一个夜里，在幸福的光辉照射不到的远离世界中心的多波尔扬小职员的住家里，一个清亮而无颤音的童声在歌唱，象音叉在发音时那么准确地一个接一个地唱出了莫扎特的旋律、洪梅尔的回旋曲、巴赫音调丰富的歌曲以及那

些沁人肺腑、百听不厌的特殊音乐……。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些曲子的作者是些什么人。只要爸爸教给他，他就立刻按照字母表拚记下来（李斯特·费兰茨就在这些夜间的音乐课上同时学会了字母的拼写)。李斯特·亚当把着费兰茨的手,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路德维希·贝多芬这几个字。

第二天夜里,李斯特·亚当两口子第一次吵嘴。说吵嘴,这个词也许并不确切,因为吵嘴是要大声嚷嚷的,而亚当和安娜却只轻声说了很少几句话：

“孩子应该学习音乐。”男的说。

“学那干嘛?”女的问。

长时间的沉默。亚当并不是没有词汇来解释为什么要学习音乐,他缺乏的是敢不敢总结自己生活和愿望的勇气。青年李斯特·亚当如何才能对这个沉默寡言、温柔顺从的女人解释清楚呢？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放弃了梦想,可是现在他又重新梦想了。不过他比从前看得更远，他现在看到的是自己儿子的前途。

老李斯特·亚当目前正在波颠杜布夫呢绒厂做工。他儿子的小车已经陷在多波尔扬的深深的泥潭中了,……也许费兰茨……

青年李斯特·亚当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教书。这是一种特殊的教学。好象他在教费兰茨学一种语言，已经学会,但过后又忘了,现在他只需要重新回忆起那些已经淡忘了的印象就行了。

亚当有一段时间曾试图控制孩子的学习进度。他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即比一个中等程度的孩子快十倍、百倍的学习速度,不可能是健康的事情。开头他还试图掌握速度，但后来慢慢发

现，不是他在指导自己的儿子，而是儿子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推动着他。这使亚当感到担心，因为猛跑是会栽跟头的。

做妈妈的对这件事看得远远比他简单，而且头脑也清醒得多。这孩子成天泡在钢琴旁边，由于紧张和激动连饭都不好好吃。他好象不是个有血有肉的孩子，而是从天上下凡的神灵，很快就要回到天上去似的。

亚当和安娜差不多每天都要拌嘴。亚当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安娜则为孩子的生命而争执。有一天孩子失去了知觉。妈妈看到他的时候，他正趴在地上，两个臂膀摊开着，好象在试验天使的翅膀。亚当立刻抱起孩子，跑去找基什马尔顿的医生。在埃斯代尔哈兹领地上，近六十年来的儿童死亡率是人们毫不关心的问题。人们只是到生命危殆时才请医生，吃点便宜药，因而坟墓常常夺走孩子们的生命。老医生戴着鬈曲的白发套，蓄着少见的白胡子，随身带来了黎明前特有的严寒冰霜和死亡正在叩李斯特家门的警告。他很熟练地脱去了孩子的衣服，然后开始仔细检查那瘦骨嶙峋的四肢和楞角可见的肋部，它们已经不大有什么生机。老医生直截了当地说：

“体温很高。如果他再抽风，那我就不知道他能否活到明天。”

那位一直(不仅是婚后，可以说她一生中)都是绝对顺从的妈妈，现在造反了。她一下子推开了医生和丈夫，要他们别管她的孩子。男人们在哪里放弃斗争，女人们就在哪里重新开始。她抱起仍无知觉的儿子，把他放在全家最暖和的床铺上，在脚下垫了块热砖，她自己则直挺挺地跪在床边开始祷告。这女人的祷告是那样虔诚，以致她觉得自己已经与这个世界脱离了。她周围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家是如此，丈夫也如此。日常那些纷繁琐碎的事情和想法现在一下都消失了。她神经质地反复叨

念：上帝救救我，上帝救救我！

从这开始，三周之内孩子没离过她的胸口。邻居帮她烧饭、打扫和照应亚当的生活，并且派人通知老李斯特，告诉他孙子可能会死。安娜夜以继日地守护着孩子，一会儿擦他额上的冷汗珠，一会儿又把汤水灌进冰冷的双唇，就是喂老医生开的药，眼睛也不离时钟的指针，好象儿子的生命差一分钟就会消逝一般。

村里盛传说，会计员的孩子已经死了。当地的乡村大事记里是这样记述的：

> "这一带的人都认为这孩子是死了，而且事实上木匠已经在动手制作棺材。"（原文为德语——译注）

整整三周，安娜没离开过孩子左右。第四周，费兰茨开始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要弹钢琴。于是，那美妙动人的学习又重新开始了。

亚当常常把孩子带到基什马尔顿的朋友家，甚至有时还大胆地去绍普隆城。父亲以一种与日俱增的惊异心情注视着自己的儿子：难道这就是那个想回到天堂去的小天使吗？这就是那个被围堵在牲口圈墙角边吓得要死的儿童吗？这孩子有朝一日会变得光彩夺目并且在自己的周围建起宫殿来吗？

费兰茨在家里的演奏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不过这同在众人面前演奏相比，还只能算是普通的练习。他为听众演奏时，那才真象长了翅膀。他要征服人们。掌声和欢呼使他脸红，使他成长，甚至可以说使他变得更秀美了。

虽然费兰茨才八岁，但他会的东西却足以使李斯特·亚当和基什马尔顿领地上留下来的几位乐师感到惊异。在他面前放一本乐谱，只要让他看一眼，就马上能够演奏；然后拿走乐谱，他

可以凭记忆演奏全曲。李斯特·亚当由于恐惧而发抖。这就象一个在梦中捡到黄金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感觉：很快要醒的，醒来之后黄金就将消失。他想：象费兰茨这样的农村孩子，除了几栋佣人宿舍之外，他还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居然敢走进圣戛依老爷家的宅院，自信地登上那大理石的台阶，穿过用雕刻镶嵌的前庭和沙龙，微微地弯下腰，去吻圣戛依太太的手，并向三位小姐表示问候（他究竟是从谁那里学来的这一套礼貌呢?），然后坐在那里弹钢琴，作出色的演奏，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圣戛依先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孩子很快就要超越家长的教育水平了。下一步该怎样关怀他的学业呢?"

亚当心事重重地凝望着前面，半晌才说：

"这的确连我也不知道。学音乐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维也纳。但这需要很大一笔经费。稍微有点真才实学的乐师（亚当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打听过这件事），每个小时至少要五个福林的报酬，一周十五福林，一年就要七百到八百福林。这个艺术幼苗还得学习法语和意大利语，此外还要有住处、伙食、乐谱、图书以及陪同人的生活费用等。我总不能让一个小孩子自己放单飞啊!"

圣戛依老爷听后直点头：

"是啊，我的朋友，但究竟需要多少钱呢?"

李斯特·亚当实际上对这次谈话是有充分准备的。他拿出了数字表格（在这时，一个梦幻者和拘谨的职员性格同时显露出来了）并念了其中几项开支，最后的总开支是个吓人的数目：一千五百福林。

圣戛依老爷想了半天，最后说：

“可以写个书面申请，当然数字不要太大。申请报告中可以稍微点一点我们老爷乐善好施的传统风格，说埃斯代尔哈兹家族总是乐于资助各个时代的著名音乐家的。全文不要超过二至三页。我给你呈交给公爵老爷，我相信总不会毫无结果的。”

一天，公爵老爷把圣戛依传来，问道：

“这又是什么怪事？这个李斯特一家从来就不安分。”

“老爷，那孩子确实不是一般的孩子。”

“即使如此，我也不能随便为一个孩子出一千五百福林啊！一些乡下人称赞了他几句，就把他一家人都弄疯了。”

圣戛依细嫩的皮肤开始泛红，他说：

“老爷，我是从不赞助丑恶的事情的。这个孩子可实在是个奇迹。我建议，您还是给维也纳的管事基阿伊写封信，也许他能给青年李斯特·亚当找个职业，使他有住处、伙食和有限的收入，这样他只要再想法为孩子筹措学费就行了。”

公爵大人按自己的习惯，在屋里反复地踱着步，不耐烦地说道：

“圣戛依，你别管我了。我有成千上万的事要办，你却要我去管一个乡巴佬的孩子。如果你无论怎样都想帮助他，我不反对你给基阿伊写信，甚至你还可以写上：公爵不反对调亚当去维也纳工作。”

但基阿伊却表示反对。因为在维也纳的办事处里安插一个会计员，会冲破他那个利益集团的成员们所结起的蛛网。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转着圈儿地玩弄外交辞令，然后用简短的两个字回绝：不行！

为了李斯特一家迁居维也纳，老医生也赶来帮忙。老医生自从费兰茨生病以来，每周都来李斯特家看望。他诚恳地说：

“这所房子(农民还按它原主人的名字称作伊雷什小屋)是不够卫生的，体格瘦弱的孩子会因此而送命。你看，满墙都渗出碱末，地板缝里常常长出蘑菇，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霉味。”

其实这倒不需要老医生来证实，因为那架六百福林的钢琴是比什么都好的证明：由于潮湿，琴弦已经松弛；琴键涨得很紧，以致别说用手指，就是用拳头也难于弹动它们。

一封来自绍普隆的信，催促李斯特·亚当上路，因为布劳温男爵想和这位管事谈一谈。虽然李斯特·亚当有点怀疑，不知是否得罪了男爵，自己怎么会一下子由会计晋升为管事，但他还是无法抗拒自己的好奇心，所以在下一个休息日就驱车到绍普隆市谒见男爵去了。

在“邮政号角”旅馆里，亚当找到了布劳温男爵的家庭教师，他正在旅馆餐厅的酒吧间里等待着来自多波尔扬的客人。这位教师是个严肃的戴眼镜的男人，与其说他是个老师还不如说更象一个狱吏。他先含糊不清地说了一个名字，好象想站起身来迎接客人，但实际上他的身子根本没有离开那摆着空酒瓶的桌子，这说明教师先生不是反对喝酒的人。他没有说多少不相干的话，立刻转入关于男爵邀请目的的正题：

“我所看护的布劳温男爵(教师停顿了一下，好象在有意地调整一下主旋律)是个不幸的人，他的双目在孩提时就已失明。”

亚当无话可说，只好伸过手去表示同情。

神情严肃的教师招了一下手，又要了一瓶酒，然后继续他的谈话：

“如果我对他的照顾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就要想办法去弥补(教师打了个嗝，当他从瓶里往外倒酒时，不得不又暂停一下谈

话）。我的照顾减轻了他所受到的打击，我为他提供了美妙的音乐礼物。”

亚当清了一下喉咙，问道：

“如果允许我打听一下的话，男爵老爷今年多大年纪？”

“刚满十七岁，拉得一手绝妙的小提琴。过去五年中，他使维也纳、波若尼[1]、佩斯—布达、卡沙、纳吉色班和代麦什瓦尔[2]的听众着了魔，全世界都说他是新莫扎特。”

亚当有礼貌地点着头，说：

“这是音乐家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称号。”

神情严肃的教师友善地点了点头，说：

“圣戛依先生告诉我，您正在为自己儿子的前途奔波。我本人是个搞艺术的，我总是听从我的良心，然后，再听从我的智慧……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帮助您的办法：让您那多波尔扬的神童公开演出。”

亚当还不甚通晓社交谈话的技巧，因此想进一步了解刚才那些话的意思。他问道：

“简单说来，您的意思是不是要两个孩子同台演出？”

“可以这样说。事实上那将是一次震动绍普隆城和莫逊州的光辉演出。不过男爵先生是主演，您的孩子只能是这个盛典的参加者。”

在此之后，男爵本人也出来了。很多失明者具有惊人的方位判断力以及在人们、家具、台阶和其他障碍物间穿行的本领，似乎他们并不是缺乏视觉的人。但是这个可怜的小男爵却不是这种特殊人物。如果没有他的教师，他就寸步难行。他一坐到桌边，立刻就要吃喝。这位布劳温男爵活象一头永远吃不饱的

---

① 波若尼，今为布拉迪斯洛伐。

② 代麦什瓦尔，今为罗马尼亚的蒂米萨拉。

牲口，他那肥胖而布满麻点的脸庞上闪动着追求食物的贪婪光芒。目光锐利的家庭教师竭力试图把男爵拉入谈话圈，但毫不奏效。胖脸男爵始终一言不发。只见他咀嚼肌肉在运动，好象真地吃到了什么好东西似的。

布劳温男爵的——正如后来的音乐会所表明的那样——小提琴演奏是很糟糕的，然而老教师的组织天才却是惊人的。绍普隆剧院那天聚集了全城的上流人物：埃斯代尔哈兹家族（由于无法得知的原因，公爵一家人似乎到的不全）、维恰依家族、亚当家族、基赫家族和沙巴立家族的伯爵们都来了。塞钦尼家族中的几位成员以及尼茨基·安道尔伯爵家也光临音乐会，而且是倾巢出动。基什马尔顿的有钱的职员们，也纷纷携带家眷在前排就座。乐队的本身也显出了对听众的尊敬。除了埃斯代尔哈兹庄园的老圆号手和定音鼓手之外，乐队是由医生、教师、簧风琴手等各行业中的看家好手组成的。

外面已经响过了男爵颤抖不稳的小提琴声。对亚当来说，比小提琴声更有意义的是人声鼎沸的听众席中骤然出现的安静。四百名听众正在期待着他儿子的登台（因为李斯特·亚当毫不怀疑：这庞大听众队伍的聚集，绝不是为了听那瞎男爵的演奏，而是为了欣赏费兰茨的艺术）。

他搂着自己的儿子问道：

“我想你不至于害怕吧？”

孩子没有回答，只是抬头看了看父亲。孩子的目光使父亲感到羞愧，因为他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一件往事：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显贵们常在埃斯代尔哈兹领地上赛马，亚当曾在起跑线上服务过。有一次，他牵着公爵的马手乘骑的一匹纯种马，它由于激动和夺标的兴奋，也曾用这种目光审视过亚当。现在，亚当自

已也觉得这种联想是不大合适的。

当目光锐利的老教师向幕后通知下一个演奏者是李斯特·费兰茨时，孩子一下子跳了起来，一路小跑，匆匆登上了舞台。如果不是别人提醒，亚当恐怕连妻子的存在也忘记了。这时他手挽安娜，也是一路小跑，直奔走廊的尽头。他们进了包厢，还没来得及坐下，乐队已经开始演奏了。安娜背向舞台坐下，她不忍看自己的独生子在那里受折磨。亚当则雄赳赳地盯着舞台，他惊恐地发现：在那些穿着考究、略微发胖的音乐师当中，他的孩子显得特别瘦弱。看上去，孩子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窘境，因为他象个受气包似地端坐在乐队的中央。乐队在演奏前奏。他低着头紧抱着双臂，好象周围的音响会使他不断颤抖。但是当乐队指挥向他这边做了个手势时，人们不禁倒抽了口凉气，因为那孩子手下爆发出的声音竟象教堂里的钟鸣。从这一分钟开始，人们的眼睛再也没有去看指挥，尽管他是奥索亚教堂的神父。人们也不再去注意乐队的其他人，只注视那个在事实上操纵着乐队的孩子。他振翅高飞，象千军万马中飘动的帅旗，掌握着节奏，调节着疾如闪电的速度；最后一排的听众站起来了，跟着，一排接一排都站起来了，好象这乐曲中有什么东西使他们无法再坐着欣赏似的。

奏完赖斯协奏曲之后（这是节目单上印好的）是返场节目。这时亚当的心已经提到嗓眼了。但见费兰茨从坐凳上溜下来（没法不溜，因为他的脚根本就沾不着地板），慢慢走到乐池的边缘，深深鞠了一躬，接着是更深的一鞠躬，然后直起身来（这时安娜妈妈已经受不住了，她从包厢跑到走廊上），用铃铛般的童音问道："各位想听什么曲目？"

掌声，笑声，欢呼声，真是演出成功后的雷电轰鸣。在一片喧嚣声中，有人提了几个曲目：《唐璜》中唐璜与采琳娜的二重唱

和贝多芬小步舞曲。

费兰茨深沉地思索了一下——没有任何人提醒他——他意识到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人们常常通过一个艺术家掌握不同作曲家的优秀作品的程度来衡量他的勤奋和技巧。春雷般的滚动，闪动而过的快板，华丽的颤音等，这些都只能算是表演，而真正的艺术——至少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是这样认为的——是创造性的艺术。你可以借用别人的曲调，但其他的就要靠你自己加工了。

费兰茨思索着，深沉地思索着。思索的时间可能比一般人所认为的还要长些，因为现在他开始认识到：等待就如同拉弓，弓拉得越满，就越能射到更远的目标。

他等待了一会。随后，犹如一只巧手在拨动竖琴而发出音响，美妙的乐曲又开始涌流而出。在一片轰鸣之后，接着就是更清晰、更明亮的莫扎特的旋律。

第二天，来拜访李斯特·亚当的几乎是一个真正的代表团。音乐会要重新举行。亚当并不反对，但要推迟一个月，因为这孩子不久前刚生过一场重病，不能太损害他的健康。除此之外，亚当对于推迟这一行动还另有打算：这次胜利的消息肯定会传到基什马尔顿，现在可以向公爵介绍这孩子了。为了见公爵即使需要到处求情、讨好，说到底就是要受到屈辱，也在所不惜。

他用工整的花体字母和恭敬的称呼又写了一封信。公爵的回信虽然迟了些，但终究还是回了信：他将在九月末回家时的某一天抽出几分钟时间接见费兰茨。

当然，如果在公爵接见时，漏掉庄园的乐队指挥夫什先生，那将是很不礼貌的事，所以必须单独向他通报这个好消息。如果他在百忙中能够抽出时间来，而且不违背公爵大人的习惯作

法，希望他也能出席在这次接见的同时所安排的音乐会。

夫什先生真的来了，而且比规定的时间早了一刻钟。夫什先生的视力不好(经常读谱和抄谱，毁了他的健康)。他一生中有两个嗜好，一个是音乐，一个是给他带来快速兴奋的烟盒。这个把鼻子揉得发紫的驼背老头来到公爵面前，就费兰茨的家庭音乐会大致表述了如下看法：这样的孩子和猴子差不多，你可以教他学会任何东西，因为棍子是个好教师，它可以把傻瓜雕琢成智者。李斯特的这个孩子什么乐曲都能弹，但他并不懂音乐科学。因而我愿提醒阁下，对待这样的神童应当特别小心谨慎。

让人们久等，这是统治者智慧的第一诫。李斯特·亚当一家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公爵和夫什先生(就在公爵后面三步左右)才姗姗而来。儿童另有自己的光学标准，他们看到的东西与大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费兰茨现在就没有看到围绕在老爷头上使仆人们如此恭敬的光圈。亚当深深地鞠了一躬，一直到老爷开口说话才抬起头来。可孩子是坦率的，他完全是以一种好奇的而不是受宠若惊的态度瞧着老爷。公爵大人穿着沾有泥巴的深统马靴和贴着鹿皮的马裤。坎肩底下是一件黄白色的绸衫。外面披着一件在舞台上常见的土耳其式披风。这是公爵在家里的时候为了舒服才穿上的(当然也有某种礼仪上的意义，就是说不必过分严肃地对待客人，对他们可以随便一些)。

公爵——以他所能做到的程度——表现得很友善："嗯，李斯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这种问法也是宫廷礼仪的一部分，表示老爷是不屑一顾零星小事的，因此需要别人提醒他)。

亚当慢慢直起身，结结巴巴地背出了刻意学会的台词：

"我是青年李斯特·亚当，是您的多波尔扬牧羊场的首席会计员。我卑贱地恳求您允许我那名叫费兰茨的儿子为您进行表演。"

公爵坐下了(坐在这间房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这样,夫什先生和亚当他们就只好站着了)。过了一会,公爵终于又仁慈地开了口:

“那就让我听听你的儿子会弹什么吧!”

亚当赶紧把准备好的台词又背了出来:

“我儿子费兰茨学了三年钢琴。这期间他居然获得了很大进步,使周围一带的所有音乐鉴赏家为之着迷。他可以识谱演奏,可以变调演奏,也可以按您想象的即兴演奏。”

夫什先生咳嗽了一声,表示要说话。公爵允许后,他才说道:

“我认为,”他又揉了一下那个经过无数次揉搓而发紫的鼻子,“周围一带的音乐鉴赏家们,”这时,夫什先生为了增加讽刺效果而故意放慢了说话速度,“并不懂得多少音乐科学。”

亚当为表示尊重他的话,又弯下了身子:

“在这方面,当然指挥先生懂得更多!”

夫什先生继续发表他的高论:

“我的意见是,先要对孩子进行仔细的测验,因为家长和周围人们的捧场,可能会把他推向这样一种结局:开初是桂冠临头,最后则是哭泣失望。”

公爵大人带着一种感兴趣的神情打量这三个人。埃斯代尔哈兹公爵虽不是心理学家,但他对人的性格了解很深。毫无疑问,这里马上会有一场战争,是一场在守城的老头和攻城的孩子之间的战争。

交战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夫什先生拿来了一本乐谱,放在钢琴架上,然后击掌示意,让仆役搬进一张凳子来。指挥先生严肃地发出指示:

“孩子!你弹一下第七页。”

费兰茨先通读一遍乐谱，然后平静地开始演奏。他既不急促也不拖沓，其自然的程度就如人们在讲自己的祖国语言。

夫什先生突然又把考试的螺丝紧了一扣：

“孩子！你演奏的是什么调性？”

“d小调。”

“那你再用b小调重奏一次。”

这时，如果孩子思索、计算，或者去测定调性的变化距离，那么奇迹就会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掉。然而费兰茨既没有思索、计算，更没有去数数，而是立刻就弹起来。仍然是毫不夸张的节奏，既不快也不慢，而是由乐曲的自然脉搏所要求的恰到好处的速度。

这时，公爵讲话了：

“你真的从未读过这本乐谱吗？”

“是的。从来也没有读过。”

公爵又问：

“你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打算在绍普隆城再举行一次音乐会，阁下！”亚当兴奋地回答道。“至于在这之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布劳温男爵通知我说，他将在维也纳和巴登举行一次家庭音乐会。沙巴立伯爵则坚持要我们在绍普隆音乐会之后到波若尼去为老爷太太们再表演一次。”

公爵沉吟了半晌，两只眼睛紧盯着那双沾了泥巴的马靴，好象在琢磨究竟是怎么踩了一脚泥似的。他终于表示：

“李斯特可以到总管家那里去报到。圣戛依以后会帮你搞到去维也纳和巴登的通行证。”

亚当深深地鞠了一躬，那孩子也机灵地模仿他爸爸鞠了一躬。当他们直起身时，公爵一行已经向外走了。在公爵背后三

步之远是夫什先生。仆人打开了大门，无声地示意：这次接见结束了。

接着的几个星期，可以说是对安娜的考验时期。亚当由于感到骄傲而神采奕奕。但费兰茨却表现得很自然。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面对个别听众，无论是旅馆的房间，邮局的马车，还是充满猪油和大葱气味的酒馆，他都无所谓，就好象已经过多年的实践锻炼一样。使他经常想起第二次绍普隆音乐会的倒是拉代茨基团队的出动。因为奈斯涅尔上尉动员了所有的军官同事，而他们又都拉来了一大帮显贵的朋友。这些人不仅为自己的男爵、伯爵封号而骄傲，更为能参加如此众多上流人物的聚会而高兴。可以说，第二次绍普隆音乐会纯粹是一次庆祝会。

在波若尼，由于所受到的热烈欢迎，人们甚至同意授给这位儿童艺术家以奖学金。一些显赫的家族，如阿波尼、阿马代、沙巴立、埃尔都第、维恰依以及埃斯代尔哈兹·米哈依等老爷都接待了他。奖学金是管六年的，但匈牙利式的热情就是这样，当第一个六百福林还没收集起来时，由于人已经去维也纳和巴黎，那后边的钱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尽管如此，亚当还是感到很骄傲，因为他儿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印刷品上。《普来斯堡报》的科学评论员克来因·亨利教授（业余作曲家、管风琴专家，同时又是另一位匈牙利著名音乐家艾克尔青年时代的老师）关于这位儿童艺术家曾写过这样的话：

上个星期日，即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斯特·费兰茨这位九岁的名手，有幸在埃斯代尔哈兹公爵的府第，为达官贵人和许多音乐爱好者献艺。小艺

术家有非凡的技巧和极快的识谱能力，连最难的作品也能立即读出并把放在他面前的一切作品完美地演奏出来。他使人们感到惊异，他激起了人们最光辉的希望。”

在此之后，李斯特一家乘坐驿站的马车，前往维也纳和巴登。

一八二一年一月，他们返回家中，又重新开始过穷困的生活，提出屈辱性的申请。亚当终于明白：他非但在维也纳找不到工作，就是在埃斯代尔哈兹家族无边无际的维也纳领地上，也找不到一块立锥之地！亚当到这时什么都不要求了，只要求给他一年停薪的假期。就是这一点，也要等到一个名叫帕里什的职员表示愿意搬进李斯特家那间又潮又霉的屋子，并同意只拿与李斯特同样的工资之后才能实现。

他申请的另一成果，是那位慈悲的老爷答应拨出二百福林作为对儿童天才的资助。

亚当决定，这次要一下子迈出三步。第一步，不管安娜如何绝望、啼哭和预卜凶途，一定要把全家搬到维也纳。第二步，立刻给洪梅尔·涅波穆克·亚诺什写信，请他顾念昔日友情，收留这位小音乐家。第三步，经过千百次地反复考虑，最后决心把那二百福林退还给公爵老爷，表示自己不要施舍！

安娜曾想对最后一项决定加以劝阻，但亚当是不可动摇的。他今年四十五岁了，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从未能直起腰杆，从未能说过一次压在自己心头上的话。整整二十五年了！他在泥潭中挣扎，努力学习，为的又是什么？就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忘掉在中学和大学时忍饥挨饿学到的那一点点

东西。

他以退回公爵施舍的行动来庆祝自己穷困的周年。圣戛依先生两次前来相劝，说不要在头脑发热时做出决定，但亚当不肯听这位好心人的劝告。相反，他破釜沉舟，变卖了所有的家私：钢琴、橱柜、图书、唯一的珍品——一块旧金表以及院子里的家禽和圈里的牲畜。洪梅尔也终于来信了，同意教他的孩子，但代价是每小时一个金福林。这种同意无异于拒绝，因为这样高的学费只有家满万贯的富豪才付得起。就是这个坏消息也未能动摇亚当的意志。他不再变卖家产了，而是干脆把它们抛到大街上，就象遇难的海员一样，竭力想摆脱一切造成负担的零星杂物，只求能游向那生的希望在召唤他的港口去。

一八二二年五月八日，李斯特一家离开了多波尔扬。亚当硬着头皮和邻居们谈笑，好象根本不知道驿车已经开动了似的。他既不去看隐现在薄雾中的邻居房子，也没瞧一眼晚霞照射着的朋友住宅。这时，一种空虚的感觉袭来：我的决定究竟对不对？

安娜隐瞒不住自己的感情。她哭了。她已经大哭过一场，现在只是在啜泣，她甚至不想去擦干红肿眼睛中的泪水。

李斯特·费兰茨的情绪却很好。他在考验自己作为征服者的品格。驿车离开村边时，这个白脸庞金头发的小男孩已经博得了车上所有其他乘客的欢心。

李斯特·亚当的全部财产不超过七百福林。这在多波尔扬要算是一笔不小的资本，就是在基什马尔顿也说得上是很大的一笔财产。可是到维也纳之后会怎样呢？七百福林在维也纳会立刻从手里融化掉。

最初，他们住在斯梯夫高斯街92号的兹乌姆·格仑宁·伊格尔客店的第一层。不到一周，亚当就发现，那些侍者、使女、门房和车夫，就象从他手里抢钱一样地对他进行勒索。于是他搬到克鲁盖尔斯特拉斯街1047号的第二层，这样至少可以躲开仆人们的纷扰。房间当然是窄了些(因为便宜嘛)，于是又发生了新问题：需要租一架钢琴。然而更急人的问题是要给费兰茨请音乐教员。亚当按照人们的推荐，挨门挨户地拜访了那些先生们。他们众口一词地认为，能给这个天才的孩子当老师的只有贝多芬的学生卡尔·车尔尼一人。

星期六正午十二时，也就是人们传统的“第一次拜访”的时间里，亚当拜访了车尔尼先生。车尔尼是个未婚男子，目前还和双亲住在一起。他的住宅虽然也在克鲁盖尔斯特拉斯街上，但显然与周围的房子不同。那些老房子由于岁月的剥蚀，不是从顶盖就是从台阶上掉下砖块，而车尔尼的住宅却象放在丝绒盒里的首饰一样闪闪发亮。车尔尼妈妈——从不看街上的行人——每天穿行在院中的小道上，从房子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用同样的细心查看房子的台阶和楼板，看看那橘黄色的地板上和透明的石蜡下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她能看到的部分是有限的，因为大部分地板是铺着地毯的，地毯上还罩着保护地毯用的布单。但这老妇人对罩单也很精心，特别是对那从一个房间铺到另一个房间的过道上的地毯罩单，让什么客人使用，她都是要过问的。与此相似，桌面也都用柔软的呢绒铺盖着。至于扶手圈椅乃至周围的壁柜，也都会引起人们一种难受的感觉，仿佛自己是走在一个磨光了的玻璃杯的内壁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个四脚朝天。虽然这个家庭的两个男人都立意要成为自由艺术家，但他们谁也不曾对女主人的严格表示异议。老文泽尔·车尔尼已经六十岁开外，默默地承认了这种不可改变的现实。年轻的

卡尔·车尔尼完全顺从了女主人的思想影响，但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谨小慎微，繁琐细碎，可以说：他为自己的职业也设下了许多保护性的“罩单”，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使音乐教师的职业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平。

卡尔·车尔尼在一个星期六，抱着某种不太相信的心情，接待了这些从巴诺尼亚① 来的客人。他让他们稍微等候了一会，然后庄严地走进了会客厅。两条瘦瘦的肘臂叉着腰，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他抬脚的姿态好象从童年时代起就非常爱惜脚下的地毯和罩单似的。车尔尼先生透过眼镜来观察这二位从“土耳其地区”来的客人，然后又象是没瞧够，把眼镜推到额头上去再打量了一会儿。最后，他用一种很难说是完美的但却是够热情的客套话说道：

“请坐！”

李斯特父子带着拘谨的神情坐下。说实在的，那二张带着圈的扶手椅也不允许人们有什么舒适的就坐姿式。经过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后，李斯特·亚当先开了口：

“我是在显贵的朋友们诚挚的建议下来拜访您的，我想把对我儿子的教育工作托付给您。”

车尔尼也坐了下来，但也只能是客人们所采取的那种姿式。他回答说：

“很遗憾，我实在太忙，无法再收新的学生。在维也纳还有许多音乐教师，他们当中象我这样水平的并不乏其人。”

李斯特站起身来，痛苦而失望地说道：

“教师先生，我们远道而来，为了这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已经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

① 巴诺尼亚(Pannónia)，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也包括今匈牙利地区，故过去有人称匈牙利为巴诺尼亚。

车尔尼的答复仍是谨慎而有礼貌的：

“父母望子成龙总是要花很大代价的，我对此表示赞赏。我衷心祝愿您的辛劳最后会得到满意的硕果。”

费兰茨听了一段成年人之间的毫无兴味的对话后，就再也不去注意他们了。起初，他还保持着安静，后来索性从椅子上溜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向钢琴。当车尔尼先生刚刚讲完又一番客套话时，小费兰茨已经掀开钢琴盖，坐在琴凳上开始演奏了。

车尔尼先生对这种行动大为恼火，在这间房子里，居然发生了如此粗鲁无礼的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没有父母允许的情况下，随便换个座位都是不行的，更不要说是任意动钢琴了。这样的自由行动使他这位著名教育家感到丢脸。可是他的震怒并没有持续多久，越是听费兰茨的演奏，不快的脸色也就越为赞许的笑容所代替。最后，他大为惊异地问道：

“这孩子是跟谁学的？”

“教授先生，他是跟我练的。”

车尔尼放松了一下叉腰的肘臂，从眼镜片后边投来了一道慈祥的光芒，然后郑重宣布：

“教这孩子的事，我愿意承担！”

费兰茨到目前为止，已经习惯于人们对他欢呼、赞扬乃至投以无保留的惊异眼光。而现在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个虽然乐于承认他的天赋但每天总是重复唠叨一句话的教师：“这孩子很有前途，但目前还知道得很少！”

车尔尼先生想要改正孩子什么错误和弥补什么缺陷呢？

首先，他看到了三个问题：第一，这孩子不能忠实地按音符演奏，他总是为作曲家的作品添上自己的想象；第二，节奏飘忽不定，这可能很有吸引力，一个吉卜赛乐队的首席提琴手是可以

这样的，但一个舞台演奏艺术家就不行了；第三个问题则是手指……。为了使孩子完整而均衡地弹一个节拍，卡尔·车尔尼常常要花费几个小时时间，随后再让孩子长时间地反复练习，力图把孩子那不大灵活的小拇指和力度偏弱的无名指都锻炼得和它的弟兄们一样的发达。车尔尼先生在雕琢颤音、三度音、三连音以及六度音等方面，有着取之不尽的想象力。费兰茨过去习惯于过目成诵，所以现在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非常艰苦的考验。过去，他常有些地方弹得不准确，有时去掉一个和弦，有时把一些对小孩子的手来说有困难的部分简化掉或者跳过去，现在不行了。车尔尼要求他体会每一个小节，准确地跟着老师的指法去练。孩子哭了，表示抗议老师的严厉。他还同妈妈商量，按他自订的童话般的计划离开这个死板的大城市，回到美丽而幸福的匈牙利去。他指控老师，说老师往往给他一些根本无法完成的作业，有时在指法上还教他作假等等。总之，费兰茨使用了一切手段，但他始终未能使爸爸站在自己一边。

由于车尔尼先生的推荐，费兰茨得以出入最著名的艺术爱好者们的沙龙。在他们当中有宫廷顾问凯塞维特尔和豪罕纳德尔，财界巨头盖缪勒尔夫人以及室内乐大师弗约尔德（这时的弗约尔德是音乐界的巨星，皇帝曾委派他重组维也纳歌剧院。皇帝之所以如此决定，主要还不是从艺术上考虑，而是从道义影响上考虑。还有消息说，此人正在努力使奥地利本国的艺术家超过意大利和法国的客座艺术家）。从弗约尔德这里，通往维也纳歌剧院三大明星（松塔格·亨赖特，温格尔·卡洛里娜和施吕代尔·维海米奈）的路是笔直的。舆论称他们是艺术界的三神不是没有道理的，亨赖特代表警世的思想，维海米奈代表巨大的热情，而卡洛里娜则代表姑娘的纯洁。他们把费兰茨当作一件玩

具来对待，经常带他去看歌剧院的排练和演出，驱车到城里去兜风，还送给他许多礼物和亲吻。总之，他们把这个孩子挽在臂弯里就象带着一个金发娃娃一样。费兰茨就在这种环境里熟悉了演出时的那种令人紧张而又愉快的激动，认识了偌大世界上的众多沙龙和充溢着女人汗香味和脂粉气的华美化妆室。在这里，他们每天都在进行战斗。这孩子很少想到自己，因为他还不是艺术家，而是个孩子，目前他还只能依靠自己的、一些专家认为是特殊的想象力进行演出。但是女人们已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那些漂亮苗条的、涂脂抹粉的精灵们已经从费兰茨消逝着的童颜中看出了一个男子汉的面庞：一张强有力的、将来既会发号施令又会奉承献媚的嘴巴，一个线条优美的鹰钩鼻和一双现在就闪烁着征服者光芒的眼睛。

后来，连车尔尼先生的推荐信也不需要了。三位艺术之神亲自带他外出。这次是在哈凯尔贝尔格·兰道家的晚会上，客人多达三百人。整个晚会有两组节目：一组在大厅，一组在音乐厅。小艺术家被召到梅特涅首相阁下的面前。这次晚会使我们的艺术家幼苗了解到光辉艺术生涯的某些侧面。他在首相府的一间小房间里等候着，在场的有他的父亲和一群为他们服务同时负责监视他们的仆人。一个半小时后，府中管家出来宣布：孩子将在显贵的客人们面前演出（由他本人陪同），请李斯特·亚当继续等在这里，因为在那样的场面上是不需要他的。

他们沿着边门台阶上楼，几经转折来到了走廊上。这是通向老爷住处的长廊，从这里他们走进前厅。这是一座完全由玻璃围起来的暖烘烘的音乐厅。各式各样的首饰和勋章在闪闪发光。无数的衣钩上挂着晚会参加者的华丽服装。在红、黄、紫、绿的丝绸中，燕尾服的料子闪耀着墨色的乌光。他们从密密的人群中穿过，因为演出舞台恰好在大厅的正中。费兰茨费力地

爬上三个阶梯，活象个被判了死刑的囚徒。他现在第一次感到他们不是来同他玩的，不是来哄他的；他们没有微笑，也没有先给他一种使他感到心热的善意。他现在是在演一个节目，说得更明确一些，他是一个被雇来的神童。

他既不感到窘迫，也没意识到平时自然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演奏，既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也控制着乐器的音调，他几乎是在探索大厅的音响和在场的听众。过了一会，声音一下子变得丰满了。他先弹了一曲车尔尼的作品，接着是莫扎特的，最后胜利地响起了贝多芬的《G大调回旋曲》。

掌声。这是一种比通常宫廷礼仪所规定的要持久和热烈得多的掌声。孩子避开了三个台阶，一下子跳到大厅的地板上，直奔首相夫人。他问道：

"您真的喜欢吗？"

尊贵的夫人能说什么别的呢？这位拿破仑的战胜者的妻子只能学着玛利娅·代雷兹亚[1]女皇的样子，象她当年拥抱小莫扎特那样，把李斯特·费兰茨搂到怀里，淡淡地、毫无表情地吻了一下，然后大声说道：

"我的孩子，你演奏得美极了。他们不会不奖励你的（这位贵妇人从自己丈夫那里学得了外交艺术）。"这句短短的话，把这样一个怪场面又带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她与孩子间的关系是用奖赏，也就是用金钱来表现的。

其他在场的人虽然也懂外交语言，但热烈的情绪却降不下来。掌声又把儿童艺术家拥上了台。费兰茨也忘记了他父亲还等在那间佣人休息的小房间里，忘记了刚才走过的台阶和走廊。他忘我地演奏着，多半是按吉卜赛人习惯的节奏，而不是按车尔尼

---

① 玛利娅·代雷兹亚(Mária Terézia, 1717—1780)，哈布斯堡皇帝。一七四〇至一七八〇年为匈牙利和捷克国王。

教授所教的那种节奏。谢幕、返场、再返场，最后他终于疲倦而幸福地穿过走廊，一直跑到爸爸等候他的房间（仆人们仍在那里侍候着李斯特·亚当），然后愉快地赶回家，向妈妈报告说：首相夫人——这不是神话，也不是想象，真的就在衣兜里——给了他五个金币。

这个家庭马上就对如何处理这新的战利品召开了“军事会议”。亚当总是采用特殊的方法教育孩子，从不对孩子隐瞒什么，因为他把孩子当作成年人对待。他现在不无惶恐地说：全家的财产就只有一百三十四个福林了。他还承认（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因为感到很害臊），他又给埃斯代尔哈兹公爵写了封信，请老爷忘记他过去的鲁莽并把上次拒绝接受的二百福林寄到维也纳来。在家庭“军事会议”上，既没有争论，也没有争吵，但费兰茨还是感觉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安娜始终不相信（至少她是这样说的）在维也纳会获得成功，她认为那是麦秆烧火——着起来的同时也就燃成灰了。人们喜欢的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音乐天才，而是孩子的白皙面庞和金黄头发。亚当紧紧地咬着牙，说：“孩子是天才，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崇敬他的。”看来安娜是白白搬到维也纳来了，因为她的眼光始终没能超过她的堂兄、肥皂匠拉格尔·费兰茨先生。

不过这只是一次无声的对话。因为上面那些话都只是在脑中想，谁也没有说出来。但孩子还是感觉到了。所以当话题转到五个金币的时候，孩子的本能告诉他：应该拥抱两个大人，把他们拉得更靠近些；解铃终需系铃人，矛盾是由他而产生的，应该由他来进行调解。

李斯特·亚当很快发现，费兰茨除了练习钢琴外，还应该学习和声。在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下，亚当拜访了著名的意大利音

乐指挥安东尼奥·萨列里。

萨列里早就退休了，住在城外。那座小房子坐落在格林金山的侧坡，说实在的，比个大鸟笼子也大不了多少。小房子的前厅铺着大理石地板，门外是木栏杆的台阶，一共三个房间。房间本来就不大，却挤满了无法计数的纪念品，如浮雕、油画、古代雕塑、珍贵的乐谱手稿和镀金的指挥棒（它们曾是一些艺术大师，例如阿米达、舍米拉米德和丹奈达克等人使用过的），因而显得更加窄小。此外，一个压着一个的桂冠和花环已经干枯，上面落满尘土，拖着数百条金字斑剥脱落的丝绦带，仿佛在向人们显露大师当年在维也纳、米兰、罗马、慕尼黑和巴黎所获得的光辉成就。这小小的房间里，充溢着一种特别的腐朽气味，使人感到自己是置身于一个拥挤的花店或墓地里。

李斯特父子伸手敲了敲那扇古老的木门，门板上尽管有许多裂缝，但仍可看出原来雕刻的许多天使、鲜花和花纹，也堪称是一幅杰作。门的正中镶着一块铜牌，上面镀着发光的字母：安东尼奥·萨列里。

李斯特·亚当多次拉门铃，但没人答应。于是他自己推开门，门显然没有上锁。房子里一片寂静。当他们战战兢兢地走上吱喳作响的木台阶时，从远处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那是谁呀？"

亚当高声回答道：

"来访者……我们不打扰您吗？"

等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回答：

"首先我想知道你们打算干什么，然后我才能决定这是否会打扰我。"

"我们是演奏音乐的，指挥先生……"

"你们从哪儿来？"

“从匈牙利来。”

又沉默了好一阵。

“那你们请进来吧。”

李斯特父子来拜访的时候，这位大师刚刚进入生命的第七十三个年头，至少日历牌的计算是这样告诉他的。他的确是历尽了沧桑：他认识那位会亲切聊天的梅塔斯塔西奥以及卡尔扎毕基特和达朋代特这两位剧院冒险家；他还认识音乐界粗暴的独裁者格卢克骑士；他经历了威尼斯歌剧的鼎盛时期和衰落阶段；他和海顿结为朋友，但却攻击过莫扎特；他是贝多芬的老师，还对舒柏特和莫斯切来斯等人提过几条有益的建议；他领导过维也纳歌剧院并以朋友而不是宫廷人员的方式同约塞夫皇帝长时间谈过话。尽管皇帝很看重莫扎特的天才，但也很愿意听取萨列里的意见，因为这位善耍权术的人很聪明，从不过分称赞自己，也从不过多攻讦敌手。

安东尼奥·萨列里先生在这个时间里是不大出门的。就连从铺着软垫的法国沙发床上，如果不是很必要的话，他也不肯轻易下来。他脸上布满皱纹。缺了牙的嘴已经细长得成了一道缝，以致在那萎缩了的鼻子和表现着意志力的向前倾的下颏之间，几乎看不见它。

他很愿意谈他自己，而且象是谈论一个死去的人似的：“话说那萨列里先生”，“当我还是活人当中的一个的时候”等等。看上去他真是丧失了生命力，只是那对闪烁的眼睛里还放射着从前的、意大利人的光焰。他的眼睛是欺骗不了的，它能看到人的灵魂深处，它能立即发现一切令人恐惧的美德，指出一切可资利用的缺点。

李斯特父子怀着深深敬畏的心情向大师问候，大师迅速提出几个问题后，就了解了有关他们的全部重要情况。显然使老

人感到骄傲的是，在维也纳那么多的音乐教师中，李斯特父子恰恰选中了他，但他并不愿意教那种幼稚的和声学练习和对孩子进行小学生式的考试。

最后，李斯特·亚当的雄辩胜利了，萨列里摆了一摆手，说道：

"够了，够了……我老萨列里什么都知道。明天早晨十点钟你准时把孩子送来。象我这样的老人是起得很早的，但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最好早上就开始上课。我预先说清楚，我这里既没有秩序也没有制度；如果正好我的胆囊出了毛病，那就只讲十分钟；如果夜里睡好了，那就一直教到中午；如果我对一切都厌倦了，我就把小学生赶走。我并不需要钱。我赚的钱比我所能花掉的钱要多得多，所以我们也就不必提学费的事了。"

萨列里起先只教费兰茨一人，后来又收了一名学生。费兰茨的同窗是一个名叫兰哈丁格尔的维也纳青年，比费兰茨大不到三岁。这位匈牙利的小圣手(满城的人都这样称呼他)能轻易地完成任何作业；而兰哈丁格尔可就受罪了。当老师在胆疼的间歇中给他出几道很容易的作业时，他的大雀斑脸上就会急出汗珠。他嘟嘟囔囔地喘着气，好象不是在做动脑筋的题目，而是在搬运沉重的麻袋。这时，我们的费兰茨则微笑着把两三种答案写在纸上，让老师去选择最适当的。

尽管如此，萨列里还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坚持教这个雀斑脸的学生。对费兰茨只能称赞，但老头需要有一个能让他尽情挖苦和鄙视的人。奇怪的是费兰茨并不鄙视他的同窗，而后者也不仇视他。他们有更大和更重要的对象要对付，这个对象就是他们的老师。这使他们忘掉了彼此之间的一切小矛盾。如果老师不愿意讲课，不愿意再去讽刺兰哈丁格尔，使他那些怕羞的雀斑点都红涨起来；如果老师不想再教他们如何识别各种各样

的“钥匙”，那就会让他们把一些短歌的歌词记录下来，而且要用意大利语（其实这是让他们受更大的罪，因为他俩谁也不会意大利语）。如果上课提不起老师的精神，老头就开始谈话，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自我对话，这时，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学生。

谈话的中心永远是莫扎特。他对莫扎特是又爱又恨，就象是恋人一样，又热恋又嫉妒甚至不惜杀伤对方。他自己也不确切知道，当他的对手永离人间时，他是不是发疯了。不……真正的愉快应该是同莫扎特较量、决斗，在舞台上，当着听众的面，在全世界面前击败莫扎特。

萨列里几几乎乎想印一种名片，上面写着：“我是那神人般的莫扎特的敌人”。但这时辛德勒律师的名片上却写的是“贝多芬的朋友”。辛德勒律师总是穿著严肃，活象个假日的殡葬事务代理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着充分的尊严而不允许有丝毫的放肆。在他崇高的信念中，好象贝多芬的朋友就是贝多芬本人一样。辛德勒每星期四都要出现在温格尔·卡洛里娜的家里，这一方面是为了欣赏每周都举行的音乐晚会，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发布他在几分钟前刚获得的关于贝多芬的新闻，而且还要加上他预言家式的评论：

“在维也纳，良好的音乐欣赏习惯已经死亡。意大利人污染了一切。我们的道德，我们的音乐，有可能连我们的饮水都被他们污染了。”

妇女们并不太注意他愤激的议论，她们经常去拜访孤独的贝多芬。这种时候，贝多芬希望她们不要去想他的声望，请大家把他当作没有光环的普通人一样来同他谈话（当然要通过那令人遗憾的“记录方式”来进行）。妇女们利用这个机会，很快就向他提出一连串很坦率的问题：您为什么不结婚？您为什么躲着

众人？您为什么不拜访朋友，包括温格尔·卡洛里娜的家？尽管女人都有些演员式的轻浮，但她们终究还是好朋友嘛。接着，话题就转到新近出名的神童身上。她们建议，贝多芬大师一定要去听听这个孩子的演出。这一时期，贝多芬住在“黑色斯帕聂尔教堂”附近的罗泰斯公馆，那是一座衰败了的可怕的房子，象一个巫师山窟，而不是象一幢市民住宅。在那充斥着坩埚、药瓶、破乐器、厚厚的手稿、扔在地下的图书、变硬了的剩余食品、象钟乳石般悬挂着的蜘蛛网、未拆封的信件以及读成了烂布条似的古典名著的房间里，这个孤独而又爱动感情的老人，听到人们谈论什么马戏表演或神童的献艺，就感到是受了侮辱，有时被惹恼了的艺术大师干脆就把她们赶出宅门。他说道：

“我讨厌那些可怜的、象马戏团里驯狗那样驯出来的神童！你们让我安静些吧，谁也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这种事情！”

尽管如此，过了几天以后，他还是把那位哭丧脸的辛德勒叫到跟前，试探性地提出了几个问题：“关于那个小匈牙利人，您知道些什么消息吗？”

辛德勒深知“老板”常会无缘无故地发火，所以他用了一种双关的手式作了回答，它的意思是既肯定又否定。

大师粗鲁的脸抽动了一下，厉声问道：

“怎么啦，辛德勒！你瘫痪了？我在问你，快回答！”

铅笔在对谈本上疾速而无声地写着：

“关于那个孩子，我听到不少议论，但到底有知识还是没有知识，我还没有机会亲身体验过。听说他在私人音乐会上多次演奏，包括在梅特涅首相家里，并且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大师的脸部肌肉又抽动了一下，接着问道：

“是谁教他的？”

这对哭丧脸的辛德勒来说，又是一个难题。他该怎样称呼

卡尔·车尔尼呢？车尔尼曾是贝多芬的学生，甚至一度是大师的亲信，但是到了贝多芬的晚年，他就再也享受不到大师的慈爱和信任了。可是不知道大师后来是不是又改变了态度，重新喜欢上他了。辛德勒最后还是用铅笔在记录本上写道："是卡尔·车尔尼教的！"

由于他觉察到贝多芬的激动，于是又赶紧加写了两个字："遗憾！"

大师先是喃喃自语了一阵，然后冲口而出：

"请您在随便什么地方听听这小子的演奏，然后再向我报告。"

辛德勒接受贝多芬的命令后，不久就找到了一个机会，这就是温格尔家的音乐晚会。对客人们的邀请是七点钟，但是温格尔家的家长温格尔·杨诺什·卡洛依先生（他是苕来夏努姆县县长，法学院教授，兰道家族的财产处理者，弗尔戛齐伯爵的委托人和法律顾问，而最令他骄傲的是：他是温格尔·卡洛里娜的生身父亲）请李斯特一家六点钟先来喝咖啡并进行友好的交谈。

温格尔·杨诺什·卡洛依先生有个错误的想法，他想让作为匈牙利人的李斯特父子能有机会习惯一下他家的家风，因为那是他从小就习惯了的（他出生在匈牙利高原的吉布塞尔家族），而近年来很遗憾地被人们忽略了。

当李斯特父子进来时，温格尔先生张开双臂欢迎他们：

"上帝把你们带来了，亲爱的朋友和同胞。我的女儿说了你们多少好话啊，早就盼望有今天，我好用匈牙利式的拥抱来欢迎您。"

李斯特·亚当的嘴角上挂着一丝苦笑，他用德语回答了主人的欢迎：

“很遗憾，我的匈牙利话讲得很不好。请原谅，咱们还是讲德语吧。”

温格尔还想作最后的努力：

“那么您的儿子……他也不会讲匈语吗？”

李斯特·亚当只得勉强回答道：

“我孩子的学习问题很麻烦。按理说他现在应该学习数学和语文，还需要学习地理和历史。可是我没有钱，我实在付不起那么昂贵的学习费用。”

谈话无法再继续下去，因为女主人温格尔·杨诺什·卡洛依夫人(出嫁前是卡尔文斯基·安娜女伯爵)进来了。客人也逐渐到齐，其中有卡罗琳·皮赫来尔（是小姐的教母，著名女作家)、德勒雷(著名戏剧家，小姐的游戏教师）以及教小姐声乐的老师们：男中音歌唱家沃格尔、朗格小姐和美因维勒夫人。最令人激动的是对沙因特·鲁滨的欢迎。这是个十七岁的天才小提琴家，漂亮得同爱神所钟爱的美少年阿多尼斯一样。健美的脸蛋象一个圆润的苹果，围在他四周的女人们似乎都恨不得上去咬它一口。沙因特·鲁滨先生还有点国际性的声誉，因为他爸爸是法国人，妈妈是意大利人，他的老师则是最德国式的德国人路德维格·施波尔，后者竭力想把这位英俊少年置于教师专制的锁链之中。但现在鲁滨离开老师有几百公里，因此可以自由地与女人们周旋，炫耀他的法语和意大利语，然后神气地、清晰地拉起小提琴。他轻微地摇晃着身子，这种动作也是从芭蕾舞演员那里学来的。一时间他成了整个晚会的中心，费兰茨完全被人们忘记了。费兰茨在社交生活和演出过程中能够经受住一切紧张场面，但就是容忍不了这种被人忽视的时刻。他躲到沙龙的一个角落里，背对着所有的听众。只是当温格尔家的高个子听差来叫他时，他才活跃起来。

"安东·辛德勒先生有请。"

哭丧脸的辛德勒的出场使法意混血儿阿多尼斯也只能退避三舍。沙龙里出现了片刻的安静。费兰茨从角落里怯生生地走出来，想更仔细地观察一下那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这时辛德勒也在打量着孩子：

"你就是那个小匈牙利人吗？"

"是我。"

又是片刻的安静。这期间，贝多芬的助手和小孩都在审视着对方。最后还是大人先开了口：

"今晚你演奏过吗？"

"还没有。"

"我是专门来听你演奏的。"

"我非常愿意为您演奏（在孩子那张白色大理石般的面颊内部，正在喷发某种火焰），为贝多芬的朋友演奏。"

费兰茨只是在几周之前才刚刚度过十一周岁的生日，但他已经成了社交生活中的人物；只要他眼睛一瞥或者说半句话，人们就会被吸引过来。现在，人们忘记了鲁滨，忘记了那些男女教授，忘记了卡罗琳·皮赫来尔。这时根本不存在怠慢李斯特的问题，温格尔全家人的每一顾盼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了。

虽然才十一岁，但他已经能以大艺术家的本能肯定地感觉到，在这里决不能试图用雕虫小技来哗众取宠。在鲁滨之后，他应该用令人感动的音响来演奏。他选的曲目是奥布斯第十三号奏鸣曲的柔板部分，乐曲节奏缓慢（可能比习惯的还要慢些），钢琴上发出了大提琴和中提琴的富有魔力的乐音，然后又出现了木管般的深厚而有节律的声音。回旋曲的欢快把降A大调乐曲的卿卿我我撕得粉碎。好象一个天使飞越过听众的头顶，他的脸上充满着古代塑像的美感。美固然使人觉得幸福，但因为它

是那样完美无缺，所以也使人感到恐惧。

在场的人们很谨慎地掌握着自己的掌声，因为举足轻重的贝多芬的私人秘书也在座。但这并不要等很久，在穿黑衣服的先生拥抱了费兰茨并且握了李斯特·亚当的手之后，人们都听到了他的允诺：他将亲自把这孩子引见给贝多芬。

温格尔·杨诺什先生来了个锦上添花：

“我这里又设想了一场出色的节目：由我女儿卡洛里娜唱歌，沙因特·鲁滨拉小提琴，我年轻的匈牙利朋友弹钢琴，请安东·辛德勒先生指挥。现在就差场地了，其他零星小事有一位导演去安排一下就行了。”

李斯特·亚当按照当时的惯例，同费兰茨一起拜访了大学里的所有著名的音乐专家，并且毕恭毕敬地邀请他们出席费兰茨和鲁滨、卡洛里娜三人同台演出的音乐会。亚当到处爬楼梯、在会客室等着拜见这些大人、老爷们，不敢漏掉任何一位音乐界的权威人士。按照当时的等级次序，音乐爱好者协会主席弗斯顿贝格伯爵、秘书长约塞夫·松来涅特、主席团成员卡斯特里、基久斯、多恩伯爵和兰哈莫尔都是重要人物。对这些人更要登门叩拜。当然，匈牙利的同胞也不能漏掉，例如为匈牙利演奏艺术赢得了一些声望的钢琴家沙拉伊，以其匈牙利的出身而感到骄傲的小提琴家贝赫姆以及虽然起的是意大利式的名字但却是基什马尔顿地方的德国人弗尔蒂特等。埃斯代尔哈兹家族的人虽然不甚关心李斯特一家人，但对演剧和音乐事务很内行的巴尔菲伯爵却向费兰茨发出了邀请。他希望能在自己的家庭音乐会上看到费兰茨的演出。李斯特一家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这次真正获得欢呼的并不是儿童艺术家。这些大人先生们——包括晚会主人——是从晚上十点钟才开始娱乐的，因为他们请

到了本城最显赫的客人：剧院院长巴尔巴亚和受他宠爱的艺术家、闻名世界的罗西尼[①]。在这些光芒四射的巨星当中（罗西尼曾扬言：如果他班底的人不能全部接到邀请，他本人就不出席巴尔菲府上的晚会），李斯特父子只能象油灯上的火焰一样苍白。大师罗西尼到场时，就象一个快乐的王公。他并不注意外表，也不期望人们的崇拜、致敬和过分的亲热，但他的内心却意识到自己的权势，即使没有外在的表示，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他快乐的脸上，闪耀着成就、天才和财富这三股光芒，圆圆的脸庞就象房顶上的满月一般，从分立两厢的致敬人群中缓缓升起。在这里，谁还会去注意局促不安的李斯特·亚当和被深深刺痛了的孩子呢？费兰茨简直无法忍受人墙两边的臣仆们的奴颜婢膝。

以后就是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晚餐，象李斯特父子那样没有身份的客人当然未受到邀请。晚餐后，由罗西尼的班底举行的家庭音乐会完全征服了听众。这时，巴尔菲·费迪南伯爵来了个意外的举动，尽管只有几分钟，但它还是使人们忘记了罗西尼的成功。祝贺意大利人的掌声还没停息，通向舞厅的两扇大门已经打开，比豪利·亚诺什的吉卜赛乐队开了进来。究竟是巴尔菲伯爵打扮的还是吉卜赛人自己装备的，谁也没有问，因为比豪利本人也在场，谁还去提这种问题呢？首席乐师在门槛前站了一会，小提琴夹在下颏下面，握弓的手举在空中，只等主人一挥手就开始演奏。音乐是那样热烈和激动，就象在甜蜜的黄鹂婉啭吟唱后的狮子般的怒吼。穿着匈牙利式服装的吉卜赛人，按着音乐的节拍向里走着，一直走到舞厅中央最明亮的灯光下才站住。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圈，象一股小部队面对敌人的攻击

---

① 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所作《塞维勒的理发师》，音乐生动幽默，具有反封建倾向，为十九世纪意大利喜歌剧的代表。另一作品《威廉·退尔》，反映了意大利人民要求摆脱外族压迫的愿望，对大歌剧体裁的形成，起了推进作用。

而彼此防护着背后一样。这时吉卜赛国王比豪利·亚诺什从队列中站了出来，目光紧紧盯着主人的视线，身体越来越向前倾。突然他把弓子象剑一样地劈下去，打断了正在跳动的进行曲旋律，又开始演奏一首新曲。它的调子甜蜜而多变，人们先是跟着它微笑，过一会儿又感动得流泪，它真有某种最名贵的葡萄酒的魅力，既苦又甜。当乐曲进入灵魂最深处的时候，那些脆弱的人已经是泪花翻滚（这时比豪利的小提琴就象雁阵中的排头雁似的在人们面前飞翔），大厅中的气氛宁静而紧张，音乐给人的已不是享受而是痛苦。接着，比豪利的琴弓又重新回到琴弦上，指挥小乐队奏起了英雄战士们入伍、在战场上遭到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交混曲“维尔彭克”①。

当窗外透进黎明的曙光时，疲倦得要命的费兰茨和其他男女佣人一样，正躲在偏厅的丝绒沙发垫上打瞌睡。维也纳黎明时分木轮车的喧闹声也掺进了舞厅中的嘈杂音响，这时巴尔菲才突然想起一个重要节目被漏掉了，于是赶紧派人去找那位儿童艺术家。钢琴周围都是欢笑声、搧扇声、碰杯声、脚步声以及挪动椅子的撞击声。与其说此刻人们还没有走散，是为了欢聚和娱乐，还不如说是大家害怕走上黎明时颇有凉意的大街。

费兰茨英勇地弹了一遍洪梅尔的回旋曲。亚当惭愧地往衣袋里揣下了那十个金币（这是包了费兰茨音乐会全部甲等票的伯爵大人给的），然后父子二人步行回家，因为散场后大街上已经没有马车了。疲惫不堪的孩子机械地迈着双脚，只有在脑海里萦绕着的比豪利的节奏还在支撑着他。

费兰茨当然不是第一次接触吉卜赛人。在埃斯代尔哈兹公爵的领地上，无论是乡村警察还是匈牙利日耳曼少数民族居住地的武装乡丁，都不能制止吉卜赛人的流浪队伍。他们就在那

① 维尔彭克，匈牙利的踢脚舞曲。

一带转，经常在孩子们心中引起恐惧和欢乐。费兰茨曾不只一次地爬上窗台看他们——当然是在妈妈紧紧的搂抱中。妈妈生怕吉卜赛人的一瞥会把孩子拉走。他还站在窗边听大人讲一些毛骨悚然的故事。人们说吉卜赛人是骗子和小偷，他们吃死瘟猪，不信上帝，拐骗婴儿和偷掘坟墓。他还看到他们流浪时拉着破烂的大车，不是这个缺轴瓦，就是那个没轮箍；那些摇摇晃晃的长着可怕的鬃毛的瘦马，令人望而生厌；光着身子的小孩子们围着大车乱跑，有时甚至穿过牲口的腿下。李斯特·费兰茨儿时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使他产生了一种既害怕又渴望见到他们的晕眩感觉，就象对待灶膛中的火一样，明知它会灼人并留下疼痛，却又不顾母亲的担心而非要在它周围跑来跑去不可。

有两次他已经离吉卜赛人很近了。那是一个夏天，他们正从弗兰根堡坐车回家。在烈日照射过后，土地都干裂了，沾满灰尘的树木也都渴盼甘霖。周围一片寂静，到处是干旱。夜晚满天的繁星，预示着明天将仍然是晴天，而且很可能比今天还要酷热。

车子驰到奈麦特凯来斯都村附近突然停下。他正想张嘴大声地问问爸爸，但是爸爸的手掌却堵住了儿子的嘴：安静！别出声！孩子也不须有人对他多加解释，很快就明白过来；这里发生了需要绝对保持安静的事情。

在一片槐树林里，一帮吉卜赛人正在宿营。干净的草地中间生起了营火，一把小提琴和一只单簧管在演奏，有个姑娘正围着营火跳舞。费兰茨老远地看见——或者说他自认为是看见了——那营火的微光照射着姑娘的破烂衣裳。因为它是带条纹图案的，远看起来就好象她是披着老虎皮在跳舞。费兰茨还进一步发挥了想象力，觉得那跳舞的姑娘真地变成了老虎。

这种出神的幻觉没持续多久，亚当夫人——那个肥皂匠的

坚强的堂妹拉格尔·安娜向丈夫发话了：看在上帝面上，你快赶车吧！不然被发现了，就要落入他们的手中。费兰茨不十分清楚“落入他们的手中”是什么意思，但看见车子动了，而且上了坡之后就开始了十分惬意的溜坡，所以还是觉得很高兴。这时，费兰茨既害怕却又希望能从近处听那单簧管的嘶哑的声音，看看那姑娘的舞蹈。他觉得她离火越来越近了，最后也许就变成了火。

第二次遇到吉卜赛人（尽管听起来是那么奇怪而不可信）正是亚当夫人自己促成的。晚上，村里传来一阵惊恐的叫声，有人说邻村的酒店老板被杀了，死得很惨，而且家里被偷个精光。谁是凶手？据说是吉卜赛人。在这以后，埃斯代尔哈兹领地上开始追捕各种各样的流浪汉。人们实际上只发现过一个吉卜赛车队，但是谣言马上传开，说这里看见了一辆车，那里看见了一批流浪者，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骑马的男人，在另外什么地方又发现一帮抱着小孩的女人，结果一个也抓不着。这时，李斯特一家正在桌边吃晚饭，突然听到门外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人们难于断定，这究竟是个小孩还是什么牲口发出的声响。亚当从壁上摘下猎枪（实际上从有记忆的时代起就从来没有装过弹药），轻轻走向门口。这时他才看清，原来是一个吉卜赛小姑娘趴在门槛上，趁亚当打开门时，悄悄地溜进屋里来了。她象一个小动物，尽管害怕走近人前，但由于饥渴交迫，还是跑出来找吃喝。安娜立刻作出了决定：应该让这个小姑娘留在这里。她一呆就是三天，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也从来不回答别人的问题，吃饭时狼吞虎咽，睡觉时不解衣扣，就象是一只湿透了的猫。她睡得很警觉，只要稍有一点响动，她立刻就会坐起来。到第四天，她跑了。谁也不知道她跑到哪儿去了。安娜开始总是觉得家中丢了这个少了那个似的，但是最后都找到了，原来小姑娘什

么也没有偷走。

他们真正与吉卜赛人相遇，倒不是这一次，而是圣久尔吉节日那天在集市上。吉卜赛乐队来了，他们的乐器已经很陈旧，同他们的车队一样。小提琴手浮肿的眼睛由于困乏几乎要闭起来，那吹单簧管的也累得想尽快放下乐器去拿酒瓶子喝点酒。不过这都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过了一会，那缓慢而摇摆不定的节奏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响亮，闭着眼睛的小提琴手醒了过来，吹单簧管的乐师放下了酒瓶，首席乐师也精神抖擞起来，这时音乐的破车已经变成了旋律的花轿车，变成了飞驰的骏马，使费兰茨感觉到，同这种音乐相比，他的钢琴声显得格外可怜而贫乏。父亲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努力劝说孩子不要过多地去想它。他解释说，吉卜赛音乐是音乐家的毁灭者，是酒吧间的音乐，是低级趣味。听这种音乐就象是听酒鬼们在粗野地骂人一样。费兰茨表面上顺从地从头至尾地听了这番教诲，听话地朝父亲点了点头，但内心深处还是相信这些使自己的心同它们一起跳动的音乐。打这以后，一旦父亲不在家，他就试图通过钢琴来演奏那特殊的音乐。然而这种秘密的练习总是令人失望。就象儿童在散步中采了许多野花，把森林的气息带回家中一样，其结果是花很快就凋谢了，只剩下些干枯的花瓣。

在以后的几周内，亚当和费兰茨经常与比豪利见面。在弗尔戛齐家，巴恰尼·文采家，埃尔都第家，李斯特·亚当到处招睐听众，而比豪利(用他自己的话说)却在大把大把地捞钱。

费兰茨从不放过站在他们身边的机会。他最喜欢两首歌(“歌”字在吉卜赛人口中发两个“L”的音，费兰茨连这都学会了)：一首是(如果我们相信翻译的话)《基尼日之歌》，由一个叫法依·拉斯洛的贵族老爷作曲；另一首则是由比豪利心中迸发

出来的歌，翻译说那是他在自己儿子死的时候写的。比豪利很少演奏这首歌。只是在办丧事时或某位老爷处在极度痛苦中而非要他演奏这首歌不可时，他才偶尔演奏一下。

李斯特·费兰茨凭脑子默记了这两首歌，而且第二天还在蒂亚伯里家演奏了。

这个特别的事件，比那些报纸末端的消息更值得一提。

他们注意到的是蒂亚伯里的眼睛。这对小眼睛深深地嵌在一张营养良好的圆脸上。艺术家蒂亚伯里很象一个接受一切人忏悔的牧师。他十分情愿而且仔细聆听每个找他的人说话，并且常常用一些机敏的问题或友善的点头来鼓励人们继续讲心里话。这个胖脸圆眼的人不仅听别人诉说，而且认真帮助别人，好象他的生命就是为别人办事而存在似的。由于某种奇迹，他这种愿为别人牺牲的精神，居然使他积聚了一批财产，于是他更加坚信：为别人办事对自己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最初，这个圆球式的蒂亚伯里先生靠弹吉他过日子，后来又弹钢琴。以后他进了斯坦奈尔乐谱和乐器商店，当然不完全是站柜台，有时还要跑上跑下。后来他进了卡披先生的事务所，然后是同卡披合股经营。当他接待亚当和费兰茨的时候，他门上的牌子已经只有一个由金色字母拼成的名字：蒂亚伯里。

这个圆脸男人张开双臂迎向客人：

"亲爱的朋友！（他拥抱了亚当，随后就去掏自己那万宝囊似的口袋，里边有图章、钥匙和零钱。他还摸出了一块糖并且立刻用来招待小费兰茨）亲爱的朋友！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想打听一下，我们音乐会的门票是否畅销？"

"当然是畅销的，亲爱的朋友。辛德勒先生、温格尔老爷和维也纳的三位艺术之神推荐的，那还会有错吗？"这时，蒂亚伯里

突然作了个招手的动作，然后立刻向大门“滚”去，因为又有客人来访了。蒂亚伯里为客人们作了相互介绍：

“这是我们匈牙利神童李斯特·费兰茨的父亲李斯特·亚当先生，曾任埃斯代尔哈兹领地上的畜牧主任(蒂亚伯里用眼睛一瞥，制止了亚当的一切反对这样介绍的表示)。这位先生则是值得无限尊敬的、霍弗贝尔的指挥阿达贝尔特·吉洛维茨，他是一位见过世面的闻名世界的音乐家。那不勒斯、巴黎、伦敦和维也纳都为他鼓过掌。”

吉洛维茨先生对这种介绍苦笑着点了点头。他很想从谈话中抽身，因为这种谈话既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处，只能浪费时间。指挥先生这时的模样，就好象有一个糊涂的理发师，错把应该擦到他脸上的明矾水抹到嘴巴上了。吉洛维茨点了一下头，咕哝了一句什么，然后用最精练的语言说道：“我很高兴……我荣幸地向您致意……但现在请放开我。”蒂亚伯里根本不顾吉洛维茨的窘态，还是抓住不放：“尊敬的指挥先生，如果您能出席这孩子的音乐会，那我们将十分荣幸。”

指挥先生苦笑着的嘴角上差点要流出那抹错了的明矾水：

“我从来不出席任何音乐会……”

可是胖脸圆眼的男人仍然坚持不让：

“那就请您现在听他演奏一下吧！这样即使不去参加费兰茨的音乐会，我也可以告诉人们，我们的神童博得了吉洛维茨指挥的喜爱。”

吉洛维茨眼睛的周围，这时出现了细微的纵横交错的皱纹。这些皱纹在一个没有笑意的人的脸上，标志着某种淡淡的愉快情绪。

蒂亚伯里的商店在当时的条件下，真可以说是一个代表经营天才的智慧之乡。在它的角落里是赌台，四周放着扶手椅和

上面置放雪茄和点火工具的烟台。“L”形房间的短横的一边放着两架钢琴和一个四重奏乐台，进口的对面是一个铺着桌布的长条柜台，上面摆着新近从罗马、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买来的歌剧、圆舞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序曲和歌曲乐谱。吉洛维茨走近柜台，拿起洪梅尔新近创作的钢琴协奏曲，放在李斯特·费兰茨面前(这部作品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洪梅尔根据自已手的特点创作的，因而除了作者本人外，别人都演奏不了)。

时钟已接近上午十一点，在这里玩纸牌的老主顾已渐渐散去。费兰茨先慢吞吞地翻了一会乐谱，然后放回琴架上，立即开始演奏。

没有更好的形容词了，精彩得几乎使人害怕。李斯特用全速演奏着。在作曲家只给钢琴一点细微的表现机会而让乐队演奏主调的地方，李斯特立刻从钢琴上奏出了喇叭、双簧管、单簧管、弦乐五重奏和圆号的音响。

吉洛维茨面色苍白地站在孩子的背后。他弯下腰，说：

“我一定去参加你的音乐会。”

蒂亚伯里却不饶过这位名指挥，他说：

“指挥先生，请您稍微留步。我写了一段很漂亮的圆舞曲，它是那么简单、自然和讨人喜欢，我相信一周之内整个维也纳都会传唱。最近我遍请维也纳的名家为我的小曲写写变奏调，我已经获得了一大批人的首肯，连舒柏特和贝多芬都答应了。现在我恭请吉洛维茨先生和李斯特·费兰茨二位也帮帮忙。”

吉洛维茨点头表示同意。

这时尚未散去的人们都围拢过来。李斯特不得不继续演奏。他不假思索地奏起了比豪利奏的两支歌曲：一首是《基尼日之歌》，另一首就是比豪利在自己儿子去世时写的那支歌。孩子的双手奏出了比豪利小提琴的沁人肺腑的乐音。强烈的和声节

奏和低音提琴的嗡嗡声，不仅曲调相宜，连节奏也酷似。这时他脑海中仿佛又出现了那遥远的景象：在吉卜赛人安营扎寨的老槐树下，一个姑娘在围着营火跳舞，她变成了老虎；单簧管在鸣叫，歌声和野性的呼喊声交混在一起了；接着，他乘的车开动了，顺着下坡疾驰，单簧管的声音追逐着他；远处是营火的闪光，吉卜赛人正在老槐树下狂欢作乐。

李斯特的音乐会定于一八二二年十二月一日举行，地点在国会音乐厅。为了举行音乐会，李斯特·亚当跑遍了老爷们家的楼梯，体重也减了九磅！而可怜的安娜，就象是个梦游病患者，紧张和不安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蒂亚伯里的"军情报告"不断地送来：楼上还有两排待售票……就剩一排了，完了，一张票也不剩了！

《阿格梅农音乐》一八二二年十二月号上登载了全部节目：

克莱门蒂的《序曲》

洪梅尔的《b小调钢琴协奏曲》

李斯特·费兰茨演奏

罗德《变奏曲》　　沙因特·鲁滨演奏

罗西尼《德莱特利奥和波里比奥》歌剧咏叹调

温格尔·代莫塞演唱

钢琴自由幻想曲

由十二岁的李斯特·费兰茨应听众要求即兴演奏。

这家音乐刊物一八二三年一月号还对音乐会作了评价：

"仍然是那位少年圣手。他象是从天上降临下来

的一样，引起了人们最大的称赞。鉴于他的年龄，他给观众的东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人们甚至不理解：这在肉体上怎么是可能的。他能演奏洪梅尔难度极大的作品，特别是最后那段响雷般的乐段，简直是奇迹。这需要丰富的经历、强烈的表现力和细腻的感情。据说他能照乐谱演奏任何作品，在识谱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愿波利希米亚保护这脆弱的幼苗，使其免遭险恶的风暴的摧残，得到健康的成长。他的非凡的艺术才能，象大力神一样——这不是胡思乱想，更不是梦幻——，把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的行板和罗西尼《泽尔米拉》歌剧的一个主题融合起来了。”

圆眼睛的蒂亚伯里很懂得如何做买卖。他又开始计划一次新的音乐会。费兰茨演奏瑞斯的《^{b}E大调回旋曲》获得了很大成功，致使一八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不得不在同一地点举行第三次音乐会。

这次音乐会——用习惯的说法——使整个维也纳都出动了。王公贵族、艺术家以及高贵的业余艺术欣赏家们都来了。鲁道夫亲王等皇亲国戚、百万富翁的小姐们、著名的医学教授们以及首相府的官员们，都在认真对待这次音乐会。他们不是缺乏能力而是没有勇气从上流社会的围墙中走出来。现在，音乐行家和业余爱好者终于都坐到一起来了。坐在贵宾席上的是贝多芬的朋友安东·辛德勒律师先生。

休息时，辛德勒找到儿童艺术家和他的爸爸，告诉他们说：

“请你们准备一下，下周我将带孩子到贝多芬那儿去。”

亚当不安起来了：

“听说贝多芬先生不大喜欢神童们……”

辛德勒以一种知道一切内情的微笑说道：

“不久前，他听了布拉海特卡小姐的演奏，那是和你儿子同龄的一个孩子……”

亚当很有礼貌地探询道：

“他对那位小姐满意吗？”

辛德勒绷着哭丧脸幽默地答道：

“我的大师没有把她扔出去，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功。”

尽管如此，这次会面的结局非常不幸。那是二月里一个刮着风的上午，结着冰的石头路面非常滑，人们就象在童话世界的玻璃山上爬行一样地走着。当走到贝多芬住宅附近时，天开始下雪了，但这不是匈牙利那种飘落下来的柔软雪花，而是带着微弱的撞击声砸下来的无数粒冰晶，象冰制的金属碎片一样，既扎脸又伤人。

辛德勒正在门内等着他们。他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亚当的服装，然后仔细地端详了费兰茨的穿戴，提醒道：

“艺术大师最看不上那些爱打扮的猴子，这样的人在他面前肯定要失败。”

又审查了一阵之后，这位哭丧脸的男人满意地点点头，说：

“这就行了，我对孩子的穿着没有什么意见了。”

他们慢慢地走上台阶，到了平台上，停在两扇油漆已经起泡了的门前。辛德勒掏出钥匙，伸进锁孔。随着楼门的打开，他客气地让客人进屋。

费兰茨和亚当等候在前厅里。辛德勒一个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内室。孩子本来什么东西都不想看，只想早点见到艺术大师。孩子本来什么都不想注意，但他还是不得不看到散乱地堆放在长桌上的旧书、报纸、没有洗过的盘碗和干了的药水瓶。

父子二人在继续等候。他们感到这住宅里好象没有人。至少是他们一直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响。过了一会，似乎有人说话了，或者说是在喊叫，而且很激动，连字都咬不清楚，只是一些尖声尖气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孩子不由自主地拉住父亲的手。

随后，又是一片寂静。

费兰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亚当却立刻明白了，这时大概是辛德勒先生在说话，只不过用的是笔罢了。这位艺术大师近来已经不再掩盖自己的生理缺陷，每当有来访者，他就把谈话本往前一扔，意思是：写吧，但要尽可能写得正确些。

两个客人就这样诚惶诚恐地等待在前厅里。但是再也没听到尖声喊叫。又经过长时间的寂静之后，屋里传出了钢琴声。这肯定不是适合车尔尼先生口味的音乐，也不会使萨列里先生感到喜欢。生硬的和弦彼此撞击着，不仅震动了孩子的心，也震撼了整个住宅。听的人感到：在这样强烈的音乐中，恐怕墙壁都要震裂了！

好半天，辛德勒才走出来。他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急急忙忙关上了前厅通里间的门，然后张开双臂，几乎是把两位客人赶了出去，只是到了外面的台阶上才说：

“他简直要吃人。”辛德勒的脸上闪着一种特殊的光芒，既象是羞愧又象是荣耀。“他几乎打了我。他太痛苦了……他弹琴的声音象是撕裂出来的，那简直不是在作曲，而是在殉道！”

辛德勒他们在大门前站了一会，扎脸伤人的冰晶迫使三个人不得不找个地方躲起来。最后他们终于在街上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找到了避难所。虽然李斯特·费兰茨清楚地知道，在成年人面前为了尊重长者，不经允许是不宜讲话的，但恐惧和好奇心还是驱使他首先发问：

“他很生气吗？”

辛德勒觉得对孩子的问题根本不屑于作出回答。他郑重地说：

“他正在进行伟大的创作，可能是人们从来没有写过的最伟大的作品。他正在写交响曲，第九交响曲。”

计划在一八二三年四月十三日举行的音乐会，对蒂亚伯里来说，简直是一场胜利的冲锋战。他象个军事统帅那样指挥着，对助手们发出各种命令：

“要给席克总编辑留两张票子。市议员图切尔先生需要一间包厢。瓦乌鲁赫教授要包整整一排座位……但很遗憾只能给他五张！让巴尔菲家族明确一下：他们是不是要全包剩下的三个包厢？”

票子很快就被分送到维也纳上流社会各家的门房。蒂亚伯里处理这一大堆票子，犹如一个天才的将军在调遣他的师团。就是这样，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不过蒂亚伯里终究不愧是个能干的老手，他对这个人撒谎，对那个人道歉，对有的人出于需要还要奉承几句，以求宽恕自己的过错，息事宁人。当他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是怀着胜利者的喜悦心情的，因为要票的人比音乐厅能容纳的人数多出了一倍。

费兰茨已经坐在舞台上。他习惯地身向前倾，前额几乎碰到谱架，力求从内心里把整个世界都抹掉。当乐队演奏前奏的时候(这正是洪梅尔写的那首使吉洛维茨先生作难的b小调钢琴协奏曲)，李斯特弯着腰坐在钢琴前面。等到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发出信号，示意现在应该是钢琴声部参与演奏了，李斯特立即挺直腰杆，两只手在琴键上张开。他刚刚要按下去，突然发现那位伟大的客人贝多芬正坐在第一排。

由于迟疑，费兰茨差不多晚了一秒钟、也就是一次心跳的时

间才开始演奏。他弹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感情。场内先是掌声，而后就是一阵一阵掌声的浪潮(在那个时期，人们是按照一个一个乐章来鼓掌的!)。在慢板处，是一片肃静，而弹到最后的乐章时，则象是战场上的喧嚣。坐在后排的人根本顾不上音乐会的礼仪了，一起拥到舞台前，都想看看这个音乐神童和天才是怎样用双手点燃音乐的火焰，使音乐厅内放射出令人目眩的光辉的。

又是掌声，又是掌声的浪潮。

费兰茨又一次返场。

在舞台的侧幕后边，蒂亚伯里在摆手，意思是：够了，对听众不能服务到他们完全满意的时候为止。舞台的另一侧站着李斯特·亚当，他也在做手势，但费兰茨不理解他的意思，只是看到父亲脸色苍白，老泪纵横。人们又一次鼓掌。李斯特·费兰茨又一次演奏。

奇怪的是，这回连一点掌声也没有了。剧场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使人们忘记表达自己喜爱心情的事情。在一片沉静中，只听到通向舞台的台阶上有沉重的脚步声。费兰茨感到有人站在他的面前弯下身来，把他紧紧搂在怀中，吻了左边的脸颊，然后又吻右边，最后又吻了一次额头。

孩子站起身来，心跳得非常厉害，几乎就要昏倒。

这时听到的已不是掌声，而是电闪雷鸣!

贝多芬和李斯特·费兰茨先在台上并肩站了一会儿。过后，贝多芬大步跨下台阶，奔向观众席，挤过人群。出口处的大门“砰”地在他背后重重地响了一声。

李斯特·亚当收到埃斯代尔哈兹庄园总管家的一封信，信中除批评他以外还通知了如下事项：

一、由于亚当长期不能在多波尔扬供职，因而不能得到去

年提薪时应增加的份额；

二、提醒李斯特·亚当赶快写信表示自己的态度：是否愿意继续担任原职？三个季度的等待期已过。如果亚当答复说不想任职，其职位将立即由别人担任。

如果说这封信的到来又引起了一场家庭战争，那是夸张了。但如果说肥皂匠拉格尔从青年时起教给他妹妹安娜的只是服服帖帖，那也是过份了。安娜固然从姑娘时代起就习惯于服从，但是母性使她坚强起来。最初她还只是暗示影射，后来发展到同丈夫公开争吵。这场"战争"动用了所有的论据和反证。从表面上看，好象他们之间只存在一个矛盾：即究竟是继续留在埃斯代尔哈兹领地上，还是跳到自由的水域中去。就算是仅有这一个矛盾，那也是够尖锐的了。安娜坚决认为，不论是那些赞扬性的评价，还是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金钱，都只是空中楼阁和幻想中的幸运，是命运在微笑时把这些给了他们，但命运在生气时就会很快地收回。尽管亚当搬出莫扎特和洪梅尔，尽管他从音乐史的金皮书中找出许多证据，尽管安娜在这些科学论证面前表面上后退了一步，但她仍然怀着不信任和担心未来的心情提问：万一幸运飞离了我的孩子，那将怎么办？于是这场争论又产生了新的枝节，这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安娜希望孩子进学校。因为他既不会加减乘除，也不懂得正确书写。就连没念过多少书的安娜也明白，一个人的字要是写得歪歪扭扭，那该是多么不光彩。亚当很轻松地就击退了这场攻势，因为费兰茨虽然唯一的老师是自己的父亲，却也写得一手好字，赶得上成年人。不过亚当内心深处也感觉到，对孩子的教育还是有些问题的。李斯特·费兰茨象海绵吸水似的吸收着音乐；只学了几个月，就能熟练地（当然也有错误）讲法语；拉丁文和意大利语也很快被他学会。

但如果向他提出最简单的关于历史、文学、天文、地理、数学、自然常识等方面的问题，他就连一个小学生也不如。对这些情况，亚当心中是明白的。但是他认为，在当前这种穷困的现实条件下，别的都办不到，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拚命地让孩子在艺术道路上有所成就。而在这个方向上，只需要演技、语言知识和对音乐的特殊天才。别的知识以后再慢慢想办法吧，等有了更多的钱，也就好办了。比这些更为尖锐的矛盾是宗教问题。当然，亚当是毫无保留的罗马天主教徒。就象他准确而负责地从事他的职员工作一样，他也准确而负责地信仰宗教，熟悉所有的教规和章程，如应该向谁忏悔，对谁跪拜等等。在他的思想中，从来没想过弥撒的次序、宗教节日的先后乃至祷告的词句是可以互换、修改或忘掉的。他不多不少，正好是个标准的天主教徒。安娜并不象亚当那样熟悉宗教的礼仪和拉丁文的祷告词，但是她站在宗教阶梯的更高一级。亚当夫人是个虔诚的教徒，她希望把自己的儿子也纳入到虔诚的信仰妙境中去。这在维也纳是很容易办到的。在这里，古老的教堂鳞次栉比，随时准备接受信徒们轻声的祷告。教堂的阴凉大理石，古老的木制长凳都极容易使信徒们跪下来。亚当以自己的铁腕紧紧抓住儿子，他可以宽容儿子书写的错误和祷告词中的偏差，但是对指法上的毛病，升调和转调的错误，和声中的不灵活和不协调，以及对萨列里先生考题的疏忽，那是绝不放松的。

埃斯代尔哈兹庄园总管家的信之所以会引起如此热烈的争论，是因为它公开提出的问题只是个表面问题，而在它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目前尚看不出来的后果。

这种长时间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坚持不让的争吵，最后迫使亚当写了一封非常卑躬屈膝的信，请求能准他再延长一年的停薪假期。复信很快就来到，措词极为简单：埃斯代尔哈兹庄园基

什马尔顿的管家不能同意李斯特·亚当的请求。

这时,安娜几乎是央求亚当举家回国赴任,但亚当丝毫不为所动。他去找了车尔尼、萨列里和蒂亚伯里,甚至还拜访了梅特涅、巴恰尼·文采和巴尔菲·费迪南伯爵等赞助人。这些人都赞同亚当的选择,有的人还建议他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勇敢地冲向世界,去征服巴黎!谁能在巴黎受到崇拜,谁就能征服世界!

亚当虽然认为自己的考虑是坚定不移的,但多少还想留有余地,因此一直推迟作出最后决定。一封来自佩斯①的信也起了推迟决定的作用。经营艺术品的商人米勒·卡洛伊建议(他有说服人的特殊本领)在佩斯安排一次音乐会。他建议音乐会在"七酋长"饭店的大厅里举行,这样就能为直通佩斯的"民族剧院",为下一步的演出铺平道路和制造机会。

李斯特一家沿着平坦的多瑙河岸驱车回国,经过一天半的旅程来到了佩斯和布达。这座城市有点象个正在发育中的小伙子,虽已具备城市色调,但他的神情仪态仍酷似个农村小镇。那些高贵的古典式建筑集中在多瑙河岸边,但它们的背后则是黄沙土道。驿车驰过时刮起的尘沙是那样可怕,甚至连有经验的赶车人也不得不时走时停,以免高低不平的道路上的土块和飞扬的灰土惊了马。他们与米勒·卡洛伊是在一家咖啡馆里见的面。这个地方完全是欧洲风格:大理石的桌子、金边的大立镜、铺着绿色丝绒的台球案子以及那些殷勤忙碌的侍者。但是窗外却传来了枪炮声似的轰鸣,原来是几个匈牙利人在用鞭子往集市上吆赶牛群。

尽管如此,交易谈判还是成功地进行着。他们一起拟定了在匈牙利演出的海报内容:

---

① 佩斯,是现在布达佩斯的一部分,当时布达和佩斯两部分尚未合并为一个城市。

“我是匈牙利人。在我即将赴法国和英国之前，我怀着依恋和感激之情为能在祖国演出，汇报我初学的成绩而感到无比的幸福。我还没能达到中学毕业水平，但我将用持续的勤奋来获得它，以求有朝一日能达到幸运的境界——成为亲爱的祖国的光荣树上的一根枝丫。

李斯特·费兰茨”

在咖啡馆的喧闹声中，他们商定还要找一家权威性报馆的编辑部，而且要在报上登一则启事，文词尽可能朴素，但一定要引起读者的注意。米勒认为，有必要把费兰茨这个孩子稍微少年化一点，这样效果会更好些。按照上述要求，报纸写道：

“在匈牙利国土上出生的李斯特·费兰茨，是一个总共才十一岁的男孩；在维也纳，他的钢琴艺术天才受到了普遍的承认，现在将在音乐学院的组织安排下，在‘七酋长’饭店大厅举行演出。”

“七酋长”饭店的各个厅室都是满满的，这不是什么怪事，因为平常也总是如此。一些著名的吉卜赛乐师、吞剑的和耍杂技的演员、占卜算命的先生以及变印度戏法的魔术家等等，经常在这里献艺。现在这一切都不在话下了。地方乐团演一个序曲之后，李斯特·费兰茨演奏莫舍列斯的协奏曲和难度很大的变奏曲。这个变奏曲看来是作曲家有意把难点集中起来而谱成的，演奏刚一开始，就发出了似冰块在碰撞的声音。在这个难死人的节目之后，是地方演出团体的两个特殊人物的节目：泰伯尔

小姐和巴布尼格先生的二重唱。整个音乐会以李斯特的自由演奏作为结束。

出席这次音乐会的(在李斯特的经历中是第一次)都是匈牙利报界的人士。《国内外通讯》的热烈时评，是这样报道这次艺术事件的：

> “上星期四，一个罕见的现象吸引了我们。在‘七酋长’饭店大厅里举行的钢琴晚会上，有一个绍普隆州的十一岁男孩李斯特·费兰茨，他的钢琴演奏天才使我们完全倾倒。那些把支持国人的努力当作荣耀事业的大人物、布达和佩斯的崇拜者以及两城的精英显贵都出席了。这个漂亮的金发男孩，显示出机敏、轻松、准确、适当的力度和艺术家的手法。他用美妙而令人眩晕的演奏充实了这次高贵的集会。他的杰出演奏给人们增添了愉快的希望：这孩子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将为我们祖国带来巨大的光荣。我们祝这个美丽的灵魂健康成长，在他赴英、法的前夕，祖国的祝福是对他的预先褒奖。在那里，他一定会为匈牙利人民的才智赢得尊崇。”

如果说在布达和佩斯的匈、德语居民彼此是怒目相视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爆发过拥护和反对王室之争，那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过分夸张。实际上，他们相处得并不错，不过他们之间终究还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德文报纸对这场匈牙利音乐会保持沉默（如果不算那些兔尾巴似的小消息)，而匈文报纸则对一八二三年五月十日和五月二十四日的两场“间奏曲”——即在德国人剧院中让李斯特在幕

间休息时演出——不予理睬。《国内外通讯》根本就没有派记者去采访这两场音乐会，因为他们不满意儿童艺术家以“我是匈牙利人”开始，而最后却以在德国人的剧院里演出作为结束。

作为孩子的费兰茨，对这一切都是不知道的。他在佩斯和布达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并利用一切机会来欣赏多瑙河。他认为维也纳那里的一段充其量也不过是这里宽阔的多瑙河的一个支流。他最关心的事情是领略“七酋长”饭店吉卜赛乐队的“老”博卡的演奏风采。李斯特认为他的演奏比起比豪利来要更华丽，但不象比豪利那样傲慢和矜持。他主动到各张餐桌边去演奏，在这方面博卡可以说是即席导演的最大行家。费兰茨对别人说自己“是匈牙利人”或“匈牙利出生的德国人”都不甚在意。他只是一味欣赏那既吸引而又排斥他的城市。这两个城市有时象亚洲草原上的边塞堡垒，有时却又象美妙音乐的温柔睡乡。

当他们回到维也纳之后，在安娜的一再央求下，亚当又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亚当重又坐到桌前写他的申请书。这时，他完全忘记了贝多芬曾吻过他儿子的额头，那么多评论称赞费兰茨是个奇迹，也忘记了远方的佩斯和布达，那里的人曾认为费兰茨是国家未来的光荣。一瞬间亚当忘记了所有这一切，也许这种忘怀中包含着这样的意愿：要在安娜面前证明他已经做了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亚当忘记了往日的成功，又变成了埃斯代尔哈兹家族的一个受尽屈辱的佣人：

最尊贵的公爵阁下：

为了对孩子的爱抚，为了让他接受科学教育，我牺牲了自己的安宁和财产。我唯一美好的愿望是让他在您给予的帮助下，在国外继续其已经取得重大进步的学习，以增加祖国艺术家的数目，而不致湮没于庸碌之

辈当中。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应该无数次地感谢上帝的关照，事情进行得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我没有任何理由对我已经作出的牺牲感到后悔。但是我从庄园管理处第2803号规定中得悉，我的请求已被拒绝，这引起了我极大的震惊，因为它不仅会使我的前功尽弃，而且剥夺了公爵对我的宠信。

如果围绕着我身上和高悬在我头上的不幸一旦成为事实，那我将痛悔当初，并且为这种悲惨的结局而绝望。

当我越是感到危险临近和害怕时，我的思想深处就越发肯定您会帮助我。这种幸福的意识给了我力量，使我坚定起来，敢于最后一次在您的宝座前祈求帮助和救援。

我以深切的感激和尊敬的心情，斗胆向您跪请：重新接受我的请求吧，允许我请两年长假，并发给我一个凭它可以领得护照的证明。

怀着对您的深切感激和敬意向您再次重复我卑贱的请求。

公爵阁下卑贱的仆人李斯特·亚当

一八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于维也纳

公爵的答复仍然是拒绝。

李斯特·亚当正准备进行一次长途旅行。温格尔为他们举行了欢送晚会。接着在许多贵族宅邸里组织了一连串的家庭音乐会。最后还在卡尔·车尔尼老师家举行了一次小型欢送会。

当初用小孩子迈着拘谨的步伐进入满是地毯的房间时的神态到哪里去了？车尔尼老师的魔法为小李斯特争到了信仰者和崇拜者，去年对这种魔法的恐惧心情又到哪里去了？现在小李斯特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客人，倒象个小孙子。他悄悄地跑到车尔尼妈妈的身边，轻轻地依偎在老太太的脸颊旁；老太太也以从未有过的亲切称呼，甜软地叫着这个匈牙利小孩，不是叫他"普茨"就是叫他"茇茇"。接着，老太太用各种巧克力糖果、热带水果、水果罐头和核桃点心来招待他。这时，李斯特·费兰茨象一只受到宠爱的小猫依偎在老太太身旁，竟用"你"来称呼车尔尼老师的母亲，这使两家人都吃了一惊。老师想纠正这种叫法，但老太太却紧紧搂着小李斯特说：在他们匈牙利可能就是这种习惯吧。

在车尔尼教授为他们举行的欢送晚会上，老师向学生发了结业证书并且开了不少推荐信。他把口头多次重复过的话又写在纸上：这个孩子已经是成熟的舞台艺术家；作为钢琴家，可以说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学的了；理论进修还没完结，但在这方面的进步也是罕见的。

所有这一切都从费兰茨的耳朵边溜过去了，但是老师下面的一句话却使小李斯特和他父母非常感动。老师改变了平日的官腔，走近孩子，一边用手拍着他的金色头发一边说：

"愿仁慈的上帝保佑你，茇茇！"

这个爱称是老师从未叫过的。就是刚才老妈妈这样称呼时，他还皱了一下眉头。因为老师认为，这种称呼会使纪律松弛，但是现在他自己也这么叫了：

"茇茇！让上帝指引你！"

一八二三年九月二十日，李斯特全家离开了维也纳。

他们从埃斯代尔哈兹家族总共只得到了一张服务证明书，证明四十五岁的李斯特·亚当一八〇一至一八〇三年曾任见习书记员，一八〇三至一八〇八年为正式书记员，一八〇九至一八二三年任牧羊场会计官。

干了整整二十二年，但证明书上对亚当勤奋努力而忠实的工作连一句好话也没写。它只能证明亚当是被公爵老爷解雇的职员而不是逃离主人的佣人。

证明信的右下角是圆形的大图章：戴着金冠的兀鹰，一只爪子抓着盾牌，另一只爪子握着三枝红玫瑰。



第二章　少年李斯特

三月的雪居然在孚日广场的树上闪着银光，这在巴黎是少见的奇景。街心的雪虽然被踏散了，但在离广场仅仅几十米的诺莱斯宫的花园里，圣三位一体的铜塑像、阿弗洛迪特的石雕像、沉睡在冬日梦境中的成排树木、修剪得象几何图形那样整齐的树墙以及大理石的坐凳，上面都盖着一层厚厚的银色被子。在这里，老爷和太太们曾打扮成牧羊人，演出过委婉甜蜜的但后来发展成为血腥残忍的牧民故事。

在这三月的晚上，诺莱斯宫所有的窗户都放射着光辉。公爵大人在中断十年之后，重新在这里举行晚会。客人队伍之庞大，只有国王的王宫才能容纳得下。公爵邀请了路易十六的弟弟阿托伊斯伯爵。社会上有一种恶意的谣传，说他与命运悲惨的玛丽·安东尼特之间关系不正常。由于路易十六的早衰和健康不佳，目前法国到处都认为他是国家的统治者。公爵还邀请了杰出的话剧演员塔尔马。由于他教拿破仑、皇族以及革命新贵学过举行朝仪、说恭维话、作手势和使用餐具的艺术，从而使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史册。主人还邀请了贝利夫人（她的丈夫不久前死于一个晚期雅各宾党人之手）和奥尔良公爵（连同他为数众多的家庭成员），并且对后者开了个无情的玩笑，请帖上写的是奥尔良公爵在流亡的痛苦中曾使用过的名字：恰巴德·拉托尔市民。请帖的名单上还有君维勒公爵，这是个家族十分古老

但财产日益减少的贵族。此外还有罗茨柴尔德银行家，一个新发迹的金融界巨头。

云集的宾客中有演员、交际花、军人、部长和冒险家(他们当中，不只一人是有权势的，至少也是准备抓权的。)络绎不绝的马车又载来了新老贵族和一些资产阶级人物。后者虽然十分愿意以"七月十四日派的子弟"① 自居，但他们又以魔鬼般的准确程度模仿着旧贵族的衣着、仪态(特别是他们的丑态)、谈吐和姿势。

晚会的主人、保尔·弗朗西斯·德诺莱斯公爵今天晚上刚好七十五岁。但他仍然是个挺拔潇洒而富有魅力的男子。他那略微肥厚的尊贵嘴唇上面，顶着一根国王式的鼻子，浓重而弯弯的两道眉毛下面闪烁着一对明亮锐利的眼睛。田径运动员般的身体穿着光彩夺目的古式丝质燕尾服。斜挂在身上的是那些包括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授予的勋章，其中最新的一个则是复辟的波旁王朝② 授予公爵的。但是公爵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开玩笑，是供新富人和新贵族逗乐的玩笑。公爵是个甘当反对派的人。还在路易十六时期，他就仇恨宫廷、阿托伊斯伯爵和普罗温茨公爵，并以反对派的大无畏精神站在革命政权一边。但当革命烧到他本人身上的时候，他又起而反对革命，随后流亡国外。拿破仑镇压了革命以后，他突然又意识到：就是一个雅各宾党人也要比虚弱的资产阶级老爷更值得同情。而现在他终于谅解了拿破仑：在今天和昨天的罪行中，还是昨天的更值得原谅，因为它们至少是由一个天才的匪帮造成的（公爵一直这样称呼拿破

① "七月十四日派"，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陷巴士底狱，开始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拥护这次革命的人，自称"七月十四日派"。

② 波旁王朝，波旁家族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先后在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建立的王朝。因九世纪末艾马男爵封地在波旁堡而得名。法国的波旁王朝厉行封建专制统治，其代表人物是路易十四。

仑），而今天的罪行却是由一个毫无生气的不幸的老人造成的，他已经没有力量犯更严重的罪行，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用他的愚蠢行动使整个世界感到吃惊。

正九点钟，公爵在两行台阶汇合处的平台上就座。他感到很自豪，因为他认识名单上的所有客人，而且可以毫无差错地叫出他们最近获得的（准确些说是买来的）头衔、等级和爵位，而这是很不容易的。诺莱斯公爵站在台阶的最上一级，用一视同仁的和彬彬有礼的笑容扫视着所有在座的大臣、公爵、资本家、交际花、演员以及已经下台的和即将上台的大臣。只对一个小孩子是例外，他用法语说了一句话：

“欢迎您，我的小朋友！”

公爵在两排台阶交汇的转角处，中断了一下正式的招待会日程，用特殊的友好态度来欢迎这个孩子和他的父亲。他们就是李斯特·费兰茨和李斯特·亚当。

公爵家的音乐晚会上没有预定的节目单，是一种即兴表演。几周以来，公爵的管家一直在努力为晚会请到波尔多哥尼先生和琴蒂夫人，佩来里尼大师和吉提塔·帕斯塔（意大利歌剧的男女主角）。然而最大的成果是请到了李斯特·费兰茨，他将使那些受重金礼聘的意大利人为之失色。

琴蒂夫人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咏叹调。虽然她用意大利人大模大样的但并不令人反感的姿势谢幕，但是这种亲切的表示并没有收到效果，因为人们所期待的是儿童艺术家。

诺莱斯公爵府里丝毫也没有那些左右着梅特涅公爵府生活的陈腐准则。在这里，儿童艺术家不必在佣人的房间里等候，也不必爬台阶和穿过阴森森的坟场般的走廊。他正依偎在贝利公爵夫人的身边，同女人们轻松地交谈着。他还不时地抚摸着她

们，对她们的那些服装、头饰、纱巾和象征着财富的扇子，表露出一种男子汉的爱慕。在掌声停止之后，李斯特坐到了表演台上。他先弹奏洪梅尔和车尔尼的几个零星小作品，然后就开始了即兴的自由演奏。即兴演奏一个多小时之后，主人宣布：

"夜太深了，这会伤害孩子的。"

公爵亲自陪同李斯特父子二人走过大厅，沿着走廊一直送到门房(别的维也纳贵族老爷和银行家会这样做吗?)，并且下令用马车送他们回家。在车前告别时，公爵对着亚当的耳朵悄声说道：

"如果您的安排允许，请明天中午来一趟。"

公爵表现出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主人。在上各道菜的间隙，他讲起了自己三百年前的祖先安尼·儒勒斯公爵是怎样用国王金库的钱填满了自己无底的口袋。然后又谈起那位温和的路易斯·安东尼，讲他任巴黎大主教期间如何利用天主教信徒们的钱袋作为自己的金矿。接着讲到保尔·弗朗西斯如何走遍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午宴的主人没有谈自己的情况，而是带领客人们来到一个圈起来的角落，参观他的私人化学实验室。公爵一面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小李斯特的金黄头发，一面同李斯特·亚当谈话。他认为，尽管亚当来自乡下，但懂得现代的复杂哲学：

"我的先人在这个世界上冒过险，经常过着流浪生活。他们丧失了一切信仰。虽然他们站在被绞死的国王的事业一边，但内心深处却同意那些决定宣布并执行绞刑的人们。他们之所以站在被绞死者的一边完全是出于义气……"这时公爵脸上掠过了一丝极难觉察到的笑意，"我对那尊敬的阿托伊斯伯爵差不多也是这样的……"

客人们参观整个实验室后，走下大楼后面的台阶，进入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这是一所由于某种奇迹而完整保存下来的图书馆。这里汇集了各种雕塑家、木匠、镶嵌匠、垫子匠、象牙雕刻家和大吊灯制作师的杰作，构成了公爵的图书馆。到处都是巴洛克式[①]的装饰。玻璃吊灯上数以百万计的磨光楞面使得四壁生辉（那些透明的钟乳石随着每次开门的响声而晃动并在气流中发出银铃般的乐音）。书架上可以看到绿、红、褐、白等颜色的书籍封面，在名贵的皮面上闪耀着金色的字母。大厅中央安放着一张巨大的书桌。桌上放着堆成小山似的书籍，旁边有两个金环（按照一种陈旧的天文学理论）标志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道。

公爵从一个锁着的橱柜里拿出一本巨型画册，放在书桌上，然后把小李斯特拉到身边，说："孩子，我把它送给你……关于我的礼物，我还要作些说明。"这时公爵又面向李斯特·亚当："这是我收藏品中最珍贵的一件东西。这些是丢勒[②]、荷尔宾、罗兰、拉斐尔、米开朗基罗[③]、伦勃朗[④]和瓦特乌等大师的作品，我希望孩子能够了解并且喜欢他们。现在的时代毁坏了我们的感觉器官。在今天，谁能说得出品尝是什么意思？最后一位伟大的

---

① 巴洛克式，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流行于欧洲与拉丁美洲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运用矫揉的手法以及透视深远的壁画、姿态夸张的雕像，以产生戏剧性效果，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在建筑物中制造宗教神秘气氛和追求豪华奢侈的意图。

② 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其作品充满了人文主义的观点与中世纪宗教世界观的斗争，反映了德国人民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

③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生于佛罗伦萨。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浪漫主义的幻想，表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在艺术上具有坚强的毅力和雄伟的气魄。

④ 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荷兰画家。他在荷兰新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画了一些以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为题材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厨师已经同路易十五一起死掉了，那些唯一值得提起的菜谱也同时消灭了！我们的嗅觉又如何呢？我在我的小实验室里，希望能重新制造出上个世纪的伟大女性们曾使男人们为之发狂的香味来……。很遗憾，我的一切努力全都失败了。同过去的香料比较，我最好的香料只能散发出大蒜和厕所的恶臭。在一位少年音乐家面前，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们的听觉也变坏了。笨拙的钢琴代替了细腻的翼琴，连宫廷的弦乐队里也出现了圆号和长号的野性吼叫。在这样衰败的情况下，我们至少要保持住我们的视力。谁学会用丢勒、拉斐尔和瓦特乌的眼光来看问题，即使他可能会被人毁坏听觉或味觉，但是他的视力是永远不会被毁坏的……”

公爵按了一下铃，随即向走进来的仆人发出指示：

“把这本画册送到李斯特先生的住处去。”

然后又对李斯特·亚当说道：

“这点微薄的礼物是送给您的（他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本皮面的小本子）。您可以用它记日记。请记下所有与我们的儿童艺术家有关的事情。将来长大成人，他也许会愉快地翻阅这些充满成功和失败的记载。命运是无法预测的，将来您的某些记载也可能会写入历史！”

李斯特·亚当的日记

李斯特·亚当真的记日记了。他对事件的记述不是从一八二四年初开始的，而是追溯到在德国取得成功之日，因为那是在巴黎一举成名的序幕。曾当过《音乐杂志》、《法国音乐》等刊物编辑的道尔迪盖（1802—1866年）见过这本日记并且读过其中的一些片断。令人遗憾的是，最后这日记的原本丢失了。

本书作者在这里试图通过《奥格斯堡汇报》、《什瓦比信使报》、《音乐汇报》(以上为德文报)、《白旗》、《星》、《蚓螈》(以上为法文报)、《晨邮报》、《温莎快报》(以上为英文报)等报刊上的文章和里纳·罗曼、克劳德·罗斯坦、詹姆斯·洪涅凯尔、布鲁诺·沃勒尔、瓦特·贝凯特、尤利乌斯·刻普、豪劳斯蒂·艾米尔和彼得·拉贝等人的著作,对日记进行复原。

一八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们幸运地到达了慕尼黑。安娜感到特别疲乏,老是想睡觉。我虽然是第一天到达这里,却要陪费兰茨游览市容,他是从不疲倦的。慕尼黑有点象佩斯和布达,既有宫殿大厦,也有牧鹅水塘和贩牛市场。我们音乐会的日期成了问题。莫斯切来斯也在这里。据他说(我确信,他不是为了惹我们不高兴才这样说的),连他自己的音乐会日期也没有确定下来。这样我们只好等待了。抢在他的前头演出,那是很不礼貌的。

一八二三年十月十日

这几天没有什么值得记的。我帐本上的那些数字只能使人生气和害怕:每月的开销正在吞噬我那一点小小的财产。

一八二三年十月十八日

昨天,举行了第一场音乐会。由于他们还没听说过我们,上座率不太高。但是善良的国王和公爵夫人们的到场,弥补了这一切。他们都坐在包厢里。虽然听众不多,但音乐会的成功马

上使我们定下了第二场音乐会的时间：十月二十四日。

一八二三年十月十九日

《奥格斯堡汇报》对费兰茨的演出作了如下报道：

> “由慕尼黑向整个音乐世界盛传着一个消息：新莫扎特诞生了！消息还说，这个神奇的儿童七岁时就引起了音乐报刊的注意。这些消息都是真的。只不过他今年已经十一岁了……不管怎样，我们还得承认：这个消息是符合事实的，李斯特·费兰茨确是新生的莫扎特。这孩子演奏洪梅尔的《b小调协奏曲》是那样的轻松、清晰、准确而有力，感情是那样的深沉，你就是用最大胆的想象也不能找到同他一样年龄的天才来。以后我们也听过洪梅尔和莫斯切来斯本人演奏这个曲子。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李斯特·费兰茨绝不比这两位音乐大师逊色。但奇迹还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在于那孩子的即兴演奏超过了主题节目……”

《什瓦比信使报》指出：这孩子将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钢琴家；也许可以说他已经超过了所有的钢琴家。

在小费兰茨面前，我总是一再强调说：新闻记者的语言总是偏激的，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是如此。

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无疑是一种快乐：观众的一大半挤在外面，人数竟然超过

了票数的一倍！

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伊布涅尔兄弟来找我们，请求费兰茨能在他们的小提琴音乐会上进行合作。从我们当前的物质状况来说，这是一种重大牺牲，因为这次演出的收入要全部归伊布涅尔兄弟。巴伐利亚人是很看重金币的，因此当有人把我们这种慷慨的作法传扬出去后，人们感到无比的惊异。他们在马路上拦住我们问：是不是全部收入都给伊布涅尔兄弟了？我们自豪地答道：是都给他们了。

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今天中午是在巴伐利亚国王的宫廷里度过的。很遗憾，按照宫廷礼仪的规定，安娜被排除在外，只能让我们两人进去。宫廷总管对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训导，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宠儿巴伐利亚国王面前应该注意些什么。我把他的每句话都铭刻在脑子里。费兰茨却晃动着腿，做鬼脸，手指头不停地运动，好象在弹一架看不见的钢琴。可是在我们被引进宫廷的接见厅后，他的表现却又象个靴匠的小学徒。他把我丢在一边，独自一人跑上去，并且向国王伸出手。使我感到极为惊异的是，国王竟愉快地原谅了他这种不合礼仪的举动，接过了孩子的手，并且把他拉到自己身边。费兰茨很随便地靠着头戴金冠的国王的膝盖。我记得当时的谈话是这样的：

"在莫舍列斯的后面演奏，你不害怕吗？"

"我不怕！"

“你是个机灵的孩子。你不知道恐惧二字，这很好。”

我的儿子高兴地点着头，表示他同意国王的意见。

“那么你现在能为我们演奏吗？”

“为什么不能呢？我非常愿意……”

（这时候，我感到我脚下的大地好象要裂开一样，宫廷总管也为他捏着一大把汗。宫廷总管曾经一再教过我们：如果国王要孩子为王族演奏，那时孩子就应该这样回答：我能为陛下和王族献技，这是象我这种年龄和卑贱出身的孩子所能得到的最大恩宠。）

费兰茨表演得很动人。弹完后，他又走到国王面前。看起来国王在宫廷总管面前也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学生，他不是按照宫廷礼仪微微点头表示赞扬，而是从左到右，然后又由右到左地亲吻小艺术家。在这之后，国王用手指向我们做了一个“弹指”的动作。费兰茨笑了，国王也笑了。在场的人当中只有宫廷总管和我两个人窘得要死。

一八二三年十月三十日

在奥格斯堡举办了一次内部音乐会。

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鉴于听众的巨大兴趣，我们不得不在“和声音乐厅”重新举行音乐会。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名声越来越大，居然有人来向我们讨钱了。现在我们要为火灾受难者演出。这种事是不能拒绝的。否则，他们马上会说：这对一个小孩算得什么？只要他动动手指，敲几分钟钢琴就行了。我无法向他们说明：交通、伙食、场

租以及售票人员，几乎占去了我们的全部收入。我们演了那么多场，可是全部收入只剩下九百个福林。

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五日

我们在斯图加特举行音乐会。报纸又在使用超级形容词：

“十二岁的李斯特·费兰茨给听众提供了最高级的艺术享受。他在表现力、准确性和表演才能等方面，都无愧于伟大的钢琴艺术家的称号。”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六日

我们在斯特拉斯堡的“卓姆·盖斯特音乐厅”举行音乐会。这是一种近乎骚动的场面，剧场人员根本抵挡不住象冲锋的士兵一样涌进来的人群。剧场经理不得不向外界求援。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我们无法离开这里。只好找了一个比音乐厅大一倍的剧场再进行演出。骚乱的局面仍无好转。人们告诉我说：就是再演五场，也未必能满足观众的愿望。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前天我们到了巴黎。由于报刊和私人通信预报了我们的到来，等着我们的是非常紧张的日程安排：一下子就接到了三十六

个晚会的邀请。谁都不肯付一百法郎以下的酬金，就是付一百五十法郎的为数也不少。

我拒绝了某些显贵的邀请，因为钱并不是一切。人还是要休息的。特别是费兰茨，他虽然长得很快，也还算强壮，但终究还是个单薄的小孩。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个显赫而又有用的邀请：让费兰茨在劳里斯顿文化部长家里演出。朋友们曾提醒我们说，很多事情都要取决于部长，例如提供免费场地，或其他资助等。但目前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因为即使这样，我们积起来的工作和邀请，就已经够多的了。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幸运真地在向我们微笑。蒂亚伯里的推荐信使我们认识了谢巴斯蒂安·埃拉尔德这位法国最大的钢琴和竖琴厂厂长。老先生已经七十岁左右。他立刻喊来了他的妻子和“继承人”。继承人皮埃尔实际上只是侄子，但老先生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

我们和埃拉尔德先生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这位老先生就建议在他的“宫殿”为我们安排住处(这真是一座宫殿，不过建造得很凌乱，看来埃拉尔德的先人们都是按自己的口味随心所欲地进行扩建的)。老先生说我们绝对不能拒绝。他一边说一边立刻就叫人把我们的包裹、乐谱以及衣服箱子搬上了二楼。在那里，有两个房间、一个过道、一间小巧的厨房和一间储藏室供我

们使用。费兰茨在楼下大厅进行练习。这个大厅是值得单独描写一番的。它的两面墙实际上是从天花板一直到地面的窗户，全厅有十盏吊灯。艺术家（现在就是我们的费兰茨）可以在三种乐器上进行练习：一架竖琴，一架讨人喜欢的十八世纪的洛可可①式乐器和一架新的有七个半音域的特大钢琴。这架钢琴的声音可与乐队相匹敌，而其柔和程度又可同竖琴媲美。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这是我日记中最愁苦的记载。

我们带着萨列里大师和梅特涅老爷的推荐信前往音乐学院。我们很快就被带到凯鲁比尼②大师的面前。我先介绍了费兰茨，当然也适当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我掏出那些可以证实费兰茨演出成功的报纸。可是凯鲁比尼告诉我，他对报纸毫无兴趣，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我又拿出了萨列里的推荐信。他以国王般的骄傲说：我从来不看介绍信。他还向我解释了为什么拒绝看介绍信的原因：我们想摆脱什么人时，就给什么人写介绍信。

我问凯鲁比尼是否想听听费兰茨的演奏。他摇了摇头说，他对钢琴不大感兴趣。我看到靠大人物的介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成功的，于是就转而谈到此行的目的：这孩子曾在名师门下学习，现在希望让音乐学院的教授们进一步雕琢他的艺术。

---

① 洛可可式乐器，洛可可(rocco)的涵义是“贝壳形”，也叫“路易十五式”。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统治时期(1715－1774)所崇尚的艺术形式。其特征是具有轻巧、纤细、华丽和繁琐的装饰性，色彩轻淡柔和。

② 凯鲁比尼(Luigi Cherubini，1760－1842)，意大利作曲家。曾任英国宫廷作曲家；一七八八年定居巴黎，先后任巴黎音乐学院学监、院长。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其歌剧作品大多具有反对专制暴政的倾向。

凯鲁比尼一动也不动地站着。费兰茨张着嘴，好奇地盯着这个活石头人。我感到自己象个在大老爷宝座面前低头哈腰的乞丐。

沉默只持续了几秒钟。切鲁比尼开了口：

“改变音乐学院的章程，我是没有权力的。这个学院只招收法国公民。”

我绝望地听着。费兰茨哭了。凯鲁比尼转身往回走，很快就消失在院长办公室厚厚的皮垫大门后边。

我怎么也劝不住费兰茨。他一路都在哭，一直哭到家里。安娜抚摸着他那美丽的金黄头发，然后对我投来责难的目光：你看，孩子过早地认识了流泪和绝望。我能做什么呢？我只好把孩子带到埃拉尔德先生那里。老先生听我讲了经过情况 之 后，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他说：“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只要想学习，在音乐学院的大墙之外也能学习……。”他沉吟了一下，接着补充说：“明天，意大利歌剧院的指挥佩尔先生将来看我。他想给歌剧院买一架新的竖琴。我可以和他谈一谈……。”

我们把茇茇打发回他妈妈那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人。埃拉尔德又描绘了一番费迪南·佩尔先生。他今年五十五岁，是位杰出的演奏家。但是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获得生活的两大礼物——金钱和女人的手段。他机敏、谨慎，但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象狮子那样勇猛。他曾随从拿破仑直捣莫斯科。回 来 后，他比塔里兰决定得还要快：立即转向波旁王朝。但他毕竟还是写出了《利奥诺列》。据说，贝多芬曾表示：本来他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的。对这件事，佩尔还恬不知耻地添油加酱，到处散布说，贝多芬写《费德里奥》时不仅借了他的脚本，而且主要的音乐片断也是从他那里借用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个好手，对茇茇会有好处。

佩尔按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他们很快做成了对彼此都有利的买卖。佩尔为歌剧院买到了新的竖琴和钢琴，埃拉尔德则获得了不少圆圆的金币。我并不知道，但我感觉到：佩尔在这笔买卖中也得到了好处。佩尔是那种忙忙碌碌的人。他总是来去匆匆，而且总是愿意把自己说得更忙一些。他的一只手在签字，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紧擦脖子上和额头上的汗水。突然他又想起了什么，立刻在记事本上写上几个字。撕下来后就请埃拉尔德立刻派个人送往歌剧院。

在他那又大又长的脸上——胡子是无法刮干净的，因为那象头发似的黑胡茬很快就会从苍白的皮肤里钻出来——经常流着汗。手帕也帮不了他的忙。请他喝的一杯葡萄酒简直是直接变成了汗水。埃拉尔德单刀直入地提出：

“我希望您能教一教这个孩子。”

“有天才吗？”

“您听一听吧！”

可是佩尔是个忙人，剧院、乐谱出版商、约会和公务都在等着他。他现在没时间来考察一个普通人。他说：“好吧，好吧……明天十点钟到剧场来，以后我再看该怎么办。”

佩尔对钢琴、室内乐和交响乐懂得并不多。他讲课时也是匆匆忙忙，而且经常为仆人、剧院的某个著名男高音、乐谱出版商的印刷工人和某个漂亮女人所打断。在课堂上，他只讲授歌剧文学。现在他正在研究格鲁克的作品。他流着汗，杂乱无章地、支离破碎地工作，但讲得还是十分出色。等他讲完一个乐章，茇茇已经会背了。佩尔最初还以为是偶然的。他一遍又一遍试图考验茇茇。小孩不仅唱出了曲调，而且立即弹出了相应的和声，使得佩尔大为吃惊。

佩尔一边流汗，一边擦额头上的汗，一再耸肩，表示不理解：

“这真是个魔鬼般的孩子。”

一八二四年一月五日

今天，我们给皇家美术总监写了信，向他申请长期招待票。我们很快就从邮局收到了他寄来的票。

一八二四年一月七日

今天我们又收到了一张特别荣幸的请帖，邀请单位是阿波罗儿童科学协会。

尽管那位永远匆忙而流着汗的佩尔没有提起过，但我知道这次邀请应该归功于他。在儿童科学协会，茇茇实际上是经历了一场考试。表演结束后，他获得了儿童科学协会的文凭。

佩尔对茇茇取得成功的初步反应是很古怪的。他在生气。这叫人感到不可理解，因为正是他在帮茇茇的忙。我相信，我已猜到了他的秘密。他是在生自己的气。说得确切些，他是在生自己弱点的气。在他的一生中，他开始第一次无私地爱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儿子。

一八二四年一月十日

茇茇这孩子就象一条小狗，必须好生照管。只要我有一分钟不在跟前，他就会干出什么傻事来。昨天我派他去乐谱商店，有意不同他一起去，为的是让他习惯一下独立生活。整个路程也就是一分钟，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竟会去这么长的时间。最后我等不及了，就亲自跑到街上去看。结果我在街角找到了他，

只见他手里拿着扫街的帚把，周围聚集着一大帮人。

“我的上帝，你在干什么？”

他紧紧抓着那宝贝般的帚把，手指头都变白了。

“你倒说话啊！”

“我想给扫街工人一点小费，因为我们家前面的街道总是他在扫。我给了他一张五法郎的，他嫌多，只好去换零钱。在他回来之前，我得照看他的帚把。”

一八二四年一月十四日

芨芨很疲倦。在这种时候，他的演奏显得很马虎，常常随心所欲地改变大师们的乐谱。我收紧了缰绳，说话的腔调也严肃起来，坚持他必须按预先规定的时间练习，并且拿出了伟大的秘方——巴赫的钢琴复调。孩子每天要弹两首前奏曲和两首赋格曲，这回他没法即兴弹奏或任意篡改了，因为“圣经”的语言只能逐字加以引用。

遗憾的是，我也累了。我的胃不大好。一年来，我几乎没有吃过任何一块能在我体内变成血液的东西。我不是在吃，只是为了营养在尽义务，因为我很明白，要机器运转，必须给它一些燃料。

这个在我们抵达时显得那么亲切的城市，现在露出了它的毒牙。我们接二连三地收到诽谤和侮辱我们的匿名信。他们责难说：孩子著名的即兴演出纯粹是骗人；我们同指挥事先都说好了，他们都是些帮凶，就象马戏团的演员一样。

一八二四年一月底至二月初

昨天我们三人去做弥撒。这对孩子的震动很大，我担心他

会昏倒。他那缺血的脸庞变得象块白布。他的手激动得发抖。他仰望上方，似乎在期待着圣欧斯塔赫教堂的大圆顶突然裂成两半，上帝和天使们一起出现在他的面前。回到家里以后，他说以后应该多进教堂。我只好回答说：生活有它自己的次序，那是不能随便打乱的。你应该工作，学习，然后祈祷。它们都一样重要。

一八二四年二月五日

今天我们去拜会了圣欧斯塔赫教堂的神父巴尔汀教士。他是个真正的法国教士。他性情开朗，面色红润，喜欢葡萄酒，也喜欢音乐。他从传闻中已经知道芨芨了。他很快就向我们发出邀请：他自己也常常举行音乐会，很希望在音乐会上看到羊群中最小的羔羊。我的儿子接受了他的邀请，同时也提出了要求：希望能认识一下教堂的管风琴和管风琴手。不久，巴尔汀带着我们爬转角楼梯。芨芨跳着、跑着；神父涨红了脸，喘着粗气；我则由于胃疼，每转过一个平台都要停一下。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管风琴旁。老演奏家接待了我们。他好象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管风琴的哨子、键盘、换声区域和脚蹬等复杂机械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位披着人皮的哨子显然感到不很痛快，因为这批从街上来的人挤到他跟前问这问那，动手动脚，打破了由千百个哨子组成的王国的肃穆宁静。只是当芨芨朝着他微笑，并说上次做弥撒时管风琴的演奏是多么出色之后，这个两条腿的“哨子”，才变得温和了一些。他先讲解了键盘、换声区域等系统，接着（出乎巴尔汀神父的意料），还邀请芨芨到管风琴上演奏。孩子表现得很大方，马上开始了演奏。当然又是即兴演奏。当一个父亲发现自

己的儿子具有令人惊异的天才时，那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现在我正享受着这种美妙的时刻。只不过在这半明半暗的教堂大厅里，听着庞大乐器的叹息、尖叫和轰鸣，我这种美妙的感觉当中还夹杂着一种新的感受。我找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这是恐惧！犹如一个人站在非常高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周围竟是很深很深的沟壑。这时没有比恐惧或者惊恐更恰当的字眼了。这孩子究竟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是谁教会他这些的？！

这次即兴的管风琴音乐会使巴尔汀神父受到了一场真正的折磨。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由于阴影还是由于我的想象，巴尔汀的脸似乎变瘦了。他祝贺我，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然后抚摸着茇茇的金发说：以后常来！

一八二四年二月十日

现在已经能肯定，我们将在皇家剧院的伊塔琳·卢沃伊斯大厅举行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音乐会。好心的劳里斯顿部长安排我们免费使用该厅，甚至他还让意大利剧团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三幕，作为我们节目的补充。音乐会将由罗西尼亲自指挥，由皮来格里尼先生、琴蒂小姐和久蒂塔·帕斯塔夫人参加演出。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荣幸。我们对茇茇的节目单讨论了很长时间。决定演出洪梅尔和车尔尼的两个乐队协奏曲，当然，还得加上不可缺少的幻想曲（即兴表演）。

一八二四年二月十三日

埃拉尔德的女婿斯朋蒂尼是世界闻名的作曲家。他在柏林获得巨大成功后返抵巴黎。为了欢迎他，今天我们同埃拉尔德

全家共同进餐。斯朋蒂尼讲的是意大利式的法语，所以饭桌上的谈话我能听懂的不多。他肯定是在谈《奥林庇亚》，这部歌剧的文字部分已由作家霍夫曼译成德文。至于布置和服装道具，则是由一位名叫辛克尔的先生设计的。斯朋蒂尼称他是当今世界上的第一流戏剧专家。

在介绍斯朋蒂尼和芨芨的故事之前，我先说几句斯朋蒂尼进门时的情况。他是愤怒地咳嗽着走进房间的，还没迈进门槛就开始咒骂："为什么要让一个意大利人在这样污浊的地方生活，就象在柏林和巴黎那样，除了大雾和下雪之外，还有感冒、肺炎和死亡在威胁着无辜的外乡人。"他愤愤地坐在一张巨大的餐桌旁。桌上摆设着木拉诺和斐灵翠的玻璃器皿、古代的银餐具，还有最名贵的塞夫勒瓷盘。这时还不能向他作介绍，因为这位大师正嚷着要换椅子："坐在圈椅上我没法吃饭，因为我的两个胳膊肘总要碰到扶手上。"他一边说，一边大声地擤着鼻子。仆人给他搬来了一张新椅子。现在，大师开始注意菜谱了。好多菜他都不愿意吃。他的妻子埃拉尔德·尤丽埃特象对待一个患有重病的娇气孩子那样，对他什么都照顾到。这位五十岁的小孩子好象每时每刻都在检查自己的健康状态，一会儿擤一下鼻子，一会儿挤一下眼睛，一会儿皱一下额头，一会儿蹬一下脚。最后他总算发现了我们。他以一种缺乏教养的粗野态度或者说象一个国王那样傲慢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埃拉尔德把我们介绍给他，而且特别强调我们是从遥远的巴诺尼亚来的匈牙利人。有趣的是，尽管我和芨芨都没有说什么，然而这个国籍却吸引了他。斯朋蒂尼耸了一下肩，问道："你知道我的哪一部歌剧？"这真要感谢萨列里当年的教学成果，芨芨很快就回答说，他知道《柯尔泰兹》、《密尔顿》、《维斯塔的处女》和《帕斯奎里》。斯朋蒂尼表面上似乎没有注意孩子的回答，但是午饭后当我们走进客

厅时，他命令芨芨坐到钢琴旁去演奏，并说："让我听听你会弹《维斯塔的处女》中的哪一段。"

感谢上帝，芨芨弹得很不错。高兴之余，当然又出现了奇怪的老问题：他是从哪里学来的？问得确切些，他在脑子中怎么会积聚起这么多的曲调、和声和旋律？看起来，斯朋蒂尼并没有被我儿子的表演所感动。奏过幻想曲后，大师沉默了很长时间，眼睛盯着前方，然后说道："这真是美妙的音乐，简直无法相信这全是我写的。实际上，一切值得谈论或者表演的音乐都在其中了。我真地感到怀疑，我究竟还能为我的后人留下些什么呢？……因为我把一切工作都做完了……。"

一八二四年三月八日

在紧张地做准备工作的那几周里，我没有写日记。现在就从音乐会开始写吧！一八二四年三月七日，星期天晚八时，芨芨为在巴黎赢得最后的彻底胜利而开始了伟大的战斗。音乐会是以好的兆头开始的。意大利人演的是海顿的交响曲。这个曲目我在基什马尔顿曾多次听过，有一次我还以助理小提琴手的身份参加过演奏。对这高贵的音乐，巴黎人并不太看重。包厢的门忽开忽关，在最高一层看台上有人开起了小会。就是在楼下的正座中，人们也没有表现出艺术欣赏者所应具有的态度。交响乐总算是结束了。台上人来人往，正在重新装台。芨芨的钢琴被推了出来，随后他自己也出现在演奏台上。

乐队先开始演奏。几分钟后响起了钢琴声。这时，我比较平静了，只是胃还有点痛。有一刹那，我忘记了是我的儿子在演奏，音乐把我完全吸引住了。但随后我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看到这确是他在演奏。在他出场前，我曾千叮万嘱，要他注意乐

谱，看来全是白费功夫。茇茇大师是倔犟的、不肯屈服的：他丝毫也不顾曲谱，全凭记忆演奏，这当然会使他的家里人感到紧张。我觉得他是在用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挤压我的大脑：只依靠记忆来驾驭乐队和钢琴的一切曲谱。弹得非常出色，第一乐章结束了。听众都屏住呼吸：原来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演奏现在才真正展开。乐队保持沉默时，只有他一个人在表演，显示自己的才华。先是闪电雷鸣，然后是雷鸣的级进滑音，好似在同上百架竖琴竞秀。最后是结尾的颤音。这颤音有声有色地向上发展，越来越轻，好象要脱离大地的境界……这时乐队本应该接上来，可是罗西尼大师忘了向乐队做手势，他身子略微前倾，眼睛紧盯着孩子的两只手。茇茇微笑着，抬头望了一眼大师，然后重新弹了一遍刚才的颤音。大师这时才想起应该指挥乐队了，于是钢琴和乐队的欢乐和声又重新融合在一起。

当然，听众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无休无止地欢呼鼓掌。巴黎马上出现了新的流行话：希腊竖琴之神俄耳甫斯[①]只能感动石头，而这个小匈牙利人却点化了意大利人的心。

下面是《白旗》杂志的评论：

"从昨天的音乐会之后，我脑中好象又看见了灵魂转世。我坚信莫扎特的灵魂和思想已经转到李斯特·费兰茨的肉体中了。特别明显的事实是，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祖国（这位法国记者竟把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看作是一个奥匈民族）。他们的职业和任务也完全一样：都是在孩提时代就达到了令人惊异的高峰。我可以随便请一个有幸参加过他的音乐会的人作证：那

① 俄耳甫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孩子在刚刚够得上钢琴的键盘和刚刚坐得上琴凳的时候，就已经克服了一切困难而成为欧洲第一流的钢琴艺术家。这个第一流是经得起任何比较的，连莫舍列斯都不会对这个等级表示异议。”

《白旗》文章的作者马汀维里先生在另一段中称颂茇茇的即兴演奏说：

“在此之后，他甩开了演奏台、乐谱和一切台上的东西，完全沉醉在自己的天才中，让美丽的幻想自由飞翔。在这里，语言的权威不起作用，找不出任何形容词来表达当时的现实。在和谐的序曲之后，响起了《费加罗的婚礼》。刚才我已经说过，由于灵魂转体，李斯特成了莫扎特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他还给莫扎特的曲调增添了新的东西，这最好不过地证明他继承得是多么完美。”

《星报》好不容易才找到与众不同的赞美茇茇的言词。尽管孩子面色苍白而又削瘦，但报纸还是说他“令人感到骄傲，富有男子汉的派头”。

“他是世界的第八奇迹！”这句流行话不知道究竟是谁编造出来的，可是巴黎的流行话专家们都说是自己的发明。

纯收入达到了四千七百一十一法郎。我们终于摆脱了经济困难。

许多地方又发出了参加音乐会演出的邀请。其中还有柏林、布鲁塞尔、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当然，我们也收到

了一些侮辱性的信件。此外还读到一篇想搞乱人们思想的报纸文章。音乐报纸《蚓螈》既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就发表了这篇文章。他们显然是存心挑拨我们同某些人的关系。这些人当中包括有杰出的罗思柴尔德男爵或维也纳埃斯凯来斯家族。

我们的恩人埃拉尔德（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和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使我永远相信，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无私的友谊和仁爱）向我建议：不要抗议，更不要去驳斥，用不着认真对待他们。如果我们为这种事而停止前进，纠缠到里面去，那就会不由自主地弄脏我们自己。

音乐会成功的主要结果是有人直接为茇茇写了一个歌剧剧本。这件事实际上是由那位永远忙忙碌碌的斐迪南·佩尔发起的。他最先提出了为茇茇写个歌剧的想法。三天之后，剧本就送到我的手上。歌剧的名字为《唐·桑科》或《爱情之堡》，作者是梯阿隆和朗斯。

第一场景：不可战胜的爱情城堡。宫墙环抱，钟楼高耸，四周都是可怕的垛口。灯光照得宫墙透明，人们发现：原来城堡是个真实的《一千零一夜》，里面到处是幸福、陶醉和炽热的爱情。歌剧脚本说：只有相互爱着的人们才能踏上幸福之岛。唐·桑科也想进入城堡，但守护大门的三头狗挡住了他的去路："放弃你的一切希望吧。只有当回报你的爱情的火焰点燃了你的心灵时，你才能进来。"唐·桑科对三头狗的劝告半信半疑。他正热恋着埃希尔，但是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她也爱他。魔师阿里多（剧本里有这样的角色）对被排斥在幸福之门外的唐·桑科说：一点希望也没有，因为埃希尔刚刚和纳瓦莱公爵订了婚。

不过阿里多不仅会制造混乱（试想，唐·桑科听到他的话后

是多么难受啊！），也会帮助人：他掀起了一场暴风雨，把正在举行婚礼的埃希尔和赶来祝贺的人们都赶进了爱情之堡。或者说只是可以赶进去吧，实际上埃希尔是不能进去的，因为她的心也没有被回报的爱情之火所燃烧。阿里多为这个公爵小姐出了个主意：要她假装是爱唐·桑科的，这样就可以使城堡的大门打开。但埃希尔是个真正的女英雄，她宁愿选择狂风暴雨也不愿撒谎。可是灾难远远不只是无情的风雨和惊天的雷鸣！这时，罗姆阿多冲上戏台，想要拖走高洁而冷心的小姐。唐·桑科抽出宝剑，挺身保护小姐，在对打中负了伤。在这骑士般的自我牺牲面前，小姐的心软了下来，终于回报了唐·桑科的爱慕之心。

奇异的城堡大门敞开了，这对情侣成了幸福之岛的居民。（我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从剧本中体会到，罗姆阿多实际上就是那个足智多谋的阿里多魔师，他之所以戴上假面具，伪装自己，完全是为了帮助这对恋人。）

我还看到，剧本作者是想让茨茨在歌剧音乐中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这里有农民舞、二重奏、暴风雨、对打、小夜曲、芭蕾舞以及一个作曲家所想要的一切。

我从戏剧世界的习惯和道德中至少学会了一件事：在还没有开始做事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茨茨的劳动（假设他的表演可以被接受的话）是否会同世人见面。从昨天开始，我就在进行工作了。我的第一站是拜访劳里斯顿部长。从他那里我得到了最明确的肯定答复。在这之后，我又去歌剧院打听审稿委员会是否接受这部歌剧。这里的信息并不是最好的。审稿委员会的一个常委是费迪南·佩尔，可是另一个委员（我几乎不敢写出他的名字来）却是切鲁比尼。

我还有比这更大的担心。到十月份，茨茨才满十三岁。不

管他多么有才华和富有想象力，但他终究还只是个孩子。有一天，我们在奥尔良公爵家作客。公爵老爷让茇茇坐在他的膝上，问道："啾，你希望要点什么吗？因为你的钢琴确实弹得很好。"谁知我这个孩子真地就要了一个木偶。这种可以套在手上的木偶，还是他在一个公爵孩子那里看到的。第二天，公爵派人送来了差不多一整个玩具店，但茇茇对木偶已经不感兴趣了，因为他正在读那部令人发狂的歌剧剧本。唐·桑科的冒险显然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这就是我的大问号！应不应该让这个好玩好动的孩子去接触这种翻天覆地的爱情故事？他真能从中理解和感受到什么吗？

正在思想陷入混乱和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安娜来了。她在我面前还不到几个小时，就简单明了地宣布：她再也受不了啦。她的生活毫无意义，这里不需要她。伙食由隔壁的饭馆供给，收拾房间有埃拉尔德的仆人，至于音乐会，那是没有她也照样可以举行的……我原先还以为这只是由于她的性情多变，犹如四月的阴天，来得猛去得也快。

可是安娜真地开始收拾行李了。她打算先去看她叔叔，然后到克莱姆斯的亲戚那里去。她严肃地告诫孩子：今后爸爸的话就是圣人的格言。

其实，在我的贫穷生活中，凡是能够牺牲的，都已经牺牲了。家庭、房子、职业以至安全……现在我连安娜也得牺牲掉。十五年的共同生活使我非常了解她。她虽然是那样的温顺、恬静和听话，但是一旦决定了什么事，那任何人也动摇不了她。现在她决定要走，人间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她留下来的。

她很谦逊地感谢了埃拉尔德一家。她讲法语时错误不少，

说得也很慢，但是表达得很得体：她身体有病，在这种时候，最好还是住在自己的亲戚那里。我和芨芨送她到驿车站。我最后又问了她一次："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她的眼睛里没有眼泪，但声音却是哭泣的："不久的将来。"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就是说，"等你们积攒很多钱后，两人一起回来。一个孩子没有家是不能成长的。"

"我已向埃斯代尔哈兹庄园汇去了几千福林，让他们去投资生利。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们，只要你用钱，就可以去取。"

"谢谢你，亚当！"

在这之后，她无缘无故地哭了起来，要我多保重，因为只有她知道，我在梦中象个发烧的病人那样辗转呻吟；只有她知道我吃得越来越少；也只有她注意到，我的脸有时候都痛歪了，可是我从来不对人说。驿车开动了，留下了我和芨芨。芨芨既不发问，也不好奇，但我感到了他探询的目光：妈妈到底为什么要走？

从现在起，写信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我们将去英国。

一八二四年六月的上半月

我们到达伦敦时，音乐季节已快结束。尽管如此，对我们的邀请仍如雪片飞来。一场晚会可得五个英国旧金币。也有特别高的，例如在法国大使的晚会上，我们得了二十个。

近日结算了在伦敦的收入，共一千三百七十六个福林。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伦敦特别忙，所以很少写日记。我得在几天或几周内学会一种新的语言。英国人讨厌德语，瞧不起法语。我宁愿让他们

从头到尾听我讲蹩脚英语，也不想勉强人家听我讲别的外国话。

我们终于举行了第一次独立的音乐会。这正是久蒂塔·帕斯塔举行音乐会的那天。音乐爱好者们只好在世界闻名的女歌唱家和我的儿子之间作出选择。专家们终究还是对茇茇感到新奇。在第一排离指挥位置很近的地方，坐着的都是当代钢琴艺术界的权威：克莱门蒂、克拉默、赖斯、尼代、格里芬、卡尔克布连涅尔、吉普里安、波特和拉多尔。

当听众正在进入演奏厅的时候，我读了一份在街上散发的传单：

请注意　　请注意　　请注意

"新阿吉尔大厅"

匈牙利出生的十二岁艺术家李斯特大师敬告高贵的老爷太太和广大听众：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八时半，他将演出，并将弹奏谢巴斯蒂安·埃拉尔德先生获有专利的新大钢琴。

乐团团长是莫礼先生，乐队指挥是乔治·斯马尔特勋爵。

票价半个金币，请速向大马尔布鲁斯街十八号的李斯特先生购买。

我随手放下海报传单，重新转往音乐厅。离开场已不到十分钟时间，可是大厅的大部分座位还是空的。我闭上眼睛，心想这次可要失败了。现在只能看看售票处的成绩了。

我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不愿再看那些空荡荡的座位，反正乐队一开始演奏就会把我惊醒。可是令人高兴的情景出现了：

就在这最后的几分钟内，厅里差不多已经坐满。这样看来，伦敦就是这个习惯，尊贵的客人是不能来得太早的。反正一样。我们度过了难关，票子销得不错。

我的孩子演奏得很自然大方。他既不理睬那些大人物，也不看一眼乐队指挥。他那天使般的微笑使第一排的女人们着了迷。

我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才得知：世界著名的曼陀林演奏家西格诺·维麦卡蒂也在座。他建议共同演奏车尔尼的变奏曲《怦怦跳动》。这个节目取得了无法形容的成功。

掌声终于平息下来，即兴演奏开始。这当然需要听众们协助，可是没有一个人点曲子。后来在乔治·斯马尔特勋爵的一再敦促下，总算出来了一个人，是一位妇女。她建议演《塞维尔的理发师》中的一段：《基蒂，基蒂》。

茇茇这孩子是多么顽皮，他装得好象在寻找这一段曲调似的，先是“猛敲猛击”，然后从“基蒂，基蒂”中演化出赋格曲，接着又由赋格曲组成另一种音乐：他用右手弹主题，用左手润色衬托，然后两手交叉，用左手“唱歌”，而右手用来横扫琴键。乐音的波浪越来越低，越来越轻……结尾时已成为令人窒息的叹息，只剩下节奏在啜泣：基蒂，基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皇家音乐学会举行年度庆祝会，这真是莫大的光荣。他们邀请茇茇参加会演，既是客人，又是演出者。我们的主人是皇家乐队的宫廷指挥萨姆尔·谢巴斯蒂安·维什。这是位上了年纪的大音乐家和大科学家。他象接待亲王似地接待了茇茇。

在庆祝宴会开始之前，茇茇为全国第一流的音乐家们演奏

了二十分钟(这是宴会上唯一的节目)。又是即兴演奏。听众都站起来为我儿子的表演鼓掌。

一八二四年七月一日

这里也有竞争。英国莫扎特学会正在迫使(更准确些说,是他们的家长在迫使)从曼彻斯特来的小阿斯普尔和从慕尼黑来的德尔菲尼·肖洛特与我的芨芨争芳斗妍。他们当然是竞争不过的。这主要应该归功于芨芨的天才和支持我们的大人物们。有一次,音乐会结束后,我收到了一封只有几行字的信。从签字上看,是奥地利驻伦敦的大使埃斯代尔哈兹·米哈依公爵。我立刻去拜会这位老爷,并受到了他殷勤的接待。他说,他已经同英国国王的宫廷联系妥当,准备安排芨芨为王室家族演出。

今天我不得不到医生那里去。他给了我一些药水和一条好心的建议:尽快地离开英国,因为这里的气候对我是有害的。

今天收到了为王室演出的酬金:五十个英国金币。这是很大一笔钱,然而更值得怀念的是这次演出。国王反复用德语、英语和法语说:这小孩超过了克拉麦尔和莫斯切来斯!

邮局又送来了新的请帖。曼彻斯特在等待着我们。音乐演出公司在信的开头写道,酬金是一百英国金币。这又是很大一笔钱。我这可怜的父亲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纪,恐怕一共也没有挣过这么多钱。我不顾医生的所有忠告,决定接受这项邀请。

让我们看看曼彻斯特的海报吧:

曼彻斯特皇家剧院

瓦尔德和安德列夫公司以极为欢乐的心情宣告,

我们以巨大的物质代价与青年艺术家李斯特顺利地订立了合同。他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所有听过他演奏的专家都一致认为，他具有当代最伟大的音乐艺术天才。

今天，瓦尔德和安德列夫先生还让我了解了一下音乐会组织安排方面的某些秘密。下面是一份预算计划：

场租费	三十个金币
乐队	三十五个金币
印刷厂、节目单	九个金币
报刊广告	二十六个金币
票务	九个半金币

这笔开支相当于匈牙利的九百十六个福林。在开支这么大的情况下，如果老板们希望在获得荣誉之外还能赚点钱的话，那就必须场场满座。

茇茇搞作曲也很勤奋。他的作品有：

壮丽回旋曲	两部
阿布兰德主题变奏曲	两部
娱兴曲（主要是用罗西尼和斯朋蒂尼的主题写成的幻想曲）	一部

一八二四年九月三日

我们又回到了阔别四周的巴黎。毋庸讳言：我多少（如果不是完全地）觉得这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们首先拜访了劳里斯顿阁下。他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对茇茇的海外成就表示关切。之后话题转到歌剧《爱情之堡》：

“这个歌剧搞到什么程度了？”

茇茇大胆地回答说：

“到冬天就可以完全结束。”

部长阁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说：

“你应该作出最大的努力把它搞好，因为审稿委员会里有凯鲁比尼先生。”

“面对部长阁下的支持，凯鲁比尼先生又能怎么样……”

部长皱起了眉头：

“凯鲁比尼对皇帝来说都感到是个厉害的对手，更何况是对我！”

关于歌剧的情况就是这样。茇茇沮丧地整理着手稿。入夜，我从另一个房间看到他毫无睡意地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只好悄悄走进他的房间，鼓励他说：

“不要担心！我们绝不轻易罢休！”

一八二四年圣诞节

我的手有几个月没有摸日记本了。日子过得很平淡，无可记述。安娜按时写信来，我们也热情兴奋地复她的信。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改变现实：我们彼此离开了；我担心这会使孩子感到特别痛苦。今年十月，孩子迈进了生命的第十四个年头。他变成了一个修长苗条、颇有吸引力的翩翩少年。人们，特别是女人们（愿上帝宽恕她们的罪行）的视线总是停留在他的身上。他不仅是个杰出的艺术家，而且是个善于社交谈话的好手。我即使在巴黎呆一百年，也将永远是一个客人。我在言谈和举止

方面都有困难，而芨芨却是地道的巴黎派头。他讲话流畅，我往往跟不上；他思维敏捷，想辩过他可真得下番功夫。要保持我做父亲的权威和优势，已经越来越困难。他最不满的是他没有朋友，说他就象一只关在笼中的歌鸟，人们可以欣赏他，听他表演，也许还崇敬他，可是他却不能摆脱鸟笼。埃拉尔德一家在自己的亲戚当中为他找了一些朋友，但是他嫌不够。芨芨回家，总是问个没完：莫里哀是什么人？什么是毕达哥拉斯定理？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蒸汽机？地球怎样围着太阳转？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但在这些思想交流之后，往往出现的是更大的空白：孩子在思考，他正在开发自己面前的知识宝库。他毫无羞涩之意，敢在大庭广众面前不断发问。他什么都想知道。他弄来那么多书，以致书柜在书的重压下总是摇摇晃晃的。他读得很零散，恨不得一下子就能读完十本书。后来他对读书也腻烦了。

他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行人。过一会儿，他请我允许他去探望一下老朋友圣欧斯塔赫教堂的老管风琴手。虽然芨芨已经十四岁了，但我不愿让他一个人在巴黎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于是我决定同他一起去。我一边听管风琴演奏，一边打瞌睡。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又上去听了大合唱。最后我对他说：今天够了吧。我发现到教堂来玩，对孩子有很大影响。每去一次教堂，回来后都要谈论几天。

世界的一切权力都在上帝手中。那他为什么偏偏让他的独生子为人类做出牺牲呢？芨芨从这个问题出发，研究了殉道者们的生活，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的一切辛劳可能都是白费。对他来说，在教堂大殿中度过的每一个小时，比上百次音乐会都更值得。当然，我不同他去争论这些问题，因为这是个不大容易弄明白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很容易迷失方向，最后陷在里面不能自拔。我只是对他说：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按照造物主的意

旨去工作。农民种地，教士传教，妈妈哺育孩子，艺术家则为人类提供美的享受。总之，每个人都在完成上帝委派给他的使命。

“上帝给我的使命真的就是使别人得到娱乐吗？”

“是的……！”

我们经济上再也没有困难了。用匈牙利话说：我们挣够了钱。在一天夜里，我结了一次帐。时过夜半，我推开帐本，脱了衣服想睡觉，但是怎么也睡不着。突然，我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扎得是如此之深，以致我怎么也无法从思想上把它驱掉。这个念头是：假如明天我闭上了眼睛，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安娜远得就象在月球上，孩子（不管他天赋有多高）终究还是个孩子。这点小小的财产如不加以注意，就会象三月的积雪一样融化掉。必须积更多的钱，打下更稳定的基础。我真想马上起来做点什么事，不愿再这样无所作为地坐待明天，以免厄运和贫穷降临到我儿子的头上。

严峻的冬日来临，旅行已经不可能了。于是芨芨继续写他的歌剧。虽然他知道《唐·桑科》的事情还远没有了结，但仍然用他所特有的毅力热情地画着音符；我则为打听审稿委员会的名单而四处奔走。今天，终于弄到了全部委员的名单：

佩尔、凯鲁比尼、彼尔顿、波叶尔丢、利索尔和卡蒂尔。

这没有什么可害臊的，我拜访了他们所有的人。他们都好意地接待了我。当然，也都使了惯用的托词，“我们将尽力而为，问题的关键在孩子的作品是否行。”

没有办法，戏剧世界是个很有欺骗性的世界。我们需要找到更可靠的支持。假如上帝有一天让我离开芨芨，那我一定要给他留下一笔财产。于是我又同演出公司的老板们开始谈判。

三月份，我们将在巴黎举行音乐会，然后在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波尔多、图卢兹、里昂、尼姆和马赛。接着渡海去伦敦、曼彻斯特和温莎，最后再回到法国。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在布洛涅城作短暂的休息。

我向芨芨说明了我的计划。我有意让他习惯于我把他看作是个成年人，给他看了演出公司老板们的来函信件。他虽未表示反对，但看得出他并不喜欢这次巡回演出。我几乎说出闷在我心里的想法：要趁热打铁；要充分利用目前形势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儿童艺术家的面前，世界是敞开的……问题是他长大后怎么办？当然这一切我只是在想，因为我要是告诉他的话，那肯定会深深伤害他的。他变得越来越愿意谈论未来了。特别是当人们不再把他当小孩子哄着玩，而是把他看作是艺术家的时候，更是如此。他又开始创作新的曲子，在写《唐·桑科》的同时，还编写一组练习曲。他骄傲地告诉我说，他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钢琴协奏曲。由于激动，他雪白的脸庞上泛出了红晕："在这里，你将找不到惯常用的快板、行板和急板等字样。我描写一个人……他咒骂整个悲惨的世界，然后高傲地背离了人群。眼泪，我的主角要学会哭；梦境……在这以后，主角发出了讥讽的笑声，把背朝着世界。"我听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你是从哪里学来这些东西的？"

他脸上流露出胜利者的笑容。在那天使般的童脸上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梅菲斯特[①]的样子。他说：

"爸爸显然没有读过契尔德·哈罗德写的《朝圣之路》……"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零星琐事太多，还得写东西，所以没有时间研究这位英国贵族的作品。

---

① 梅菲斯特，德国作家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名。

这时，他感情激动地朗诵起来：

> 没有永存的神灵，也没有永存的信仰，
> 昨天是宙斯，今天是阿拉，
> 别的时候还可以诞生其他。
> 当人们意识到血的牺牲毫无意义，
> 死神啊，你的希望将化为尘沙。

在这种时候，我能做什么呢？只有感到惊异。我对他说："这种读物对你来说还嫌早了些，我的小朋友！"

他不回答，而是坐到钢琴旁用娴熟的指法和音乐语汇重现了契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路》。我觉得我真应该批评他几句：不恰当地、过早地读某些书，就象没有消化的食物，对胃是有害的。然而他是那么可爱，特别是当他去掉了梅菲斯特的表情，扑到我的怀里，搂着我的脖子时，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管那些已经想好的严厉词句了，只是抚摸着他，并称赞说："好了，孩子。不过今后你想读什么或者不想读什么，事先要同我商量一下。"

一八二五年三月份

在这一年艰难而曲折的残冬季节，茇茇象葡萄汁一样开始发酵、成熟。我只好加强对他的管教。感谢上帝，音乐会又重新开始了。尽管他不愿意，尽管他表示只对创作艺术感到兴趣，他毕竟还是在兴奋地准备音乐会。第一场重要的音乐会将在一八二五年三月十五日举行。人们说，这将是近年来最光辉的一次联欢晚会。参加者有库里奥尼、佩来格里尼、朱切里、波尔多哥尼等先生以及琴蒂夫人、帕斯塔夫人和罗西夫人。

在埃拉尔德家里，还有一张名片在等着我们。上面写的是法朗兹·约色夫·加尔教授。

第二天，教授亲自来了。他虽然住在巴黎，但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他办事仔细、谨慎，多少有些学究气。他拿出一个小小的记事本，上面记着我的全部档案、安娜的档案以及我所能记得的全部亲戚的档案。他还请我允许他摸摸我的头颅。他一边摸，一边咕哝，然后又在小本子上记点什么。虽然我不大喜欢别人摸我的脑袋，但对这位蓄着大胡子的白发老先生还是尊敬的。我问他：

"尊敬的教授先生，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吗？"

"我想测量一下您儿子的头颅。因为很明显，天才人物的大脑也会表现在外部。但不知道在儿童身上是不是也如此。"

我不想伤害这位老教授，因此也就没有禁止他进行测量，尽管我是不相信他这些话的。其实有什么必要打扰一个孩子的神经，让人家去说他是神童，猜测他的大脑尺寸呢？

在马赛，我怎么也未能摆脱艺术家们的要求。帕斯卡和贝松大师为芨芨画了像，制了铜雕刻板。当地的一位诗人还在画像上写了一首诗：

他忘却了年龄上的欢乐，
把灵魂溶化在幸福的歌曲中。
他惊异地聆听：
上帝也在赞赏我们的神童。

现在我们俩都不想再举行音乐会了。

我们离开英国后，迁居到法国布洛涅。在那里，我们每天作海水浴，以洗掉从英国带来的污垢。我们在海滩散步，搜集贝壳，欣赏出入港湾的各种船只。我们在一家豪华的咖啡馆里休息。聚会在那里的都是一些显贵人物。他们玩弄各种手法，最后使我们终于同意在咖啡馆的大厅里举行一次音乐会。

这样一来，整个休养期间的费用全给包了，最后还净赚了六百个法郎。当然罗，赚钱多的地方，开支也大。我们每天要付五个法郎的房钱，吃早饭和午饭要花十六个法郎。

有一个演出公司的经理建议我们去荷兰和德国作巡回演出。接受这种邀请的可能性并不排除。即使只是为了离奥地利和安娜近一些，这个建议也是可以考虑的。不过这件事情是属于将来的问题。当前还是得先回巴黎，以解决我们的住宅问题。在现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我们不能再接受埃拉尔德先生慷慨的照顾了。

我们的新住址是蒙特马利区新圣欧斯塔赫路二十二号，斯特拉斯堡旅馆。

今天我们得到通知，要�去审稿委员会进行答辩。我想，他们的目的是在于了解歌剧究竟是不是茇茇自己写的。因为谣传说，整个乐谱都是费迪南·佩尔的作品（后来又传说是克鲁采尔的手稿）。当然，我得陪孩子去。他们让我进了审稿委员会的会议室，在整个评判过程中，我一直紧张得满头大汗。乐谱摆在委员们面前。他们对小家伙说："你先演奏一下埃希尔登场的那一段……风雷曲……序曲……埃希尔和唐·桑科的二重唱……"

茇茇一面弹琴，一面用细嫩的童声演唱。我得说，审稿委员们的态度是亲切的。利索尔在鼓掌。彼尔顿露出善意的微笑。老卡蒂尔站了起来，走到钢琴前吻了吻茇茇，说道："你干得非常

好，我的孩子！”

遗憾的是，委员会要进行秘密表决，因此我们只好退出大厅。一分钟……一刻钟……还是没有表决结果。卡蒂尔从门后伸出头来说：“先生们，请再忍耐一下！”又过了半个小时，两扇门打开了，服务员把我们引进大厅。看来，卡蒂尔先生接替了主席职位，因为是他站起来宣布评判结果的：“我们一致接受李斯特先生的新歌剧《唐·桑科》。”

我盯着凯鲁比尼的象大理石一样顽固的死灰脸。他们究竟是怎样争取到他同意的呢？因为这个“一致接受”里边也有他的一票。我相信，我永远也不会解开这个谜！

我们准备到音乐学院去拜访教钢琴的克鲁采尔先生。教授先生曾获得许多国王、大公授给他的勋章，但最大的荣誉还是贝多芬大师推荐了克鲁采尔的奏鸣曲（后来我才知道，它并没有列入节目单）。这样的开场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位大艺术家并不需要别人的赞颂。他是那样朴实、直率和富于人情味，以致茇茇在说话中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教授先生，我们想请您担任我的歌剧指挥……。”

克鲁采尔把我们引入他的工作室，让茇茇坐在通常是他本人工作的那张写字台旁，然后一起翻阅总谱。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和研究后，教授紧紧握着茇茇的手，说：

“好吧，我答应你，小东西！”

一八二五年十月十七日，也就是我儿子生日的前几天，歌剧《唐·桑科》上演了。整个晚上留给我的印象是，演出似乎是在我的梦境中进行的。在我们还没有迈进歌剧院大门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的紧张感觉：迄今一切顺利，但接着可能一切都会完蛋！我怎么会干这种发疯的事呵？这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成

百辆豪华的马车停在楼前，到处是耀眼的夜礼服，光芒四射的首饰。人们都是为茇茇而来的。所有的吊灯都为他而发亮（这样灯火辉煌的场面我还从来不曾见过），乐队也赶来为他服务。管乐师使劲地吹着A音，它穿过了上千人的谈话、喧笑和脚步声，透过了舞台上回荡着的杂音。当然，我熟识歌剧的一切声音，因为我参加了所有的排练。但现在一切都是新的，好象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它。我完全丧失了判断力，不知道它只是个一般作品还是一部杰出的创作，是儿童的嬉戏还是真正的音乐。我感到茫然。

我只记得当时茇茇站在天鹅绒的大幕前，他的旁边是歌唱家诺乌里。掌声无论如何也不肯平息下来，大幕一次又一次地拉开。当我从台阶上往下走时，听到了群众的评论：

"这真是一个天才的孩子，……假如整个歌剧都是他写的话……"

我想再谈谈克鲁采尔先生的情况。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近暮年。由于手受伤，他只好从事教学或指挥工作，再也不能演奏他那架曾受到贝多芬称赞的琴了。如果换作别人，他的性情在这种时候会变得暴躁乖戾，并且想方设法在别人的身上来报复自己所遭受的不幸。但我从未在克鲁采尔的行为中发现过这样的弱点。他红润而慈祥的脸上蓄着稀疏的胡子，闪现着基督式的表情。那对观察敏锐的眼睛，从不寻找伤害别人的机会，而是闪烁着鼓励他人上进的光芒。他两只高贵的手不是大自然偶然的产物，而象是雕塑家的艺术作品。所有这一切将永远作为善良仁慈和助人为乐的象征而活在我的心中。

在歌剧《唐·桑科》演出第四场（这时仍然很叫座）之后，克鲁采尔要我们去他那里。他要我一个人去。我立刻意识到他有

什么秘密的事要告诉我。的确，这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教授向我提出了一个对我们一辈子都是有益的建议。他说，要赶紧把对孩子的教育培养工作交托给具有更高水平的人。杰出的艺术家是不会闪烁其词的。老教授诚恳地告诉我说，《唐·桑科》这部歌剧只是靠儿童的机灵所创造的奇迹。这种音乐只是一种花枪，它能使外行人惊叹不已，但内行人会感到：这座艺术创作的宫殿虽然富丽堂皇，但只要有一场大风，就可以把它摧毁，因为它的基础不牢固。一定要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在上面建造一座永久性的事业之堡，而不是一座童话小城。

我惊慌地问道："茇茇的工作毫无可取之处吗？"

克鲁采尔用他那秀长而柔软的手拉着我的胳臂，说：

"您怎能这么说呢？我们不是演出了吗？它同其他歌剧作品一样……是很可取的嘛！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这孩子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不是想为今天培养一个神童，而是要为明天和后天造就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当我听克鲁采尔论证时，我不仅注意着他，而且也注意着我自己。不管怎么说，受到批评总是很痛苦的。因为我愿意听别人说茇茇的创作是完美无缺的，就象艺术巨匠们的作品那样尽善尽美。起先我感到懊丧，但当我的目光与克鲁采尔的目光相遇时，我又平静了下来。我知道，他只是希望我们好，毫无其他企图。我应该听取他的忠告。

"教授先生，您能答应教他吗？"

"很遗憾，我不能承担。音乐学院的指挥工作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此外，我自己也正在写一部歌剧。"

"那么您推荐谁呢？"

"安东尼·瑞恰。"

我立刻给车尔尼教授写了一封信，向他征求意见。他回信

说，他目前正在把瑞恰的两部作品翻译成德文。

无须多加解释，车尔尼教授赞成我的选择。第二天，我去拜会瑞恰，他住在一所瑞士的宅院里，周围都是德国人。他们实际上占领了整个安静的夸特尔山。瑞恰的房子在三楼。当我进入前厅时，仿佛踏上了一个德国小岛的土地。这里是雕刻的旧钟，莱茵地区的风景画，那里是笨重的古德意志家具，凌乱地散在桌子上和书架上的乐谱。再往里边走，看见钢琴上、座椅上和橱柜顶上也都是乐谱。一句话，好象整个住宅都被乐谱的洪水淹没了似的。最后见到了房子的主人。这是一位眉毛浓重、声如洪钟、身材魁梧的人。并不是肥胖或营养过度，而是象普通农民或护林人那样肌肉发达，健壮雄伟。只花了几分钟时间，我们就说明了来意。紧跟着我说："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成就是很大的，但我还是觉得，我们走进了死胡同。克鲁采尔先生认为我儿子的艺术道路不对头；我儿子也反对老是作巡回演出，或者象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反对这种马戏团式的表演生活。"

瑞恰接过我们带给他看的乐谱，把它们放在钢琴的乐谱架上，然后开始演奏。他弹琴的声音象打雷一样或者说是象用猎人的号角来表演百灵鸟的歌唱艺术。演奏结束后，他拍了拍芨芨的背，发表了如下的意见：在受到意大利人的训练之后，再深入学一点德国的东西是没有害处的。至于说到孩子的危机（他这时说话的腔调就象一个严肃的医生对漂亮的女人讲解她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病症一样），那只是一种瞎议论罢了……过去谁也没有问过瑞恰，他是不是碰到过危机。父亲死后，他一个人沿着公路走，总算找到了布拉格（确实是"找到"，因为那时他还不识字）。后来又流浪到叔父家。最后到了瓦莱斯泰因，住在一个脾气暴躁的婶婶家里。她讲法语时就象放连珠炮。她只会讲法语。他在这里也呆不下去，只好又跑到波恩，投奔另一位爱发怒

的叔叔。在这里，有两个人在啃着那又甜又酸的青春、狂热和不满的面包。一个是安东尼·瑞恰，另一个是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疯狂地演奏！他们激动地宣誓：他们要在一起肩并肩地征服整个世界！在此期间，他开始啃金贝格和马普尔格的音乐理论。他的叔叔不仅限制他的伙食标准，而且也限制他学习的时间。因为叔叔认为：在乐队吹喇叭任何时候都会有面包吃，而当作曲家就是在乞丐当中也得站在最后一排！

茇茇着迷般地聆听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教诲，真象是他课堂上的俘虏一样。教授推开了所有时髦的乐谱，但非常详尽地分析了两部杰出的作品：贝多芬的作品第一〇一号和一〇六号奏鸣曲。

当他讲解作品第一〇一号奏鸣曲的"慢板"乐章时，茇茇激动起来了。瑞恰不喜欢也不想用轻而易举的办法为贝多芬的音乐获得崇拜者，他只想培养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在优美而孤独的道路上追随贝多芬音乐的人。

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二六年之交

这一段时间是在学习中度过的。瑞恰主要研究反向进行（奇怪的是他不是用钢琴而是用自己的三十六首赋格曲进行分析）。有时他还带茇茇去歌剧院，看正在上演的歌剧《萨福》（我必须说明，演出并不很成功）。法国观众不大欣赏瑞恰这个"捷克的德国人"狗熊式的沉重步伐。我也在帮助孩子学习。我为茇茇制定了一个小课程表。我既是老师，又是学监，此外多多少少还是教科书的作者。我开始教茇茇学拉丁文、法语语法、历史和希腊神话，另外还教他学点算术（这门课遭到他强烈的反对）和一些

优秀的文学作品。尽管有这么多功课，但还是没有能够阻止住他越来越不满，越来越危险的成熟过程。茇茇有时把谱子摔到地上(请不要误会，这首先是发生在学习车尔尼先生演奏技巧的时候)，拒绝按照音阶序列练习（车尔尼先生把音阶序列安排得极其严格，头脑清醒的人是不会改变它的)，并且声称：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那些艺术大师绝对不会用这种枯燥的笨办法来折磨自己；他们肯定会发现，在听众面前耍这种把戏对艺术家是有害而无益的。在这样大哭大闹一阵后，他跑到钢琴前，开始演奏作品第一〇一号的那个乐章。“你看，这才叫音乐……我愿意演奏它……但是谁也不会要它！你可以相信我的话！”他这种造反行动如果只是发生在家里，那倒也算了。但是他有时在别人家里，甚至在最隆重的晚会上也是这样。他弹得很好。但我熟识他的每次呼吸和每个动作，我知道他只是“半心半意”地在弹琴。然后他转向听众(他与贵人们谈话时是那么大方自然，好象他是见过大世面的)问道：“还要我演奏什么？”听众的要求是各式各样的，最后终于集中到一个名字上：贝多芬。这里的人对维也纳的艺术大师不太熟悉，但他们知道要求听他的音乐是一种高尚而优美的事情。茇茇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先在钢琴上定了定音，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记忆，然后开始演奏。又是即兴表演。我肯定地知道，贝多芬没有这样的作品……但他却越弹越狂，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当最后的一个音符响过后，高贵的听众们都狂热地欢呼起来。在回家的路上，我狠狠地责备他：“你为什么把听众当成傻子？他们要你弹贝多芬，你却给人家来了个凌乱的即兴曲。”茇茇看了我一眼，这已经不是孩子顽皮幼稚的目光，而是一个成年人带着愠怒的目光。他说：

“因为我想要表明，他们什么音乐都不懂……他们分不清我这种大杂烩式的即兴曲和最伟大的巨匠的音乐。”

他站在街心，对着我的面说：

“我真不想再干了……！”

现在他每天早晨都到教堂去。我问他：

“花那么多精力上教堂有什么好处？”

“我在那里感到最愉快。”

“那么在家呢？难道不比在那里好？”

还没等他回答，那四堵墙已经回答了：这是四堵墙，不是一个家；它只是个歇脚的地方。要是安娜在这里，她肯定会有别的安排，可是我没有很多时间来照顾这个“安乐窝”。一张桌子是用来摆餐具的。一个柜子是盛衣服的。小橱柜里放的是衬衣和杂物。除了两张床外，就是一架钢琴。我也感到这样的家是冷冰冰的，可是我没法把它弄得更好一点。因为我既无时间，又无精力，当然也没有钱。我必须节约每一分钱，希望有朝一日我不在了，能够把它们留给我的孩子。

今天，孩子对我说，他要去学神学。我确信是巴尔汀神父使他着了迷。我立即到教堂去找神父。巴尔汀神父最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指控，说他从未向孩子谈过同意还是反对他学神学的问题。次日，我们三人一起进行谈判。芨芨仍然固执己见。巴尔汀神父温和而聪明地劝说道：

“上帝给你聪明才智，不是为了让你把它隐藏或埋葬在修道院里。全能的上帝之所以给你财富，是要你分给众人。”

回家途中，我们都沉默无言。芨芨不作声，我也不说话。午后我去找瑞恰，他答应帮助我。他对芨芨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第二天芨芨又开始正常练琴了，不久在贝利公爵夫人的晚会上作了惊人的演出（它是这次演出季节的最光辉的聚会）。是的，是惊人的演出。在他的演奏中，有一种我从未发现过的新的声音。以前，他的演奏总象是一个儿童在说话，无忧无虑，天

真无邪。现在则完全象一个男子汉了。他在音乐中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绪、思想乃至秘密。观众还在狂热地为一个儿童鼓掌。但我却知道他已经不是孩子了。一种莫大的忧愁缠着我的心：我再也控制不住他了；曾经在我手掌心玩耍的小鸟翅膀硬了，要飞走了，而且将会消失在无垠的天空中。

重返伦敦，又到了新阿吉尔剧院。节目的编排使茇茇大为不满。这种不满是有道理的。节目单中有竖琴幻想曲、声乐二重唱、英国圆号独奏，此外还有小提琴独奏、吉他联奏和笛子幻想曲……。在这一切之后，才是茇茇的钢琴曲目，其中有莫舍列斯和麦塞德尔写的钢琴、竖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四重奏以及《不列颠的统治》变奏曲独奏。

星期天上午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儿童合唱团在教堂圆顶上唱歌。茇茇握着我的手，悄悄地、没有任何责怪之意地对我说：

“你看，这才是高贵的音乐……它可以使人们变得纯洁。你答应我永远不在阿吉尔剧院演出吧，我受不了。你应该理解，我实在受不了啦。”

音乐从大圆顶上回折下来。我紧握着茇茇的手，说

“我们渡海到法国的布洛涅去吧！我们将不参加任何演出，只是消夏，在海岸上散步。”

一八二七年八月一日

今天我又去看医生了。医生要我立即离开伦敦，停止一切工作、写信和谈判，认真休息。

一八二七年八月五日

我们到达了法国的布洛涅。我一直躺着，毫无散步的兴趣。我想起了多波尔扬那位老医生的话：床上的温暖是最好的医生。

一八二七年八月六日

今天我同芨芨进行了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我要对他说明，我之所以反对他改学神学，绝不是因为担心他不能再举行音乐会从而不能再赚大量的钱财……我觉得自己在世期间已不再需要很多金钱、收入和财产了。我考虑的已不再是财产，而是他的工作和未来。我坚定地相信，在他摆脱童年时期的危机之后，他的面前将是一条笔直的大路。我相信，这将比成就的本身更有价值，它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一八二七年八月十日

今天我要芨芨去请医生。我感到浑身疼痛。芨芨在我身边坐了一整天。他握着我的手，问道："要我给妈妈写信吗？"我紧握着他那细嫩而有力量的手，答道："不用，我的芨芨……我相信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一八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今天我身体好多了。我让芨芨去散一会儿步。他回来后，给我弹了一会钢琴。奇怪的是，我的听觉似乎变迟钝了。我几

乎听不清他弹的是什么。我在床上尽力撑坐着，以便更好地看看他的脸。苃苃漂亮得象一尊象牙雕刻的塑像。昨天还是个孩子，今天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男子汉了……我把他叫到跟前，他顽皮地坐到床边，头靠着我身边的枕头，问道："你觉得好些吗？"我吻了吻他的脸。年轻人的凉爽肌肤使我觉得很舒服。我对他说：

"你要当心女人，孩子！不要叫她们驾驭你的生活！"

苃苃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说道："如果你认为这种事是可怕的，那你就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只为这件事操心吧！"说着，苃苃给我看了看他日常的读物：坎彼斯·道马什写的《跟随耶稣基督》。

一八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布洛涅的圣达姆扬公墓的招魂钟响了。李斯特·亚当在这里走完了他生命的旅程。

他刚刚过五十岁。在这五十年当中，他整整奋斗了四十个年头。

走在他棺材后面的只有三个人：天主教神父（他为死者作了最后的祈祷和祝福）、医生和费兰茨。从这一分钟起，青年李斯特不仅失去了他的爱称"苃苃"，而且也失去了这个爱称中所包含的一切幸福而完美的和谐，失去了父亲的保护，失去了总有人替他作出决定和行动的安全感。正是在这种可怕的、孤独的环境下，他实际上失去了祖国。因为亚当生前恰似一条联结的纽带，把费兰茨同多波尔扬、基什马尔顿、绍普隆、布拉迪斯洛伐联结了起来。而在没有"鬼魂显灵"的情况下，祖国是不太容易再呈现在他的眼前的。只有当他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他才会想起他第一次上的钢琴课、吉卜赛人和他过去烧过火的那只绿色壁炉。

现在，他们父子俩编织的精巧的记忆链条永远地断裂了。

李斯特·费兰茨虽然同另外两个人一起走在死者后面，但他仍然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笼罩着自己。

他一边在公墓陵园的土路上跟着丧车慢慢走动，一边试图回忆父亲的声音："茇茇……你记得吗？"他再也听不到父亲的提问，当然更说不上回答了。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费兰茨刚满十六岁。埃拉尔德表示愿意帮助他，但他却坚持一个人干。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要她马上到巴黎来；存放在埃斯代尔哈兹庄园的钱，不要去动它；请把这笔钱看作是他将来收入减少或完全没有收入时的担保金。

他退掉了同父亲一起住过的住宅，因为太贵了。他在孟梭伦区租了一套便宜得多的房子。

随后，他遍访了朋友、熟人以及他童年时曾在那里获得过辉煌成功的显贵们的府邸。他到处宣告，他暂时不再举行音乐会。他想教学生（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誓言，但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他想边教边学。

孚日广场的树上覆盖着十月的白雪，这在巴黎是少见的景象。街心的松雪虽然已被辗散，但广场对过的诺莱斯公爵的花园里却还保存着这种难得的十月银装。厚厚的白色锦被覆盖着圣三位一体的青铜塑像、阿弗洛迪特的石雕像和沉睡在冬日梦境中的排树上。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林墙和大理石坐凳上也是一层白雪。就是在这些坐凳上，打扮成牧羊人的老爷和太太们曾演出过委婉甜蜜而后来发展成为血腥残忍的牧民故事。

费兰茨在公爵府门口已经拉了三次青铜拉铃，但门却没有

打开，只有一个声音从门上的了望孔飞出来。

“先生，您找谁？”

“我找诺莱斯公爵。”

“他在上月十日去世了。”

了望孔无声地关上。费兰茨往回走去，在那无边无际的大花园里走着。透过栅栏，他看见了一张张诱人就坐的凳子，凳上的白雪已经逐渐变黑，中午的阳光正在消融初冬留下的美景。



第三章　卡　罗　琳

一八二七年冬，巴黎的面孔显得格外冰冷无情。

雪不停地下着。尽管在冬天的灰色天空中，有时中午会露出一点太阳，但也只能象一朵奇妙的红色玫瑰花一样挂在那里，地面上依然到处是冰冻。在蒙特马特里山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光滑如镜的雪橇跑道。王宫花园的铁栅栏上盖上了一层坚如铁石的冰被。石雕像脚下的水开始凝结，看来很快也要变成厚冰……

街道也显得冷冰冰的……

在街上巡逻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报纸不敢写，议员们在国会会议上也避而不谈，但在社会上，人人都在传说：生活贫困，物价暴涨，严冬将促使巴黎郊区的群众起来革命。

有个地方发生了殴斗。死了一个人，伤了几个人。可是坏消息就象雪球一样，滚得越来越快，体积也越来越大，不一会就传说伤了几百人，死了几十人……

冷酷的冬天……

乌鸦从田野迁居到城里来了。它们在教堂的石雕柱上不停地哀鸣悲叫。

到处是巡逻的士兵。雪不断地下着。看样子靠人力已无法清除这堆积如山的大雪，所以干脆就不去扫它了。在郊区，雪象棉花被一样覆盖着大地；在市中心，雪被行人和来往车辆辗成了黑泥浆。

费兰茨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大地竟然会有这样一副冰冷无情的面孔。现在他已经不是神童了。父亲突然不幸去世，生活环境逼迫他去认识金钱、账单、路费和行李；母亲要在巴黎勉强生活下去。所有这一切几乎在一、二天内就把他锤炼成为一个男子汉。奇怪的是，他最近几个月长得特别快。旧大衣已经显得太窄小，上衣袖子也突然象变魔术似的短了一大截。他已经不再是李斯特少爷，而是李斯特先生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有时站立不稳，感到惊慌害怕，但有时却又以羞涩的幸福心情欢呼自己的自由。他在冰冷无情的巴黎街道上走来走去，下定决心要在巴黎站住脚，即使从前的朋友和熟人都不再支持他，他也要这样做。

在他的生活中有两个坚固的支撑点，一个是母亲，另一个就是埃拉尔德家。安娜回到巴黎后，性情大变。她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肥皂匠的胆小的妹妹了。那时候她对自己生活在世界城市巴黎总是感到惴惴不安。现在她知道孩子需要她。她以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克服着自己胆小怕事和笨手笨脚的缺点，甚至暗地里学习法语生词和文法。亚当已经永远离开人间，因此她必须很快学会同副食商店、肉铺、洗衣房、裁缝铺、旅馆的老板们打交道和讨价还价的战略战术，学会最困难的当母亲的艺术：当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费兰茨身边；当她感到似乎变成了儿子累赘的时候，就马上离开他。

她从维也纳刚到巴黎几个星期，就已经使家里变了样。窗户挂上了帘子，地板上铺上了廉价的地毯，桌上盖着桌布，在亚当"统治"时期弄得象兵营行军架似的大床上铺着几块绸单，虽然它们都是一些最便宜的低档货，但毕竟给这间房子带来了有生气的色彩和亲切的微笑。

安娜学会了说话，而且还学会了比说话要困难得多的东西：

听别人说话。因为青年费兰茨现在首先需要的是热心的听众，以便他有一个倾吐自己心事的地方。费兰茨对母亲说：他发现生活的最深刻的内容和意义就在于有一种秘密的和用男子汉气概容忍着的惆怅之感，它能使又丑又脏的日常生活变得绚丽多采；他还发现，一个真正的男人和艺术家的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排除一切日常琐事中的孤芳自赏。总之，母亲除烧饭做菜，打扫卫生，布置房间外，还要听费兰茨讲话；在他一再要求时为他出点主意；在她感到沉默可能对孩子最有用时则默不作声。

费兰茨正在迅速成长，他在教别人的时候，总想教得同别人教他的不一样；他在演奏的时候，总想演奏得同自己过去演奏的不一样。他以极大的努力想把自己培养成另外一种人，一种同自己过去不一样的人。从前他只知道几部音乐作品，了解几个音乐家，现在他想要了解自己周围的人和整个人类。这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来说确是艰巨的任务。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他的情绪忽高忽低，有时发出幸福的欢呼，有时又哀叹自己的不幸，有时胜利地发现了崭新的曲径，有时却又吃惊地遇到了痛苦的折磨。

他需要母亲。因为母亲是永存的、不变的。母亲是奇妙的水银柱，她永远保持着对他的均衡温度的慈爱。他需要母亲！母亲虽然不了解夏多勃里昂和青年雨果的斗争和痛苦，也不知道谁是仲马，她对这些事懂得很少或者根本不懂，但她坚强有力，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力量。她是一棵挺拔苍劲的大树，不断地结出鲜美的果实：慈爱。

另外一个坚强的支柱是埃拉尔德家。

埃拉尔德"老板"刚过七十五岁生日。他还是那样不知劳累地工作，每次吃午饭和晚饭，都要喝半公升酒。他整天想自己的发明，为埃拉尔德家族操心，好象还只是刚刚创建埃拉尔德商号，

其实他的商号已经成立五十多年了。他还同过去一样喜欢小李斯特，把他看作是当代的天才。他对小李斯特不再演出而去教书感到非常失望……这个老头想方设法说服小李斯特：只有那些在艺术生活中没有成就，从来没有被灵感吻过额头，年轻时受过很多折磨到年老时想连本带利得到补偿的人，才会去当教员。显然，老头自己也并不真相信这些话。他只是由于生气才随口编出这些歪道理。他也不得不看到，小李斯特对自己的选择是坚定不移的。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为小李斯特去物色一些学生。

学生中使费兰茨最得意的是来自日内瓦的彼得·沃尔夫，他比老师只小几个月。费兰茨每天都在教他。不过这种教学应该说是互相的。老师教学生音乐，学生则教老师许多奇闻轶事，使年轻的老师得到启示。沃尔夫介绍了莎士比亚及其对头高乃依① 和拉辛②，有时表现出想象力的奔放，有时则又流露出古典式的克制。他还向老师介绍了热情歌颂生活、大胆直言的诗人卜伽丘③ 和拉伯雷④。这两个少年象一对情侣似的每天等待着会面的时刻：探索秘密的冒险把彼得带进了贝多芬奏鸣曲、莫扎特交响乐和格鲁克歌曲的仙境，而费兰茨则见到了帕斯卡、笛卡儿、孟德斯鸠和卢梭。

---

①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法国剧作家。写有剧本三十余部。内容大多宣扬爱国思想，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艺术上遵守古典主义创作方法，语言崇尚典雅。

② 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 1639－1699)，法国剧作家。作品多借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传说，暴露宫廷贵族的荒淫和残暴。他是法国古典主义代表作家之一。

③ 卜伽丘(Giovanni Boccáccio, 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反对封建专制，拥护共和政体。代表作有《十日谈》等。他的作品对后来欧洲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④ 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约1494－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医生。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等作品，反映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

彼得同音乐学院教授齐迈曼有亲戚关系。后者总是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晚上设宴招待巴黎精神社会的代表人物。彼得早就是齐迈曼沙龙的成员，而且还带费兰茨去过几次。

有一次，齐迈曼的眼光正好落在躲在沙龙角落里的两个年轻人身上。

“我们的青年客人是不是也能为我们的精神宴会增添点光彩？……”

尽管费兰茨曾经起过誓，在自己还没有真正掌握音乐的力量、重点、节奏和声响之前，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掌握整个音乐艺术的奥妙之前，决不再弹钢琴，尽管他完全自愿地把自己排除于艺术的天堂之外，但现在他不能不答应主人盛情的要求，又一次坐下来弹琴。他弹的是格鲁克的歌曲。

这次演奏的成功不仅反映在齐迈曼教授热烈拥抱和亲吻上，而且表现在第三天他就得到了文学艺术家茶会的邀请。

什么叫文学艺术家茶会，他只是在亲身去过之后才真正弄清楚的。刚进门时，他就感到很特别，又气派又可笑，真象是一幅蛙鼠相斗的漫画。在举行茶会的阿森纳尔图书馆大门口，站着四个头戴皮帽、手持步枪的彪形大汉。特别是他们留在墙上的影子，简直是四个巨人。在大门里面也站着士兵。院子里陈列着可能是在奥斯特里茨平原或滑铁卢战役使用过的旧炮。

每走一步就有人高声喝问：

“口令？”

“茶会！”

“你可以进去了！”

在这些奇特的游戏之后，客人才能进入阿森纳尔图书馆。它实际上象一座吉卜赛人的村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象当代小说艺术家们所想象的吉卜赛窝。在一张特大桌子上放着一个

巨大的铜盆，里面正燃烧着熊熊烈火。窗户上挂的都是黑色丝绒帘子，为的是防止外人窥探茶会的秘密，以免外界的凡夫俗子钻进吉卜赛村庄。没有油灯，只有几支蜡烛在墙上投下模模糊糊的阴影。摇晃不定的烛光时而照射在金皮书籍上，时而照射在蓄着长胡子的男人们的脸上，有时则照射在门上和窗户上挂着的古老兵器上。每个人都在讲话，在解释着什么事，使进去的人不由自主地会怀疑他们谁也没有在听别人说什么，他们是一群只贪恋着自己的人。突然有一个人鼓起掌来，宣布来了新客人：维克多·雨果……

有些人总是象圣人头上有光轮一样随身带着自己的荣誉。青年雨果当时还只有二十五岁，但他的到来一下子就改变了茶会的气氛。几个热心的卫兵拿走了蜡烛台，另一些卫兵立即点起大厅的吊灯和壁灯。雨果在讲演台上朗读他的手稿。厅内变得一片肃静，整个大厅象白天一样明亮。这位青年诗人一下子就造成了只有剧院工作人员才体会得到的紧张气氛。他还没有开口说一句话，还没有开始论证、批判，还没有引用任何令人轰动的俏皮话，可是那些刚才还很随随便便的人就已经成了专心一致的听众。雨果讲话的声音很轻，他有意使自己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声音都具有音乐感。在有些地方，他很大方自然地停顿下来，以便突出他要讲的句号、逗号和新的段落。因为是在朗读手稿，所以他很少抬起头来，但是那深邃闪亮而带有女性的眼睛、线条优美的嘴巴、温柔安详的下腭和开阔饱满的额头，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每一双眼睛。雨果是个美男子。瘦弱、苗条、高贵，虽然他从来不谈“高贵的”事情。相反，他总是讲人民，讲群众，讲那些有成百万只手臂和一颗巨心的无名英雄。

大家对他全神贯注。他低声地、不时有些间断地朗读：“没

有共同一致，就不会有浸透在一切古代作品中的普遍的美。荣华富贵和节日盛装，如果无休止地重复，最后也会使人感到厌烦和疲倦。荣华富贵不能靠荣华富贵来发展。这样它会变得无聊，因为美也可以是无聊的。为了避免平庸，我们必须去创造奇异。奇异使人得到休息，是人们通过紧张的努力达到美的出发点。美只有一种，而丑却有成千上万种……"

费兰茨先是注意听讲，后来开始注意观察听众的反应。他感到，这已经不是一般听众在倾听，而是宗教信徒的聚会。人们沉默无言，但不停活动着的嘴巴紧紧盯着雨果，聚精会神地听他说出的每一个字，不管他讲得多么轻。这是节日里的教堂的肃静，它更显出了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的声音。

"……美和奇异。前者代表人的灵魂，后者代表人的兽性。如果你把它们分开，一个是纯粹的抽象、无聊、学究气和纸张味，另一个是纯粹的泥土、肮脏和野兽的卑鄙无耻。如果你把它们连在一起，一个是灵魂，另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英雄，另一个是庸人；一个是巨人，另一个是胆小鬼！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你真正的英雄……无所畏惧的恺撒大帝……杀掉暴君的克伦威尔……"

"我们应当大胆地宣布：时间已经到了！如果说本世纪的精神已经冲进了一切地方，但就是没有冲进最不受束缚的思想世界，那是不可思议的。你应该拿起你的笔杆，粉碎各种理论和规则，敲掉覆盖在真正艺术上的石膏假面具。艺术中没有规则，没有模式，只有大自然的永恒规律……"

这些话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人来说是多么丰富的精神食粮啊！这是神的食品，它能使人的心变得伟大，使人的身子飞起来，使人如痴似醉，使人的思想锋利敏锐。当然，只是简单地知道这些启示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们写在纸上，写在钢琴谱上，以便检验音乐是不是能够创造奇迹；一定要用戏剧的聚光镜联结

美和丑，高洁和卑污，使星星之火变成烈焰，使烈焰变成灵魂的燃烧。

彼得是一个出色的辩论对手。他十分懂得，讨论问题时应该多提反面的意见，只有经过激烈争论后所赢得的胜利才是真正可贵的胜利。不过真正的辩论对手还是钢琴本身。费兰茨成百上千次地进行试验，看钢琴除了节奏美、和声美以及古典音乐的天堂似的和谐美之外，能不能够把丑恶化成音乐。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得到安慰，只会使人感到吃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钢琴上进行试验。试验把他引向作品第一〇一至一〇六号乐曲的作者贝多芬。这时，老艺术大师已经不再对大理石坯作过多的精雕细琢，而是按照大自然或上帝自己造就的原型把大理石坯摆在人的面前。

这是一种新的钢琴弹法，或者说是一种新式钢琴艺术的试验，它不久将表现在"李斯特老师"的作品中。

他的另一个最宠爱的学生是瓦莱丽·波希埃。她与自己的老师几乎同年，所以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她的父亲阿库斯·波希埃总是自始至终陪着她听课。开始的时候，老波希埃这样做还只是为了检查一下教学质量，后来他逐渐忘记了这件自己本来不该管的事。他不仅是课堂教学的热心见证人，而且成了积极的参加者，最后又进而发展成为忠实的记录员。在一月份的一个上午，确切地说是一八二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沙龙的门帘打开，从门帘缝里出来了一个现代阿波罗①。他身穿浅蓝色的礼服，里面是鹿皮坎肩；细长而有劲的大腿上紧紧绷着鸽灰色的裤子；手上拿着一顶做工精致的灰色高统礼帽。所有这些再配上一副理想中的美男子的脸孔，笔直的鼻子，无法抗拒的眼

① 阿波罗(Apollon)，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神宙斯的儿子，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诗歌，并代表宙斯宣告神旨。

神，笔墨无法形容的高贵嘴型，使姑娘的心不能不颤抖的成年男子似的低沉声音。这个年轻人是那么朴素、谦虚，就如同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他一开始谈话就表示他崇敬克莱门蒂、赫尔茨、贝尔蒂尼、莫舍列斯和卡尔布莱纳的艺术，愿意听从小姐的吩咐，充当她走进大师们精神王国的领路人。然后他坐下来演奏克莱门蒂、卡尔布莱纳、莫舍列斯和贝尔蒂尼的作品。琴声仿佛雷电闪鸣，一会儿犹如大海咆哮，波涛汹涌，一会儿风平浪静，使得能干的父亲和着了迷的女儿几乎昏倒在钢琴旁。他父女俩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耳听到，这位青年魔师从一个普通的音乐瓶子里放出了多么惊人的法宝啊！李斯特先生的解释说明更是动人。他可以对你讲一遍、二遍，必要时也可以讲十遍，然后把钢琴盖上，有礼貌地把小姐从琴椅上扶下来，轻轻地挽着她的胳膊，把她带到沙龙的小桌旁坐下：

“亲爱的小姐，现在您不要去想什么指法、音响！您要设法抓住这段音乐小诗中的核心！”

瓦莱丽小姐温柔的小脸在钢琴课刚一开始时就是红润的，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褪去。她轻声答道：

“可我就是抓不住它的核心！”

老师没有再作解释，而是背诵了一首诗：

“你好，深秋时的树丛！
你好，草地上的黄叶！
最后的时光是那样美丽，
它的消失使我无限悲痛！”

波希埃先生问这是哪位诗人的作品。他亲切地回答说：

“拉马丁。”

在这以后，当瓦莱丽小姐再弹贝尔蒂尼小诗曲时，感情确是丰富得多了。她还模仿老师的样子，用头默默地打着拍子，用肩膀的晃动来表达更深沉的思想，使音乐从平凡的现实飞向想象的花园。她取得这样快的进步，究竟是受拉马丁诗的影响，还是因为老师的手在散步时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胳膊，现在无法去分析，但进步确是实实在在的。

费兰茨有很多学生，因为老埃拉尔德在不停地为他奔忙。费兰茨搞音乐已经十二年，但母亲安娜对这种吉卜赛人的手艺至今仍抱着怀疑态度，她总是为他忧心忡忡，胆战心惊。他常去孟德斯鸠伯爵家教小姐们学钢琴。这里的酬金比一般学费要多五倍。他还教英国驻法国大使格兰威尔勋爵的女儿。有一个名叫路易·梅赛梅克的极为用功的比利时青年常去他家练琴。他在圣旦尼斯教会学校还为十五位小姐每星期上三次课。也就是说，他每星期都在拨动十五位小姐的心弦。他还去哈布斯堡帝国驻巴黎公使阿波尼伯爵官邸教音乐。在这里，他又可以经常听到人们说“我们匈牙利人……”，尽管他听到的是法语。

他是匈牙利人，这一点在谈话中越来越经常被提到，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家茶会上。巴黎的艺术家们在茶会上第一次使用了浪漫主义这个词。反对这个词的人对它极端仇视，支持这个词的人却认为它是胜利的启示。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为了给自己的创造寻找新的色彩和舞台，跑到希腊、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印度去追求罗曼蒂克，后来又在李斯特·费兰茨的额头上发现了有趣而神秘的印记：匈牙利……不大懂地理的法国人并不知道这个小民族究竟是在幸福的阿拉伯这边还是那边。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浪漫主义的青年人并不重视地图上的经纬度，他们品尝的只是这个怪字“匈牙利”的味道……

埃拉尔德老头准备在自己家里举行音乐晚会。费兰茨给雨果写了一封信。天知道他已经扔掉过多少草稿，因为他自觉乳毛未干，非常自卑，而雨果却是那么机敏多智，信心十足。最后一稿是这样的：

尊敬的雨果先生：

星期日上午如果您有时间，万望光临埃拉尔德家。您的来访将使我感到光荣、幸福和骄傲。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李斯特·费兰茨

这个邀请是向雨果发出的，但实际上请来了文学艺术家茶会的整个指挥部。保尔·罗米安、诺地埃和另外几个年轻人都来了。这些青年人在当时不仅能决定文学、戏剧是否时髦，而且在决定领带、背心、礼帽、奇光异色的礼服式样方面也具有极大权威。茶会的一些其他知名先生和太太也都来了。

埃拉尔德沙龙的所有吊灯都已点亮。十一时左右，也就是在晚会正式开始前几分钟，阿波尼伯爵同英国大使手挽着手走进大厅。过了一会，孟德斯鸠全家光临。老埃拉尔德高兴得直搓手，可是费兰茨却想躲起来，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出场，就会被迫演奏钢琴。

音乐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是竖琴独奏。演奏者与其说是在表现自己的艺术，还不如说是在为埃拉尔德牌竖琴做广告。接着是琴蒂独唱，最后才是李斯特的钢琴表演。开始时他弹了几首自己拿手的曲子，然后一跃而跳入贝多芬的黑底洞……他是在为那些来这里瞎聊天，只懂得意大利歌曲和巴黎轻歌剧的女士们演奏贝多芬。可以肯定，使她们安静下来的并不是音乐本身，

而是表演者脸上流露出来的无限激情。这是一种征服人的力量，它不仅能保持住音乐作品的巨大建筑结构，而且能控制住人们的全部注意力。不会听音乐的人也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在进行激烈的搏斗，为的是使音乐变成山崩地裂，大海咆哮，雷电交加，使人们真正觉得听到了自己脑中所想象的音乐。

这次音乐会所引起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很多人认为，原来的神童已经不见了，现在的费兰茨只是一个粗野地弹奏钢琴、不注意艺术的优美和含蓄、不大安分守己的青年人。一些说话比较谨慎的人把演奏的不成功归咎于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说贝多芬的作品对法国人来说是过分日耳曼化了。当然也有些人对费兰茨唱起了颂扬的赞歌，而且正好是赞扬他敢于演奏贝多芬的气魄和胆量，因为巴黎的听众只习惯于听一些贫血的摇篮曲、乱喊乱叫的打闹剧和老掉牙的西西里小调。不过费兰茨首先想知道的是文学艺术家茶会或其领袖雨果的意见。“领袖”的意见是相当令人沮丧的：

“音乐是一种衰老的艺术，象一只没有牙齿的狮子，尽管还有惊天动地的声音，但是已经不会咬人。只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人们才需要音乐和音乐之王。因为音乐是一种抽象的语言，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密码文字。可是今天的艺术家已经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如果有人现在还在寻找密码和模模糊糊的象征，那他不会是我们的人。”

雨果的意见并没有使费兰茨灰心。他只是想：雨果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应该使音乐能够说话，使音乐能够更公开地、更大胆地说话。

这时他还只有十七岁。人在这种年龄，是没有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只要敢于向前冲，就可以爬上最高的山峰甚至其他

星球。

他还只有十七岁。因此他敢于挺起胸膛说：这种能说话的、勇敢的音乐将由我们来创造。他说的时候用的是多数第一人称，实际上心里想的是“我将创造这种音乐”！

英国国王陛下派驻法国的大使格兰威尔阁下对这位年轻人极为推崇。大使阁下在圣·克里克家做客时向来客们（主要是女客）赞扬了费兰茨的天才。圣·克里克伯爵是当时的工业和商业部长，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晚上举行一次招待会。他不向任何人发邀请信，但是凡是属于他那个“社会”的人都可以自愿参加。至于究竟哪些人属于这个最上层“社会”，没有任何成文的规定或法律。不过还是有一种自然形成的特殊名单，它包括贵族、银行家、艺术家、军官、企业家、新老豪门贵族和漂亮的女人。这些人经常出席杜拉斯女公爵、多洛蒂·沃·李温、劳森女公爵、贝万大人、费尔斯顿斯坦和维坦伯格家族的音乐晚会或招待会。尽管在这些地方度过的是文明的无聊之夜，但第二天他们可以向十个人甚至一百个人炫耀自己：“我昨天也在那里”，从而使别人因为羡慕而感到心痛。

圣·克里克伯爵夫人也注意到英国大使的谈话。据说，伯爵夫人患严重的心脏病已经十年，平时总是躺在床上，只是每月主持招待晚会时才在医生的帮助下出来一次。男女管家在晚会刚开始的时候总是为伯爵夫人搬来一把大靠背椅。整个晚会期间，她一直坐在那里。她象用铁丝支撑着的鲜花，只开一个晚上，第二天一见阳光就会凋谢。

圣·克里克夫人说：

“我正想为我的女儿找一个钢琴教师……”

格兰威尔大使极力为费兰茨说好话：

"在巴黎，现在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出色的钢琴教师了。"

几天后，费兰茨接到邀请：圣·克里克伯爵夫人想立即同他见见面。

在大门口首先挡住费兰茨的是戴皮帽的门房。在前庭门口接待他的是一个男管家。管家帮他脱下外衣，接过他的手套、手杖和硬沿礼帽，把他带进一间小客厅。伯爵夫人已经在那里等着。男女管家早就小心翼翼地把夫人安放在沙发上。他们扶她坐下时，就象把一枝快要凋谢的花插进花瓶时那样，生怕碰坏了。

谈话按照惯常的程序进行着。

"久仰大名，艺术家先生。"

"这使我感到荣幸，尊贵的夫人。"

"您也教书吗？"

"是的，尊贵的夫人。"

尊贵夫人的苍白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接着摇了摇小铃铛。她吩咐急忙进来的女管家说：

"把卡罗琳小姐请来。"

门慢慢地打开。为了照顾病人，这里的人显然已经习惯于这样轻轻地开门。一个年轻的姑娘出现在门前。费兰茨对这位年轻姑娘居然只有如此普通的名字感到可笑。他认为，她的名字应该是拉洛莱……。费兰茨最近几个月或者说最近几年来，已经为自己勾画了一个女子的轮廓。他画得极细，极准确，也极热心，有时把她画得象一个真人一样。费兰茨看见过她的头发颜色、带酒涡的小脸、好奇的大眼睛和身体的温柔线条，这既不是小女孩，但也还不是成年妇女。他把这个幻想中的公爵小姐叫做拉洛莱。他觉得梦中见过的拉洛莱现在正站在自己的面前。当然，他的眼睛这时候很愿意而且很快地在为她的画像进行涂

改。圣·克里克小姐的头发比想象中的稍稍黑一点，体型也略微丰满一些，目光显得更为明亮。涂改工作刚刚结束，年轻人就已经爱上了她，并且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她……！"

卡罗琳学习勤奋。费兰茨每堂课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不仅作为艺术家，就是作为教师，也是如此。他不断想出一些新点子来增添讲课的光彩。按照当时社会上的规矩，伯爵夫人每堂课都得在场，她不仅观察他们如何上课，也注意金黄头发和褐色头发如何靠近在一起，通过令人动心的音乐语言交流思想。她发现两人每次会见都是那么紧张激动，似乎已经在体验爱情的冒险和幸福。伯爵夫人由于身体不好几乎与世隔绝，平时总是躲在小说和诗歌的幻想王国中，因此特别喜欢一些浪漫主义的想法：如果这两个年轻人真诚相爱，并且能够克服社会地位不同所造成的困难，他们就会找到真正的幸福……。伯爵夫人确是个富于幻想的女人，但这不只是长期困居病房的结果。她的丈夫是卡洛伊十世的部长，属于新型贵族(不要误会，他的伯爵称号是五百年前传下来的)。他做生意，出入银行和交易所，无情地排挤竞争对手，持家极严。他决不允许自己的家庭和后代不顾贵族的身份随便参加社交活动。他每个月举行一次晚会，每星期同家里人共进一顿午餐。几年前，有时还去探望一下夫人，希望能有一个男后代，后来看到夫人如此病重才放弃了这个打算。

伯爵夫人单独一人生活。不管身体多么不舒服，每堂课她都坚持在场。她不是在注意自己的女儿，而是独自一人在幻想。有一天，夫人没有来听课。卡罗琳写了一张小条子给老师，说她母亲病重，她无法离开。部长先生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到夫人的病床旁。伯爵夫人呼吸已经很困难，但她还是拚了全身最后一点劲，指示卡罗琳继续学下去，因为孩子的生活不能停顿。然

后她用手势叫女儿暂时出去一下，要丈夫靠近一点。她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话。可是再怎么注意听也分辨不出她讲的意思。部长先生也没有时间去仔细分析她可能想讲些什么，因为他的会还没有开完。这次会议可不是一般的部务会议，而是国王亲自召开讨论如何治理一个日益沉沦和控制得死死的国家的御前会议。部长先生好象是在火堆上跳舞，在病床旁显得极不耐烦。他只隐隐约约地觉得夫人是在讲一件同卡罗琳和青年教师有关的什么事，提到什么"幸福"，还说什么"我不曾享有过它，希望……"，但所有这些话都未能引起伯爵的注意。他两只手抓着夫人冰冷的手指，轻轻地吻了吻她瘦削的汗手，草草地安慰说："亲爱的，一切都会象您所想的那样……"说完后，他马上离开了病房。马车已经在大门前等候。几分钟后，他走进了会议室。会议开得正是最热烈、最紧张的时候：国王宣布，他想从人民手中收回一切权利；既然安抚不起作用，用鞭子抽打也许能行……

在这种严重的宣布之后，一部分与会者大吵大闹，好象是破产剧团会议上的一群情绪激昂的演员，另一部分人则称颂国王陛下又恢复了从前当伯爵时的雄才胆略。国王一挥手把吵闹的部长们赶出了会议厅，把那些支持他的部长召集到另一个小会议室：

"先生们，我们谈政治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稍微玩一会，怎么样？"

侍仆已经打开小会议室的门，把崭新光滑的扑克牌放在铺着绿色绒毯的会议桌上。

圣·克里克伯爵夫人当天晚上与世永别。伯爵府升起了黑旗。灵堂就设在府中。王子代表国王亲自向死者吊唁并慰问家属。政府全体成员、伯爵主管部的全体官员以及最上层社会的

代表们（这次人稍为多一些，因为吊丧时对上层代表的资格不象平时要求得那样严格）都来了。凡是同伯爵家族多少沾点亲或有点关系的人也可以来参加吊唁仪式，例如平时经常给伯爵夫人供应日用品的商人、做衣帽的裁缝和帽匠等。还有那些过去曾经侍候过夫人的仆人，他们虽然已经被赶出伯爵府，但由于某种封建主义的联系仍然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伯爵低着头，对向他致哀的客人只是机械地伸出手，轻轻地同对方握一下，微微点点头，显得极度痛苦，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伸伸手，点点头，并注意握手的时间同吊唁者的爵位和身份相适应。卡罗琳站在他的身旁，满脸珠泪。眼泪使她看不见棺材，看不见从她面前慢慢走过的吊唁队伍，也看不见父亲和费兰茨。

青年人第二天就到伯爵家里来上班，但门房不让他进门。他问道，伯爵对他是否已经作出什么新的决定？回答说不知道，伯爵只是吩咐不让任何人进门。费兰茨平时就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现在自然想得更多了。他回忆起同卡罗琳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刻：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例如两手相碰，目光相遇，心照不宣的相许，以及伯爵夫人暗示同意两个孩子得到幸福的微笑，现在都特别值得怀念。

他每天都到伯爵家里去，但总是遭到头戴皮帽、态度凶恶的门房的回绝。后来好不容易才收到卡罗琳的一张小条子：“下午六时等您来。”门房虽然嘟嘟囔囔，不大愿意让他进去，但在小姐的命令下终究还是开了大门。走到里面后，就再也没有人阻拦他。圣·克里克家象一条破船，船长、驾驶员、水手都已经离开它，它只好随波漂荡，任凭偶然的海浪把它推向远方。一直侍候伯爵夫人的女总管不告而别。谁也没有去追究她离去的原因。这件事当然影响到整个伯爵府的内部纪律。各个大厅再也没有人打扫，小姐好几次不得不亲自去端早餐。她白白摇铃，没有人

来管她。部长先生自己很少呆在家里，因为政务太忙。整个民族和国王之间正在进行斗争（这是最激进的报纸说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国王之间在进行斗争），而且十分激烈。人人都知道，只要再讲一句不合适的话，或者偶然放上一枪，全国立即会爆发内战。交易所的老板、银行家、工厂主、新富翁和国王手下的少数旧贵族正在斗法。国王本人根本不想让步。相反，他还想召回“流亡”在英国的代表最保守势力的牌友和猎友波利格纳克。他命令取消报刊的言论自由。他在国会中进行的“改革”是用刺刀驱散议员。他的财政政策是：你缴税，别管我怎么花！在王宫的秘密会议上，部长们正在争吵、骂人、指责和反指责，圣·克里克伯爵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这种所谓的会议上。费兰茨急急忙忙走上用华丽的大理石砌成的楼梯，迅速飞向他熟悉的音乐厅，一路上没有遇见任何人。他在音乐厅门外怔住了，因为听到了等待已久的琴声。琴声低沉、平静，轻飘飘的，就象这座奇怪的伯爵府或者说听天由命的破船一样。

他们在音乐厅里面对面地看着。卡罗琳伸出手，一句话也没有说。费兰茨沉默不语，但过了一会好象突然听到了比一切教养、礼貌、愿望甚至意志更加有力的命令似的，张开了双臂。卡罗琳顺从地靠在他的肩上：

“我一直在等着你……”

“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写信？”

“这样不大合适……”

“可是生活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

他这一次才真正仔细地观察了卡罗琳。过去的几个星期从姑娘的脸上撕下了一层看不见的面纱。她已经从小姑娘变成了成年女子。在褐色的大眼睛中，有一种新的光芒。这不再是幻想，而是真正的爱情。小嘴角上不久前还是孩子式的酒涡，现在

已经不大明显了，代替它的是一种坚强的性格：我要！这是天真无邪和迅速成熟，孩子的胆怯和恋女的勇敢的奇怪结合。她说："你以后每天都可以来。"

他们天天都在一起。他们参观了每一个房间，没有遇见过任何一个人。卡罗琳带他看了陈列祖先肖像的大厅和图书室。图书室里存放着她母亲最爱读的书籍，但现在上面都落满了灰尘。他们还看了卡罗琳小时候住过的房间，里面放着许多娃娃。他们一起弹琴，但主要是费兰茨弹。他全凭记忆弹琴，有时还即兴作曲。

费兰茨心里有点害怕，认为也许在一起呆一、两个小时就行了。但是卡罗琳不同意。她脸上的小酒涡逐渐消失，越来越表现出圣·克里克家的坚定意志。她永远不满足两人在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你就老呆在这里吧，不管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他们交换了戒指，上面刻着三个字：等着你。

费兰茨把什么都忘了，脑子里只有卡罗琳。他的母亲以仁慈的微笑原谅了他的糊涂，但其他学生的家长们可不乐意了。费兰茨上课老是迟到或者干脆不来，即使来了，也象另一个世界的人似的，根本不注意人间生活的正常气氛，总是想马上回到神住的仙境中去。

恋人是没有时间感的。有时一分钟象几个小时，有时几天又象是一瞬间，所以费兰茨常常到了半夜才想到该回家。

头戴皮帽的门房没有说什么，但是大胡子下的嘴唇老是在动。这并不是在对他们的道德行为表示抗议，而是在显示伯爵府仆人对他们的不满，因为他一直期待他们会赏给大量的小费。可是费兰茨现在看不见现实世界，因为眼中只有卡罗琳的脸孔；他也听不见仆人的牢骚，因为耳中只有卡罗琳的声音。在这种时

候，谁会去告诉他，谁会去向这个来自天堂的小伙子说：你应该花一点钱，特别是要为一个仆人保持沉默花一点钱。谁也没有对他讲过这些事。他对门房只是提一提帽子，点头微笑一下，就算表示了谢意。等到他第十次这样做的时候，戴皮帽的人决定不再发牢骚，而是想别的办法来进行报复。

有一天，早晨五点钟，伯爵大人回家来，叫醒了门房。伯爵瘦多了，又疲劳，又急躁，连向门房点个头的心思都没有。可是门房请伯爵停下：

“老爷，我有一件重要事情禀报……”

“明天再说吧！”伯爵简单地答了一句，就急急走上大理石楼道。一边走一边还指责管家说，到处都是灰尘，为什么不打扫一下。他把外衣、帽子和皮鞋扔给管家后，衣服没脱就睡下了。圣·克里克实际上并不是政治家，而是实业家。他知道，象他这样聪明能干的人当部长对好友们是非常有用处的，他们也总是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总之，部长先生不是政治家，但也不是傻子。他已经感觉到巴黎的地下正在晃动，很快要地震，但任何政治家也没法预言，这次地震将只破坏一些屋顶的瓦片，还是会震塌整栋整栋的建筑物。部长先生正在床上考虑如何用最好的办法挽救他越来越多的财产。想了一阵，心里略感宽慰，慢慢也就睡着了。

他的计划确是令人宽慰：把现金全转存到荷兰、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其他财产可以分散隐蔽到法国各地。谁手中有这么多牌，谁就肯定能赢。现在只剩下安排卡罗琳的问题了。当然，通过对女儿的安排，应该进一步增加圣·克里克家族的财富和权力。下面想的已经是梦境中的事了：他看见了三年前向女儿求婚的道蒂高克斯伯爵，显然后者爱的不是他那还在玩娃娃的小女儿，而是爱的部长岳父的社会关系和地位。他在梦中同意把

女儿嫁给道蒂高克斯伯爵，但并没有发觉他们之间是否有着罗密欧和朱丽叶式的爱情关系。道蒂高克斯伯爵是个粗颈厚胸、满脸通红的人，身上还不时散发出酒味。他并不肥胖，但身体沉重，象座石雕，一坐下来，椅子就发出响声；肘臂一撑，桌子就摇晃。当然罗，部长欣赏的并不是他的仪表。他的动人之处在于他法国祖先的性格。道蒂高克斯是大地主和模范农场的主人，是全国闻名的品酒专家。他的马每次参加比赛都能获得一、二项奖。不管工厂如何扩大，不管银行如何发展，真正的财产仍然是土地、酒窖、畜棚和粮仓。战争、革命、洪水、大火，毁灭不了土地！

中午，部长醒来。第一个要求接见的是戴皮帽的门房。伯爵还很疲倦，也仍很急躁，但是门房坚持要禀告什么事。最后伯爵不得不勉强表示同意：

"说吧，究竟是什么事……"

门房冗长而罗嗦地报告了费兰茨来府上的情况。不仅有日子，还有具体到达和离开的时间，甚至连几分钟也记下了。他详细描绘了音乐教员的不端行为，并且说他相信外面也已经知道这事，至少是周围邻居的一些仆人，而这些人却正是巴黎传谣的耳朵和嘴巴……

部长站起身来，唤进管家侍候他刮胡、穿衣，然后差人去请小姐卡罗琳。几分钟后，女儿来到父亲身边，纯真无邪地看着父亲。只有一个非常纯洁和非常热恋的人，才能这样面对世界。圣·克里克抛开了即使在最内部的家庭关系中也必须相互问候的社交形式，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同那个音乐教员干了什么丑事……？我希望这只是仆人们的瞎说而不是真的。"

卡罗琳美丽温柔的脸上露出了同父亲嘴边一样的坚定性格的线条：

“我不知道有任何丑事。”

“你直接回答我：这个音乐家干了什么事？”

“他向我求婚，我同意了。”

“我已经答应把您嫁给别人了。既然我已经答应了人家，那么就是上帝说话，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我相信您现在会改变的……”

这是父女间的第一次冲突。晚上又继续斗争，如果能把这叫做斗争的话。因为这是一场优势全在一方面，劣势全在另一方面的角斗。伯爵当晚就下令为卡罗琳收拾最必需的行李，并派一个女管家和一个丫头送小姐到罗里村的别墅去住。卡罗琳没有哭，也没有嚷，甚至没有争辩，好象俘虏承认在武装押送下不可能逃走的现实一样，就这样离开了伯爵府。在出发前，父亲伸出了手，但女儿没有看见。部长在她临走前说：

“您以后再成熟一些，就会看到，我这样做全是为了您好，没有任何自私的打算……”不过这些话只能在一间空房里回荡，因为卡罗琳已经往下走了。她以极大的毅力控制着自己，好象只是出去旅行几天就要回来似的。走到大门口，稍微站了一会。门房打开了两扇大门，因为是在院子里上的马车。门房脱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卡罗琳只是点了点头，目光早就飘过门房的头。她机械地低声说了一句“再见”……

第二天，费兰茨来了。门房请示老爷之后说：“请教师先生到伯爵老爷那里去一趟。”

圣·克里克表现得很客气，好象在同一个孩子说话：

“卡罗琳不再上课了。因为几个月后，她要出嫁……”他脸上露出一种神秘的具有双重意思的微笑，“现在需要熟悉一下结

婚前后的事情。”

年轻人呆呆站着，一言不发，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伯爵说话的意思。

伯爵接着说：

“我把您看作是个正人君子。我的妻子对您的印象也很好。所以我们很信任您。现在我还是在对一个君子说话：我禁止您同我的女儿有任何来往。”

费兰茨深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恢复了讲话的能力：

“我能同卡罗琳说几句话吗？”

“卡罗琳小姐昨天晚上已经离开这里……”

“什么时候回来？”

“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如果说回来的话，那时她已是有丈夫的女人了。”

费兰茨看不见东西了，因为眼泪滚滚涌流出来，遮住了视线。他虽然喘不过气，但还是努力发出声音：

“卡罗琳同意出嫁吗？”

“卡罗琳知道，我是为了她好……”

费兰茨有点站不住了，因为伯爵没有请他坐下。伯爵自己坐在办公桌后面，让年轻人站着，似乎是在进行一场审问。费兰茨身子摇晃了几下，但很快就恢复平衡，用手抓住了办公桌的一个角。也许是过了一会，也许是过了很长时间，他又开始讲话：

“我们深深相爱……”

圣·克里克也在控制着自己，他真想一下子跳起来把这个年轻人赶出去，从办公室一直赶到大街上。但是他还是克制着自己，有礼貌地说道：

“您几乎还是个孩子。也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原谅了您的错误。我必须对您说，我相信您会理解并表示出善意：在我们家里，

还从来没有人同低层社会的人结过婚。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尊重下层社会的人。我们承认他们的能力、勤奋和优秀的品格……我们很愿意承认这一切，但是我们必须完整无缺地保持我家从圣路易时代传下来的贵族爵位。这一点您显然也是了解的。现在请允许我在我们分别时对您的工作表示感谢。我已故的妻子是很喜欢您的，我对您的才能也有很好的印象。"说着，部长站起身，为了避免同费兰茨握手，有意把两只手撑在办公桌上："再见吧，先生！"

费兰茨放弃了所有的教学工作，连对心爱的彼得·沃尔夫也不例外。他还写信通知波希埃家，说他将无限期地停止工作。妈妈什么也没有问他。没有劝告，没有责怪，甚至也没有提出最可怕的问题：今后我们靠什么生活，孩子？她还有一点小积蓄（是亚当留下来的），费兰茨也存了一点钱。目前暂时还能过得下去。不过孩子痛苦的样子实在叫人难受：躺在床上不起来，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好象上面写着只有他看得见和解释得了的字。几个星期后，费兰茨抑制着自己感情上的痛苦，去拜访巴尔汀神父。圣欧斯塔赫教堂的这位生性开朗的法国神父认为，天主教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十分快乐的哲学和生活哲理，它不仅容忍而且希望看到令人兴奋的葡萄酒、丰盛的餐桌、美妙的音乐和社会生活的其他享受。神父了解卡罗琳事件的全部情况。

几个星期来，费兰茨一直英勇地坚持着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但一见到神父就再也忍不住了：

"神父，我非常痛苦……"

"这是因为你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颗伟大而敏感的心。"

"这样生活下去很困难，但是我又不能不为母亲而活下去！"

巴尔汀神父把年轻人拉到自己身旁，用手抚摸他美丽的金

黄头发：

“你应该活下去。为了你自己，你必须活下去，我对你寄有很大的希望，孩子。”

他又呆在自己房间里不出门。开始时，一躺到床上就考虑隐居修道院的问题。后来他越是仔细地回忆过去，就越是肯定地认为，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戏。他不能脱离世界、音乐、人们、母亲、生活和巴黎。

不久，他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如果是性格脆弱的人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但他最后还是清醒过来，站了起来。他要生活，要奋斗。不久前还称颂过他的一家巴黎报纸《埃托阿广场》现在发了一个讣告：

“青年李斯特去世。

年轻的李斯特在巴黎去世了。他在其他孩子还没有开始上学时就已经征服了听众。九岁（别的孩子在这种时候还不大会讲话）就已经能够即兴演奏，他的钢琴使得那些最伟大的音乐家也惊叹不已……”

费兰茨的眼光跳过了许多称赞他的评语，突然停在一段话上：

“……在这以前，他，只有崇敬他的人。他的年龄成了他的武器，任何人的攻击都打不到他身上。人们说，他还是个孩子嘛。所以当他取得成功的时候，容忍代替了嫉妒。但是他长大之后会怎样呢？等到上帝赐给他的火花变得更加明亮的时候，情况又会怎样呢？

人们肯定也会发现他的错误，从而忘掉他的优点，也许
还会有人毒化他的一生。”

费兰茨徒劳无益地把报纸藏起来，不让妈妈看见。好心的邻居们都来向他母亲控告报上的谣言。安娜哭了，但后来看看孩子，又幸福地、宽慰地笑起来。一年多来，家里一直由费兰茨当家，妈妈很自觉地撒手不管。但现在她又成了保护者，把孩子紧紧搂在自己身旁。她吻他的眼睛、脸孔、额头和手：

“让上帝去惩罚那些伤害你的人吧！”她用手浑身上下摸了摸孩子，接着问，“你没事吧？”

费兰茨点点头：

“没事，妈妈！”

当然，首先来看费兰茨的还是埃拉尔德家的人。费兰茨近几年来几乎把他们全给忘掉了。老埃拉尔德也来了。他喘着气爬上二楼，不断用拐棍敲着楼道。不久，克鲁采尔教授也派人通知说，他想马上见到他从前的被保护人。费兰茨很快就发现他还有很多好朋友，他们为他担心，为他忧愁，他们爱他。文学艺术家茶会的领袖们也来信表示慰问。那家发表讣告的报纸后来不得不派代表团来向他道歉，并表示愿意在一切方面帮助他。老埃拉尔德不仅仅来探望，而且硬把他拉到自己家里。当马车还在路上的时候，老头就已经在考虑如何保护这个年轻人的办法。他打算请阿库斯·克鲁采尔（大克鲁采尔的弟弟，不久前刚出任音乐学院教授），比费兰茨只大几岁的比利时青年艺术家马萨尔以及具有非凡才干和性格古怪的乌尔汉来帮忙。乌尔汉背有点驼，小提琴、中音古提琴拉得非常好，还会弹一手好风琴，曾在大歌剧院乐队里演出过。人们都知道，尽管他是乐队指挥，但当

袒胸露背的女歌唱演员和芭蕾舞演员出现在台上时，他总是把身子背过去，因为他不愿意看到这种被不幸的命运同他拴到一起的罪恶世界。乌尔汉已经快四十岁了（至少人们是这么传说的），但至今还保持着童贞。他同那些大言不惭的音乐家、演员和女歌唱演员相处时，总象达尼尔走进狮子洞一样，随时准备着如何应付野兽来吞噬他。

埃拉尔德计划请马萨尔、克鲁采尔、乌尔汉和李斯特联合举行一次室内音乐会。老头用美妙而激动的演说介绍了室内音乐具有使人心灵高尚的作用。费兰茨很清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所以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埃拉尔德向他扔出了救生圈，要他赶快抓住游上岸来，不要再在危险的旋涡中转了。

第一次排练刚一开始，大家就感到很快乐。马萨尔这个身体瘦弱、头发蓬乱、说话特快的比利时人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过去。原来他也想过进巴黎音乐学院。他也见到了严厉的切鲁比尼教授，而且以同样的理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同费兰茨一样，都不是法国人。不过这种快乐的介绍只是刚开始的序曲。不久，费兰茨发现他周围完全是一种新的气氛，是一种同他过去学过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的新世界。过去，老师们总是教他如何征服听众，征服对手。而乌尔汉却总是说，你应该忘记听众，你要为自己演奏，室内音乐是内在的，它不是为感到无聊的听众而是为它自己才存在的。

乌尔汉经常送费兰茨回家。以后又由陪送发展成为几个小时的散步。驼背音乐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说，人类又走到十字路口了，只有上帝的门徒和圣人才能指出如何脱离世界总毁灭的旋涡。一见费兰茨有点怀疑地皱起眉头，乌尔汉就坚定地接着说，上帝通过圣人和门徒来实现本来要求所有人实现的意图，神圣的弥撒将按照上帝的旨意奇妙地创造，并且更奇妙地

革新人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英雄。英雄们将满足我们崇拜英雄的愿望。这些英雄不是用大炮、刀剑，通过在交易所和剧院搞丑闻的办法来赢得人们的称颂，而是靠他们最温柔的战略——仁爱来博得人们的崇敬。他们将教我们懂得，在这个追求物质享受的世界里，再没有比放弃物质享受更伟大、更愉快的英雄行为了。

这些奇特的谈话不止一次是在郊区进行的。那里的房子在秋霜和冬雪中摇摇欲坠，大门东倒西歪，墙壁又湿又脏，路上尽是泥泞和垃圾。两位好朋友就在这里边走边谈。乌尔汉对这种环境毫无感觉。他的脸闪着光，好象是走在花毯上。费兰茨对乌尔汉的话入了迷，驼背音乐家的信仰激发了他的感情。他从这些话里还感觉到，乌尔汉已经抛弃人间的一切享受，随时准备作出圣洁的牺牲。

在埃拉尔德沙龙里谈话时，很快就有一个新的成员参加进来。他的名字叫费利西·采撒·大卫。他比费兰茨虽然只大一岁，可是经历却比费兰茨丰富得多。他出生在法国南部，个子细瘦，皮肤发亮，头发乌黑。他上过耶稣教派的学校，当过律师，在合唱团里唱过歌，最后成了一个小提琴手。大卫在自己荒凉的山区故乡时就已懂得，有脑子的人可以生活得好，不动脑子的人必定失败。他对乌尔汉的基督教义表示异议。

“饥汉只有用面包才能喂饱，说空话是没有用的。用祷告烧不热冰凉的炉灶。对那些背上挨棍子或鞭子的人，讲另一个世界的真理和公道是徒劳无益的。”

驼背人连嘴都气歪了：

“你是个雅各宾党人！”

费兰茨突然发现，他目前正处在各种对立的力量之间，这些力量都在朝相反的方向拉他，几乎把他撕裂。巴尔汀神父要他

信仰讲理智的宗教，就差没有说出“做好事也不要做得过份”这句话。乌尔汉要他过自我牺牲的隐士生活。年轻的大卫却要他睁开眼睛，说“贫困的肮脏潮流将会吞掉整个世界”。彼得·沃尔夫希望他回到齐迈曼教授和阿森纳尔图书馆那里去。他的学生们都一再敦促他继续教音乐。最后还有母亲，她只要求得到和平与安静。

有时候，母亲坐在费兰茨的床边：

“孩子，相信我的话，什么事情都会随着岁月的消逝而被人忘记的。”

“卡罗琳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她一定象犯人一样被人看守着。也许她写过信，但被没收了。”

在埃拉尔德沙龙终于举行了第一次室内乐音乐会。请帖上写了两个演员的名字：李斯特和马萨尔。他们先演奏了费兰茨和斐提斯写的乐曲。听众的回答是有礼貌的掌声。最后一个节目是克鲁采尔的钢琴奏鸣曲。这时听众的情绪突然热烈起来。马萨尔特别容易临场紧张(所以后来他放弃了舞台演出而去教书)。开始时他演奏得毫无生气，但后来也被钢琴的狂呼怒号带动起来。他感到自己象一个船员，被海潮从港口卷到大海上。同费兰茨在一起演奏，小心谨慎、细致周到、羞羞答答等等，都是不行的。一定要飞翔，引吭高歌，直到心中感到不能再前进为止。

老埃拉尔德在哭。他不好意思地说，这是由于他老了，容易被感动。马萨尔糊里糊涂地呆坐着，中了魔似的，完全听从别人的意志行事。只有乌尔汉着急了：

“这是一种过分哗众取宠的音乐。它缺少含蓄和基督式的纯洁。”

乌尔汉的不高兴不仅仅是克鲁采尔的奏鸣曲引起的。在排练室内乐时的新式和声也使他感到不愉快。马萨尔和大卫很快就混熟了，他们总是不停地讲笑话，开玩笑。如果马萨尔讲一件可笑的事，大卫就马上给他补充一个更逗人的事。其结果是音乐灵感的圣坛越来越变成扮演滑稽戏的舞台。这时，围在费兰茨四周的网开始破裂。几个月前，如果他得到文学艺术家茶会的邀请，肯定会问乌尔汉是否应该去。而现在，他会不假思索地同意应邀，不再征求乌尔汉的意见。

从邀请信中发现，文学艺术家茶会已经换了地方。它不再在阿森纳尔图书馆举行，而是搬到了维克多·雨果的家。

这次来的人特别多。看样子要决定或者宣布什么重要事情。大客厅被勤劳的双手布置成大会议厅。诗人格拉德·德·内尔沃也来了。拉马丁表现得很胆怯(也许是一种孤傲)，躲在一个角落里。蒂奥斐·高蒂尔身穿红色坎肩，神态激昂，说话很快，头发蓬松，十分引人注目。仲马一再谦虚地向祝贺者表示感谢(他写的小说《安东尼》这时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功)，但是仍然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森特·比夫正在同主人商量什么事。画家戴维利亚和德拉克鲁瓦，建筑师、诗人兼画家彼得鲁斯·波莱尔都来了。波莱尔是巴黎戏剧生活中的无冕之王，他学校里的三百学生通过掌声或者口哨声可以决定可怜的戏剧作家的命运。当然，来客中还有许多女宾。例如美丽的建筑师茹利斯·瓦伯蕾，女诗人耶汉·杜赛娜。据说，杜赛娜在羊皮纸上写诗，墨水里掺有金粉。

大客厅里的嗡嗡声就象乐队演奏前定音时发出的混乱声。在这一片嘈杂声中有时偶尔可以听到高蒂尔大喇叭似的声音。在一个角落里，波莱尔正在对一个人解释什么事，一边说还一边

敲桌子。同时还可以听到一位女宾甜蜜的笑声。最后一切都静了下来。新客人巴尔扎克到了。人人知道，他一生都过得多灾多难，混乱不堪。他的命运就象一张支票，尽管可以延期一、两次，但是永远不能兑现。巴尔扎克开始写作时用的是假名，因为他曾经对自己家里人发过誓，他决不会让自己的写作活动玷污他们的名字。

巴尔扎克同地下室印刷厂的老板们打架，讲价钱，争吵不休。他使他们每个人都发了财，自己的口袋却依然是空空的。

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而且常常在他背后拿它来开玩笑。巴尔扎克肩膀很宽，有着角斗士的胸膛，头的形状很好看。如果不是一点小胡子破坏了国王式的尊容，他这个头也许可以成为恺撒国王的头。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尊敬。他走进大客厅时，就象进来了一艘庄严的大船，各种小船在它的面前都自动闪开。他向主人表达了问候之意，环视了一下周围，想寻找一个谈话的伙伴。他稍加考虑后就走到费兰茨身旁。人们很快发现，他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他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接着就说：他的一部小说主角也是音乐家，他现在想了解一下，除了书本上说的以外，一首乐曲的旋律究竟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有没有在睡梦中发现音乐旋律的事？……音乐家是怎样工作的？因为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写下来的句子往往是顽固不化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必须战胜它，使它两肩着地，即使这时候也还得使劲，一直等到写下来的字都服服帖帖，最后躺在纸上了才能停手……。他在讲话时象医生检查病人似地仔细打量着费兰茨。先是看手，接着看有力的和钢发条似的手指，然后又观察温柔的下巴、嘴和额头。最后，他说：

“我将从您这里借用一切。大自然把您雕塑成一个典型的男子。我不想再去想象什么典型了，因为这样想象出来的总是

比不过大自然所创造的。”

费兰茨尴尬地笑了笑：

“您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您了。我刚才说的话不是批评，而是一把钥匙，它也许能有助于您认识自己。您应该知道，音乐中不单单只有声音、节奏、思想和旋律。任何音乐作品中都有一个演员角色。真正的表演家会把他搬到舞台上，演他，鼓舞他，战胜他，为他痛苦，为他死去，为他复活，象喜剧中最伟大的演员一样。这将是您获得成功的一个诀窍。不要为他感到害羞，而是应该大胆地利用他。”

当巴尔扎克讲完最后几句话时，大厅里突然安静下来。茶会的负责人之一、身穿红色坎肩的高蒂尔要求大家安静。

“朋友们！第一次战役我们胜利了。喜剧剧院接受了雨果的《欧那尼》。现在我们必须赢得第二次战役，争取举行首演式！”

《欧那尼》的首演式在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举行。这一天是星期四，下着大雨。但这是一个重要日子。演出晚上七时才开始，可是剧院的工作人员、茶会的成员在下午三时就已经把剧院围了起来。剧院后门入口处对每一个进剧院的人都要检查。好象在进行一次秘密的军事行动似的，看门人要进来的人说出口令：

“钢铁！”

“女太阳神！”

只有知道口令的人才能进去。剧场一片漆黑，只有低沉的歌声在告诉人们，波莱尔遵守自己的诺言，把美术学院的三百学生全调来了。这时，有个人发出口令：“开吃！”于是小画家们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火腿、酒瓶、面包、大蒜、辣椒、点心，以及各种

各样的食品。接着，他们又唱起来了。

七时前几分钟，剧场全坐满了，包厢里也挤满了人，这在喜剧剧院里还是史无前例的盛况。这时，青年观众都在窃窃私语，原来蒂埃尔斯、康斯坦特、梅利米等人都坐进了剧院经理的包厢。当然，一些重要的反对派，例如斯克里布、德拉维格奈先生也来了。他们示威性地把手臂撑在包厢的前沿，嘴边露出一种令人高深莫测的微笑。这种微笑在演出结束后可以作两种解释："怎么样，我早就说这个戏肯定要失败的吧……"；"瞧，我就敢于挺身出来支持《欧那尼》，尽管开始时谁都不敢肯定它……"

当然，那些半神半人也来了：拉马丁、巴尔扎克、仲马、德拉克鲁瓦，还有波莱尔。他们一进来，立即引起了剧场的欢呼，就象当年恺撒视察亲信部队时受到欢呼一样。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就差没有把他们抬到肩上。

七点钟……

剧场渐渐暗下去，布幕慢慢升起。舞台上的布景是：冷寞的房间、沉重的石雕和粗糙的家具。靠墙那边有一张铺好了的床。这是一间卧室。

突然响起了第一次枪声，标志着欧那尼的战斗开始了。

"是他……在暗道楼梯上走的就是他！"

女太阳神的陪媪说了这一句台词后，全场秩序大乱。有一个人大声地狂笑，另外一个人用低沉的声音骂他："闭嘴，你这个混蛋！…"戏继续演了下去。即使最坚决的反对派的心也慢慢激动起来。舞台上已经不再是念台词，而是语言、诗歌、青春、激情和爱情在歌唱。

在这同时，观众席里还有人在争吵。有时一、两句激动的台词使人闭上了嘴，有时一、两个过分直接的字（按照过去剧院的习惯，有些事只能含蓄地表达，不能够直接明了地点破）却又引

起了保守派的愤慨：

“这简直是无耻！这是酒馆里讲的粗话……流氓也进了剧院！”

波莱尔的“军团”早就作好了战斗准备。如果批评剧本的人在他们旁边，他们就用胳膊碰他一下，或者踢他一脚，必要时还挥动拳头。如果那个人坐得比较远，他们就齐声轰喊：

“老山羊，你滚进修道院里去吧！”

这时，舞台上的戏只好暂停，台上的活人一下子都变成了石雕像。过了一会，戏又继续往下演，而观众席里还在继续争吵。这两场戏的区别只是在于中间休息时舞台上是肃静的，而观众席内却开始了真正的斗殴。高蒂尔的红色坎肩是一面旗帜，青年人都聚集在他身边。年纪大一点的人则分成一堆一堆，高声批评作者使用了流氓语言，宣扬了窃贼道德，恬不知耻地想推翻莫里哀建立起来的圣坛。

剧场又黑了。只要有一点点时间，台下没有人发出嘘声，不跺脚，不挑衅，不还击，只要有这么一点点空隙时间，雨果的戏剧台词就能使每个观众入迷。

诗人胜利了！

剧院散场时，绝大部分观众都心满意足，好象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庆幸福的命名日的大家庭里。有二十来个青年臂挽着臂——李斯特在最右边——沿着大街往前走，见到对面有人过来，就快乐地拉他一下，或者吸收他加入自己的队伍，如果那个人愿意的话。

他们在赫尔德咖啡馆门口停了下来。大家围坐在精明的阿尔丰斯先生的桌子旁。咖啡馆的这位总招待员相信青年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慷慨地借钱给他们喝咖啡，并且说必要时这笔贷款

也可以转为无偿援助。青年人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大理石桌旁，再次热烈地讨论了剧中的每一句台词，回忆了剧场的混乱、粗暴、殴斗以及使得敌人不敢再还嘴的出色的齐喊声。

出生在法国南部、满脸油光的大卫为同桌人作了精彩表演。他非常喜欢喜剧，现在他以忘我的幸福心情重现了剧场战斗时的情景，他用鼓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然后又用鼓声使他们恢复安静和秩序。他先用餐具敲鼓，后来又学起鸡叫：

"我宣布，我可以给每一个乐师、大号手、小提琴手、大提琴手、高音铜管手、铜鼓手、小号手提供良好的工作机会，还有高工资，燕尾服、护胸领和亮皮鞋……还可以提供象《欧那尼》首演式这样光荣的争吵！"

刚才还在愉快地瞎闹的青年人一下子都默不作声了。只有小心翼翼的比利时人马萨尔问了一句：

"谁是这个慷慨的大善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第一笔工资？"

大卫的脸一下子也变得黯淡了：

"诺言是马上可以得到的。至于工资么，那要等到一八九〇年彗星再现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不耐烦地叫了起来：

"你说出来嘛，究竟是谁？"

大卫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

"赫克托·柏辽兹！"

作曲家、音乐教师柏辽兹住在蒙帕内斯区一套阁楼房子里。他特别爱清洁，讲究整齐，这恰恰更加突出了他的贫穷。一进门，前屋什么也没有。用作家的话来说，一个人掉在水里时，伸出来的手什么都想捞，可是他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块刷洗

得很干净的地板和四面风化变质的墙。他用旧报纸把它们糊上，组成整齐的图案。这样既可给眼睛提供美的享受，又可以丰富科学知识，因为上面有近半年的大事记，还有各种社论文章。另外一间屋子要稍许宽敞一些。窗户前放着一张写字桌，上面堆着成吨的书和纸。墙角摆着一张象士兵行军床或教士苦行床似的铁床。只有一张椅子。墙上钉了几枚钉子，上面挂着衣服和教学工具吉他琴。客人只能坐在床上。谁要是坐在床角这一头，他就得把背靠在别人的肩上。椅子是主人坐的。现在他这里有四个客人：马萨尔、大卫、小克鲁采尔和费兰茨。他们正在仔细观察这位优秀作曲家的尊容。鹰型头、长脖子（更加衬托了鹰型头）、强有力的尖鼻子和一张小学生式的嘴。也不知道他已经挨过多少次饿，但由于自尊的骄傲，他拒绝一切美味食品，而且还说什么他的享受只在于未来不朽的佳肴。作曲家脸色苍白，也可以说是灰白，好象晚上才开的花似的，在灯光下还可以，到后半夜渐渐憔悴，天一亮就将萎缩在炉台旁。柏辽兹讲话很快，但口齿清楚，就象某些大演员一样，即使讲得最快的时候，也能咬清每一个字、字母、重音和标点符号。同柏辽兹是没法谈话的，只能听他讲话。那完全是法国剧作家拉辛写的人物塔尔玛式的独白。也确是不需要有什么人去同他争论，因为他一个人就可以讲清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正反两种看法以及一切同这件事有关的其他方面。这次他谈到，他将同哈贝尼克一起在音乐学院举行音乐会。哈贝尼克虽然已经五十来岁，又是德国人，而且他最初的音乐知识是从军乐队里学来的，但他对柏辽兹的天才极为推崇。目前他们之间有个争论，哈贝尼克主张乐队有六十人就够了，而柏辽兹却坚持要一百五十人。

费兰茨谦虚地插了一句话：

“我在维也纳听过贝多芬的交响乐，先生。乐队里总共只有

四十人。”

柏辽兹站起身来，说得更准确些，是一双看不见的翅膀使他从椅子上升起来。他冲着费兰茨说：

“您见到贝多芬了吗？”

费兰茨脸变红了。这是当男人们的某种内心隐秘被人发现时的脸红：

“是的，我见过他……他在我最后一次的维也纳音乐会上听我弹过钢琴，并且还吻了我的额头……”

柏辽兹倒在椅子上，象个小孩似的，开始小声地哭起来……

“呵，这就是我日夜等待的上天给我的信号。我一直希望有个人握我的手，把同贝多芬握手的热量传给我。先生，我是多么盼望着这一天呵！我们应该继承贝多芬传给我们的东西，把它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要演出强有力的音乐，本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只是需要有一只手把这种美妙的音乐写到乐谱上。现在上天给我的信号已经来了。”柏辽兹的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它使费兰茨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个鹰型头原来是可亲可爱的。柏辽兹走到费兰茨身边，拉着他的手，说：“这就是一个德国人给我的信号，它由一个匈牙利人传给了我……”

屋内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是柏辽兹在讲话：

“我们法国人好虚荣，好面子，自满自足，象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一样，塞住自己的耳朵，不愿听到其他民族的语言、音乐和哲学。结果使我们的虚荣和自满戴上了一切罪恶的王冠——愚蠢。我们的耳朵因此听不到莎士比亚的声音，听不到李尔王的诅咒和奥赛罗在狂吼，也听不到哈姆雷特搅起我们心灵之水——由于无聊和邪恶，它已经变得如此肮脏——的美妙语言。但对我来说，莎士比亚将会变成我的血肉和感情。”柏辽兹脸上放射出光彩，鹰型头直往前伸。“也许还会变成我的死亡。我在

一次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会上认识了哈莉特·斯密松小姐。这位当代最伟大的苔丝德蒙娜和奥菲莉娅告诉了我一切，尽管瘫痪的舌头说不出这些话，塞住的耳朵听不到这些话。先生们，每天晚上都是莎士比亚和哈莉特……不管是醒着还是梦中，她总是同我在一起。我吃的是她，喝的是她，想的是她，写的也是她。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冲到剧场幕后：我是海克特·柏辽兹，我爱您！这位女士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了一句英语，如果我这个音乐家的耳朵还灵的话，她是引用了一句莎士比亚骂人的粗野台词。但我毫不后退。一个男人是不能后退的。我跑到演出经理那里。他虽然也不会讲法语，但至少还能勉强对付几句。我用拳头捶着胸脯，说：

'我是赫克托·柏辽兹！'

'很好……'经理用英语说。显然，他是想说，他能够认识著名的法国作曲家，感到非常高兴。

我接着说：

'我非常爱……斯密松小姐……结婚……请您帮帮忙吧……！'

我不知道这个混蛋英国人当时是怎么想的。他活象一块烤熟了的大肥肉。他站起身，友好地把手臂插在我的腋下，把我带下楼梯，一直送到街上，然后突然关上了剧院大门。这时我才明白过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我开始给她写动人心弦的情书。可是没有任何回答。这时我决定同她算帐。艺术家当寄生虫爬到别人的食品上时，就从自己的心里把它赶走。我在创作中寻找安慰。我为她写了一部交响乐……《幻想交响曲》……它把哈莉特女魔赶进了巫婆家。"

柏辽兹家里当然没有钢琴，因此主人和客人立即决定到埃

拉尔德家去欣赏欣赏柏辽兹的交响乐曲。他们到埃拉尔德家的时候，天色已晚，埃拉尔德父子很热情地欢迎客人的到来。他们径直走进音乐厅，乐谱也放好了，这时柏辽兹才惭愧地承认，他不会弹钢琴。费兰茨表示了一下歉意，坐到钢琴旁，从头至尾翻了翻乐谱，立即在脑中刻下了每一个音乐符号。然后他合上乐谱，就开始弹起来。柏辽兹坐在音乐厅最远的角落里，弓着背，激动得浑身发抖：因为他实际上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出色作品。埃拉尔德父子和其他音乐朋友们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或者坐着，乐曲的初步展翅就已经把他们镇住了。

美妙的音乐，神奇的演奏。在艺术家的十个手指下，令人心醉的芳香，振奋精神的歌声，讥讽挖苦的大笑，女人甜蜜的颤音，激烈风暴的狂啸，恐怖地狱的丧事，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真是奇迹，是作曲者的创作奇迹，也是演奏者的灵感奇迹。费兰茨的两只手出色地弹出了弦乐器的低鸣、大铜号的高亢、鼓乐器的重击和双簧管的鼻音。

最后的声音消失后，厅内长时间静默无声。柏辽兹面容憔悴，眼窝深陷，激动地走到费兰茨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谢谢！”

费兰茨向柏辽兹借了一份乐谱，在家里整整弹了一天《幻想交响曲》。当然，演奏这种杰出的作品是很大的享受，但同时也是严重的考验。柏辽兹的乐曲几乎体现了他以青年人的勇气承担下来的全部想法：用真理的力量，把丑和美结合起来，使新的音乐向未来的方向奋勇前进。这是一场严重的考验。他会不会嫉妒比他大八岁、已经走在他前面并实现了他梦想的艺术家朋友？费兰茨经受住了考验：他丝毫也没有嫉妒的思想，有的只是

无条件的忘我精神和对创作的崇敬心情。

值得尊敬的不仅仅是创作本身，而且还有创作者本人。柏辽兹身材细瘦，性情乖僻，脾气不好，但心中蕴藏着能够移山倒海的精力。费兰茨也参加了同哈贝尼克的谈判。

在激烈的讨论过程中，三人一起研究了乐谱。(头脑顽固的哈贝尼克对费兰茨越来越感到钦佩，因为他眼睛非常锐敏，能够发现连作曲者自己也没有看出来的错误。)柏辽兹和费兰茨总是一起去散步。以后又加上一个德国音乐家费迪南·希莱和他的情人卡米尔·莫克。希莱是个真正的音乐家。每天练习六个小时，很少到巴黎街上闲逛，即使偶尔出去走走，也总是以一个德国人的眼光观察一切，认为巴黎城市又脏又乱，道德败坏，轻佻淫荡，恬不知耻。但是在卡米尔·莫克小姐的陪伴下，谁会去听他这些评论呢？莫克小姐是巴黎人，从脚上穿的鞋子到头上戴的帽子，全是典型的巴黎式。她有一个巴黎式的甜蜜小鼻子，一张成熟的稍嫌大了一点的嘴巴，还有她那动人的眼神，能同时使三个男人都入迷着魔。希莱是一个特别的男人：粗鲁无礼，牢骚满腹，对莫克的态度不象是一个热烈追求她的人，倒象是她的老丈夫。费兰茨根本不愿去管他们这些事，可是柏辽兹却不肯罢休。他非常能干：讲巴黎流行的笑话，学凯鲁比尼老头的样子，模仿演员们的动作，还有就是毫不害羞地向莫克小姐献殷勤，好象希莱根本不在旁边似的。在他热情的追求下，姑娘的小酒涡、小鼻子和小帽子都开始软化。这使得柏辽兹胆子更加大起来。他非常清醒冷静地安排这种散步：让费兰茨陪着希莱，自己则陪伴姑娘，而且离开他们至少有一百步，最多只让他们看到姑娘帽子上的羽毛。

第三天早上六时，赫克托·柏辽兹来找费兰茨。原来他整

夜都没有睡觉。晚上，他在道布里女子学校教吉他，下班后一直在莫克小姐家的窗口下踱来踱去，观察希莱什么时候离开她家。等这个正式的未婚夫走后，他马上用小石块去击姑娘的窗户。莫克小姐还真地在窗帘缝里给他作了个手势，要他在后门等她下来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变成了热烈亲吻和山盟海誓：希莱离开，柏辽兹接替。他们还决定由莫克小姐向母亲宣布这项变动王位的决定……从此让希莱退位，由海克特·柏辽兹作为正式的未婚夫。

费兰茨还在发困，情绪不高。这样大清早就有人来访，实在是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时间了。

长时间以来，费兰茨这是第一次又想起了卡罗琳。他带着一种抱歉的心情想到，他已经把姑娘完全忘掉。因为他现在又开始发现有漂亮的脸孔和诱人的眼睛了。不可否认，他在巴黎成千上万的引诱之下，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过隐居生活。他的创伤好了。可是人生来就是那么奇怪，他居然会为痛苦已经消失、伤疤已经痊愈而感到遗憾。现在他已不再想念卡罗琳，心中也不再难受。他一边走，一边想，一路上不是用眼睛，而且靠意识来分辨出小小的意大利商店、安静的市民酒馆、旧书铺和钟表店。这些地方是他平时每天都经过的地方。突然，他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使得他不是走，而是想跑。他一口气跑出平常居住的城区，穿过弯弯曲曲的街道，走进一条小巷。在这里，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圣·克里克伯爵府前。他看了看关闭着的窗户，然后退到街道的另一面，以便仔细地看看这栋大楼。过了一会，他又朝留着一点小缝的大门走去，并在大门前等了片刻。他没有勇气跨过门槛。一个穿着蓝色罩衣的仆人走了出来，肩上背着一把扫帚。他从头到脚地打量费兰茨：

"您找人吗？"

年轻人耸了耸肩。

“想找人，也不想找人。有一个时候，我每天都到这里来，现在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伯爵一家人后来怎样了……”

蓝衣人慢吞吞地用扫帚在地上画着半圆圈，头也不抬，随便回答他的提问：

“伯爵老爷已经搬到乡下去了，因为他被撤掉了部长的职务。小姐嫁了人。在最后搬家之前，小姐还来过一次，给我留下了一张小纸条，说是如果有人找她，可以到这个地址去找……”

费兰茨好象被一台已经开动的机器驱赶着一样，糊里糊涂地走进了冰冷的大门，直奔门房间。蓝衣人跟在后面喊着：

“请等一等……您走得太快，我跟不上！”

费兰茨的脸神经质地哆嗦着：

“条子在哪里？”

蓝衣人怀疑地看看年轻人：

“这个条子是给您的吗？”

费兰茨整个身子都哆嗦起来：

“是给我的！”

蓝衣人一面在破柜子的抽屉里找，一面对客人说：

“搬家前，伯爵老爷把全体仆人都召集到一起，简单说了几句话，就把大家辞退了。许多人都大哭起来，因为他们在这里过得挺不错，不愿意轻易丢掉这么好的差使。”蓝衣人边说边找。“到底放到哪儿去了？嗯，应该在这里。想起来了，我是在这里塞到什么地方的。”他接着说道：“当时只有那个戴皮帽的门房闹了起来，说伯爵老爷给他的钱太少，因为他是伯爵家的亲信，应该多给一些钱。如果您这位先生了解这家人家情况的话，那您肯定会知道，我们的伯爵老爷是多么自尊的人。谁也不许主动去打扰他。除非他问你，你才许答话，答话时必须恭恭敬敬。

戴皮帽的门房这下子闯了大祸。伯爵老爷大声斥责他说：你说的是什么秘密事？这个家伙吓得话也说不清楚了：我以为您……伯爵老爷深深吸了一口气，走到门房跟前，向他怒吼了一声：给我滚出去！你要是让我再在这里看见你，小心我的皮鞭！这家伙吓跑了，女仆人们也不敢再哭了。伯爵老爷把我叫到楼上，问我过去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一直在洛伊尔别墅干活，这里的老花匠死后，就把我调来了，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伯爵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大口喘气。过了好一会，气才慢慢消下去。他命令我留下来看房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每隔半年雇几个可靠的人打扫打扫房间，透透空气，掸掸地毯上的灰尘，擦擦家具……”

费兰茨急得象触了电一样：

“你赶快找吧，条子究竟在哪里？”

蓝衣人呻吟着直起身子，把一个用发黄的日本薄纸折成的信封交给他。年轻人紧张地打开了信封。上面写的地址是：贝恩道蒂高克斯别墅，圣杰克斯教堂旁。

蓝衣人还在嘟囔：

“嗯，这条子真是给您的吗？”

“是给我的！”

费兰茨仔细折叠好信封和小条子，放进口袋，然后对蓝衣人说：

“小姐要我仔细检查一下房子，当然这要请您协助才行。让我看一看，是不是一切都没有问题。”

蓝衣人吸了一口气，咬了咬牙：

“里面到处都是灰尘，还没有到打扫的时间。”

费兰茨淡淡地笑了笑：

“没有办法，命令就是命令，总得执行。我们只看一看就行

了，反正我在报告里会写上：这里一切都很好。”

他从头到尾参观了每一个房间。

这些都是他过去平时或梦中见过多次的房间。这是伯爵夫人接见他的房间。卡罗琳象幸福中晴朗的黎明一样清新、干净，第一次出现在这扇房门后。桌子上还是那些老书……又到了音乐室。费兰茨感到一种痛苦的欲望，真想再坐下来弹一曲，可是他不能这样做。这样会马上暴露自己。他只好跟着蓝衣人走，不一会就来到了自己的圣坛：卡罗琳的卧室。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觉得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他的头脑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清醒，神经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敏感，但躯体却是死的。他走不动了。他只好站在这里对蓝衣人说：这里应该特别注意好好打扫，因为小姐肯定会回来的，而且会查她留下的那些玩具娃娃和书是否都在（娃娃是她小时候玩过的；书是她同费兰茨两人头碰头时一起读过的，当时他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灵读了这些动人的书）。”

蓝衣人开始有些不耐烦了。费兰茨以极大的毅力总算从地板上拔起腿来，继续走了下去，但脚是那么沉重，好象穿的是双铅鞋。他下了楼，回到传达室，走出了大门。他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蓝衣人在后面的喊声：“如果小姐问起条子的下落，我该怎么报告？”

费兰茨没有回答，只是摆了摆手，匆匆忙忙往回走。

实际上他只是现在才发现，他被人家抢去了什么。这种撕裂心灵和生命的力量是多么可怕啊！他只是现在才认识到，他最近几个月做的工作全是空的，全是机械性的活动。他就象一个夜游病患者，糊里糊涂地在高处走来走去，因为有一颗星体、一个美丽的幻影在吸引着他的全部生命和现实存在。他自己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到的家了。只是开门声使他惊了一下。他一

进卧室，就躺倒在床上，但他不是想求梦，而是想求死。他同母亲谈完话后，立即赶到巴尔汀神父那里去忏悔。以后又去找朋友们，以求得安慰。但是大卫老是刺激他，而别人又使他感到厌烦。乌尔汉的圣洁则几乎惹得他狂怒。他又跑回家，关了灯，重新躺在床上。脑中一直盘旋着一个念头：一定要干一件可怕的事，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把房子烧了，或者把整个世界烧了，让自己也烧在里面，这样好叫卡罗琳知道，他还活着，正在为她受苦，日夜思念着她。

天黑后，妈妈送晚饭来。他碰也不去碰它一下。过了一会，安娜又进来，并抱歉地告诉说，外面有个从维也纳来的叫兰斯的年轻人来找他。这个人家居里加城，一定要同费兰茨谈谈。礼貌比痛苦更有力量。费兰茨没有让客人等多久。起床收拾一下就开门出去了。一个金黄头发、红色眉毛的年轻人走进来，一边伸手，一边自我介绍：维尔汉姆·兰斯。如果在平时，他讲的事情肯定会震动费兰茨的心。这位里加城的年轻人出生在德国，是俄国贵族的后代，在俄国有光辉的社会地位，但他想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贝多芬。一八二六年四月到一八二七年三月，他在维也纳度过了一年，目的就是为了每天能看到贝多芬，了解他的习惯，接近他，为后代记下他的声音，最后获得奖赏：同艺术大师握一次手。兰斯想写一部介绍贝多芬整个一生的书。也只有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才会有这种幻想。他那本书已经有了三章的大标题："青年贝多芬"；"艺术大师"；"未来的预言家"。幸好费兰茨还没有疲劳得无法去注意他的这些想法。接着，兰斯又说了一件事，使青年艺术家感到心痛。不过这是一种愉快的心痛。兰斯说，贝多芬传记一书中重要的一章是关于贝多芬的钢琴曲，对这个问题，他想请求曾经敢于在巴黎举行贝多芬音乐会的李斯特·费兰茨帮他研究。费兰茨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并且客

气地问了一句：

"您想弹弹钢琴吗？"

"我担心这样会使您厌烦……"

直到这时候，费兰茨才请这位金黄头发、穿着非常神气的年轻人坐下。看来他也象其他刚到巴黎的人一样，想一下子在巴黎式的生活方面超过所有巴黎人。兰斯气派十足地点了点头，把帽子放在椅子下，接着说：

"我担心，我为李斯特·费兰茨弹钢琴会使人们笑话我。"

主人忘乎所以地大笑起来：

"没有办法呀，亲爱的小朋友，不管我们多么害羞，在医生面前总得脱衣服呵！"

兰斯带着痛苦的脸色坐在钢琴旁。弹得不错。他不是艺术家，但肯定会给他的朋友们带来娱乐享受。

"您弹得很好，亲爱的兰斯先生。不过我得惭愧地承认，我不知道您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

兰斯高兴得眼睛闪亮：

"是卡尔·马里亚·韦伯的《邀舞》。"

费兰茨经不住音乐的引诱。现在他自己坐下来重弹了一遍。安娜这时也偷偷进来坐在琴旁听。这种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是很少有的。琴弹得确是动人。求爱的男人同半推半就的姑娘在对话；接着是舞会音乐激动人心的旋律；姑娘的心再也抵抗不住音乐的引诱，因为音乐本身就是春天和爱情；最后是幸福的、忘我的自白：你是多么美丽呵，你带来痛苦，也带来欢乐，呵，你是多么美丽呵，青春！

红眉毛的青年人象触了电似地站在那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心灵上的强大震动把他脑中的法语词汇一扫而完。他不停地讲起俄语来，根本忘了费兰茨是一个俄文字也不懂的。过了

一会，他才重新想起应该讲法语：

“您真愿意教我学习钢琴吗？”

费兰茨轻轻关上琴盖，把乐谱交还给兰斯，说道：

“如果我今后还教音乐的话……”

晚上，安娜母子两人去教堂做祷告。安娜完全沉浸在祈祷中，但有时也偶尔看看孩子在干什么。费兰茨没有祷告，只是在继续想下午想的事：一定要干一件可怕的、惊人的事……这个罪恶的说法不对，不是可怕的、惊人的，应该是出乎一切人意料之外的。

回家途中，他挽着母亲的胳臂：

“妈妈，你说，我能做个什么样的神父？”

安娜纯洁的蓝眼睛里闪闪发光：

“那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神父，孩子。”

“不过我问的意思不是漂亮不漂亮……”

“那你想问什么，孩子？”

“我是想问，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好神父？”

安娜长期生活在农村，从小就受到谦虚、羞涩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但现在她忘了这一切，居然在大街上抱着儿子亲吻：

“我想，孩子，你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但是非常不称职的神父，一个为姑娘会这样痛苦的人……”

在家中，费兰茨在半醒半眠状态中继续想下午的计划：消息会传开，报纸也会登出来，有个人的心虽然已经完全冰冻了，但她至少会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发生的。

整个晚上，他都被这个计划折磨着。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柏辽兹一大清早就来找他。这位杰出的法国作曲家是这样一种感情十分敏感的人，他对自己的痛苦体会得很深刻，但对别人的痛苦却漠不关心。所以，柏辽兹一进来就大讲自己的事，根本就没

有想到坐在他面前的人比他更痛苦。于是，这次谈话又变成了独白。不需要回答，不需要提问，也不需要插话，一切事情都自动地摆出来：

"卡米尔·莫克小姐当时就说，她妈妈那里会有问题。她母亲开了一家内衣商店，每天晚上都要拉开钱柜，清点帐目，看看明天钱是否会比今天多，后天钱是否会比明天更多。她母亲建议我去争取罗马奖金，她认为象我这样天才的人一定会把所有的对手全扫下台去。我问她，这个罗马奖金究竟是什么东西？她要我去找宾格尔老爷爷。这个老头把我送进一间监狱式的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破烂的铁床，还有一张满是墨水迹的写字台。上面躺着无数出色的但没有写成的音乐作品。这时候又出来了一个肥胖的看守人。他说不许向屋子里递送任何纸条，不管是手抄的还是铅印的乐谱、书籍或笔记本，凡是可能使里面的人得到启发、灵感或旋律的东西，都不行。

这样的地狱我曾经去过一次。现在卡米尔要我再去试一次。我了解自己，当别人通过我的心来说服我的时候，我是没有武器可以用来抵抗的。而我的心又完全掌握在卡米尔的手里。我准备去试试看，不过进去之前，我一定得用我所爱的人把我保护起来，例如莎士比亚……哦，我想起了李尔王的诅咒、哈姆雷特的自白，还有奥菲莉娅……不过现在不谈这些。奥菲莉娅去世了，这个可恶的巫婆。算了，我们不说莎士比亚了。我们可以谈谈另一个天才——歌德。呵，浮士德！呵，重新回来的青春！呵，玛格丽特的天真无辜！呵，骑马穿过黑夜和地狱！呵，统治全世界的权力同魔鬼结成联盟……我倒忘记问您了，费兰茨，您读过《浮士德》吗？如果没有读过的话，那一定得补上这一课。只有站在山顶上的人才能看到整个世纪。《浮士德》就是远瞻整个世纪和整个世界的奇妙的了望塔……我现在该走了。我正在同

顽固的哈贝尼克谈判。当然，还有卡米尔……她是唯一的美丽的高贵姑娘。她迫使我上了罗马奖金的强盗船，让鞭子抽我的光脊梁，让火烧我那因为朝圣而疲惫不堪的脚，正在我被撕裂得狂喊的时候，他们还来问我：先生，你的派头和神气上哪儿去了?!”

《幻想交响曲》的排练工作进行得很慢。柏辽兹的在场，他对乐队其他成员演奏技术的反复批评，以及在排练时还想雕凿每一个节拍的吹毛求疵态度，使得哈贝尼克心绪不定。不过主要问题还不在这里。柏辽兹因为生活贫困，不得不自己抄写乐谱。但是抄写过程中，思想常开小差，有时是因为想念卡米尔，有时是因为营养不良，有时则是因为灵感太多，这使他不得不一再修改原稿，把一些节拍弄得很乱。在头几次排练时，乐队演奏的不是什么交响曲，而是毫无希望的声音大杂烩。一些为了帮他的忙才来参加乐队的人逐渐离去。愿意演奏他仔细修改过的乐曲的人越来越少，以致到最后连柏辽兹本人也都不想再干下去了。

光荣的三天来到了。

但奇怪的是，这些惊天动地的声音并没有传进费兰茨的房间。同其他性格浪漫的年轻人一样，他这时也在阅读心爱的书籍，想从书中找到痛苦问题的答案。从柏辽兹那里借来的书已被他当作绝对正确的经典。柏辽兹先给他朗读了整部《浮士德》，并且作了内容丰富的解释说明，引证了大量的精彩段落，然后又给他看了自己受《浮士德》启示而写成的乐曲。这都只是开始时的做法。以后费兰茨就常常独自一个人面对歌德了，而且总觉得这位伟大诗人的话都是针对他说的。

但是，放下帘布的窗户和歌德的诗歌言词也不是一面能堵

住历史信息渗透进来的墙。费兰茨曾经成百次地发过誓，他决不再管窗外事。但他还是顶不住刚印出来的带有油墨气味的报纸和发响的纸张的引诱。于是外面的消息开始是渗透，以后是慢慢流入，最后则象洪水一样冲进了他的房间。

历史的恶作剧就是这样，衰老残废的卡洛伊十世正好起用了波利格纳克的后代，而波利格纳克本人曾经使法国国王遭到断头之刑。如果有人劝这个老头更换他的部长，他会大声嚷叫起来："我壮烈牺牲的哥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也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人们要他更换部长，以后又威胁他，掠夺他，侮辱他。最后还把他杀死。我不会这样干的……他们别想这样对待我！必要的时候，我愿战斗而死！"这个老头由于害怕，采用了各种恐怖手段，其结果反而促成了已经四分五裂、各吹各调和议而不决的国会的团结。反对派提出了战斗的口号：自己救自己，上帝也会帮助你！老国王相信瑞士卫队的武器，反对派则相信飞快传递消息的印刷机。瑞士卫兵守卫着大炮，反对派保护着印刷厂。人们都还记得路易十六在巴士底狱[1]于七月十四日失陷时说过的一句名言："今天我去打猎了……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现在，当老国王刚向猎场出发的时候，巴黎的警察局长正带着大批军警去查封反对派报纸的编辑部。他冲进印刷厂，叫来吓得发抖的厂长，下令说：

"要工人们立即离开印刷厂！"

"先生，这超出了我的权力范围。最好还是请您亲自向工人们发布命令吧！"

警察局长刚一转身，工人们就把他围上了。他们用自己的

① 巴士底狱(Bastille)，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法国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陷作为法国封建专制制度象征的巴士底狱，开始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身子保护着印刷机。警察局长吹起口哨，军警们亮出刺刀，开枪射击，一个工人流血倒下，接着一个士兵大声呼救。就在这时，工厂外面围着成千上万的群众。骑马的通讯兵急忙跑回请示波利格纳克。他命令通讯兵直奔马尔蒙特元帅，请他立即动用卫戍部队！但马尔蒙特这个名字比老国王更能引起群众的憎恨。马尔蒙特意味着失败。马尔蒙特意味着叛卖。就是由于他的叛卖，拿破仑才遭到厄运。马尔蒙特面对敌人不是生死搏斗和殊死奋战，而是让他们凯旋进军。由于事隔十八年，人们已经忘记，拿破仑曾经用尸体铺平了从莫斯科到巴黎的归路；他为后代留下了莱比锡战役、滑铁卢战役和几十万残废士兵。现在，人们只记得他当年胜利的光荣和巴黎曾经使全世界感到恐怖的伟大年代。马尔蒙特！这个老头正好找着该死的他。他的名字使那些因为疾病和饥饿而不断死亡的郊区贫民，同银行家、科学家以及由店主、厂主组成的坚强、小心但准备斗争的资产阶级队伍联合在一起。马尔蒙特！在巴黎郊区，铁器商品被抢了，群众分发了步枪、火药、刺刀和铁棍。马尔蒙特！技术学校的学生列队游行了，他们只要求有几个军官来领导他们战斗，发给他们武器，他们高喊伏尔泰的口号："一定要打倒那些可耻的家伙！"马尔蒙特！马尔蒙特！群众在大街上骚动。他的名字变成了警报，引起了冲突。在任何人都还没有谈到要革命和进行内战的时候，就已经有近十万的军队向马尔蒙特发起了进攻。起先他还在皇宫内组织抵抗，但由于成连的部队一个接着一个放下武器或参加群众队伍，后来不得不退出皇宫。他放弃了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据点，向圣·克鲁特堡撤退。沿路上损失惨重，逃兵越来越多，只有瑞士卫队还能战斗，因为他们对人民起义事业是漠不关心的。他们都是些被高价雇来杀人的人。他们就同平时进行军事演习一样，仔细地装填子弹，认真地瞄准，致命地射击。

现在透过墙壁的已不仅是印刷品的油墨味，而且还有大炮的轰隆声。费兰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迫使自己回到孤独生活中，回到自己筑成的痛苦世界中，回到书籍的美妙字句中，回到个人的真理中。这里也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我行我素，决不动摇，历史的滚滚潮流也奈何我不得；人们在战斗，创造英雄业绩或者变节叛卖；有人在以人民的名义演讲，有人在欢呼国王万岁，但我还是坐在写字桌旁看我的圣书，不为所动。

不久，一颗手榴弹在房子附近爆炸。

窗户在发抖，街上有人狂叫呼救，救护车赶来了。

又是枪声。

对面房子的窗户被炸坏了，玻璃碎片砸在大街上的声音非常清晰。

从很远的地方好象传来海潮的咆哮，起先还只是隐隐约约的嘈杂声，不久就变成了带有强烈节奏的狮吼声。书从费兰茨的手中掉到地板上：

“呵，是的，这是《马赛曲》！”

他一个箭步就跑出房间，匆匆忙忙亲了亲母亲，很快就到了大街上。他拼命向皇宫方向跑。一个陌生人挽住他的胳臂：

“兄弟，这真是光荣的日子呵！”

费兰茨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陶醉和幸福。大街小巷到处是法国民族的三色旗。街道的两旁站满了儿童和妇女。许多老年人也让人扶下楼，站着或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伸长脖子观看。还有些老人干脆就坐在地上，只垫了一条麻袋。

在空中，旌旗招展，歌声飘扬：

“同胞们，前进……！”

在远处，似乎有遥远的地震声在加强着人民欢庆节日的呼

声：先是大炮轰鸣，接着是步枪子弹呼啸而过，听起来好象是海潮冲击时的鸟叫。

费兰茨被群众看作是一个青年领袖人物，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他往前走，往前冲，跌倒后又爬起来，一直到一批武装人员挡住去路，才停了下来。这是些起义民兵。他们正在听一个刚从圣·克鲁特堡俘虏营中逃出来的战士演说。过了一会，在一阵巨大的混乱中，人们把他忘掉了。费兰茨看不见演说人，但能听到从武装民兵人墙透出来的声音：

“马尔蒙特狼狈不堪地撤到圣·克鲁特堡。他几乎是从马上滚了下来。他向老国王报告说：国王陛下，我们被击溃了！国王回答道：我原来寄予您重望……马尔蒙特竭力为自己辩解，说什么子弹打光了，士兵不断开小差等等。总之，他胡编瞎说了一通，但就是没有讲出真话：连狗都不欢迎老国王，他应该赶快滚蛋。老头说：行了，您坐下来吧，马尔蒙特，您的腿在哆嗦。马尔蒙特马上声明，这是因为骑马骑的，而不是因为害怕！过了一会，王子来了，于是演出了一场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滑稽戏。这个短腿、大肚、贪吃、老是围着宫廷侍女们转的臭王子，大声斥责马尔蒙特：您也没有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这时，这个老家伙还坐在那里不动，闭着嘴巴，好象已经英勇牺牲了似的。短腿王子继续喊叫：听见没有，元帅？这里是未来的国王在同您谈话，还不站起来？老元帅从椅子上勉勉强强支撑起来，说话声音颤抖：启禀殿下，马尔蒙特公爵、巴黎卫戍部队前司令官，谨向殿下交出元帅权杖……当前的重任超过了我的能力！王子歪了歪嘴，轻蔑地说：您现在也不象个十分勇敢的将军……马尔蒙特一怒之下，伸手去抽军刀，刚刚抽出一半，就被大肚王子推倒在椅子上，差一点没有摔倒在地上。这样一来，整个宫廷的大小官员都跑来劝架。国王也劝他们不要再吵，王子直在那里

生气，老头元帅哭了起来。我下面说的如果不是真话，你们可以当场把我剁成肉酱。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老国王这时发出命令：行了，现在我们坐下来打牌吧！他们还真地打了牌。我在伟大崇高的上帝保佑下，总算带着两条完整的腿和巴黎式的头回来了！”

武装队伍分散了。群众把费兰茨卷到了市政府大楼前。人们正在举行盛大舞会。营火、圆圈舞，有人想唱一首老歌曲，但马上被人制止。这并不是因为害怕这首歌的火药味，而是因为来了一位需要大家注意和保持安静的客人。

开始是三十二名鼓手，他们敲得震天响，几乎把城里的鸟和鸽子全给吓跑了。接着是四架马拉大炮，闪闪发亮。再下面是老战士的队伍。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十八年来一直收藏着的军功勋章。最后，大家盼望已久的客人也来了。他就是拉斐德，已经七十三岁了。又瘦又高，就象军刀一样。还是当年那样有精神。就是在革命和街垒战斗的炮火中，他仍然穿着整洁。

鼓声停了下来。拉斐德用舞蹈演员的漂亮姿式从马上跳下来。他被领到市政府大楼的一个凉台上去作演说。几千群众就是吸口气也是很大的声音，何况是欢呼，所以大家根本就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最多也只能听到几个字：一七八九年时，我也在这里战斗过……现在我又回来了……共和国万岁……如果你们想建立王国，那就让路易·菲力普[1]来吧！

有个人把两只手圈成话筒大声喊道：

---

① 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 1773—1850)，法国国王(1834—1848)。出身波旁王朝奥尔良家族、公爵。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取得王位，建立七月王朝。在位期间，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残酷镇压工人和民主运动。

“从圣·克鲁特堡来人了，老头想谈判！”

群情大哗，一片混乱。各种相互对立的声音都想压住对方，但最后终于在混乱中形成了一条主导意见：

“进攻圣·克鲁特堡！”

这时，费兰茨忘记了拉斐德，忘记了戴王冠的老头，也忘记了在他旁边大声喊叫、不顾自己生意好坏、极力鼓动向圣·克鲁特堡进军的糖果贩。他再不去管他们了，因为他在市政府大楼的一个凉台上看见了细脖子、鹰型头、乱头发的柏辽兹。他在那里站着，用一根巨大的棍子在指挥群众唱歌：

“同胞们，拿起武器……！”

这根特别的指挥棒看来有足够的权威使群众唱歌。广场上响起了从未听见过的、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式的群众大合唱，在妇女和儿童的极高音下面，生锈的男人嗓子唱出了雷鸣般的低音：

“同胞们，拿起武器……！”

费兰茨从老远的地方向柏辽兹招手，但后者好象根本没有看见他。柏辽兹还在挥舞那根大棍子，等歌唱完后，他象运动员那样敏捷地顺着凉台的围墙、栏杆和水管爬了下来。他刚刚站住脚，就立即向费兰茨那里跑去。原来他在凉台上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朋友，而且一直盯着他。现在，他幸福地拥抱着满脸通红的费兰茨：

“怎么样，《浮士德》不错吧，我的朋友？”

费兰茨抓住他的肩膀。他也把费兰茨拉在身边。两个朋友肩并肩地去追赶群众队伍。

费兰茨已经跑得喘不过气来，但柏辽兹还有劲。他边跑边说：

“我获得了罗马奖金。这是毫无疑问的。关于亚述末代国

王沙达那帕鲁斯的题目，我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那样进行了描绘，充满色彩和光辉，一片富丽堂皇，处处是东方丝绸，豪华锦缎，金银财宝……古提琴曲、抒情曲、钢管、小号，总之，凡是在壁画上生活和活动的人都得到了黄金。即使是那些吹毛求疵的家伙、挑拨离间的教授和头脑愚蠢的审美家也不得不承认我这部作品的伟大。评审委员会几乎跪倒在我脚下。宾格尔老爷爷从地下室拿出了一瓶陈年葡萄酒，建议为他和我，为法国的健康干杯。外面正在放炮打枪，我急急忙忙跑到卡米尔家。但出来见我的不是她，而是她那位只知道缝制内衣的妈妈：先生，胜利了吗？是的，夫人。我骄傲地回答了她，就如同当年拿破仑取得第二次马林戈战役的胜利后一样。她又问：您什么时候去罗马？我说：我永远不会去罗马。我决不会用革命的、快活的、血腥的和上帝的巴黎去换一个到处是木乃伊、破石头和香火味的罗马！她看了看我：如果我作为卡米尔的母亲说话，您不应该拒绝荣誉和金钱，您必须去罗马！我还能对她说什么呢？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吻了吻她的手，还象个小孩那样亲了亲她的额头，然后说：好吧，去吧，我去朝拜吧，在我的白旗上只有一个名字——卡米尔！”

前面又有很多人挡住去路。几个民兵把看热闹的人挤到两边房屋的墙边，在几分钟之内就清出了街道。过了一会，就象歌剧最后一幕的情景那样，所有在剧中活着的演员全都上了台。他们唱着最有名和最好听的歌曲，扛着打坏的步枪，挎着缺刃的刺刀，戴着撕破的帽子，背着残缺的旗子，坐着破烂的马车。最后舞台上出现了尾幕的主角：首先是银行家拉斐德，他穿的是毫无光彩的黑色衣服，可能是为了掩盖他成吨黄金的颜色；接着是赛拜斯蒂尼将军，他身穿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还有闪闪发光的肩章、绶带和触地有声的军刀。这样可以大大增添尾幕的声色。

然后是古伊索特出场。他带着胜利的骄傲环视周围，似乎他是使革命机器得以运转的唯一的神秘工程师。最后新国王路易·菲力普也混在群众队伍之中，丝毫也没有突出自己的地位。这个国王虽然还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任命，也没有举行加冕典礼，但银行家拉斐德友好地频频点头说明，这件事就象一张兑了现的支票一样，已经完全敲定了。新国王笑容可掬，反倒使人恐惧地想起一个能干的商人在商店刚开张的时候总是热情欢迎主顾的情景。新国王（尽管目前还只是银行家拉斐德承认他）同过去的法国统治者相反，总是努力避免作出军人的坚定而僵硬的动作，以免群众想起那些指挥战斗的军官。路易·菲力普的腿有点瘸。他不怕犹如八月那样酷热的七月阳光，随手带着一把漂亮的阳伞。他身穿灰色裤子、浅绿绸坎肩和黑色外衣。右手拿着帽子，高兴地向窗口、凉台、大门和一切可能有他臣民的地方挥动。

光荣的三天……！

最后的炮声还没有平息下去，他就已经着手把光荣的三天——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写成交响乐曲。先是崇高的主题调：基督教圣歌、马赛曲，音乐中还有捷克胡斯运动时期的两个战斗歌曲："让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成为我们的愉快……。"接着，这张巨大的图画变成了行动。他勾画了交响曲的情节：不满……愤怒的火焰……复仇……恐怖和渴望自由。革命爆发：到处是混乱、狂喊，国王卫队进行曲，冲锋，光荣的三天的伟大战斗……然后是十遍、一百遍地高呼：万岁，万岁！

写作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把英勇牺牲的国王之歌《亨利四世万岁！》加进三首革命歌曲中。

但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抓住自己的思想。

他错了。他在用别人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一段里是贝多芬，那一段里是柏辽兹。现在他才真正明白，柏辽兹确是个伟大艺术家。可是他已经勉强去罗马，人不在这里，不会再来影响他。现在没有人对他滔滔不绝地讲话，也没有人对他的天才唱颂歌。他现在需要自我鼓励。

《沙达那帕鲁斯国王》的首演式完全失败，丢尽了人。合唱团开始时只是起拍不好，后来为了避免错误，干脆不唱了。铜号走了调，一个乐师看错了乐谱。柏辽兹是音乐指挥(这次是没有指挥好，但后来他还是成了一个天才的音乐指挥)，由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愤怒和痛苦，抓起乐谱就扔到乐师中间。结果引起大喊大叫，相互殴斗，乱作一团。柏辽兹在半昏迷状态中被拉出大厅。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又变得浑身是劲，跃跃欲试：明天或者后天，我要重新搞起来。他还真的重新搞起来了！他在一次音乐会上同时演出了《沙达那帕鲁斯国王》和《幻想交响曲》，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又在半昏迷状态中被拖出大厅，不过这回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过分兴奋。现在柏辽兹终于去罗马了。这样就给费兰茨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可以在不受柏辽兹正反两面影响的情况下，自己来审查自己的作品。他已经断定《幻想交响曲》是部出色的作品。音乐史是在巨星的照耀下诞生的。这个想法使他感到说不出的幸福，但同时也使他担心：他在作曲方面不会象柏辽兹那样独具风格、坚定有力并且能够引人入胜。过多的思想同时向他袭来，这种时候更需要的是自我克制、自知之明和严格认真。必须去粗取精，抓住核心。

开始时极为激动人心的革命交响曲象一股潺潺泉水，慢慢地流入不能生长任何东西的沙地，最后完全消失。其原因不仅仅是费兰茨要求过分严格，灵感逐渐消失，而且也是由于光荣的三天慢慢被人遗忘。人们发现，光荣的三天革命之后，什么也

没有变化，一切照旧。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只是政府的驾驭权由波利格纳克们的手里转到了拉斐德们的手里。人民比老头国王统治时期更加贫困。警察局也不隐瞒：郊区又在骚动。一件表面看来是很小的事情特别反映了当时巴黎的真面貌。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四日，巴黎的豪门贵族为前王子贝利公爵举行了安魂弥撒。巴黎圣日耳曼大教堂的墙上挂满了波旁家族的百合花旗。圣日耳曼区[1]至今还在怀念波旁王朝的百合花王子。在郊区很快传开一个消息：贵族们不肯善罢甘休，正在准备复辟。于是群众很快包围了教堂，把那些漂亮豪华的马车推进塞纳河中，在教堂顶上升起了革命的三色旗，驱散了前来做弥撒的老爷太太。等到路易·菲力普的警察部队赶来时，广场上和教堂里只剩下一些踩坏的礼帽、撕破的飘带、丢失的披风、折断的手杖和好几匹脱离了套车而转圈奔跑的惊马，表明刚才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贝利公爵战役"。

报纸都表示极大的愤慨。国会和所谓的左翼政治家也都站在吊丧的贵族一边。三颗明星，光荣的三天越来越失去自己的光辉。羽毛笔在纸上疲倦地转来转去，终于象海燕一样落了下来，它是想飞向水面，可是一到下面就发现这里原来不是溪水，更不是川流不息的江河，而是冰，坚硬寒冷的冰！羽毛笔的海燕又飞走了。冬天的严寒不仅扑灭了三天革命之星的火焰，而且也向费兰茨下达了"不许再写"的命令。

费兰茨非常想念柏辽兹。(令人奇怪的是，他竟会特别崇拜柏辽兹)庄重的乌尔汉、演出时老爱紧张的马萨尔、爱上了巴黎的德国红眉青年兰斯、学习勤奋的沃尔夫以及越来越忙于教书的克鲁采尔，都不能弥补柏辽兹的远离。老埃拉尔德也走了，永

① 圣日耳曼区是巴黎贵族居住区。

远地离开了他和人间。费兰茨的唯一安慰是满脸油光的大卫。大卫把费兰茨引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费兰茨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大卫看作是他所心爱的浮士德和《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

这个新世界就在巴黎泰伦街的一间平房里。这里是圣西门主义者的聚会地。他们把这间非常干净但却特别简陋的房子称为圣坛，把它看作是进入思想启示宝库和未来幸福世纪的大门。新宗教的创建人是圣西门公爵，他一生中经历了各种冒险，发现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思想。他宣称：过去，十字架和刀剑，也就是迷信和战争征服了社会；现在，我们要创造一个新世界，让劳动和科学来统治。这位自称是查理大帝后代的公爵比最坚定的雅各宾党人还要激进。他有一条冷酷的基本法律：必须把神父和贵族从一切政府机构中清除出去。他是一个奇怪的人。有些人说他是骗子，另一些人却认为他是预言家。有些人认为他是患有神经病的巫师，但另一些人却把他看作是哲学家中的哲学家。他本来是个极为富有的贵族，但后来只能靠供穷人的救济粮过活。他提出的一些思想，深深地打动了青年们的心（当然也包括多愁善感的费兰茨的心）。圣西门指出：过去总是一个人剥削另一个人，将来不会是这样的；大家团结起来，让我们共同去剥削大自然吧！

只是这些好思想的本身很难把巴黎青年的中坚分子动员起来。但是泰伦街的工作能够吸引年轻人。他们搞了个秘密组织。凡是参加这个组织的必须把手指放在嘴上：嘘，别作声，别到处乱讲，你参加了特殊人物的组织。这所小教堂（完全可以这样说）以它的清教徒的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吸引了爱好罗曼蒂克的巴黎青年。因为这种生活方式胜过了一切罗曼蒂克。安凡丁神父越来越公开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五年前刚刚逝世的圣西门公爵实际上是回到人间的救世主，而他则是这位新救世主的预

言家。安凡丁象希腊神一样健美高大，他用神奇的预言充实着青年听众们的想象力：

“将来终会有一天取消一切继承权。每个人只能拥有他自己创造的东西。将来终有一天，人类会发现，上帝的宗教没有任何外表、法律和仪式，它只有一个真理，这就是在人类中建立和平！”

安凡丁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调、音色、演讲姿式是那样的动人，以致在白色墙壁的会议厅（他们自己都把它叫做是教堂）中开始还只是一片肃静，后来逐渐变成了几十人和成百人极力克制的抽泣声。在这种时候，经常有些信徒猛然离开座位，把自己身上的全部财产倒在演讲人的桌子上：请把这点东西献给兄弟们，安凡丁兄弟，请你全权处置它们。

费兰茨参加圣西门派时，原来的房子已经显得太小了。他们搬到孟西格尼街的一栋楼房内。后来这栋楼也不够用了，他们又在泰伯特街租了一栋大楼，还买下了《环球》报。安凡丁兄弟身边也多了几个助手：理论家巴萨德，行动家罗德里古兹。象阿波罗一样英俊漂亮的安凡丁，仍然是宗教和仁爱的主要讲道师。

满脸油光、永远面带笑容和经常开玩笑的大卫加入圣西门派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着魔似地坐在教堂的凳子上，仿佛一个昏迷过去的人，幸福地置身于兄弟们之中，不再注意讲道的内容，而只是倾听安凡丁完美无缺的迷人声音。

费兰茨象是另外一种木头雕成的。他也激动。当巴萨德宣布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制订了一个未来国家机构的方案时，他怎能不激动呢？根据方案，这个机构由三个议院组成。第一议院的参事由二百个工程师担任，他们为国家提供铁的保证——科学。第二议院由五十个诗人和作家参加，他们为国家提供银的

保证——想象力。第三议院中有二十五个画家、十五个雕塑家和建筑师、十个音乐家。他们为国家提供金的保证——美。费兰茨也激动，但不象大卫那样。他喜欢辩论，因为他对很多论点有不同的看法。可是这里是没有辩论余地的，因为这里需要的不是论证，而是启示。

在这里，启示多得象久旱之后的夏雨一样，不断向信徒们倾注浇灌。安凡丁宣扬男女应该完全平等，并主张把男女作为社会最小的单位。一男一女，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完全一致。从此以后，安凡丁也不再独自一人出来活动了，总是带着自己肉体和精神的孪生同伴。年轻小伙子们的激情依然不变，但年轻妇女们的激情却大大减弱，因为她们发现，英俊漂亮的安凡丁已经有了女伴，不再是单身汉了。

长着阿波罗式脸孔的预言家不管是做好事还是坏事，也不管是做受人欢迎和使人反对的事，都完全是出于内心的信念。他为人正派，因此他也从来不会想到别人会认为他不正派。但是罗德里古兹、巴萨德和安凡丁也是三人执政，他们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三人执政一样，也有内部的争权斗争。巴萨德企图争取极端派的支持。罗德里古兹借口他是圣西门的好朋友，应该当第一把手。只有安凡丁从来不想争权。他是那样的纯洁、透亮，以致一个新信徒认为，他这种灵魂上的圣洁已经同愚蠢差不多。费兰茨这时才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争论的对象，他经常同这位新信徒自由地、随心所欲地辩论安凡丁的为人和圣坛的日常活动。

他们的相识是不寻常的。按照规定，信徒们应该安静地、秩序井然地、几乎象军队一样排着队退出圣坛。费兰茨已经习惯于这种隆重的仪式。但是有一次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陌生人却挖苦地说：

“我想，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普鲁士。在那里，人的神经和

脑汁已经被抽掉了，身上只剩下了一根绳子，这样可以听人任意摆布……”

“您说得太过分了，”费兰茨说：“他们是法国人。他们的心脏和神经，特别是血液循环，都是正常的。您可能不是法国人(费兰茨从他讲第一句话时就已发现他不是法国人，但他有礼貌地隐瞒了这一点)，所以用普鲁士人来衡量法国人。”

陌生人感动地举起了戴在头上的帽子。这时，灯光照亮了原来的脸影：一对聪颖、探索、感情丰富的眼睛，一个微弯但十分秀美的鼻子，一张能言善辩和喜欢接吻的嘴巴。陌生人站在柔和的灯光下，高高举起帽子表示问候，并作了自我介绍：

“亨利·海涅。”

这位陌生人真爱辩论。至少在头几天内看来是这样。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费兰茨和海涅不是辩论，而是独白。两个人都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都坚持己见，因为他们的看法是针锋相对、互不相容的。费兰茨对一切都是那么认真、严肃，而海涅却玩世不恭，喜欢开玩笑。不论是对上帝、人、爱情、仇恨、昨天、今天，还是对任何其他东西，他都开玩笑。似乎他戴的是一副特制的有色光角眼镜，在世界上看到的一切都是扭曲的、错误的、放大的。表面上看来，他只是冷冰冰地、客观地把他观察到的东西堆积起来，但是等到它们慢慢凑成张完整的画面时，却发现是一张极其滑稽的、令人惊得目瞪口呆的、非常歪扭的漫画。费兰茨虔诚地相信，安凡丁迟早总有一天会拯救整个世界。可是海涅研究过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的哲学，对这些学派中已经磨成面粉的哲学思想都了如指掌，并认为它们可以被人随心所欲地捏来捏去，所以他才不会那样轻信别人的说教哩！海涅说，什么男女完全平等，什么取消继承权和一切特权，只要安凡

丁无权使政府也同意他的主张（不仅仅是使那些轻信的人相信他的主张），这一切都只能是空话、废话！

海涅暂时变成了赫尔德咖啡馆的主角。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德国帮：被柏辽兹称之为永远睡不醒的啤酒爱好者希莱，德语讲得非常好的兰斯，忠贞不移的沃尔夫，此外还有一个新来巴黎的朝圣者、有钱有才的菲里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蒂。海涅非常高兴同他谈话，因为他就象一只上帝创造的绵羊，生来就是作为牺牲用的。菲里克斯是个虔诚的福音派教徒。所以海涅最高兴的事就是同他一起追忆他们共同的犹太出身：

"亲爱的菲里克斯，您还记得我们的大学教授，哲学、文学、语言和间谍学博士门采尔吗？他对我们可真不错呵！"

小绵羊面部表情也象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纯洁可爱，没有把握地点头表示同意。但是这个"坏蛋"（这是赫尔德咖啡馆里给海涅取的绰号）还在继续谈这件事：

"有一次，门采尔博士在哥廷根大学大厅的走廊里说，海涅先生和所有想进入德国精神世界的人在这里打出犹太国的旗帜是非常错误的，毫无道理的。年轻人，你们应该谦虚一些，你们在旗帜上也许可以写上：犹太巴勒斯坦！"

尴尬的沉默。门德尔松本来就没有血色的白脸变得死人一样的苍白。最后他总算克制住自己站起身来。

海涅这时象一个大演员一样，一下子把滑稽戏演成严肃的话剧，猛跳起身，走过去把门德尔松搂住：

"菲里克斯，亲爱的，您知道，为了开一个傻玩笑，我有时愿意让刽子手砍掉我的手……"

小绵羊这次表现得很坚定：

"亨利，我要走了，你们别拦我……"

在他找到帽子、手杖和皮大衣就要动身的时候，费兰茨突然

决定同他一起走。门德尔松显得精神很不好。他巧妙地一再避开费兰茨想把话题转到海涅身上的企图。他只谈音乐，谈同歌德的会见情况，谈他受《浮士德》启发而写的八部乐曲。这时，他再也不紧张了。他愉快地接受了费兰茨的邀请，轻松地走上修补过的楼道，非常温柔地吻了吻费兰茨母亲的手，然后极其随便地坐在一张破旧的、有几个地方已经露出弹簧的沙发椅上。他坐下去的姿式就象一个国王的后代，似乎在告诫人们，不要过分招待我，我是微服巡游，不需要任何隆重的接待。他仔细听费兰茨弹了一、两首正在创作中的曲子，然后自己也坐下来弹琴。主人的音乐震天动地，仿佛在进攻天堂和轰击地狱。而这位细腻高贵的客人却讲究天堂似的纯洁干净，他的和声完美无缺，音乐风格象经过最天才的雕刻家雕琢过的宝石一样精细准确。

尽管如此，海涅的咖啡桌还是象冰天雪地的北极一样吸引着一切指北针。虽然有很多人认为海涅是个冷心人，但聚拢在他桌旁的人还是越来越多。费兰茨并不喜欢海涅，但也很快学会了尊重他。这个德国诗人非常聪明，对人和政治的了解十分深刻。他预言道：圣西门派的圣坛将会发生问题；在炮声和枪声中诞生的新政权暂时不愿听见炮声和枪声，可是圣坛的思想却迟早会引起炮声和枪声。

有人问道：

“他们有什么借口来欺侮安凡丁？”

海涅耸耸肩：

“政府不需要借口。政府只需要权力。”

他的预言不久真地实现了。海涅只是在一点上说错了，政府还真是找了一个借口：为了维护社会道德。因为安凡丁主张，

每个人都可以试婚二、三次，然后才必须正式缔结最后的神圣婚姻。尽管内务部长、内务部的参事们、警察局长和警察局的各级军官早就实现了安凡丁主张的试婚制，而且有的还同时享受着三、四次“试婚”的愉快，尽管他们的名字同女演员、妓女、暗娼、时装女郎千百次地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就是这些老爷们向安凡丁圣坛发起了进攻。

阿波罗脸型的预言家既没有等待犹大来吻他，也没有经受罗马总督彼拉多当年把耶稣押送到十字架的痛苦，他安安静静地离开圣坛，在大门口挂了一块牌子：

“我从此隐居，带走孩儿四十人。
我的工作让其他孩儿来做。
我已经创建了教义，现在我要行动！”

但是他的学生们对这样简单的牌子感到不满足，他们又在大门口挂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的内容就大胆得多了：

“安凡丁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是各族人民的国王！

世界看见了耶稣，但不追随他。因此他现在离开你们。但我们将全心全意地同他在一起。”

在这块牌子上签字的有四十个人，其中一个是大卫。

警察部门行动非常坚决。他们用敞篷车装走了圣坛的全部设备、物件，此外还搬走了书籍、信件、帐本、收支帐单，以及大量关于人类未来幸福国家的详细计划方案。在彻底清查了圣西门

派的据点之后(有人传说,警察为寻找发动叛乱的武器,撬开了地板,拆除了壁炉,挖开了地下室),他们又去安凡丁及其四十个门徒的最后据点进行搜查。去搜查的有一个国务秘书和一个省警察局长、好几个宪兵军官和一连全副武装的士兵。国务秘书、警察局长和军官们吃惊地看到,这里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女人,简直是有伤风化。他们在政府的批准下决定彻底粉碎这个"坏人窝"。窝真给粉碎了。在这以后,他们向某些人提供了相当优厚的礼品。要把这些人关起来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为任何人都有权用自己省下来的钱,带四十个人生活在一栋农村房子里。由于无法处罚,所以只好采用"争取"的办法。安凡丁被建议在铁道部当一个负责官员。他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接受了这个职务。对政府来说,这样也就够了。那些老爷在部办公室门后都认为,任何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原则,愿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但是必须闭上嘴巴,听命令行事。

部长们对这种处理方式是满意的,因为当时政府急需要用全部治安力量去对付比安凡丁及其信徒危险得多的事件。有消息说,阿尔萨斯地区有几个人很奇怪地生了病,而且很快就死去。接着马赛、图尔、尼斯、波尔多、土伦……等地也送来了同样的报告。报告中写的病情变化是一致的:先是大吐大泻,体温降低或几乎消失,然后病人完全失去嗓音以致变成哑巴,接着是体温突然由零急剧上升到41—42度,最后死亡。

政府举行了最高级的军事会议。会上制订了防止霍乱病的计划。资本家、贵族们都逃到山区,据说高山峭壁可以挡住霍乱病菌。国防部长根据外国的经验下令大大加强巴黎的防御力量,以便应付因为霍乱流行而发生的骚乱。就在这同时,死亡之神不是在隆重的吊唁仪式和吹打声中降临,而是象发疯的老鼠一

样通过水管、地下室、肮脏的郊区院子和厕所，阴险地、偷偷地进入法国首都，伤害居民，使一百万巴黎人感到极度恐慌。

巴黎人把自己的房子都尽量堵起来。如果邮差送信来，收信人总是先用火熏一下信封，有时干脆就烧掉。水井旁边由士兵站岗，严格监督是否有人用不干净的器皿或其他坏东西污染水源。巴黎变僵了：人们不再接吻，甚至连手也不握，人们互相都至少离三步远。机关全部停止办公，成百成千的商店关了门，上了锁，门上挂着字迹潦草的牌子：本店主已迁居乡下。在各个关卡口子，人和车马排成望不到边的长队。他们都是听说首都已发现抗霍乱病的药而从乡下赶来的。为了阻止这些人进入首都，政府不得不动用大批治安部队。

二月的气候也不作美。整天不停地下着雨雪，尽管有时中午在灰暗的天空中偶尔露出玫瑰色的阳光，但严寒丝毫也没有退让……

街上到处是巡逻部队。报纸不讲话，国会议员们也不演说，但社会上在传说：贫困助长了杀人的瘟疫。物价飞涨。天气严寒。人们担心，不久前刚刚被驱散走的在贝利公爵安魂弥撒时捣乱的郊区群众又会起来闹革命。

有的地方又发生了殴斗，死伤了一些人。

严冬。在打滑的路上，丧车越来越多。后来丧车也不够了，有人只好拆房子的木板，用它做成雪橇，上面堆上三、四具棺材。

乌鸦又从农村飞入了城市，在大教堂的石雕周围啼叫哀鸣……

到处是巡逻士兵。

行人——即使在这样严重的死亡威胁下，他们仍然还是巴黎人——在街上看热闹，观察一个可怜的、被赶出来贴布告的人如何把布告贴在肮脏的、被雨雪淋湿了的墙上。他们站在这

里，纯粹是出于好奇：人们除了等待医生们拿出灵丹妙药外，谁还有胆量来宣传其他东西……

好奇的巴黎人站在贴布告的人后面，等着布告纸稍微干一点后逐渐显现出几个大黑字来：

尼科洛·帕格尼尼

一八三一年三月九日

看完后，行人又散开了。一个巡逻兵朝这里走过来。乌鸦还在大教堂的石雕周围飞来飞去，啼叫哀鸣。



第四章　玛　丽

在里切留大街的公主大旅馆前，从马车上跳下了一些情绪紧张的记者。他们看来并不害怕致人死命的流行病，都争先恐后地朝这个老旅馆的木制楼道跑去。旅馆经理只好毫无把握地前来进行劝阻：

“先生们，艺术家阁下给我下了最严厉的命令，不让任何人进去打扰他。帕格尼尼大师正在练琴……”

小提琴的声音象一种强烈的香味散发到整个旅馆的各间屋子，给人造成了奇特的印象，似乎这种声音并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象游动的灵魂一样，有时从楼上，有时从地下室，有时从前厅和走廊，有时又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起先，记者们都着了迷似地站在那里倾听，后来有个记者巧妙地躲开旅馆经理的拦阻，从他腋下钻了过去。经理还在极力用双臂挡住大家的去路，可是记者们都一哄而上，越来越靠近艺术大师或者如经理所说的艺术家阁下的房间。现在发生了巴黎新闻史上罕见的事情：记者们居然无法见到帕格尼尼，而且他们很快发现，这并不是常见的沽名钓誉，故意拖长时间，吸引记者，增加他发表谈话的份量。不，这不是策略手腕，而是可耻的粗鲁无礼。帕格尼尼不愿接待地球之王——巴黎的记者。记者们当场进行了长时间的商量，表示强烈不满，并讲了不少威胁性的话。这时，艺术大师的私人秘书乔治·哈里斯走了出来。他是非常文雅的人，活象一个疲

惫不堪、陷入沉思的英国贵族。他对这些情绪激动的法国人感到不理解。他用标准的法语说:"艺术大师非常疲劳……他接连演出了三十场,现在需要休息。请先生们原谅,因为你们也都是艺术界人士。艺术大师向你们表示歉意。"

但是记者们不肯原谅他。这些先生怒气冲冲，因为他们受到了侮辱,一定要报复。由于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他们就翻阅前几年的意大利报纸和德国报纸，找到了一些外国记者攻击这个头上有魔鬼光轮的帕格尼尼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这些报道比帕格尼尼先生几小时的当面谈话要值钱得多了。原来他曾阴险地(记者自己是有权加上"阴险地"这个词的)刺杀争风吃醋的对手,因此坐了八年牢。在监狱里无事可干,唯一的娱乐就是拉破旧的小提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稍微学到一点东西,是不足为怪的。

当然,新闻报道是种竞赛。既然有人写了这样精彩的报道,那别人自然也不会甘居落后。于是又有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后来发展成为一部奇妙的巴黎短篇小说：帕格尼尼同魔鬼歃血为盟,建造了秘密的地下监狱,演奏魔鬼念了咒的魔琴……巴黎开始是嘲笑、惊奇、害怕,最后真相信了迷信的说法,说什么不是艺术大师来访问遭受瘟疫灾害的巴黎，而是瘟疫跟着魔鬼的小提琴到处作祟!

新闻竞赛远未到此结束。记者们还发现，帕格尼尼爱钱如命,心胸狭窄,极端自私。他走遍了欧洲，到处都看到了遭受贫困和苦难的人,可是他从来也不可怜他们。由于自私,他把聪明的拉丁成语"先为我干,明天再为你干"改为"今天为我干,明天、后天、永远为我干"。

一些版画家也在为报纸的愚蠢行为推波助澜。橱窗里挂满

了生编硬造的画片：帕格尼尼在监狱里……帕格尼尼在法官面前……帕格尼尼用小提琴软化看监人的心……

艺术大师被迫发表言词激烈的声明为自己辩护，斐提斯主编的《音乐评论》全文予以刊载。但这场攻守战斗不是势均力敌的。日报有几十万人阅读，而《音乐评论》只有几百人看。使用的武器也是不一样的。记者们给人的是又酸又甜的骗人的甘露酒，而帕格尼尼给人的却只是清水——真实情况！尽管他列举了他在米兰、罗马、波伦亚、德累斯顿、莱比锡和其他许多城市举行的义演音乐会，但是人们不会因为喝清水就醉过去。而充满了鲜血、眼泪、剧毒、爱情、死亡和苦难的报道却很容易使人昏迷不醒。看来社会舆论也起来反对帕格尼尼了。有许多人谴责他的演出，理由是在这样严重的民族灾难之际搞音乐娱乐只能是对死者的残忍。不管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决定抵制帕格尼尼的音乐会。

三月九日晚上七时，歌剧院门前车水马龙。人们突然忘记了瘟疫和誓言，忘记了帕格尼尼许多血腥的冒险经历。那些曾经相信自己誓言而没有买票的傻瓜现在到处设法搞座位，那些轻信谣言的人在存衣处前挤来挤去。现在如果能搞到一张加座票，在包厢里加一个座垫或者在角落里弄到一个平时是穷人坐的位置，他们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楼下第一排坐的都是艺术家：费兰茨、希莱、克鲁采尔、乌尔汉、卡尔布莱纳、马萨尔和令人害怕的批评家斐提斯。另外还有奥伯、伯尔蒂、门德尔松、海涅以及文学艺术家茶会的几乎全体成员。雨果没有来，因为他不喜欢音乐。但仲马、戈蒂埃、巴尔扎克和另外几个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代表茶会。包厢全被上层社会人士所占据。他们虽总共只有几百家人，但却能用刀剑和银行钥匙管理全国。那些首先在

巴黎出名的天仙般的漂亮女人、法国首都最美丽的交际花、演员、作家、音乐家以及所有梦想将来有朝一日能取代上层社会人物的资产阶级市民全都来了。歌剧院所有的吊灯全亮了。尽管还只是蜡烛，但是这么多光合在一起，照射在女人的绸衣和首饰、男人的白衣领、勋章、肩带以及包厢沉重的丝绒帘的金丝穗带上，闪闪发亮，反射的光几乎可以刺瞎人的眼睛。这是一幅无比华丽的图画！整个剧场象一张巨大的嘴，不断发出各种声音，一会儿溶合在一起，一会儿又分散成为说话声、笑声以及乐队的调音声。

过了一会，剧院服务员整齐地排列在剧场大厅两旁，同时熄灭灯火。大厅内光线暗了下来。乐队开始演奏序曲，好象有一组声音在黑夜中走错了路，心惊胆战地向人的耳朵和心灵寻找出路。这种情景使大家感到大厅更暗了。大提琴声音沉闷，小铜管节奏含混，序曲总算完了。听众席中发出了勉强的、不得不鼓的掌声。这时大幕徐徐拉开，台上空空的，就等帕格尼尼出来。场内一片沉静。有一个乐师紧张地拿起小提琴，用手指敲了一下它的背面。但就是这么一点声音，其效果却象是一颗手榴弹爆炸。

一片肃静。

台上空空的。

过了一会，一个长长的身影出现在台上，艺术大师胆怯地，几乎是笨手笨脚地走了出来。这根本不能算什么艺术家的亮相。他站了一会，低着头。仿佛在品尝、体会来自听众席的热流。他站在台上，听大家鼓掌。一丝奇特的、顽皮的微笑扭歪了他那张瘦得可怕、白得发黄、痛苦万分的脸。但就这点微笑也反映了胜利者的心情：你们到底还是来了……你们还是来听同魔鬼狼狈为奸、该下十八层地狱的囚犯拉小提琴了……

他继续听了一会掌声，然后用下巴夹住小提琴。它看来是那样沉重，似乎肩膀会压塌，膝盖会折断，脚也站立不住。他紧紧咬着嘴唇，只露出有力的鼻子和坚定的下巴，然后慢慢举起拉弓，轻轻放在琴弦上。琴声犹如金蛇狂舞，使人眼花缭乱，喘不过气来，听起来好象不是一个乐器，而是整个世界在歌唱，似乎魔琴已破掉了不许物体发声的一切咒语。

听众中只有费兰茨真正懂得表演台上的全部奥秘。他了解每一个动作的份量。他知道，笨拙的谦虚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艺术家胜利的、信心不足的表情也会有相应的良好效果。他明白，半明半暗、简单朴素的舞台，富丽堂皇、衬托演员身份的光线和布景对听众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也了解攻击文章和捧场报道的作用：如果把一个艺术家绑在报刊公开言论的耻辱柱上，它会引起复杂的反感；不断地吹捧颂扬，则会使听众丧失独立思考能力。

费兰茨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坐在椅子边上，象猎人一样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用所有的神经和全部的精力观察帕格尼尼的每一个动作。“小动作”可以迷惑别人，但是欺骗不了费兰茨的耳朵。他很快就发现，帕格尼尼拉了几个小节之后，开始变奏。他打破了传统的音阶，以便更广泛地、更大胆地运用全部音域中的音。费兰茨还发现，帕格尼尼的左手不仅仅是艺术精湛的小提琴家的手，而且也是吉他演奏师的手。这只象闪电一样迅速，象丝绒一样柔软的巨大的左手不仅仅是按着，而且是用吉他演奏师的手法弹着琴弦。帕格尼尼的琴弓简直是根魔杖！它先是狂舞，拉出从未听见过的声音和节奏，后来又慢慢在空中滑动，迫使听众随着曲调的升降呼吸，迫使听众同演奏者一起叹息、心跳。帕格尼尼以超人的艺术给听众以最大的音乐享

受。大家的思想不管怎样也摆脱不了他的魔法，只能围绕着一个形容词转，这个形容词就是"超人的"。

费兰茨在倾听。用全部的神经倾听。他觉得，他终究会弄清楚帕格尼尼的秘密，因为他已经慢慢明白艺术大师使用的是什么武器。但过了几分钟后，他又发现帕格尼尼欺骗了他，使他走上了迷途，其实真正的奇迹只是现在才刚刚开始……！小提琴变成了管弦乐队：笛子在吹，吉他在弹，中提琴在拉，人在用窒息的声音讲话（好象是在哭泣，又好象是在欢笑，声音奇怪而嘶哑，分不清是欢乐还是痛苦），铜号在响！尽管这对音乐家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确实是铜号的声音！接着是柔和的竖琴声，以后又变成了细软的小提琴声。但是看来这也是一个陷阱：你以为现在已经最后抓住艺术大师了，已经知道他的全部魔法了？不，你听，他又拿出了新的东西，他摘下了三根弦，仅剩一根G弦在那里独鸣。这是什么样的弦，什么样的拉弓呵！是哪个狂人在那里把全世界的痛苦、愤怒、讥讽、对美的追求和恶梦的惊恐统统集中在一根弦上呵?!

费兰茨放弃了斗争。他发现：帕格尼尼的秘密不是和音，不是那只弹吉他的左手，不是交响乐队的音色，也不是万能的G弦。这里完全是另外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拜伦只是梦想到曼弗雷德① 和孤独的恰尔德·哈罗尔德②。雨果也只是在艺术的想象中看到了那个反对整个可恶的社会但又企图征服它而被永世流放的欧那尼③。雨果和拜伦都只是梦见了自己的英

---

① 曼弗雷德，诗剧名。英国拜伦作。写孤傲的伯爵曼弗莱德企图解脱由于幻想破灭所带来的痛苦，反而陷入失望，终于走向自我毁灭的故事。

② 恰尔德·哈罗尔德也是拜伦作品中的人物。

③ 欧那尼，话剧剧本。法国雨果作于一八三〇年。写贵族出身的大盗欧那尼与有杀父世仇的国王卡洛及公爵吕古梅同时追求公爵侄女素儿时，互相争夺又互相宽恕的故事。此剧于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初演成功，标志着法国文学史上积极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

雄，而帕格尼尼却把生活本身变成了小说。抓住人心的不是和音和G弦，而是那种超人的努力，是那种想超过艺术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超越一切习惯势力和一切技术手法，超出小市民称之为人的极限的努力。他的秘密核心不是和音与G弦。这个皮肤黝黑和以其魔法而闻名的小提琴家告诉所有的人，告诉所有手中拿着琴弓或羽毛笔的人，弹钢琴或指挥乐队的人，想发明新机器或发现新大陆的人：没有界限，不能停止，必须创造新的世界；即使这个新世界在刚开始发现时还是荒凉的、令人恐怖的，也不要害怕；要坚持下去，以后会有别人跟上来，用新的美和新的意义来充实这块新的土地。

掌声象大风暴中的海潮一样。接着又是一片沉寂。当时的目击者伯恩写道：人们都想尽量少呼吸，最好是让心脏停止跳动，以免放过任何一个音符和节奏。费兰茨颓唐地坐在椅子上，努力在分散的思路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从今以后，艺术必须改变；必须创造新的和声、新的音色、新的力度、新的旋律、新的形式和新的实质；我必须赶上帕格尼尼，一定要爬上他已经爬到的高峰，然后再上一层楼；他是标准，落在这个标准之下的东西都是永远过时的东西。

他奋斗了两个月。

目标是掌握帕格尼尼的音乐，掌握它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把帕格尼尼音乐中抓不到也摸不着的仙绸编织成钢琴曲子。

搞出来的初稿真是令人丧气。费兰茨的耳朵是绝对正确的，它能够在钢琴上准确地记录下帕格尼尼音乐会的情景。但小提琴弦上丰富多采的艺术到了七个半音组的钢琴上却显得十分贫乏。过了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但是在那个时候，费兰茨是费了多少心血才最后找到解决办法的啊！

单纯模仿就是失败。必须创造！必须创造新的，完全新的。帕格尼尼只是指南针，但绝不是不可改动的样板。应该象帕格尼尼扩大小提琴音域一样，扩大钢琴的音域，要唤醒沉睡在钢琴中的管弦乐队。要大胆地制造雷电，唤醒别人不敢去碰一碰的琴键。不能再只限于弹出委婉流畅的声音了！钢琴必须与铜号、铜管和整个弦乐队竞赛！不要怕，大胆地唤醒沉睡的交响乐队吧！既然帕格尼尼只靠四根弦就能表现劳拉和曼弗莱德，你用钢琴的千弦乐队可以向全人类来歌唱整个世界。

他把所有的笔记本都撕碎了。撕碎了全部精细地"忠于"帕格尼尼原著的笔记本。一切都从头开始。他的音乐纺织机越来越能干，越来越使人惊讶。他在工作过程中吃惊地发现，钢琴中蕴藏着极大的可能性。它的音阶可以快速变化，音域可以扩大一倍、二倍、三倍，特别是它可以发出千变万化的持续音，使钢琴这种琴键乐器展示出崭新的面貌。这已经不再是室内音乐中雅致的古钢琴，它同头戴假发的音乐家们所弹的小风琴也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这是青年李斯特·费兰茨使用的新乐音，它使钢琴从此成了管弦乐队的竞争者。他还发现了新的颤音，它们能象刚开瓶的香槟酒一样起泡闪光，发出火花。这就是李斯特—帕格尼尼令人头眩眼花的新艺术手法，是他们两人装饰声音的新技术。

在勤奋的劳动过程中，他体会到，好几年前就开始怀疑的事是有根据的：他从值得尊敬的车尔尼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大部分已经过时了。两肘紧夹着腰部，圆胖好看的手指头，小心翼翼的持续音，反对使用强音的中庸之道，都已经过时了。唯一的规则是：自由！必须摆脱一切自我束缚、陈旧传统、学究习气和胆小怕事。你唯一的规则就是完全的自由。一切都应该自由地去创造，你应该全心全意地、用你全部的美梦和痛苦去进行自由的

创造。

一切都应该自由地去创造。

但只有一条不行：你不能变得比生活在这个美丽、野蛮、不断变动和突飞猛进的世纪的人小一些、矮一些。

他写给彼得·沃尔夫的信是最坦率的自白：

“我的精神和我的手指不断地工作。荷马史诗、圣经、柏拉图、洛克、拜伦、雨果、拉马丁、夏多勃里昂、贝多芬、巴赫、洪梅尔、莫扎特，都在我的身边。我热忱地研究、思考、吞噬他们。此外，每天还要练习四、五个小时。只要我没有发疯，你下次来的时候，会发现我成了艺术家。是的，是艺术家，是你希望的和现代音乐需要的艺术家！”

“我也是画家！当米开朗琪罗第一次看见一张好画时，就曾经这样叫过。（注：米开朗琪罗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句话是柯勒乔说的。）自从听过帕格尼尼的音乐之后，你渺小而可怜的朋友经常重复这个伟大人物的话。他真是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小提琴家，了不起的艺术家！我的上帝，在这四根琴弦里，隐藏着多少激情、苦难和折磨呵！”

“我的好朋友，我是在发狂的冲动中写下最后几行的：过累的工作、经常的熬夜和无穷的愿望使我可怜的头象火烧一样痛，我从右到左，从左到右，来回折腾，唱歌，朗诵，演讲，大叫，总之，我发疯了。今天，灵魂和肉体稍微正常了一些。不过灵魂的火山并没有熄灭，它只是隐藏在地壳下。”

同当时的任何人一样，费兰茨从来没有怀疑过：伟大的作品只能产生于无限的和极度的痛苦之中。这种观念已经不只是时髦，而是十九世纪精神生活的处世学。而除了鹰型头的柏辽兹之外，还有谁能够更好地证实这一点呢？他来到了，确切一些讲，应该是他冲进了费兰茨在普罗汶斯街的住宅，热烈亲吻了费兰茨母亲和费兰茨，然后跪下一条腿向钢琴表示问候："呵，你是天才思想的黑色摇篮……。"他很快就向主人表明，他已经知道了一切：帕格尼尼的音乐会，圣西门主义者的失败，海涅的到来，门德尔松的表现。他同门德尔松曾在罗马结成生死之交，后来又变成了相互的死敌，但不久又重新建立了至死不渝的联盟。不过对这些往事的追述都还只是前奏曲。真正要讲的事还在下面：上帝般的卡米尔已经变成了女妖。他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就介绍了整个过程。

"内衣贩子、卡米尔的母亲莫克夫人写信通知我说：她已把卡米尔的贞操和终身赠送给巴黎最大的富翁之一普莱耶尔。这个家伙还是埃拉尔德家的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我很快就作出了决定。"柏辽兹阴沉地冷笑说。"我弄来了匕首、鸦片和毒药。但这还不够。于是我又想法搞来了一个年轻女仆的全部设备：纱头巾、白外衣、布便鞋和花坎肩。总之，我搞到了一切能使我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这个叛徒女妖家的东西。我偷偷溜出梅蒂基别墅，手里提着一个箱子，里面装着我全部的行李，其中当然也包括女仆的衣服、匕首、鸦片和毒药。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总之，我在车上打了一个盹，直到转车后很久才发现，箱子、衣服、匕首、鸦片和毒药全不见了。我的脑袋炸裂了，我那发火的舌头干涸了。就在复仇之神的神庙门口，我的武器被别人偷走了。于是，我赶忙跑到旧货摊去搞新的装备。我往海边走，因为我想走水路也许能够避免别人侦

破我的计划，破坏我的复仇行动。我到了海边，当我看到美丽如画、一望无际的大海时，我突然又想起了另一种更好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该杀掉女妖，而是应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活着有什么意思？我这种人在世界上是不会建功立业的。我还没有结婚，而且将来也不准备结婚。我的脑袋象撒哈拉沙漠一样，它已经被苦难生活的无情阳光烧干了。最好还是去死！我吞了一点鸦片，然后安安稳稳、幸福甜蜜地昏睡过去。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究竟是睡了几个小时还是几天。等我一觉醒来，我发现抛弃生命是十分愚蠢的事。就在这一时刻，我脑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思想：把《幻想交响曲》写下去，向生活告别……我一定要写下去，题目也有了：《莉丽奥》或者是《回到生活中去》……”

费兰茨总算有机会插了一句：

“您最后到底同卡米尔谈过没有？”

他傲慢地耸了耸肩：

“我已经把她忘掉了。象忘掉一枝毒草一样。因为永恒的奥菲莉娅、永恒的朱丽叶又重新占据了我的心灵……我想，我最好还是同哈里埃特交个朋友。”

接着，柏辽兹转弯抹角地向费兰茨发出了一项邀请：

“亲爱的莱尼(莱尼是夏多勃里昂所创造的人物，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骑士)，您知道自己是个非常漂亮的美男子吗？”

“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那我会感到很难为情，因为人们说，美男子都是很愚蠢的。”

“有一个女人对您非常关心。她不是个普通女人，而是巴黎最美丽、最风趣和最聪明的女人。”

“我能知道她是谁吗？”

“玛丽·道格尔特。我已答应她，今天我将带您去参加女伯

爵的晚会。”

费兰茨心思重重地说：

“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柏辽兹脸上闪出光亮：

“没有关系，有我哩。我希望，您将感兴趣的不是伯爵老爷，而是玛丽夫人。她是弗拉维格尼的女儿。弗拉维格尼是法国一个十分能干的古老家族，是同臭名昭著的阿托伊斯伯爵一起流亡国外的家族之一。那时，弗拉维格尼侯爵还是一个英俊可爱的未婚青年。他的舞跳得特别好，因此而得到许多人的捧场。他的一个支持者建议他去拜访银行家贝特曼。贝特曼是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非常有钱。如果一个弗拉维格尼家族的人登门拜访他，那对他将是莫大的荣耀。因为弗拉维格尼的祖先曾经同圣路易国王一起为十字架浴血奋战过。侯爵本人不仅长得英俊，会跳舞，而且很聪明。他真去拜访了贝特曼。贝特曼小姐只是看了一眼圣路易国王时期的勇士后代，就一见钟情。但是法兰克福的市长却不是这样想的。他非常害怕法国人，他下命令立即逮捕所有曾为路易·特莱莫尼克公爵拼凑过反革命部队的人。于是我们的侯爵也进了监牢。当时，如果不是一位面戴黑纱的小姐在他进监后几个小时就通过监狱长的关系，同他一起在牢中度过一个小时，那恐怕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他后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也许早已经上了断头台。她出监以后揭开了自己的面纱。原来是贝特曼小姐。她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以迫使父母同意英俊的侯爵同这位大富翁的小姐结婚。弗拉维格尼在拿破仑极盛时期回到法国。老贝特曼已经不在人世。贝特曼小姐用父亲的财产在土伦（圣路易国王勇士们的出生地）为她们夫妇购置了大量土地和庄园。他们在这里生了两个孩子：莫里斯和玛丽。玛丽还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诱

人的小姑娘。这一年，她们全家回法兰克福老家探亲。小姑娘被介绍给正好路过法兰克福的歌德。歌德亲切地抚摸了她极美的金黄头发，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不是伟大诗人的这一亲吻使小玛丽起来造了母亲的反。弗拉维格尼侯爵去世后，玛丽表现得过分自由放纵。吓得要死的弗拉维格尼夫人，即前贝特曼小姐为了防止女儿重复她自己年轻时做过的疯事，不顾自己是个顽固的福音派教徒，硬把玛丽送进了圣戈尔修道院。但是修道院里更拿她没办法，只好又把她送回家。在这里又度过了对母亲来说充满了紧张、担心、害怕的五年。最后总算来了一位救星。这就是道格尔特伯爵。他虽然比玛丽大二十三岁，但用社交语言来说，他还是一个'从头到脚的真正男人'。这也就是说，他是赛马俱乐部扑克桌上的常客，在歌剧院有长期包厢坐位，同芭蕾舞团的某位二流女演员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当然，他也出席赛马活动，有时还亲自骑马参加比赛。他有些动作连社交生活的老手也不能不感到佩服：一走进大厅，昂着头，环视周围，好象是在找一个配得上他的伙伴，也好象是在问，嗯，这里还有没有同我一样鹤立鸡群的人物？他和妇女们谈话的姿式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腰和膝略微弯曲，以便缩小他高昂的头同迷人的妇女秀脸之间的距离。必要的时候，他也屈膝下跪。所以人们认为他是'从头到脚的真正男子'，并不是信口开河。他同玛丽结婚的手续非常复杂。弗拉维格尼家族的法律顾问同道格尔特家族法律顾问之间的争吵比查理·道格尔特伯爵追求玛丽的时间要长得多。有什么办法呢？他需要大量的钱，只有在保证他能够过老爷式的生活的情况下，他才肯结婚。双方的律师最后总算达成协议。伯爵把美丽的玛丽带进了他祖先留给他的别墅，但只是在那里度过蜜月。因为丈夫和妻子都非常厌恶这座早已荒废的古老城堡。”

伯爵本人并没有出席玛丽的晚会，尽管主妇一再强调说，"这次晚会的参加者全是自家人……。"客人倒是只有三十来人。其中有著名的文学历史学家勒古韦，他详细地（如果不客气的话，应该说是枯燥地）介绍了法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太阳大帝的史诗。出席的还有同玛丽早就相识的巴尔扎克。尽管如此，这次晚会的主角还是一位来自乡下的神父。他在这种金碧辉煌的社交场合下仍然保持着他的农民本色：脚穿农民高统靴，上面还沾着泥巴；身穿神父大黑袍，即使没有经验的人也会发现上面的补丁是农村妇女的粗手活。只有他的头同这一幅田园画不大相称。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铜铸般的头。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上有两只炯炯闪光的眼睛。眼珠晶亮，几乎是透明的。他的眼光照着谁，谁就会成为俘虏，再也摆脱不了它的魔力。还有那张嘴巴！这是沙沃纳罗拉[①]情绪激动而能抓住人心的嘴，它能象最了不起的演员一样讲话，发出从温柔的窃窃细语到雷鸣般的狂叫大喊的声音。在柏辽兹和费兰茨走进大厅时，他正在阐述某种复杂的思想。两个年轻人刚迈进门，他就站了起来，好象是在强调他的最后几句话：信仰和教会，这是两种不同的磨盘……！前者由上帝注水，后者由魔鬼注水！

费兰茨听到这些话猛吃一惊，不自觉地拉住柏辽兹的胳臂，似乎想找什么支撑点。但这时主妇已经迎了上来，他只好继续往里面走。尽管玛丽·道格尔特女伯爵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特别是今晚她作了长时间打扮，显得格外光艳照人（衣服、首饰、发式、香水以及其他单独或相互陪衬的装饰都十分协调）；因招待客人的紧张倒反使她皮肤微黄的这唯一的缺陷消除了，她

---

① 沙沃纳罗拉（Savonarola Girolamo, 1452—1498），意大利传教士。因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和高级僧侣的腐化堕落而被作为异教徒烧死。

那古典美人式的脸孔上露出了一点点玫瑰色，因而今晚变得分外美丽，但是费兰茨在讲了几句客套话和必须说的恭维话后，马上转向神父：

“我是李斯特·费兰茨。能认识您一下吗？”

虽然李斯特的个头也不小，但是铜头人比他还要高出两头。铜头人伸出了两只巨大的农民手：

“我是拉曼内斯神父。”

费兰茨象个马上想得到玩具的孩子一样，贪婪地抓住神父刚才讲的话题：

“您刚才谈到信仰和教会，似乎一个代表天堂，另一个代表地狱。我不得不指出，我认为您的看法是令人害怕和不可接受的。”

拉曼内斯把炯炯有神的、带着命令似的目光射向年轻人：

“这样激烈表示抗议的人，内心中不仅有着深深的信仰，而且埋藏着更深的怀疑。这是合乎事物的逻辑的。只有信仰的人是蠢人。只有怀疑的人则是孤独不幸的人。信仰和怀疑结合在一起，就如同两只翅膀，能够使人飞向高空……我不想把这个亲切的场合变成一般谈论哲学的娱乐活动，所以建议另找机会讨论这个问题。请您来找我，也许更合适的办法是上帝的小仆人去拜见您。我答应决不回避争论。现在我请您为我们弹点什么，作为我们友谊的保证。”

年轻人没有作任何推辞的表示就走向铺盖着金色绿丝绒的钢琴。两个差役很快就拿开了丝绒罩，打开了琴盖。费兰茨坐下略加思索后，开始弹奏帕格尼尼的一首改编曲。实际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试演他改编的钢琴曲，因为在室内进行加工改编和在大庭广众面前演奏是不一样的。在家里试验时，总是要考虑各种各样的技术表现手法：新式指法、腕法和臂法，双手弹琴

的颤音效果，音阶变化的影响，所有这一切会束缚人的手脚，但使人得到娱乐甚至满足。而现在必须采取另外一种表现手法。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设想，真正的效果应该是至少有一个人叹口气道："这好象是帕格尼尼在亲自演奏；甚至比帕格尼尼的演奏还要好！"

钢琴旁站着两个人：神父和玛丽。主妇希望对费兰茨表现得更亲切些，自动放下多年来在自己身上养成的架子。可是要放下架子如同行星要脱离轨道一样，谈何容易。玛丽自己认为已经是十分亲切了：

"我听过许多最有名的艺术大师的演奏。象您现在这样的演奏也是很出色的。"

这是只能用鞠一躬来表示感谢的生硬恭维。玛丽很快就退后一步，让神父来表示点什么。神父比主妇要聪明些，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用两只巨大的木头根似的手抓住艺术家的右手。

不久，在巴黎的沙龙生活中爆炸了一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爆炸一、二次的小炸弹。这种好玩的、令人惊讶而不是令人害怕的小工具被人们称之为"社交丑闻"。造成这场"丑闻"的是奥黛尔，她另外一个名字叫劳帕鲁纳蕾德。同平时一样，奥黛尔又迟到了，服饰不大整齐，头发也有点乱，似乎是刚从哪家爱情窝里逃出来。但她还是很有魅力。她一来就奔向费兰茨，独占了这个漂亮青年，并且直截了当地说：

"我早就想认识您了。"

"这是我的荣幸。"

"别来客套，我讨厌这种东西。您老老实实地讲真心话：对我们这次会见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我真是十分高兴。"

丑闻实际上从现在就开始了。奥黛尔夫人有一个极为富有的丈夫。她家在巴黎有华丽的宫殿式楼房，在乡下有几千公顷土地，还有一个城堡（关于这座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鹰巢已经传出了许多传奇式的故事）。尽管她有这样的社会身份，但她的语言却是那样粗鲁和明确，简直就象巴黎郊区的一个流氓在讲话：

“哦，您这样年轻就象个摇摇欲坠的老头那样讲话，不觉得难为情吗？”

奥黛尔生气地跳了起来，装着恼火的样子（至少在别人看来是这样）轻轻对费兰茨说：

“明天下午五点钟到我家里去……没有别人。如果您不见怪的话，只有我们两人……！”

现在他在生活中第一次遇到了以后经常发生的问题：时间……怎样才能够使二十四小时都被用上而不至于浪费一分钟呢？！时间呵！因为他既要无愧于教授和艺术家的称号，同时又得经常进出于最高级的沙龙，另外还要满足奥黛尔的要求。她的热恋和无耻使她无暇顾及男女仆人、门房和无数其他佣人（甚至包括她的丈夫和派来监视她的叔母），天天请他吃饭，含着眼泪坦率地供认，她感兴趣的不是钢琴艺术家和作曲家，而是男人。费兰茨还得应酬一些朋友，因为柏辽兹几乎每天都冲到他这里来，给他讲述自己的胜利和失败。最后还有一次大型演出。柏辽兹将在音乐会上演奏《幻想交响曲》或《莉丽奥》，即《回到生活中去》。费兰茨当然得陪着他一起排练（费兰茨一边排练，一边叹息时间太少），并参加哈比内克指挥的这场音乐会。

《幻想交响曲》是成功的，现在该轮到《莉丽奥》了。音乐中的独白由优秀演员波卡基朗读。显然是在柏辽兹的同意下，波卡基化装成令人发抖的批评家斐提斯：山羊络腮胡，在正当中分

梳开的头发，一绺法国式的小胡子，从一副人人都熟悉的大眼镜后透出教授锋利的目光。波卡基用斐提斯的腔调讲话。他用词是那样干脆和粗野，真只有一个从死亡中回来的人才能说得出口："现在我们想谈谈所谓的批评家先生们，破旧教堂里的穷神父们，乳毛未干的、不成熟的理论家们和其他各种年龄的老小丑们！"

费兰茨怎么也不同意与斐提斯争吵。但柏辽兹是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对他来说，只要斐提斯写过他什么坏事，那斐提斯就得完蛋！费兰茨徒劳无益地向他解释：批评家虽然也有错误，但他终究不是一般人。费兰茨曾经在大学听过斐提斯（费兰茨是个终身好学的人）讲课，他发现斐提斯已经找到了一条可能把十九世纪的音乐带出死胡同的曲折小径。斐提斯认为，声音王国的疆域是无限的，声音的有机结合和亲缘关系，声音的相互依赖和互相排斥，可以用无限的手段来予以表现。伟大音乐前辈们在处理声音时十分节简，注意分寸，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只使用了相互间最接近的声音和最能信手得来的声音，这符合古典世界的严格音乐的要求。但现在人类世界扩大了，人自身也变得更加大胆了，他们不断地抛弃旧的法律，创造新的东西。今天，在不断发生地震的新历史时期，必须改变音色、声音亲缘关系和相互依赖的法律，任何声音，任何音域都是可以使用的，因为艺术的标准不是成文的法律，而是抓不住摸不着的天才。

费兰茨很愿意听斐提斯讲的课。当然他总是谦逊地坐在后面几排的位置上，免得引起讲课人的误解，以为他是想讨好批评家。他很愿意研究斐提斯的全音域理论，但他同时也认为，主张这种理论的人同实践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位杰出的教授在讲理论时是那样地大胆，也许已经发现了通向未来的道路，

但面对活音乐的真正革命者时却又完全成了一个瞎子和聋子。他不仅不理解柏辽兹，甚至也不理解贝多芬。他在一次讲课时曾经说过，《第五交响曲》的某些部分需要进行修改，以便保持更纯洁的音响效果。

不管怎么说，斐提斯虽然也有缺点，但终究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提出了一些值得考虑的思想。用演员、化装和侮辱性的语言来对他搞这种庙会式的滑稽戏是不对的。

但同柏辽兹是无法辩论的。他只知道爱和恨，要就是爱，要就是恨。费兰茨劝他稍微冷静一点，至少是在他站住脚和生活多多少少比较有保障之前，不要这样冲动。可是柏辽兹把火热的手掌放在费兰茨的手上，说：

“本来在地中海边的时候，我就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命运注定我必须活下来，以便我永生永世为《朱丽叶》服务，使它具有不朽的艺术力量……”

时间……时间……时间！

所有的人都想占用他一点点时间。有些好朋友还不满足于这一点。拉曼内斯神父每星期要来两三次。他的铜雕式的身子一出现在小小住宅的门口，安娜和费兰茨就感觉到这个肩宽有力的大个头把所有的房间都填满了。拉曼内斯很谦虚，他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长时间地听年轻主人练习钢琴。他只是在休息时才讲几句话，而费兰茨心中明白，这个铜人就是为这点休息时间才来的。在这种时候，他们常常进行交谈，有时实际上是角斗。神父想争取一个人的灵魂，使出了全身的招数。原来他也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他对过去的和新近的钢琴艺术都了如指掌。他不仅了解教会文学的作家，也了解世俗文学的作家。他具有同雨果一样的幽默感和狂放的幻想力。他讲话的时候，嘴

巴、鼻孔和双手都会奇怪地哆嗦起来，给听者的印象是：这是一台烧过了头的蒸汽机，它任何时候都可能爆炸。他们在进行角斗。但是力量很不平衡。费兰茨维护的多半是由于习惯而不是由于信仰才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天主教教义以及在圣西门主义者圣坛里学来的、还没有很好消化的几条原则。而神父却动用了一整套论据和思想："整个世界是为了表现上帝的存在而存在的。上帝的存在并不表现在已经变成迷信的拉丁谶文，也不表现在使人们想起贫穷无产者的眼泪和汗珠的神父大袍、绸带和丝绒。上帝的存在并不反映在教皇圣旨、教会书信、束缚人类灵魂和肉体的教令之中，而是反映在无边无际的山川、海洋、陆地，特别是人的劳动之中。只有劳动才能把人自身改变成为上帝的样子。艺术家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只有当艺术家不愧于上帝门徒的称号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艺术家向人类指明一切。艺术家能够指明上帝的创造和人的命运之间的神圣关系，而且只有天才闪现出来的光辉才能做到这一点。唯有艺术家才有足够的力量撕下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装甲假面具，撕下强加在耶稣基督脸上的假面具。只有艺术家才能撕下这种假面具，向人类说明，我主耶稣是穷人的救世主，贫困者的援助者，劳动者的鼓励者，高尚心灵火焰的点燃者，善良人的保护者，天堂上的圣洁绵羊……"

拉曼内斯还带着青年朋友去巴黎郊区散步。费兰茨在这里学会了在上层社会的太太、先生当中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字。这个字并不大好听，听起来令人反感而不是使人喜欢。谁要用手碰着它，它会使人感到又湿又凉，浑身起鸡皮疙瘩……这个字就是贫困！拉曼内斯带他参观了臭气扑鼻的地下室。在这些地方拥挤地睡着二十到三十人。他们躺在那里并不象人，而是象一批堆积在一起的木头。神父带他访问了一些穷人家的孩子。

他们还没有学会说话，但是已经学会了劳动。拉曼内斯还带他看望了一些妇女。贫困夺去了她们的一切：微笑、青春、美丽、魅力，唯一留给她们的是母老虎般的狂野和愤怒。拉曼内斯在讲道方面是不知疲倦的：你作为艺术家，如果不为人类奋斗；如果在千百万人把苦痛的脸转向你时，你忘记去抚摸它们；在同那些应当对人类的腐化负责的人斗争时，你忘记紧握拳头，那你就只能是社会的可耻寄生虫！

时间……时间……时间！

每个人都想占用他一点时间。德国派也没有放弃这个打算。希莱、门德尔松、兰斯、海涅都来看过他。海涅又气又恼地质问越来越少露面的费兰茨：亲爱的，您究竟钻进了哪一条死胡同？您已经在圣西门主义的死胡同中走过一段路了。现在看来您又走进了虔诚神父讲道的死胡同了。费兰茨也不是一个谨慎的辩论者。他年轻气盛，平时总是寻找而不是避开辩论。他尖锐地回击说：您同我一样，大致上也走过同样的道路，不过在我心中还抱着希望，用但丁的话来说，我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找到真正的道路……

对海涅是无法生气的。他是个迷人的精灵，他甚至能使那些了解他一切弱点的人也眼花缭乱。他写过许多出色的音乐评论文章，尽管他好多次都没有去音乐会现场，但他的特别天才使他仍然感觉到了现实。他在给德国读者的讽刺性的通讯中揭露了巴黎，同时又用美妙的诗歌批判了德国的小器、残忍、吝啬和愚蠢。对海涅是无法生气的。他是大自然创造的云彩，有时它用温水灌浇大地，有时用闪电吓唬人们，有时又用它乌黑的丧色把大自然遮盖起来。对另外一个好朋友柏辽兹也是生不起气来

的，尽管他坚持不渝地反对斐提斯，反对费兰茨认为的是当代最独具风格的教授。费兰茨仍然经常去听斐提斯的课。斐提斯则把学生引向中世纪的教会音调、希腊旋律、原始音色以及作为古音乐基础的四度音阶。起初，这些思想看起来都是些空洞理论和毫无意义的矫揉造作，音乐实践家根本无法去利用它们。不过费兰茨是个愿意思考问题的人，他在这些理论的后面看到了充满紧张和变化的现实生活：现代音乐的旋律体系不可能永恒不变，因为它的后面也有几千年的发展阶梯；未来肯定还会建造新的阶梯，我们的今天只不过是无限增高的巴贝尔塔中的一层。

柏辽兹对所有这些理论只是耸了耸肩：他讨厌斐提斯，因为这是个顽固不化的老混蛋，不管他干什么、说什么，都只能是一个至死不悟的敌人的吠叫；费兰茨不应该去研究这个伪学者的骗人理论，而应该尽快地写好《幻想交响曲》的钢琴曲，准备参加联合音乐会。在这次音乐会上，费兰茨演奏了韦伯的曲子。柏辽兹演奏的完全是崭新的音乐。他们两人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柏辽兹又诅咒、又发誓，跪下来向费兰茨的出色演出表示感谢，然后又跑到音乐指挥台上，几乎同哈比内克争吵起来，最后的收场则是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接受听众热烈的掌声。以后他们又一起参加了一场更亲密、更动人的活动：哈莉特·斯密松小姐同海克特·柏辽兹举行婚礼，宣誓订结终身……费兰茨在结婚登记簿里，在新婚夫妇名字后面第一个签上了名字。他还私下问过柏辽兹要不要钱用。柏辽兹感动而骄傲地拒绝了援助：

"我的前途现在已经是笔直的了。我看到了我要达到的目标。它象胜利女神尼克一样在我面前飞翔。我的胜利女神就是哈莉特小姐。任何人也不能再阻挡我沿着胜利的大道前进。"

当然罗，还有女人。她们也在占用青年艺术家的时间。她们所占用的时间要比费兰茨愿意花在她们身上的时间稍微多一些。这里首先就有一个奥黛尔。她狂恋着青年艺术家。这在她一生中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不能不使整个巴黎感到震动。她已经不再傲慢地翘起小鼻子，也不再挤眉弄眼（这是巴黎上等女人和交际花本领的结合），她再也不摆架子了。她每天都要找一个理由给费兰茨写一封信，而这些信又总是由她丈夫家某个仆人送去，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尴尬。她不仅仅写信，而且还送去书、花、乐谱、沙发靠枕、领带、文具以及其他信手拈来的东西。对这样的热忱和感情是难以躲避的。有一天早晨，她派一辆马车来接费兰茨。一个魁梧的猎手在他家门口立正报告说：

"老爷和夫人邀请您参加明天的围猎活动……"

费兰茨推托说，他对打猎毫无兴趣，也没有合适的猎装，另外他还得去埃拉尔德家同马萨尔、弗朗科姆和乌尔汉一起排练。

这时一阵旋风把猎手推在一边。奥黛尔亲自出面来邀请他。她当时的语调很难只用一个字来表达。哭泣，恳求，劝说，深情地哀诉，向往幸福的欢笑，在这当中对费兰茨母亲也说了不少甜言蜜语。但对猎手却只下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命令：走吧！

费兰茨又讲了他不能应邀的理由，甚至还表示担心这样做对外影响不好。但是奥黛尔一句话就解除了他的武装：

"我的丈夫和阿加特奶奶当然也会在场。整个别墅将装满客人。"

她的丈夫和阿加特奶奶确是在场。但是很多客人由于暴雨无法赶来。一切事情都象狂想的浪漫主义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两层楼高的古老狩猎别墅的所有铜号都吹起来，周围的蓝天白云慢慢昏暗下去，乌云沉降在悬崖陡壁上，用一块不透明的黑布遮住了美丽的山谷、冰冻的陡峭山峰和晶莹透亮的森林。别墅

在一片漆黑的乌云之下整整生活了两天，所有的汽灯、蜡烛和夜明灯全部点燃。

第三天，森林区的主猎手前来报告：

“大雪封住了别墅的唯一通道。扫雪开路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白天，四人一起打牌。丈夫、奥黛尔、阿加特奶奶和费兰茨。遵照夫人的命令，晚上七时共进晚餐，然后在大客厅听听音乐，晚上九时半左右各自归寝。可是不过一个小时，奥黛尔就来敲门了。费兰茨的各种托词，什么仆人可能发现，阿加特奶奶可能去看她，也许她丈夫……全是白费。

奥黛尔根本不听这一套。她还只有二十几岁，年轻热情。她面对着大壁炉的红光，木头燃烧的火光在她皮肤上不停地跳动，犹如一尊正在铸造的黄金雕像。腰软如柳条，热情如烈火，使人感到立即要爆炸似的。

第二天黎明，她偷偷溜出房间前吻了吻费兰茨的眼睛和嘴巴，然后把头放在他手中说：“谢谢。”

白天打牌时，费兰茨老是观察别人的表情，看是否被人发现了什么。主人年近六十，总是轻轻地摇晃着脑袋。据说，他这个毛病是在一次战斗中得到的，不过他当时不是站在法国卫国者一边，而是站在普鲁士侵略者一边。他半睁半闭着眼睛。费兰茨有时觉得他是在偷看邻座的牌。总之，侯爵摇晃着他近于紫红色的脑袋，阿加特奶奶在数她的钱。奥黛尔毫不掩饰地、温情地盯着费兰茨。他这时真想站起身，走到冰冻的院子里，打通雪路，一直步行到巴黎。他只想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逃离这关了他四、五天禁闭的牢房。

可是又下了场暴雪，路又堵住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等他回到巴黎时，差不多已经过了一个月。桌上堆满了信函、请帖。他只打开了其中一张最有吸引力的邀请信：普拉特女伯爵一定想见到他，因为她那里新近来了一位费兰茨必须马上认识的波兰朋友。其他邀请出席晚会的请帖大部分都已过时，但普拉特女伯爵的邀请没有到期，离聚会时间还有两天。费兰茨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处理了积压下来的事情，然后准时出席女伯爵的晚会。当然罗，他在晚会上遇到的都是讥笑的脸孔和挖苦的眼色："在侯爵别墅打猎打得怎么样？"

费兰茨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脑袋后面有一个男人荣誉的光圈。它是属于征服者的，但是却会使年轻人脸红。

过了一会，参加女伯爵晚会的主宾来到。费兰茨很快地打量了一下来者：皮肤、异常狭长而毫无血色的白手、稍许激动就会流汗的皱额头都显得很敏感，不，不仅是这些；从他探视的目光和歪头的姿式看，他内心也是很敏感的。他好象在倾听讲另外一个人秘密的超频率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只有他才能听得见。费兰茨看着他狭窄和略显痛苦的脸，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突然会想起"痛苦"这个形容词。但事实确是如此，这张脸表明：在这里，痛苦是常客，青春的欢乐只是偶然的路人。费兰茨还没有作自我介绍就已把新来客人的一切特征铭刻在自己脑中：他非常有气派，如果是别人，也许可以说是花花公子。但他不是，他应该这样穿着打扮，对他来说，这不是追求时髦，而是气派所需要。现在他伸出手来，在苍白痛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能够认识您，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名字叫肖邦，弗雷德里克·肖邦。"

他们两人长时间地握着手。费兰茨也说了一些常用的客套话，并且尽量想把意思表达得更深一些：

“认识您，使我感到万分高兴。”

晚会过程中，肖邦情绪稍许放松了一些，特别是当他发现大部分客人都是波兰人的时候。这时，满脸愁容、性情敏感的年轻人（费兰茨估计他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突然变成了好玩的孩子。他同客人们打趣、开玩笑，还讲了一个古老的滑稽故事。不过他在讲故事时不断咳嗽、大笑。接着他坐下来弹琴。即兴演奏几分钟后，他请求主妇把灯都灭了，只在大厅的角落里留下一支蜡烛。大家都屏声息气地等着。肖邦开始弹琴。这是孤独和黑夜的音乐。紧张，恐惧，一种既无形状也无名字的东西象云雾一样飘来。象胆小的孩子在黑暗中唱歌，想赶走鬼怪一样，孤独的人也在唱歌。它的旋律是那样温柔，使你觉得无法把它写下来，只能梦见它，轻轻地哼哼它，而且只有那些真正感觉到这种音乐的人才能听到它。费兰茨完全入了迷。不过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这种音乐表面上没有任何形式，是一种十分随便的音乐语言，是心灵在直接讲话，但实际上却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和奇妙的钟表，它的每一个齿轮都相互衔接得很好，它的任何零件都不是出自老技师的手艺。这里一切都是新的，都是独具一格的，都是这个手心潮湿和脸色苍白的波兰人自己的。

当然，人们不会让他离开钢琴。更值得钦佩的是，肖邦弹钢琴时没有使用任何哗众取宠的手法。他的演奏简单而朴素。就象有些人说话那样，从不提高嗓门，而是让听者自己去确定哪些地方应该是强音，哪些地方应该是轻音。肖邦弹琴时声音很低，但就这样也能吸引听众。

在费兰茨旁边站着的是玛丽，或者暂时还可以叫她是道格尔特女伯爵。

在大家鼓掌的时候，两人进行了迅速的对话：

“很久没有看见您了。”

“我在乡下。”

“我希望您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谢谢。过得确是愉快。”

“上次您在晚会上打动了所有听众，包括拉曼内斯在内。我本来以为，在那次晚会之后您会来看我的。”

“我未能及时探望您，使我深感惭愧。”

肖邦又在演奏了。玛丽似乎存心想破坏一下气氛，凑过身去对费兰茨说：

“他弹的琴比帕格尼尼的还要难懂。”

下一次的会见是两人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道格尔特家又举行晚会。肖邦得到的请帖上郑重地写着：道格尔特女伯爵。而费兰茨得到的邀请信右下角只有两个字：玛丽。

女人都有一种特殊本领，特别是当某件事触动了她们的第六感官时，任何事情都瞒不过她们。奥黛尔当然很快就听说了邀请的事，甚至不排除她已经了解到信中只写了“玛丽”两个字。于是她大哭大闹了一场。奥黛尔挽着费兰茨的胳臂，不断地指责费兰茨是个没有良心、没有感情、没有灵魂、忘恩负义的叛徒，他只是想侮辱她，蹂躏她，毁坏她，然后再去找新的不幸女人。暴风雨来得迅猛，消失得也极快。奥黛尔以后还来找过他几次，但不久他就听人说这个女人已经同某某公爵相好了。那些好朋友还马上加上一句：奥黛尔显然在考虑“王位”继承人问题，因为医生说劳帕鲁纳蕾德侯爵恐怕活不长了。现在需要有一个在地位上和财产上都能使她更上一层楼的第二个丈夫。

虽然同平时一样，只要玛丽家有什么有趣的人聚会，就得向奥黛尔发出邀请，但是这一次她没有出席玛丽·道格尔特的晚会。仆人在报告客人到来的时候，很容易使人们想起圣诞节时

家长点烟火的情景，半暗的房间突然一下子充满了火星、火苗、和吱吱发声的火光。现在仆人也在"点烟火"。随着他的报告，一颗一颗的火星在半暗半明的大厅中闪烁发光：

"勒古韦教授……欧仁·苏……弗雷德里克·肖邦……费兰茨·李斯特……"

接着来的是夫人们、贵族们、银行家们和记者们。然后又是火星闪光：

"欧仁·德拉克鲁瓦……荷奈尔·德·巴尔扎克……赫克托·柏辽兹……"

十点钟左右，三个大厅已挤满了客人。女主人知道肖邦是不愿意出头露面的人，但仍然抱着可能遭受拒绝的担忧心情，请肖邦为客人表演钢琴。

玛丽亲自陪肖邦走到钢琴旁，为他整理好椅子上的坐垫，揭开钢琴上的金绿色的丝绒罩，并吩咐仆人熄灯。肖邦在灯光还没有熄灭之前就开始演奏《#f小调夜曲》。他充满着即使是大艺术家也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具有的激情。费兰茨也只是在这时才真正理解了肖邦音乐的实质：怀念祖国。在巴黎这种色彩缤纷和幸福富裕的生活热流中，这种感情也没有让不幸的诗人平静下来。他眼前看到的仍然是沉沦的村庄和波兰广阔的天空。他看到，在波兰的大地上，村庄、森林、教堂的尖顶和人的生命都在消失、灭亡。

掌声。费兰茨站在琴旁。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右臂被别人的手抓住，并且被拉向钢琴。肖邦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

"现在你坐下来，重弹一遍我刚才弹的曲子！"

于是又响起了《#f小调夜曲》。费兰茨有力的钢手现在被迫象肖邦那样轻抚琴键。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使他没有漏掉任何一个重音、细微的停顿和稍长的间歇。他弹的节奏同肖邦弹的节

奏一样自由(奇怪的是，它同时又是那样的规整)。他弹的调子也同肖邦弹的一样，是那样地屏息、热情和克制。

灯又亮了。费兰茨起身对听众惊服的掌声表示感谢。

掌声象浪潮一般接连不断。现在肖邦和费兰茨都站在钢琴旁向听众致谢。柏辽兹很快就把波兰艺术家“抓在自己手里”，把他拖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费兰茨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柏辽兹的独白：

“……她也出席了您的公开音乐会，为您写了诗。她还写了一篇极美的短篇小说，展开了她诗人天才的翅膀。不过在展翅飞翔时，也混进了黑夜和音乐女妖的声音。小说写得好极了。如果别人这样写我，那我一定会非常幸福。遗憾的是，她是写给您的，我的朋友……”

波兰艺术家又惊异、又糊涂地笑了笑：

“我没有完全听明白，先生……您讲的究竟是谁？哪个诗人？她为什么要写我？……”

柏辽兹紧紧皱起眉头：

“这是些什么问题呵?!这位诗人，除了是本世纪的女人、《印第安娜》的作者、一百年才开一次的美丽的夜来香外，还能是谁呢？我讲的当然是乔治·桑呵！”

“我对这位女诗人是很敬重的，不过我没有打算同她建立个人关系……我不喜欢抽烟的女人，不喜欢穿长统裤的女人，不喜欢惹是生非的女人。一般来说，我不喜欢任何一个用生命和名誉来追求出风头的人。”

关于乔治·桑问题，肖邦常常私下同费兰茨商量对策。因为女诗人不断派人邀请他，表示自己很想认识波兰音乐诗人。费兰茨经常听肖邦讲授音乐课。听课的还有可爱的古特曼，他对肖邦就象忠实的猫狗对待自己的主人那样。切尔诺维茨的卡

尔·姆·米库里、波多茨卡女伯爵、彼鲁西女公爵、奇梅女公爵以及童年时代曾在厄尔巴岛上面对面地看见过拿破仑的爱尔兰人阿梅劳等著名人物都来听课。最有意思的学生是埃斯代尔哈兹小姐,她经常恭维老师,但更多地是恭维费兰茨。在小姐的眼中,费兰茨已经不是个年轻人,而是个艺术大师,在他的额头上挂着肉眼看不见的桂冠——世界名誉。在每次课快结束时,能干的冯塔纳也往往赶来。他现在靠当职员过活,但他主要的工作是夜以继日地为肖邦服务。他为肖邦抄写新的音乐作品,处理肖邦的信件。学生的学费也由他来收存,因为肖邦对钱的事不感兴趣。他经常去都伯特商店为肖邦定制帽子、手套、衬衣、领带、护腿等物品。他还经常催促著名裁缝道特里蒙每月为肖邦制作一套新衣服。而后者每次都能发明一种新式样,有时缝的是贝壳扣,有时加上什么红色衬里,今天在衣服上采用美丽的缌带滚边,明天又用中国丝绸做光滑如镜的上衣。下课后,连情愿躺在门槛上为肖邦看家的古特曼也走了。剩下来的两个人就继续商谈乔治·桑问题。肖邦认为,他没有兴趣介入这种丑闻历史,被别人写成第十章或甚至第一百章。他说,有些喜欢搜集蝴蝶标本的女人,尽管非常爱蝴蝶,娇宠、喂养和保护这些上帝的漂亮生物,但最后终不免要把它们用针钉在硬纸板上,因为搜集者需要的是死标本,她们不会去看这个蝴蝶是多么美丽。

对皮格尔街的美人鱼问题商讨了四、五次后,他们最后决心做当年希腊神话中奥德赛本来应该做的事,“把自己捆绑在船杆上的绳子解开”,勇敢地跳进海里,让命运去决定一切!

皮格尔街的艺术村是巴黎当时精神生活的中心之一。乔治·桑就住在这里。拉曼内斯在巴黎逗留的时候也住在这里。这里有德拉克鲁瓦的创作室。巴尔扎克也在这里长居过。他家的邻居是哲学家皮埃尔·莱瑙。乔治·桑的沙龙是大家的聚会

点。拉马丁、海涅、密茨凯维茨、仲马、柏辽兹都是常客。此外，欧仁·苏、圣佩韦、梅耶贝尔[1]也来过不少次。

在一个美丽的春天，两个年轻人怀着冒险家鲁宾逊的心情来到皮格尔街。首先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乔治·桑家的院子，它很象一个小农庄。里面种着庄稼和几棵果树，养着大量的家禽，到处是飞来飞去的鸽子和摇头摆尾的狗。它们不怀任何敌意地围着客人，用潮湿的鼻子去顶他们，显然它们已经习惯于客人会给它们带来什么吃的。沿着石柱廊进入的大厅里，天花板下搁着的是农村狩猎房式的木梁。迎接他们的是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他们很懂礼貌，首先介绍了自己：梭伦基……莫里斯。

费兰茨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抚摸孩子的头。肖邦却后退了一步。尽管他已经是成年人，但仍保留着一些孤僻孩子的性格，不大愿意同陌生的孩子交朋友。

年仅十岁的小莫里斯象个社交家，落落大方：

"二位请坐。我母亲马上就到。"

如果美人鱼以为这种拖延时间的做法会引起来客更大的兴趣，以制造第一幕开始前良好序曲的气氛，那是完全打错了算盘。肖邦气愤地用手指刻画他的礼帽沿，几乎把刚买来的手杖在膝上折成两段。费兰茨开始时只是看了几眼小仙女似的梭伦基，过了一会，他象玩蛇人一样把小孩吸引到自己身旁。小姑娘靠在他的膝上，用天蓝色的眼睛瞅着这位漂亮的年轻人。（以后她谈到费兰茨时，总是说"那个漂亮的年轻人"。）起先，她还只是站着，后来干脆顺从地爬在他怀里，用手勾着他的脖子，轻轻地说："如果你非常想的话，可以让你吻我一下！"

---

① 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 1791—1864)，德国作曲家。早年创作意大利式歌剧。三十年代开始，吸取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音乐的配器手法，发展和确立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盛行于法国的大歌剧体裁。所作歌剧场面宏伟、布景华丽，偏重外在的演出效果。

谁要想了解关于乔治·桑的各种传闻轶事，可以向任何人打听，因为所有巴黎人都认识这位“穿长裤的女人”，并把她神化为妇女自由的天才。但是也有人在骂她，因为在小市民的眼里，她是家庭道德败坏、自由恋爱、女人抽烟、象男人一样朝三暮四的具体体现。对她的家庭关系也应该象百科全书似地予以准确记载，因为这种身世在世界传奇小说中也是少有的：她的祖先是以闹丑事而闻名的萨克逊国王阿戈什大力士。他的儿子通过联姻关系，成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亲戚。这位王子后来当了元帅。结婚后，妻子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这位小姐以后嫁给富豪杜宾，生了儿子莫里斯·杜宾，即女诗人的父亲。他好象是只从窝巢里掉到地下的小鸟，一下子降在人间世上，只讨了一个普通姑娘做妻子。巴黎谣传说，她当时的工作是介乎妓女、舞女和市场女贩之间。他们生下的就是这位“穿长裤的女人”。乔治·桑有时享受祖母遗留下来的亿万财富，住在诺汉特的别墅里，在同原始森林差不多大的花园中散步；有时却又住在母亲的破房子里，会见卖唱的、市场小商贩、失业的芭蕾舞演员、小偷、看手相的和话剧演员等等三教九流的人物。她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她生活在童话般的王国中，只要指头一弹，神角里就会倾倒出各种各样的珍珠宝贝；她又象一个中了魔法的公主，经常闻到穷人的大蒜味和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她同杜德万特男爵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乔治·桑有一个坚定的决心：她一定要真正实现那些随风倒、瞎骗人和胡思乱想的作家们只敢梦想的事。她离开了男爵和家窝，来到了巴黎。她在自己的旗子上勇敢地写上了四个字：一切自由。可以忠贞，也可以胡来；可以思考，也可以盲从；可以赚钱，也可以挥霍；可以把人们吓走，也可以吸引那些愚蠢的男人……一切都可以自由地做，唯

有一条不行：欺骗。作为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找了一个有影响的报纸编辑桑德乌先生做自己的情夫。她从他那里学会了一个市场女贩的女儿和女贵族的孙女所能学到的一切——从爱情到文学。然后又抛弃了他，另找了既会写作又懂爱情的缪塞①。所有这一切都使巴黎感到愤慨。这两位作家是文友又是同行，周游世界各国，象一对老虎一样，有时相互争吵，有时又亲密无间。就在这时，她的第一部小说《印第安娜》诞生了。这部小说使整个巴黎都感到惊奇，使她的名字从此以后同雨果、仲马和巴尔扎克并列在一起。如果说玛丽只是想了解这些事，就根本用不着请费兰茨去。不过他还是愿意见面的。

费兰茨访问乔治·桑不久又去了道格尔特家，这次确实只有他们家里人在一起。在小客厅里接待他的有弗拉维格尼侯爵、玛丽的母亲、玛丽的哥哥莫里斯和玛丽本人。老侯爵身穿黑色上衣，上面满是花边，脖上、手指上的珠宝闪闪发亮，即使外行人一看也知道这都是些价值连城的真货。老太太仍然保持着贝特曼家族的特点，眼珠乌黑发亮，鼻子略翘，下唇稍厚。莫里斯脸上也保留着贝特曼家族的这些特点，但他总想以近卫军军官的姿式来掩饰这些。他靠在椅子上把穿着紧身裤的双腿伸得老长，有时故意纵声大笑，象一个吸烟人喷烟一样，把笑声送到天花板上。保姆带着家中最小的三岁女孩露易苏也进来站了一会。这个小姑娘由于大自然开了个特别的玩笑而几乎没有面孔：一双贝特曼式的大眼睛吞掉了或者说占满了整个脸蛋儿。英国保姆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介绍了小女孩，接着玛丽也讲了几句听不懂的英语，把保姆和孩子支走了。最后，玛丽向费兰茨提出

---

① 缪塞(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早期受雨果影响。七月革命后作品中出现悲观色彩。其作品如诗剧《杯与嘴唇》等主要描写鄙视资产阶级社会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个人主义者的悲剧。

了问题：

“请您讲讲，乔治·桑那里怎么样？”

“她让我们等候了半个多钟头。过了一会，柏辽兹也来了。圣佩韦带来了雨果的妻子。齐迈尔曼进来时大嚷大叫，好象带来了一个大乐队。缪塞直打哈欠，表示他非常讨厌这一帮人。最后出来的才是女主人。我没有想到美人鱼会是这样的。她光脚穿着一双拖鞋，腰上系着围裙，里面的裙子打了一个结，以免妨碍她的工作。原来今天仆人和女厨都放假，该她自己做晚饭。她决不会为了客人而不让仆人休息，即使国王亲自驾到，她也不会这样做的。她一边走进来一边用厚毛巾擦手，然后根据各个客人的身份、关系和她的兴趣伸出额头、面孔或嘴唇：‘亲亲我吧，小鸡，坐下来吃吧，菜凉了以后连一块木头都不如。’她让两个孩子铺桌布，分餐具，然后吩咐几个客人帮她的忙。等大家都坐下来后，她走到肖邦面前：

‘嗯，我真地就那么可怕吗？’

波兰人先是脸色发白，接着由白变红，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请原谅，我从来没有说过您可怕……’

‘男人的优点是勇敢。您应该坦率地告诉我，您原来想象我要比现在美丽、年轻、整洁。我这样子很象我妈妈，她有时得在市场上卖鸟卖鸡……’

肖邦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不断地擦汗，向我递来求救的眼色。我才不去帮他哩！我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位上帝创造的奇人。她开始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又圆又胖的女人，后来才发现她象农村妇女一样健壮，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后，胸脯仍然象姑娘一样隆起。她漂亮吗？不，不漂亮。下巴太小，鼻子没有什么特点，不能给她的脸增添什么特色。但是她看着你的时候，却使你感到有一股魅力。这顿晚饭就是这样吃的。幸亏客人们胃

口好，谁也没有想到让肖邦、齐迈尔曼或者我弹琴。大家默不作声地大吃大喝。最后还是女主人打破了沉默。她站起身，举杯为雨果夫人祝酒：

'祝贺本世纪伟大作品的诞生！愿上帝保佑写出《巴黎圣母院》的天才健康长寿！'

掌声和欢呼声。也有一点尴尬的咳嗽声。因为雨果夫人是由圣佩韦陪同来的。这种祝酒词显得有点不够照顾客人的处境。不过乔治·桑就是这样的人。她没有穿夜礼服，穿的只是带有油腥味的劳动服；她没有摆出女作家的架子，而是打扮成普通的女厨子；她不是赞扬圣佩韦，而是祝贺没有出席的丈夫……总之，她是不顾场合的人。但是她对《巴黎圣母院》极为钦佩。她谈到作者概括了几个世纪的丰富想象力，谈到诗人额头上的时间皱纹，因为他担起了整个人类的痛苦和愿望。她的笨拙还表现在她不加区别地说：同雨果相比，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是笨蛋；我们在自己所长的方面也只是中等水平的人，而雨果在自己所短的方面也要比我们伟大得多，我们在他的面前只能感到惭愧。"

时间是有速度的。这听起来好象全属废话。但事实确是如此。时间就同江河一样，有时流得很快，有时却由于堤坝的阻拦而变成不动的池沼。现在费兰茨的时间流逝得特别快。一系列的光荣演出。他同肖邦和小提琴家艾恩斯特联合演出后，又同肖邦、希莱一起参加了普拉特女伯爵家的大型音乐会，演出《波兰还没有灭亡》的变奏曲。就在这次晚会上，帕尼·卡斯特拉诺娃讲了句名言："如果我还年轻，我愿让希莱做我的丈夫，肖邦做我的朋友，李斯特做我的情人！"

不久，他又在法瓦尔特大厅同越来越容易激动的柏辽兹合

作。这次演出的参加者中有格里希姐妹、乌尔汉、肖邦和费兰茨。当晚，《评论报》编辑部里进行了一场持续到深夜的狂热争论。柏辽兹在总编辑贝尔丁先生的保护下终于“占领”了整个音乐版。以后又是一场难得的音乐会：肖邦、希莱和李斯特三架钢琴合奏巴赫的钢琴曲。接着是国王似的礼品：肖邦送给费兰茨一套练习曲，另一套送给了玛丽·道格尔特……这些练习曲当然应该马上弹给大家听。但所有这些也都只是梦中的狂欢会，真正占据他的注意力、思想和时间的是玛丽。他们每天都在通信，从缪塞、《浮士德》、《巴黎圣母院》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引证大量的美词警句。费兰茨还经常陪伴玛丽上街采购。玛丽则要求拜访和认识李斯特的母亲。

生活流逝得真快……

一八三四年四月十二日，费兰茨到了一个遥远的小村庄。它躲在布利塔格山的一个角落里，离开最近的市镇圣皮埃尔也有半小时的路程。周围都是象烧得发红的草和光秃秃的峭壁。几枝冻坏了的树在布利塔格山的大风摧残下不停地摇曳。

费兰茨几乎还没有放下行李，就开始向玛丽报告这个新地方：

“我现在住在善良而高尚的拉曼内斯神父家里。房子并不太新，也不大好看，但住起来挺舒服。楼下是餐室和会客室，神父住在这里。我住在一楼。另外还有一间房子，里面全是书，住客是图书馆馆长波雷教授。二楼有几间小屋，住着三个年轻学生……”

晚上，拉曼内斯几次申明，教会已经取消了他做弥撒、接受忏悔、解除罪恶和为上帝服务的权利。但是费兰茨还是坚持要把一切心里话都告诉他，就象跪在忏悔室里一样。他们一直等到

下半夜才开始谈话，因为在这以前，那几位年轻房客需要用弹琴、游戏和谜语来消磨时间。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拉曼内斯点了点头：

“现在可以开始了……”

费兰茨弯腰坐着，两手放在膝盖间，低着头，只露出了浓密的金黄头发：

“神父，您是了解玛丽的。”

“是的，我了解她。”

“您也许比我更了解她……”

神父的铜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孩子，在我被捆绑着的时候，我明白爱情是比世上任何理论科学都更可靠的钥匙。”

费兰茨抬起头来：

“您知道我们在相爱？”

“孩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是自以为在相爱。”

费兰茨又弯下腰，开始忏悔：

“实际上，我从第一次见面就怕她。我爱她。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爱她。几个月来，我们互相躲避，好象击剑手在寻找对方的弱点。我是个好虚荣的人，神父。我过分好虚荣了。玛丽是个比我强的击剑手，她很快就找到了我这个致命弱点。她很少称赞我。有时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伟大的艺术家，唯独她不这样看。看来她对我其他方面的能力也是怀疑的。如果我引用错了一句话，她马上就给我纠正。有时她甚至还挖苦我说：既然连基本的语法也不懂，何苦还要讲拉丁文？于是她马上开始教我如何使用拉丁文。然后她又讲起希腊文来，一边讲，一边还拿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语法来作比较。在这种时候，一个男人是什么事情都敢干的。我偷偷地学会了拉丁文，开

始学起意大利文。我还从柏辽兹那里借来了莎士比亚的著作，在百忙中钻研英语语法、词法和《哈姆雷特》。但是神父应该知道，学习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冒险行为。因为你一读莎士比亚，就还想看看米尔顿的东西，接着又会想到斯威夫特和笛福的作品，然后又是十次、百次、千次地阅读拜伦的诗……从但丁到彼特拉克只相差一步路，阿里奥斯托和塔索也在吸引着你。这是一种危险的冒险，神父，特别是对我这样一种人来说，因为我正在同时研究《浮士德》、柏辽兹的乐曲、形式纯真而内容新颖的肖邦作品、贝多芬的交响乐、永远隐藏着新谜而使你无法捉摸的帕格尼尼。有时清晨，当书本从手中滑到地上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是个狂人。在桌子上、地上有成堆的书，到处都是伏尔泰①、卢梭、圣西门、莫里哀、狄德罗、达朗贝尔②、帕斯卡③、康德、黑格尔和谢林④的著作。等第二天赶到玛丽那里，这一切学习又全白费了，因为教学工作、排练和其他事情太多，累得我既不能思考，也不想说话。而所有这一切还只是考验的开始。神父，您曾经见过农村小孩子误进地主家、踩着大厅的光滑地板时的情景吗？这个可怜的穷小子就象钉了掌的驴子在冰上走路一样不断地滑跤。在她那里，我体验到了这种情景。我在普拉特女伯爵、拉茨维尔公爵、阿波尼伯爵、杜拉斯女公爵家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但在她家里却感觉到了。她家里有成千上万种习惯和规定，

---

①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代表十八世纪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并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② 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法国数学家、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对偏微分方程有贡献。曾任《百科全书》副主编。

③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其散文作品对法国散文的发展影响甚大。

④ 谢林(Schelling, 1775—185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早期反对封建主义，但后来日趋反动，晚年成为普鲁士国王的御用哲学家，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

任何地方也没有教过，任何时候也不许去打听，因为弗拉维格尼侯爵和莫里斯·弗拉维格尼昂首阔步的姿式告诉我，这些东西全是天生的。总之，玛丽有时帮我纠正错误，尽管她很照顾我的面子，但每一次纠正都象给了我一记耳光。后来我感到厌烦了，第二天没有去她家。第三天来了一封信。签名的不是玛丽，而是老侯爵本人。我回了一封很委婉的信，只是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大客气：我不去。一星期后，正当我同我的德国朋友海涅、希莱、门德尔松一起散步的时候，同莫里斯迎面相遇。他对我打了个招呼：

‘好久不见了，亲爱的大师……’

‘伯爵先生这样称呼我使我受之有愧。这种称呼只有贝多芬或者神般的拉摩才配得上……’

‘我们不要去争一个称呼的事了。让我们谈谈实质问题：您因为生气而有意躲开我们。’

‘如果由于不是我主观上想做的而使您生了气，我愿表示歉意。至于我不能登府拜访，那是因为我需要练琴、教书，几乎每天晚上都得演出，创作乐曲。另外，我还得努力学习，以弥补我非常欠缺的知识，这一点正是在同您们相处的时候认识到的。’

莫里斯神气十足地点头告辞，我们也举起帽子作为回礼，然后继续散步。海涅好奇地询问：这个时髦小猴是什么人？唉，人的灵魂就是那么稀奇古怪。海涅这句话竟会使我感到生气，因为我觉得他同时也伤害了一个属于我的人。第二天妈妈交给我一封信：‘我想认识一下我们的同胞海涅。星期四，请您带他来……’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叛卖。玛丽总是炫耀她的两种出身：一是她的贵族家庭出身，一是使她区别于‘急躁、轻浮的’法国人的德国出身。玛丽没有办法赐给我贵族爵位，但她吸收我参加另一种值得骄傲的特权集体，称我为同胞，说我是陷在

巴黎这个乱七八糟的沼泽地里的规规矩矩的德国人。我成了一个叛徒，因为我接受了这种特权称号而没有简单明了地宣布我是匈牙利人。我承认自己是德国人，而且让她这样向别人作介绍。我尽管发过许多誓，但是星期四晚上九点半钟还是拉着海涅如期赴约，重新出现在道格尔特家的晚会上。这次晚会的口号如旧：只是我们家里的一些人。的确如此，因为整个晚会的客人一共还不到六十个。这次当然是海涅最出风头。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得到了一面闪发光辉的镜子。玛丽一、两句恰到好处的插话或轻声提示的德国警句更加增加了他的光辉。海涅——至少在我看来——也犯了大多数会讲俏皮话的人所犯的错误。当他们没有什么俏皮话可讲的时候，为了寻找俏皮话，最后只好拿起最廉价的武器：去挖苦讥讽某一个人，其结果往往是或多或少地侮辱了人。这次的讥讽对象是我和已经垮台的圣西门主义。我只好抓住第一个机会就不辞而别。第二天，道格尔特家的管家给我送来了一封信：'请马上赶来！'一个君子在这种时候能够怎么回答呢？我叫来了马车，立即赶到她家。玛丽脸色灰白。

'昨天为什么要使人生气？'

'我不知道什么事使您生气，但不管怎样，我向您道歉。'

'亲爱的朋友，您这样不告而别，还不叫人生气吗？'

'我同海涅角斗，只会打败。我不愿意在您面前被人击败。'

'但您这样做使我感到无限的难过……'

'那又是为什么呢？'

'您现在已经很少到我们家里来，而我一个星期前就开始高兴，认为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一股暖流穿过了我的心，但是在我的思想深处本能地感觉到这是在玩游戏，一场危险的游戏。我不能参加这场游戏！即

使她现在真是这么想的，我也不能参加。她现在肯定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绝不能去抓她的手。当心，千万当心！可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使任何男人也无法再抗拒下去的事：玛丽哭了。她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扑到我肩上或者倒在沙发椅上，而是站在那里睁大着眼睛，让眼泪象玫瑰色的小溪一样在雪白的脸上滚滚下流——我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颜色。我伸出手臂，把她扶到椅子上。她看着我说：您现在象兄弟一样地吻我的额头和脸吧，我非常需要您。可是亲吻往往并不象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这已经远远不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昵，而是疯狂的、令人头昏目眩的拥抱。这只有一个愚蠢的年轻人才会做得出来，尽管他刚才还一再警告自己要当心、当心、千万当心！第二天又在一起，当然第三天也一样。我们制造各种借口把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和每一分钟联接在一起。有一天，我得到邀请信，要我同露易苏、英国保姆和玛丽一起乘车去花园玩。所谓花园就是她在布洛涅山脚下的一座小别墅。里面只有二十多个房间和一座能容纳下埃斯代尔哈兹老爷某一个村庄的花园。四点钟在凉台上喝咖啡。上帝在这种时候也乐于支持邪恶。他向人间投下了明媚的春光和醉人的云彩。大地散发着春意荡漾的芳香，这种芳香特别象新婚夫妇新房中的香味。天气非常好。眼睛特大、肤色苍白的露易苏请求妈妈允许她同保姆一起去玩皮球。玛丽表示同意。球的碰地声、孩子的嬉笑声、保姆的说话声越来越远。'您能为我弹点什么曲子吗？''非常高兴。'说着我们就走上了一楼音乐厅。我必须告诉神父，这座'花园'一般要到五月才开放。这件事我并不知道，但玛丽是知道的。别墅里没有仆人。即使有，也都住在花园的角落里，因为其他房间都封住了。我们两人盲目地走上朝两个方向展开的大理石阶梯。玛丽把手放在我肩上，我轻轻搂着她的腰。我已经

不记得，当时是没有找到音乐厅，还是根本就不想找到音乐厅……我只记得我们又坐在凉台上，玛丽坚定地说：她的生活终于又有了目标。一个人在狂恋的时候对别的事是不大关心的。肉体的幸福陶醉、满足和欲望停止了一切思想。一个星期之后，我好象记起了一个曾经溜过我耳边但印象并不深的音乐旋律似的，问玛丽道：

'您谈的是什么生活目标？'

'我要整顿我的生活。我不想躲藏，也不愿说谎。我不想扮演廉价小说中描写的破坏婚姻的女主角。关系必须明确。'

我还是没有理解她的意思：

'您有什么决定吗？'

她严厉地从上到下打量我：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是你的人。我要离开家、丈夫和母亲，同你一起走。'

'上哪儿？'

这个问题问得确是笨，我马上感到后悔。玛丽痛斥了我一通：'上哪儿？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愚蠢的小市民才问得出来，他只有在备齐了家具、设备和父母的祝福之后，才能结婚。上哪儿？……到社会上去闯。你以为莱尼、奥多尔夫、奥伯曼或者维特会这样问他的心上人吗？上哪儿？不管是贫困还是荣耀，也不管是流放还是继承王位……'

我能做什么呢？我只好跪在她面前，吻她的两只手、眼睛和生气的嘴巴。开始她还反抗了一阵，后来慢慢消了气。

'玛丽，一切听你安排，你愿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在'花园'里。我不在乎说出我们所有相会过的地方。男朋友和女朋友、整个巴黎都在帮助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因为弗拉维格尼——贝特曼——道格尔特家族

的骄傲的女王终于下嫁给一个乐师，而他究竟是德国人、匈牙利人还是吉卜赛人都还难以肯定。我没有对妈妈隐瞒这件事，因为我相信普通人的智慧。我认为当我用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冒犯上帝，因为我所说的普通人就是简单、纯洁、能干和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母亲。她只是点点头，说：'我早就料到了。''你知道？你同她不过只谈过一、两次话……'母亲笑了笑，但这种笑容，实际上掩盖的是眼泪：'我早就料到……你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了。你是男人。你应该把她接回来，连同幸福和祸害一起接回来。'

第二天，我告诉玛丽说，妈妈不反对我们两人的结合。玛丽和我当时又在'花园'里。她手里正拿着杯子，听我说完后，她把杯子扔到地上，漂亮的头猛朝后仰，大声地笑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慢慢平静下去。她一边还在喘气，一边问我：

'总之，妈妈没有反对……'

'没有，玛丽！'

'但她实际上同意我们什么呢？'

'当然是同意我们结婚呵……'

玛丽静静地坐了下来，沉思地看着地上。过一会，她站起身，背靠石柱向下面高声喊：'露易苏……露易苏……露易苏……！'

远远传来回音：'我来了，妈妈！'

'快一点，小女儿，快要下雨了……'她慢慢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想同你结婚。道格尔特夫人变成李斯特·费兰茨夫人，这有些滑稽。'"

这次忏悔一直持续到深夜。拉曼内斯当中没有插一句话，最后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费兰茨一再表示："我想过纯洁的生

活！”神父对他这种态度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纯洁的生活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

他还没有睡几个小时，铜人就来敲门了：“喂，起来吧……我们该走了！”因为时间紧迫，客人只好匆匆忙忙洗洗脸和手，喝一杯酸牛奶当早点。出发前，拉曼内斯简单地祷告了几句，也顾不得同行人是否做了祷告，就仓促启程了。费兰茨觉得他们是在跑步，直奔圣皮埃尔镇。年轻人原本希望听到神父的意见、劝戒或批评，但神父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拉着他跑，一直跑到山下，穿过圣皮埃尔镇和一片乱七八糟的小森林，最后来到一间破土房的炉灶旁。这间土房是用乱石破瓦堆砌成的，周围抹了一些泥，做工非常粗糙，风从门窗里随便进来出去。小破房里有几件粗制的木家具：条凳、细腿桌、铺着羊皮的小床。看见我们进门后，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站了起来。他脸上的肉完全干瘪了，干得发裂的嘴唇下面只剩下了几颗坏牙齿。

“上帝把您带来了，神父。”

拉曼内斯咕哝了一声，好象是在问候，然后从大袍下面掏出了面包、羊酪和干鱼：

“带来的东西很少，”他又微笑着加了一句，“我们这个教派非常穷。”

老头也没等神父说声请就狼吞虎咽起来。他的下颚不停地抽动，脸就象一部装坏了的机器，又没有制动设备，越来越快地吞蚀着材料。拉曼内斯在旁边一声不吭。一直等他把全部食品吃得精光以后才祝他身体健康。小土房里的人都默不作声。这时，费兰茨隐隐约约想起了童年时的情景：多波尔扬……农村……村旁的吉卜赛帐篷……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象老头这样贫困可怜的人。最后还是由拉曼内斯神父打破了沉默：

“我的年轻朋友从远道赶来，想听听您的经历。”

老头看来吃得太累了，他要求允许他躺在床上：床板是由几条木板拼成的，上面铺着一些乱草，再上面就是那块又破又脏的羊皮。

他开始讲自己的经历。

“我是从很远的地方——里昂来到或者说逃到这里的。现在有四个星期了。”为了要记起往事，讲话人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也许已经五个星期……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邻居的意大利女人玛丽亚偷偷地走进我家，问我们还有没有面包，因为小露易莎身体很弱……小孩病了，也许不是病，家里已经断粮两天了。我们把家里仅剩的一点面包都给了她。第三天，玛丽亚已能上街讨饭，但是我们那里住的都是穷人，人象野蜂一样，住得拥挤不堪，稍稍为点小事，就争吵打架，互不相让。在这样的穷地方，很少有人会给她面包吃。她只好到有钱人家去讨。她被抓住。因为警察说她不是讨饭，而是想偷东西。她被关进了监狱，家中只剩下孤单单的小姑娘露易莎。周围邻居也没有人去管她，因为大人小孩清早四点钟就得到丝织厂上班。留下来的老头或者婴儿无法去照料她。就这样，小姑娘活活地给饿死了。第二天，玛丽亚被释放回家，发现孩子已经咽了气。这个意大利女人本来是个非常温和的老实人，现在她一下子变野了。她冲出院子，狂喊怒号，就象一只发了疯的母狼。女人们从四面八方的房子里奔了出来，紧紧把她抓住，不让她乱跑。她们想劝解她，可是一滴毒药要比一条河的蜂蜜还要厉害。结果是玛丽亚的愤怒影响了其他人，而不是其他人劝住了她。女人们用一块破被单裹住小孩的尸体，带着尸体去打官司。她们来到警察局，要求赔偿小姑娘的命。警察宪兵用刺刀驱散了闹事的妇女。小尸体就躺在市场的石板地上，样子真叫人可怜。好象上帝有意让她在一生中死两次。女人们退回贫民窟，带回了愤慨、激怒的情绪。这种情

绪后来越烧越旺，人们在贫困、肮脏、臭气中燃烧起仇恨的火焰。男人们同自己选出来的代表进行了磋商，决定向厂方宣布：每天必须增加工资三分钱。有一个厂主表面上装着愿意同编织工人谈判，暗地里却派女婿到城里向宪兵队求援，说这里在搞叛乱……三分钱！多要三分钱就是叛乱！这不是要从天上摘星星、抢月亮嘛？……三分钱！是不是要让这些女人也穿上绸衣，男人戴上礼帽？这个家伙还肯谈判，那些家伙更加无法无天。三分钱？想得倒美。我们宁可关厂停产。于是在工厂门口加上了铁杠，套上了大锁。富人住宅区的宪兵加强了巡逻。全副武装。可是我们既无武器，也没有面包，我们只有最可怕的炸药——饥饿！我们赤手空拳向宪兵冲锋。他们把所有的子弹全倾射在群众身上。只要刺刀还没有折断，他们就拚命用它刺人。等到子弹打光，刺刀刺弯，街上已只剩下尸体。后来我们也开始报复。地下水道里到处漂浮着死人……整个富人区都逃散了。有的骑马，有的坐车，有的坐轿，有的步行，一边狂奔，一边乱叫。本来我们可以抓住所有的人，他们的车子里装满了金银财宝和我们最需要的食品，根本就跑不快。可是我们看到他们带着成百上千的小孩，我们不忍心去追捕他们。现在我们本来可以占领工厂，分掉他们的房子…贝诺特老爷一家四口人住在一栋宫殿里。让上帝保佑我们吧，贝诺特夫妇、小女儿和老母亲四个人就住了四十间房子！我们没收了一切。我承认，即使遭他们抢劫过的食品仓库对我们来说也是无价之宝。里面有面粉、食油、盐，还有我们穷人家孩子连听也不大听说的白糖！让上帝保佑我们，这里有糖！成麻袋的糖！

第三天，里昂周围全变了。军队包围了城市。他们出动了大炮和骑兵。只要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全是武器。是妇女们燃起了革命的烈火，现在也是她们想熄灭它。她们认为，没有必要

去同政府对抗，还不如派几个老年人去同他们谈判。老头们确是去了，可是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们全部被当作人质。就在法国的心脏地区——里昂城墙下，军队发起了冲锋。我们的武器不多，不过我们不怕死。士兵们躲在石垒后面，只要稍遇抵抗就四散溃逃，而我们都象被困的虎狼一样拚命搏斗。我们手中只有刀、斧、棍和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多次赢得胜利的古老法国工具——富人家院周围的铁栏杆。这些铁栏杆都打得尖尖的，目的是为了防备小偷翻墙行窃。我们用它们制作了成千支长矛。在那些敢于握住它们紧紧不放、直到战斗而亡的人的手里，这些武器是非常厉害的。冲锋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房子被烧，建筑物倒坍。他们居然忍心用密集的炮火轰击我们安置老人、儿童和病人的院子。自从伯利恒大屠杀后，我主耶稣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的尸体。自从耶路撒冷毁灭以来，上帝也从未见过这么多女人的尸体……”

拉曼内斯问：

“您为什么逃出来？是怎样逃出来的？”

“他们控告我是革命指挥部的人员。他们对我进行了缺席审判，判我死刑。我是靠掘墓人救出来的。他们把我夹在大批尸体里一起运出了里昂城。被屠杀的群众都埋在离城市四公里的乱石堆里。我被运到那里，然后就不停地逃跑，搭乘农民的小车、步行……现在我的命就在您神父的手中。”

回到家后，又只剩下他和神父两人。神父说：“在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上，有一颗钉子就是人的自私。”

费兰茨沉思良久，好容易才说出话：

“我应该举行音乐会来救济他们。”

神父愤慨地摇摇头：

"孩子，你不要施舍……你应该在别的方面为他们做好事。你要把他们记在你的心里。你要把他们的事迹传下去，让别人也看到和听到这种悲惨可怕的毁灭，让人们永远记住两个鲜血淋淋的大字：里昂！"

他在写新的作品《里昂》。纸上第一句话就是里昂战士们的口号："为劳动而生或者为战斗而死！"他在绘制这部特殊交响曲的战斗画面（暂时还是用钢琴乐谱的形式，因为他还不相信自己创造的管弦乐的效果）。就在他为新的创造呕心沥血，投入自己全部精力的时候，巴黎似乎已经成为过去而且离开他越来越远……如果把母亲接来，把书籍、乐谱和文稿都运到这里来，他就可以不再需要巴黎。他写的稿子越堆越高，他对自己同玛丽的关系也越来越感到特殊。现在应该同她谈谈。他现在还没有忘掉里昂的炮火，它象起火的房屋迸炸出来的火星那样，还在强烈地、痛苦地烧灼着他的皮肤。

他拚命地工作。拉曼内斯不得不硬把他拖到外面去作长时间的散步。神父精力充沛，身体健壮，需要消磨自己的体力。他经常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气不喘，心不跳，汗不流。他和费兰茨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是圣日内维韦山。山上有座孤零零的小教堂，住在周围的人越来越少，因此长期没有人去维修它。一场深秋的暴风刮毁了小教堂的钟架。以后又下了一场大雪，压坍了拱顶，最后装嵌着铅玻璃的窗户也都掉下来了。这已不再是上帝的庙堂，而是可怜的破旧畜棚。它唯一的装饰是一尊雕工粗糙的木圣母像。她的脸象农妇一样坚定，搂抱着痛苦万状的耶稣的双手，象土地或者说象救世主的血一样红。教堂的管风琴犹如阵风，透过破玻璃窗，穿过既没有锁也没有门把的门缝，为寻找出路呼啸而过。拉曼内斯常常默默无言地跪在圣母像

前，态度极为虔诚，看样子他根本忘记了周围的世界。

有一天，他变得特别爱说话。

他说，几年前，他看到了一次幻影，他没有把它记下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一直严守秘密，只是现在才作为一个狂热虔诚的预言家告诉费兰茨：

"……在那一年第三百六十五天的深夜，天空一片漆黑，七个国王在一起开会讨论有关人和权力的问题。最强大的国王举起装满了人民鲜血的酒杯：该死的耶稣，他把自由带到了人间；在他未降临世界之前，谁敢站在我们面前？他的宗教想把我们赶下国王宝座；我们应该取谛耶稣的宗教！

这时另外一个国王也举起了酒杯：我们不仅要粉碎他的宗教，而且要消灭科学、思想，因为思考问题的人总是想反对权力！

第三个国王插话说：对，必须扼杀一切思想。不过，如果我们只消灭信仰和思想，人的灵魂相互同情的本能和语言依然存在。一个人不满，另一个人会去帮助他；一国人民叫苦，另一国人民会拿起武器保护他们。因此，我们必须窒息任何传播人和人、人民和人民之间同情心的声音。

第四个国王建议使用挑拨离间的武器。只要使每个国家、城市、农村、房子、家庭和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利，他们就会用相互的仇恨来代替彼此之间的谅解。

第五个国王祝酒时说道：让人们变得卑鄙无耻，使他们永远心惊胆战；刽子手总是真正国王的第一个大臣。

第六个国王的提议最令人可怕：败坏他们的道德；道德是强者的盟友，而我们需要的是软弱无能的人民。

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看刚才发言的情景，最黑暗的夜晚已经从地狱的最深处唤起了新的黑暗，一切罪孽和邪恶都被动员起来危害人类。这时，只有魔鬼自己还没有发表意见。

在黑夜的最黑暗的时刻，第七个国王站了起来：可是我们怎样才能使人民离开耶稣呢？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我的意见是，我们必须争取耶稣手下的神父……用财宝、地位、权力去赢得他们。让他们向人民发出赶快抛弃耶稣和对我们祈祷的命令。”

《里昂》正在构思中。文稿越堆越高。革命的号角响起来了，战鼓声激动人心，向反对耶稣的邪恶势力发起冲锋！可正是在这时候，他收到了一张小条子：“我需要您！玛丽。”拉曼内斯没有留他，也知道留不住他。一行字的小条子一下子就毁掉了两个男子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他们两人原来都以为自己已经为思想和信仰建造了最坚固的、任何女人的力量也摧不垮的堡垒。可是这一行字居然使费兰茨立即收拾行装，甚至几乎是不辞而别——因为他害怕神父责怪和挽留的目光。一天后，他和她又在一起了：

“怎么啦，玛丽？”

“露易苏病得很厉害。我母亲说，这是在赎她对上帝犯下的罪孽。”

“您母亲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她全都知道。”

“是您告诉她的，还是她猜着的？”

“这我已不记得了。她是如何知道的，无关紧要。现在我需要的是你站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孤单单一个人，没有任何支柱，实在受不了周围环境的压力。我感觉到，他们都认为我是孩子生病的祸根，丈夫、母亲、哥哥……也许甚至孩子本人都这样认为。”

一个星期后，小姑娘至少看起来是复原了，她又跑到花园里去玩。他俩坐在凉台上，听着孩子从远地传来的踢球声和英国

保姆隐隐约约的说话声。爱情又重新到来。他们每天都在写信，传送条子。信中用各种化名和小名，开各种玩笑，天天山盟海誓，倾吐思念之情，感情热烈到几乎可以点燃信纸的程度。

费兰茨的嗅觉和皮肤的感觉还在怀念和拉曼内斯在布利塔格山上共同度过的纯洁美好的日子，怀念神父的盛情和教诲，怀念创作劳动的幸福激情。可他还是觉得呆在巴黎好些，因为这里有玛丽。许多人在街上看见他们时，总是爱转过身去相互窃窃私语：这是李斯特——然后心照不宣地挤挤眼睛——和玛丽·道格尔特。听到这些议论也是一种享受。另外，在巴黎还可以见到永不熄灭的火炬——柏辽兹。前不久，他一气之下抛开了贝尔丁总编辑先生，而去投奔《音乐报》的"大头头"施莱辛格。柏辽兹是个善于把失败也说成是胜利的苦中作乐的人。他向费兰茨热烈地解释说：

"贝尔丁先生想把他全家都压在我头上，因为他是编辑，妈妈是诗人，女儿是作曲家……我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以致第二天我不得不去同施莱辛格进行谈判。我向他建议：您应该创办世界上第一张音乐报纸。您只需要表示支持，解开一个钱袋就行了……其余的事我来办。我可以找来李斯特、海涅、乔治·桑、圣佩韦和道蒂古……但是绝对不要斐提斯，因为只有博物馆的动物陈列室才需要这种老犀牛和鳄鱼标本。"

费兰茨好容易才找到一个说话的机会：

"肖邦和乔治·桑呢？"

"亲爱的朋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的波兰人从情网中逃了出来，乔治·桑一直还在崇拜他。先生，您知道肖邦是个多么胆小的男人吗？我崇拜我的朱丽叶，我用温情和爱情的音乐编织桂冠，放在她的脚下……但如果象乔治·桑这样的女人向我抛出情网，我是不会破网逃走的……我甘心充当幸福的囚徒，即

使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费兰茨询问柏辽兹新近的创作。他拿出了一本崭新的乐谱：《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费兰茨迅速翻了翻总谱，然后坐下来开始弹琴。柏辽兹一边听他弹，一边热烈地解说：

“这部曲子本来是为帕格尼尼写的。他对曲子极为赞扬，但是不肯演奏，因为他学不会……他已经老了，脑子象一块湿透了的海绵，再也不能吸水了。后来我就让乌尔汉去演奏。”

钢琴声刚刚停下，柏辽兹就继续讲巴黎的消息：

“罗西尼先生已经停笔不写……不久前有人请他写一个新歌剧，他拒绝说，他现在只研究烹调艺术。但是梅耶贝尔却大不相同……！现在全世界都在演出他的作品，这是上帝对那些搞音乐创作的小人物们的惩罚！我一直等着切鲁比尼和斯波蒂尼不再创作，后来都实现了。现在这个最饶舌的罗西尼也终于不说话了……但是梅耶贝尔还不行！他会比我们任何人都活得长久。他一百岁以后也会象只为一家人做饭的厨师一样，倾倒出各种各样的音乐符号，因为他了解这家人的口味……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巴黎人的坏胃口。他能满足每个巴黎人的要求。他知道哪些人爱咏叹调加上酱汁，哪些人喜欢二重唱加上凉菜，哪些人欣赏尾声再加上香槟酒……他真是个该死的家伙！在这么多意大利和德国厨师当中，一个可怜的法国作曲家还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不过我正在写一部新作品，它将会扫除所有的厨师王朝。《本凡努托·切里尼》这样的歌剧一百年或一千年内只能有一部。”

两天没有得到玛丽的任何消息。

第三天派人送了一封信去，但是没有带来回信。他忧心忡忡，在道格尔特家周围转来转去。正好有一个女仆人走出来。他本来想装着偶然相遇，但由于着急，装得一点也不象。他的声

音充满了忧虑和紧张：

“你们府上出了什么事？”

女仆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她怎么也不懂“你们府上”这个字的意思，因为他把伯爵家和她这个女仆人说成是一家人了。姑娘害怕地问：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老伯爵夫人和年轻的……？”

女仆人慢慢明白过来：

“小姐病得很厉害。”

在这种生死攸关的紧张时刻，人平时在高兴的时候觉得最愉快的事也会变成负担。如果是平时，能够同奥斯博、赫尔茨、斯塔玛第、郎伯夫人、姆尔·莱罗等人同场演出，能够得到斯托伯尔博士的荣幸邀请，共同研究几百年的音乐历史，本来会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可是现在？另外，费兰茨还担心教会对拉曼内斯的迫害：教皇命令他去罗马接受处分，并以教会的诅咒惩罚他办的战斗性很强的报纸。

不过，费兰茨主要的心思还是在玛丽身上，所以上面那些事情也就显得不那么尖锐突出。他想请母亲去看她一次，让她知道，他不仅是她的情侣，而且是她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一天早晨，听见有人在敲门。费兰茨立即披上外衣去开门。毫无疑问，这是玛丽派人送信来了。

门口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矮而壮，面孔晒得又黑又红，看样子他从来也不戴帽子。如果不是红黑脸上有一双可爱的孩子式的眼睛在微笑，人们会觉得这个人很可怕。另一个男人浑身是黑色衣服，脸上有刀痕，头发象乌鸦翅膀一样。他还有一张凯撒大帝式的嘴巴，站在那里，威风凛凛。

费兰茨失望地请他们进去：

“找我有何贵干？”

两个客人郑重地作了自我介绍：

“戴莱基·山道尔伯爵。”

“李克诺夫斯基·费里克斯公爵。”

他们边进门边说明来意：他们要找一位决斗助手。李克诺夫斯基公爵遭到了别人的侮辱，要举行决斗，需要两位匈牙利助手。他选中了戴莱基伯爵和李斯特·费兰茨。

费兰茨只好把他们请进办公室。戴莱基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戴莱基的父母把他送到德国，希望他能学一点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他学德国哲学学得倒了胃口，于是去投奔李克诺夫斯基公爵。公爵使他当上了西班牙王位争夺者康·卡洛斯、玛丽亚·约夫、伊西多拉·德·波旁公爵的卫士。这比黑格尔哲学可要有趣得多了。可是他不久就发现，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帮着王位争夺者打仗，是一种最危险的差使。争夺王位的双方都保持着伟大的西班牙宗教裁判的可怕传统。他们砍掉俘虏的手脚和脑袋，或者把俘虏扔进河里。戴莱基伯爵和李克诺夫斯基公爵差一点也遭到这种结局。他们正要被拉出监狱，绑赴刑场。神父已经为他们作了最后的祷告。这时幸亏来了一个性情开朗的法国人（名字不大记得了，好象是什么雷赛布工程师，天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他靠着比宗教裁判还要古老的西班牙传统，给监狱长送了几块金币，给狱卒塞了几个银币，给刽子手送了几支高级雪茄烟，就把两个年轻人从监狱里带走了。先是乘船，后来又坐马车，一直来到巴黎。他们在这里第一个碰到的人就是那个把他们出卖给刽子手的混蛋将军。李克诺夫斯基打了将军两记耳光，将军还没有来得及还手，就又挨了两下耳光。现在他已经找到了两个决斗助手，地点在布洛涅森

林。这将是一场生死决斗。

奇怪的是，生命的严格法律从来没有自认的正义法律那样有力量。费兰茨不得不跟他们到布洛涅森林去迎接对方的两个陌生的决斗助手，然后在毛毛细雨下和湿漉漉的草地上跺着脚走来走去，看着蓄络腮大胡的蒙特哥罗将军（费兰茨只是现在才知道这个"叛徒"的名字）甩下大衣，扔下衬衫，光着满身是毛的上身，象一个从牢笼中放出来的野兽，准备进行决斗。他从头到尾看着李克诺夫斯基公爵脱衣服作准备：解开领带，把衬衫扔到衣服堆上，接过一把军刀，在空中挥舞几下，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好象是帕格尼尼在长期停演之后又重新拿起了渴望已久的拉弓。这不是什么决斗，而是两只发狂的、浑身是刺的野猪在树丛中来回奔跑，与其说是在伤害决斗对手，还不如说是在伤害潮湿的树杈。公爵的步伐很有派头，他不大跑动，只是有时躲一躲对方的刀锋，有时往前窜一步扰乱对方的刀法，然后猛砍一刀，不过不是用刀刃，而是用刀背。将军的肩膀、胸脯、脸上全是红红的印痕，似乎对方使的不是军刀，而是鞭子。决斗助手过来干预：尊敬的先生，这样斗法是违犯规定的！李克诺夫斯基用刀行了一个礼，然后继续决斗，突然猛的一刀把将军砍倒在地。血从将军的肩上不停地流出。医生几乎无法止住流血。这场决斗是不可能保密的，特别在路易·菲力普统治的巴黎，更是如此。因为这里——至少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是和平、资产阶级化和安全可靠的首都。报纸很少报道结束里昂斗争史的最后枪声，但是对李克诺夫斯基公爵和蒙特哥罗将军的决斗却大书特书。这种丑闻必须停止传播。费兰茨亲自去找了内务部长。这次谈话不能说是愉快的。在部长办公室的大皮门后，在路易十四时期的家具摆设中，在散发着香水味的部长会客室里，一个秃头先生对客人大发雷霆：

“您不需要自我介绍。我认识您。在某些方面我还是钦佩您的。但是我反对一个在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受到当时还是奥尔良公爵的国王陛下如此照顾的艺术家，现在去参与各种破坏活动：圣西门……拉曼内斯神父……后来又是什么流血决斗，而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不愉快的政治后果。国王陛下从来不支持卡洛斯争夺王位，王国政府不允许卡洛斯的冒险分子在这里避难。我将下令把李克诺夫斯基公爵和您的同胞押解出境，送交西班牙的合法当局。”

费兰茨慢慢抬起头来盯着发怒的秃头：

“真的吗?!”

“不这样做不行呵！否则怎么处理这些外国人？他们会给法国带来祸害的……”

费兰茨不慌不忙地插话说：

“可是你们却在到处宣扬，说法国是伟大的母亲，她拥抱每一个避难者……”

发怒的小秃头擤了擤鼻子，以掩饰自己的不安。过了一会，他轻声地问：

“那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可以的话，我请求让他们留在法国，我愿为他们作担保。”

费兰茨的麻烦事又来了。戴莱基带来了一个吉卜赛孩子，而且要费兰茨教他音乐。戴莱基这个象印第安人似的粗壮汉子虽然没有学会哲学，但却具有一双识人的慧眼。费兰茨也喜欢上了小约西，他天真活泼，总是叫肚子饿，调皮得可爱，活象一条小狗。他拉的是一把破旧的小提琴。他常常从安娜腋下偷偷伸过手去拿盘子里的东西吃，同邻居的所有脏孩子打架。从外面

回来的时候总是带着胜利的伤痕，不久前还是崭新的衣服变成了破布条。尽管这样，他却自以为是凯旋归来的英雄。戴莱基也弄不清楚这个孩子究竟是哪里人。不久前，有一个吉卜赛乐队来到巴黎，这个小孩不知道怎么就脱离了他们。戴莱基收容了他，然后又把他交给费兰茨。如果不是女人的现实感帮助了他们，这两个成年人可能会整年地逗小孩玩。安娜找来一个教员，让他不仅教孩子拉小提琴，而且还教他怎样使用刀叉和口纸，什么时候该洗脸刷牙，如何掌握ABC的秘密。

他们给孩子穿上新衣，把他送到教师那里，缴了学费。可是第三天，约西就跑回家，一头钻进安娜的厨房里胡闹。他还只有十几岁，但已经懂得用完整的逻辑来为自己辩护：

“这些学问我反正也学不会……还是拉小提琴好。可是我比那位教师先生拉得好得多……”说着说着，他就装出老师那种枯燥无味的拉琴姿式。而他是怎么拉琴的呢？他拉琴时姿式舒展优美，富于幻想，象蟋蟀在叫，似黄莺在唱，因为他是从美丽的云霞和无垠的碧空学习乐律的。费兰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抱起他，吻他一下，然后一起上街，重新给他买一套新衣服，给他一点零用钱，又哄又骗，把他再次送到教师家：

“好好学习，约西。以后你会明白学习对你的用处的……”

约西站在教师家门口，卑躬地吻了吻费兰茨的手，然后去拉门铃。他还回头看了一下。费兰茨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的目光：这是一头忠实而听话的小狗被强迫离开自己敬爱的主人时的目光。

过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也许是一年（费兰茨的时间观念完全糊涂了），收到了一行字：

“露易苏去世……”

谁也不知道小姑娘的葬礼是什么时候举行的。据说，跟在小棺材后面送葬的只有两个人：弗拉维格尼侯爵和玛丽·道格尔特。

消息灵通的巴黎人这一次不灵了。道格尔特家里没有透露出任何消息。一天晚上，正当费兰茨在雕琢他的革命音乐诗《里昂》的时候，安娜从门缝里钻进头来通报：

“玛丽……”

她进来了，浑身黑素。她揭开了面纱，下意识地伸过脸来：

“亲我吧，我的朋友。”

费兰茨给她脱下外衣，让她坐在这间屋子唯一的一把舒服椅子上，好象她是一个刚刚生过病或者还在学走路的小孩子。他什么也没有问。他等待玛丽先开口。

在很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她终于说话了：

“孩子去世了……她的小坟墓在我的生活中造成了可怕的隔阂。她的父亲不仅愚蠢，而且没有良心，甚至可以说是残忍无情。关于我的哥哥莫里斯，我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担心要是说出我的想法来，会是对人类和上帝的犯罪。这孩子不仅是我唯一的宝贵露易苏，也是弗拉维格尼——道格尔特——贝特曼三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站在我一边的只有我的母亲。”

“您没有通知我……”费兰茨胆怯地插了一句。

女人抬起眼睛盯着费兰茨。真奇怪，简直令人可怕：这一双女人的眼睛并不悲哀。她冷冷地，几乎是敌对地看着他：

“你现在应该站在我一边……”

“任凭您吩咐，玛丽。”

“明天我同母亲动身去瑞士伯尔尼暂住一段时间。过些时候，你也到伯尔尼来，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费兰茨马上与母亲商讨了钱的问题。他不同意安娜动用父亲在时积起来的、现在存在埃斯代尔哈兹公爵庄园的储蓄。这笔钱是不能动用的。他给母亲留下了半年的房租费和一年的零用费，把学生分给了肖邦、希莱、赫尔茨和普莱耶尔夫人(即原来的莫克小姐，她曾经是柏辽兹和希莱的灵感，后来继承了普莱耶尔的财产，成了巴黎最受欢迎的艺术家和教授之一)；为朋友们留下的通讯地址是：贝伦斯旅馆，伯尔尼。

母亲没有哭泣，也没有悲伤，她用巨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她的本能要求她用十个指头留住自己的孩子，因为他在还没有开始生活之前，就已经把它毁了。玛丽比他大。也许大六、七岁……？谁也说不清楚。她这样不顾羞耻地抛弃了家庭，将来会遭到社会的谴责，连累年轻的费兰茨。但是安娜还是沉默不语。这并不是因为她害怕、胆怯，而是因为她冷静地看到，她的儿子一定得走，一个孤独的老太婆最多也只能劝说几句，但儿子肯定不会接受。她默默地收拾行装，只是在拿东西的时候才发现两只手都不听使唤。她下意识地整理衣服，收拾什物，仿佛用的不是双手而是机器，它们的动力不是意志而是无可奈何。

费兰茨一下子从沸腾的热水池跳进了冰冷的海洋……

他从热气腾腾的巴黎直奔瑞士的一个小城市。这个小城市睡过了整个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打过盹，现在刚刚开始苏醒过来。它奇怪地发现，世界上一切都在更新、变化，冰块正在溶解，春天即将到来，可是这里依然故我：古老的水井，井上的彩色雕塑，狭窄的街道两旁挂着迎风招展的商号布幔：鞋匠、裁缝、编织工、木桶工、钟表匠、首饰铺、成衣店等等。古老的教堂象地窖一样寂静，散发出潮湿的霉味。太太们和费兰茨住的旅馆里，床上铺着怪物似的枕头和厚厚的毛毯，到处都有一种使人想起

太平间的干净的怪味。

他们在一起吃午饭。老侯爵夫人现在已经不再是那种雍容华贵的贵族太太，而是同任何一个普通的城市或农村妇女一样的女人眼看自己唯一的女儿走上毁灭的道路而毫无办法，因而只好毫不掩饰地悲伤流泪。不过她还能注意文雅地请费兰茨入座，替他盛汤，递给他面包，然后站起身，扔下餐具，冲出餐厅。

晚上，三人一起进行了一次尴尬的谈话。实际上只是玛丽一个人在讲：

"现在母亲可以安心返回巴黎，您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回家后，令人遗憾的是，您将会面临更严重的问题。人们将散布流言蜚语，乘机造谣污蔑，追究我的过去，诽谤我的现在，窒息我的未来。母亲，您老人家应该保持沉默，任凭他们去瞎说。您的名誉、哥哥的名誉都是无懈可击的。我将自己维护自己的名誉，"她很快纠正了这句话，面朝费兰茨说："我们将自己保护自己。"

第二天，老侯爵夫人启程回巴黎。她的马车门刚刚关上，他们两人就动身去日内瓦。

他们在日内瓦泰巴桑街和贝尔斯·费尔斯街交叉口租了一套房子，正好对着侏罗山。每隔一刻钟，教堂顶的钟声就要响一次。早晨、中午、晚上，庄严的大钟总是敲出 B—G—E…F—D—B的声音。

房东和同居的房客们对这两位旅客的来历是有所怀疑的。不过二、三百年来，他们总是很愿意把自己的房子租给路过瑞士的外国人。正是这几百年的经验告诉他们，好奇是不礼貌的，也是有害无益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用审视的眼光研究这一对

年轻人，因为他俩没有任何结婚证件，只是所谓的“良心婚姻”。这种婚姻在巴黎、在远离上帝的天主教徒当中也许完全有效，但在卡尔文派教徒①的心目中，却只能是罪恶、令人愤慨的淫荡和对上帝的亵渎。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李斯特先生和道格尔特夫人从不拖欠房租（他们预付了一年的租金），而且夫人除这些外还给同居的房客们以各种各样的好处，因此日内瓦的卡尔文派的教徒们也就不大去管他俩的事了。费兰茨还去日内瓦音乐学院作了一次礼节性拜会，这使得他们两人的道德信誉有所加强。听说李斯特要来拜会的消息后，学院的全体教员都来了。那种气氛就如同当年厄尔巴岛的居民在自己小小的村庄里突然看到了波拿巴·拿破仑一样。全体教员在院长办公室列队迎候。这间屋子至少在那些刚从巴黎来的人看来，显得特别敞亮、干净，但充满了小市民的俗气。费兰茨表示他很愿意在这里教课，这一来使得教员们更加感到惊讶不止。自从音乐界的拿破仑、被放逐在厄尔巴岛上的音乐之王将在学院讲授钢琴课的消息传出之后，人们对音乐学院议论纷纷，反响很大。

玛丽离开巴黎之后，性格也慢慢发生了变化：玛丽·道格尔特好吃醋了。随着费兰茨学生的增加，这种嫉妒心情也越来越严重。有一天，肖邦的情人玛丽·波托茨卡女伯爵来到日内瓦（来意不明），要求费兰茨收她作学生。终年流浪的贝尔基约瑟家庭，包括仍然漂亮得很危险的公爵夫人和她的两个音乐业余爱好者的兄弟也都来了。他们一到，在巴黎举行过的家庭音乐会就迁到了日内瓦。诗人缪塞的妹妹也专程赶来，要求拜费兰茨为师。

---

① 卡尔文派教徒，信仰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卡尔文的教徒。卡尔文(Jean Calvin, 1509－1564)是法国人，其主张和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要求。

青年艺术家李斯特原来幻想能终日在奥贝曼山谷中，眺望冲天的高山峻岭，享受森林的新鲜空气，欣赏冰河的源泉和平滑如镜的山湖，欢度寂静孤独的隐居生活，但结果不得不看到，这里同巴黎一样，他又被湍急的旋涡所包围。接踵而来的不仅仅是学生，而且还有不少新朋友，他们摆脱了日内瓦居民心胸狭隘和小市民目光短浅的束缚，结成了保护这两个被放逐者的联盟。在这些朋友中，研究凯尔塔语和古印地语的学者阿道尔夫·皮克蒂特尤其显得突出。他不仅是这些专业知识方面的活字典，而且作为人来说，也特别有吸引力。在他身上丝毫也看不到巴黎人的矫揉造作。他从不发誓咒诅，也不会每天都发现某种能揭示一切秘密的箴言。皮克蒂特是个枯燥无味、慢条斯理和深思熟虑的人。他的性格总是使费兰茨想起日内瓦湖畔的钓鱼翁：在无边无际的科学秘密之湖上耐心地坐着；从不仓促行事，忙乱无章；从不对隐藏在水面下的鱼儿生气发火。他静静地等着，让科学研究的奇迹自己来上耐心和学识之钩。同其他爬山运动员一样，皮克蒂特长得精瘦有力。他特别喜欢爬侏罗山，而且不止一次地带上费兰茨。

青年艺术家李斯特二十四年来一直过着最紧张的生活，现在总算找到了寂静。他经常爬到很远很高的地方，在那里连飞鸟展翅的声音也听不到。他的旅途同伴也从不打扰他的宁静，因为皮克蒂特是属于这样一种很少有的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他们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脚下是流动起伏的象绸巾一样的云层，它遮住了山谷、湖泊和沿山的古老城市。过了一会，云雾滚滚，打破了一切距离，把遥远的东西都带到身边：在几里之外闪光的教堂尖顶似乎就在眼前，在湖上漂泊的小船好象是一片乌黑的刀片，正在切割着缓慢流动的湖水。

一片寂静。

他感觉到了一种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过的东西。这是一种油然而生、飘然而去、静静来到然后又突然高飞的感觉：创作愿望。他在日内瓦这种难得的新鲜空气和山区的寂静安详气氛中，感到了愉快的昏眩，获得了幸福的激情，引起了创造的渴求。

也许是由于皮克蒂特干巴巴的学者式性格的影响，他还懂得了艺术创作不仅需要激情而且需要勤奋的道理。有的作品目前还只是一种计划设想，但有些已经慢慢形成了最后的架子：《里昂》、《巡礼舞》、《教堂钟声》、《奥贝曼山谷》、《退尔教堂》等，另外还有几首即兴曲，如山区牧民的夜曲、轻松愉快的终曲等。这些都是牧民的音乐，是他同皮克蒂特一起散步时听到的音乐。

第一个音乐批评家是玛丽。她说的批评意见是费兰茨今后在充满斗争的生活中不知道碰到过多少次的三个字：我不懂。是的，费兰茨作为钢琴艺术的拿破仑，把帕格尼尼的魔鬼艺术、柏辽兹文艺复兴时期的富丽色彩、肖邦轻声细语的热情自述变成了自己的血肉和细胞；他还学习了雨果的思想，把丑和美、高尚和卑贱融化在同一粒丸子里。但是他现在尝试的是一种新的音乐，一种更透彻、更明了、更坦率、更朴素的音乐。每当他自己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毛骨悚然：我能做得到吗？我真地敢这样做吗？

费兰茨给日内瓦人带来了一件又一件意外的事。他被音乐学院院长请了去谈酬金问题。年轻的艺术家只是耸了耸肩："我免费讲课！"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令人惊叹的漂亮姿态，实际上使瑞士人感到有点生气。这种怀疑金钱是一切精神和道义价值的标准的人，显然也怀疑社会秩序在其他方面的铁的法律。他的放荡生活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归根到底说来，他是一个革

命者。我们虽然给他避难权，但是我们不得不担心他什么时候会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他会象硫酸一样毒化日内瓦社会生活的平静而温暖的湖水。费兰茨同自愿从巴黎流亡到此的金·詹姆斯·弗锡结成了朋友。弗锡在法国首都被警察局看作是过左人物，一直受到“关怀”，以致最后不得不回到故乡日内瓦来。他在一家报馆里当编辑，在大学里讲授课程，成了日内瓦左派政治家们的领袖人物。他每次讲课，费兰茨都去听。他讲课的题目是非常吸引人的：欧洲走向民主的道路。弗锡起初有点看不起这个新学生。他的眼睛从浓密的、思索的、带有一点责怪意味的眉毛下，轻蔑地打量着年轻人：这个家伙到我们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后来，他们慢慢谈起话来。有时是教授送艺术家回家，有时则是费兰茨送弗锡回家。最后，他们共同作出了一个有益的决定：费兰茨报名上大学，听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哲学家德尼斯和生物学家德堪多的课（德堪多还研究法学；作为艺术协会主席，他是日内瓦艺术生活最主要的保护人）。

西斯蒙第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可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陪同皮克蒂特和费兰茨去山上散步。他不仅研究意大利中世纪城邦历史，写过三十一部有关法国历史的书，而且对欧洲现代经济结构极感兴趣。他钻研经济生活的神秘循环过程，研究它如何使金钱由这个国库、银行、钱柜流进另一个国库、银行、钱柜；探讨欧洲的新组织机构问题，工厂和矿山如何成为它的神经，工程师、工人、设计师和企业家如何组成它的细胞。总之，西斯蒙第教费兰茨的，正是圣西门主义所缺少的东西。他对经济职能的研究虽然还是原始的，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

西斯蒙第把自己的得意门生又转交给哲学家德尼斯。他比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更能吸引学生。德尼斯教谢林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这些课使费兰茨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

己的思想：如果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新的东西，那就会扼杀一切发展；用荷马的标准来衡量，圣亚各斯顿肯定是违犯规定的，而用圣亚各斯顿的标准来衡量，则卜迦丘和彼特拉尔卡应该是笨蛋；莎士比亚可以判拉辛死刑，而按照拉辛的要求看，《浮士德》只能是个怪胎；所以，对一部作品必须用它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不要把天才限制在古希腊强盗普罗克鲁斯特的规则之床上，而是应该使哲学和美学的“床”适合天才的体型和精神的大小。

费兰茨不断使人们感到意外。他为意大利革命流亡者举行音乐义演，支持贝尔基约瑟公爵夫人发起的慈善事业。整个日内瓦都为他不肯接受酬金而感到茫然。那些能干、勤奋而节俭的日内瓦人不信任他，当费兰茨最后终于决定为自己举行音乐会时，他们都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现在，这个大城市的小市民们对圣西门、拉曼内斯、西斯蒙第、弗锡和德尼斯的学生进行了一次气量狭窄的报复：抵制参加他的音乐会。费兰茨一生中曾经受过许多考验，这一次又受到了自我克制和艺术良心的考验。他不能把那仅有的几位听众弃之不顾，他按预定节目单从头至尾为他们演奏了贝多芬、韦伯、柏辽兹、肖邦的作品，然后又弹奏了自己创作的描写日内瓦钟声、泰尔教堂、奥贝曼山谷和里昂暴动的乐曲……他充满了自由的幸福热情，就象在雁群前面飞行的排头雁一样，不断回顾身后的队伍，发现它们远远落在自己后面。

不管他多么为自己千辛万苦争取来的“野蛮自由”感到骄傲，但还是不得不注意巴黎人在自己背后说些什么。

据从巴黎传到日内瓦的谣言说，道格尔特伯爵在听到玛丽私奔的消息后，只是耸了耸肩：“我受得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弗拉维格尼家族宣布同私奔者脱离关系。这不仅仅是道义上的抵制，而且是从法律上剥夺了她的一切财产继承权。

巴黎的上层人士曾经对浪漫主义小说家们的丰富多采的幻想赞叹不已，也为小说中所描写的女主人公因为寻找人的真理而破坏婚姻流过同情的眼泪；那些心善的贵妇人曾为玛隆的不幸遭遇而悲伤，同情过《印第安娜》的女主角。但是现在，同样是这些人在怒气冲冲地反对逃到日内瓦去的情侣。他们两人在太阳下再也没有地位，至少是在巴黎的太阳下不能再有立锥之地。

不过那些好朋友并没有袖手旁观，背信弃义。乔治·桑，特别是柏辽兹和施莱辛格都在帮助他们。主编《音乐报》的杰尼鼓励费兰茨写作，如果他本人来不了巴黎，至少也可以让自己的文字出现在巴黎的报刊上。

起初，费兰茨准备写一篇特别的文章，题目是《未来的宗教音乐》。后来他自己也为这篇过分大胆的文章感到害怕：

> “今天，圣坛已经动摇不稳，讲经和宗教仪式已经成为人们怀疑和挖苦的对象，在这种时候，艺术应该离开教堂的内壁，到外面去寻找广阔的天地。为了做到这一点，必不可免地要创造一种崭新的音乐。这种音乐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艺术，它将紧密而广泛地把戏剧和教堂结合起来，这种音乐应该是严肃的、神圣的、丰富多采的、热烈的、不受限制的、狂风暴雨似的、平静的、纯洁的和发自内心的。《马赛曲》比任何印度、中国和希腊传说都更有力地证明了音乐的力量。因此在创造新的宗教音乐时，必须以它和其它歌颂自由的美妙歌曲为我们的样本。是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人民的儿子和女儿、男人和女人将都会唱这些歌。让这

个伟大的时代早日来临吧！那时候艺术将会得到充分发展，变得完美无缺，并用兄弟联盟的铁链把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创造新的奇迹！”

玛丽仔细地阅读了这篇文章，提出了很多意见。最后她建议还是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为好，反正可以写的命题有的是。可奇怪的是，不管他们写什么问题，即使是最和平的问题，里面也埋藏着炸弹和火药桶。费兰茨后来写了关于艺术家地位的文章。李斯特的这份宣战书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艺术家现在生活在社会集体之外，因为在现代国家的生活中，已经没有诗人和宗教的成份。社会艺术已经不存在，或者说还根本没有诞生。今天我们遇到的是些什么人呢？是雕塑家？不是，是制造塑像的工厂主；是绘画家？不是，是粉刷工；是音乐家？不是，是音乐制造商。到处都是工匠……那些作为艺术的真正孩子而生出来的艺术家虽然清高、独立，但是他们不能不承受悲惨的痛苦。真正的艺术家看到，他被艺术制造商和工厂主所包围，这些人把自己的才能完全用于去满足群众的多变心理和没有教养的富人们的幻想愿望。真正的艺术家最后不能不把这些工匠当作是自己的兄弟，看到群众对他们一视同仁的现实。”

巴黎的反应并不大好。对于用各种腔调进行评论。有的讥讽，有的愤慨，有的诽谤。总之，他们对来自日内瓦的预言抱着敌对的态度。有些人骂得特别凶，譬如说象费兰茨这样的艺术家，处在象他那样的社会、政治、物质和道德地位，生活得象国

王，占据着好多女王，还有国王般的财产，当然落得说漂亮话。巴黎在挖苦李斯特·费兰茨，丝毫也不怜惜他的艺术成就、私人生活和写作风格。他在《音乐报》发表的论文的风格确实是有点问题。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只能把错误归咎于自己。他在不应该让步的地方表现出自己的软弱(或许是温柔)。他对玛丽总是那样顺从。因为玛丽怀孕了。医生嘱咐她除必要的散步外平时应该多躺少活动。玛丽只好经常躺在床上读书，后来读厌了，就把许多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书籍使劲地扔得到处都是。她总是想干点什么事，可是医生要她躺着。又没有人同她谈谈心。她讥讽地说，那些教授老爷们爱上了费兰茨，只找他，不找她。教授老爷们的夫人总是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避免同玛丽见面。最后，她总算找到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她可以帮助费兰茨写作，但实际上是夺去费兰茨手中的笔，自己动手写。她旁征博引，不断提出新的思想。费兰茨在这方面也听从她的话。因为他爱她，可怜她，担心她的情绪和身体。这位曾被整个巴黎娇惯了的美丽女人，现在躺在非常干净整齐和无限凄凉孤独的房间里，唯一的乐趣就是修改和整理他的法文著作，当然有时还帮他重写。费兰茨不愿意为这些小事埋怨她。他总是抚摸着她美丽的金黄头发，同意地点点头：改得好极了，玛丽，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幸运的是，这些文章虽然掺杂了玛丽的水份，但有些思想仍然不能不引起内行人的注意和重视。费兰茨主张教会音乐、戏剧音乐和交响音乐的最优秀代表每五年聚会一次，共同评出前一时期最成功的作品，然后在巴黎罗浮尔博物馆里展出；由法国政府买下这些作品并印刷出版；用这些收入作为建立本世纪音乐博物馆的基金。杰尼、施莱辛格和柏辽兹还吃惊地读到他的另一些建议(可想而知，这些建议在一些外行人当中会引起

多大的震惊)：普通学校也应该进行音乐教学；不要只在音乐学院讲授音乐艺术(也就是说，不要只允许未来的艺术家受到专业教育)，应该在巴黎和所有其他法国城市建立学校网，让那些不是音乐艺术的创造者而只是音乐艺术的享受者也能学习音乐。

《音乐报》编辑感到，这张报纸正在由于费兰茨的思想而燃烧起来：在大学设立音乐哲学和音乐历史课程；同工业和商业协会一样，各种职业的和业余的乐队、合唱团、音乐团体也举行年会，讨论哪儿错了，哪儿对了……建立音乐的民主生活。

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圣诞节前几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给孩子取的教名是布兰丁。瑞士的冬天雪花纷飞、空气清新。这个美丽富饶国家的圣诞节就象一个理想之国的圣诞节一样，快要降临人间。人们在打扫和粉刷整个城市，成千上万的烟囱青烟缭绕，直上云霄，似乎有无数的阿贝尔在上帝宝座面前献祭。人们很快发现，上帝慈悲地接受了这一切祭品，因为各家炊烟都冉冉上升，整整齐齐地飘向天堂。就是在这种感恩的气氛中，太太、小姐们纷纷来探望玛丽，并且向她说了一切在这种时候应该说的话：……这孩子的小脸蛋多么白嫩……小嘴巴多么好看……小手又是多么柔软……脸部表情充满了聪明智慧……就是他的咳嗽声听起来也象音乐一样好听……。

玛丽很难忍受这些人的探望，因为她感觉得出来，这是人们有意把偏见和不满放在一边，在对她发善心。可是玛丽至少也同费兰茨一样为他们"野蛮的自由"而骄傲。她不会演戏，不会装出甜蜜的微笑去感谢这些庸俗市民的好意。她躺在床上，孩子就在她身边。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因为流血过多而精疲力尽的雌虎。她等待着时机，等到能喘过气来就立即同那些折磨她

的人去搏斗。

大雁离开雁群无论多远，总是不断回头环顾。费兰茨也是这样。他现在是那么愉快、激动，因为有了孩子，一种特殊的骄傲感充满着他的心怀；他今年刚刚二十五岁，就已经是一个"幸福的父亲"；他能够有胆量冲破一切阻挠，同他过去的生活决裂。尽管如此，原来的李斯特·费兰茨仍然没有一下子全部消失。他每天细心阅读巴黎报纸。有一个人的名字老是压在他的心头。这个人就是西吉斯孟德·泰尔贝尔格。巴黎的各家报纸都说泰尔贝尔格是一位新的奇妙的钢琴艺术家，他能使人们忘掉一切，觉得过去任何一个弹过钢琴的人都是多余的。泰尔贝尔格是个崭新的人物。泰尔贝尔格高雅无比。泰尔贝尔格不怕任何技术上和音乐上的困难……。他弹的已经不是普通的钢琴。在他的手指下，钢琴变了，变成了神奇的竖琴。它美妙的声音使听众飞向神话世界，使他们得到最难得的艺术享受：连绵不断和纯洁悦耳的和音。

有什么可以否认的呢？费兰茨的朋友们也被泰尔贝尔格的艺术天才所折服。《音乐报》是这样，斐提斯也是这样。这一点使费兰茨特别感到伤心，因为他一向把这位比利时学者看作是自己的老师——至少是在音乐史和音乐理论方面。施莱辛格也站到泰尔贝尔格一边去了。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不可能去反对整个世界。客观现实对费兰茨提出了一个揪心的问题：也许反对泰尔贝尔格是不对的？也许整个世界是正确的？泰尔贝尔格真的使人们忘掉了所有的伟大前辈？也许真是发生了什么奇迹，就在拿破仑被困在厄尔巴岛狮笼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拿破仑，他竟创建了那么大的英雄业绩，以致马伦戈和奥斯特里茨的辉煌战果也显得如此渺小？

这是可能的吗？十五年来，他呕心沥血，准备创造一种崭新

的，配得上时代的，要比四、五千年来全部走过的路程还要远的音乐；他同拉曼内斯的思想进行争论，从帕格尼尼那里借来色彩，在皮克蒂特率领下周游吠陀世界①，同歌德结交朋友；他创造了新的音乐体裁——交响诗，并且正在设法把钢琴变成神妙的乐器，让它发出魔鬼似的激情和人道主义的声音，就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无名之辈突然脱颖而出，赶上甚至超过了他，使他的整个痛苦寻求、自我折磨、坎坷不平的道路变得完全多余，这是可能的吗？

玛丽给予了英雄般的回答，这是一个女人所能够给予的最勇敢的回答："你到巴黎去一趟，听听他究竟弹得怎么样。"

费兰茨到达巴黎的时候，泰尔贝尔格已经离开了。费兰茨只好先去找他最坚定的朋友柏辽兹。很自然，费兰茨提出了第一个也许是唯一的问题："你认为泰尔贝尔格怎么样？"柏辽兹毫不客气地说："我不喜欢钢琴家……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没有学会弹钢琴。我喜欢的是音乐家……"。他朝着费兰茨露出了他难得露出的微笑："我喜欢音乐家……就象你这样的小伙子。"

他还去探望了肖邦。这位波兰艺术家现在依旧是那样高雅、细腻，享受着整个宫廷的支持。但是他终究不再是往昔的肖邦了。他呼吸时总是发出一点嘶嘶的喘气声，就好象刚才走得太快或者跑过步一样。他的眼睛放射出炽人的光芒，太阳穴上的皮肤透明晶亮，布满了细小的血管，活象一张仔细画出来的解剖标本图。

只是在走出大门的时候，冯塔纳（肖邦在有礼貌地告别之后没有送客人）才告诉费兰茨，肖邦生病了。原先他们以为巴黎的生活和气氛损伤了他的神经，后来又怀疑他的心脏有毛病，只是

① 吠陀世界，吠陀是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梵文"知识"的音译，主要指宗教知识。作者在这里借喻为广阔的知识海洋。

最近才确诊是肺病。他必须离开巴黎。演出的事连想都不能去想。恐怕连教学工作也得放弃。

费兰茨接着去访问了小埃拉尔德。

这位年轻的公司老板表示他将给予一切支持，就象他父亲在世时支持费兰茨一样。埃拉尔德家的沙龙永远听从李斯特·费兰茨的支配，而且不需要任何酬金。费兰茨接受了这座免费的大客厅，举办了音乐会，不过没法面向广大群众。他只请了一些朋友：杰尼、施莱辛格、柏辽兹、音乐作家道尔蒂格。道尔蒂格是拉曼内斯推荐的。当然，神父肯定会来，如果愿意的话，斐提斯也可以来。

在音乐晚会开始前几分钟，马车已经切断了埃拉尔德大楼周围的所有通道。有近五百人请求，不如说是要求进入音乐晚会大厅。有的发出威胁，有的用金钱贿赂，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拿出了某大臣的介绍信，有的甚至说自己就是大臣级的官员。他们把守门人吓得半死。最后埃拉尔德不得不亲自出面处理入场请帖问题，但是他发现这些来客都是巴黎圣日耳曼区的上层人物，对这些人他是不能不卑躬屈膝的。怎么办？他只好急急忙忙跑进去找费兰茨，向他通报：内部音乐会已经成了公开的音乐会。当然，费兰茨可以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宣布说：我不演出了。

但是他能这样做吗？

在这个问题还未来得及提出以前，他就决定了：演出！

他演奏的是贝多芬《第一〇六号钢琴奏鸣曲》。但丁在探视一个更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巴黎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这是一个阴沉忧郁、毫无光彩的地下世界，只有那些在生活中遭受最大苦难的人，只有那些在十字路口不去选择幸福的欢笑，而

是选择热泪的旋涡的人才能走进这个世界。接着是快速的节奏，用铁锤敲打的急速拍子，犹如一个巨人在敲击地狱的大门。再下去是艺术家慷慨的陈词，凄凉的哀吟。听众这时当然最愿意把这种哀吟变为一种温情脉脉的悲诉。但是哀吟不是哀求。奏鸣曲的三个主题以变奏曲的形式继续展开，充满了活力和节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回答，表现了复杂的、富有生活激情的音乐技巧和痛苦折磨的感情。

五百多人挤在不久前刚刚扩大的埃拉尔德大客厅里。他们也都知道，他们将是一场严峻考验的见证人。一个年轻人坐在钢琴前面，他可以比当代任何一个音乐艺术家都弹得更高雅、更漂亮、更吸引人。但是他放弃了廉价的轰动。他弹的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他不得不再举行一次音乐会。根据卡米尔的愿望或者说请求，第二次音乐会在普莱耶尔大厅举行。又是拥挤不堪的听众。又是一些大臣、大臣秘书、贵族、世界闻名的艺术家和半交际花们围着他转。只要他签一个字，就是一张入场请帖，也可以说是一种难得的奖励。他又演奏了贝多芬的作品和自己的乐曲，当然也演奏了当代伟大音乐家韦伯、柏辽兹、梅耶贝尔、肖邦的曲子，以表示对他们的崇敬。音乐会又获得了旋风似的成功。人们回到家里，愉快地睡上一觉，第二天一醒过来就急切地去向那些不如他们幸运能出席音乐会的人传播自己难得的经历："手法非常新颖，确是独具一格……他选的乐曲简直使人认为他是一个古怪的人……泰尔贝尔格就不这样……弹得更细腻、更动人……当然，李斯特是非常有才能的，他被迫的流亡生活和在山区的孤独隐居几乎使他发疯了。"

柏辽兹的坚定令人感动。他说李斯特是神话中的英雄，他

猜中了斯芬克斯[1]的最难猜的谜语——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柏辽兹还特地去安慰李斯特，高度赞扬了他的新作品，并且宣布：在这一切之后，我们可以期待作曲家李斯特创作出任何最好的作品来。

本来他已经可以回家了，但是由于要会见几个亲密的朋友，不得不继续留在巴黎。他努力说服自己，这些会见对他的前途、艺术创作和写作是十分重要的。他非常想见见朋友，尽管在日内瓦的朋友都是些杰出的人物，但是在那里他为了说明白一件事需要做十分钟的报告，而在这里只要使一个眼色或者诙谐地加重一点语气就行了。不过他在巴黎和里昂的逗留使他良心上感到不安，为了履行义务，他隔几天就给守候在日内瓦的情人写一封信。

巴黎，一八三六年五月

我同缪塞共进午餐。他对我们的事谈得十分坦率、真诚。夏天他将到日内瓦去。那时我会把他介绍给您的。

巴黎，一八三六年五月中旬

昨天我去拜访了拉马丁。他是第一个坦率提出问题的人：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回答说：我的一生已经决定只献给一个人，这是绝对不变的。对另外一件事的献身则是有条件的和附带的。绝对不变，这是对您，亲爱的。有条件的，这是对艺术。

---

①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将行人杀害。今常用以隐喻"谜"样的人物。

拉马丁再一次推心置腹地同我谈了话。他非常夸奖您。尽管他反对我们决定的事，但是他仍然认为：人们应该对您表示同情和尊敬。

就在写这些情书的时候，李斯特高兴地访问了乔治·桑，愉快地同莫里斯和小梭伦基一起玩；陪着缪塞、海涅和肖邦去听密茨凯维茨热炽而激愤的诗歌朗诵。实际上他们已不是在听一个诗人的朗诵，而是在听一个预言家的演讲。快到夏天的时候，李斯特又回到了日内瓦。

他俩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玛丽严厉指责李斯特，甚至不顾她那比平时尖得多的声音会引起邻居的注意。看样子李斯特长期在外面使她感到愤怒，她讲的那些冲动言词都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她的狂怒是针对过去整整一年的。她认为现在住的地方是监狱，是强制性的孤独，或者象她说的那样，是日内瓦的封锁区。现在她已经清醒过来，发现了她失去的一切东西：华丽的晚会、早晨上街买东西时的漫游、女友、嫉妒、巴黎上层社会的香水味和她老家马棚的稻草味；发现了她为之苦恼的原因：巴黎，巴黎，巴黎！难道她真的要为这个带着微笑来到她所崇拜、向往而又仇恨的巴黎的人抛弃自己的一生吗？她竟然为他生了孩子，为他承受了近十年来最大的丑行所造成的奇耻大辱？而他现在却居然象一个有教养的家长一样，只亲亲她的额头，早晨吃饭时只顾翻阅堆满在桌上的信件，她为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玛丽象演员一样地逐渐进入了角色。这个演员开始时还记得自己是在按照导演的指示演戏，后来就同扮演的角色一致起来，完全在表演自己了。玛丽也是这样。起初她只是想按照既定的作战方案惩罚一下迟迟不归的情人，但是后来忘掉了自己的原

有方案，越来越感到生气、委屈，最终则发展成为绝望，不仅言辞冲动，而且嚎啕大哭，演出了最后的一幕：摔倒在孩子的小床前，双膝跪下，直到躺在地板上。费兰茨把她扶了起来，抱在怀中，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因为痛哭、愤怒、绝望和激情的表演而变成僵硬石块的身体放到床上。

当天晚上、第二天，两人都不肯和解，都默不作声。以后由于再也不需要用冲动的言辞交锋，因此他们之间经常是沉默无声。

费兰茨想用开玩笑的办法来消除紧张气氛。他开始给她写信，但是得不到回答。早晨，他坐到玛丽的床沿上，试图用亲切、温情的语言同她谈话，也没有用处。

第四天，玛丽总算开了口："我太轻浮、太急躁了。随随便便离开可靠的河岸走向旋涡的人，并不是在水中陷得越深越好。相反，他应该有勇气回头上岸。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我要上岸。我在国内也许能找到个安身的地方。即使不是在巴黎，至少是在法国。"她用有点局促不安、充满痛苦的眼神看了看费兰茨："您应该明白，这样下去我受不了。让我们现在就分手吧！现在分手还是时候，还不会因此而相互仇恨和蔑视。"

一八三六年六月，费兰茨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想重返巴黎同您一起生活。母亲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而您对我来说比母亲还要重要。离开您这么遥远，我怎能幸福呢？如果一切事情都能象我希望的那样，我将会得到自由。那时我就可以把我的一生都献给您……。"

费兰茨和玛丽就是这样在玩耍，象小孩似的，毫不负责任。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道路是不能同任何河流、旋涡、回头是岸等等相比的。即使真是这样，他们也应该避开旋涡，共同坚持下去，冲向彼岸，因为任何方向的道路都是畅通的，只有一个

方向除外，这就是回头路。

他们两人已不再吵架了。有时还能打破沉默说几句话。他们忠实的学生和朋友皮埃尔·沃尔夫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一点愉快的变化。沃尔夫把这个小家庭的三个成员玛丽、费兰茨和布兰丁安置在自己父母家里。热情的家庭式的气氛使玛丽慢慢失去了好斗的精神，有时候甚至能坐在钢琴附近听听费兰茨弹琴。家庭危机似乎使她稍微软化了一点。她有时候也能带着一点理解的样子点点头说："很好，虽然使人感到有些陌生、遥远，但还是很好。可惜听的人不多，不是全世界都在听……。"

当夏季来到日内瓦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变得平静、和谐，虽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烈火般的感情。他们争吵了只有几个星期，但是两人都似乎成熟了好几年。在风暴之后，更感到宁静的可贵。双方都能注意这一点。玛丽好象放弃了女王的骄横傲慢，变得客气了一点。她比较近人情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表现出比较温柔的女人气了。几个月前，如果她听说乔治·桑同她两个孩子和女仆人要到这里来，肯定会大发雷霆。因为她没有任何兴趣去同这个女海妖进行较量。乔治·桑具备了一切优越条件：才华出众，态度认真，享有盛名，魅力十足，生活浪荡……。如果她早一点来，玛丽肯定会大闹一场，决不会同意见面。但是现在她温顺地点点头，说："既然我们去不了巴黎，那就让巴黎到我们这里来吧！"但是事实驳斥了玛丽的预言。乔治·桑一家人并不是作为法国上层人士来到这里，而是象海盗一样占领了卡诺尼克斯山区旅馆。这两个女人都穿着紧身裤，长头发一直散到肩上，看起来十分可怕。因为这种打扮使人感到，她们不仅是费兰茨的亲戚，而且是同性人。费兰茨穿的也是紧身裤，头发也披散在肩上。梭伦基和莫里斯把自己装扮成小海盗。女仆人穿着深黑色的衣服，也不想为这种沉闷的家庭打扮带来

任何色彩。幸亏皮克蒂特教授也在这里，总算有了一个能代表规规矩矩的瑞士风格的人。不过教授的存在并不能影响其他人。每到晚上，旅馆的客人都把房门堵起来，并且请旅馆老板保管他们值钱的东西。乔治·桑是特别喜欢开玩笑的，她一看到这种情景，就更加想捉弄人：既然这些瑞士小市民和来自英国的旅行者如此胆小，那就更应该整整他们。白天，这两个女人故意用脚步丈量饭厅的长度，用探视的眼光搜寻东西，以增添旅客们的疑心，使他们都深信这些女海盗是在看他们的财物和钱袋。这两个女人还有意用自己编的暗语说话，而且说得特别响，就象一群野蛮人要开始进攻文明人时一样。然后，她们拿起了旅客登记簿，由费兰茨填写："……音乐家、哲学家，生于巴拿苏斯，来自绝望之处，走向正义之路……"乔治·桑则更进了一步，她逐项填写了旅客登记表。"旅客姓名：皮浮士一家；住址：大自然；来自何处：上帝；去何地：天堂；出生地点：欧洲；职业：流浪人；证件签署日期：无期；职衔来自何人：公众舆论。"

乔治·桑比任何人都了解人，更何况是对男女伴侣之间的复杂关系。她在几分钟内就发现了两人之间的裂痕，而且确诊是"无聊烦闷之症"。她一面请皮克蒂特教授带着大家翻山越岭，一面自己亲自动手整顿她朋友们的命运。她说："泰尔贝尔格又到了巴黎。同他相见是不可避免的。音乐季节一开始，费兰茨就应该去巴黎。玛丽就住在我家。在诺汉特镇，谁也不敢动您一根汗毛。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的家乡是一个魔术般的帝国，外界的习惯和法律在那里是行不通的。仇恨、阴谋、诡计在那里吃不开，人们喜欢的是一种天真无邪、常常被人们挖苦、已经过了时的感情——博爱。"

玛丽从爬山运动中，从这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女人身上，从开始还是迷迷糊糊但后来越来越健康正常的欢乐中得到了解脱。

几个月来第一次感觉到，她确是生活在人世上。但是她仍然没有失去她那“日耳曼式”的观察人生的眼光。她凝视着乔治·桑，心里不断盘算：“这个女人究竟想要我干什么？想要我们干什么？想要费兰茨干什么？那么多男人围着她转，她还想要什么……”不过玛丽还是表示接受邀请，尽管态度是冷淡的。

乔治·桑的诱惑力在她离去后也没有减弱。费兰茨经常给她写信。乔治·桑把他的信很快就转给了杰尼。信中说：“我坚信，对艺术作品要有一定的理论批评。但是任何人也比不上艺术家本人对自己艺术作品的批评。这种想法也许会使您感到很特别，但请您别见笑。您相信吗？一个善良的艺术家在一定时期之后，当他的灵感热情已经冷却下去，当他已经从胜利的陶醉或失败的懊丧之中清醒过来，他会比世界上任何文艺批评家更清楚地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作品的缺点是什么，这些缺点来自什么地方。从这里只需要向前再走一步就行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高尚精神，向群众真诚和勇敢地承认这一切。这难道有多大困难吗?!”

勇敢的思想会产生勇敢的行为。费兰茨说艺术作品的真正批评家是艺术家本人，接着他就亲自去进行“手术”，但是令人担心的是，死的将不是病人，而是医生自己。费兰茨开始以非凡的勇气分析泰尔贝尔格使整个世界为之屈膝倾倒的狂想。

“在泰尔贝尔格先生的作品中，我看到的只是平庸和单调。认为这种看法不公正和过分严厉的人可以去看一看泰尔贝尔格的幻想曲。由于他的东西不多，很容易就可以读完他的全部作品。第一个印象就是它们

缺乏思想，而且缺乏到这种程度，以致我们都不想去找一找他的思想。他的音乐没有任何意义。它是一种‘舒适的音乐’：它不会使人们感到任何新奇，没有任何新颖的东西。整张整张的乐谱充满了幼稚轻浮的和弦与半音音阶。他每一个节拍的速度一样，每一个速度的快慢也一样，好象都是一八二四年由某一个音乐沙龙里的音乐机器制造出来的……”

回答这封信的人是另一个大对手斐提斯：

“对你的友谊使我必须坦率告诉你，你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有杰出的才华，你克服音乐技术困难的本领是举世无双的。你把从别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你没有新的思想。你只是某种音乐学派的后代，而且已经固定化，再也没有新的思想。你把一种快要落伍的东西捧到顶端，但是你并没有创建新的学派。新学派的艺术家是泰尔贝尔格。这就是你们两人之间的本质区别……”

战斗的意志使费兰茨无法平静下来。他继续进行可怕的“手术”。他给斐提斯回信说：

“您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您的博学多识是惊人的。您在艺术领域中立下的功勋也是无可辩驳的。但是不管您的学问有多大，也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您不能不加调查研究，就自封为最高权威，盲目地对表演艺术和音乐创作方面的专业问题发表评论。毫无疑

问，如果您能劳驾耐心地研究一些作品，也许能作出公正的判断。但是教授先生，您没有这样做。因此，您的某些评价……是没有价值的。”

泰尔贝尔格问题使人们忘掉了费兰茨和玛丽受到的屈辱。巴黎的公众又在心情激动地等待着李斯特·费兰茨的到来。笔战只是一些特权人物的欢乐，当两人面对面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古典式的娱乐——最大的马戏。这将是角斗士们的一场生死搏斗。恺撒大帝最后会用他的拇指朝下面的角斗场一点：你们杀掉那个没有用的家伙。不是因为我们生费兰茨的气，也不是因为他的丑行使人讨厌（巴黎很快就忘掉了玛丽和费兰茨的事，已经很少有人谈到它了），更不是由于某种道义上的愤慨才下这种结论，而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习惯如此：在一场角斗中，总得有人杀人，有人被杀……让这个匈牙利的吉卜赛人完蛋吧！这个家伙迄今总是获得成功，这一次可能要自食其果了。

谁也不同意费兰茨写的争论文章。甚至出版家施莱辛格也不同意。他虽然勉强同意发表这些文章，但是在文章最后加上了一句尖酸刻薄的话：编辑保留自己不同于作者的意见。

没有关系，文章会比温室里的花凋谢得更快。今天整个巴黎还在讨论它，明天就会觉得连提到它也是可笑的事。争论文章象花一样凋谢了，但是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也没有减退：究竟谁胜谁负，是李斯特还是泰尔贝尔格？

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初，费兰茨又出现在巴黎。十八日，他同柏辽兹一起演出。节目是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和歌剧《尼奥伯》中的幻想曲。

音乐厅里坐满了高等听众。李斯特的崇拜者们来不了，因为票价太贵。在大厅里只能听到轻轻摇动扇子的声音（这使人

想起了伺机进攻的巨蟒的嘶嘶声)，还有由谈话、轻笑、私语、开包厢门、调音和女人过响的笑声混合在一起的、无法分清的嘈杂声。这些声音既不表明李斯特将会胜利，也不表明他会失败。这种嘈杂声就象一张巨大的没有表情的脸，既看不出激动，也看不出其他情绪。这张脸定下了音乐会第一刻钟的气氛。冷漠的无聊情绪在整个大厅中蔓延，就象在不通风的粮仓中散发出霉味一样。费兰茨刚要开始弹钢琴时，心中闪过一个愉快的念头；玛丽幸亏不在这里，她肯定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紧张气氛……。在他随着柏辽兹指挥棒的动作弹琴的时候，令人痉挛的紧张心情逐渐松弛下来。他已经感觉到使人得到幸福和自由的音乐节奏，就象游泳的人刚刚浮出水面时那样清楚地听到一切声音，听到了钢琴胜利的琴键声。他感到已经不是柏辽兹在指挥他，而是他自己在带动整个乐队……。掌声并不很热烈。人们在互相观望。如果那些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在这里，这场斗争就可以定局了。可是在这里的只是巴黎圣日耳曼区的高等女士和绅士，她们虽然无法使李斯特失败，但是也不愿让他取得真正的胜利。掌声，不很热烈的掌声……下一个节目是《尼奥伯》幻想曲。刚才是近百人的乐队，现在只是一架孤零零的钢琴。连那些最高贵的女士们和花花公子们也不得不注意了。这架孤独的钢琴不仅代替了，而且也使人们忘记了整个乐队。这是一架独具一格的钢琴，它忽而象喇叭狂号，忽而似中提琴呻吟，一会儿象雷鸣电击，一会儿又发出弦乐队的和声。听众着了迷……连巴黎圣日耳曼区的上层人士也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了，甚至有人在中间最激动人心的时候鼓了掌，使整个听众席猛吃一惊，但接着仍是死一般的寂静。

掌声，欢呼，要求再来一次！巴黎的高贵女士和先生们现在又象一年前或十年前那样热情了。胜利了！但这种胜利不能多

次重复，因为这是连最强有力的精神和体力也会为之消耗殆尽的胜利。

一八三七年一月十八日、二月四日、十一日和十八日又举行了音乐会。李斯特同中提琴手乌尔汉和巴塔同台演出贝多芬的钢琴三重奏鸣曲和几首二重奏鸣曲。这次来的已不是巴黎圣日耳曼区的高贵先生和女士们，而是真正的音乐爱好者。这次演奏的是一种被巴黎的音乐权威们早已遗忘了的音乐体裁——室内乐。它自我克制，简单朴素。它避免一切妖艳的色彩、撕裂的声音和哗众取宠的手法。可是当时那个世界却主要是喜欢这些东西。因此这场演出对艺术家和听众都是一次特殊的考试。能取得完全的成功吗？很难说。听众总是想把自己看得更高明一些，显得更内行一些。有时他们的掌声与其说是出自内心的美感，还不如说是出于礼貌。演出是否真的成功了？说不确切。但是人们终究是坐在那里听他演奏。他们就坐在这个非常急躁好动、总是想猎奇的巴黎城的中心。是胜利吗？是的，是胜利！泰尔贝尔格演奏的是贝多芬"最得人心"的曲子，把最好的酒变成了酸汤，而李斯特和他的两个朋友演奏的却是第七十号、第九十七号和第二百二十一号等优秀作品。他忠实地、虔诚地演出了这些作品，不管听众是否会因此而减少，也不管音乐的真正爱好者是否会在一场大型世界博览会上，由于音乐市场上的酒店老板们会给他们喝更迷人、更令人兴奋和更便宜的酒而厌烦高贵的名酒。

一八三七年三月十二日，"所有的人"都聚在巴黎的意大利剧院里。泰尔贝尔格在举行音乐会。费兰茨躲在三楼的一个包厢里。是朋友们把他偷偷送进来的。他正在仔细观察这位奥地

利艺术家和他自己。羡慕和嫉妒是否使自己丧失了判断力？没有。他在冷静地，甚至可以说是在宽容地观察泰尔贝尔格。这位艺术家出场的时候好象不是钢琴演奏家，而是奥匈帝国的全权代表。他在燕尾服的左襟上挂满了勋章。他那修饰得非常整齐的络腮胡子使费兰茨想起了童年时期在埃斯代尔哈兹庄园看到的大管家。泰尔贝尔格过来了。他走路时身体挺直。他站在钢琴旁，接受人们的崇敬。他向听众微微弯腰时，特别是对阿波尼伯爵包厢的方向，腰弯得更低一些。然后又向宫廷方面来的皇亲贵胄表示了非常动人的敬意。路易·菲力普国王也亲临音乐会。听众们狂热地呼喊。也不知道是在欢呼——至少是在这个晚上——国王还是艺术家本人。估计首先是在欢呼国王，因为他不久前幸运地摆脱了费也齐案件的麻烦。这个疯癫而堕落的意大利人（有些人说他是科西嘉人，甚至有人说他是波拿巴·拿破仑的亲戚），这个轻浮的意大利冒险分子居然想谋杀国王，向全世界发出警告：耍嘴皮的人是不能当法国国王的；这个国王欺骗了意大利和波兰的爱国者，把那些曾经拥护他坐上国王宝座的穷汉又送上了断头台。巴黎圣日耳曼区的达官贵人们现在在欢呼他们的国王和在听众席中就座的最高检察官，因为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判处了费也齐和所有想谋杀国王的人死刑。国王在包厢里站起来，接受人们的欢呼，然后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艺术家可以开始表演了。泰尔贝尔格弹得确实是好。琴声象珍珠一样地滚动，它们是那样和谐，没有任何机器能够这样完整地发出音乐节奏。泰尔贝尔格坐在钢琴旁，就象一个有经验的老爷学赶马车一样，虽然也拿着缰鞭，有时还使鞭子发出呼哨的声音，但是他的腰和肩却纹丝不动。他把肘子松松地放在两腰旁，表示他的表演只是种优雅的艺术，不需要过分使用力气。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节目也是这样天真无邪、毫无变化，因此特别使

人——至少使费兰茨——感到厌倦。但是听众越来越高声欢呼，泰尔贝尔格只好临时加演了有名的贝多芬幻想曲。这时费兰茨突然扭动了一下身子，好象遭到了雷击。流畅的节奏同音乐巨人贝多芬的曲子配起来，就象是让一个衰老的平民坐在皇帝的御马车上，用那些费兰茨十分鄙视的、愚蠢的华丽装饰去侮辱人，惹人生气。费兰茨站起来，迅速离开了包厢。

一八三七年三月十九日，李斯特·费兰茨在大歌剧院举行了音乐会。勒古韦写的评语是："李斯特完全陶醉在音乐之中。他不断地向后甩他的长头发，他的嘴唇露出胜利的微笑，眼睛闪闪发亮，苍白的脸因为内心的火焰而变得红润。音乐大厅的空气中充满了电光火花，大家似乎听到了闪电时的隆隆雷鸣。……他的演奏包含着一种喜剧性的、匈牙利式的、吉卜赛人的东西……。"

勒古韦自己也没法判断第一次战役的结果，究竟是谁胜利了？谁被击败了？是李斯特第一，还是泰尔贝尔格第一？勒古韦没法发表意见。因为如果真要他发表意见，他就只能倾向李斯特。

在这以后，两人又分别举行了多次音乐会，有时两人甚至同台演出，表演同一节目，但都未能决定胜负。音乐会的主人贝尔基约瑟女公爵说：泰尔贝尔格第一，但李斯特举世无双！她的这句名言使她从此变成了李、泰之争的权威专家和最高仲裁。人们都期待她再次组织李、泰会演。女公爵为了援助意大利革命者，不久又举行了一次义演音乐会，请来了巴黎最高贵的绅士和女士们，并且特邀泰尔贝尔格、李斯特、埃尔茨、皮克西斯、肖邦和卡尔·车尔尼等著名音乐家参加演出。人们的注意力很自然地集中到车尔尼先生的身上，因为他曾是李斯特的老

师。人们希望从他那里刺探一些关于这个"伟大吉卜赛人"的童年秘密，了解李斯特小时候究竟表现出过哪些才能。车尔尼对李斯特是十分了解的。他不喜欢人们的胡猜乱想，因此生气地拒绝回答这些令人讨厌的问题。他只是淡淡地说："李斯特童年时勤奋、正派。他可怜的父亲为了他不仅牺牲了自己的职业，而且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就是这么一些情况。"

女公爵的音乐会是一场诗人比赛会。六位艺术家都演奏贝利尼的《清教徒进行曲》。李斯特最后一个登台。这次晚会实际上决定了李、泰之争的结果。李斯特不仅表演了自己的手法，而且在某些段落里还表现了泰尔贝尔格的"方法"、车尔尼的严谨作风、肖邦的幻想色彩、埃尔茨和皮克西斯的悠闲熟练，最后用超过贝利尼原著水平的终曲结束了这场音乐会。

这是一次特别的、令人深思的演奏。它表明李斯特能够做到泰尔贝尔格、埃尔茨、皮克西斯或车尔尼所能做到的一切，而且比他们做得还要稍微好一些。其他这几位——肖邦除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李斯特额头上有一个标记，凡是走近他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个标记：奇才。

玛丽曾同乔治·桑商量好在诺汉特镇等待费兰茨。但是乔治·桑派去的一辆马车不仅接来了费兰茨，而且还接来了另外一位客人——肖邦。这是一种尴尬而紧张的场面。费兰茨还记得，肖邦曾经激动地拒绝同乔治·桑保持友情的建议。现在两人要见面了，总应该想办法作点解释，帮他俩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才好，即使这种解释可能是愚蠢的、一捅就破的。但是肖邦一路上保持沉默。当马车跑到通向乔治·桑别墅的沙土道上时，费兰茨才发现肖邦的脸色象石灰一样死白，太阳穴上的细小血管

显得比平时更加青蓝。

在别墅前迎接的几乎是一个接待委员会。玛丽抱着小布兰丁，乔治·桑带着好动的梭伦基和老往后躲的莫里斯。塞勒斯坦小姐也在场，还有著名画家德拉克鲁瓦。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莫里斯少爷的家庭教师。当他看到费兰茨的惊奇眼神时，连忙又补充了一句："请别误会，我只教他绘画，在其他方面他比我懂得更多。"德拉克鲁瓦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预示了他们在这里度过的整个夏天的气氛。在这里，大家都想客串点什么。肖邦为莫里斯的木偶剧谱写乐曲。玛丽成了翻译家，把乔治·桑写的几个小故事从德文译成法文。费兰茨奇怪地发现，当乔治·桑称赞说"亲爱的，译得很好，这确是文学翻译作品"时，玛丽的脸上竟会出现连爱情也激发不出的红润。塞勒斯坦小姐也在演一种角色。如果有人狠敲别墅的大门，强烈要求会见闻名世界的主妇，塞勒斯坦小姐就穿上乔治·桑的衣服去接待来客。她化装成伟大的女作家，巴尔扎克、雨果、缪塞、拉马丁的女朋友，人们的灵感（也是人们的晦气星），对妇女平权、可能爆发的土耳其战争、中国皇帝的后宫、坐汽球旅行、写小说的诀窍、犯罪率不断提高以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大发议论。这一家从大人到小孩都在做戏。当那些被弄得稀里糊涂的访问者昏头昏脑地走出别墅时，已经弄不清楚自己刚才是在地球上还是在一千零一夜的神话世界里。在这场戏里，乔治·桑演出得最少。她是费兰茨所曾见过的最勤奋的工人。如果客人闹得太厉害了，她就离开别墅住到森林中的一间小房子里去。那里长满了各种攀藤，装有一扇又旧又锈的铁门，看起来比她的高级别墅更接近于她的小说题材。这时乔治·桑正在写当时最时髦的家庭小说《莫普莱特》。费兰茨是唯一受到她信任的人，因此有时候她给他读几段正在创作中的小说。

费兰茨以信任来回答信任。他也给她“读”自己正在写作的乐曲。不过他“读”的时候需要钢琴和强烈的灯光。费兰茨还为乔治·桑演奏根据贝多芬交响乐改写的钢琴曲。琴声响彻楼下所有的房间，冲向楼上，象一面迎风飘展的旗子飞向塔尖，几分钟后就把全家都吸引到琴旁。乔治·桑躺在地板上铺着的熊皮上面。一条腿弯着，另一条腿叠在上面，嘴里叼着一支钢笔，两手垫在后脑勺下。她的身子轻轻地摇晃着，好象是躺在一条被神秘乐声的波浪拍打着的小船上。德拉克鲁瓦飞快地在素描，画完一张马上又拿起另一张纸。玛丽靠在房门旁，侧着脸。因为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她这种姿式最美。房门的阴暗背景更加衬托出她窈窕的身材和洁白的肤色。她象保护神一样站在那里欣赏自己的作品，因为费兰茨现在弹的曲子正是在她给于灵感之吻后才谱写出来的。

琴声早已消失，乔治·桑从熊皮上爬起来，伸伸懒腰，捶捶肩膀，然后摇起手铃：塞勒斯坦，我饿坏了。

女佣人马上行动起来，就好象女主人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吃过饭一样，现在一定要让她好好饱餐一顿。

“亲爱的，您想吃什么？”在这间房子里，人们没有等级，只有小名，或者只说：亲爱的。

“煎鸡蛋、青蒜、一块小腊肉，还要一杯葡萄酒。不要太多，每人一小杯，让我们共同庆贺我最亲爱的朋友、独占鳌头和举世无双的李斯特万岁！”

在这些夏季的欢乐（钓鱼、打猎、捕捉蝴蝶、打弹子球、游泳、森林散步和工作、工作、工作）后面，阴影最后终于遮住了整个天空。肖邦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乔治·桑表现得特别耐心，而且要求两个孩子也这样做。但是莫里斯和梭伦基同一般孩子一

样，害怕病人，总是尽可能躲开他。肖邦感到了这种裂痕，但是他还是努力想同孩子们保持友情。这就变成了打猎和逃跑的游戏，使肖邦特别痛心。病人的心胸是狭窄的，而两个孩子却总是缠着费兰茨，不愿意离开他一步。这已不单单是孩子们对某个人的热情，而是一种孩子式的爱情了。乔治·桑也常常愿意多看看这个漂亮修长的人。玛丽感到，这里迟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最多只是因为天气炎热，乔治·桑和费兰茨开始在深夜工作。两人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的两头。一个在创作《莫普莱特》后代的故事，另一个在写贝多芬交响乐的钢琴演奏曲。两支笔不停地在动。两人都没有想到要用一个动作或一句话去影响对方的工作。玛丽在一旁仔细观察他们。有时候她偶然在窗前站一会，看到的只是两支笔在那里疾书。

一天深夜，或者应该说是黎明，费兰茨很晚才上床睡觉。玛丽往常总是假装睡着了，等着费兰茨去亲吻她。但是这一次她没有这样做。她穿好衣服，坐在窗口前等待着。

“怎么啦？”

“没什么。”

“为什么不睡觉？”

这一下子话匣子打开了：玛丽之所以选中费兰茨，并不是因为他身体的魅力吸引了她；她只是想与他同甘共苦，支持他的工作、斗争。乔治·桑算什么家伙？她有什么权利占有他？玛丽立即自己作了回答：乔治·桑是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庸人，她用自己的一些愚蠢的经历去迷惑男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女人也能象他们一样写作，争论，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

玛丽忍不住大哭起来，背朝着费兰茨说：“这种气氛我受不了。我非常可怜肖邦，但是我并不喜欢他。必要的话，我可以同

大家一起笑，但是实际上我反对乔治·桑的恶作剧。我不愿同她在一起。我担心她会把你夺过去。”玛丽越哭越伤心，起先还坐在床沿上，后来干脆躺下去了。她很长时间一动也不动，最后突然说：“我决不把你让给任何人！你是我的！”

深夜，整栋楼房闹哄哄的。肖邦不行了，得赶快从邻区请医生来。医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要求马上把病人送往巴黎的医院。但是乔治·桑怕他受不了路上的颠簸，主张留在这里。她为肖邦作出了从未为男人作出过的最大牺牲：停止自己的工作，整天在病床旁侍候病人。她亲自给他冷敷、喂食、洗脸。几天后，玛丽宣布：他们想走，他们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给主人增添麻烦。乔治·桑没有挽留她和费兰茨，只是在分手的时候讲了几句：“好多人在说我的坏话。我担心我可能比人们议论的还要坏。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能保护我。你们去告诉人们，我是很容易同情别人的人……一个真正能同情别人的人，不可能完全是坏人。”

他们终于离开了诺汉特镇。

但是上哪儿去呢？回日内瓦？没有任何意义。回巴黎？如果玛丽不去，那行，但是同她一起回巴黎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们变成了没有家的人。

这个小家庭决定先去里昂。在路上，费兰茨给远方的朋友皮克蒂特写了一封信：

“我的朋友，我离开贝利省到了里昂。在这里，我发现周围有那么可怕的苦难和惊人的贫困，我的正义感要造反了。当一个人袖手旁观里昂居民在徒劳无益

地同折磨他们身体和灵魂的苦难搏斗时，这是一种极大的痛苦。老年人不得休息，青年人毫无前途，孩子们没有欢乐。他们都拥挤在一些臭气熏天的破房子里……。正是这些没有立锥之地的人用自己满是伤痕的双手做出了美丽的丝绸、沙发，让那些有钱人去享用……。自从耶稣宣布人类博爱以来，已经过去十八个世纪，但是人们仍然同当时一样不理解他的话。这个社会就象医生一样，他企图把一些死亡的迹象掩饰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治病，医治好人们的创伤。那些掌握国家命运的人忘掉了一点：人民是不会永远容忍下去的，在长期痛苦地呻吟之后，他们总有一天会大声疾呼……那时将会是非常可怕的呐喊。”

几个小时后，费兰茨忘记了这些苦恼，因为他自己也有不少苦恼事。玛丽自认为清欲寡淡，极为简朴，几乎成了无产者，但实际上她仍然是贵重的奇花异草，要求贵族老爷式的生活环境。玛丽并不是轻浮的女人，但是她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在各地的住宿、同他们一起旅行的佣人、为地方贵族老爷们举行的晚宴，都是需要大量金钱的。还有服装、首饰、发饰等等，都是很大的支出。可是费兰茨自从看到里昂下层居民可怕的集体宿舍之后，心里再也不能平静，仿佛害了一场大病。他自愿举行募捐义演，还为工人演了专场。这是些什么样的听众呵！这是些多么可怕的脸！这里有多少破烂衣服，有多少未老先衰、缺牙露齿的嘴巴和象火一般炽热的眼睛！你根本无法知道他们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敌人来听你演奏的。他们可能会当着你的面问：既然你也是富人，那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比别的富人好一些呢？在里昂剧院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人。在艺术家的周围也从来没有过这

样可怕的沉静。费兰茨为他们演奏了肖邦的乐曲，接着又弹了韦伯、罗西尼和一些瑞士作曲家的歌曲，表演了他流浪年代的音乐日记和令人眼花撩乱的钢琴练习曲。暴风雨般的掌声。工人们一再要求加演。他们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长时间地逗留在他的窗下不肯散去。他们仔细观察他在窗帘后的每一个动作和影子，把他当作从未来世界中带来了福音的救世主。

费兰茨也许是第一次感觉到需要在什么地方扎根。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整个的一生是建立在沼泽之上的。明天怎么办？这个小家庭怎么办？他们究竟是属于谁的？难道他们一生下来就是游荡的彗星吗？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天空中有一种可怕的星球，它不属于任何星体，独自徘徊漂流。

里昂的蒙戈尔菲家族希望费兰茨一家留在这个贫富极为悬殊的城市里，并且为他举行了一次穷奢极侈的音乐会，还请来了歌唱家诺利特。诺利特是个文静，也可以说是忧郁的人，他对自己在世界上享有的声誉，就象对一件紧身衣服一样，并不感到舒服。主人想方设法请他表演，但是他并不愿意。费兰茨也是迫不得已地勉强应付。他随身带来了舒曼[1]写的歌曲请歌唱家选择。诺利特选中了《百花之神》。他飞快地看了一下歌谱，遗憾地说，没有法语译文，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这个重要时刻，玛丽起了作用。她把歌曲译成了法文，而且既准确又合拍。

《百花之神》第一次用法语演唱。三个人都获得了掌声：歌唱家、伴奏者、文学翻译。玛丽高兴得想在房间里跳舞，亲诺利

---

① 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其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特色。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写过一些同情革命的歌曲。一八五四年起精神错乱，后死于精神病院。

特的手，然后打开窗户向里昂广场高呼：我、我、我！

他们没有在里昂定居，而是去了意大利。第一个目标是尚布尔。拉马丁在信中用诗的语言邀请费兰茨和玛丽上他那里去，说他想认识这位敢于同整个世界的偏见进行斗争的英勇女士。他们到了诗人的家，发现诗人似乎已经在准备将来把他的房子变成博物馆。每一张纸片、每一支折断的钢笔、每一本翻破的书籍、每一部零散的手稿，都说明诗人的许多伟大著作是在这里写成的。费兰茨接着去参观了卡特希埃克大寺院。在这里只住了几天，然后继续向意大利前进。费兰茨过去即使在路易·菲力普的警察国家里也习惯于自由来往，但这次在法意边界上却陷进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死水潭。他们在边界上受到了严格的检查。每一个箱子都被打开，每一本书都被翻过，他们的提包、口袋也都被搜查。边境站人员先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突然提一些怪问题，以便打乱过境者的思路，使他们露出马脚。费兰茨几乎想马上返身回去。但是回哪里去呢？日内瓦？巴黎？里昂？卡特希埃克寺院？还是诗人拉马丁的家？他是一个没有家的人呵！这时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是一颗离开群星的小星球，只能永远在无垠的空间游荡。

他在米兰生活得比较愉快，因为这里有很多人会讲法语。另外，人们马上就认出他是李斯特，这对费兰茨的虚荣心来说也是一种愉快。看来法国报纸在米兰也为他作了宣传，为他赢得了盛名或者臭名。他去探望了米兰的音乐之王老吕卡蒂。如果当时有一个画家在场，肯定会把这两个音乐之王的会见铭记下来。老吕卡蒂坐在一张在世界上也许是最大的写字台后面。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张写字台，而是学校里的大讲台。写字台背后是巨大的书柜，上面摆设着老吕卡蒂发表的各种著作。他一

看到费兰茨进来，马上疾步过去拥抱，然后带费兰茨参观了各间办公室、对外开放的商店和装备有各种美妙乐器的音乐大厅。这里有竖琴、钢琴、各种小提琴、箫笛、低音提琴和黑管。他把店里最高级、最新式的钢琴打开来请费兰茨观赏并作临时表演。琴声刚一响，整个商店的职工全都聚拢过来。老板一发信号，大家就热烈鼓掌。他还把自己的马车、房子、书库、乐谱库、别墅、朋友、钱包、银行支票本以及一个百万富翁所能提供的一切，都交给费兰茨使用。

过了几天，费兰茨觉得在米兰也呆不下去了。他想离开这里。但是到哪里去呢？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一颗脱离了星体轨道的流星。

主人发现客人不安，立即请他去别墅休息。这座小别墅名叫贝拉基阿，就建筑在科莫湖畔。在这里可以散步，可以观赏各种奇花异草，可以去清凉的湖上行舟，也可以到丛林中漫游。在丛林的深处，耸立着雕塑家伯莱尼的名作《毕特丽丝》，她在天堂等待着朝拜过地狱和油锅的但丁。

费兰茨有时也觉得在这里可以安身了。这并不只是因为美丽如画的风景吸住了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有读不完的书。他同玛丽一起用意大利文读但丁的作品。也许这就是栖身之地。这里有微波荡漾的清水，有捍卫着小高原的树木，还有令人陶醉的旅行。他可以去地狱，可以下油锅，也可以进天堂。

但是，这种有了栖身之地的幻想不久也破灭了。自从离开日内瓦后，一年多来，他们没有任何收入。他们不得不回答一个毫无诗意的现实问题：今天、明天、后天靠什么生活？

有一天，他又进城去米兰，又是坐在那张特大写字台对面同老吕卡蒂谈话。他如实地说明了自己的困难。老吕卡蒂没有说一句话，拿出自己的钱包，数了一万里拉放在桌上，然后说："这

只是预支。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举行音乐会。不是一次、十次，而至少是一百次。几乎每分钟都有人找我，责怪我说：你们一家人都睡觉了？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艺术家在你家里竟然闲得没事干？为什么不请他出来为我们表演？”

关于演出合同的谈判是由小吕卡蒂出面进行的。他父亲很喜欢舞台生活，好象他不仅是歌剧出版家，而且还是歌剧演员。小吕卡蒂则是一个直率的现代商人，附带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作曲家。他对李斯特上台演出表示有些担心：意大利人只对歌唱艺术感兴趣。一个人枯燥无味地、毫无生活气息地、没有节奏地敲敲琴键就能吸引听众，这对意大利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意大利没有钢琴艺术。人们也不需要它。在意大利唯一能够拨动人们心弦的乐器是小提琴。因为它能够象人一样地唱歌、叹息、激动和呼吸。尽管米兰人是整个意大利半岛上最有文化教养的人，但是人们仍然难于相信，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不去听唱歌，而是坐在音乐厅里听一个来自远方、以前一点也没有听说过的人弹钢琴，是很值得的事。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如果不是必须演出以换取面包，费兰茨也可能会生气地离开这里。但是一八三七年圣诞节他们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科西玛。当地的神父是这样填写孩子的出生证的：“李斯特——弗拉维格尼·科西玛，女，生身父母为玛丽·弗拉维格尼和李斯特·费兰茨，父母凭自己的良心结了婚，父亲承认新生婴儿是自己的……”。神父一边写，一边嘟嘟囔囔。费兰茨的心好象通过了一股凄凉的冷流，深深感到自己没有家和孩子也没有家的苦楚。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玛丽又象从前那么美丽。在街上，人们一见到她，都要一再回头看看，在她背后窃窃议论。玛丽的情绪也好些了。一八三七年和一八三八年，狂风暴雨袭击了科莫湖，

但是他们一家却生活在从未有过的平静安宁的气氛之中。他们又在读但丁的著作。毕特丽丝的侧脸型很象玛丽。玛丽经常轻轻地走进他的工作室问道：工作得怎么样，我亲爱的朋友？每当这种时候，费兰茨总是觉得是毕特丽丝在向他伸手。

费兰茨这时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也没有经历过艰难的斗争，但他已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生活制度。每天一大清早，当全家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每天对自己的作品精雕细刻，十遍百遍地反复修改每一个节拍，一直弄到接近自己“心灵中的音乐”为止。他认为这种音乐不能用耳朵，而是要用灵魂去听，而且自己创作的音乐也只能做到接近这种音乐，因为他无法，也许永远无法真正地达到、抓住、彻底地掌握这种音乐。每天早晨起来，就象一个编写历史的教士一样，耐心地、虔诚地推敲着每一个音符。他现在才认为自己真正掌握了帕格尼尼出类拔萃的艺术。就在这一时期，他怀念拉马丁的《诗歌与宗教的和谐》以及《一个旅行者的纪念》开始成熟，《彼特拉克之歌》也正在诞生。在这里，他还写了一首诗。在一个清晨，他把它偷偷地放在玛丽的桌上：

没有战争，但也找不到和平，
满怀希望，可又害怕，心里在燃烧，身上却冷得要命，
我正飞向天空，但人体还在地上，
我拥抱着整个世界，但又穷困赤贫。

阿摩尔没有把我关起来，可又不让我解脱，
她不认为我是她的，但又不愿把我放开，
她没有杀我，但也不给我自由，

我既做不了活人，当死人也不自在。

我看得见，可是没有眼睛，我没有舌头，但是能说
话，
我想去死，不过还是愿人帮我活下去，
我喜欢别人，同时又爱自夸。

我的灵魂既欢笑又悲啼，
我害怕死亡，也害怕生命，
亲爱的，我就这样成了你的，永远属于你。

他把这首诗放在桌上后又回去工作，等着玛丽的反应。

清晨，在人们都起来后，新鲜的牛奶味充满了整栋房子。从房子的另一头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太阳正好照射在工作室的门上。这时，玛丽——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没有先把自己收拾一下——跑了进来，脸上还留着枕头压出的红印，用两臂抱住费兰茨的脖子，开始哭泣起来：

“这首诗真是给我的吗?”

“是给您的，亲爱的。”

“可惜我不会唱歌……”

费兰茨坐到钢琴旁，弹完歌曲后，搂抱着玛丽：

“有时真希望让时间停下来……”

但是时间是不会停止不前的。恰恰相反，它以飞快的速度逝去。小吕卡蒂的预言没有实现，意大利人一听说是李斯特表演钢琴，立即“占领了”音乐厅。当然，这些音乐会同在巴黎的演出不一样。在这里，正象老吕卡蒂所说那样，必须给人们一些东

西，否则他们会感到厌烦而纷纷退场。在音乐厅入口前专门设有一个木箱。听众可以把自己想听的节目写在纸条上，然后把它投进木箱里。他们可以写上自己一般喜欢听什么，在自由加演时希望听什么。但是这些意大利人误解了设立木箱的意思，他们把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写在纸条上，似乎他们不是在向李斯特提出什么要求，而是在向预言家询问自己未来的命运。这些纸条中提了不少这样的问题：您对婚姻有何看法？尊敬的音乐大师究竟是哪一国人？铁路事业的前途如何？有遮阳沿的军帽还时兴不时兴？妇女在场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抽烟？驿站的马会不会死光？

艺术家起初有点生气，后来又觉得好笑，当他更了解听众之后，他爱上了这些有趣而奇怪的人。他们不象巴黎高雅人士那样鼓掌，也不象普鲁士的上层分子那样用文明棍敲击地板。这些人还不懂得如何风雅地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他们只会站起来拚命狂喊，向舞台扔帽子和领带，甚至还有扔钱包的(当然他们先得把里面的金银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拿出来)。在这种获得极大成功的音乐会之后，钢琴就象一只拔了毛的鸡一样，被拆得支离破碎，因为人们把凡是从钢琴上能拆下来的东西都带去作纪念品了。不管这些事怎样了结，费兰茨的成功是用笔墨无法形容的。意大利人早在中午就占满了音乐厅的座位。小吕卡蒂徒劳无益地指挥、哀求、强迫人们遵守秩序，向尊敬的听众们一再解释：买了第一排票的人，不会愿意坐到后面去，而买了后排票的人没有权利坐在第一排。说这些话全是白费，因为在这里决定座位排次的是拳头、厚脸皮和谁的嗓门大。要开始表演也不容易，因为头十五分钟主要是听众自己表演。他们象拉拉队似地齐声喊叫：费兰茨！费兰茨！等他们喊得声嘶力竭之后，音乐会才能开始。这是什么样的音乐会呵！因为听众不

是穿著讲究的太太小姐和喜欢斗鸡的公子哥儿，而是音乐狂人。费兰茨用自己的独特风格弹了《清教徒进行曲》和一首在米兰音乐晚会上听到的罗西尼歌曲。

钢琴弹出这首歌的曲调，几分钟后全场都跟着唱了起来。费兰茨感到一股炽热的电流通过了全身。这些强大的电波象天使的巨大翅膀一样把他举在空中。在最精彩的时候，全场一片沉静。没有人咳嗽，没有人动椅子，也没有人叹气。等到幻想曲一结束，立即雷电交加。意大利人开始轰炸舞台。他们把自己身上所有能够脱下来而不至于有碍观瞻的衣服全扔到舞台上，然后有节奏地、着魔似地狂喊：费兰茨、费兰茨！

小吕卡蒂是个有文化素养的生意人，他知道欢呼也会使人感到厌倦的。他必须用猎奇来战胜厌倦。他又宣布举行新的音乐会。表演者是莫尔蒂尔、皮克西斯、肖伯莱纳、奥里基、李斯特，还有正路过米兰的希莱，六位艺术家一起弹奏三架钢琴，二人合弹一架。节目是《魔笛》中最美的曲子。如果不是小吕卡蒂亲口说的话，费兰茨是不敢相信的，因为他居然想把莫扎特偷偷塞进意大利人的意识中。因为意大利人一直认为，萨尔斯堡的伟大音乐是生硬而勉强的，使用乐器也太多，有时没有音乐感，音调太不和谐……。

这一天，费兰茨准备演出自己的新作品《但丁奏鸣曲》，心中有点发愁：既然他们认为莫扎特也太生硬、不和谐、过分日耳曼化，那《但丁奏鸣曲》又会引起什么反应呢？

这是"六人音乐会"的一段余音。另外一段是同希莱会见。这位德国艺术家正好从巴黎来，带来了许多莱茵河畔的消息。费兰茨主要是关心朋友们的情况，对一些传闻轶事兴趣并不大。德国艺术家介绍的情况中，最令人紧张的是乔治·桑和肖邦的关系。

“这是一种奇怪的爱情，”希莱说，“开始是女的热情，男的冷淡，后来关系发生了变化。乔治·桑看来已经觉得够痛苦了，但肖邦却开始热起来。最后两人肯定会吹。或者说，如果不是这位不幸的波兰人病倒了的话，他们两人可能已经吹了。医生说，肖邦得的是不治之症。乔治·桑现在不能丢掉他不管。乔治·桑象一位慈善的修道女那样看护着肖邦。这种病一般是不会引起漂亮女人们的爱情的……因为肺病病人容易出汗，有时还吐血，还有许多其他毛病，只会把人吓走，而绝不会对人有多少诱惑力。但是这位女士承受了这一切。最近，她陪肖邦去西班牙养病。因为医生说，海边的温暖空气可以治好肺病。他们还带去一个女佣人。但是她半路上就逃回巴黎。现在到处在传说，凡是他们住宿过的地方，店主在他们走后总是把他们用过的床单被褥烧掉，当然钱得由他们付。唉，与其说这是蜜月旅行，还不如说这是走向十字架……”

罗西尼的来访也全亏了“六人音乐会”。他隆重邀请费兰茨出席他家的晚会。对这次偶然的会见，小吕卡蒂也起了推动作用，因为他作为生意人，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新点子：“衰落之星和上升之星在米兰天空的会见”。李斯特不久就把一厚本手稿《音乐晚会》交给了小吕卡蒂。这是李斯特在罗西尼晚会上的即兴作品。

在这些光辉的会见中，费兰茨显得最为突出。尽管应邀到罗西尼客厅来的人都是当时最有名的歌唱家、小提琴家、音乐指挥、诗人、政治家和金融家，但最突出的还是李斯特：他会讲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他的表演神奇美妙，他的身材英武修长等等，使得每一个从他身旁走过的女人都要向他暗送秋波。但也正是在这里，他受到了一次很久也未能治愈的创伤。

罗西尼：“您工作得恐怕太多了一些吧？”

李斯特："大师，我只根据我的习惯或者爱好所要求的程度进行工作。"

罗西尼："您知道自己是很有天资的……"

李斯特："我从来不敢这样看待自己。"

罗西尼："我还可以说得更多一些，您不是天资高，而是天才。就象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genius(即天才)。但是您将一事无成，因为您抓得太多，把自己的精力分散了……。"

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一个根子：无家可归，没有祖国。只能象有些植物一样任凭种子随风飘荡，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也许罗西尼是对的。费兰茨每天以自我折磨的勤奋精神努力工作，从来不满足于自己轻易写出的第一稿，总是反复修改十次、百次、千次……。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无家可归，没有祖国，分散精力呢？

在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中，要想在音乐会上表演得好，当然是很困难的。从前他是那样热情奔放，现在则常常感到空虚幻灭。可另一方面，目前正是他享有盛名的时候，不仅在各种音乐会上，而且还被米兰某些高贵人士请去演出，甚至连当时统治着北部意大利的哈布斯堡皇亲们也来观赏他的表演。他经常进出萨莫尔约夫女伯爵家，不止一次地被邀请一起去看戏。

在斯卡拉剧院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终生感到遗憾。

进入斯卡拉剧院之后，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台上演着戏，但是包厢里却在过着社交甚至家庭生活，门开进开出，人走进走出，或者是丈夫在探望他的女朋友，也可能正是一个男朋友在同这位丈夫的妻子幽会。乐队显得是那么可怜。全是些精神萎靡不振的乐师，全是些吃不饱饿不死的家伙。舞台布景破旧不堪，灯光昏暗杂乱。把乐队统一起来的不是乐队指

挥的小棒，而是上帝的慈悲。一百年前的动作使演出更象一张漫画，而不是歌剧。

费兰茨赶紧退场回家。他给巴黎《音乐观察家报》编辑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情绪激动和讽刺挖苦的信。这封信一口气写了下来，连野心勃勃的"合伙作家"玛丽也提不出任何意见。第二天，他把这封信念给小吕卡蒂听。这位老板脸色苍白，站起来告别时只是勉强握了握手，说道：

"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您对自己没有深入调查过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意大利人民没有国会 没有论坛，没有报刊，没有自由的文学。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祖国，而且也没有什么希望可以使这个国家成为自己的祖国。斯卡拉剧院就是他们的一切。您嫌它破烂不堪，可是它终究是我们意大利人的。您嫌它过时落后，但是在这里讲的是意大利话，唱的是意大利文，演出的是意大利人。包厢门开进开出？亲爱的朋友，您怎么会知道，那些走进走出的人是否在利用目前在米兰唯一可以利用的地点交换一些秘密情报呢？米兰到处都是证人、特务、告密者、警察、暗探。亲爱的朋友，您怎么知道这些人私下是在干什么呢？我只是希望巴黎的编辑先生能够比您谨慎一些，不发表这封信。因为遗憾的是，如果发表了，您就必须承担责任……"

玛丽留在贝拉基阿。费兰茨去威尼斯参加两场音乐会的演出。他疲惫不堪地回到旅馆住处的时候，天都快亮了，但他仍然保持着僧侣式的生活规律。一大清早，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到圣马克广场散步，在福罗利安咖啡馆喝一杯咖啡，享受着不用同任何人谈话、不用征服任何人、不用忠于自己荣誉、不用象火一样闪亮发光的清闲乐处。他一个人安详地坐着，但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阴郁惆怅感又来侵袭心头：他现在坐在咖啡馆，他也可以这

样坐在蒙帕纳斯、米兰或者日内瓦湖畔，四海为家但是又无家可归。也许这样生活倒也蛮好。他心目中的英雄和自从开始独立思考以来的忠实伴随者是但丁、豪拉德、浮士德、莱尼、奥伯曼……这些人也都是流浪者、永不安静的灵魂。他们也是魔鬼的朋友……他们抛弃了一块土地和自己的祖国，为的是取得无限的土地和得到整个人类。

他还坐在福罗利安咖啡馆里。

热烫的咖啡已经冰凉。

其他客人都走了，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要报纸看。招待员给他拿来了一张维也纳报纸。最后一版上有一条小消息：一八三八年三月十三日，多瑙河的冰流冲破了堤坝，毁灭了佩斯城。

他匆忙付完钱就往家赶。他还没有什么肯定的计划，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必须马上回国帮助佩斯居民救灾。

他一边走一边尽力回想佩斯—布达给他留下的记忆……记得他是同父亲一起去过那里。两人在多瑙河岸上散步，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站下来看看，看到的好象都是一张发黄的标语：我是匈牙利人！

他绞尽脑汁回忆过去。奇怪的是，他不是在用眼睛、耳朵或者想象来回忆，而是用手来回忆。他回忆起十五年前父亲拉着他的手一起走过陌生的街道，走过灰尘飞扬的土路，听到鞭子声和吆喝声，看到低头漫步的牛群……又是黄色的标语：我是匈牙利人！

他现在应该高兴，他已经不再孤独，不再是无家可归、没有祖国的人了。因为他要赶回匈牙利。他不顾玛丽的阻挠，也不管吕卡蒂家的劝告，什么都不管。他只想念自己的祖国。祖国

发生了水灾，这不会是骗人的消息，为祖国而心惊肉跳，这是一种奇特的感情……

他赶忙回家。一边走一边想：这只是一种意愿还是真正的感情？只是姿态还是真理？这个遥远的生身之地对他究竟有多大意义？他连这个地方的名字也不大记得起来了，留在记忆中的印象只是几间发出霉臭味的吉卜赛土房……一个连它的语言都不懂的国家，对他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奇怪的、乱七八糟的亚洲式的城市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留下的只是记忆，只是父亲那只大手的余温和一张黄色字母的标语：我是匈牙利人！

他给巴黎的老朋友马萨尔写了一封信。美好的思想和动人的旋律带来了真正向往祖国的音乐激情。

"……我在一家德文报纸上看到佩斯发生大水灾的消息。我的心被震动了。我产生了一种少有的特殊的同情感。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动着我去援助不幸的受灾难民。我扪心自问：我究竟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可以给他们什么帮助？实际上我一无所有，爱莫能助。我既没有掌握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具备权势的分量。但是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向前走。我要是不能用自己的微薄收入去帮助祖国的灾民，良心上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永远睡不着觉。也许上天会给我一些恩赐？上帝在沙漠上创造了面包的手还没有疲倦。上帝对一个艺术家的几分钱比对一个富翁的百万金镑也许会更感到高兴……

……激情和烈火使我认识到祖国这个字的真实涵义。在我心灵的眼睛面前展现了极为美丽的图景：熟悉的森林回荡着猎人的号声，美丽的多瑙河穿过高山陡峭奔流直下，广阔的草原牧放着自己的畜群。这就是匈牙利。她肥沃富饶的土地世世代代养育着优秀的子孙。这就是我的祖国！我就是这样呼唤着她，也许你会觉得好笑。我也是这个古老伟大种族的一分子，我也

是这个独特的、从不屈服的民族的子孙。

……呵！我那广袤而遥远的祖国！我那些素不相识的朋友们！我那巨大的家庭！你的苦难召唤我回到你的身边。我惭愧地低下头，向被我遗忘多年的祖国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将去维也纳。我计划在匈牙利举行两次音乐会，一次收入归我的同胞，一次收入用来支付路费。然后我将一个人背着旅行袋徒步巡视匈牙利最偏僻的地方。”

玛丽厚颜无耻地大笑起来：

“装腔作势，又是装腔作势！您说的是什么样的祖国，什么样的牺牲？您可以相信我，我比您更了解您的所谓生身之地。我阅读过一切能读到的关于这个远方草原的书籍。贫困、愚昧、落后。它正在朝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可能沉陷的最深处坠落下去。我还看过赫尔德的书。他科学地证明，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语言正在瓜分者挖掘的坟墓中逐渐消失……这个国家的人民将被吞噬掉，也许已经被周围的日耳曼人、土耳其人和斯拉夫人吞噬掉了。您想在那里干什么？您连匈牙利话都不会讲。即使会讲，您又能同他们谈些什么呢？！”

玛丽的数不清的论据、挖苦嘲讽的评语和条理井然的主张最后终于暴露了她的内心思想：现在她嫉妒的已经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种灵感，而是一个国家。她说：“他们会把你从我这里夺去……他们会象一窝黄蜂一样冲向你，吸去一个诗人、梦想主义者、哲学家、艺术家（稍为想一会后她又加上了一个字）和一个男人所能给予的一切。”

费兰茨不得不同玛丽斗，同小吕卡蒂斗，因为他坚决反对费兰茨废除演出合同。为了取得护照，还得同奥地利的官僚作风斗。奥地利当局在签发护照前想了解一下，这位圣西门公爵的信徒、拉曼内斯神父的朋友、“良心婚姻”的主角究竟为什么要去

维也纳？等到这一切斗争都结束后，他才能出境。第一个目标是维也纳。

瓦尔特·泰娜丝日记：小插曲

（瓦尔特·泰娜丝是一个心灵美丽的维也纳姑娘，后来嫁给流亡国外的匈牙利自由战士普尔斯基·费兰茨。她为了匈牙利的民族英雄科苏特①、谭契奇②、裴多菲③和自己的丈夫，学会了匈牙利文。她的日记实际上是一部隐藏在内心的爱情小说。她的热情起先只是为了一个杰出的男人，后来却变成了对一个民族的热爱。）

一八三八年四月十九日

昨天十二时半，我们去参加李斯特为他同胞举行的音乐会。我早就听说这颗巨星的大名，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就象我梦中的威尼斯和实际生活中的威尼斯丝毫不差一样，我想象中的他和现实中的他也是完全一致的。我想象的是天使般的音乐，实际得到的是最纯洁的和音。演奏刚一开始，我就被他在精神

---

① 科苏特(Kossuth Lajos,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出身贵族家庭。匈牙利一八四八年革命初期任财政部长。一八四九年出任国家元首。由于奥俄联军入侵和反动军官叛乱，革命失败，他被迫辞职，流亡国外。他坚决反对一八六七年的《奥匈协定》，拒绝特赦回国，后死于意大利。

② 谭契奇(Táncsics Mihály, 1799－1884)，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坚决主张民族独立、解放农奴。积极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斗争，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③ 裴多菲(Petöfi Sándor, 1823—1849)，匈牙利诗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写了大量反对封建压迫、揭露资本主义丑恶、歌颂人民战斗精神的诗歌。一八四九年在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除诗歌外，还写有政论、剧本等。作品对匈牙利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上和技术上克服音乐难度的本领、演奏的力量、内容的丰富和惊人的才华迷住。过了一会，我什么也不去想了，我深深感动，只觉得想哭。我真想从我的心底里大哭一场或大笑一场，以表达我的感情和兴奋！他的演奏对我已不仅是一种音乐，而是生活本身，是一位拥有一切和内心火热的天才所经历的生活和思想。

我现在才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崇拜李斯特。在他的心里蕴藏着多少美好而伟大的感情啊！尽管他也免不了凡夫俗子的影响，但他对人类一切真、善、美的东西是极为敏感的。他是第一个只凭外表就能吸引我的人。他的脸部充满了自然的高贵气质。

父亲警告我，不要老是谈论李斯特，免得我真地会爱上他。

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听人说，李斯特向梅特涅公爵作了礼节性拜会。公爵大人不在家，夫人出面接待。但是接待的方式不象这位闻名世界的艺术家所期待的那样。李斯特中途告辞，悻悻离去。第二天梅特涅首相亲自回访。据说，他还对李斯特表示："亲爱的李斯特先生……对女人们的态度是不必过于介意的。"

现在，维也纳的天空上有三个新星：泰尔贝尔格、汉塞尔特和克拉劳·维克。但是人们还是抢购李斯特音乐会的票。

萨菲为李斯特写了一篇长文章，说匈牙利音乐大师在演奏中不受规律、格式和结构的约束，因为他正在以一个独立国王的胆识和权威创造着规律、格式和结构。

一八三八年四月三十日

今天我们得到了极为难得的艺术享受。李斯特演奏了缪勒

和舒柏特的作品，其中有舒柏特的《进行曲》、《维也纳之歌》等名作。

出版商和演出公司经理哈斯林格要求出版李斯特改写的《帕格尼尼练习曲》。李斯特大师坚持把一个没有名气的年轻人改写的帕格尼尼乐曲也印在这部书中。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罗伯特·舒曼。

一八三八年五月一日

今天有幸同双亲一起参加哈斯林格先生的家庭晚会。出席的客人当中有李克尔三兄弟（他们都是音乐巧匠，会演奏世界上所有的乐器）、歌唱家斯塔第格尔和兰特哈丁格。后者是一个多面手，既是歌唱家、作曲家，又是音乐指挥。据说将来还准备选他当歌剧院院长。李斯特迟到了。他同兰特哈丁格热烈拥抱。闲谈中发现，他们过去都在老索里埃先生门下当过学生。他们追忆了学生时代的胡闹情景，不断引起哄堂大笑。为了对李斯特表示敬意，布尔格剧院的全部名角都聚集一堂。

李斯特正要应邀坐下弹钢琴，主人哈斯林格建议高贵的先生和女士们到大厅里去，因为那里有一个小乐队在等着。遗憾的是，这次奇迹般的表演没有办法记载下来。迷人的音乐、有力的节奏、灿烂的光辉、还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热情。只有心胸开阔的人才能焕发出这样的热情，也只有那些心地善良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热情。

父亲又责怪我了，因为我听音乐时流了眼泪。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如果我不流泪，那才是羞耻。

一八三八年六月一日

今天，所有的朋友都去为李斯特送行。波布萨伯爵、兰特哈丁格、塞钦尼伯爵[①]、哈斯林格，还有我父亲。我也一再要求去，但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遭到父亲的拒绝。我只好坐在家里翻翻日记，记上新的感受。我不是感觉到，而是看到李斯特如何坐上车，人们又如何站在马车周围同他告别……我想，我爱他，这没有什么可以不好意思的。痛心的只是我有三次和他谈话的机会，但是都因为没有勇气开口而错过了。现在听到马车轮子飞奔的声音，我只好过迟地、痛苦地说出心里话：我爱你！……

六月底，李斯特又到了米兰。他背着旅行袋遍游祖国各地的计划未能实现，连匈牙利的边境也没有去成。因为玛丽来信说，她得了一种奇怪的重病，动也不能动，要他赶快回去。他不得不拚命往回赶。

回到家后发现玛丽并没有生什么奇怪的重病，可是情况已经无法改变，他已经回来了，只好重新开始原来的生活。

不久，米兰报纸也开始跟着小吕卡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起初，李斯特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记者们很快就使他清醒过来。巴黎《音乐观察家报》发表了他过去批评斯卡拉剧院的文章。整个意大利舆论大哗，认为这不仅是侮辱一个剧院、一些歌唱家，也不仅是侮辱一些市民，而是在侮辱整个民族。三家大报

---

① 塞钦尼伯爵（Szèchenyi István, 1791－1860），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匈牙利改革运动的创始人。主张发展民族经济、科学、文化，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带头攻击，向艺术家开始了十字军讨伐。主要内容是：

一、李斯特对一个把他捧为上帝的城市忘恩负义。

二、说意大利公众不是高贵音乐的真正爱好者，这种令人愤慨的断言，不是诬蔑意大利人民还能是什么呢？

三、李斯特攻击了意大利的妇女、男人和意大利的家庭生活，玷污了妇女的贞操和母亲的纯洁。

四、李斯特还诬蔑了歌剧院人员、乐队、指挥、女主角等，既侮辱了每个人，也侮辱了整体。

五、他真是那么伟大的钢琴艺术家吗？是不是意大利人过早地下了结论，没有听从自己的良知和智慧，盲目相信了德国和法国吹捧他的评论？

六、李斯特先生凭什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伟大的法国艺术家，其实他并不是法国人而是匈牙利人？

李斯特自尊地和勇敢地作了回答：他在旅馆里等着先生们，愿意象骑士一样对这一切承担责任，尽管他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善意，是出于对意大利人民和艺术的无限崇敬。准备进行决斗的英雄们都没有来，但是李斯特周围的空气却成了冰冻。人们都躲着他。音乐会根本无法举行。七月，他又去威尼斯。但是人们仍然不去参加他的音乐会，他们忘不了斯卡拉剧院事件。

李斯特自己也感到，作为一个严肃的、有家小的人，他不能对这次失败轻描淡写地耸耸肩就算了事……

在这段时间里，从匈牙利来了许多感谢信，但“祖国”总是那么遥远，无影无踪。看来，这就是他的命运和使命，象不朽的英雄浮士德、莱尼、奥伯曼一样，永远在四方漂流，不断从头开始进行征服，取得胜利，最后依旧失望。

在威尼斯失败后，李斯特又接到了一些重要的邀请。莫德

纳公爵请他去卡塔约别墅住。这座别墅完全可以称之为国王的宫殿，它有方方正正的法国花园、半圆形的马车道、巨大的石头浮雕、沉重的柱子，还有宽敞的走廊、廊柱厅、院子和阳台。

在正式午餐和私人谈话时，公爵小心翼翼地询问：

“您了解宫廷的规矩和习惯吗？”

“不，不了解……我也没有这种需要。”费兰茨放下了餐具，眼睛直盯着主人。

两个仆人在侍候他们两人吃饭，态度庄严，礼节繁多。因此要等几分钟之后，他们才能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的大管家会去找您的，他将教您一些最主要的宫廷礼节。我将请皇家客人来。斐迪南皇帝① 兼国王陛下、皇后、巴尔马公爵、伊丽莎白女亲王、玛丽亚·露伊莎亲王夫人、费兰茨亲王、伦巴第亚亲王和他们的亲属都要来。”

第三天，皇帝兼国王陛下和其他人真的都来了。整个公爵府立即变成了一座兵营。早晨五点钟，军人整齐的脚步声传来，皇帝的侍卫长在轻叩皇帝寝宫的大门。几分钟后，整个长廊站满了宫女：皇上正在上厕所，在这种严肃而重要的时刻，任何人也不得惊扰圣驾。六点钟，皇帝、皇后、王子、王孙都上小教堂去做每天例行的祷告，当然得空着肚子去。六时三刻，早餐开始。费兰茨得到了特殊的宠幸。他被邀请同哈布斯堡皇室共进早餐。斐迪南皇帝坐在首席。他看上去很象一匹衰老的、喂养过头的猎狗。又大又长的脑袋向前耷拉着，似乎他那又细又长而且不断颤抖着的脖子有点架不住沉重的头颅。脸部肌肉松软地下垂，眼皮总象困乏得不行。说话、走路、吃饭时，神情萎靡不振。

① 斐迪南皇帝，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之一，兼任匈牙利和捷克国王。

在宫廷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准确的程序，似乎支配生活的不是人的需要和愿望，而是某种几百年前就有的神奇的、旧式的戏剧设计。它的意义和内容早已被人遗忘，剩下的只是外壳——富丽堂皇、繁琐复杂、毫无目的和令人疲倦的礼仪。

上午，皇帝和皇家的男成员都坐马车到邻近的森林中去舒展身体，这种散步式的活动被称之为打猎。其实这里并没有野兽，随身带去的猎枪也都是些装饰品。中午十二点钟进午餐。大家吃得紧张迅速、毫无乐趣，因为皇帝还有事。等一会，皇帝在自己的私人御宫里还得再吃一顿，不过这里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那些繁杂的礼仪。下午休息和五点半用毕晚餐后，费兰茨为皇帝陛下和其他尊贵客人弹琴。斐迪南的大脑袋又向下耷拉着，显然是睡着了。伦巴蒂亚亲王用自己的马靴跟在厚厚的东方地毯上画图案。费兰茨亲王凝望着窗外，感到无聊。只有皇后一人在注意地听。有时候还吩咐说："这一段再弹一遍……"音乐晚会结束后，艺术家荣幸地被皇后单独召见。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因为周围环立的宫女是不算数的。这样，两人的谈话就显得格外亲密：

"关于您，人们谈论得很多，亲爱的李斯特……"

回答是默默地弯了弯腰。

"您的婚姻究竟怎样了？听说你们已经有了孩子。"

回答是默默地、肯定地弯了弯腰。

皇后的身段用紧身衣的丝带和其他裁缝做的器材勉强维持着，就象一个要散架的木桶被铁箍紧紧地箍着一样，动弹不得。这位发福的、穿得花花绿绿的老女人浑身上下打量着漂亮、修长的年轻人，愉快地说：

"大家都在追您吧？我指的是女人……"皇后的笑声是那么

纤细、清脆，仿佛身段仍是三十年前年轻时那样美丽苗条、充满魅力。

费兰茨又鞠了一躬。在他退出宫门时，皇后发出了邀请：

“冬天，我要在维也纳听您的演奏，亲爱的李斯特……我将批评皇宫总管，因为春天您在维也纳演出的时候，我们一次也没有出席过。不过没有关系，到了冬天我们会去弥补这个不足的。”

第二天，又是祷告、上厕所、按西班牙礼仪设计的午餐、晚餐，然后又是音乐会、召见。费兰茨感到，他弄不清楚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猎狗头的皇帝、铁箍箍着的皇后、闲得无聊的王子、亲王们。难道在米兰、库斯坦、奥尔莫茨、维也纳就是用这些人的名义在宣判人们死刑？难道拉曼内斯神父和雨果煽动群众起来推翻的就是这些人？难道安凡丁诅咒的就是这些人？难道这些人就是贝尔基约瑟女公爵所说的可怕的、杀人不眨眼的魔鬼？难道就是这个脑袋不停颤抖的老头和衣服快要绷裂的老太婆？难道他就是恺撒大帝，她（费兰茨也为自己这个比喻感到好笑）就是美貌而残暴的埃及女皇克娄巴特拉？

插　　曲

安格罗·马约神父一八三九年一月至七月给教廷国务秘书路基·兰布拉奇尼先生的信

罗马，一八三九年一月十日

阁下：

您指示我去认识我圣城客人李斯特·费兰茨，并同他交朋友。这一任务我已完成。我已同他见过面。这位举世闻名的艺

术家今年一月五日在我住处附近租了一座别墅。艺术大师带来了许多行李。别墅里的仆人和他随身带来的看起来很高贵的女佣人忙了半天才把它们搬完。我听说过艺术大师童年时的情况，也见过他。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幼年时的金黄色头发已经变成松软的褐色鬈发，他过去柔软清脆的童声已经变成深沉的男低音。他们到这里才几分钟，就被很多人围起来。尽管他和伯爵夫人意大利语都讲得不错，但是要摆脱这些越来越粗野的群众也不容易。我走过去，帮他们讲了几句得体的话，就把这些好奇者打发走了。我刚刚要同他握手，突然听到有人叫喊、鸣枪，一个教堂敲起大钟，接着邻近的教堂也都开始敲钟。这确非一般小事。如同哥特人或汪达尔人当年入侵罗马一样，到处都在敲钟报警，人们狂喊乱叫，最后凝成了一个可怕的名字：马索西亚！马索西亚！马索西亚！

当我们听清楚了这个可怕的名字后，群众已经跑到马车这边来了。我急忙拉住一个头戴铁盔、手执长戟的小孩问：

"怎么回事？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快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强盗头马索西亚前天抢走了圣伊格纳茨学校的一个学生，要求一万银币的赎金。学校校长没有按时把钱送去，强盗头就把这个学生吊死了。"

遗憾的是，这些话全被李斯特先生听到了。他的脸部表情立即变得十分可怕。漂亮的白脸涨得通红，也可以说是涨得发青。他把手中的小行李包猛地往地下一砸，里面的女人用品全都掉了出来，一直滚到正在乱跑的群众的脚边。

"你们怎能容忍这种事？！"他指责我说。

尽管圣城的治安问题同我关系不大，但我还是不得不惭愧地回答：

“马索西亚人多势众。要打败他，不仅罗马警察不行，就是奥地利皇家军队也不顶用。”

他盯着我，脸上逐渐有了血色，但是眼睛还放射着可怕的火光：

“我听说你们这里有很多监狱。在米兰传说，你们在地下囚禁了两千人。你们也许可以动员这些囚徒来打强盗。”

吃午饭时，李斯特的话匣子完全打开了。当然，高级红葡萄酒在这里也是起了作用的。我发现，教廷在外界的声誉非常不好。他问我：“听说，你们这里如果发现演员在预先未获许可的情况下演戏，要判刑四年，这是真的吗？还听说，如果发现有人私藏武器，有两种刑罚可以选择，或是把手臂砍掉，或是把他活活烧死，这是真的吗？还有人说，在贝奈德十六教皇陛下的同意下，罗马至今还有圣廷宗教裁判所？”

阁下听到这些愚蠢的问题后也一定会感到困惑不解。我尽可能一个一个地回答：如果不把那些不经批准就擅自演出的人从舞台上清除掉，真正的伟大艺术之花就会因为杂草丛生而枯萎，代之而起的将是没有文化教养的、伤风败俗的、吉卜赛人式的妓女文艺；只要人们的幸福还受到魔鬼的威胁，圣廷宗教裁判所就有必要存在；至于禁止私藏武器，那是因为大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不需要再有武器了！

艺术大师看着我，嘴边露出了讥讽的微笑：

“不过稍为留一点武器也有用处，至少可以用来对付杀害少年儿童的马索西亚。”

在他讲完这句怪话之后，我们的午餐就结束了。

敬诚问候，求您祝福

梵蒂冈收藏院

图书馆长

安格罗·马约神父

罗马，一八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阁下：

今天，在间隔两星期之后，我又同李斯特先生见了面。在我详细汇报之前，我想先报告一下从他仆人们那里搜集来的一些情况：

这对“良心婚姻”夫妻每年要耗费三十余万法郎。夫人来自法国的收入每年不到五千法郎。另外据说，两人之间的口角越来越厉害。这种矛盾在罗马期间特别尖锐。罗马的精神贵族们狂热崇拜李斯特。法国研究所所长英格里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德国浪漫主义绘画派、所谓的纳萨里努斯运动的头头奥沃贝克每天都去李斯特那里。该运动的一些其他成员以及英国大富翁阿迈尔斯、爱尔兰主教维斯曼、俄国富豪加利金公爵等等也是他的常客。加利金公爵表现得就象国王一样，居然还有宫廷侍卫长。他的侍卫长维尔霍尔斯基伯爵出面购买、租用宫院大厦，同音乐家们签订合同，举办音乐晚会，组织化装舞会，安排远足旅行，资助舞台演出。当然，他总是强调这些事情都是加利金公爵委托他办的。

每天都有许多朋友来看望李斯特。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全花在朋友身上，因而无法照顾那位夫人。两人常因此争吵。夫人对每一个客人都有挖苦的评价，例如说维尔霍尔斯基是“肥胖子”，英格里斯是“食客”，奥沃贝克象“十字架上的耶稣”等等。

所有这些都只是街谈巷议的材料。对我们的事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纳萨里努斯运动。它对李斯特也是有影响的。它的成员都是画家。他们在残破不堪的圣伊西多拉寺院聚会。他们的老师奥沃贝克最明确地表达了大家的信仰：要象耶稣的信徒

们一样纯洁朴素；放弃一切奢侈浪费；象农民、牧民、渔民一样生活；工作上认真踏实；骄逸豪华、富丽堂皇、准确逼真的绘画并无意义，如果后面没有一切艺术的基督信仰：相信上帝、热爱人类。

我同李斯特面对面地谈了一次话：

“您想过没有，纳萨里努斯运动的温和的艺术革命最终会引起危险的后果？”

他惊讶地看着我说：

“我从未想过这些问题……”

“但是您需要想这些事，因为奥沃贝克只容许教会里有农村神父，主张把主教、大主教、红衣大主教等等全部赶走，也就是说只留下圣军的士兵，消灭所有的军官。”

李斯特勇敢地注视我的眼睛：

“奥沃贝克肯定是革命者。如果他是的话，那我也是。我要进行反对中庸之道、好逸恶劳、盲目的模仿、无耻的伪装、卑鄙的欺骗、非人的冷漠、害人的愚蠢以及其他一切罪恶的革命。纳萨里蒂曾经说过，为真理斗争的人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也只有敢于斗争的人才能取得胜利。”

罗马，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

阁下：

李斯特接连举行了四次音乐会。一次是同法兰西拉·皮克西斯（世界著名的钢琴家皮克西斯的养女）合作。一次在阿根廷剧院。另一次在圣路易·德法兰西大教堂演奏管风琴。最后一次是在加利金公爵宫殿里举行的小型音乐会。李斯特单独一人连演了三个小时的节目，听众自始至终聚精会神，情绪完全为他所掌握。这次音乐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请他抽点时间同我进行一次十分重要的、没有任何证人的谈话：

“您是杰出的人物、杰出的艺术家……但我担心一些错误思想会影响您的信仰！”

“我就是我，我总是代表自己说话，因此对所谓的错误思想也只能由我一个人负责……”

“但是那些使您受骗上当的假预言家们呢？例如拉曼内斯……”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实际上……”

“我们并不要求您在几分钟内就把他的思想忘掉，也不会命令您这样做。我们只是请您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困难和思想，希望您也参与使永恒的教会恢复其青春的工作。您主张教会艺术摆脱表面华丽的装饰，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支持这种想法。”

李斯特沉默了很久，看起来已经不愿意再说什么。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他终于还是开了口：

“不管我谱写什么样的乐曲，也不管我鼓励我的朋友们进行什么样的艺术创作，这些都不能改变罗马。罗马必须自己使自己发生根本变化，这样才能产生新的教会艺术。您想在罗马搞艺术革命，可是在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神父巴特尔·皮阿萨却每个礼拜日都在说，世界上一切哲学书籍都应该烧掉。他同那些怀疑地球是个大盘子、永恒不动、太阳围着地球这个大盘子转的科学家们争吵。您真地梦想什么教会艺术革命吗？一个小时前，我刚从奥沃贝克那里回来。他几乎是哭着告诉我：教会当局已下令封存《圣母之家》这张画，因为画中的赤脚圣母有损教会的威信和道德风尚……不，现在还没有到采取任何革命步骤的时候。”

我担心我已经失败了。我只能用这种忧虑不安的心情来结束我的信。

敬诚叩拜，请您原谅并为我祝福

梵蒂冈收藏院图书馆长

安格罗·马约

罗马，一八三九年五月

阁下：

遗憾的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汇报。李斯特和夫人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取名达尼埃尔。

李斯特通知我，他把家里整顿好以后即离开罗马。他们将先去鲁卡，然后再到夏季休养地去住些时候。

顿首叩拜

安·马

一八四〇年五月十二日，英王陛下在伦敦白金汉宫召见客人。女王丈夫阿贝特也在座。女王维克多利亚不仅让来拜谒的人们吻她的手，而且还同他们谈几句话。布莱辛顿女公爵和道赛女伯爵低声向女王报告：某某上校刚从印度回国……某某夫人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某某将军过去在威灵顿总参谋部任过职……下一位该接见的先生不是贵族，请陛下同他谈谈新的纺织机问题……

女王完全按照两位女贵族的指示行事，只是在听到左右侍奉人员轻声报告"李斯特·费兰茨到"后，才打破了这种常规。

女王走下了宝座，几乎是迎头赶上去：

"哦！李斯特先生，我早就在等待这一时刻了。"

艺术家以他那无法模仿的幽雅姿式弯了弯腰，几乎是抓着女王的手吻了一下：

"我也日夜梦想能当面侍奉陛下。"

女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手足无措的、羞答答的少妇。她转过身，向宝座方向高声呼喊：

"阿贝特，李斯特先生来了！"

女王丈夫刚才一直坚守着王家的尊严，留在铺着印度地毯的王座上，现在也只好按照德国军官学校规定的立正姿式把两脚后跟一碰，顺从地回答：

"我来了，亲爱的。"

阿贝特公爵也过来了。现在是三个人一起走过大厅：维克多利亚女王在中间，左边是公爵，右边是李斯特。

他们穿过接见大厅，走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楼梯，然后走进音乐厅，直奔钢琴。现在发生了一件非常出人意料的事：女王把她手中的中国扇子交给丈夫，把头巾和手套交给李斯特，她自己先坐下弹起钢琴来。当然，音乐厅里一下子就挤满了听众。她弹完一曲，立即爆发了热烈的掌声，直到女王用手势叫人们停止时，掌声才渐渐停息下去。

"现在请李斯特先生为我们表演！"

费兰茨先弹了罗西尼、贝利尼、梅耶贝尔的曲子，最后表演了《伟大的不列颠》。女王鼓掌最热烈。这是一种信号，表示宫廷的礼仪规定是可以冲破的，女王批准大家比平时鼓得更响一些。然后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革命行动：艺术家同女王夫妇共进晚餐。李斯特租坐的马车空着回去了。因为女王坚持用白金汉宫马厩中最美丽的四匹马套车送音乐家回家。

旅馆里一片混乱，走廊上乱七八糟。

费兰茨问：

"发生什么事了？"

门房难听地清了清嗓子：

"先生不在的时候，一位女客人带来了三个孩子、一个女佣

人和一个小丫头。她不管我们的劝说和反对，硬是搬进了先生的房间里。”

李斯特起初有点想发火，但是很快就控制住自己：

“这位女士是同我一起的。”

现在轮到玛丽指挥一切了。所有的箱子、衣柜全被打开。各种家什用具都摊在她的脚下。她好象是一个打了胜仗的统帅正在下令打扫鏖战之后尸陈遍野的战场。

费兰茨站在门口，他努力控制着自己，总算勉强发出了一个冷淡而讥讽的问候：

“晚安，夫人！”

玛丽对这次重要会见的场面早就作了精心的准备。她在给女佣人、小丫头和旅馆服务员发出一、两项指示，把她们打发走之后，挽着费兰茨的胳臂，走进了另一间屋子：

“亲爱的朋友，我知道，如果单独一人在世界上流浪，吸引美丽的孤单女人和渴望罗曼蒂克的姑娘的目光，这对一些有名的艺术家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但可惜的是，我的艺术家是有家小的人，他有女人和三个孩子。他不应该忘掉我们。如果他真地忘掉我们，我们就不得不来恢复恢复他的记忆力。”

费兰茨虽然没有抽出胳臂，但是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神经而不让玛丽感到他是非常不愿意同她在一起。

费兰茨冷冷地问了一句：

“有什么困难吗？”

“是的，有困难。”

“需要什么，如果允许我打听一下的话？”

玛丽走到窗前，装着看窗外的街道。过了一会，慢慢地流下了眼泪：

“需要爱情……”

费兰茨抱住玛丽，一再亲吻她在黑暗的房间里显得更为洁白的脸：

“请原谅我，我太粗鲁了。”

两人的思想还在对立，但是身子已经和解。两个人躺在床上，两支雪茄在冒烟。他们都在抽烟。两支雪茄的火光在黑暗的房间里画着奇怪的线条，从抽烟人的嘴到烟灰盒，然后又从烟灰盒回到抽烟人的嘴，就这样来回地画着。这是幸福而疲倦的爱情的宁静。玛丽先开了口：

“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您了，亲爱的朋友。谈谈您的情况吧！”

“亲爱的，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争吵是在圣罗索尔。我在访问附近的渔民村庄，观察大海，您却在咒骂一切。骂我们住的地方太破烂，骂伙食太差伤了您的胃，骂那些从国内、从佩斯用匈文、拉丁文、德文、法文不断写信来要我回匈牙利去的人。我请您陪我一起回匈牙利，可是您不干。您说这是我装腔作势的一种新形式，说我过去曾做过虔诚的天主教徒，以后变成了革命的圣西门主义者和里昂的暴动分子，现在又想当什么叛乱的匈牙利人。您这些尖酸刻薄的语言使我火冒三丈。后来我们不仅争吵起来，而且相互辱骂。您一气之下，不辞而别，把三个孩子带去巴黎，我则按原计划赶到维也纳。音乐作品出版商、音乐会举办人哈斯林格接待了我。他说，我的音乐会极受欢迎，需要的座位票多于实际销售量的十倍。哈斯林格一般是不大热情的，也不习惯夸奖别人。他是一个旧式商人，耳朵上老挂着一支笔，手指上满是墨迹，看来是在亲自管理账目。我刚才说过，他是一个旧式商人，从来不对任何事情表示热情，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花

费他几分钱。但这一次他表现得十分慷慨。原计划举行三次早场音乐会，后来改成六场，另外当然还要组织几场音乐晚会。为了表示礼貌，他特地从耳朵上拿下笔，问我有何打算？我问他指的是什么？他说，您过去在信中曾经说想改写舒柏特和贝多芬的乐曲，使维也纳的听众能够听到钢琴演奏的舒柏特歌曲和贝多芬交响乐……我的回答简单而明确：亲爱的哈斯林格先生，您可以规定音乐会的票价，还可以编印各种广告，也可以印发请帖，但是不要来管我的事！后来他真是没有管。音乐会开始前，他紧张得下巴直哆嗦，好象是该他演奏钢琴，而我却在代他管账似的。在我演奏《田园交响曲》之前，全场肃静。已故的贝多芬故乡的地方官安东·辛德勒尔坐在最前一排，这使得音乐厅的气氛显得更加严肃。这位先生交叉着胳臂，显示出他并不只是一位来听音乐的人，也不只是第一排第七号座位的占有者，而是贝多芬的代表，他将象贝多芬本人一样来评价演奏效果。音乐会是成功的。舒柏特的歌曲改写得也不错。我不得不三次重复《百花之神》。我不想多说这些了，只讲一些具体事实吧！又是这位哈斯林格。由于紧张，他夹在耳朵上的笔和墨迹斑斑的手又在哆嗦，他拉着我的右臂说：卡米尔·普莱耶尔来了，关于她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她来后，我们的音乐会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当天我就去看望了她。她长得很漂亮，态度十分友好，就象我们昨天才分手一样。第二天她在巴尔菲家举行私人音乐会。她弹琴，我翻谱，这该是多大的奇闻！您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演奏台、掌声和弹钢琴的。但是这一次我克制了自己，不登台表演，不同这位美丽的巴黎女人竞争。”

玛丽的雪茄又在发光，她说：

“当然，更需要知道的是音乐会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另外，我也想了解一下，费兰茨，女人们是怎么瓜分你的？！我听说，

您在同她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和雷维茨基·希多妮亚女伯爵也是好朋友……！”

费兰茨解释道：

“这都是些谣传。我曾经生过一场重病，发高烧，皮肤长满了红疹，医生们都觉得束手无策。因为没有对症的药，只好用凉水浸过的被单把我包起来，但是这样做又可能引起肺炎。希多妮亚女伯爵这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可以用骑士勋章的名义对天发誓：谁要是往坏处想，谁就是可耻的人。经过几个星期的折磨之后，我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回到了祖国的加冕首都波若尼（即布拉迪斯拉发）。国会正在举行会议。听说我回来了，议员们中断了会议，并且派出一个大贵族代表团到船码头接我。您可以想象一下，亲爱的，这简直是一张德拉克鲁瓦的绘画。它充满了金碧辉煌的东方色彩，到处都是镶着珍贵钻石的金链条、红绒短袄、弯形宝刀。您再想象一下，那是些多么英俊的战马，配上价值连城的马鞍，骑在上面的全是久战沙场、因风吹日晒和雪雨冲洗而皮肤黝黑的贵族。玛丽，如果您能想象出这一切，您大致上就可以了解当时迎接我的场面如何了。名字多得我脑中都装不下。我只记得埃斯代尔哈兹公爵家族的三批代表、塞钦尼伯爵、费什泰蒂奇伯爵、巴江尼伯爵以及法伊家族的代表都在场。还有许多其他来接我的人只知道欢呼，拉我的手，有的还亲我的脸。”

玛丽的脸又被发光的雪茄照亮了：

“您是一位特殊的革命家，亲爱的费兰茨……尽管您是雅各宾民主主义派，但您总是同国王、女王、伯爵、公爵们发生关系，总是同那些王公贵族，同那些象您站在演出台一样地站在国王宝座前的人们发生关系。不过您是孤独的，就象国王一样的孤独。”

费兰茨尴尬地笑了笑：

“佩斯报刊上还发表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说土尔佐·久尔吉总督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初曾给一个名叫李斯特·加什帕尔的人写过信，不仅称他是朋友，而且称他是同胞。显然，这个李斯特就是我的祖先。您应该理解和了解匈牙利人。许多人都来住处看我，同我紧紧握手，象兄弟一样地亲脸，并且用拉丁语告诉我，他们不需要再进一步研究我的家族史了，就这一篇文章足以证明，我是他们的同胞。我的表现充分反映了家族的碧血玉骨和英雄的传统。当然，亲爱的玛丽，不应该忘记，在这种时候人是不容易保持清醒头脑的。不断的庆祝、欢呼；大学生、手工业者、神父、教授、小学生和地方卫戍部队的军官们都来看望我。这种不断的庆祝、欢呼就象最浓烈的甜酒一样使人陶醉。我头脑昏昏沉沉，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因为我感到在这么多讲话、开会、舞刀、立正、说拉丁文的人当中，我快要消失、溶解，就象一滴水溶化在大海中一样。接着来看我的是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天主教派的、福音派的、资产阶级的、贵族的等等。这些机构也是避不开的。我只好弹琴，用银锄头破土奠基，用法文演讲——您一定会因此笑话我的——有时还试着用拉丁文演讲。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仔细认真地观察了我自己。这真是我朝思暮想的祖国吗？那么多欢迎祝贺、拔刀致敬、赠送花环、妇女游行、捧场文章，还有象钟声一样的喧闹，弄得我头昏脑胀。这不是钟声，这是辗转不安的思想在我过分疲劳的脑中的轰鸣。有一天上午，来了一个记者代表团。他们先用法文演讲一番，然后朗诵了一首匈文赞美诗，并当场给我翻译过来：

致李斯特

时代沉沦，一代人正在堕落，

道德和艺术观念越来越淡薄，
理智只是偶尔闪现光芒，
追求美丽和伟大的人惆怅，孤独。

旧世界用血的标记指着前面，
但新世界不顾前车之鉴，
人们都变得如此自私自利，
良心结成冰块，灵魂化为鬼奸。

上帝终于发出善心，
决心拯救那找不到幸福、
不断走进歧途的世界。

上帝终于发出善心，
派来万能的音乐之子，
为我们弹琴赎罪，免受惩戒。

当天晚上在贵族俱乐部举行音乐会。不知道是谁这样安排的，我突然发现，在俱乐部楼上的绿色厅里只有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过一会，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满脸胡须、精力充沛的男人。他的脸常常神经质地抽动。竖起的眉毛象一种测量风暴的精密仪器，不过它不反映外部气候的变化，而是根据灵魂深处的情绪而波动。眼睛眯成一条缝，象猎人在观察他的猎物，或者说象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在检查病人的内心世界。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赛钦尼·伊斯特万伯爵……。他刚刚介绍了自己，就开始转入正题。他是个一只眼睛做着事情，另一只眼睛盯着时钟的大忙人。听朋友们说，他的一生就是在匆忙中度过的。他一说话，就

开门见山：亲爱的朋友，您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早就过时的东西。任何人也无法从刀鞘中拔出刀来。因为它们已经生锈好几百年了。神气十足的皮帽、皮披风和皮短袄早就被虫蛀坏了。我担心一旦有人用力摇晃这些可爱的同胞，他们可能会象被虫蛀过的毛皮一样散掉。在这里，一切都过时了。他们感到骄傲的是同皇帝对抗。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皇帝好，想给国家带来什么更好的东西，而是因为你在这里看到的匈牙利人都自认为是皇帝。多么自满，多么傲慢！这是一种没有文化教养、嫉妒别人的自私自利！我们在这里应该做的事情是教育这个贫穷落后、受尽苦难、忍饥挨饿的国家学会做生意，建造公路，管理财政。要教会他们读书写字，特别是要教会写字。因为这里许多人虽然勉强会认几个拉丁字母，但是不会写。要教整个国家懂得：我们生活在欧洲，生活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和伦敦所在的欧洲。如果不学会这些，我们的民族就会从地球上消失。我们的国家犹如一潭死水，勤劳的邻居们不断筑堤，使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在这里，有重大的任务需要您去完成。人们很崇敬您，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懂音乐。他们根本不懂。他们只是因为您头上戴着世界声誉的王冠才崇敬您。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光学上的奇怪现象：匈牙利人在眼底下看不见的东西可以从国外看得见；宝石太近了，看不清楚，只有它在几百公里之外闪光时，才能感觉到它的价值。李斯特先生，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切，在这个还在时兴玩狗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国家，教育人们学习更高尚和更纯洁的精神文明。您先应该让人们懂得，为莫扎特、梅耶贝尔欢呼不只是贵族老爷们的时髦。做到这一点以后，您还应该使人们热爱音乐，使匈牙利人成为英雄，热爱和尊重祖先的遗产，认识到自己不应该低于欧洲的其他民族。另外，我还必须指出，您应该学会匈语。我也是后来学会的。原来我只会用匈语叫爸

爸、妈妈，这样做为的是不用德语或法语叫他们而使自己感到惭愧？我们使用过时的拉丁文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模仿维也纳的文明也是一种病态。我们必须自己先学会匈文，目的是为了以后教人民学匈文，要使匈文不仅成为做政治演说、签买卖合同的驯服工具，而且成为诗歌、文学的驯服工具。我们要使这种还不很精细、完整的匈牙利文同欧洲文明国家的文字竞赛。对您来说，更艰巨、更崇高的任务是学会匈牙利音乐，学会之后再教匈牙利人同世界第一流的歌手意大利人、日耳曼人、法国人竞赛。”

深夜，李斯特在烛光下读一首诗：

还在你童年的时候，
命运的冷酷之手就已使你惆怅，
“走吧，走吧，你没有祖国。”
她无情地把你推向异乡。

艺术的光荣之翼，
把你送到神奇的地方，
这是伟大的精神之国，
也就是你的故乡。

生活不断地引诱你，
走向金碧辉煌的天堂，
她给你荣誉、财富，
要你留在那里尽兴收藏。

荣誉把你带上了，

最高最高的地方，
你听到人们在欢呼吗？
李斯特，世界就是你的家乡。

命运、艺术、荣誉、幸福，
不管她们说什么，
你还是忠于自己出生的地方，
日夜思念着真正的家乡。

你终于又回到了祖国，
虽然这里的生活贫困、肮脏，
但是人们的良心纯洁忠厚，
热情的欢迎使你永世难忘。

戴上你的桂冠，
象骑士一样斩棘开荒，
你是高贵、忠实、伟大的艺术家，
李斯特，祖国的骄傲，祝你幸福寿长！

玛丽在打哈欠：

“这首诗是谁写的？”

“索贝尔，有名的索贝尔．他是舒柏特的朋友，写过好多歌词。”

“几天之后，索贝尔在佩斯用上面那首诗欢迎了我。接着一个大合唱团演唱了这首诗。索贝尔同佩斯的德国剧院音乐指挥、作曲家格利尔合作组织了这场演出。就在合唱团唱歌的时

候，索贝尔手拿礼帽，头略前倾，身体挺直地站到我面前。他是个漂亮的男人，脸色苍白，仪态文雅，就象是从拜伦的诗中走出来的一样。蓬松的黑鬈发遮着布满皱纹的额头（有人恶意地传说，他每天要在理发师那里消磨一个小时整理他那不听指挥的鬈发）。在索贝尔身旁，还有一位艾尔德蒂伯爵。索贝尔为自己是舒柏特的朋友感到骄傲，伯爵则以他认识贝多芬为荣。艾尔德蒂伯爵原是合唱团成员，后来变成了指挥。在整个庆祝活动中，他是鼓掌的主要带头人。到处都有他的存在，到处都有他的声音。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费什泰蒂奇公爵的家里。可是人不仅要靠艺术生活，还得靠各种普通物资生活。得有一个人来保证我生活上的一切需要。这个有用的人就是托尔纳州的总书记官奥古斯·安道尔。当别人装腔作势，客串指挥的时候，他给我订了房间，送来了维也纳的高级雪茄和三种葡萄酒，说这是为了使我不仅通过方言，而且还通过品酒来了解匈牙利各地的情况。他还派来一位名叫基什·卡尔曼的先生做我的秘书。基什先生懂拉丁文、法文、德文和匈文。当然，上面说的这些事并不象演戏那样由导演编排得井井有条，一件事接着一件事，而是杂乱无章，有时甚至是同时发生、交叉进行的：基什先生在说话，艾尔德蒂伯爵唱着歌，一位军乐队指挥在窗前指挥乐队演奏，与此同时出版商瓦格纳正在说服我把一些手稿交给佩斯一布达出版社，并声称这是我的爱国主义义务。在我的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时，又有一些新的高贵人物看我来了。所有这一切在我脑海中溶成了一片模糊的印象：音乐、钢琴音乐、吉卜赛音乐、部队音乐、贵族老爷们的业余音乐等等。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赛钦尼的忠告：我必须了解并且学会匈牙利音乐。但是谁来帮助我呢？他们推荐了音乐指挥家艾克尔·费兰茨。他还真的来了。艾克尔和我同龄，但看起来已经是饱经风霜的人。他沉默寡言，

德文、法文、拉丁文都说得很好。我对他说，我想学几首优美的匈牙利歌曲，如果可能的话，我将把它们带到欧洲各国……。他点点头，但看起来并不那么热心。他冷冷地说：可以吧……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他回答道：同行先生，因为这样做就好象一个人走到人家开着的窗口下，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几句话，就说我已经知道里面在争论什么问题了。一个人要想真正懂得一个国家在说什么，想什么，在写什么诗，唱什么歌，喜欢谁，蔑视谁，热爱谁，仇视谁，只到窗口下面路过一下是不够的。应该站在那里仔细听一听。最好是在那里住下来，那时就不需要别人给你带来歌曲，就象不需要给植物学家带来压扁了的花朵一样。那时一切都会自动地到来，同行先生，只要您有那么多精力搜集、记录、整理和传播就行了……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生气，也没有指责，但是里面多少总有点不高兴的意思：你刚来几天，就想收割一切，不仅不满足于得到荣誉、掌声、奖章，甚至还想带走我们的歌曲。不过这种不愉快的气氛只持续了一会儿，他很快就具体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优美的匈牙利歌曲。他还列举了一些作曲家的名字：马特劳伊、福加劳希、赛尔道海伊、波格纳尔和法伊·伊斯特万伯爵。他表示，如果他搞到了这些人的作品，会立即给我送来。我问他是否肯为我演奏一下，因为从活生生的音乐中学习和从写下的乐谱中学习是不一样的。他推托道，他不敢在象李斯特·费兰茨这样的音乐大师面前献丑。我说：同行先生，您别客气，我不是想得到钢琴演奏艺术，而是想得到优秀的匈牙利歌曲。因此他不再推辞，坐下来开始弹琴。他的弹法同皮克西斯、卡尔布兰勒或者莫谢尔斯的弹法截然不同，好象根本不管别人爱听还是不爱听，只是一味地敲着琴键。过了一会，琴声越来越激动，听起来似乎已经不是在弹钢琴，而是在奏大提琴，打击洋

琴，所有这一切还加上带钉的马靴撞击声。我们两人不由自主地都激动起来。其实这还只是刚刚开始。琴声既象劈开天空的闪电，又象风雨交加的雷鸣。不过这场大风暴是有节奏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节奏。它是千军万马奔腾驰骋的节奏，是刀剑旌旗呼啸狂号的节奏，是骑兵勇猛地冲锋陷阵的节奏。我已经坐不住了。在最后的雷声过去后，我问他：这是什么曲子？他看看我，眼神是那样的辛酸，使我心里也感到难受：同行先生，难道您连这个曲子也不知道吗？这是《拉科齐进行曲》①。我避开了他这个带着怒气的问题说：谢谢您对我的指教。然后我坐到钢琴前，根据我刚刚听到的曲调重新弹了一遍《拉科齐进行曲》。艾克尔先生是不大愿意多说话的人，就是现在他也不愿多夸奖我几句，而只是摇晃着我的手：好极了，很难相信这不是长期练习和精心设计的结果……

直到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第一次音乐会以前，我再也没有见过艾克尔先生。”

“这位爱讲真话、言词尖刻的艾克尔先生在您的第一次音乐会后说了些什么？”玛丽问。

“他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第二天，我和佩斯—布达著名的索德尔夫人同台演出，他也没有说什么。这位夫人简直是女王。从州长到剧院经理，从年轻的合唱队员到民族剧院的老演员，都得听她的指挥、命令和安排。她总是昂着头，好象头上戴着一顶看不见的王冠似的，但是由于王冠太重，摆不平，所以她的头绝对不能动一动。她是一位认真严肃的艺术家，演出前总是要先排练一次。这次伴奏的是一个可怜的、穿着破旧上衣的青年钢

---

① 《拉科齐进行曲》，十九世纪初，在匈牙利民间广泛流传的歌颂十七到十八世纪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民族英雄拉科齐的歌曲，后加工提炼成为《拉科齐进行曲》。

琴家。他总是紧张局促，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怕贝多芬和舒柏特的曲子太难，还是怕索德尔夫人的脾气太大。刚刚弹了两段，暴风雨就来了。索德尔夫人大声斥责，手敲着钢琴，用极为流利的匈语、德语和法语骂人。她的咒骂看来已不仅是针对那个可怜的年轻人，而且有些指桑骂槐，是针对我的：你是个遍游世界的音乐之王，可我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在这里，你得听我的！我心平气和地走了过去，有礼貌地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道：您不反对我为您伴奏贝多芬和舒柏特的杰作吧？她看了看我，不知所措，一下子就从傲慢之塔的顶峰摔了下来。她紧握着我的手：

"这样大的荣誉，我不敢当。"

但是实际上她还是让我为她伴奏了。很快又响起了琴声。可是她的歌声使我心慌，最后我不得不对她表示：

"您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艺术家，您应该遍游世界！"

音乐会结束后，我这位不爱讲话的朋友又来同我握手，这次总算说了一句话：好，很好……特别是您敢于为索德尔夫人的歌唱艺术伴奏，这是英雄式的行为……我这位爱挖苦人的朋友艾克尔就是这样的人。紧接着又来了一个脸带怪笑的男人，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容易折磨我们这些流浪汉的心的问题：你知道我是谁吗？没有经验的人在这种时候会觉得好笑，等着他说明身份。但是象我这种有经验的流浪汉会老实地回答：我不知道你是谁，亲爱的朋友，请你说明自己的身份吧！但他还是怪笑：

"你还记得维特尔·安顿和维特尔·亚当吗？……"

听到这句话，我浑身发热，几乎要哭出来。在我的面前立即呈现出已故的福兰肯伯格先生的形象。这位怪笑的青年人是那么象他，简直是两个同样的鸡蛋。我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你一定是福兰肯伯格·多尔菲！"

我只是心酸想哭，但是他却真地哭了起来：

“费兰茨……真没有想到我们又见面了。你现在正站在世界的顶峰，也许比这还高，而我呢……”

“你现在在干什么？”

“新闻记者。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两个小时的话，我可以谈谈一些同你直接有关的事……”

我是很愿意同他多谈谈的，但是喧闹、欢呼、火炬游行、学生游行、妇女代表团等等又接踵而来，使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谈话，甚至想想问题也很困难。唉，我怎么会有时间去同我童年时的伙伴谈几个小时或甚至几分钟呢？他们又把我拖到贵族俱乐部去了。说拖并不是夸大。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用肩膀抬着我上车，也不松开马套自己拉车送我。俱乐部里正演奏着吉卜赛音乐。灯光耀眼，可以招待几百客人的餐桌上已摆好了刀叉匙盆。宴会的主要演讲人是彼得里切维奇·霍尔瓦特·拉扎尔。他说：

“当有些人找出沾满灰尘的贵族证书，来证明李斯特·费兰茨的贵族出身以及他同某些名门贵族的亲戚关系时，我总觉得好笑。这都是些徒劳无益的工作。李斯特是贵族，但是他不需要任何被蛀虫咬坏的旧证件来证明，因为他是由主宰一切的上帝用自己的圣手封为贵族的。在这里，我想起了伟大的拿破仑。他拒绝了一些伪学者的献媚，因为他们企图证明拿破仑皇帝是迈第西克家族的后代。可是拿破仑说：我不需要祖先……我自己就够了！”

在欢呼庆贺、觥筹交错的间隙中，我童年时代的朋友终于来看望我了。他说：

“相信我，我由衷地为你受到的热烈欢迎感到高兴，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你由于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

它的炮弹虽然打不到你身上，但是很容易玷污你的地位和尊严！”

对这一点，我也开始有所感觉：

“你讲的是什么样的战争？”

“不管彼得里切维奇·霍尔瓦特怎样标榜自己是民主主义者，也不管他如何轻蔑贵族的爵位，他实际上是向贵族老爷们拍马溜须的人。他是一切仇恨或厌恶欺骗宣传的人直接攻击的目标。谁受到他的支持，谁就会遭到另外一些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如艾德沃斯、加劳伊、维莱斯马尔蒂、托尔蒂·费兰茨、巴伊沙·尤若夫的怀疑。他支持歌剧院吗？这些民主主义者就向歌剧院开火。结果大闹了一场，法院责令写攻击文章的人公开自己的姓名。巴伊沙、托尔蒂、维莱斯马尔蒂走进法院，要求把他们关起来，说他们愿意承担匿名攻击的责任。以后那些控告这些作家的人又冲进了一些报刊的编辑部，大打出手，打伤了好些人。他们还雇了一批打手帮他们决斗，杀死了几个人。这更加暴露了他们的野蛮、粗暴和无耻。你想想，你站的位置合适吗？你是愿意站在专雇打手角斗的彼得里切维奇一边，还是站在另外一边？在另外一边，虽然公爵、侯爵、伯爵不多，但都是些正派人。”

“那你怎么回答的？”玛丽问。

费兰茨放下了快要吸完的雪茄，点起了他更喜欢抽的烟斗，用空出来的一只手驱赶着扑面而来的烟雾：

“我告诉他说，正因为我不大了解或者说根本不了解匈牙利的情况，所以我不能支持这场战争的任何一方。我的那些贵族们虽然雇用打手，爱打官司，但是他们热爱音乐，也就是说是我的同盟者。另一方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为真理、平等、社会生活的纯洁而斗争。作为圣西门和拉曼内斯的学生，我也在为这些崇高的目标斗争。因此他们也是我的盟友。如果我能在这

里长住，我良心上的天平一定会倾向这一方或那一方。但是我在这里只住几天，我不能倾向任何一方。因为我在这里不会有敌人，我只有朋友、战友、兄弟。即使有人因此而指责我，我也只能如此。这时，我们的谈话又被另一个人的祝词打断。接着我的秘书向我报告，科斯加尔先生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等着我，一定要马上同我谈谈。我根本不知道这位科斯加尔先生是什么人。但是由于我已经习惯于让各式各样的发明者、歌词诗人、算命先生、秘密剧本的作者、草药商人和未来的作曲家们来支配我的时间，所以这次也没有推辞。我在福兰肯伯格和基什秘书陪伴下走进了另外一间屋子。科斯加尔先生穿着匈牙利服装，态度矜持，好象可怜的匈牙利的全部困难和麻烦都系在他那粗短的腿上和宽厚的肩上似的。我还没有来得及伸手，他就抓住我的右胳臂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科斯加尔·亚当，佩斯—布达的裁缝师！"

"这次意外的见面使我感到愉快，先生！"

"我之所以来找您，艺术家先生，是因为我已经不能容忍匈牙利民族的一位杰出艺术家、誉满全球的匈牙利俄耳甫斯、优美旋律的魔术大师、匈牙利良心的忏悔神父还穿着法国或德国的燕尾服、坎肩和长裤。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穿匈牙利服装的时候了，而且要穿配得上当代最伟大的匈牙利人——李斯特·费兰茨的服装！"

科斯加尔根本不考虑我自己对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想法。他一击掌，就冲进来四个裁缝给我量尺寸。量完之后，他说：

"衣服明天就好。我保证，只要阁下身材不变，决不需要修改重做。"

尽管这些事只是用去了几分钟时间，人们却已经在俱乐部里到处紧张地找我。又是一些委员会、代表团之类的，他们通知

说：人们将在市中心为我树立塑像。在这里，只是客气的抗议已经不够了。我只好坚持说，首先应该为匈牙利文学、历史、文化生活中已故的英雄们树立塑像，等到全有了之后，再为我雕塑像。

“可是，”代表团的发言人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募集了捐款，这怎么处理呢？”

“鉴于国王加冕城市波若尼和匈牙利精神首都佩斯—布达都还没有设立音乐学院，我建议你们把这笔钱作为建立音乐学院的经费……”

他们总算同意了所罗门王的决定。他们按照匈牙利的习惯才刚刚欢呼了一声，就又来了一个代表团。代表团通知我一个好消息：我已被选为佩斯市的荣誉市民……

没完没了的欢呼、代表团、委员会。州议会还动议国王陛下授予我贵族爵位：

“恭请皇帝兼国王陛下授予李斯特·费兰茨贵族爵位，以表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热心的人类之友和忠诚的爱国者所建立的、为整个文明欧洲所一致推崇的功勋……”

许多著名的贵族都在建议书上签了名。也许是我想起了福兰肯伯格的话，当时我对周围的人说：这个建议书最好作废，我虽然不是革命者，但是我也不想做哀求别人的农奴。我这句话几分钟之内就传遍了能容纳几百人的宴会厅。布拉蒂先生过来劝我：艺术家先生，您是有孩子的人。即使您自己不愿意，您也应该为你的儿子接受国王的恩赐。我回答说：我儿子的母亲是真正的女伯爵，我是他的父亲，难道这还不够他一生受用吗？总之，人们的情绪稍为低落了一些，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对他们来说是那么值得骄傲和能提供各种特权的东西对别人竟会毫无价值。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恢复一下人们的情绪。我站起来宣布：

我愿为增添民族剧院的设备筹建基金；除了为我树立塑像的基金外，我还愿再加一笔更大的捐款，以便尽快建成音乐学院。我拿出了几千福林放在桌上，然后坐到钢琴前为人们弹奏了《拉科齐进行曲》和几首从比豪利·亚诺什那里听来的旧军乐曲。弹完琴后，如果不是我那愁眉苦脸的朋友艾克尔和福兰肯伯格把我从后门偷偷送出去的话，我几乎无法摆脱我的同胞们。到哪里去？他俩不声不响地走着。他们带我离开市中心，走到停泊在多瑙河岸边的拖船前。天气很冷，正刮着一月的寒风。风的呼啸声使人们以为是狼群包围了整个城市。最后他们带我走进了一家小酒店。开始只听到杯盘碰击，高声谈笑，店门开进开出，后来喧哗声逐渐平静下去，好象人们在一首旋律十分复杂的曲子中慢慢懂得了它的节奏、和音和相互联系。真正的音乐旋律渐渐压下了人们的吵闹声：吉卜赛人正在演奏。艾克尔说："先生，现在请仔细听。您将会听到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听到的音乐。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就已经超过了所有的老琴手。他能够把歌曲演得那样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即使是受过训练的音乐家听了也会惊得发呆：他是多么有才华，他的心是多么热情奔放，他的手指又是多么坚硬呵！如果条件好的话，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帕格尼尼……。"

我们走进了内厅。乐队领头的一看见愁眉苦脸的艾克尔，马上就迎了过来。艾克尔以国王的庄重姿态为我们作了介绍：

"这位是李斯特·费兰茨……这位是蓬果·费兰茨……"

谁要是能够用艺术手法描绘出这个吉卜赛人的脸，那必将是一幅伟大的杰作。黝黑的脸上既有下等人的卑恭，又有艺术家的骄傲，既充满了只有真正的音乐家才能体会到的内心热情，又反映了向听众讨钱的酒吧间琴师的献媚姿态。蓬果谦卑地鞠了一躬。从他的动作中你可以感觉到，如果艾克尔允许的话，蓬

果就会去吻他的手。在这以后，吉卜赛人又回到了乐队，重新开始拉琴。……等以后情绪安定一些，我可以把这些歌曲都为您演一遍。在这些曲子当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首哀伤的曲子，他们怎么翻译也没有能够把意思完全译出来，因此我只记住了头几句特别具有东方色彩的调子：金龟子，黄色的金龟子……蓬果看见我们三人都很喜欢听匈牙利音乐，他就一首接着一首地为我们演奏。有的歌曲根本无法翻译过来。但是曲调本身就能表达内容：心爱的，开开门！他一拉到这里，青年人就脚心发痒，开始跳起舞来。他们把桌子都推开，我们也上去帮了忙。蓬果站到酒厅中间，先拉了一段序曲，等到大家不仅用眼睛、耳朵，而且用自己的心灵注意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拉起舞曲，使人们一下子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真是奇妙的音乐。挺拔，年轻，矜持，但是带着爱情的幸福微笑。我问：这是什么舞蹈？艾克尔又白了我一眼：同行先生连这也不知道，这是恰尔达什舞[1]！我又问：那么为什么在俱乐部里尊敬的先生和女士们跳的却是波兰、法国的三步舞和维也纳的圆舞呢？其实恰尔达什舞比世界上任何舞蹈都更美、更气派。艾克尔耸了耸肩：如果我这样对他们说，他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臭骂我一顿，教训我别管他们的事；如果是您去对他们说，也许一句话就可以使恰尔达什舞成为全国的新时髦。

这句话里既有一些指责，也有一点赞扬。我努力想取得他对我的信任。第二天，我组织了一次联欢晚会，邀请了所有我认为会有利于这件事的人。鬈发的索贝尔说，在这次晚会上，他第一次使贵族老爷和资产阶级市民、绅士先生和自由主义的青年、日耳曼少数民族和匈牙利人、不断告状打官司的公子少爷和新闻记者相互和解。在这次晚会上，我讲了几个值得大家注意的主

① 恰尔达什舞，一种匈牙利民间舞蹈。

要里程碑。第一是建立音乐学院。第二是搜集全国的优秀民间歌曲，然后加以系统整理，使世界上最有文化的人和最优秀的音乐家也向它们低头、屈膝。在大家热烈欢呼下，我又加了一句：我已经开始搜集民间歌曲，有一部分已经向公众演出过，与维也纳的哈斯林格出版社已经签订了出版合同。在人们的狂呼和叫好下，我几乎没法说到第三个里程碑。等了好久，我才得继续讲话：据我了解，我的朋友艾克尔·费兰茨快要完成一部新的匈牙利歌剧——《巴托利·玛丽亚》。至迟到今年秋天即将同观众见面。第三个里程碑要求我们扶持和加强新的嫩苗——匈牙利歌剧，要求我们尊重和支持它的作曲诗人、音乐指挥、在前台的演员以及所有参加这项演出的乐队和合唱队的无名成员。讲完这段话后，在这种非政治性的集会上爆发了罕见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因为我也邀请了民族剧院的全体合唱队员和乐队队员来参加这次联欢晚会。邀请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学会如何同傲慢无礼的埃斯代尔哈兹、弗什泰蒂奇、杜尔索等贵族老爷共同相处……等到会场上安静下来之后，我又讲了第四个里程碑：我们要创造匈牙利舞蹈。其实也用不着我们去创造，因为它已经是活生生、热辣辣的现实，匈牙利民族的青年人在没有任何委员会、会议和学者的帮助下，已经灵巧地模仿牧民和农民的气势壮观的舞蹈，创造了新的匈牙利舞蹈。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一直在注意我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的秘书朋友，已经把蓬果·费兰茨带到讲台前面。他的出场使整个大厅光亮起来。在老一辈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清醒过来的时候，年轻一代的人已经开始跳起舞来。人们疯狂地、不倦地跳着。等到温度略为降低的时候，我叫基什秘书把钢琴推到大厅里来，让我和蓬果这两个费兰茨轮流为大家演奏舞曲！

“科斯加尔先生做的礼服怎样了？”玛丽问。

“按时完工。深红色的短袄，银白色的坎肩和蔚蓝色的裤子。科斯加尔先生亲自为我试样。他围着我身子转，好象在观赏一座纪念碑，然后用双手猛地一拍：

‘真棒，简直是一座活雕像……’

我伸手取出钱袋，问他应该付多少钱。科斯加尔从头到尾仔细地打量了我，眼神一点也不比愁眉苦脸的艾克尔友好多少，说道：

‘分文不收！应该是我欠先生的情。因为您穿着我做的这套衣服遍游各地，人们都将会知道这件短袄和坎肩（请允许我老实告诉艺术家先生，这件坎肩是最值得我骄傲的）是佩斯—布达裁缝店师傅科斯加尔·亚当缝制的。这就是我莫大的光荣。’

很快我就有机会露一露科斯加尔先生的杰作了。因为一八四〇年一月四日我要在民族剧院举行音乐会，将穿上这套新做的漂亮礼服。我演奏了《拉迈莫利·路西亚》和《半音阶加洛普舞曲》。后来又弹了《拉科齐进行曲》。据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说，这次弹的《拉科齐进行曲》就象密尔顿安琪儿们的激烈战斗一样。不过掌声超过了战场上的厮杀声，迟迟不肯停息下来。最后也只是因为弗什泰蒂奇伯爵和其他贵族出现在台上，人们才慢慢坐了下来。讲话的是弗什泰蒂奇伯爵，他致了简短而热情的贺词，授予我一把礼刀。可惜我只能依靠别人翻译，然后我用法语答谢，又得请人翻译成匈语。这篇贺词的稿子还在我的笔记本里，是我的秘书用速记写下来的，它的大意是：

这把刀过去曾为保卫国家出过力，今天我们把它交给最和平的人的手中。这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匈牙利在战场上取得这么多胜利之后，现在要在艺术、文学、科学的和平战场上博取荣誉。这把刀是我们艺术家的高贵的、明显的标志。刀鞘上镶嵌着珍珠和宝石，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附属品。实质是刀鞘中

的刀。我们的艺术作品也是这样……我们的思想可以通过千千万万的形式表达，但是就如同刀鞘中的刀一样，我们真正的思想火花——热爱祖国和热爱人类，却隐藏在刀鞘里。我们将通过合法的、和平的途径进行工作，但是如果一旦有人想不公正地通过暴力来打扰我们，我们一定会拔出刀来，决不迟疑。”

第二天，费兰茨和玛丽进行了一次十分尴尬的谈话：

“玛丽，您打算长期留在伦敦吗？”

“您呆多久，我也呆多久，亲爱的……”

“这里是英国的心脏。我们无法久留。我们会成为丑剧的中心。虔诚的老太婆们会占领旅馆的大厅，旅馆经理甚至可能给她们带路。这里不是意大利。在我们周围的也不是意大利人。玛丽，在这里，您的女伯爵衔头、我的所谓的世界声望都不能保护我们。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在伦敦附近找一块地方……”

“您想不让我在社会上露面？”

“是的。我是迫不得已的。”

“也许我最好马上离开英国。”

“也许……”

“您虽然已经认识那么多女人，费兰茨，但是我想，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女人的心对您并没有坏处。总之，我不走！”

“您吃醋吗？”

“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您没有权利让我躲在巴黎，隐居在您母亲的家中。我带着三个孩子。您应该明白，我不会这样做的，不会，不会，决不会！否则宁愿离婚……或者是大闹一场，或者是平静地分手，宁愿您把我赶走，我也不能同意与您母亲住在一起，让人把我关在一座贫困落后、掩盖不住仇恨和相互根本不理解的监牢里。”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放弃在英国环游演出的计划……”

“不能这样做。我需要钱用。我愿意住在乡下。”

“住在里士满行吗？那里我有几个好朋友。”

玛丽耸了耸肩：

“是里士满还是地狱，对我来说完全一样。只要不回巴黎就行……”

费兰茨的首要任务是为朋友帮忙。伦敦出版商维塞尔来找他，抱怨地说道：由于过分乐观的估计，他出版了肖邦选集。现在才发现，谁也不要。书全部堆在仓库里，一本也卖不出去。只有李斯特能够帮这个忙。只要在伦敦组织一次肖邦音乐晚会，维塞尔先生就可以免受两百路易金币的投资损失，肖邦的地位也可以得到挽救。费兰茨真的举行了一次肖邦音乐晚会，效果也是好的。突然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给肖邦写封信，但是后来一想觉得不行。他还记得最后一次的会见。他们两人之间好象产生了隔阂。这种隔阂看不见，摸不着，因此也无法消除。生气？嫉妒？还是为了一个女人？现在已经弄不清楚问题的根源了。不过信也不能写。过了几天，李斯特在汉诺威广场为公众演出了一场，以后又同伦敦交响乐团一起举行了音乐会。最后又来了一场独奏会。

音乐会中间休息时，莫舍列斯来看费兰茨。这位杰出的音乐大师还不见老，头发虽然灰白，但是脸孔红润，三十二个银牙闪闪发亮，微闭的眼睛放射着善良的光芒。

“您在同我比赛，孩子。您演奏韦伯的合奏曲，三天前正好我也演奏了这首曲子。不可否认，我不如您。您的演奏是无法比拟的。”

费兰茨惭愧地鞠躬施礼。

莫舍列斯慢慢地放下了手杖、硬沿帽、蓝色衬里的大衣，用一双眯缝的眼睛仔细打量年轻人：

“有件事请给我解释一下，孩子。您有的是思想、曲调和丰富多采的音乐设想，为什么总还是演奏别人的曲子？幻想曲、变奏曲、圣曲、伯利尼、多尼塞提、梅耶贝尔、佩基尼、舒柏特，还有其他数不清的曲子。您可以有更大的成就。您可以看得更深，飞得更高。但您还是只演奏别人的，这是为什么？”

费兰茨正坐在演员化装室的练习琴旁。他迅速关上琴盖，然后在房间里边踱步边说：

“自从我有思想以来，我一直生活在音乐厅里，在艺术家之间，在公众面前，几乎可以说，是生活在不停的公开表演的战场上。我热爱人，也尊重听众。但是二十五年来，我不得不看到，公众总是渴望听到最不值钱的音乐。即使是最优秀的艺术家也不能不满足这种庸俗愿望，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对抗这种潮流。顺水推舟是比较容易的。我从小就决心对抗低劣的艺术。你们想听圣曲？可以，我就演奏圣曲，但是我也要强迫你们了解唐璜。你们想听幻想曲，还要加上令人激动的快速和弦和吹哨的颤音？可以，我为你们表演，但是你们也必须听听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你们想听变奏曲？可以，这个我也会弹，但是你们必须让我加上舒柏特的《百花之神》。我的老师拉曼内斯神父教导我说，一个艺术家如果不在成功的演出之外为自己提出更远大和更高的目标，就配不上艺术家的称号……”

可是，演出公司的经理维莱尔·比尔对艺术家使命的看法完全不同。在一个寒冷的秋天早晨，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真正的艺术家国民议会。约翰·奥兰多·巴利也来了。他是非常受欢迎的艺术家。他在各地演出时，人们派代表团在边

境欢迎他，到处挂满了旗帜和花环，到处是军乐队，就好象在欢迎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威灵顿将军一样。上帝给了他一副极好的嗓子，这已经不是一般人的机体所能有的嗓音，而是一种在冲击着陡峭峡谷的巨大风暴。巴利一唱歌，人们的头发会竖起来，背上会穿过一股冷流，特别是唱他的拿手好戏《鸣钟》时，情况更是这样。歌声象军号那样响亮，象狂风那样呼啸，在感情最强烈的地方，神经脆弱的人会昏倒过去。斯蒂尔小姐和巴桑诺先生也是歌唱家，但是他们的嗓门要小得多，他们演出的是古老的叙事歌曲、空想的抒情歌曲和一些意大利的小夜曲。这里还有里查顿先生的笛子和在法国学习音乐指挥艺术的拉万努先生。他暂时还没有乐队可以指挥。根据天才的维莱尔·比尔的设想，拉万努先生将指挥当地的业余乐队。费兰茨就是要同这样一班人马合作。起初，费兰茨很生气，几乎想离开这里，后来维莱尔·比尔先生向他描绘了一番到外地去演出的美好情景，才使他有些回心转意：这次旅行将经过英国风景优美的丘陵地区，住宿在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古老旅店，品赏各地的名酒佳肴，享受各种各样的冒险机会，所有这一切都在等待着有幸来到英国的客人。在这次会议进行过程中，主人供应了大量的英国啤酒、美味的冷肉盘，以后又上了各种各样烈性饮料，使大家的情绪很快就热烈起来。巴利当场——不考虑物质报酬——表演了他的拿手好戏《鸣钟》。他的高音嗓子也迫使其他人跟着一起喊叫。拉万努在指挥一个看不见的乐队；里查顿用笛子模仿夜莺的叫声，但很不成功；费兰茨开始扮演起滑稽演员来。他想，这样至少能有几天或几周的时间摆脱一切麻烦，摆脱令人精疲力尽的音乐会，首先是摆脱那些几乎是在追逐费兰茨的评论家先生们。攻击他的带头人是《音乐世界》的记者。费兰茨在莫舍列斯的一次大型家庭晚会上作了非常成功的表演之后，这位记者声称：李斯特的演奏

没有感情，他的音乐观是令人讨厌的，他的风格只是粗暴地捶击乐器，由于他缺乏真挚的感情，因此只好借助于荒唐的、使人吃惊的技术上的小动作来欺骗听众，与其说他是令人尊敬的艺术神父，还不如说他是庙会集市上的叫贩。《雅典艺术评论》编辑亨利·福特基尔·科利写文章回击了这种粗暴的辱骂，指出李斯特是当代唯一用时代的声音、以时代的名义、用十九世纪的革命热情歌唱的钢琴家。尽管如此，费兰茨在这座泰晤士河畔的城市里散步时，仍然感到十分苦恼。他从来没有获得如此热烈的成功和欢呼，但是也从来没有遭到这样粗暴的攻击和辱骂。现在他可以摆脱这一切了。跟着这些好伙伴遍游英吉利、苏格兰、爱尔兰准是件愉快的事。而他们则把费兰茨看作是来自奥林匹斯山的神人。

第二天大家签订了合同，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艺术团体的马车就离开了伦敦。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雷丁市举行了音乐会。一个月之后，他们抵达都伯林。因为那里没有乐队，多才多艺的巴利先生只好亲自担任音乐伴奏（他会弹钢琴、竖琴、风琴，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拉小提琴）。但是巴利先生当钢琴伴奏的荣誉在李斯特表示自愿伴奏后就维持不下去了。

当晚，费兰茨在《鸣钟》开始之前演奏了一段神奇的钢琴序曲。暴风骤雨，乌云密布，电闪雷击，大海咆啸，波涛翻滚，巨钟轰鸣。等到巴利开始唱歌的时候，听众的情绪已经无法再往上提了。演出之后，两人一起到台前谢幕。大家都回到演员化装室，很快分领了当天的票房收入。费兰茨请大家吃有香槟酒的晚饭，使大家饱餐了一顿。这顿饭的价钱大大超过了费兰茨当天的收入。

不管怎么说，吉卜赛式的生活还是美妙的。到了莱斯特市后，拉万努总算有了一个乐队。乐队的大提琴手是莱斯特公爵。

排练的情况大致如下：

拉万努：阁下请注意，刚才F音太高了一点……

公爵：您太装腔作势了，年轻人。我爱怎么奏就怎么奏，我喜欢怎么拉就怎么拉！

费兰茨在幕后听到了这次对话。下次等到自己演出，由可怜的拉万努和杂乱无章的乐队伴奏时，费兰茨狠狠地整了一下公爵的大提琴。他弹得特别快，使公爵根本跟不上拍子。音乐会结束后，公爵激烈地表示抗议：您不照顾公众；您应该知道，他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因为您李斯特，而是为了欣赏我的大提琴才来的。

要是在别的时候，费兰茨肯定会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对他艺术盛名的侮辱。但是这次他很轻蔑地对待这件事，认为它不屑一提。在长期而疲劳的旅行演出结束时，大家才发现演出公司经理一个钱也没有，许多费用都支付不出来。费兰茨对这事也觉得无所谓，只是耸了耸肩，说了一句："可怜的魔鬼……"

临别前，大家又演奏了一场《鸣钟》。巴利唱得窗户直发抖，费兰茨又掀起了海洋的愤怒和狂啸。然后，艺术家们相互告别，费兰茨回到里士满，那里等着他的是玛丽、三个孩子和烦恼。

祸不单行，倒霉的事总是成双地到来。费兰茨在返回里士满的途中，最后一站因为马车夫喝醉了酒而疯狂地赶车，结果车翻进了路旁的小沟。旅客都被挤压在车厢里，到处都是玻璃碎片、翻倒的行李、箱子和座位。

玛丽当晚找来了医生。医生的诊断是：左手严重骨折，左腕脱臼，需要绝对的休息。

医生走后，两人在一间巨大而没有火炉的房间里坐着。这种情景是非常荒唐的。楼上的房间住着三个孩子、奶妈和玛丽的女佣人。楼下是他们两个人。房间特别大，阴冷黑暗，还散发

出一种潮湿的霉味。这就是里士满。他们何必一定要住在这里呢？纯粹是消磨时间，浪费才华。当时他参加又疯癫、又可爱的吉卜赛式的演出旅行是多么愚蠢呵！现在他的左手坏了。在伦敦至少还有五个音乐会合同有待执行。以后还得去布鲁塞尔、巴黎、柏林……可是目前被困在里士满，带着一只受伤的手，怎么办？还是回佩斯去吧？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另外找音乐学院院长了，我回来了。我将做院长、教员、艺术家、朋友、同胞以及其他一切……

第二天，在卧室的黑暗中，又有两支雪茄烟的烟火在闪亮。玛丽先开了口。她想转移一下费兰茨对目前困难的思路：

"上次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您得到那把礼刀之后又干了些什么？"

这把刀，这把可恨的刀，它首先伤害的是我。布拉茨·德·布里伯爵显然只是想在报纸上刺我一下，但其结果等于是打了我一记耳光：

"我们当然需要忠告会唱歌的夜莺和钢琴艺术家，以便使我们的全部热情(和全部金币)成为他的……我们甚至可以让贝多芬和韦伯饿死，但是我们必须用礼刀去表彰李斯特先生！"

这是粗暴的侮辱……不过这记耳光首先不是打在我的脸上，而是打在匈牙利民族的脸上。我也明白，音乐家、优秀艺术家、周游世界的钢琴家是不应该得到礼刀的。我甚至从一开始就知道，不管授刀仪式多么隆重感人，它同艺术家受舆论讥讽、遭到失败只是一线之差。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破坏那些拥抱我、把我当作兄弟、象阿拉伯人一样把最心爱的马送给我的人的快乐。我唯一能做的是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大致上按上面所说的思路，很快就回答了布拉茨伯爵的攻击。这是一记耳光。

另一记耳光是从斐迪南皇帝陛下那里得到的。人们告诉我，皇帝拒绝了为我申请贵族爵位的建议，理由是贵族称号只能授予在战场上或者为国家的利益建立过功勋的人。我能干什么呢？只好继续执行我的十分疲劳的演出计划：乘坐快车去久尔、绍普隆、波若尼，然后再去多波尔扬。我去探望了老家，参观了我同父母一起居住过的地方。我站在高低不平、堆着牛粪的院子当中，追忆我童年生活的片断，强迫自己接受回忆引起的激动情绪。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因为我只想起了父亲。现在我才真正懂得，他为了我离开这个贫困愚昧的地方去巴黎，是作了多么大的牺牲……家乡的人为我举行了优美动人的舞蹈表演。我把我所有的钱全部分给了他们。我还去拜访了赛钦尼，他代表朋友们赠送给我一只珍贵的金属杯。然后我又乘快车去维也纳。这样来去匆匆，实际上是为了处理一件没有处理完的事。哈斯林格计划出版匈牙利歌曲。我说，如果出版，我可以把它定名为《匈牙利狂想曲》。他还想了解我前几年到处流浪的情况。我们两人因为合同问题发生了争执。他把现成的合同放在我的面前，我不能不加任何改动就签字。因为争执不下，他突然改变了话题：我准备在维也纳的莱都特大厅为您安排一次音乐会，因为所有其他地方都太小，容纳不了那么多人。这是卡塔拉尼和帕格尼尼以来的第一次……

确实如此。那天音乐会的听众有三千人。当我正要开始演奏的时候，突然皇帝兼国王陛下的侍卫长走进大厅。他吩咐了哈斯林格几句，厅内立即变得闹哄哄的，人们相互紧张激动地传递消息，座位重新安排，头几排椅子全部后移，搬进来的是些大沙发，然后哈斯林格用感动得几乎要哭的声音宣告：请诸位站起来，皇帝陛下和皇后、王子驾到！首先进场的是我那位皇后朋友，身子还是被令人窒息的铁箍紧紧地箍着。接着进来的是奄

拉着忧郁的脑袋的斐迪南皇帝，后面跟着皇帝的家族成员，脸上仍然是那种我在意大利时已经领教过的冷漠无聊的表情。在震天动地的掌声和高呼万岁声中，皇帝一家慢慢就座。令人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皇后用一个文雅的手势接受了我的敬礼，而且还点头回礼，对我使了一个顽皮的、心照不宣的眼色。看来尽管皇室的男成员不喜欢我，但是我在皇室的女成员当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音乐会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我从钢琴旁站起来的时候大约是九时半，这标志着演出已经结束。至少是我认为已经结束。这时音乐厅内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要求我加演节目。我又坐回钢琴旁，只好听天由命。这样啰哩啰嗦的音乐听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居然临时选出了一个委员会，由委员会根据听众的要求进行投票，然后决定我演奏什么曲子。就只缺加印盖章和贴印花邮票了。委员会主席根据多数通过的原则，要求我先弹《上帝保佑》。弹完后，又是讨论、表决、检查表决结果。第二个曲子选的是泰尔贝尔格写的法国小步舞曲。第三个曲子是一个有意思的维也纳青年的作品，曲名是《生活就是跳舞》。我以后有幸地认识了这位年轻人，我一看见他黝黑的皮肤就高兴地觉得，他同我国的吉卜赛人一定是亲戚。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约翰·施特劳斯。《上帝保佑》是我知道的曲子，因为我年轻时听过几次，因此不需要他们给我介绍什么。第二和第三个曲子我不大了解，于是只好请委员们给我抄一份乐谱。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一位委员站起来说，他认为施特劳斯配不上海顿和泰尔贝尔格。我马上表示：我认为这个曲子是很好的，我在国内和国外的爱好就是搜集一切能拨动人们心弦的优美曲子。演奏结束后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这时侍卫长以笔挺的立正姿式向皇帝报告：皇帝和皇后陛下，皇家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皇后用一个动作把侍卫长打发走了。这个动作证明皇后确

是维也纳人，因为任何一个维也纳小贩在有人挡住他看热闹的视线时，都是用这种动作把人推开的。我不想说得太长了，总之，这次音乐会延续到夜晚十二时半才结束。皇帝显然是睡着了，但是皇后的兴致特别高。我想，我应该通过某种方式来感谢她的掌声和欢呼，因为它们确是打破了一切宫廷礼仪常规。等到掌声平息下来后，我用钢琴弹了一首佩斯的小夜曲：金龟子，黄色的金龟子……然后我一个接着一个地演奏了我的狂想曲，结果使这些只是从传闻中听说过什么是匈牙利和匈牙利歌曲的人发起狂来，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佩斯—布达的听众。最后，皇后终于向侍卫长抬了抬手，表示可以起驾了。我想，以后为我申请爵位的结果肯定同第一次是一样的。"心爱的，开开门"等歌曲是不会受到皇族青睐的。

我在维也纳曾经认识过一个名叫德萨尔的布拉格音乐家，他告诉我说：尽管他很尊敬我，但是他还是生我的气，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布拉格人都同他一样，因为我侮辱了捷克人和斯拉夫人。我看了看他，心里反复地琢磨，我们两人当中究竟谁是疯子，是他还是我？

"您凭什么这么认为，先生？"

"在一次佩斯的音乐会上，有一个讲斯拉夫语的青年建议您弹一弹他的民族歌曲，可是立即遭到讽刺挖苦，有人喝倒彩，有人还当场隆重地烧掉了他的条子……"

这一次我真有些动怒了：在我的一生中确是有过这么一件事，是在佩斯发生的。但是那个青年人不是斯拉夫人，而是日耳曼人，他建议演奏的不是什么民族歌曲，而是"呵，亲爱的奥古斯汀"。有几个情绪冲动的佩斯音乐朋友认为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因此把条子撕掉了。

德萨尔热烈拥抱我："真是这样的吗？"

我推开了他的手臂，向后退了一步："我没有说谎的习惯。"

过了几天，他在街上见到我，立即热情地跑过来："我把一切情况都写信告诉了布拉格的朋友们。现在他们回信说：他们恳求您去布拉格。"

我推托说，我已经同别人签了合同，去不了。但是这位热心人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他说他能想办法处理好一切问题。尽管我有私人秘书，但还是由德萨尔先生出面写信给布拉格、德累斯顿、莱比锡联系，而我只要签个字就行了。一八四〇年二月十一日，我们路过布尔诺。当地人把我们从车上抬了出来。当天就举行音乐会。二月十八日到达布拉格。海报邀请尊敬的听众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半到普莱丁斯·萨尔音乐厅参加音乐会。我住的地方正好在音乐厅对面。我亲眼看到人们从早晨八时半开始就排成长队占据了音乐厅、楼内的各条走廊和附近的几条大街。中午，音乐演出公司经理雅各伯·费谢尔来找我，说是音乐会出了点小问题，因为他在社会公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多出售一些票，现在有四百多人只好挤在大厅里，台上也坐满了人，只留下了一点我能侧着身子走到钢琴旁的空地方。他向我道歉，说这一切都是由于布拉格人空前的热情所致。我从他的谈话中进一步了解到，布拉格人想让我成为"黑色艺术家"，一个强有力的钢琴艺术家，他的力量和灵巧能迷住人民。但是我没有按照正式的节目单演出，而是先以《月光奏鸣曲》开始，然后是《埃维·玛丽亚》和《百花之神》。开始人们有点失望，但是后来掌声如此之热烈，使我想起了莫扎特，觉得应该由他到布拉格来戴上这顶期待已久的桂冠。布拉格人发现，他们得到的不是他们想象的东西，或者用一位法国女士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实际情况比我的声誉还要好些，演出《百花之神》后，场内秩序就没法维持了。群众都挤到台前。我为他们加演了一直埋藏在我

心底里的《胡斯之歌》。场内先是极度的肃静，后来则是激烈的风暴。晚上，埃丽莎·施利克女伯爵举行招待会。她自己也是作曲家。她还邀请了许多著名音乐家和布拉格最权威的音乐出版家约翰·霍夫曼。霍夫曼对我说，他愿意把《胡斯之歌》买下来。在这同时，他对我笑了一笑，好象隐藏着什么秘密似的。我回答道：我愿意出售，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您必须先告诉我，您为什么笑。他四周看了一看，似乎想了解是否还有局外人在场，然后说：这首歌从来不曾是胡斯之歌。它是我的朋友特阿多·克洛夫写的。这首歌同波兰军团一起在奥斯特罗文卡战场上浴血奋战过，它的旋律曾飘荡在所有为人类自由而斗争的地方。沙皇和哈布斯堡皇帝最恨克洛夫。因此，我们在传播这首歌的时候不敢写作者的名字。他会原谅我们的。他没有虚荣心。他的歌就象古老的胡斯运动一样，传遍了全世界……正因为这样，在你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开始是极度的肃静，后来是激烈的风暴……

第二天，我们被邀请去卡勒尔·科戴克伯爵家做客。有人又为我写了一首诗……

玛丽长叹了一口气："这样不停的庆贺，您受得了吗？"

费兰茨自觉有愧地低下了头："这就是我的生活。"

一八四〇年三月十四日——费兰茨又接着讲下去——我到了德累斯顿。一大堆信和一个代表团在等着我。先讲讲信。这些信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们等你回来，快回来吧！但这次不是作为客人，而是永远在佩斯定居下来。信中还附有一个奇怪的通知：国内的出版检查委员会准许出版《拉科齐进行曲》。我现在所处的地位很特殊：福兰肯伯格指责我同王公贵族穿一条裤子，皇帝陛下的政府却认为我不配取得贵族爵位，出版检查

委员会又宣布我是叛逆分子……我究竟是什么人？有时候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幸运的是我没有多少时间去折磨自己，因为希莱来了。就象老朋友之间常做的那样，我们共同回忆了逐渐模糊的往事。过了一会，门德尔松也来了。他比过去显得更温和，更稳重，好象是一支在凋谢时才放出芳香和丰姿的花朵。接着敲门的是舒曼。我很熟悉他这种类型的人，不过不是在男人当中，而是在妇女群里。这种人不爱说话，但有蕴蓄的热情。他充满情爱，但又嫉妒成性，总是要求你只同他在一起，只关心他，只谈他的事，只研究他的过去，只考虑他的将来。舒曼聪颖异常，但不是法国式的小聪明。他的智慧犹如一座深井，而不象一般法国人的聪明一看就到底。要想把这种智慧充分发挥出来，必须做很多工作。但是一旦你到达了井底，你就会发现奇迹。沉默寡言的舒曼说话了。他游移不定的眼睛开始闪烁出光芒，秀美的嘴角上露出讥讽的微笑（有时也是对自己的讥讽）。他在讲述自己的青年时代，回忆年轻时那些稀奇古怪的、热烈的、与生活现实紧密相连的梦想。他谈到了严厉的双亲，他们一直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律师。他甚至还回忆起一个老蜘蛛，它总是在墙角上织网，想把他最崇拜热爱的克拉拉和他窒息死。在这里，他提到了织网的维克教授。他坐到钢琴旁，一个一个地弹动琴键，因为他的手指在一次疯狂的试验中损坏了。这次试验本来会使他成为钢琴艺术上的帕格尼尼。过了一会，舒曼的妻子兼灵感克拉拉也来了，她对我严肃地微笑。这种微笑象一副冰冻的铁甲，掩盖着一切感情。你无法知道，这种微笑究竟是友好的问候还是敌对的宣战。她代表舒曼感谢我让哈斯林格出版了帕格尼尼的作品，并且感谢我在施莱辛格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评介舒曼的作品。她朗读了《音乐评论报》的信作为报答：

“向李斯特·费兰茨致意！我们知道，对一个胜利者来说，多

一个或少一个桂冠是无关紧要的。也许是由于谦虚而满足于现有的胜利，您至今还未到我们这里来过……您现在离我们的城市是那么近，请来吧！我们将敞开双手拥抱您，只要爱戴和尊敬允许，我们愿意永远拥抱着您……富洛莱斯顿和艾斯比斯（签名）。”

舒曼马上作了解释。他写了一首新的钢琴曲子《狂欢节》。这部作品除了描绘美妙的舞会之外，还象征着他整个一生的虚荣和美的复杂混合。《狂欢节》的两个主角就是富洛莱斯顿和艾斯比斯。舒曼打开了乐谱夹，用眼睛鼓励我翻看其中的《狂欢节》。我翻看了几页后就开始弹奏起来。克拉拉脸色苍白，舒曼则满脸通红：

“妙极了……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一种音乐魔曲，就象我国宝贵的诗人恩斯特·霍夫曼写的一样。”

克拉拉也在点头，但她指出，有些地方节奏稍为快了一些。舒曼仰面坐在沙发上高声大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笑）：“天哪！你们这些钢琴家都是神人，都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现在您瞧，您象魔鬼似地弹琴，而她这个小蝴蝶、我唯一心爱的人却在担心节奏速度……”

克拉拉根本不理睬舒曼这样欢乐的情绪。她有些嗔怪舒曼：“我只是从未来的角度提醒艺术大师……今后在别的场合、别的听众面前，在某些地方不要过于激烈……”

美丽的克拉拉就是这样的。幸亏德累斯顿不是这样。在我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欢迎场面就是那样的热烈，以致身体不好的人心脏病会发作。我配得上这种过分热烈的欢迎吗？这次我不是一个人演出。同台的还有施勒德尔·德夫里安特夫人。她演唱了最优美的舒柏特歌曲，并且让我荣幸地为她伴奏。这位杰出夫人的表演深深感动了我，使我也决心为听众提供一些特

别的东西。我演奏了《狂欢节》。当然，群众的耳朵都是很尖的，消息迅速传遍大厅：李斯特在几个小时之前刚刚第一次看到《狂欢节》的乐谱。我没有过多考虑克拉拉的意见，仍然按照我的节奏弹这首曲子，结果如同我一生中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又一次打乱了音乐厅的秩序。成百成百的人围着钢琴，没完没了地要我加演节目。最后，音乐会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一个人沉醉在成功和音乐美感之中的时候是不会去考虑其它细小琐事的。我也忽略了几件事。其中一件事是没有管住从佩斯一布达带出来的、已经无用的基什先生，他渐渐变得那样傲慢无礼，以致有些旅馆把整套高等房间让他住，而把我却塞在一间小卧室里。这个蠢人还跑到莱比锡这座德国的音乐之城，自作主张地同一个新闻记者拼凑了一则广告："莱比锡懂音乐的听众将荣幸地听到举世闻名的李斯特的演奏。"

莱比锡人大为震怒。这是应该的。这个笨蛋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莱比锡是托马斯和巴赫的家乡。对这个城市来说，不管是谁的到来，都不是什么光荣。基什还荒唐地把票价提高了一倍，把新闻记者赶出售票处，宣称我不给任何人免费票。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莱比锡的公众面前。报纸过去从未这样攻击过我的音乐会，但遗憾的是，莱比锡的报纸这样做了。尽管音乐厅坐满了人，但是不仅没有人鼓掌，相反还有不少人吹口哨。我没有办法，只好站在台上等这些先生吹够为止。但是后来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我选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序曲和终曲作为开始。人们的反应是冷冰冰的。这时，拿破仑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第一场马伦戈战斗失败了，没有关系，第二天再打一仗，最后还是赢得了第二场战斗。休息以后，我也开始了第二场战斗。这次演奏的是《尼奥伯幻想曲》和《半音变奏曲》。我自弹钢琴以来，已经听过很多掌声，也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发狂的听众，但象

这次那么大的激动混乱，还很少经历过。不过这并不能改变德累斯顿一家报纸评论文章对我的攻击，它指责我的演奏缺乏美感，没有艺术价值。克拉拉的父亲维克教授不仅是莱比锡，而且也是全德国最有权威的评论家。他也极力批评我，把新闻法范围内所允许的、一切难听的形容词全都加在我头上。在艰苦的第二场马伦戈战斗后，我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基什先生的辞退信。一封要求音乐会举办人取消合同。第三封信给法伊·伊斯特万伯爵，表示我很愿回国定居，但是希望他们给我提供条件……基什很快就来见我，他以一个受委屈者的庄严姿态把他管理的文件全都甩在我面前。音乐会举办人也来了。他表示决不取消合同，因为不管那些音乐评论家先生们怎样打喷嚏，音乐会的售票额总是音乐厅能容纳人数的两倍，这是任何时候也没有过的。我问，您的损失可能会有多少？他说了一个天文数字。我说，好吧，请您在报上公开发表通告，我宁愿赔偿您的损失，也决不再为莱比锡人提供向我吹口哨的机会……但音乐会举办人是一位正派人，他不想借机敲我一把，所以最后还是同意取消合同。他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由于极度紧张和疲劳，我又病倒了。浑身上下又发出了在维也纳曾经长过的又痛又烫的红疹。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躺在床上休息，把房间所有的光线全部挡住，不许任何人接近，保持绝对的安静。我是这样决定了，但是我的朋友们采取什么态度呢？热情诚恳的门德尔松决定设法挽救僵局，他不能让老朋友李斯特·费兰茨就这样离开莱比锡。正好这时有一个节日。三月二十一日是巴赫和拜厄的诞生纪念日。门德尔松在这天晚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音乐晚会，请了三百五十个客人，并且由他本人、希莱和我同台演出。我演奏的是维克教授所说的臭名昭著的节目《露西亚幻想曲》、《百花之神》和《魔鬼罗伯特幻想曲》。在这次音乐会上，莱比锡人的情绪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尽管我讲法语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表达自己，但我在音乐会上还是用德语讲了话，从而把一些最坚决的敌人也争取过来了。

第二天，音乐会举办人又来找我：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解了，我们举行音乐会没有任何障碍了。门德尔松也帮着劝我。舒曼则几乎是哀求：他还想再听我弹琴，希望看到我如何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次我选了韦伯的协奏曲，事后才感到，题材选得不是很好。乐队赶不上我的节拍，匆匆忙忙、踉踉跄跄、勉勉强强才跟上来。这简直不是音乐演奏，而是一场生死搏斗。不过这场搏斗还是成功的，舒曼高兴得大声呼喊“胜利万岁”。

在这些斗争、努力、胜利的过程中，我的笔也没有休息。我把门德尔松和舒曼的一些歌曲改写成钢琴曲。我以为现在可以安心地离开莱比锡了，因为莱比锡人已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又想错了。《莱比锡音乐评论报》正好是在我离开后吹起了打猎的冲锋号。他们在拚命追逐猎物。尤其令人尴尬的是，这家报纸不仅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发行，而且还在整个德国、奥地利帝国，甚至法国和匈牙利发行。我可以周游全世界，可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但在我的背后却总是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肯定这又是维克教授的主意。尽管如此，当我的马车飞向一个又一个城市的时候，克拉拉的脸还是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想起有一次演奏舒曼的歌曲没有象演奏《露西亚幻想曲》那样成功，当我走下台时，克拉拉向我表示祝贺，脸上冰冷，毫无笑容。我当时暗地在心里发誓：总有一天我会使舒曼的《狂欢节》受到它应有的欢迎，不愧同贝多芬《三十二变奏曲》平起平坐。

所有这一切事情，我全抛在脑后了，因为我收到了您的一封信，亲爱的玛丽。这封信经过长途辗转，好不容易才到我的手。

雪茄又在黑暗的房间里发出光亮：是的，信确是我写的，但是一直还没有得到您令人满意的答复……

“您来信问我，我是否能让您完全自由？您的用词是十分明确的。您要的是道义上、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完全自由。如果一个女人提出这种问题，那问题的后面肯定有一件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个人——一个比自己丈夫更贴心的男人。也可能是您——但我根本不作这种假设——想使我吃醋，故意制造一个不存在的情人，使我以后为了同别人争夺您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您写了信，从邮局寄出，也到了我的手。我必须坦率地回答：您是我三个孩子的母亲。我愿意同您同甘共苦，风雨同舟。我如果说，您走吧，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但是如果您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更有希望的未来和更幸福的婚姻而自己想走，而我又强拖住您，那我也会成为可笑的、没有骨气的人。现在您当然在笑我——尽管我看不见，但是我感觉得出来。是我把您锁在这里的。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因为您已经被他们赶出家门，被剥夺了一切。只有在我支持下您才能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在这个可笑而无情的摩登世界里，谁有钱，谁就能发号施令。现在我给您打开铁锁。因为我曾经在没有征求您意见的情况下同您原来的家庭取得了联系，并且同您母亲谈过话。不管多么令人难以相信，我还见过了莫里斯。他们认为，巴黎已经忘掉了过去的事。如果您回到老家，我不能说他们会气呼呼地跑来接您，但是他们会友好地欢迎您。这就是目前的情况，亲爱的玛丽，您自己拿主意吧！”

雪茄的烟火又划出了一道光线，到烟灰盒旁放出几粒火星后就熄灭了。玛丽停了很久之后才回答道：“我想，目前最紧迫的事是回巴黎，当然我要把孩子们也带走。到了那里后再决定我们两人的命运吧！”

一八四一年一月十日，玛丽和三个孩子启程去多佛尔。费兰茨送她们到海边。天气异常阴森可怕。他们在海关大楼里等着轮船。楼外狂风怒吼。海关大门时开时关，放进了大海的潮气，弄得楼内更加阴冷，连火炉旁也结了冰。这样的天气使人们都无法讲话。上帝的守卫天使们正在上面吵架，凡间谁还敢说话呀？过了一会，船长派人来请乘客上船。玛丽走到费兰茨面前，长时间地、热烈地吻了他。

"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安静地度过几个月，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可您是一只流浪鸟，在世界上到处乱飞，而我却被关在巴黎的牢笼里。当我们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又总是相互指责。"

"当心孩子，多多保重……"

玛丽开始低声哭起来。这时她已不再是女伯爵，再不象天鹅一样昂着头，也不再去寻找一种最能显示她那古典美人的侧脸型的姿式。她只是轻轻地哭泣，把三个孩子都紧紧搂抱在身边。

"什么时候能够见到您，费兰茨？"

"我很快就要去巴黎。那时我们再处理一切问题。"

玛丽的脸上闪现了一刹那的光彩：

"我已经好久没有问过您了：还有些爱我吗？"

刚巧这时候海关大楼的门大开，为的是让旅客们和小行李推车能够顺利通过。狂风也冲进了大楼，发出了大风琴的声音，使整个大楼都在哭号。费兰茨没有回答——即使回答，声音也会被狂风吞没——，而是紧紧抱住玛丽，然后同孩子们一起走向船码头。大风用鞭子抽打着船帆。风声刚刚有些平息，天空就下起了鹅毛大雪。费兰茨一直站在岸上看着船渐渐离开。浓密的雪花很快就挡住了他的视线，也挡住了不断摇动的白色头巾。

船已走得很远了，但是白色头巾还在向下俯冲的云层和向上拍击的船帆之间摇动，就象有一个人在杀声震天的激烈战斗中发出了微弱的呼救声。

费兰茨继续留在伦敦。他出现在音乐厅的演奏台时，左胳臂用绷带吊着。这种情景使得他的崇拜者们大吃一惊。由于他的音乐会大部分都是义演性的，所以不能取消。他只能用右手弹，另一位有名的钢琴家莫斯切来斯当他的“左手”。《雅典娜报》和《音乐世界》的争论还在继续。反对派的评论已经比过去谨慎得多了，但是攻击还没有停止。这时不仅是社会舆论，就连消息灵通的音乐会举办人也都站到费兰茨一边来了。在伦敦和外地，有人张贴了许多海报，预报李斯特将要演出，合同谈判正在顺利进行等等。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卑鄙的欺骗宣传，地球上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会愤怒地提出抗议。但是费兰茨听到这些事的时候只是哈哈大笑。有时候他从一张义演海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当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后，就真地坐车赶到那里去演出，使举办团体都大为震惊。演完后，他用力拍拍主要组织者的肩膀，说：这样骗人，上帝也不会生气的。

维克多利亚女王十分爱听李斯特弹钢琴，因此经常请他到温泽别墅去演奏。在玛丽离开英国几星期后，他也启程回大陆。第一站是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旅馆的房间门外，来访者有礼貌的叩门声得不到房间主人的回答。为了引起房间里的人的注意，来访者故意高声咳嗽，但是也没有任何反应。等了好久，房门总算打开，但出来接待的是一个眼睛炯炯有神的意大利青年。

“李斯特先生由于旅途劳累，也可以说是由于旅途困乏而无

法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他委托我来最详尽、最可靠地答复诸位的问题。以后诸位有事，请都来找我，我将听从诸位的吩咐。”讲完这些话后，年轻人同各报记者分别握手并自我介绍：贝洛尼，加泰诺·贝洛尼。

《布鲁塞尔评论》记者问：

“听说艺术大师独自一人承担了建造贝多芬纪念碑的费用，这是真的吗？”

贝洛尼褐红色的脸孔精神焕发，看来他是很喜欢讲话的人，现在正好得到了很好的话题，因此使他象男高音唱咏叹调一样觉得是一种享受：

“确是如此。艺术大师在意大利时听到一个令人感到可耻的消息，说是各国的艺术家先生们只捐助了三百福林作为建造贝多芬纪念碑的经费。先生们，只有区区三百福林。一个普通工厂主、商人或三等官员的埋葬费也远远不止三百福林。我必须强调指出，三百福林只够用来举行追悼仪式，连个墓碑也造不起来。巴黎、维也纳、柏林、伦敦的音乐家们居然这样吝啬。我的主人马上采取了措施。他通知贝多芬治丧委员会，不要再进行募款，募款通知单全部作废，他愿意独自一人承担建造贝多芬塑像的全部费用。他这次到布鲁塞尔来，也准备进行义演。以后还计划去欧洲各国义演……我们捐献的将不是几个，而是几千甚至几万福林！”

《安卫尔新闻报》记者提问：

“听说正因为李斯特先生到处乱花钱，所以他的家庭专门派人监护他，有这回事吗？”

贝洛尼把他闪闪发亮的眼睛转向天花板，觉得这种问题实在是不屑回答。但他还是不得不说几句：

“没有这回事。任何人也没有，也不可能监护李斯特先生。

谁也没有这种权利。”

《布鲁塞尔评论》记者又问：

“亲爱的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名字，那您是贝洛尼先生。您在这里的任务是什么？您在这里不是他的监护人吗？”

贝洛尼表演了一曲意大利的老滑稽戏。演员在戏中只是捧着肚子笑，笑得越来越厉害，肚子、胸部都不断颤动，但是没有声音，最后突然控制不住，就大声狂笑起来。

“说我贝洛尼是什么监护人？真是叫人笑破肚子。事情很简单，艺术大师每天都收到五、六十封信，有时上百封信，必须有人阅读、分类，把一些夜游病患者、永动机发明人、敲诈勒索分子和其他坏蛋的信剔出来；必须有人处理海报、入场券、节目单、广告、旅馆房间和旅途用品等具体事务。艺术大师身旁需要有一个人帮助他加减乘除，防止小偷盗窃不拘小节的大人物的口袋……但是更重要的是，亲爱的记者先生们，本人多年来一直注意着艺术大师的活动。我一直象一个渴望科学知识的天文学家一样注意着他这颗明星的运动轨道。我收集了十五年来所有用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出版的有关艺术大师活动的报刊资料。我还收集了他全部的节目单和海报。直到不久之前我才知道，我正好和他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逗留。促使我来到布鲁塞尔的是一笔生意，促使他来到布鲁塞尔的是上帝的使命。我拜会了他，并且自荐愿为他服务。我可以向诸位负全责地宣布，我不是根据玛丽·道格尔特女伯爵的要求、意愿或指示这样做的。我现在是他的小小秘书。我为此感到光荣、高兴和幸福。我十五年来一直准备做的事现在终于成功了。先生们可以这样写：加泰诺·贝洛尼不多不少，正是艺术大师的小秘书。你们也可以这样写：贝洛尼是站岗的，是大师们的大师，是为李斯特守门的大师。”

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钢琴声。

贝洛尼闭上眼睛，虔诚地把手指头贴在嘴上：

“安静……这是贝多芬第一〇六号乐曲。”



第五章 流 浪 鸟

玛丽确实企图利用贝洛尼监视费兰茨的行动。但是这位新秘书有礼貌地，然而是坚定地拒绝了玛丽的要求。贝洛尼对主人忠心耿耿，很快就把费兰茨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来往信件排列得整整齐齐，比较重要的信件都专门放在一个地方，随时准备答复。合同放在一个大皮包里，旁边是一张编写得很巧妙的音乐会日程表。费兰茨只要一看表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在列日、安特卫普、奥斯坦德和布鲁塞尔演出。贝洛尼在干这些事的时候心情愉快，积极认真，而且没有使费兰茨感觉到任何负担。在这个可爱的意大利青年身上丝毫也找不到那种令人讨厌的和陈腐守旧的商人习气。在音乐会上，他鼓掌最热烈，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想为主人捧场，而是他确实比别人更感受到音乐的美妙。他每天都把越积越多的银行账单给费兰茨看。然后，他象教训一个孩子一样反复地对主人解释："尊贵的艺术家先生，只有当您没有钱的时候，钱才会成为您的敌人。如果您开始积钱，它就会成为朋友。如果您的银行存款越来越多，它就会比兄弟还亲。总之，钱是最好的医生，包治百病；钱是最好的伴侣，温柔体贴；钱是最好的顾问，足智多谋……"

费兰茨开始还能耐心听他发表宏论，但过一会就忍耐不住了。他愤怒地拍着桌子：

"贝洛尼，您发疯了？您难道想使我成为守财奴吗？"

在这种时候，贝洛尼总是谨慎小心地退出去，但是过不几天，他又会旧话重提，把银行账目拿来请费兰茨过目，同时生动地描述背后有钱支持的人是如何幸福愉快。

正当贝洛尼快要说服费兰茨取得胜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角斗英雄、冒险分子李克诺夫斯基公爵。可怜的小贝洛尼花费了好多精力，一勺一勺地向费兰茨喂药，而这个击剑士却整坛整坛地向费兰茨倾倒野蛮、胡闹而且有毒的生活之酒。这里讲的并不是寓言譬喻，而是真实情况。李克诺夫斯基喜欢狂饮。他常把费兰茨拉到夜总会去寻欢作乐。当然，贝洛尼也得跟着去。正如他自己所说：神圣的誓言使他不能不象李波莱洛那样到处跟着唐璜，只是他比李波莱洛更加忠于主人就是了；如果需要，他会跟着费兰茨上刀山，下火海。他们三个人一起饮酒。李克诺夫斯基话最多，他详细宣讲了他在捷克、波兰、德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冒险生活。他用刀剑伤过很多人，但是自己也受过不少伤（脸上的刀痕就可以作证），当然他因此得到了很多美人的亲吻。贝洛尼起先还小心翼翼地喝酒，露出难为情的微笑，活象一个被道德败坏的人拉下水的年轻神父。但是不久酒精开始在他身上起作用，眼神明亮、热情奔放的贝洛尼唱起歌来。过了一会，他也讲起自己的经历。他的叙述使公爵和费兰茨哈哈大笑，因为一只小小的黄莺在老鹰窝里谈笑自若并不是常见的事。但是第二天一清早，贝洛尼又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说："大师……今天布鲁塞尔市政大厦将举行代表大会，斐提斯和奥尔·布尔都将出席……现在应该回家了。"

贝洛尼想作个好榜样，坚定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如果不是另外两个人把他扶住，他肯定会摔倒在地上，推倒椅子，掀翻堆满酒瓶的餐桌。他坚持走了几步，但是一出酒店大门遇到冷风后，就又倒了下去。费兰茨和李克诺夫斯基只好扶着他回家。

他一边被人拖着走一边还在嘟噜：

“您是伟大的，大师，您是非常伟大的！”

谁也无法知道，他是在赞颂世界第一流音乐家还是在夸奖壮实的公爵。后者喝了一个晚上的酒，可现在还是那样挺拔精神，似乎他刚才不是从酒店，而是从澡堂里出来似的。

贝洛尼所说的代表大会是为纪念伟大的比利时音乐诗人格雷特里诞生一百周年而召开的。又是一系列的音乐会。贝洛尼又恢复了他的勤奋工作，协调地安排来自各城市的合同，大胆地赶走那些寻找各种借口敲诈费兰茨的冒险分子。他还同各种慈善团体进行认真仔细的谈判。它们都要求费兰茨帮忙，为衣衫褴褛的穷汉捐献衣服，使无家可归的孤儿有人收容，让误入歧途的姑娘改邪归正，给衰老残废的海员安身之地。格雷特里纪念委员会还请费兰茨捐款建造格雷特里塑像。贝洛尼象一个守卫城堡的战士一样英勇战斗，但是腹背受敌。因为费兰茨有一条原则：凡是向他伸手的，都应满足；不要讨价还价，不要装腔作势；你应该为能够给人施舍感到高兴，上帝给你钱财，是为了让你分给众人。

费兰茨的生活犹如一条颠簸不定的小船，一会儿被掀上浪头的高峰，一会儿又淹没在低潮的浪花中：今天为救济盲人举行音乐会；明天却同大吃大喝的李克诺夫斯基和几个舞蹈演员瞎胡闹；后天又参加格雷特里纪念晚会，演奏这位伟大比利时作曲家的作品；再下一天他们一起去奥斯坦德寻欢作乐，尽情享受，当然李克诺夫斯基更是带头人。在这段时间内，费兰茨还同斐提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谈话。斐提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准备在法国新大百科全书中写一篇关于李斯特的介绍来弥补他过去对李斯特的攻击，甚至还请求李斯特把他的新乐曲改写为

练习曲。一个已经到达钢琴金字塔塔尖的人现在开始用李斯特的风格、手法和声音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才能。还有一次有意思的会见：费兰茨在格雷特里纪念代表大会上认识了挪威音乐家奥尔·布尔。布尔个子很高，脸上布满了因为风吹日晒而出现的裂纹，似乎他不是靠拉小提琴谋生，而是一个生活在海洋上的挪威海盗的后代。

他们最主要的共同话题是帕格尼尼。布尔不久前刚去过意大利和法国。凑巧的是，布尔走的正好是当时帕格尼尼走过的路线。他一步一步地跟在这位伟大的小提琴家后面作最后一次旅行。

当帕格尼尼到达尼萨时，死亡追上了他。那时他已经没有什么人样了。瘦得皮包骨，不能说话，炎症严重的咽喉不断出血。这时，敲诈勒索者、律师、代理人、赌窟妓女、法官、官吏一起都来为自己的平庸无能找他算账，几乎把帕格尼尼撕裂。

教会一直到他死后也没有放过他。安东尼奥·加尔万尼阁下派他的秘书在灵前宣布了教会的判决：任何墓地，不管是城市、国家、贵族和农民的土地，都不得埋葬他的遗体；他既不能在森林、田地或其他任何地方得到永息之地，也不许以任何借口予以安葬；如果有人违抗教会旨意埋葬了他，任何人都可以挖出这个魔鬼的尸体，把他的骨头或骨灰抛撒野郊，这种行动将会得到教会原谅，不算罪过。帕格尼尼的棺材被运送到警察局时，沿路上还遭到群众的咒骂。半夜，帕格尼尼的儿子阿希尔雇了八个人，从警察局院子里偷出了棺材，扔进了大海。看来教会的愿望实现了，大地抛弃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费兰茨彻夜未眠。他正在埋头疾书帕格尼尼的祭文：帕格尼尼不仅是艺术家，而是艺术大师，甚至比这更多，是艺术魔术

师。他只是不知道，艺术家要比英国上院议员、王位继承人和教会权威人士受到更严格的人格法律的约束。艺术家的法律是：才华赋予责任！

几周后，费兰茨在汉堡演出。贝洛尼看到费兰茨向波恩贝多芬基金会捐献那么多钱，给盲人收容所和退休音乐同行那么多捐款，脸色都发白了。但是当他看到费兰茨迅速而忘我的决定挽救了地方乐队的义演音乐会时，他从内心感到骄傲。这场音乐会的举办单位预先没有准备舞台照明。音乐会还未结束，天色已近黄昏，费兰茨和乐队最后的节目不得不临时取消。台下情绪激昂，几乎要闹出事来。这些音乐爱好者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目的就是为了听听"李半仙"的演奏。人们来往奔跑，开会研究，但是毫无结果，因为费兰茨虽然同意在黑暗中演奏，可是乐队没有乐谱和照明无法演出。天空越来越暗，只有大教堂的几盏油灯和忽暗忽明的蜡烛带来了一点光亮。吝啬的德国市民要求退票，李斯特不演就退票。这时费兰茨坐到钢琴旁，不要乐队，开始一个人演奏。他象俄耳甫斯神一样很快使情绪激烈的群众平静下来。他弹的是《露西亚幻想曲》、《尼奥伯》的改编曲。最后一个节目是《一路平安》。音乐会结束后，欢呼的听众象送一个凯旋归来的将军一样把费兰茨送回了住处。贝洛尼的银行存折虽然没有增加收入，但是他也逐渐习惯了一条法律：才华赋予责任！

汉堡人根本不肯让费兰茨离开。他只好再演一次贝多芬的幻想曲，并且同汉堡的精小乐队合演了第十六号五重奏曲。

一八四一年秋天，费兰茨、李克诺夫斯基和贝洛尼这三位好朋友到达哥本哈根。他们还没有订下房间，丹麦国王恺莱斯特尼八世就已派人通知：国王陛下召见艺术大师。费兰茨连衣服也来不及换，风尘仆仆地赶去谒见国王。恺莱斯特尼八世见到

费兰茨感到十分高兴。他免去了一切礼仪，热情地说："久仰尊名，今日始得如愿以偿。"

丹麦国王授予他最高勋章。哥本哈根的音乐厅两次客满，大大增加了贝洛尼的银行存款。不过哥本哈根的救济基金会、孤儿院、退休音乐工作人员之家以及其他慈善机关也都得到了赠款，因为比贝洛尼银行存折和音乐会合同更有力的法律是：才华赋予责任！

最热情的哥本哈根听众、诗人和童话作者安徒生是这样记载的："……我同一些保守的政治家、胆小怕事的市民谈了话。他们听了李斯特的音乐后跑到街上，同几十万群众一起高唱《马赛曲》。枯燥无味的数学家听了李斯特的演奏，变成了热情奔放的人。哲学家黑格尔的信徒们认为李斯特的音乐反映了他们的哲学，是使人类飞向完善之岸的巨大智慧浪潮。诗人们认为李斯特也是诗人。旅行者——这里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从他的音乐中看到了已经见到过的或者即将去寻找的神话世界。的确，李斯特的音乐是一种魔术般的旅行，我从中感到了自己远离祖国时心跳的旋律，听到了特雷西纳山岩的潮浪撞击声和古老德国大教堂的风琴声，看到了阿尔卑斯山顶的皑皑白雪和意大利狂欢节的彩色缤纷。这是天庭判决的号声，它响彻希腊的悬崖峭壁，唤醒死去的众神……"

诗人是这样评价的，他因为音乐家的热情而燃烧起来了。专家们怎么看呢？他们中有人不止一次对李斯特采取敌对态度，因为费兰茨是特殊的天才，是反对一切中庸之道的。专家们首先对李斯特·费兰茨的声音感到困惑不解。他的声音——至少看来是这样——可以无止境地增强。他演奏《半音阶加洛普舞曲》时，开始声音很低，使得坐在后面的人都不得不低声提醒前面几排的幸运听众不要摇扇子，不要大声喘气。过一会，急速曲的声

音渐渐地、一步一步地，也可以说是一度一度地增大，使强音充满了整个大厅。听众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好象他们自己也在跟着艺术家一起弹钢琴，琴声愈来愈宽，愈来愈响，但是它还在继续上升，甚至可以超过最强音。听众不止一次地在演奏过程中鼓掌，因为实在是忍不住了。只有到这时，艺术家才开始从最强音逐渐下降。这种声音已经不仅仅是一架钢琴的乐声，而是一个受到人的意志、热情和天才鼓舞的特殊乐队。费兰茨刚开始走上艺术生涯的时候，自己常常成为美妙动听、难以抗拒的声音的俘虏，就象一个演员常常成为自己声音的奴隶一样。随着岁月的消逝和演出的成功，费兰茨懂得了一个道理：艺术家不能滥用钢琴声音的魅力。他体会到巴赫和肖邦对声音的强弱有不同的要求；演奏帕格尼尼的曲子，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但表现斯卡拉蒂的感情，就必须严格控制自己。他还明白，被自己的声音所激动，不能区别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索福克勒斯和缪塞的演员不是好演员。自我克制，这已经越来越成为费兰茨的特点。严格要求，对自己、对听众都是如此。他愈来愈愿演奏伟大的经典作品，这要求艺术家和听众都必须具备极大的忘我精神。这里激动听众的不是《半音阶加洛普舞曲》的最强音，而应该是另外一种东西，是清晰、明确而纯洁的音乐语言，是自由而有规律、自然而又严谨、象人的呼吸和心脏跳动一样的节奏。在演奏伟大的经典乐曲时，不能只依靠钢琴的焰火来征服听众。除了演奏外，还要解释这些优秀作品的内在矛盾、冲突、斗争以及这些内在矛盾、冲突和斗争最后如何消失在胜利的和音之中。他越来越依靠不久前还作为不解之谜的乐曲本身来征服听众。过去，费兰茨喜欢即兴演奏，喜欢吉卜赛式的风格，他常常为单调的音节增添音乐的歌词，加上第八度音，通过和声来补充简单的旋律，用强大的声音之柱来支撑摇摇欲坠的音乐建筑物，以激发听

众的感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兰茨越来越不愿即兴演奏，风格越来越简单朴素，越来越忠实于作品的本来面貌，并且努力使听众也习惯于朴实的风格和手法。有些地方期待他演一些花俏的噱头，但是他不干。即使海报和节目上已经安排，他也临时改演贝多芬或巴赫，因为他不仅想使人们得到音乐的享受，而且还努力设法提高人们的音乐素养。他感到，单纯的乐声、钢琴演化出来的丰富多采的乐队和声、自由跳动的节奏以及理解音乐的严肃性，都还不能向他提供全部武器。他的两只手是最敏捷和最可靠的手。在刚开始从事艺术工作时，费兰茨常常赋予钢琴演奏一些魔鬼似的光辉，不仅采取音乐家的手法，有时还运用演员的手法进行表演，使自己也受到巨大力量的压力，以致他的身体几乎承受不了这种心灵上的刺激。随着光阴的消逝，他不再这样做了。现在，他的手指还是象闪电一样的迅速，两只手仍然准确无误地跳越在两个八度音的“悬崖”之间，但是他已经不再痛苦，不再演戏，或者说不再矫揉造作，而是象人们用自己祖国的语言说话一样，准确可靠地使用各种最复杂的词汇向听众叙事。专家们——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在他的一双手、手的式样、手指的特殊长法中去寻找秘密。结果发现，他的手无论尺寸还是样式同普通人都是一样的。也有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家认为，费兰茨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长得漂亮，仪态潇洒，文雅庄重。但是几十年以后，人们发现，老态龙钟的李斯特虽然已经有些瘸拐，再也没有年轻时那种潇洒仪表，但却比青年时代更加受人欢迎。可见，他成功的诀窍是不能用任何外表来解释的。很多人称赞他的记忆力，说他几乎能把世界文学中的所有重要作品都背诵出来。也有人提到他的适应能力，说他能体会到各种作品的精神，而且总是能反映出它们最可信和最真实的感情。人们把他同许多伟大的同代人作了对比，但是找不到任何适合的

标准。不管把他放在什么样的高度，总觉得还是低了一些。

其实，他的秘密正好是在于他没有任何秘密。他的手比别人敏捷、可靠、有力，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音乐只是来自手和乐器的会合。他不是弹奏音符，而是迫使死板的乐谱人格化。他不在音符下面找到更深一层的思想内容，不找到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如何思考、感觉、痛苦、激动和歌唱，决不罢休。

在哥本哈根演出后，他又返回巴黎。实事求是的贝洛尼主张乘哥本哈根最豪华的汽轮，但是冒险主义的李克诺夫斯基却认为帆船渡海更有诗意。费兰茨当然同意后者的想法。他们把越来越多的行李堆上三帆船"贝尔斯号"，开始了富有罗曼蒂克色彩的旅行。帆船由两艘汽轮拖出港口，因为出发那天港口没有一点风，连用于告别的手帕也飘动不起来。在公海上船帆有点鼓了起来，勉勉强强到达了古克斯海文港。这时风完全停了，任何航海科学也无法再使帆船继续前进。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待，一直等到风神情绪好转，送来一点小风为止。乘客们起初还觉得这一切都挺好玩，但是一、二个小时之后就逐渐感到厌烦。温顺文雅的旅客们开始争论、拌嘴、叫嚷，船长怎么也阻挡不住，最后闹得船上的大副、二副和其他军官全都出动，准备把一些旅客先送上岸，免得他们损害船只和他们自己。贝洛尼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微笑，李克诺夫斯基愤怒地敲击船舱房门，只有费兰茨还保持着内心的平稳，提议到市内去散散步。他说，我们一生中只有这次机会去参观这个港口的名胜古迹。贝洛尼傲慢地走在前面，后面跟着费兰茨，最后压阵的是悔恨交加的李克诺夫斯基。他们走进了一家咖啡馆。费兰茨的第一个问题是这里有没有剧院。回答是酸溜溜的："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有个剧团在这里曾经勉强演了一个星期，因为收入太少，弄得连饭也吃不上，到

了夜晚，他们只好在剧场里睡一会。他们早就想离开这里，但是祸不单行，海上风平浪静，船开不动，因此只得在这里靠典当度日。费兰茨当即发出军令：到剧院去！李克诺夫斯基大为高兴，贝洛尼却十分勉强。他说，风任何时候都可能刮起来，船长不会休息，他们会被扔在这里。可是贝洛尼的话全白说了，李克诺夫斯基已经起身，费兰茨也要走，贝洛尼只好象李波莱洛跟着唐璜一样追赶上去。剧院里冷冷清清，没有一盏灯，也不见一个人。费兰茨打开了正在沉睡中的剧场的大门，用两手圈成一个喇叭，大声喊道："喂，这里有人吗？"

回答的是颤抖的声音（后来才知道，这是剧团经理的声音）："请不要这样高声叫嚷，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离开这里，但是让我们平静地度过今天这个晚上吧！"

"谁说要赶你们走？我们带来的是演出、金钱和其他一切好东西！"

在演员们睡觉的戏台上，一个矮小、有些驼背的人出现在摇晃不定、颜色发黄的光圈中："我是哈特曼，剧团经理。"

"李斯特·费兰茨。"客人作了自我介绍。

一听到这个名字，剧场里立即大为混乱，好象雷电击中了戏台上破旧的布幕。声音和名字传遍了整个正在睡觉的建筑物。"李斯特·费兰茨……李斯特·费兰茨……李斯特来了！上帝保佑我们，李斯特真在这里！"剧团经理几乎哭了出来："哦，上帝呀，我们的救星，我们最后的希望……您想为我们干什么？"

"帆船现在在港口抛锚，动弹不得。人们闲得没事，几乎想相互吞吃掉。我们把他们叫来，为他们举行一次从未见过的、美妙绝伦的联欢演出！"

李克诺夫斯基坐上马车，赶到港口去叫人。一刻钟后，布幕全拉好了。不到半个小时，男女演员都穿上了最后仅存的戏装，

等到船上的乘客进剧院时，乐队——仅李斯特先生一人——已经开始演奏，纤小的女演员们象饿坏了的鸟儿一样在唱歌，满怀着重新获得食物的希望。演出结束，掌声雷动。费兰茨挥手请停止鼓掌，同时宣布："把椅子全部搬开，狂欢舞会现在开始！"舞会音乐由李斯特·费兰茨负责。

天快亮了。这时港口工作人员进入舞会大厅："起风了！快上船，快上船！再不走，风可能又要停，那就走不了啦！"

人们在走出剧院大门时，纷纷往帽子里扔丹麦银币、匈牙利福林、德国银币，随时都可以听到这些硬币可爱的相碰声。

最后离开的是李斯特。他向帽中投进了一枚法国路易金币。

贝洛尼紧咬着嘴唇："慢慢地我也将学会一条法律：才华赋予责任。"

他们终于胜利地进入巴黎。乔治·桑专门撰写社论欢迎他，说李斯特在欧洲各个战场上取胜后，终于来征服巴黎了。

当天，李斯特先去访问柏辽兹。他脑中正在酝酿一项他单独一人很难实现的计划：在巴黎为建造波恩的贝多芬塑像募集资金。柏辽兹不用怎么说服，情绪马上热烈起来，说他已经听到了贝多芬乐曲的声音。柏辽兹主张先演贝多芬的《节日序曲》，然后共同演奏《E大调钢琴协奏曲》、《克罗采奏鸣曲》，最后以《第六交响曲》作为结束。

柏辽兹演奏得非常好。费兰茨弹奏"慢板"时，使人们感动得流了泪，但接着他的"终曲"又使人们振奋起来。演出成功了！在最后一场暴风雨的掌声过去后，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喊道："演奏《魔鬼罗伯幻想曲》！"这句话就象把点着的引信扔进了炸药桶一样，立即引起了剧烈的爆炸："我们要听《魔鬼罗伯幻想曲》！"费兰茨脸色苍白地站在幕后，命令贝洛尼派一个人到幕

前宣告：我再也不弹了！这位意大利人急得几乎要哭出来，来回搓着双手："您为什么要向群众的炽热情绪泼冷水？如果您演奏了这个曲子又会发生什么问题？"贝洛尼看到费兰茨眯着双眼，眼神极为冷淡，不由大吃一惊："大师，我不愿意出坏主意，我只是认为，我们必须赢得巴黎战役的胜利，因为您在这里不仅有朋友，而且有不少敌人。"

费兰茨平静地、不带任何情绪地说："今天的音乐晚会是为贝多芬举行的，不应该表现梅耶贝尔，正如不应该表现李斯特一样。"柏辽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布幕外面的欢呼几乎已经变成骚乱。剧院经理脸色紧张地走进演员化装室："我请求您为了剧院和您自己出去演奏一场，不要使群众不高兴！"

费兰茨没有办法，只好咬着牙重新登场，演奏《魔鬼罗伯幻想曲》。

第二天，柏辽兹作为记者写文章支持李斯特："有些人只豢养狡兔，但是却把他们的笔刺进象李斯特·费兰茨这样的猛狮的心。"

有些人在用毒箭射李斯特。奥斯卡尔·卡曼滕特在一家周刊上居然写道："有一位钢琴艺术家不仅是演员，也是一个好经理人员。他答应给一个女人二十五个法郎，要她在音乐会上假装因过分激动、感动而从椅子上晕倒在地。上面所说的那位杰出艺术家还规定一种把戏：他快速、激动地弹完后，听众席中要有人晕倒，于是他马上跳下演奏台，用浸过香水的手帕把这位昏过去的女人弄醒，这样就可以取得巨大成功，因为伟大的音乐魔术师还是一个救命恩人。"

"有一次，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演奏韦伯的《合奏曲》。但是那位被收买的女人没有完成任务，她没有晕过去，而是睡着了。尽管艺术家的节奏是那么强烈，但是没有任何人昏过去。钢琴家

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晕过去。听众立即把他围起来，极力唤醒他，看护他，哄他。由于喧哗，那个女人被吵醒了。她一看到这种情景马上又昏了过去，但这次不是假装而是真昏过去了。”

过了几天，又出来一个新的对手。不过他比卡曼滕特危险得多，因为他是亨利·海涅。谁也不明白，象他这样善良的诗人为什么也会这样做。费兰茨认为，即使是对他进行最严厉批评的人也多少是有些善意的。特别是海涅，他觉得更应该是这样。尽管他不喜欢海涅的讽刺文章，但是他热爱作为诗人的海涅。遗憾的是，海涅这次批评不是善意的，而是有意伤人：

“哦！有多少花朵掉在李斯特先生的脚下！他以坚定不移的自信和强大征服者的傲慢‘容忍’花雨落在他身上。这种情景是令人难忘的……最后他带着慈祥的微笑弯下腰去，选了一朵红色茶花插在燕尾服的小口袋上。这种情景是令人难忘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刚从非洲前线归来的青年士兵面前。在非洲，洒在他们头上的不是花朵，而是铅弹；他们也插上红色茶花，但这是用自己鲜血染红的茶花，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赞扬。我在观察人们如何欢呼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些曾经见过拿破仑——他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确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巴黎人现在这样为李斯特·费兰茨先生捧场，真叫人奇怪。这种疯狂的欢呼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接着，海涅以同一个医生对话的形式，向费兰茨射出了一支更毒的箭：

“有时候我想这样来解释李斯特的巫术：世界上任何人也不能象李斯特·费兰茨那样组织成功的演出。在这方面，就同说谎大师菲兰德弗亚、博斯科、霍提尼和迈耶贝尔一样，他也是天才。最高贵的人们自愿地和免费地为他服务，那些被收买的捧客则按照特别的纪律执行他的指示。”

辛德勒也反对李斯特。一般人都随着岁月流逝而发胖，软化，年轻时调皮捣蛋，现在则多了一层肉可以进行掩盖。不过辛德勒恰恰相反，他比过去更加精瘦，更加严格，更加黝黑。贝多芬去世已经快十五年。辛德勒现在自以为是个先知，只有他才知道贝多芬想过什么，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创作某一作品等等。他也出来批评费兰茨，说贝多芬的节奏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强音，说贝多芬还如何如何。人们起先对他的批评感到好笑，但是后来终于还是不得不想到，辛德勒毕竟在贝多芬身旁生活过，是亲近贝多芬的人，他多少总知道一些贝多芬音乐的规律。

贝洛尼大为激怒。但是费兰茨把他的话只当作耳边风：

“请通知波恩人，我的任务已接近尾声。汇去的二万五千福林已足够建造贝多芬塑像。”

贝洛尼一边顺从地坐在写字台旁按照李斯特所说的精神拟稿，一面嘴上嘟嘟囔囔：“如果辛德勒先生也向波恩人提供这么多钱，那时他爱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

费兰茨走到这位虔诚的意大利青年背后，用手按按他的肩：“别生他的气。过去他也做了不少工作。”

令人痛苦的事情越积越多。费兰茨去拜访了肖邦，但受到冷遇。一家报纸攻击道：“李斯特去求骑士勋章，但是遭到了最坚决的拒绝。”

究竟是谁毒化了他周围的空气？因为人们——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知道，费兰茨不但不会请求勋章，即使别人给他，他也不会从一个镇压里昂饥民的国王和政府手里接受勋章。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玛丽又闹起来了。她未能同家里人达成协议，只好又搬回李斯特母亲那里去住。两个女人之间无声无息的争斗又从头开始。不过她们两人的策略截然不同：安娜想尽

一切办法软化玛丽的心，因为看来已经无法征服她；玛丽则想方设法使人们知道，她不需要安娜的慈爱、照顾、亲热和关心……不，不，决不！

坏事情逐渐积累起来。他已经不象前几年那样热爱巴黎了。朋友们都在走自己的路，甚至象柏辽兹、马萨尔、小克鲁采尔、乌尔汉这样的朋友也离开了他。昔日那种幸福的散步、粗野的争论、兄弟般的拥抱、在野外露营和胜利的欢乐全部结束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巴黎。费兰茨感到，他年过三十，同青年时代已经永别，巴黎也同他一样变老了。巴黎本来是温顺、热情的朋友，现在却变成了爱讥讽挖苦、枯燥无味的人，他赶走了自己忠实的儿子李斯特·费兰茨。这个巴黎已经不是他的家。虽然有听众的热情欢呼，美术家们为他雕塑、绘画，成百封来信自献爱情、提供高价演出合同、吟诗歌颂、要求签名和表示崇敬，但是费兰茨仍然觉得，原来的巴黎正在消失，宝贵的窝巢已被神秘的风刮坏，现在很难或者根本不能保卫他了。

玛丽想出一个主意：在莱茵河的某一个小岛上消度夏天。这位冷冰冰的女伯爵一谈起莱茵河、德国的土地和她的童年，就象点着了火似的，话越来越多，而且都是诗的语言。这个岛叫诺南维尔斯。贝洛尼休假去了，只有脸带刀痕的李克诺夫斯基公爵还忠实地跟随在费兰茨身旁。他有时教三个孩子玩一些野蛮的战斗游戏，有时直率而厚颜地向玛丽献殷勤。有意思的是，公爵这些举动使玛丽十分快乐，以致有一天晚上，当两支雪茄又在黑暗中发亮的时候，玛丽带着感情说："公爵是真正的贵族。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还能发现我的美貌……"

李克诺夫斯基写情诗给玛丽……费兰茨带着宽恕的微笑朗诵他的诗，并且把它们谱写成曲子。

在费兰茨和玛丽之间，爱情再也不象过去那样炽热发光，但

是有时仍能爆发出一点火花。在这种时候，玛丽表现得很亲切，自愿充当费兰茨的工作助手。在美丽宁静的夏夜，她为费兰茨朗诵德国诗人的作品。不仅读歌德和席勒的杰作，还读乌兰德、雷瑙、阿诺德、彼得·科尼利斯、霍夫曼、海尔威格等人的优秀诗歌。读完后，她把书合上说：

“当然，后面还有海涅的诗……但是考虑到他曾给您造成很大的烦恼，我不愿意因为他的诗而影响您在夏天的休息……”

费兰茨对她的话感到无法理解：

“您真以为我会生诗人海涅的气吗？我虽然不大懂德国文学，但是对海涅的诗我倒还真敢参加考试。他的诗我几乎全能背下来。”说着，他就背诵了一首：

你把毒药倒进了每一首歌，
我还怎能从你那里得到快乐？
毒液流入了我的心脏，
我的一生任凭你去宰割。
你把毒药倒进了每一首歌……

在费兰茨的身上，有两种思想在同莱茵河的魅力搏斗。一是在巴黎度过的青年时代，一是终于找到的归宿、佩斯一布达。但是要抗拒德国小岛的诱惑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些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农村姑娘象对国王一样尊敬他。每天都有人给他送点礼物。这一家送来刚刚搅拌好的新鲜黄油，另一家送来一丛鲜花。这一位给玛丽带来一只鸡，那一位靠着费兰茨工作室的窗台说：“我有一首很优美的歌，如果您不反对，我非常愿意念给您听。”

这座小岛是富有魅力的。北面有一座已经坍塌的寺院，剩

下的只是小教堂。当地人都根据这座破教堂的铃声起床和安息。费兰茨喜欢这里的河流。河上来往频繁的船只象征着德国式的勤劳和热爱劳动的精神。费兰茨也喜欢宁静的夜晚。沿岸各村的钟声都能清晰地传到小岛上来。

费兰茨改变了他的音乐体裁，写出了一首接一首的歌曲：《莱茵河畔》、《莱茵女神罗累兰》、《从前有个图勒国王》、《你来自天上》、《你好象一朵鲜花》。

费兰茨创作这些歌曲的灵感既来自海涅、歌德、乌兰德、雨果，也来自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比豪利·亚诺斯和老家多波尔扬的一些面孔已经模糊不清的吉卜赛人。就在这里，他的一部伟大作品逐渐成熟、发展，直到几年后最后形成。这就是根据雷瑙的诗谱写的《吉卜赛三重奏》。

插　　曲

他改变了音乐体裁。真是这样吗？他真地从诗神的阿拉伯马上下来了吗？他真地离开了飘荡在想象之海上的战舰吗？没有，绝对没有。尽管他在认真研究舒柏特从俾德麦尔家庭音乐中发展出来的歌曲，深入了解门德尔松和舒曼诗歌的结合，但是他仍然独具一格。他改写的乐曲为音乐戏剧画出了光彩夺目的布景。他的钢琴千变万化，能作任何表演：它能为谈情说爱的人放射出月亮的光辉，给荒芜凄凉的土地铺盖上艳丽的云彩；它能弹出竖琴一样迷人的声音，也可以带来吓人的闪电劈雷；它能象陀螺那样飞速旋转，也会象战鼓一样惊天动地……因为他的钢琴能弹奏出一个歌唱家或整个乐队、一把小提琴或整个巨型交响乐团所能表现的一切音乐。他把舒柏特、舒曼、门德尔松创始的东西推到顶峰。

不，他不会不忠于他原来的音乐体裁和乐器。我们必须强调，乐器产生声音，声音产生语言，语言产生祖国语言。他不会不忠于钢琴的祖国语言。他总是把他最关心的一切翻译成这种祖国语言。他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

他极为推崇贝多芬的交响乐。起初，那是因为感激"贝多芬曾经吻过他的额头"，后来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年深入研究了贝多芬的作品，最后则是由于他以科学家认真细致的态度分析了贝多芬的思想、风格和手法。他能够背诵出贝多芬的所有乐曲，了解贝多芬所有乐曲的地位，知道贝多芬乐谱的一切秘密和这些秘密的一切美妙之处。他把贝多芬的交响乐都译成钢琴的语言，因为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贝多芬的财富。费兰茨喜爱德国的大教堂和巴赫的风琴演奏，因为巴赫把成吨重的大块石头、精细小巧的花纹石雕和结实有力的顶梁大柱化成了音乐。但是费兰茨还是把他的六部管风琴前奏曲和《g小调幻想曲》改写成钢琴曲，因为只有用十只手指抓住它们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掌握巴赫的思想。他热爱柏辽兹。起先只是因为年轻人的江湖义气和粗鲁的战斗友谊，后来才越来越深刻地了解这个热情的灵魂，但这也都是在把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改写成钢琴独奏曲之后。对门德尔松也是如此，费兰茨把他的《仲夏夜之梦》也谱成了黑白琴键曲。费兰茨欣赏帕格尼尼演奏小提琴的精湛技术。它既保守，又新颖，既有古老的意大利魔术师的魅力，又有但丁下地狱取回永恒的精神财富的胆量。他把帕格尼尼的作品也翻译过来，有时译文比原文还要丰富多采。

思乡之情驱使费兰茨转向编写歌剧。从拜伦到雨果，从沙达那帕鲁斯的古老悲剧到匈牙利草莽英雄的浪漫史，都是他创作的源泉。他热心研究歌剧作家奥柏、贝利尼、唐尼采蒂、罗西尼、梅耶贝尔、阿列维、帕西尼、莫扎特、韦伯、墨卡登和格林

卡……，探索音乐剧、音乐舞台气氛、运用乐曲塑造人物和优美动人的歌声的秘密。但首先他还是要把所有伟大歌剧作家的作品“翻译”成钢琴的语言，只有这样他才能尽情地品尝梅耶贝尔、罗西尼、墨卡登、阿列维等人作品的芳香。以后他把艾克尔、威尔地、瓦格纳和柴可夫斯基的歌剧也改写成钢琴曲。

有时候，他还把书中学到的智慧、哀怨、幻想和真理谱成钢琴的语言。《奥伯曼山谷》、《但丁奏鸣曲》等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他把自己看到过的秀美如画的风景，例如瑞士的群山、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游船、日内瓦的大钟、瓦隆斯达德湖的渔人，也都描绘在钢琴的琴键上。

他把自己同拉斐尔、米歇兰柯、萨尔瓦多·罗莎和奥尔卡纳相处的美好回忆，也按照黑白琴键的语法、词汇和套语进行了编排。

他还用自己的乐器研究一些重大的秘密：上帝、宗教、人……写出了《宗教诗乐集》。后来他创作了《安魂曲》，这里再也没有童年时代的宗教幻想，而只有一条信念：在仇恨与愤懑的世界里，博爱也可以是推动世界的力量。

费兰茨同玛丽和三个孩子一起在诺南维尔斯度过了三个夏天。粗暴无理的侮辱和毫无理由的责难，朋友们的背离和敌对，逐渐把他磨炼成为一个坚毅刚强的男子汉。他学会了欧洲各大城市和这些大城市的精神世界中一切可以学到的东西，只有一条他没有学会：仇恨。另外，他始终也未理解，尽管他两只手散发钱财，对别人讲人道和博爱，但别人却只是耸耸肩，说他太浪费……

在这里度过的夏天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李克诺夫斯基的了解。过去，费兰茨只知道他是一个到处惹是生非的角斗英雄、疯

狂的政治冒险家和喜欢女人的好色之徒。他虽然家财万贯、有房有地，但又是一个负债累累的骑士，一直在欧洲各大城市的负债人监狱之间踩走钢丝。亲密无间的德国之夏使他也开始吐出心里话。他之所以愿意同李斯特·费兰茨结成生死之交，是因为他心底里埋藏着同费兰茨一样的理想。两人在莱茵河畔单独散步时，李克诺夫斯基交了心：他也是共济会会员。多年来，他一直在注意观察费兰茨的生活。现在他认为，这位艺术家朋友已经成熟，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了。费兰茨一向讨厌一切妨碍人自由行动的纪律。不管是谁给他戴上镣铐，他都反对。是教会还是圣西门，是拉曼内斯还是共济会，镣铐终归是刑具。但看来李克诺夫斯基最后还是消除了费兰茨的疑虑。

一八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李克诺夫斯基公爵和维尔曼·斯皮埃尔教授（法兰克福学院教师）带领费兰茨走进了法兰克福共济会的聚会地。费兰茨激动地感觉到，歌剧《魔笛》的情节正在他周围重现：他被蒙上双眼，被人牵着穿过一个又一个走廊、楼道和房间，走进一间地下室——那里可以清晰地听到莱茵河的流水声。然后又由陪同人拿着火把带他到一个半明半暗的小屋里。它不象牢房，而是象小祈祷室。在这里，一个面带黑纱的男人对他谈了一通生活的虚荣问题。然后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很象《魔笛》中的教堂——站了好长时间。有人突然扯掉了蒙在他眼睛上的黑布。在他面前摆着的是近百把锋利的军刀，看样子是用来威胁他，同时也是在考验他的胆量。最后，乔治·克洛什博士（共济会首领、著名的律师和人道主义科学家）从宝座上站起来，对来者简单表示了欢迎。他谈到什么相互拉着的手共同锤炼的铁链，说仇恨、妒忌、残忍、非人道和贪婪想扯断这条铁链，但它是扯不断的，因为象李斯特·费兰茨这样的人的手正在加固它。

费兰茨感觉到，在现代的世界中，这样一幕一幕的表演只能

是游戏，是一种经过仔细准备、表演得很好而且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游戏。不过加入共济会对他的一生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使他脱离了教会，大大超过了安凡丁和拉曼内斯对他的影响。

夏天的宁静终于被外来因素所破坏。科恩市民派来的代表团求见费兰茨。他们设立了李斯特委员会，制订了争取慷慨的李斯特捐款的作战计划，要求他为半途而废的科恩大教堂建筑工程举行义演。代表团有二十个成员。团长是科恩寺院的主持，站在中间。右边是科恩市长，左边是建筑师。在外面还有由四十个人组成的合唱队。当一个演讲人讲话的时候，合唱队就开始唱一段。最后弄得讲话声和唱歌声交混在一起，谁也听不清谁，于是德国式的严密组织工作只好宣告破产。整个小岛的居民都赶来看热闹。现在已经成了三重奏或者四重奏：演讲声、合唱声、围观声和狗叫声。不用说，费兰茨很快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过了几天，科恩人来接他。不过只是简单地说“来接他”远远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他们派来了一艘大轮船，几乎把小岛的小码头挤破。船上有三百五十人的合唱团、八十人的吹管乐队。就象军队登陆一样，他们整整齐齐地上了岸，分列两厢，四百三十个人中有的唱，有的吹，对李斯特·费兰茨表示敬意。这真是一场混乱的小夜曲演奏会。莱茵河山谷响起了回声，四百三十人的合唱乐队成了一支气势雄壮的军队，因为不仅是他们，而且整个河谷也在唱歌、奏乐。在仪式完毕后，四百三十人共进早餐。人们用虔诚的双手把李斯特的钢琴抬到山坡上的小教堂门口，并请李斯特为朋友和崇拜者们举行露天演奏会。因为来宾都是德国人，而按照德国习惯，没有一点军人仪式，那是不能成为完整的节日活动的。不过，可以放心，这一点也早有安排。科恩的卫戍部队专门派来炮兵在莱茵河对岸向艺术大师鸣炮致敬。炮火的

硝烟笼罩了整个小岛。合唱团和乐队还布置了值班人员，别人吃饭时，由他们唱歌、奏乐。

诺南维尔斯小岛的宁静被打破了。费兰茨在科恩为建造教堂进行的义演活动使科布伦茨人和法兰克福人都眼红起来。于是这里要求捐献一座孤儿院，那里要求建立莫扎特基金。幸运的是，贝洛尼休假回来了，他立即以意大利式的急躁态度把那些贪得无厌的乞讨者驱散。现在要由他来安排李斯特的活动日程了。李斯特得先去卡塞尔演出，然后再到魏玛①。一八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接连举行了三场音乐会。三十日抵达耶拿，然后继续赶路。如果能在耶拿多呆几天那该多好。这里没有人向他乞讨，没有人要他“表演”，这里的群众只要听音乐、音乐、音乐……但是他不得不赶路，因为德累斯顿在等待着他。下面还有莱比锡。在这个古老而可怕的战场上，不仅拿破仑流过血，他也流过血。他第一次了解到克拉拉在反对他。在莱比锡的音乐会上，费兰茨演奏了几首协奏曲。克拉拉的评语是：“这些演奏的水平低得可怕。”费兰茨知道，不管怎样，必须坚持斗争，因为在莱比锡不能再打败仗了。他演奏了贝多芬《D大调钢琴奏鸣曲》和《唐璜幻想曲》。这场音乐会使得那些最凶猛的对手也不敢再说什么了。有个别人表示，门德尔松对这些曲子可能比李斯特理解得更深刻，但是群众不理睬这种吹毛求疵的美学探讨和假仁假义的传统观念。李斯特的住宿地几乎成了一座堡垒。但是警察、音乐会组织人员和请来帮忙的学生都无法维持住秩序。贝洛尼伤心地通知音乐会举办人，李斯特再也没有时间在这里演出了，因为他要赶往柏林。他们在柏林住在俄罗斯饭店，仍然是费兰茨、李克诺夫斯基和永远不知疲倦的贝

---

① 魏玛(Weima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城市。曾在此建立魏玛公国，十八世纪后半叶起成为欧洲著名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

洛尼三个人。这三个人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结算关系：李克诺夫斯基用支票付账，贝洛尼从他提成份额中扣除，最后实际上全部由费兰茨包下来。有一天早晨，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个子来找他们。尽管他穿得破破烂烂，但是自尊心却特别强。他站在餐桌前，同费兰茨相互打量了一番，可能他是想让对方不经过自我介绍就认出自己。后来他终于用又高又脆的男高音说："潘特莱奥尼，先生们可能已经听说过我这个名字。"费兰茨本来想冷冷地说一句："我从未听说过。"但这只是一种残酷的意图。他真正说出来的话是："当然，潘特莱奥尼先生。"

小个子毫不客气地坐到他们的餐桌旁，一面翻看菜单，一面要菜，并且不时向招待员发出指示：有的菜要热一些，有的菜要凉一些，有的要放香料，有的多放点糖。在这同时，他还不断地对同桌人讲话，说他潘特莱奥尼是当代最后一个伟大的头腔发音歌唱家，他走遍了全世界，从圣彼得堡到罗马，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得到成袋成袋的黄金，但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是走黑运，什么事也办不好。举行演唱会吧，可是头天晚上倒了嗓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歌剧院负责人，但是他肯定在签订合同前就去世了。歌剧院的门票早就全部售完，可是剧院正好在开演前烧掉了。如果邻近城市的音乐爱好者邀请他去演出，那么不是大雪封住了道路，就是两个城市之间的桥断了。讲完这一切后，他坦白地承认，他现在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安身之处也还没有着落，衣服被女房东扣押，肚子饿得慌。费兰茨听完他的故事后哈哈大笑，代他付了饭钱，把两枚金币塞到他口袋里，然后挽着他的胳臂，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

"潘特莱奥尼先生，我很喜欢开玩笑，但有一件事是不能开玩笑的，那就是艺术。先生，在这里必须考试一下。您唱歌，我伴奏，最后由贝洛尼先生来确定，您究竟是艺术家还是乞丐。"说到

这里，费兰茨的态度严肃起来。

潘特莱奥尼的小瘦脸开始发青。一系列倒霉的事和刚才的大吃大喝使他没有丝毫唱歌的情绪，但是又不能不唱。他身靠着钢琴，请李斯特伴奏。他开始唱《波斯王塞克西斯》中的动人歌曲。看来，他没有学过很多东西，公路可能就是他的音乐学院，教他唱歌的人也许就是那些同他一起品尝西班牙、意大利、莱茵河、莫塞利葡萄酒和歌曲旋律的酒肉朋友。他的歌声象鸟叫一样单调，未受过训练，没有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但他总算是艺术家，这使贝洛尼兴奋起来：

"先生，请告诉我，我们能为您做什么？"

这位自称世界闻名的头腔发音歌唱家、刚才还叫肚子饿的小个子挺了挺胸："您想到哪里去了，贝洛尼先生？您以为我是盲目来找你们的吗？我的设想是……"在场的人都觉得小个子由于某种魔力变得越来越高大了，"我的设想是同钢琴大师同台演出！"

费兰茨倒在钢琴上大笑了一场：

"贝洛尼，别再说了……他这种不知羞耻的作风已够得上艺术等级了。我们可以共同举行音乐会，你这个坏蛋、懒汉。我愿意这样做，因为你是有才能的。"

在柏林，他们的队伍又进一步扩大。一个可爱的年轻人在长期沉默之后来到了这里，他就是戴莱基·山道尔伯爵。他长得比过去更成熟了。肩更宽，胸更厚，脸孔晒得黑黝黝的，不过他那一双愉快的、闪闪发亮的学生眼睛没有任何变化。

现在他们是五个人了。不过费兰茨就是有十个或者一百个助手也不足以安排无数的演出、晚会、宴会、欢迎游行、舞会、博士或名誉博士授衔会、招待会以及没完没了的义演、捐献活动。

这些事情就象浪潮一样向他袭来，他作为游泳者，几乎被淹没。起先还觉得这些浪头挺好玩，但是后来由于感到窒息而不得不同浪潮进行搏斗。饭店的大厅里摆下了供三百人食用的餐桌。爱克洪文化部长亲自通知李斯特，他已被选为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王家剧院总检察官雷德恩伯爵致贺词后，由大学教授第特里西博士和科学院院士费斯特尔博士代表“同事们”讲话。接着是爱采尔博士讲话。他作为一个共济会会员——当时共济会在德国还是合法的——向李斯特表示祝贺。但是庆典并未结束。画家瓦奇、建筑师斯泰尔和举世闻名的雕塑家拉乌克也来探望费兰茨。先是致贺词，然后由拉乌克向李斯特赠送塑像。上面的题词是：为纪念幸福的兴奋时刻，赠予天才、灵魂和感情的艺术家、正派清白的男子汉李斯特·费兰茨。柏林艺术家们和业余爱好者们于一八四二年二月十八日。

不久，李斯特被艺术科学院选为名誉院士。这里的热烈掌声刚完，马上又被马车送到毕尔夫人的沙龙。毕尔夫人虽然是梅耶贝尔的母亲，但她的朋友们主要是慕她本人的道德、学问和非凡的诱惑力而来。在毕尔夫人家里等着李斯特的有作家科尔尼鲁斯、诗人瓦尔哈根·冯·爱斯、科学家洪堡、歌德和贝多芬的女友贝蒂娜·冯·阿尔宁和艳丽无比、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卡罗蒂·冯·哈根。过了一会，萨巴蒂夫人，即很久没有见过面的乌格·卡罗尼娜也到了。费兰茨虽然已经疲劳不堪，但是在这么多热情女人的眼光下，又变得精神抖擞，作了出色的表演。

真是奇光异彩的晚会。香槟酒一瓶接着一瓶地被打开。费兰茨发射了使人眼花缭乱的全部火箭：《半音阶加洛普舞曲》、《魔鬼罗伯幻想曲》、《那不勒斯土风舞》、《尼奥伯幻想曲》和一系列的改写歌曲。在这个令人昏眩而极为美妙的晚上，费兰茨唯一对之感兴趣的是卡罗蒂的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她坐在那

里端庄稳重，象女王那样高贵，肩胸丰满光滑，头颈犹如贵重花枝，身材窈窕。费兰茨想在这个活的爱神身上创作一部爱情之歌。第二天、第三天，他俩都在一起。每次都是卡罗蒂主动去找他。不到一个星期，费兰茨就到卡罗蒂家去吃饭了。这种爱情来势凶猛，横行无阻，压倒一切，雨骤风狂，任何人也无法抗拒。在深夜暗淡朦胧的光线下，在黎明令人清醒的平静中，卡罗蒂对费兰茨窃窃细语："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今后也不会再象这样爱一个人……"

音乐会还是一场接着一场。先是在音乐学院、俱乐部、大学剧院、王家剧院，后来因为听众越来越多，只好在歌剧院举行音乐会。国王、王后、王室成员、政府部长们都来了。

费兰茨在仔细观察自己。他对国王的赞扬感到特别高兴。他向往上层，近二十五年几乎全是在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间度过的，但同时他心里又隐藏着一种奇怪的清高情绪。普鲁士国王决定授予他十字勋章，派人把它送到音乐演奏台的布幕后。费兰茨愤怒地把勋章连同衬有红色丝绒的盒子摔到地上。幸运的是，在他身旁是形影不离的卡罗蒂。她头脑比较清醒，弯下身捡起十字勋章，然后以一种无法模仿的姿式向转交勋章的雷德恩伯爵鞠了一躬："我们亲爱的艺术家受宠若惊，以致把勋章掉到地上。"

是的，费兰茨身上确实有一种市民的清高思想。他想刺一刺雷德恩伯爵，因为伯爵虽然很讲礼貌，但严格按照容克贵族的法律对待费兰茨；他还想刺一刺国王，因为国王把他看成是一只会跳舞的蝴蝶，会唱歌的夜莺或者会拉布幕的滑稽演员，并且按惯例授予他勋章。几天后，雷德恩伯爵亲自来拜会费兰茨。一见面就热情握手，对他表示友谊和热爱，以消除授勋时的紧张气氛。国王陛下请他转告费兰茨：国王希望在波茨坦别墅白色大

理石厅再次见到艺术家。为了平衡一下胸挂勋章、身佩宝剑、有武士风度、按指挥行事的军官们的欢迎仪式，国王还邀请了王家剧院全体成员，并为他们单独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出席音乐会的不仅有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女演员、男高音演员、乐队指挥和话剧演员，而且还有一大批可怜的小人物：拉幕人员、合唱队员、大提琴手、单簧管手、提台词人员、女化装师、大管演员和小提琴手等等。只有这样的八百个听众才能抵销站在波茨坦别墅前的仪仗队、象雕像那样死板不动的仆役和生锈的宫廷礼节在他心中所引起的不舒服感觉。

费兰茨是个不知道疲倦的人。在爱情、庆贺和磨炼神经的表演（他在二十六场音乐会上共演奏了一百首不同的曲子，另外还得全凭记忆临时加演好多节目）中，他既是钢琴演奏家，又是音乐指挥家。他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并且改革了乐队演奏的程序。他让那些躲在乐池的乐队演员上演奏台，把他们排成半圆形，好象菲德利·利昂诺娜解放奴隶一样，使他们尝到了自由和光明的甜头。他手下的乐师从现在开始已不再是从前那种可怜的吹鼓手，而是艺术演员了。他们是被费兰茨的指挥棒唤出下层世界的。

音乐专家们的一致意见认为，李斯特比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都要高出一头。瓦尔哈根说："他的表演独具一格，清新优美。他获得了最热烈的魔术般的成功。自从帕格尼尼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景。"

但是，不管群众是多么钦佩、喜爱他，总也有人粗暴无理地攻击他。《黄昏报》主编写道："他变成了一些人的偶像，有些人为他举行火炬游行，演唱小夜曲，女人跪在他的面前，吻他的手，有几个疯子还在自己的衣服和手套上绣他的头像。人们简直是失去了自己的清醒理智！"

《社会报》编辑也支持这种意见："柏林实际上处于一场灾难之中。这场灾难的主角是一个弹钢琴的人。这是一种从低级的玩笑变成悲剧的令人难受的转折点。"

崇敬和仇恨都是无边的。又来了一些新的庆祝委员会，但是愤怒的攻击也重新开始了。身材粗短结实的匈牙利人戴莱基·山道尔为了自己的朋友李斯特·费兰茨要同别人进行决斗。因为有人在街上当着他的面侮辱艺术家。戴莱基伯爵在大街上向一个口出狂言的德国人当面挑战。几个小时后，那个人被包在被单里抬走了。

费兰茨离开柏林的时候，受到极为隆重的欢送。大学的校长、教授们坐在敞篷马车上为他送行(费兰茨曾为大学免费举行了好几场音乐会)。跟在大学车队后面的又是五十多辆马车，上面坐着柏林社会的精神贵族和世袭贵族。整个车队穿过全城，开到王宫面前，以便国王陛下也能亲眼看到艺术家的凯旋队伍。队伍中还有德国人组织活动时必不可少的内容：合唱团、军乐队、大学生仪仗队在总指挥命令下正步走等等。

费兰茨穿着旅行便服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见。他又为大家举行了一场免费音乐会作为临别纪念。接着又是香槟酒、欢送词、答词、诗歌朗诵，但是香槟酒的酸甜味也未能使人们忘记离别之愁。

报纸还在继续攻击他，他们甚至把卡罗蒂也扯了进来。

费兰茨仍然坚持自己生活的基本原则：要宽恕所有的人。贝洛尼自告奋勇地站出来为他说话，自己写文章，自己署名，对报刊的攻击进行了坚决反击。在这以后，攻击才平息下来，报刊变得鸦雀无声。

终于离开柏林了。费兰茨象一个善良的国王一样检阅他的队伍，他们现在已经有六个人：费兰茨、李克诺夫斯基、贝洛尼、潘特莱奥尼、戴莱基……还有一位突然加入他们行列的肖伯侯爵。马车静静地摇晃着……费兰茨坐在后排打瞌睡，过了一会，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了卡罗蒂的离别情书：

“诗人，告诉我什么是爱情？
——是欲望，是你灵魂的感应。
诗人，告诉我什么是亲吻？
——是幸福，是你感情的反映。”

在路上，潘特莱奥尼第一个掉队。接着肖伯也离去。等他们到达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时，只剩下了四个人。

音乐会，音乐会，还是音乐会。费兰茨又举行了一系列义演音乐会，为学生们作了专场演出，为学校教员作了内部表演。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九日，卡尔·罗森克兰茨教授代表康德的大学授予费兰茨名誉博士证书：“我荣幸地代表阿尔贝图大学授予您名誉博士证书。您和不朽的约瑟夫·海顿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刻取得了音乐博士的学位。我们认为，这种荣誉对您来说也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德国和英国的大学很少授予这种学位。但是我们感到，这种荣誉所必需的一切思想和优点，全统一在您的天才之中。技术的奇迹在您的手中只是用来表现最高贵思想的工具。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真正的艺术大师。您用新的艺术成就，进入了代表着时代的自由思想的集体。李斯特博士，请接受我们的感谢，因为您的成就使人类更加富有了。请接受我们对您的崇敬和爱戴……”

费兰茨的心在轻轻地、静静地跳动。他配得上这些称号吗？他有权利不仅代表自己，而且还代表匈牙利艺术界对授予这种荣誉表示感谢吗？

他感情激动地回答说：

“美是正义的反映，艺术是思想光辉的反映。今后我将继续遵循这条道路前进。”

马车的巨大轮子在石子铺成的公路上不断滚动……音乐会的琴声悠扬：《半音阶加洛普舞曲》、《清教徒进行曲》、《尼奥伯幻想曲》。接着又是车轮的音乐，城市、乡村、公路客栈、寺院、圆顶教堂和小城市穿流而过。各地的社会名流用花朵、演讲、军乐甚至礼炮来欢迎艺术家，就好象欢迎一个国王一样。最后他们到了仙境般的城市圣彼得堡……住在米哈伊广场的大饭店。现在又只剩下费兰茨、贝洛尼和李克诺夫斯基三个人。他们的箱子、行李还未来得及打开，音乐会举办商、记者、艺术家以及所有同音乐会多少有点关系的人就已经把他们围了起来。费兰茨对音乐会有点担心。他曾经在艾姆斯有机会见过沙皇太后，领略过罗曼诺夫家族的骄横态度和自封为神的傲慢姿式。如果说哈布斯堡家族在姿式方面学的是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茨画笔下的人物，那么可以肯定地说罗曼诺夫家族借鉴的是同石头一样僵硬的拜占廷式的圣画像。这次会见最后虽然以艺术家和艺术取得胜利而告终，但在费兰茨的记忆中还是留下了令人寒心的、最好还是把它忘掉的坏印象。现在，这些在费兰茨周围转来转去的先生们很快就告诉他，沙皇不会出席在国家剧院举行的音乐会，因为沙皇对艺术家的印象不好。沙皇是否会允许他的家属来也还不能肯定。不过贝洛尼非常高兴地报告说，已经售出门票三千张，这是音乐会史上少有的。

日历上写着一八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按照日历现在应该是

春天。但是圣彼得堡的上空还刮着寒冷凛冽的冬风，涅瓦河也冻得直哆嗦。只要晚上一降温，涅瓦河两岸就会结冰。应该说，对费兰茨的接待也是比较冷的。在国家剧院里，明亮的煤气灯把金银首饰、高贵礼服、勋章绶带照得闪闪发亮。到处是珠光宝气，犹如发现了《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宝藏。剧场内鸦雀无声。三千人那样肃静，比三千人喧嚷还要显得可怕。贝洛尼在最后一分钟发现了秘密。原来第一排全部空着。沙皇皇后还是准备来听音乐会。但是根据宫廷礼仪的规定，她必须迟到。这并不是不遵守时间，而是礼仪上的严格要求：应该是艺术家等待皇后，而不是皇后等着听艺术家的演奏；皇后还没有到之前不许鼓掌。过了很久，音乐会举办人急喘喘地跑进来宣布：皇后的仪仗和马车到了！三千人一下子全站起来热烈鼓掌，似乎山洪骤然爆发，空中雷电交加。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是为罗曼诺夫家族鼓掌，还是为那位站在演奏台上的身材修长而肌肉发达的男人鼓掌。费兰茨坚毅有力的脸完全沉浸在灯光、掌声和人们热烈的眼神之中。

彻底胜利了！三天之后，又是一场音乐会，重复了上次的节目。听众还是三千人和沙皇全家——沙皇本人除外。

费兰茨匆匆忙忙去莫斯科演奏了一次，然后又返回圣彼得堡。在这期间，真正的春天到了。俄国王公贵族们的克制态度也有些放松了：他们尽管忠于沙皇，但是也无法排斥象李斯特这样难得的人材，因为他不仅是演奏钢琴的艺术家，同时也是善于交际和才思敏捷的艺术家。尽管沙皇不喜欢他，但是宫廷人员，特别是高贵的宫女们一再邀请（说得更正确些应该是引诱）他进宫作客。费兰茨在意大利相识的维耶尔戈尔斯基伯爵（他本人是音乐的业余爱好者，弟弟是优秀的中提琴家）为他组织了一连串的私人音乐会。这些音乐会的最积极的听众是沙皇皇后。她

隐蔽着自己的身份，每场必到。当然她这种微服幸游的做法也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宫廷马车、威武的近卫军和马车后面的一大群侍从人员是任何到过圣彼得堡的人都能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这还得算微服幸游，因为只有这样皇后才可以不顾严格规定的宫廷礼仪，尽情享受使人飘摇欲飞的肖邦三步舞曲、逗人心花缭乱的帕格尼尼练习曲和这位远道而来的艺术家独创的令人愉快无比的《匈牙利狂想曲》。

三段小插曲

一、俄国音乐评论家谢洛夫对李斯特的评价

"……听了李斯特的演奏后，我同斯塔索夫都象着了魔似的，两人谁也没有说什么话，急急忙忙往家赶，以便尽快把自己的印象、梦想和所受到的鼓舞心情记载下来。我们两人还发誓说：一八四二年四月八日这一天，从今以后将永远是我们神圣的一天，我们将终生不忘。我们两人象是处于热恋之中的情人，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也没有见过这样天才、热情和魔鬼般的人物，他的演奏有时象狂风怒号，有时又如此温柔迷人……"

二、李斯特对这些日子的怀念

"……亲爱的玛丽！音乐会实际成了我的独奏会，一共演奏了六首钢琴曲。这足够了。皇后和整个宫廷——沙皇除外——都来了。明天我还得去维耶尔戈尔斯基伯爵家，因为皇后和王子王妃召见我，要我再为她们演奏钢琴。上周收入四万多法郎。复活节的星期三，我将举行第三场音乐会，地点就在从前泰尔贝尔格演出过的大厅。

我感到十分疲劳，很想休息。您愿意在诺南维尔斯再呆两个月吗？如果您不答复我这个问题，我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时我将不去巴黎，而是去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华沙、波罗斯洛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摆脱这种生活。现在，我完全生活在真空中。愿上帝保佑您！”

三、圣彼得堡的先生们对李斯特的反应

（地点：维耶尔戈尔斯基伯爵家）

伯爵家所有的大厅全部打开。三层楼房共有三十间大厅。每间大厅里都铺着又软又厚的鞑靼毡毯和印度地毯，橡木天花板上悬挂着钟乳石式的大吊灯，墙上是一些古罗马人的画像和价值连城的绘画艺术珍品。伯爵在意大利时广泛收集了意大利名画家的各种杰作。在大楼里站岗的不仅有伯爵的仆人，还有近卫军的一些高个士兵。他们在等候皇后的銮驾。普通客人早已到齐：斯塔索夫、谢洛夫和勉强从家里被拖来的格林卡①。这里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斯捷潘·彼得洛维奇和阿尔诺尔德·久里。贝根道尔夫伯爵也来了——警察局长出席这种晚会是没有坏处的。接踵而来的是沃隆科夫·杜什科夫伯爵、约苏波夫公爵、美丽的皮埃罗苏尔斯卡女公爵、皮肤洁白如玉的红发美人玛丽·卡莱尔吉斯夫人、纳塞尔罗德女伯爵。李斯特·费兰茨终于到了。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皇后才姗姗驾到。当李斯特正在弹琴的时候，有两个人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窃窃私语。

甲先生：听说沙皇召见了警察局长贝根道尔夫伯爵，命令他把李斯特驱逐出境……

---

① 格林卡(Mihail Glinka, 1804－1857)，俄国作曲家。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同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人交往。所作歌剧《伊凡·苏萨宁》富于民族风格，是俄国第一部民族歌剧。

乙先生：沙皇为什么对李斯特生这么大的气？

甲先生：有一个混蛋宫廷人员要求李斯特专门为波洛第诺战役的老战士们演出一场。李斯特还没有等他讲完话就开始反击："我是在法国受的教育，在法国出的名。我无法同那些打败法国的人相处。"

有些以惹是生非为职业的人马上到沙皇那里告了状。这样难得的情报是绝对不能隐瞒的。沙皇陛下听后说："我不喜欢这个年轻人，特别是不喜欢他那长头发和他的政治观点。"

然后这些人又把话传给了李斯特。他又反击说："我的头发是在巴黎养长的，我只愿意在巴黎剪掉……至于说到政治观点，我是没有政治观点的人。在我还没有三十万把刺刀来支持我的看法之前，我不会有政治观点。"

不过，皇后却对李斯特佩服得五体投地……

乙先生：我想我并没有泄露什么秘密，如果我告诉你说，沙皇也终究会对这位匈牙利的俄耳甫斯五体投地的。

甲先生：这不可能！

乙先生：不可能的事是没有的……最多只有难以做到的事。还是让我来告诉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美丽的卡莱尔吉斯夫人正狂恋着李斯特。而沙皇却正在为这位被缪塞、拉马丁、海涅、巴尔扎克、肖邦和雨果爱慕过的红发美女发疯……现在调换了一下位置。不是人家为她感到热血沸腾，而是她在极力追求这位英武倜傥的匈牙利人。其他的就不用我说了。红发美女昨天对沙皇陛下稍为笑了一笑，然后用扇子遮着脸，轻轻地对皇上说了一句话："明天我想在国家剧院见到陛下……"沙皇听后，脸色都变蓝了："难道您要我去对这个年轻人表示敬意吗?!"美人不慌不忙地答道："不是对他表示敬意，而是使我幸福……"我敢发誓，皇上一定会去国家剧院。要是您愿意，我们可以赌一赌。

如果我说错了，罚我一百个金币，如果我说对了，只罚您十个金币……

巨大的马车轮继续在公路上不停地滚动，又经过了无数的城市、乡村、圆顶教堂、寺院、破旧的农舍。光着脑袋、点头哈腰的官员们在广场上热烈欢迎路过本地的“国王”。费兰茨背靠着冰凉的车垫，脑中还回响着同车轮滚动声混杂在一起的乐曲片断：《半音阶加洛普舞曲》、《尼奥伯幻想曲》，以及最后一场音乐会上为沙皇陛下（这位象神一样的罗曼诺夫终于还是去了国家剧院）演奏的《拉科齐进行曲》。不需要多作说明，沙皇完全明白这是什么乐曲，因为人们很快发现他神情非常严肃，再也没有鼓过掌……。马车穿过发出回音的桥拱。车轮的声音被土路上的泥潭窒息。接着又听到德国公路上石块的笃笃声。最后由法国用热情、幸福和恋人的拥抱欢迎艺术家的归来。一路上陪伴他的是车轮声、音乐声和一些女人的眼睛：卡罗蒂、卡莱尔吉斯夫人，还有在家里等着他的玛丽、玛丽、玛丽……他正在自问自答：“你还爱她吗？是不是一种比爱情更有力的习惯势力使你离不开她？你在可怜她？你不敢承认，这一切已经完了、完了……”马车越跑越快。费兰茨被许多往事所包围：象征纯洁的日内瓦、晨钟、在山上同乔治·桑和玛丽共处的日子、三个孩子、已经失去的以后又从海底里捞出来的珍珠似的爱情……卡罗蒂、卡莱尔吉斯夫人、玛丽。不，这不仅是对往事和青春的回忆和怀念，这是至今犹在的活生生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知罪犯罪的爱情。使他感到苦恼和屈辱的是，当他和玛丽发生任何争执时，总是玛丽有理，因为是她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等他，而他却象一只流浪鸟到处寻找新窝——新欢：卡罗蒂、卡莱尔吉斯夫人、玛丽……应该全告诉玛丽，因为他从来不愿意说慌。应该坦率地告诉玛丽：上

帝赋予我磁石般的力量，不管我怎么做，女人们总是朝我飞来。不，这些话说得不真诚。应该说上天给了我磁石般的力量，吸引着女人，我并不反对这种吸引，我在不停地征服女人，并且为这些征服感到愉快……

与玛丽的会见完全不是费兰茨原来想象的那样。跑过来迎接他的是一个美丽的、充满胜利的笑意的女人：

"上帝把您带来了，亲爱的朋友！"

"就您一个人？母亲和三个孩子呢？"

"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是奶奶的客人。"

"看样子您在生气。您的欢迎是冷淡的，是在例行公事。"

"不，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互相答应给对方以完全的自由已经半年多了。您多次享用过您的自由，只不过不总是那么有选择就是了。您使我感到难过和屈辱。尽管我从来没有想找过任何人，但是偶然的巧遇……"

"玛丽，您是对的。我赶回巴黎首先是为了向您道歉。您没有答复我在圣彼得堡给您的信。但是我并没有实现我的威胁，既没有去哥本哈根，也没有去华沙和波罗斯洛，而是回到您身边来了。"

"谢谢。您永远是我们愿意见到的客人……"

"我想，应该说是'家长'。"费兰茨露出了痛苦的微笑，"最好的称呼应该是：一直等待的情人……"

"母亲和三个孩子很快就会回来。在他们面前，我们不能再继续谈话。现在让我们明确一下吧：是一起生活还是分开生活？明白这个意思吗？"

"当然……"费兰茨眼帘中又闪现出玛丽年轻时顽皮而动人的微笑，"不过也可以说是不完全明白。我们在莱茵河畔共同度

过的美丽的夏天也许能使您的心软一些。”

“对不起，我听到了门铃声。”在她脸上闪过了一种极难发现的局促不安的表情。又是一阵铃声。“这是隆豪德，诗人……我的好朋友。”

“我还记得他，好象我们在哪里见过面。”

“我希望您能更深一步地了解他。”

“不必要了，”费兰茨伸出了手，“我从来就是相信您的。相信您的格调，特别是相信您的风雅。”

“留下来吧！”

“不行，”他一边告辞一边说，“如果您真要爱一个人，玛丽，希望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惩罚我才去爱一个人。”

他在巴黎只呆了几天，事情就象泛滥的河水一样滚滚而来。有几个商人想组织一个德国歌剧团。他们从遥远的城市里请来了独唱演员、合唱演员。团长兼音乐指挥是李斯特。但是在第一次排演时，这些商人就不干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剧院的门票收入能够支付这么大一个歌剧团的费用。德国人是坚强的、军人式的，说得难听点，是专横武断的。但也就是这些德国人现在显得那么可怜，变得好象一群被吓坏了的小学生似的。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从早到晚蹲在一起，等待幸运的到来，等待救世主在法国草原上不仅给他们带来面包，而且还能帮助他们返回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波罗斯洛，返回自己的家乡。巴黎乐善好施的先生、女士们立即组成了救济委员会。主席是罗斯恰尔德女侯爵，主席团委员有拉苏莫夫斯基公爵、斯德豪申侯爵等人。但是成绩很小，只募集了几十块钱，就是作为施舍也不够。于是，费兰茨去找老朋友奥布里斯特·托恩（他在美国赚了很多钱，想在巴黎花掉），向他借用大楼，举行音乐会救济德国“难民”。音乐

会获得了超过一切想象的成功。费兰茨还清了这些可怜人的债务，请他们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然后发给每人三百法郎的路费（超过实际需要的一倍）。可是这些得到好处的人很不懂礼貌，他们在巴黎的市中心居然唱起了德国的老歌《莱茵河应该是德国的》！新闻界大吃一惊，以为德国人要入侵巴黎。费兰茨没有办法，只好保持沉默。只有贝洛尼在紧张地算账：每人三百法郎路费，一百人就是三万法郎，其中有多少是义演的收入，又有多少是费兰茨自掏腰包？

一封信使费兰茨陷入深思。魏玛宫廷邀请他去。这个城市是赫尔德①、歌德、席勒生活过的城市，它的音乐权杖现在掌握在洪梅尔手中。魏玛宫廷邀请他去，是因为王子要举行结婚典礼，庆典上的精彩节目要有李斯特的钢琴表演。不过邀请信隐隐地露出一层意思，举行结婚典礼的音乐会只是借口，实际上是由于洪梅尔刚刚去世，魏玛的音乐生活无人指导，宫廷想长期聘用李斯特。

在魏玛小宫廷里气氛是家庭式的，没有那一套严格的礼仪规定。为了李斯特和鲁宾尼，在结婚典礼的宴会上免去了繁礼缛节。卡尔·亚历山大同他的新婚妻子不止一次地走进演员化装室向李斯特表示祝贺，长时间地同他握手。过了一会，宫廷总管来报告：魏玛女王公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卡尔·亚历山大的母亲）想同艺术家谈谈。

费兰茨被带到王宫的夏殿。这时已是秋天，但是温暖的天

---

①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德国文艺理论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同狄德罗、歌德和莱辛都有交往。学术研究范围包括哲学、文学、宗教、历史和语言学等，提倡民族文化，重视民间文学。

气使花园仍然保持着春夏的美丽，树枝被剪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夏殿前的花坛里百花怒放，争妍斗艳。

在小巧精致的会客厅里，只有三个人：女王公、宫廷总管（他在旁边笔挺地站着，好象是会客厅里的一件家具）和艺术家。女王公个子很高，身材丰满。有意思的是，她长得同她的亲兄弟沙皇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在她身上看不到罗曼诺夫家族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冷淡态度。她请费兰茨坐下。艺术家略表客气后就坐了下来。玛丽亚·巴甫洛夫娜仔细地打量着他。两人的眼光碰到一起了：

“您能留在我们这里吗，亲爱的李斯特？”

“我感到荣幸，陛下。不过我已经承担的义务使我不能长期留在魏玛。我有家，还有三个孩子，我不愿让他们离开巴黎。我的故乡匈牙利也在动员我回去。如果他们发出邀请，我就马上回国。另外还有许多合同……我秘书的日历上已经排满了明年的活动日程……”

“据我所知，夏天不举行音乐会。您可以在我们这里度过夏天和初秋，只呆三个月也行。”

费兰茨沉思良久。他不愿把自己拴在一个地方，以免将来后悔；他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

最后，他说了这样几句话：“女王公待敝人恩重如山，但是据我了解，宫廷和宫廷剧院已经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同行谢拉尔德先生。把他辞掉是不公正的，让一个新来的人站在他的上面更是不应该。我不能成为谢拉尔德先生的上级，但是——请陛下不要见怪，以为我不谦虚——我也不能做他的下属。”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站了起来，表示召见已告结束。临别时说：

“我接受您提的十分宝贵的意见，多谢。您既尊重同行，又

尊重自己，很合我的心意。我们将根据您的重要意见拟订一个合同草案。您看了以后如果没有意见，就请签字。我们将尊重您的决定和自由。”

一八四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费兰茨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内容一共三条：他不干扰谢拉尔德先生乐队的活动，谢拉尔德先生也不干扰他的乐队活动；李斯特先生不挂任何职称，仍然是李斯特先生；在魏玛工作三个月，酬金一千银币。

费兰茨希望从现在开始就呆在魏玛。但是贝洛尼不肯让步：“大师，音乐会合同都是您自己签的字，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任何人也不能怀疑李斯特的诺言。”

于是旅行马车又出发了。在法兰克福只呆了几分钟。但就是这么一点时间也足以造成法兰克福的土皇帝罗斯恰尔德与艺术家之间的激烈争执。罗斯恰尔德事先没有征求费兰茨的意见就擅自宣布，艺术家将在他的私人音乐会上演奏。贝洛尼也帮着他说情。罗斯恰尔德的管家向费兰茨苦苦哀求，最后这位银行家又亲自来做工作。但是费兰茨坚持不干：不行，不行！罗斯恰尔德无权在他既不知道也未同意的情况下支配他；罗斯恰尔德应该学会，黄金不是万能的。于是，费兰茨用急行军的速度——因为贝洛尼组织这种旅行，就象拿破仑组织一次闪电战一样——向柏林进发。在那里，等待他凯旋归来的是支持他的李斯特派和无理攻击他的反李斯特派。费兰茨还是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宽恕你的对头，不要用语言、文章、讥讽，而是用你的行动来回答。他继续为歌剧院的“不知名者”募捐，依然演奏逐渐变成反对派的门德尔松的作品（门德尔松对李斯特在柏林获得的胜利，特别是对他同宫廷的关系进行了讽刺），接着又指挥乐队演奏了韦伯的《奥伯龙序曲》和贝多芬的《科里奥兰序曲》。最

后，他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指挥了洪梅尔的室内乐七重奏，使得最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马车继续前进，又是急行军的速度。他走遍了西利西亚各个城市：列日尼茨、格沃古夫、尼斯，然后又很快折回柏林，同施罗德①——德夫里恩特联合举行音乐会。他根本不去理会评论家的批评谩骂和流言蜚语，对这些职业的和业余的惹是生非者表现出最大的宽容态度。音乐会大厅变成了音乐教堂。他同施罗德一起演奏了贝多芬、舒柏特、门德尔松和舒曼的作品。然后又以更急的速度去波兹南、波森、克拉克……华沙。

马车厢里有一张小桌子，专门供费兰茨写字和读书用。他在这张桌子上写的信，字迹不仅被马车颠簸得歪歪扭扭，而且被内心的火焰燃烧得模模糊糊。

> “亲爱的法伊朋友，你曾经说过，我在任何地方也不会象在匈牙利那样自由地生活和创作，我想你说的是对的。这正是我的希望和目标。不过在这以前，我还需要在国外流浪几年，过许多苦闷的日子。只要在佩斯找到合适的工作，我马上轻装兼程回国；只要我还能为你们服务或者你们还要我，我将一直留在国内。不管怎样，明年我将来探望你们。”

这是一个奇怪的、特别的信件。看起来他同玛丽已经断绝了一百次关系，但最后总还是弥合在一起。他无法离开玛丽。他在摇晃不定、不停飞奔的马车上给玛丽写了一封最热烈和最痛苦的情书：

① 施罗德（Friedrich Ludwig Schröder，1744—1816），德国演员、导演。受莱辛美学思想影响，导演和表演过莎士比亚的剧作。

“早晨阴沉、寒冷。我唯一的光芒，唯一的温暖和唯一的生活源泉就是想念您，玛丽……看来我已经忘记了生活。我的梦模糊不清。飞逝的岁月使我感到苦闷。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您会因为同我一起生活而感到幸福，我将马上丢掉我的装腔作势和徒劳无益的工作，就象丢掉一件破外套一样。我承认，我不相信我能使您生活幸福，因此我只好选择流浪生活……

三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处在烈火和自我的紧张之中，使我自己也感到厌烦和良心上的不安。我只能荒废我的一生，今天没有欢乐，明天没有希望。

我的身体很结实。我的道德力量和为人性格经受了锻炼。我们也许还能得到幸福，实现心灵中的理想？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应该由您来作决定！”

过了几天，他又写了一封信：

“您能跟我一起走吗？……我希望您同我一起去匈牙利。行吗？我不愿听到您否定的回答。我要很快结束我的流浪生活。匈牙利是我自然的和必然的归宿……我希望将来能和您一起在匈牙利度过我的余年。”

玛丽没有回信。生气了？爱情的火焰完全熄灭了？另有新欢了？费兰茨越想越远：也许是极重的虚荣心使玛丽离开了

他？玛丽现在工作非常勤奋，几乎是咬紧牙关在拚命。她已经选择了一个作家笔名：达尼埃·斯泰恩……也许他的存在会影响她的情绪。因为不管玛丽在写作上取得多大成就，费兰茨都会露出讥讽的微笑：达尼埃·斯泰恩出生在乔治·桑家的附近。玛丽出于一种女人的奇怪的和孩子式的固执心理，一定要向乔治·桑表示：我不仅比你美丽，而且还比你有才华！马车继续在奔跑，穿过桥梁，踩着土路。他在车上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他两人的关系问题。本来，玛丽只要写几句话就能使他的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但是她却顽固地保持着沉默。

一八四三年四月，华沙警察头子、三级卡塔琳奖章获得者、圣彼得堡秘密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的任务是镇压波兰自由运动）阿伯拉莫维奇召见了警察局的值班军官：

“关于这个匈牙利人有什么情况？”

“容卑职报告，我们正监视着他的一切行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越轨行为。”

警察头子有一个不大好的习惯。他如果一激动，就会一口气把肺里的气全部吐完，然后就这么憋着，好象一个潜水员在考验自己究竟能在水底呆多久而不吸气一样。阿伯拉莫维奇憋了好半天，以致不得不连吸几口粗气来填满他那已经憋坏了的肺，接着又冲着他可怜和不幸的下级发脾气：

“李斯特先生同肖邦一家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他每天都往肖邦家里跑。难道这还不是情况……？”他又一下子从肺里排出了全部空气。过了一会，他又喊叫起来：“我相信你们是在盯他的梢，但是你们不能象沙皇陛下的军官那样护卫着他。你们不象军人，倒很象一群又瞎又聋的笨老太婆！你们每天围着他转，可是不知道他今天同沙尔托里斯基结交，明天又同捷特维尔蒂

斯基和莫斯托夫斯基相识，同索菲亚和塔莫斯基夫人来往频繁……这个匈牙利家伙常常在公开的音乐会结束后又组织一些私人音乐会，你们连这都不知道……”

警察头子用比刚才更大的动作换了一口气，变了变讲话的嗓门：

“尊贵的先生，您知道吗？这个革命的、杀人放火的流浪汉现在在演奏什么？”

值班警官摆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脸，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李斯特和上面所说的人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李斯特现在在演奏什么。让上帝把这个家伙带走吧！鬼才知道李斯特在弹什么曲子。他还没有来得及想这个问题，警察头子又嚷开了：

“你们知道吗？李斯特正在演奏《波兰还没有灭亡》变奏曲！”

费兰茨自己对这些事毫无所知。他在国家大剧院举行肖邦晚会，不知疲劳地演出。一天难得睡几个小时。在华沙，夜以继日地有人找他。他只是偶尔能偷闲得到几分钟的幸福：卡莱尔吉斯夫人到华沙来了。她通知李斯特说，已经有两份秘密报告送往圣彼得堡。一份是阿伯拉莫维奇警察局长签署的，另一份是她自己签署的。

现在一切取决于哪一份秘密报告更能起作用了，是警察局长的，还是红发美人的。因为放弃圣彼得堡之行是不行的。贝洛尼坚决反对，他根本不怕阿伯拉莫维奇本人和他的秘密报告，他担心的是李斯特签了字的合同。于是马车又出发了。涅瓦河畔正好又是春天的四月。在米哈伊广场上，白天洒满了温暖的阳光，可是一到晚上，河水又冻起皱纹，只要刮一阵风，就会结冰。

李斯特在这里举行了六场音乐会，尽管沙皇不高兴，但是演出依然同过去一样成功。不过在李斯特派和宫廷献媚派之间的斗争中，这次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因素。费兰茨同格林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格林卡是个受压的天才。官方人士看不起他。在一次晚会上，皇太子米哈伊逼着问李斯特："您果真认为格林卡是个优秀音乐家吗？""不仅如此。他是个音乐天才！"皇太子耸了耸肩："天知道这些音乐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如果要惩罚我的卫队，就下令让他们到歌剧院去听格林卡的音乐！"

后来发现，官方人士与格林卡之间的矛盾远远不是一般艺术风格上的矛盾。格林卡周围——尽管他不轻易让别人成为他的知心朋友——有一批年轻人，其中有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画家、记者和科学家，甚至还有一些政治野心家。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正在酝酿着一种皇上是绝对不会喜欢的东西。这些年轻人不大听罗曼诺夫家族的话。他们经常批评和讽刺罗曼诺夫家族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费兰茨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加入了这场斗争。一年前，他曾经观看过格林卡的节目。他的示威性的鼓掌不仅仅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青年群众，甚至一些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的人的注意。他这次在俄国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演奏格林卡的作品。他弹奏了格林卡的一些幻想曲、变奏曲和杰出作品《切尔卡进行曲》。这部改写的钢琴曲几乎比歌剧本身还更能吸引听众，因而大大增加了格林卡的支持者。虽然费兰茨听说格林卡在某些方面批评过他的钢琴演奏风格，但是他还是坚定不移地为支持格林卡而进行斗争。格林卡认为费兰茨演奏手法太硬，近乎粗暴，只突出某一点，过于狂放，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费兰茨的态度。

看来，宫廷集团现在比较认真对待这位匈牙利艺术家了。它已经不满足于散布一些流言蜚语，而是开始动员评论家和记

者等笔杆子来攻击他。费兰茨根本不去理会这些著名评论家或者不大出名的评论家的批评，继续一场接一场地举行音乐会，出现在一些最高级的沙龙中。一八四三年四月底到五月中旬，在莫斯科又演出了六场。他还抽空访问了莫斯科郊区的吉卜赛人，向他们学习俄罗斯的吉卜赛音乐。但是他的时间太紧了，等到他返回莫斯科去参加音乐会时，乐队已经演奏了三次序曲，歌唱家和小提琴家也表演了不少节目，沙皇家族的亲王们和一些高等人物正在准备回家。这时，费兰茨跳上了演奏台，没有说一句表示道歉的话就开始弹琴。这次他演奏的既不是贝多芬、肖邦，也不是李斯特、格林卡，而是他刚刚从吉卜赛人那里听来的歌曲。台下听众愤懑不平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再也没有人去责问他上哪里去了，为什么迟到。人们反复喊叫的只是一句话：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演奏一遍！

格林卡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吉卜赛晚会。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吉卜赛村：各种各样的帐篷、随便扔在地板上的稻草、伪装的营火、吉卜赛舞蹈家、歌唱家和音乐家。格林卡主要邀请了李斯特的拥护者：达尔戈梅斯基、小巴拉基列夫、斯塔索夫、维耶尔戈尔斯基伯爵、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等人。为了让宫廷方面也有"代表"，还特地邀请了沙皇的总饲养官约斯科夫公爵和无所而不在的警察局长本克多尔夫伯爵。大富翁约苏波夫公爵和一些为自己能参加这次"狂人晚会"而感到幸运的人也都来了。应邀的条件是：来宾必须把自己化装成吉卜赛人，脱下燕尾服，穿上五光十色的破烂衣服。沙皇得到的报告是，格林卡家举行了狂欢会。其实人们并不是因为喝了格鲁吉亚烈性葡萄酒、使人烧心的白酒或格林卡亲手搅拌的草莓汁而发狂，而是因为听了激动人心的吉卜赛歌曲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小脸蛋曾被普希金亲手抚摸过的小姑娘，这次又得到了新的荣誉：李斯特含

着热泪听她演唱。

快天亮的时候，李斯特坐下来弹钢琴，演奏的是莫斯科吉卜赛人的音乐。

李斯特的眼眶里装满了回忆的泪水。

他回忆起自己在多波尔扬的童年……他和父母坐在车上，篝火旁有一个吉卜赛姑娘在跳舞。她越跳越靠近篝火，最后同火完全融化在一起……

他的信也许没有寄到，为什么玛丽没有回答，匈牙利的朋友们也没有回答？看样子，谁也不需要他。他在信中很明确地表示，他想回国，他不愿永远象鸟一样在外流浪。但是没有人回信。贝洛尼不停地给他安排演出日程。在驿站换车的时候，总是听到同一种单调的报站名的声音：符腾堡、巴登、慕尼黑、纽伦堡、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曼海姆、海德尔堡、迈宁根。经过长期颠簸之后，终于又回到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这时慕尼黑的气氛非常悲哀阴沉。因为巴伐利亚王子和他的朋友们（实际上是卫队）正在希腊同土耳其人作战。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希腊人民而战斗，但也有人说他们是为了争夺希腊的王位在打仗。土耳其人紧紧地包围了王子部队。多少天来，没有传来任何关于这支部队是否还存在的消息。即使这样，巴伐利亚国王陛下还是亲自出席了音乐会。这意味着听众也都可以冲进音乐厅。费兰茨把两次音乐会的全部收入捐献给希腊自由战士和慕尼黑盲人收养院。他把分到的一千五百马克装在信封中寄给了市议会。生平极为节俭的巴伐利亚国王（他总是亲自检查宫殿中的蜡烛是否已吹灭，剩酒是否已收集起来，燃料、粮食或其他财物是否被浪费）亲自下令把李斯特寄钱的信封保存在博物馆内，永志纪念。

一八四三年十月，慕尼黑的青年为了表示感谢，为李斯特举行了小型火炬游行，在他住的地方弹奏小夜曲。费兰茨在旅馆凉台上站了很久。他把贝洛尼叫到身边，对着他耳朵轻轻说了几句话。贝洛尼虔诚而油光光的脸立刻变得苍白。但是费兰茨不仅能请求，而且也会下命令。贝洛尼只好垂头丧气地走进厨房。几分钟后，旅馆门大开，招待员都走到广场中间排队集合，跟着他们出来的是抬着酒瓶箱的小侍童。木箱子里装的全是香槟酒。尽管贝洛尼一再劝说，巴伐利亚人更喜欢喝啤酒，而且碑酒也比较便宜，但是费兰茨毫不动摇地表示：客人虽然是巴伐利亚人，但主人是匈牙利人！

罗马的老朋友、画家塔西陀也来了。他请费兰茨参观了创作室。他还举行了一次化装舞会……请费兰茨坐在一架摇摇晃晃的钢琴旁。主人拉开了挂在墙上的绿色花绒窗帘，露出了六张巨型硬纸板，上面画着提供给柏林艺术博物馆的精心绘作的壁画草图。六张画描绘了六个重大历史事件：巴倍尔塔，耶路撒冷的毁灭，希腊的黄金时代，匈奴人入侵，十字军和改革时期。

费兰茨目不转睛地凝视着：

“这六张画都应该写成音乐……这六首交响乐将成为世界历史的音乐史诗……”

马车又出发了。费兰茨疲惫不堪，脑子麻木，勉勉强强还能听见驿站长的喊声：

“德累斯顿……什切青……德绍……不伦瑞克……汉诺威……贝恩堡……”

在德累斯顿，费兰茨不得不多呆一段时间，因为朋友们硬把他拉去看歌剧，要他听听新的伟大作品，认识认识创作这部歌剧

的艺术家。歌剧名是《黎恩济》，作者是瓦格纳。这次会见气氛相当紧张，因为费兰茨不愿意说谎。他无法接受德累斯顿朋友们的过奖之词，例如什么新时代……德国歌剧史的新篇章等等。他认为《黎恩济》中有许多东西还是过去的老东西，有些则只是反映了音乐指挥的个人技巧。费兰茨讲不出热情洋溢的赞词。他同这个傲慢的人难以找到共同语言。不过他也无法抗拒瓦格纳的魅力。瓦格纳有一种特殊的谈话能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不管他讲的是古代希腊人、现代生活，还是谈神化了的贝多芬和当代惨死的音乐诗人，也不管他的话题变换得多么快，讲得多么娓娓动听，他的中心思想实际上只有一个：我、我、我！这种令人吃惊的自信，这个又瘦又小、不顾一切地想给人以巨人印象的人，使李斯特感到奇怪和迷惘。瓦格纳对所有同代人的防御性的仇恨和狂热的革命者的姿态，也使李斯特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在这些态度的后面看到瓦格纳是个软弱动摇、十分讲究吃喝穿用的小市民。瓦格纳对李斯特也不大信任，更谈不上什么热爱了。瓦格纳本来指望李斯特会高声宣布：我发现了真正的天才！但实际得到的只是一般有礼貌的友好表示。李斯特的赞词不好也不坏，恰恰是一个优秀的外地音乐指挥所应该得到的赞词。瓦格纳的一生一直动摇在爱神维纳斯的脉脉多情和苦行僧的自我折磨之间，因此他现在特别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李斯特不是单独一个人，他还带来了一个瓦格纳生平看到过的最漂亮的女人。这个女人真是爱神维纳斯再现。她具有无限的诱惑力，既有能吸引男人眼睛的丰韵，又有精美塑像般的窈窕身躯。头发浓密而又蓬松，充满着电磁般的吸引力，即使象瓦格纳这样口若悬河的人在她面前也会瞠目结舌，期期艾艾说不出话来。他的视线一直盯在这个女人身上。只是等客人离开之后，他才重新恢复了理智和嗓音，向自己轻轻地念着这个女人的名字——罗

劳·蒙代茨……

这位漂亮的女舞蹈演员是费兰茨的最新情妇。罗劳不同于以前那些情人，她不是娴静感人、温柔多情地爱，而是大叫大骂，甚至动手打人地爱。她不许费兰茨看任何女人，不管是女厨师、女公爵、女演员还是德累斯顿市场上的女商贩。在这一场爱情冒险中，征服者是罗劳·蒙代茨，被征服者是费兰茨。在德累斯顿举行的一场音乐会结束后，一阵香风吹进了演员化装室。这样漂亮的女人费兰茨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一进门就跪在他的面前，抱住他的双腿，把美丽的脸孔贴在他的怀里，悲伤地哭了起来：

"上帝把你带来了，使我终于也能有几分钟的幸福时刻……"

哪一个男人能够顶得住这样美丽的女人的进攻呢？晚上，他们一起吃晚饭，当然也一起度过良宵。艺术家感到他不是和一个女人，而是和发狂的海洋在一起。第二天，他们又一起度过了一整天。

第三天，罗劳还在熟睡，费兰茨偷偷地反锁上房门，把钥匙交给门房，并且给了他十个金币："朋友，看在上帝的份上，绝对不要让那个漂亮的女人出来，不管她怎么叫喊。只有这样我才能摆脱她！"

玛丽迟到的信终于收到了。信中说：

"您关于回匈牙利的信，我不准备答复了。到六月份见面时再谈。在这以前，我不会变，您肯定也不会变。因为您还会照着您丰富的幻想去活动，而我仍然要根据我的良知行事，我的心会很痛苦……"

费兰茨把这封信读了几十遍，总想在字里行间找出玛丽真实的思想。可是不管他怎么做，不管他怎么推敲琢磨信的意思，结论只能是一个：玛丽不愿意离开巴黎，不愿意离开自己踩出来的生活道路；玛丽仍然认为去匈牙利并且在佩斯安家是一种病态心理、装腔作势和愚昧无知；她也不相信费兰茨真会放弃艺术家生活、演奏台、旅行马车和无数的金钱。其实，费兰茨并不需要这么多钱。因为除了几本书、几支雪茄烟、一杯酒、简单的食品、一套演出服装之外，他再也不需要什么其他东西。他何苦还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流浪呢？简单的回答是：为了三个孩子；不仅要保证他们的生活，而且还要保证他们的未来。他必须给孩子们留下一笔遗产，因为他们将来一定会遇到比任何人都更大的困难，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同他们的父亲作对比。不管他们将来选择什么职业，人们总是会说："你们的爸爸比你们强多了，他是一个优秀音乐家，能写会说，身强力壮，既有能耐，又比你们成功。"他只有一条可以做到：给孩子们一笔财产。如果他们将来进入社会，条件不如他时，金钱会增加他们的力量。

在巴黎会见是避不开的。费兰茨没有等到六月，而是四月就返回巴黎参加两场音乐会。贝洛尼把票价订得特别高，以致连巴黎的观众都倒吸了一口气。尽管如此，音乐迷们还得为抢购一张门票进行肉搏战。这一回费兰茨主要演奏自己的作品。开始的时候，人们感到憋气，觉得花了那么多钱只能听听这种音乐，实在冤枉。但是最后人们的情绪被激发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炽热，音乐演奏又成功了。谁都不再谈论泰尔贝尔格，连柏辽兹的《卡米尔》也被降到第二流或甚至第三流的地位，谁还再去提皮克西斯或卡尔布莱纳呢？巴黎的天空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李斯特·费兰茨。柏辽兹为费兰茨的钢琴艺术写了颂歌。海

涅还在挖苦费兰茨，但是他挖苦得很巧妙，以致一般没有经验的读者还以为他是在赞扬这位钢琴大师。费兰茨根本不去读对他的评论。他因为经常远离孩子，所以总是想为孩子做点什么。他想把孩子聚拢到自己身边，听听他们雏鸟般的叫声，可是他很快发现，他们已经不是小孩，而是小大人了。他们已学会埋怨、赞扬、提问、告状，象烈火一般地爱。不过他们主要是爱妈妈，对爸爸的爱只是偶尔的，并且象彗星那样一扫而过。因为他常常不在家，对孩子来说显得是那么遥远和神秘。现在他们都紧紧地贴在他的身边，他不可能再有时间去管那些评论。他没有时间再干别的事，尽管贝洛尼老是跟在后面唠叨，劝他接受这里的合同和那里的邀请，不过他必须抽出时间来同玛丽单独谈谈有关他们两人的命运的事。

真是世上少有的美人。

她写的信是一个心碎女人的抒情诗歌。但是当着面的时候，她却又非常清醒冷静，象一个铁面无情的法官，准确无误地、逐条逐项地罗列了他曾经犯过的全部罪行。她认为这都是些公开的、让人耻笑的丑行，她已经无法再忍气吞声。她必须同他离婚。费兰茨以三个孩子为由拒绝离婚。可是，在信中充满柔情的玛丽冷冰冰地回答说：

“我也是在教养院长大的。”费兰茨知道，她这样说只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是他现在不想同她辩论。不管他是多么不愿意，最后还是不得不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

“您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玛丽的脸盖上了一层乌云。她一直以惊人的毅力控制着的眼泪开始流出，很快就直泻而下，再也无法抑制：

“母亲已经去世。几个星期之后，我将接受她留给我的那部分遗产……”

费兰茨站起身来，很严肃地弯下腰，去吻她的手：

"请接受我的悼念，玛丽。"

"谢谢，亲爱的朋友。"

过了不久，玛丽写了一封信给费兰茨："我们必须谈谈，还有一些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费兰茨回信中说："晚饭时您那里会有人吗？如果您不拒绝，六时半我将去您那里。"

他们两人刚谈几句，隆康德就来了。费兰茨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他表现得比平常还要客气一些。讲话时态度温和，声音也不高。最后三人决定：两个女孩送到贝尔纳德夫人办的教养院，男孩暂时住在奶奶家，到长到上中学的年龄时，再送进波拿巴学校。

费兰茨后来又给玛丽写了两行字："我们之间不需要有第三者来作见证。最后我还有一句话，如果将来还需要我，我任何时候都会和您在一起。"

费兰茨又开始了他的颠沛生活。沿路上一再被驿站长的叫声惊醒：里昂、马赛、土伦、尼姆、图卢兹、波尔多、蒙彼利埃。最后一个城市的名字——波城使费兰茨的心跳加快了。

音乐会结束后，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张十分熟悉然而又是那么陌生的脸：卡罗琳。她还年轻，不到三十岁，但是头发几乎全白了。她的眼神是一个老妇人的眼神。她把脸凑到费兰茨面前说："吻我吧，费兰茨。"这时，他闻到了一种奇特的香味。这种香味小时候在妈妈拉开不经常打开的五斗柜抽屉时曾经闻到过。抽屉里的衬衣衫裤散发出一种草药味，一种无法形容的、经过多年积累起来的、被流逝的光阴所提炼出来的香水味。

第二天，两人在阴森森的别墅里又见了面。费兰茨演奏了两首古老的法国歌曲，作为赠给他早年的学生和情侣的纪念。另外，他还为自己写了一首诗：

青春的遗嘱

我愿象闪烁的阳光一样离开人间，
剩下的只是黄昏时晚霞的一现，
这样结束生命该是多么愉快，
请让我默默走进黑暗无边的深渊。

幸运的是，贝洛尼根本不想"离开人间"。他一如既往，积极安排日程，认真处理信件，努力签订合同，拚命讨价还价。他要求西班牙音乐演奏会举办人提供情况。当他听到那里的条件十分恶劣时，他坚持在合同中规定罚金，而且这笔罚金必须事先存入法国第一流的大银行，只有里昂银行开具证明，保证每场音乐会酬金一万法郎，方可启程，否则——用贝洛尼的话来说——决不动身。不久，银行通过邮局寄来证明，于是贝洛尼脸带当年汉尼拔将军抢登阿尔卑斯山时的胜利微笑，硬拖着费兰茨朝西班牙半岛进发，走上新的光辉灿烂的凯旋大道。

他们遍游了一些大城市：马德里、里斯本、科尔多瓦、塞韦兰、巴伦西亚、加的斯、直布罗陀、阿利坎特、马拉加、巴塞罗那。紧接着又赶回法国的里昂、贝桑松、科尔马、施特劳斯堡、米卢兹、梅斯，穿过瑞士的巴塞尔和苏黎世。费兰茨又弄得疲惫不堪。西班牙式的欢迎场面、古罗马竞技场上的欢送大会、花环、首饰、主动找上门来的女人、西班牙和葡萄牙宫廷中世纪的礼仪、永无休止的旅行以及折磨筋骨的旅馆床铺，耗尽了他的精力。最后好不容易才到了波恩。在这里，费兰茨毕生中的一个

大苹果和重大贡献——贝多芬塑像纪念碑快要建成了。

可是对这样的大事，费兰茨也只能分一半心去做，另外一半得去应付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成百上千的琐事。他有家，在远方有一个女人。看来她只是现在才开始从离婚后的昏迷中清醒过来，试图补偿许多自己想象出来的或真正受到的委屈。拉曼内斯给费兰茨来信说：玛丽托他用自己的全部威望和道义上的分量说服费兰茨，要他在有关孩子们前途的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孩子们应该同自己的母亲（全部地或绝对地只同自己的母亲）保持关系，不需要奶奶插手他们的培养教育；也不需要费兰茨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祖国和一个早就被消灭、分割、合并的人民的名义向孩子们灌输浪漫主义的怪念头，他们不需要"匈牙利式的幻想"。费兰茨在音乐方面也许行，但在生活上几乎是一窍不通……

费兰茨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但还是赶写了回信：

"亲爱的神父！现在我的脑中千头万绪，两个主要的问题都涉及到孩子们的未来。一个是对孩子们的培养教育问题，另一个是孩子们的法律地位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我同玛丽已经一致决定，大女儿送交贝尔纳德夫人教养，小女儿身体比较虚弱，目前暂由奶奶照管，将来也打算送进贝尔纳德夫人办的教养院。我认为，那些我可以接受其忠告的人们的一致意见也认为，这是目前最聪明的解决办法，尽管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谈谈孩子们属于那个民族的问题和法律地位问题。这三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法国人。布兰丁生于日内瓦。科西玛生于科莫。达尼埃出生在罗马。三个孩子都姓我的姓，我对他们有完全的支配权，当然

这种支配权也确定了我对他们的义务。孩子们应该属于他们父亲所属的国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是匈牙利人！他们应该受匈牙利法律的约束。我唯一可做的是通过匈牙利总督请求皇帝兼国王陛下使他们完全合法化。

请原谅我写得这么长……

万分感激和忠于您的

李斯特·费兰茨”

费兰茨同贝洛尼也发生了一点小磨擦。在巴塞尔音乐演奏会休息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一个浑身湿透了的年轻人到演员化装室来找费兰茨。他为了听李斯特的钢琴演奏，专程从苏黎世步行到这里。他呆呆地凝视着艺术大师的脸。只有那些非常贫困而又非常热情的年轻人才会这样看他们所崇敬的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整个灵魂、全部希望和为之感到骄傲的圣徒式的贫困全都凝结在这一瞥之中。来访者——据费兰茨估计，大概二十四、五岁——几乎不敢伸手握费兰茨先伸过去的手："您使我感到太荣幸了，大师。我曾经向您自我介绍过一次，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是在汉堡见的面，您显然已经不记得我了。我叫拉福，约基姆·拉福。"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亲爱的朋友？"

"我想听听您的钢琴演奏……"

"一个空座位也没有了。"好管闲事的贝洛尼插嘴说。

"没有关系，"费兰茨打断了他的话，"他可以在演奏台上坐在我的身边。"

在接下去的谈话中发现，原来拉福也是音乐家，而且是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他学会了一切可以学的东西：指挥、配音、室

内音乐、合唱、钢琴、小提琴、风琴。他还精通管乐器，如果需要的话，他也会抄写乐谱，因为他能写一手好字……总之，他什么都学会了，就是没有学会如何赚面包吃。费兰茨仔细打量了这个浑身上下已经湿透和胆怯怕生的年轻人。他的破旧上衣已经磨得很薄，以致身上的骨头几乎都可以穿透这些破料子。费兰茨还留心观察了他那一双细嫩的和冻得发青的手。他没有手套，也许从来就没有戴过手套。他的一双皮鞋虽然擦得很亮，但是上面满是皱折、小破洞，说明穿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费兰茨友好地搂着青年人瘦窄的肩膀："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加达诺·贝洛尼……这位是约基姆·拉福。我想今后请贝洛尼先生继续掌管财政事务，请拉福先生当我的艺术秘书……"

这样一来就同贝洛尼磨擦开了。这位积极勤奋、脸上总是忙得出汗的意大利小个子活象一头衰老的长毛狗，嘟嘟囔囔，反对主人再养一条新的看家狗。从此以后，他总是酸溜溜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刺人："请您找拉福先生谈谈吧！这是艺术问题，敝人一窍不通。"费兰茨知道后，就把这位非常忠实于他的人拉到一边："有些人宁死也不会接受施舍，这也是一种战死疆场的军人似的英勇精神。对这种清高的人，我们也应该想法帮助他们。所以您不要声张，不要增加我的困难，不要去挖苦一个好人……"

他们三人一起动身去波恩参加贝多芬的纪念活动。他们很快发现，现在需要的不是两个秘书，而是一个庞大的办公室组织。因为组织委员会请来了很多人：梅耶贝尔、好久不见的圣西门主义者、挚友费利西·大卫、斯庞、穿着丧服的安东·辛德尔、永远热爱生活的莫斯切来斯、巴黎音乐报刊的"国王"久里斯·杰尼。来客的名单中还有谢拉尔德(魏玛的"指挥对手"，示威性地不同李斯特来往)、由从前的敌人变成朋友的斐提斯和克鲁采尔。

克鲁采尔比法国人还要热情地拥抱费兰茨，一再亲吻老朋友的脸颊，自己的脸上则满是泪痕。斯图加特音乐学院院长林帕纳尔和一位仍然保持着美丽仪容与诱人魅力的女士也来了。她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在同一个时间里与五、六个男人眉来眼去。她现在是柏辽兹的不朽的“卡米尔”。过了一会，歌剧《卡米尔》中的“老鹰”、柏辽兹自己也出现在人群之中。不过他现在伸展翅膀的时候，已经感到很吃力，说起话来有些灰心丧气，自己也越来越难以相信世界还在围着他转。

费兰茨仔细核对了一下名单，吃惊地发现，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都不在邀请名单中。对法国方面更是严重的失礼：没有请奥门、阿列维、托马斯。甚至连为贝多芬做了最大贡献的哈柏尼克也未请。他们也没有向费兰茨的启蒙老师、贝多芬的忠实学生车尔尼发出邀请。组织委员会不肯接受出钱建造贝多芬塑像的李斯特的意见。费兰茨唯一的愿望是请他们同意大利著名雕塑家巴托利克一起为贝多芬雕作塑像。组织委员会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在德国的中心地区，不能让一个意大利人来制作最伟大的德国艺术大师的纪念雕塑像。费兰茨无条件地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他自己也认识到，如果真按照他的意见做，德国的一些头等雕塑家都会感到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组织委员会决定采取招聘的办法来选择最合适的雕塑方案。在这一场激烈的竞争中，最后德国雕塑家哈奈尔取得了胜利。一八四五年八月，塑像落成，纪念周的节目单也准备就绪。永远抱怨不满、相互嫉妒和争吵不休的组织委员会委员们之间的严重分歧总算告一段落。纪念周的节目是：《第九交响曲》、《庄严弥撒曲》、《C大调弥撒曲》、《耶稣在橄榄树山上》、《第五交响曲》、歌剧《科里奥兰》和《爱格蒙特》序曲、歌剧《费德里奥》终曲、《E大调钢琴协奏曲》、拉祖莫夫斯基的《四重奏》、布莱登斯坦博

士合唱团的大合唱和李斯特·费兰茨的《圣经曲》。节目是够了，不过这些先生们忘记了一条：要举办节日音乐会，还必须有音乐厅。本来他们想利用旧帝国学院的音乐厅，可是它一直被当作马厩使用，现在即使进行最仔细的打扫和粉刷，也去不掉它的马粪味。费兰茨迅速作出决定：建造一座节日演奏大厅。组织委员会的委员们听后都为之一惊：谁出钱？费兰茨只说了一个字：我！委员会马上派出信差去找维奈尔（杰出的建筑师，不久前他刚刚在科恩结束了靠费兰茨捐献而修建的大教堂工程），并且提出一项工程要求：在几十个小时之内这里需要一座大厅！贝洛尼气得几乎发疯，但他还是努力去找工人，取款采购木板、沙土、铁架等建筑材料。费兰茨把全部时间都耗费在建筑工地上。他到处做鼓动工作，同工人交朋友，分发酬金，同建筑师、领班、木匠、石匠一起互相鼓气，最后这座建筑物真象一枝神奇的花朵那样平地而起。

一八四五年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时半，大教堂前的广场挤满了人。教堂内正在用管风琴演奏《C大调弥撒曲》。做完弥撒后，人们都聚拢到用帆布遮盖着的塑像周围。这时，费兰茨大声骂起人来。这一天是个大热天，人们站在烈日下等了很久很久，但是王室的成员还没有来，而他们不到，塑像是不能揭幕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看样子，那么多的精力、劳动、金钱全是白费了。人们等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他们派人骑马去打探消息。在他们还没有返回的时候，从莱茵河那边远远地传来了惊天动地的船鸣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和王后、王子夫妇以及英国女王维克多利亚和丈夫阿尔贝亲王驾到。费兰茨因为疲劳、酷暑和硬压在心底里的愤怒几乎昏倒在地，但是当他看到帆布从塑像上掉下来，塑像的铜脸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时候，他的心情平静了下来：雕得真不错……

现在就只剩下如何搞好音乐会的问题了。这个任务又主要落在费兰茨的肩上。在塑像揭幕的当晚，费兰茨担任歌剧《费德里奥》的音乐指挥，然后演奏贝多芬的《E大调钢琴协奏曲》。但是这还不够，因为普鲁士国王陛下坚持要费兰茨在自己的别墅里演一场，至少是一场。在王家别墅的音乐会上，他为林德和维阿尔多伴奏，然后演奏了《诺尔曼幻想曲》。尽管他做了这么多工作，这样奔忙紧张，花费了那么多钱，但是仍然有人在不公正地攻击他。德国的音乐界同事们怒气冲冲，议论纷纷：为什么演奏李斯特的《圣经曲》，而不演奏德国人自己的作品？在斯泰恩饭店举行的宴会上，以描写细腻而出名的诗人瓦尔夫第一个站起来讲话："斯庞大师的主音，联系一切的李斯特，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布莱登斯坦博士，组成了最纯洁的和音。"然后他又为英国女王和普鲁士国王祝酒。这时谢拉尔德从椅子上跳起来，几乎把台布也拉下桌子：

"我没有听到任何人为法国国王祝福，您李斯特先生是应该这样做的！"

餐桌的另一端蹦起一个英国人，他的声音仿佛莱茵河上的船鸣："我们还应该为中国皇帝祝福，因为他同法国国王陛下一样远离我们……"

这一下子宴会大乱起来。节日活动差一点变成了打群架，只要有人再说一句过头的话，马上就会爆发一场大型殴斗。费兰茨请人们安静，劝大家不要争吵，几乎是在哀求，但是这些都没有用处。法国客人和他们的一些"盟友"为表示抗议，当场退出了斯泰恩饭店。

第二天他根据组织委员会的决定继续演奏《圣经曲》。国王们又迟到了。几分钟、几十分钟、几个钟头都白白过去。国王们没有到，按礼是不能开始音乐会的。费兰茨越等越生气，最后决

定不再等任何人，不管谁迟到，演出也要照原计划进行。

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布莱登斯坦博士急急忙忙地跑到演奏台前通知：

“大师，两位国王陛下驾到。”

李斯特弯下腰对站在台下的气咻咻、面通红的小个子说：

“我们再为他们演奏一遍，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他勉勉强强对付了这场音乐会，一回到宿舍，就躺倒了。症状同在维也纳时一样：发高烧，四肢浮肿，满身都是疹斑。他一个人躺着。贝洛尼在筹备下一批音乐会。拉福正在抄写李斯特的《圣经曲》，因为好多人都索要手稿。最后总算来了一个人，在他周围默默无声地侍候他，仿佛她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个没有躯体的仙女。她为他煮茶、通风、收拾房间，既慈爱而又严格地喂药，然后坐在床边读报纸给他听。

本来有些发霉的房间现在到处散发出清洁的香味。费兰茨连手也抬不起来，只好用眼睛来“抚摸”这位自愿侍候他的“护士”。

这个没有躯体的仙女是卡莱尔吉斯夫人。她是费兰茨的朋友、护士、情人和亲信。她耐心地听费兰茨的忏悔：“我必须抛弃这种流浪生活……。”她还为费兰茨读报，因为他的眼睛过分疲劳，看起书来模糊不清。卡莱尔吉斯夫人念到“波恩市议会和贝多芬纪念委员会共同决定命名一条李斯特·费兰茨街……”时，费兰茨虽然极度疲惫，但还是挣扎着说“不行！”不管波恩市长如何亲自对他做工作，他仍然坚持：不行，不行！

卡莱尔吉斯夫人陪他前去科恩。费兰茨还想做他现在根本做不到的事，履行音乐演奏合同的义务，结果又病倒了。没有躯体的仙女又在为他煮茶，打扫房间，冷敷，听他忏悔：“我必须抛

弃这种生活方式……我也想抛弃这种生活，但是我心底深处有另一种力量在催促我：继续干下去吧！继续飞吧！流浪鸟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费兰茨长大后还从来没有这样病过。科恩的医生说，这只是暂时的不舒服，很快就会好起来，可是结果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他抱病赶到荷兰的克利夫，不顾自己头昏目眩，用两只火辣辣的手坚持演出。这次他主要是伴奏。卡莱尔吉斯夫人、贝洛尼和拉福都一再劝他休息，但他还是坚持按原计划履行合同义务。他在巴登稍事休息后就想离开病床回国：“你们不要再管我了，不要弄得我生病或者病得更厉害。国内来信叫我回去。如果朋友们能在国内给我找到适当的工作，我就长期留在佩斯或者永远留在那里。”

回国前还得按原计划去维也纳、布尔诺、布拉格演出。单单在维也纳就得演出十场，有时一天得赶两场。一八四六年四月四日，他又匆匆忙忙赶到捷克作巡回演出。五月十七日是最后一场音乐会，它的时间超过了正常音乐会的两、三倍。

虽然工作紧张，身体劳累，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听一个小孩演奏钢琴，因为推荐他的人说，这个孩子几乎是费兰茨的同乡，出生地离开多波尔扬只有几公里。多少年来，乞丐、骗子、签名收集者、失意的音乐作曲家和音乐神童（主要还是神童的父母），一个接着一个地找他，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

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名叫约基姆·约瑟夫。他在名师面前并没有显得特别紧张。他象小学生一样鞠了一躬，两只脚后跟一并，作了个立正姿式，然后就大胆地看着费兰茨。孩子长得很高，身体结实。脸孔显得坚毅，但是充满感情。他选门德尔松的小提琴演奏曲作为“考题”，李斯特担任伴奏。还没有拉到第十节拍，费兰茨就站了起来：“不错，不仅作为孩子，就是作为现成

的艺术家也很好；年轻人，到魏玛来找我，以后让你担任乐队长。”

费兰茨又出席了几次宴会和贝多芬的纪念活动。最后，在维也纳警察当局周密准备、广泛收集和仔细分析了欧洲各地的情报之后，费兰茨被召进了皇帝的宫廷。

一八四六年四月三十日，朋友们都在佩斯的船码头等候他。一下船就被送进英国女王饭店。他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窗门下就已经有人在拉小夜曲。音乐指挥是愁眉苦脸的艾克尔·费兰茨。到了晚上，又有一批人在拉小夜曲。全国各地第一流的吉卜赛乐师结成一伙，轻轻走进半睡半醒的艺术家的卧室，拉起了吉卜赛歌曲：小燕子，飞吧……我在森林里散步……金龟子，黄色的金龟子……。贝洛尼点燃了全部蜡烛、汽灯，招待员拿来了香槟酒，吉卜赛乐队的领队举起酒杯，用法语向费兰茨致敬。他讲的虽然不是拉马丁或者雨果的法语，但是每句话都能听得懂：“我就是巴黎的约什卡，艺术家先生。我就是那个穷孩子，您曾经为我花过那么多钱和精力。我感到非常惭愧，但这就是吉卜赛人的生活……请上帝原谅我的罪恶……”

费兰茨拥抱了他，听了他们的一段演奏，然后自己也坐到钢琴旁，为吉卜赛朋友们一直弹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诗人高劳伊·亚诺什派人送来了颂诗：

> 到我们这里来吧，音乐之王！
> 让祖国把你拥抱在自己的胸膛。
> 你的血和祖国的血溶化在一起，
> 母亲的土地才是你站得住的地方。
> 你的英名使你成为世界的奇迹和杰作，

你的良心要求你永远是祖国的忠实儿子和希望！

……

不过反对他的人看来也跟到了佩斯。《布达佩斯新闻》一八四六年五月三日报道说：

“许多人决定，为了更好地欢迎这位艺术家，他们准备失去自己的理智。今天，我们在一本刊物里读到，谁如果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还不失去理智，谁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那好吧，你们干吧！在布达城下已经失去过比这更多的东西①……”

如果只是这些攻击，倒也没有什么。人们情绪之热烈是罕见的。欢迎诗一首接着一首，歌唱团一个接着一个，奏小夜曲的也是一批接着一批。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不管它令人多么疲倦，任何人也不会觉得太多了。不过费兰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他希望匈牙利总督、某一个亲王或国王代表到他这里来向他宣布：“我们要把您留下来……”可是谁也没有对他作这种表示，市政府的先生、州议会的领导人、青年代表、有权有势的特权分子或贵族老爷们，谁都没有说请他留下来。费兰茨感觉到，他们并不希望他迁回国内常住；佩斯人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被捧到天上去的偶像，但是并不需要象他这样既有长处也有缺点、不仅可以神化而且也可以批评的人。不，他们肯定不愿他回国定居。只要他在国外能够继续取得成功，他就能成为他们的神；如果他在国内只受到国内同胞的欢迎，那么人们就会怀疑，他在国外大概已经吃不开了，所以只好回国来。

① 指布达城曾被土耳其人占领。

不，他们虽然非常尊敬他，但是并不想要他留下来。赛钦尼伯爵请他参观了正在施工的工程奇迹——链子桥，并且亲自为他作向导，介绍造船厂的情况。这个工厂是德国人帮助建造的，工程师、工人几乎全说德语，但是工厂大门上写着：第一个匈牙利造船厂。

又是一场接着一场的音乐会。匈牙利的上层社会一天到晚围着他转。在一次宴会上（费兰茨自己也记不清了，究竟是在夏季别墅、俱乐部、酒店还是在疗养院）国家剧院的名演员艾格莱希·加波尔为他朗诵了诗人维莱什马季写的一首颂歌：

你是举世闻名的音乐家，
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一家。
你振奋人心，
你驱散忧愁，
用你那唤起人们觉醒的琴弦，
为病中的祖国歌唱吧！

只有维莱什马季提出："你到我们这里来吧！"其他人都忘记了邀请的事。其实发出邀请的机会很多。他为建造音乐学院和其他慈善事业募捐举行了一系列义演。佩斯小组、民族小组和民族俱乐部联合为他举行过盛大宴会。最后在巴特尔饭店又为他举行了送别宴会。在这些宴会上，讲话人引用了很多比喻和警句，对费兰茨备加颂扬，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呼和鼓掌。民族博物馆专门定制了费兰茨的画像。造船厂宣布，下一艘船建成时一定请费兰茨主持下水典礼。但是任何人也没有再重复维莱什马季的话："你到我们这里来吧！"

五月十三日九点钟，费兰茨又会见了愁眉苦脸的艾克尔。但是要谈话却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位音乐指挥生平有很多事情都不愿意做，而其中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谈话。于是艾克尔、李斯特和贝洛尼三个人（拉福在德国出差，卡莱尔吉斯夫人在巴登有事）就这么面对面地坐着，一边喝酒，一边吃又咸又辣的烤肉。不过后来还是艾克尔先开了口。他讲话时也是那么愁眉苦脸，好象医生要拔他的牙似的："同行先生最近说过，想听听我的歌剧《胡约蒂·拉斯洛》。但深为遗憾的是，按照预告节目，最近几个星期内不会演这部歌剧。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朋友们：歌唱演员、音乐演员、合唱演员和幕后人员。他们决定就在今天上午为您演一次专场……我们设想，在观众席上将只有同行先生单独一个人。不过请稍稍等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布置舞台，演员、乐师和其他人员还在路上，有些人住得很远。"

中午十二时，《胡约蒂·拉斯洛》开场。演出结束时，费兰茨长时间地紧握着作者的手："您创造了一部杰出的作品。昨天还是梦想的东西，今天变成了现实：匈牙利的歌剧诞生了！"

最后一个晚上也被占用了。费兰茨要为建造孤儿院进行募捐演出。

他等着，一直等到最后一分钟，希望还会有人对他说："你到我们这里来吧！"也许终于会有人发现：在这个创造了链子桥、造船厂、民族剧院和匈牙利歌剧的、正充满春天的热情的国家里，在这个培养了许多诗人、生活正在向上发展的国家里，也应该有李斯特·费兰茨的容身之地。可惜谁也没有这么讲。他们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偶像，老远地对他表示尊敬，但是谁也不说"你到我们这里来吧"！

一八四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向维也纳出发。幸运的是，他没有机会读读《布达佩斯新闻》上令人讨厌的讽刺文章：

"李斯特走了。他留下的空荡荡的包厢每天都有三个人用抽水机抽头天晚上为艺术家流下的眼泪。据说，在这个泪海里，到处都是被撕破的、拼命鼓过掌的手套，湿透了的手帕以及破旧的望远镜玻璃，因而大大增加了抽水的困难。"

李斯特没有读到这篇酸溜溜的无耻短文。他现在正站在维也纳音乐厅的演奏台上，指挥着乐队，强迫维也纳人听《胡约蒂·拉斯洛》的序曲。这个任务并不是很轻松的。人群中既有鼓掌声，也有惊讶声。费兰茨为了对那些发出惊讶声的人进行报复，对那些鼓掌人予以鼓励，又重新演奏了一遍《胡约蒂·拉斯洛》。

接下去又得听从贝洛尼的安排了：从维也纳到萨格勒布、绍普隆、久尔。费兰茨利用这些短短的时间为艾克尔的歌剧到处找出版商，但是匈牙利没有人愿意出版，最后甚至把手稿也给弄丢了。他在纳吉赛班演奏《拉科齐进行曲》，被当地的日耳曼居民喝了倒采，但是他在科罗日瓦尔却得到了补偿：他的老朋友戴莱基·山道尔张开双臂拥抱他，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

插　曲

在科罗日瓦尔取得的成功补偿了一切。费兰茨忘掉了在纳吉赛班被日耳曼人喝倒采，忘掉了记者们的诽谤污蔑，忘掉了一切不好的记忆——李斯特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忘掉坏事，这使他一生都避免了考虑如何进行报复的烦恼。他写信给维也纳和佩斯的朋友们：

“在所有活着的艺术家当中，唯有我能够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其他人总是在国内的吝啬公众的浅水里艰难地挣扎，而我却能够在一个伟大民族的公海上自由地扬帆遨游。北斗星告诉我：我的祖国匈牙利会有一天为我感到骄傲！”

人们在他的住处前举行了火炬游行，对他表示敬意。这不是一般的火炬游行，而是深情火流的运动。过了几天，费兰茨到科尔托村去拜访老友戴莱基·山道尔。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秋天。在红叶满树的小林子里，点缀着白霜，天空呈现乳白色云彩，显得格外清新，看来不久就要下雪了。但是中午天气十分暖和，坐在屋檐下晒太阳，不仅可以沐浴在十一月灿烂的阳光中，而且可以享受到它轻轻抚摸时的温暖。他们两人对坐着。戴莱基说：

“费兰茨，不久前，我国一些著名的反叛者维赛雷尼·米克洛什①、科苏特·拉约什和他们的支持者就在这张桌子周围聚会过一次。你是从远道来的，又是一个客人，因此你很难体会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我们在亚洲式的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指路明灯。他们使我们看清了可怕的现状：全世界都在以神话中的巨人脚步快速前进，而我们国家却还处在犹豫徘徊、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困兽互斗和嫉妒成风的时代。科苏特的火把不仅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而且点燃了我们的心中之火……只有点燃了革命之火，我们才能摆脱这座废墟，否则它将坍塌下来，把整个国家全都埋葬掉。这座废墟就是同奥地利的共同宪法和联合协议。裴多菲也曾坐在这里。他就在这张桌

① 维赛雷尼·米克洛什(Wesselènyi Miklós，1796—1850)，匈牙利大地主。主张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是自由贵族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支持科苏特的改革观点。

子上写下了辉煌的诗篇：

这个世纪已经腐烂透顶，
生死搏斗的时刻即将来临，
光辉灿烂的日子就在前头，
手拉手，肩并肩，大家齐努力，
再也不要害怕巨人神灵。

屋檐下非常安静。两人都默不作声地坐在桌旁。过一会，又是戴莱基在说话：

“我的这位裴多菲也许比世界上任何有名的诗人都要伟大。可是，由于语言的限制，他无法在整个欧洲的天空翱翔。虽然他比别人更伟大，更勇敢，但他也只能在匈牙利的草原上拍翼展翅。国外不了解他，也无法了解他，也许永远不会了解他。谁也不会为了更细致地观察裴多菲的飞翔而去学习这种来自亚洲的语言。而你费兰茨得天独厚。你会讲任何人都能懂得的语言。你的任务是在全世界宣传匈牙利，生动地讲解我们的愤怒和腐化讲解我们鲜血满地的过去和孤苦伶仃的今天……人们能听懂你讲的话。尽管我们是那么热爱你，那么崇拜你的音乐、高尚灵魂、匈牙利血液与性格以及你的慈善的人道精神，尽管我们是那么希望你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我们还是认为，只要你的青春尚在，只要你还有力气，你最好还是在世界各国遨游，宣传匈牙利的苦难与斗争。用你的音乐来宣传。你要驱散人们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匈牙利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民族只是一具在广阔的欧洲大陆上踉跄徘徊的活尸体。这种观念正象一条绞索似的套在我们的脖子上。你应该在全世界演奏钢琴，通过你的音乐语言让人们至少用自己的心灵感觉到：一个能这样哭泣和欢笑的音

乐的国家，一个有象战鼓一样狂吼、象夜钟一样宁静的音乐的国家，该是多么美好的国家。”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米盖什·亚诺什伯爵、贝特兰·加波尔和其他好多人都来戴莱基家探望费兰茨。戴莱基弄来了一架钢琴，并且派人骑马跑遍附近各村，邀请男女老少都来听费兰茨的音乐表演。在戴莱基和费兰茨的脸上，谁也没有发现，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讨论了国家大事。在这临时组织起来的联欢晚会上，人们一边大杯大杯地喝葡萄酒，一边不停地演奏音乐。黑皮肤的吉卜赛人波奇和穿得整整齐齐的李斯特两人共同为大家助兴。费兰茨自己也舞兴大发。按照当地的习惯，晚会持续了两天两夜。人们轮流休息、睡觉。在主人休息的时候，由贝特兰或戴莱基的表侄负责主持晚会。如果哪一个男舞伴因为喝酒太多或者太困而脚步不齐，马上就会有另一个男人上来顶替，因为妇女们是不能没有舞伴的。晚会结束后，费兰茨乘马车回到科罗日瓦尔。在这里，有三场音乐会（一八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三日）等着他。

演出的结果是，费兰茨不得不偷偷逃离这座城市。他的朋友们故意把他的马从马厩里牵走，马车轮子上的钉子也给卸掉，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他离开这里。但是贝洛尼比这些“阴谋分子”强多了，不知他从哪里又弄来了一辆马车。人们所崇拜的李斯特走了。他沿路又穿过许多偏僻的乡村和节日盛装的城市，越过大大小小桥梁，跑过坚硬的石子路和松软的土路，最后来到了布加勒斯特。在这里，他为热情的听众演奏了《罗马尼亚狂想曲》。接着，又继续往东，一直到了基辅。在这里，他又重复了科罗日瓦尔和布加勒斯特的胜利。费兰茨要在好客的基辅城度过一八四七年的二月。勤奋努力的贝洛尼忙得满头大汗。因为基辅音乐会举办人原定的计划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音

乐会场次必须增加六倍，贝洛尼不得不重新安排整个日程。当然，这些增加的场次都是义演。贝洛尼用他那好听的抒情式的意大利话不断地诅咒。在一场义演音乐会休息时，他发疯似地冲进演员化装室：

“艺术大师……这里看来发生了某种误会。我们最好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有一位女士，我想说，有一位贵族夫人用一千卢布买了一张门票。这比最贵的票价还要高一百倍。”

费兰茨在他的一生中对钱从来不感兴趣，所以现在也不想分担贝洛尼的紧张情绪：

“这位夫人一定很有钱。她肯把钱花在基辅孤儿院上，那再好也不过了。”

贝洛尼还是不肯罢休：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以您的名义写张条子，对她这样慷慨的行为表示感谢。”

“行。请您起草一封信，我来签字。”

秘书先生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突然生气地拍了一下额头：

“糟糕……我竟连这位夫人的名字也不知道！”

费兰茨上台的时间已到，只好边走边说：

“那您就去了解一下吧，贝洛尼！”

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贝洛尼就把一切情况都弄清楚了：“夫人的全名是萨伊——维特根斯坦·卡罗琳女公爵。父亲彼得·伊凡诺夫斯基，母亲巴尔明·波多什卡。女公爵今年二十八岁，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九岁（说到这里，贝洛尼做了一个无法模仿的鬼脸）。家财万贯。领地上有三万农奴，丈夫萨伊——维特根斯坦公爵，是德国人的后代，现在是沙皇宫中的宠臣。他的祖先没有从德国带来任何其他东西，只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族徽，确是艺术珍品，上面雕着银河金龙、手持长刀的勇士和顶着王冠

的十字架。但是除了这些以外，他们来到这里时一无所有。据说，这位尊贵的老爷还继承了容克贵族的家风：对上面卑躬屈膝，对那些因命不好而归他管的下人凶暴残忍。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沙皇十分宠爱他。但是沙皇并不喜欢他的夫人。外面传说，这位夫人是一个坚定的波兰爱国主义者。起先，她还只是同作为沙皇宠臣的丈夫分居，以后干脆连信也不给他写了。现在两人已经完全分开，如同陌路人一样。公爵只是领取赡养费时才到她家去一趟。因为在这个一切都颠倒过来的世界里，要由巨富的夫人倒贴，而乞丐似的丈夫只好伸手。几年前，由于父母的严命，他们勉强保持着婚姻关系，女公爵还生了一个女孩。但她根本不认识亲生父亲。这位沙皇宠臣也从来没有想到去看她一次。”

费兰茨正在理发，他只能简单地提一、二个问题：

“这位付一千卢布的夫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不幸的生活。她的父母生前也是经常吵架。父亲彼得·伊凡诺夫斯基象个乡村的古希腊学者第欧根尼，对三万农奴又打又拉，脾气多变。他用拉丁文读塔西陀的作品，用希腊文学柏拉图的著作，用英文诵吟拜伦的诗，用法文阅览拉马丁的书。读普希金时用俄文，读歌德时用德文。当地人说，这个老头到晚年时眼睛全瞎了，于是只好让女儿为他读书，而且要她用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当然还有波兰文朗诵给他听。小姐聪慧异常，她被迫用哪一国的文字念书，以后就学会了哪一国的文字。而且脑中记下了成千上万的诗句、警句，背诵如流，犹如天主教神父做弥撒时念圣经一样。以后她不仅要替父亲朗读书本，而且还不得不出面检查账目，巡视仓库，同那些小偷似的官吏打交道，给银行和贪财的商人写信……总之，这位伊凡诺夫斯基小姐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女人。

人们说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的脑子是那么好使，以致她家同别人打官司时从不用聘请律师，因为小姐自己就精通法律。不过上面所说的这一切还只是对小姐培养教育的一个方面。她不仅要侍候盲父，而且每一年还要在母亲那里住三个月。母亲认为，当地的气候、景色、许多无知的人和泥泞的道路对她身体健康有影响，因此无论她是到德国的卡尔斯堡和巴登，还是到法国海边或者瑞士山区，总要带着卡罗琳，以便把一切烦恼、痛苦、无病呻吟和孤僻性格都抛在脑后。小姐就这样跟着妈妈学会了如何大方自如地进行社交、花费金钱和统治别人。凡是谈到女公爵的人都一致认为，她是个统治人的女王。违抗她的意志，那肯定是要倒霉的。男人在她的眼里连狗都不如。因为她已有两个榜样。一个是她的父亲，他尽管博学多识，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依靠一个小女孩的智力和体力来生活。一个是她的丈夫，尽管他穿着神气十足的近卫军官制服，向人们炫耀祖先传给他的贵族身份和沙皇对他的宠幸，但他还是不得不鬼鬼祟祟地伸手向自己的老婆讨钱，因为没有她的金币，他就会变成一钱不值的空心娃娃。”

费兰茨温和地容忍着理发师在他的脸上施展自己的高超艺术。满脸的肥皂沫使他不得不讲短话：

“现在该怎么办？”

“我已经向她提出，我们将登门拜访她，艺术大师。她答应后天在沃罗尼茨等我们。到时候，女公爵将派马车来接我们。”

第三天，女公爵的马车果然来了。费兰茨想把贝洛尼也带走，但是站在旅馆房间门口的身高两米、手中拿着大帽子的巨人摇着头说：“女公爵命令我只带一个人走。”

几乎过了快一个星期费兰茨才勉强归来。贝洛尼反复追问他，但他一句话也不回答。直到第二天吃午饭时，他才向贝洛尼

谈了一些情况：

她是一个特别的女人。她在大门口等着我。手里捧着一个大面包和一小碟子盐。她说，这是波兰农民的习惯，神父、贵族或国王到他们家里来时，他们就是这样款待客人的。她带我走进了别墅，大部分是木结构的，但是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一个西欧人连做梦也不敢这样想。地上铺着美丽精致的地毯，墙上挂着镶有宝石的古画像和可能在古战场上使用过的武器。我们坐下还不到半小时，她就开始教训起我来：

“您在社会上被人们带坏了。您不做祷告。您肯定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向上帝忏悔过了。”

我只笑了一笑，想避开这个尴尬的话题：“那好吧，我就向您忏悔吧！我感到疲倦。这不是筋骨和躯体的疲倦，而是对生活感到的疲倦。”

她看了看我，用纤细的小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谁感到疲倦，上帝就会把谁叫走。感到疲倦的人可以在上帝那里找到安慰、欢乐、力量和对生活的信心……”

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话弄得我很不安，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谈过这类问题了。我想摆脱这种压力，因为她的话分量很重，压着我的肩膀，迫使我跪下。我接着说道：

“我在社会上流浪已经快三十年。在这些岁月里，我所看到的教会的奴仆们大多是制造是非的阴谋分子或者是善于走后门的政治家。”

她又把目光投向我，象一盏灯那样照着我的脸。它照得我不得不眯上眼睛、内心惭愧地躲开它的光线。她说：

“您不要把教会的一些不称职的神父同上帝混为一谈。如果耶稣再次降临人间，他肯定会象对待叛徒一样把他们赶出教堂。”

我试图用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转移话题：

“夫人，请您给我一点信仰吧！我想，即使您把您信仰宝库中的东西分一半给我，我们两人也会感到宽裕自如的……”

她也看到这种话题对我来说不那么愉快，于是就此结束了谈话，把我带到音乐厅。在那里放着两架钢琴、一架竖琴和其他一些乐器。“我希望您能碰一下其中某一架钢琴。”她用一种无法模仿的孩子式的天真态度说：“因为这些钢琴现在在这里只是值钱的家具，如果被您的手摸过，那就会成为珍贵的圣器。”

我弯下腰吻了吻她的手，她又接着说了下去：“您的每一次音乐会，我都在场。最初抓住我的心的是一首幻想曲。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以后我的思念被您弹的贝多芬奏鸣曲所吸引。现在我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您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得天独厚的艺术家。不久前我在天主教堂听到了一首风琴曲，我向演奏者打听这是谁的作品，他说是李斯特·费兰茨的。现在我才终于明白，您不只是杰出的音乐家和演奏家，您是上帝赋予天才的少数特殊人物当中的一个。”

午饭后，她把我带到客厅。桌上放着一套非常精美的古代银制文具。在装墨水的银瓶上雕塑着三个艺术形象：阿波罗、俄耳甫斯、普罗米修斯。女公爵说：“请接受这件小小的礼品作为纪念。在您身上同时具备着这三种神的特点……阿波罗给了您光辉照人的形象，俄耳甫斯使您得到了他动人的音乐旋律，普罗米修斯让您继承了他的崇高使命，把火带到人间，把感情之火带进人们的心灵之中。”

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管家（这个家伙差不多也有两米高）走进来，把我领到我的卧室。这间卧室可以说是巴黎的奢侈和鞑靼汗王的豪华的混合物。早晨，有人轻轻叩我的房门。又是那位管家。他的德语讲得很蹩脚，但是还能听得懂：“我们在小

教堂做弥撒，女公爵恭请阁下光临。”

我没有办法，只好赶快起床，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就赶往家庭小教堂。在那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变了样的公爵夫人。昨天晚上，她是来自巴黎的火花，她讲的法语是一个只有精通雨果、拉马丁的人才能讲得这样美的法语。可是在今天早晨，她完全沉浸在祷告之中，变成了一位虔诚无比的波兰妇女。我在一旁只是等着她长出翅膀，象仙女一样消失在昏暗的教堂拱顶上。我没有心思做祷告，一直在观察跪在我旁边的女主人，心里老在想：人的性格是多么难以捉摸呵！她的灵魂是由多少细丝织成的呵！在整个上午，我的哲学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卡罗琳女公爵向我介绍了她唯一的女儿玛格尼。介绍时，三条长毛狗、小姑娘和她自己正在客厅的鞑靼地毯上滚来滚去，她们边叫边笑，抓住狗的长毛，撩起自己的裙子，这样做，在一个知书明礼的天主教徒家庭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上午举行了小型音乐会。我为小姑娘、妈妈和三条象熊一样壮实的狗专门演出了一次。不过这场音乐会并不是根据阿波罗、俄耳甫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精神进行的，因为小玛格尼喜欢躲在钢琴下看我的脚怎么动，然后爬上我的膝盖，搂抱着我，用标准的法语轻轻对我说："你应该永远住在我们这里……我非常喜欢你，据我看，妈妈也很喜欢你……"可是到了晚上，她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女公爵。她穿着黑色的衣服，乌黑的头发散在两边，遮住了太阳穴，显得特别纤细、娇弱和可怜。她把自己的日记读给我听。这是非常感人的作品。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父母就强迫她嫁人。见过世面的妈妈把刚满十六岁的女儿嫁给维特根斯坦公爵的理由是："我不能把你嫁给俄国人，因为这样做会招至波兰人的仇恨；我也不能把你嫁给波兰人，因为他会把你的财产全都浪费掉；还是把你嫁给这个德国人吧，他既不是肉，也不是鱼，只是一个德

国人。你应该感到高兴。他至少不会在不高兴的时候打你……”这真是一部痛苦的日记。能够从字里行间读书的人马上会懂得，她是想逃避现实。她想抛弃一切，开始新的生活，即使新的生活会使她变得一无所有，她也心甘情愿。语言的力量和速度可以超过意愿、意志和设想。我对她说：“也许我能帮助您开始这种新的生活……”她看了我一眼：“您是我唯一能够共同开始新生活的人……”我吻了吻她的手，以感谢她对我的信任。这一天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她坐马车赶往一处远方的领地，因为那里有个女农奴生病了。在这种时候，她既是医生和护士，又是施舍人。她经常帮助那些缺吃少穿的人。第二天，我们又在一起。她说：

“正在成长的少年已经穿不了原来的衣服，您也不能再继续过流浪生活了。”

“我该怎么办？”

“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应该提这种问题。您应该创作。您应该为人类创作不朽的作品！”

“如果我有家，有安身的地方，也许我可以试试看。”

“听说您同魏玛宫廷签有合同。”

“这只是三个月的休息。九个月的时间还得花在流浪生活上。”

“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在那里呆一年，我就担心您不愿意。”

“魏玛不是我的祖国……”

“您是匈牙利人？”

“是的。”

“我们了解匈牙利的命运。我们两国的人民是兄弟。在波兰没有一个人希望肖邦回到自己的祖国来。相反，如果他真在

国内，人们会想方设法让他逃出国境，把他送回巴黎，要他在那里为我们波兰人讲话、歌唱，向世界进行宣传。我从前一个匈牙利人也不认识，您是我有幸认识的第一位匈牙利人。但是我敢肯定，每一个人都会对您讲我们波兰人对肖邦讲过的话。”

我们在音乐厅里共同度过了夜晚。玛格尼很快就睡着了，三条小熊狗也出去了。看来它们宁愿听外面风声的呼啸，也不想听我弹的钢琴。我已经演奏了很长时间，她插空问了一句：

“刚才弹的是什么？”

“《但丁奏鸣曲》……”

她仔细打量着我：

“您了解但丁吗？”

“他的作品我全能背下来……”

她想了很久，然后起身走到书柜前，拿出一本软羊皮包着的《牧歌》来朗诵。她的意大利语发音听起来好象她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最后她放下了书：“这部作品当中有很多思想，就是用您的钢琴也无法全部表现出来，这需要一个大乐队。需要一个大型交响乐队，它能把人带到越来越高的天空，带进天堂，受到圣贤们的欢迎。”

同女公爵谈话是最愉快不过的事。就象两把铁锤在打铁一样，火花和火花都并在一起。两个人的思想火花也并在一起，不断互相启发，越谈越深。我已经在开始构思我的交响乐了：“我想让但丁的思想反映在音乐厅的巨大布幕上，我有许多画家朋友，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地帮助我完成这部眼、耳、心共同享受的交响乐……”

女公爵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认识一个人，她愿意出十万卢布来完成这项事业。”

我没有追问这个人是谁，因为女公爵发红的脸已经告诉我，

这个人就是她自己。最后，我们谈定，等这次演奏旅行结束后，我立即返回沃罗尼茨。

贝洛尼对费兰茨的汇报感到失望。他使了一个不信任的眼色：

“就是这些，阁下？”

费兰茨局促不安地站了起来：

“贝洛尼，我对您还有一些严肃的话要讲。我们两人的口头协议到一八五〇年期满。如果我放弃我的艺术生涯，那对您将是一次严重打击。您让自己的生活同我联系在一起，而我却要离开您……当然，我会负责赔偿物质上的损失。”

贝洛尼沉默很久后说：

“我没有任何物质要求。我在您身边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种黄金时代就要结束，使我感到非常伤心。我看得出，您这个决定已是最后的决定……”

马车又在公路上奔驰。在小小的桌子上有一封法文信，是写给卡罗琳女公爵的：

> “卡罗琳，请您相信，我将象罗密欧一样傻，如果我们认为他做的事是傻事的话……我要为您歌唱，只爱您，为您找寻欢乐。我要使您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有了您，通过您，为了您，我才相信爱情。没有这种爱情，我再也不需要地，也不再需要天。我唯一的、光荣的情人，让我们相互爱着吧！我向上帝，向救世主耶稣发誓，任何人也不能拆散上帝安排在一起生活的情侣。”

同时，他还给玛丽寄了一封快信：

“您知道吗？我在基辅偶然认识了一位非常杰出、非常非常杰出的女人……为了同她谈几个小时的话，我愿意多走成百上千公里的路。”

贝洛尼什么也不再问了。他仍然是一个勤奋的普通秘书。但即使不问，他也很清楚这些信是写给谁的。如果有人逼着问他，这两封信里写的内容是什么，他一定能回答个八九不离十！

这是同贝洛尼相处的最后一天。贝洛尼还是同平时一样，最后一次整理费兰茨放得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整天都在工作。来往信件排得整整齐齐。重要的信件单独放着，准备随时答复。各种合同都放在一个夹子里，旁边有一张安排得很好的日程表，使费兰茨一看就知道，他什么时候需要在列日、安特卫普、奥斯坦德和布鲁塞尔演出。贝洛尼还是象平时一样愉快而亲切地做这一切工作，根本不让离别成为套在费兰茨脖子上的负担。临别时，他又重复了过去讲过的老话：

“亲爱的艺术家先生，只有当您没有钱的时候，钱才会成为您的敌人。当您开始积钱的时候，钱就差不多是您的朋友。如果钱袋逐渐鼓起来，钱就会比兄弟还亲，比最好的医生和伴侣还要好……钱是最好的顾问……”

费兰茨激动地搂抱着意大利人的肩膀：

“多么奇怪，您自己从来也没有按照这些话来做。您是无私的、可爱的、勤奋的，贝洛尼……您不要把自己装成一个贪婪无情的放债人！”

贝洛尼的眼睛有点润湿了：

“如果形势要求您继续过光荣的流浪生活，决不要忘记我贝洛尼。只要您召唤一声，贝洛尼就会来到，就会飞到您的身边！”

第六章 瞭 望 塔

肖 伯

奥地利皇帝派驻魏玛使馆的首席参赞肖伯侯爵在离开几个星期之后又返回魏玛。维也纳政府恢复权力后，曾召回它驻在各国的代表。肖伯说（当然只是对费兰茨和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这样的密友才会说）：“匈牙利的革命火焰正在迅速蔓延。哈布斯堡王朝还未能稳住脚跟。维也纳起义的伤痕也还没有痊愈，但他们又开始了新的阴谋活动，企图重新恢复对德国地区的统治权。”在政治上，肖伯已是一个感到厌倦而且十分失望的人，所以他不愿为皇帝的蜘蛛网再增添多少网丝。但他写日记倒是十分努力，其中还记载了朋友李斯特·费兰茨在佩斯、布达的成功演出。现在他回到魏玛，热切希望继续了解费兰茨今后的命运。费兰茨把他带到自己住处最安静的角落——书房，毫无保留地讲起来。现在讲的事是他一生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给您的最后一封信是从沃罗尼茨发出的，信中请求您帮助我们进见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女王公。您很快就回了信，说女王公已经为我买下了小小的阿尔滕堡宫，这足够我们两人住了。女王公希望我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不要同居，以便对外保持原来的关系。于是我住在旅馆，维特根斯坦女

公爵住在阿尔滕堡。这是计划。在计划实现之前，我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首先，卡罗琳必须逃出俄国。她得到消息说，维特根斯坦家族为了抢夺卡罗琳的巨额财产，打算把她关进寺院，借口是她有神经病，但考虑到她的贵族身份，不好把她关在普通疯人院里，只能请慈悲的修女们来管教她。卡罗琳不得不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准备逃走。有一天，一个非常敬佩卡罗琳博学多才，经济上也得过她好处的边防军军官派骑兵送来一封信："沙皇降旨，由于整个欧洲都发生了骚乱，立即封锁俄国边界。我还没有宣布这项命令，请您赶快乘此机会逃走。"于是卡罗琳不顾狂风大雪，用大皮袍紧紧包住小玛格尼，带了一些最心爱的什物和一部分金钱，马上出发。我在朋友李克诺夫斯基的领地上等了好几天，也没有见到她们的踪影。后来，李克诺夫斯基派出了巡逻骑兵去搜索，好容易才在大雪中找到她们。最后一段路她们是步行过来的。小姑娘已经完全昏迷过去，但是卡罗琳坚毅不屈，象一个圣徒或者疯子一样，在冰天雪地中为孩子开路。李克诺夫斯基摆下盛宴招待我们。第三天，他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告诉说：这里离边界太近，他无法保证安全。他打算马上用车送我们走，到另外一座别墅去住。

没有时间再犹豫。我们又出发了。我们穿过无边无际的加里西亚平原，不顾漫天大雪，不断克服恐惧的心情，拼命往前赶路。一路上换马时，驿站站长都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消息：狼群包围了各条通道。我们逐渐接近捷克边界的时候，狼群袭人的危险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危险：整个国家都在动乱之中。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骑兵队伍，带着用帆布遮盖起来的大炮向前挺进。开路的军官粗暴野蛮，宪兵沿路大喊大叫，骑兵胡作非为，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骑兵冲过来传令："老百姓都走开，不许妨碍部队前进！"我们只得拉紧马缰，把车往路边

赶，一不小心马车就陷进泥泞的雪地里。一路上多次出现过这种情景，但我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赶路。在路上，激动人心的消息以一种神奇而无法解释的速度传开：全世界都爆发了革命……拉德茨基的部队被赶出了米兰；国王在巴黎垮了台；布拉格人把两头鹰的王徽全取下来了；匈牙利，我那美丽而粗野的祖国，建立起一支又一支义军，诞生着一个又一个英雄……不知道是什么动力在传播这些消息，使我们在路上就了解到一切有关情况。有的是在酒店里听到的，有的是在院子里传到耳朵里来的，有时在骂人的话中也会听到某一个人的名字。很多波兰难民向我们讲述事情的经过。他们讲得那么认真、虔诚，仿佛是在为自己做最后一次祷告。我们不顾一切艰难险阻，继续往前走。在格拉茨休息了几天。卡罗琳催我直奔魏玛，但是我的血液、好奇心、爱好和流浪鸟的性格要我走另一条路……我不愿表现得比现实中的我来得差。一种奇怪的火焰在召唤我。这种火焰在平时的阳光下是很难看得见的，但是在危险的夜晚却显得格外明亮。这种火焰就是祖国！祖国在召唤我！我从格拉茨转往维也纳，然后从维也纳直奔匈牙利边界，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到达绍普隆，接着又继续往东走，赶到基什马尔顿。在那里只呆了几分钟，朋友们就把我围上了。我这时又想起了费兰肯柏格对我说过的关于两个营垒和被迫选择的话：我必须决定，究竟站在哪一边。在绍普隆和基什马尔顿的朋友们为了我而激烈争吵。这个说："匈牙利民族正在自杀，正在走向彻底毁灭的深渊。"那个说："拉科齐的精神复活了，自由的旗帜又重新树起来了！"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我明白，尽管我只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但是对两个营垒来说都有一定的分量。我走遍了波兰、捷克、奥地利，知道一支强大的军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向小小的匈牙利包围过来。要把这些情

况告诉他们吗？这样做等于是抓住一个正在战斗的勇士的手说："投降吧！聪明的胆小鬼活得比疯狂的英雄更长久！"但是，如果我不把这些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不让他们知道成百万的步枪、刺刀、大炮、长矛、利剑、匕首正在向他们袭来，那我不是在说谎吗？我徘徊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办。卡罗琳拉着我的胳臂，说："赶快离开这里吧！这里正在播撒光荣的种子，但是很快就会收割死亡！"我得承认，不是向首席参赞肖伯承认，而是向在佩斯—布达以我祖国和民族的名义欢迎过我的诗人肖伯承认，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去佩斯吗？只有穿过正在战斗的革命阵地才能去那里。回维也纳吗？奥地利首都同我有什么关系？还是转回魏玛？卡罗琳又挽着我的胳臂，说："只有孤芳自赏的人才会犹豫不决。信教的人应该祷告。如果他的良心是干净的，他就会得到耶稣的启示。"这时，在我的脑海中，圣西门的理想主义在召唤我，海涅的形象在嘲笑我的困窘，我还想起了大卫对我的教导和我在里昂学到的一切……感到了罗马教会的冷酷，回忆起教会使我离开、抛弃它的种种失望情绪。现在人们正从两个方面拉我这个盛着徘徊观望和怀疑恐惧之水的瓶子——一个快要裂开的瓶子。一个人处在这种境地，往往容易被比较有力的那一只手拉过去。我走进了基什马尔顿的教堂。在讲坛宣讲圣经的是阿尔巴赫·桑尼斯洛神父。过去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在佩斯时，常常听人提起他。教会把他赶出了首都，说他讲经时太容易使人想起巴黎的宗教分裂主义者拉曼内斯神父了。现在他正在讲经。他唯一的和非常明确的思想就是：热爱你的祖国，为她作出牺牲，即使需要你为祖国献出生命，也应该在所不惜。祷告完毕后，教堂的小教童走过来通知说：神父在内室等候我们。阿尔巴赫神父比我还高出一个头，身材细长。他只看了我们三人一眼，就邀请我们同他共进午餐。卡罗琳想方设法要吻他的手，

但是他避开了。他请我们坐下。这顿午饭吃的是肉汤、面包、煮肉和几个又大又光的苹果。阿尔巴赫看来不仅是神父，他还能看透你的灵魂。在我还没有把心事讲出来之前，他就开始开导我了：

“您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今天，您是唯一对这个世界有点分量的匈牙利人。如果您和我们一起牺牲（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得到的只是一颗在欧洲天空唯一代表着匈牙利精神和灵魂的明星的陨落。我现在不是劝告您，而是命令您。我作为神父，作为年纪比您大，并且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现在准备死在这里的匈牙利人命令您：赶快离开匈牙利！不要再有任何犹豫！一些胆小的人或者今天被人们称之为投机分子的人，都跑到国外去淘金。我以整个民族的名义对您说：今天，您是匈牙利精神财富在国际上唯一的代表。您的任务是以最高尚的‘投机分子’的名义在国外积累黄金，不要使自己受到任何伤害和损失。”

我本来还要让卡罗琳看看多波尔扬村，因为我心里有个计划，想把我家三代人生活过的旧房子买下来。但是我们只到了多波尔扬村的边缘上。我只能老远地给她指点这栋房子在那里，因为马车要赶往维也纳。阿尔巴赫神父一再叮嘱我，决不要放弃这唯一的机会。我们回到维也纳后，立即转往魏玛。女王公亲切地接见了卡罗琳，并且答应同沙俄驻魏玛的大使马尔第茨谈谈，要他马上写信给自己的兄弟、俄国统治者，请协助解除维特根斯坦·米克洛什公爵和卡罗琳公爵夫人之间的婚约。她还请大使把此事转告莫斯科红衣大主教，请他也助一臂之力。离婚的理由（这是卡罗琳从教会法的深井中好不容易才挖掘出来的）是女方在结婚时还是个小孩。父母包办的婚姻无论从教会法还是从世俗法来看都是无效的。谈完话后，卡罗琳搬进了阿尔滕堡，我住在艾尔布林茨旅馆。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吃饭。孩子的女家

庭教师安德桑小姐也来了。不久，我厌烦了这种假仁假义和愚蠢暧昧的生活，干脆搬进了阿尔滕堡。一些小市民开始有议论了，但是魏玛的几个革命者却大为高兴："看，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战士！"上层社会人士对这件事表示不满。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女王公一再写信催沙皇，几乎是在哀求他让这两个"罪人"走上世俗和基督的正道。可是马尔第茨大使先生向俄国宫廷发出的报告讲的都是坏话，反而破坏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不过我这种说法只是基于分析，而不是真抓到了他什么证据。由于音乐家可耻的私心，我无法理解卡罗琳、马尔第茨和巴甫洛夫娜她们的计划。我只去管我的乐队。乐队里的人见到我，就象羊群见到狼一样。他们背着我议论是非，一看见我就又马上散开。他们在背后甚至说我不识乐谱，所以我只好装着不看乐谱也能指挥，以免别人发现我连上帝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以后又传出谣言说，我在指挥演奏《马尔他》时，放下了指挥棒，只用空手比划，活象一个掉在水里快要淹死的人……连拿指挥棒这种最基本的动作也不会的人还能算什么音乐指挥？接着他们又在练习时故意捣鬼：中音部调音不准，铜号不能及时赶上节奏，黑管把四分之一拍变成了二分之一拍。他们想试试看，这位在全世界弹遍了钢琴的音乐指挥先生，这位从来不懂什么是乐队的音乐指挥先生，究竟能不能发现这些毛病？我只好一个一个地纠正他们，我给黑管演员吹了一下黑管，教他应该怎么吹，然后又把那个有意胡闹的小提琴手叫了起来，心平气和地告诉他："有好多作品，我都能凭记忆背出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音乐家敢同我开玩笑。"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之间的合作才开始有所改进。有一天，乐队领队把我拉到一边，说："指挥先生，我们已经习惯过去的指挥所定的拍子。请别生气，如果改变节奏，我们会演不好。"我回答说："你们的节奏还不够有力，音乐指挥在乐队这艘船上的作用不是

水手，而是舵手。我不能只满足于喊喊一、二、三，不能只是摇摇指挥棒。我的任务是用这根小棒，如果我厌烦了的话，也可以用空手把你们带进一个新的世界，使你们听到过去没有听过或者根本不想听的音乐。我这两只手要把你们带进舒柏特、韦伯、梅耶贝尔、柏辽兹、舒曼和瓦格纳所想象的音乐境界。”

在这段时间里，我正好得到一部《汤豪塞》序曲。刚看完第一页，就感到不错。再看几节后，觉得它非常好。过了一会，我急匆匆地去找卡罗琳，因为她是我的亲信，也是我的检查员。她常常能巧妙地使我过分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我坐在钢琴旁说：“卡罗琳，您听着。我认为我发现了一部本世纪的优秀作品。”弹完后我问她：“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她回答说：“您应该在下次音乐会上介绍它。”可正是这次演出引起了魏玛的第一次风暴。我要求加强乐队，因为我那可怜的弦乐组无法拉出《汤豪塞》哭泣和喊叫的深沉感情，但答复是没有经费。后来问题又有进一步发展。宫廷里有些老爷提出：“这些音乐会究竟有什么意思？李斯特先生可以到王宫里来弹他的钢琴，别去管剧院和乐队的事。在剧院里演演滑稽戏，变变魔术，耍耍狗熊就行了，如果公众非常想听音乐，可以演上一、二场意大利歌剧，但不能再多了，否则会变成坏事甚至是危险的事。”这些蠢话是这几位老爷对歌德的剧院讲的。有一次，我在艾尔布林茨会见几个音乐家，从邻近桌上听到曼戈尔德参事先生在那里向同桌人大发谬论。他实际上是在说给我听：

“我们再也不需要《汤豪塞》这样愚蠢的东西了。”

“参事先生，我的右边有一群驴，左边也有一群驴。正如您看到的，我前面有一群驴，后面还有一群驴。但是这些驴不能阻挡我，我还是要在我的道路上向前走的。”

第三天，宫廷法院传我出庭（他们不愿意搞公开审判，免得

市民们幸灾乐祸)。宫廷的总参事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发问：

“您用的那个侮辱人的词(总参事的身份使他不便说出“驴”这个字)指的是谁?”

“总参事先生,我是一般指在魏玛的两条腿的驴。”

“曼戈尔德参事先生可以认为这个字是指的他吗?”

“可以。”

“您愿意向他赔礼道歉吗?”

“我不愿意,总参事先生。”

“您知道这样做是破坏宫廷内部的秩序与和平吗?”

“总参事先生,我不接受您这种说法。我是搞音乐的。如果您不认为是不谦虚的话,我也可以说,我是艺术家。我认为,瓦格纳的《汤豪塞》能丰富我们的节目,扩大群众的视野。有人从来没有搞过这种复杂的行业,但他却站出来把我的辛苦劳动,把我们音乐家的自我牺牲精神说成是愚蠢的东西。侮辱人的不是我。不过我不要求他赔礼道歉。”

总参事最后站起来宣布：

“我判罚魏玛宫廷特任音乐指挥李斯特·费兰茨二十福林作为宫廷慈善事业基金。你们同意判决吗?”

我没有回答,但是拿出了一百福林放在桌上:“搞慈善事业,我从来不反对。”

在这以后,我下了决心:既然要斗,那就斗到底吧!这时正好索菲亚公主要过生日,魏玛的各种团体、学校、行会都在积极筹备庆典。我计划演出全部《汤豪塞》来作为祝贺公主生日的礼物。既然我已经出了一百福林,这个官司就还得打下去。卡罗琳准备去德累斯顿,因为她怀疑马尔第茨大使扣押了她的离婚申请。她决定自己直接写信给沙皇,但信不能从魏玛邮局发出,而要从德累斯顿寄出,因为她估计马尔第茨大使也能控制魏玛

的邮局。我对她说:"您反正要离开这里去德累斯顿, 在那里最好找个机会看看《汤豪塞》的演出。讲老实话, 我同瓦格纳的第一次会见并不是很愉快的。我不喜欢他的音乐, 也不大喜欢他这个过分自尊的人。最好能有一个完全没有成见的人去听听他的音乐。"第三天,卡罗琳回来了,情绪很高。德累斯顿剧院经理对她说:瓦格纳是个很骄傲的人,他受到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人的拥护,但他这部《汤豪塞》可以与莫扎特、贝多芬和韦伯的作品比美。卡罗琳没有同他辩论。晚上, 她坐进包厢观看了歌剧。演出结束后,她又到幕后去探望了瓦格纳本人,并且告诉他, 魏玛剧院将努力使魏玛的演出至少是接近(如果不是超过的话)德累斯顿的水平。瓦格纳很快就给我寄来了总乐谱, 并且写了一封文笔动人的信。他的散文至少也同他的音乐风格一样美。音乐排练开始后, 我和宫廷经济部门之间不断发生争执。为一把小提琴、一块幕布、一个铁钉或一桶油漆, 都要进行一场斗争。另外在思想领域也得斗, 因为曼戈尔德参事们在继续搞阴谋活动, 并且想方设法到处整我。最后总算要正式演出了。瓦格纳先生的上司看来也和曼戈尔德这帮人差不多, 他们竟然不让瓦格纳到魏玛来参加自己作品的演出典礼。会成功吗? 这里不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而是一场极度紧张的考验问题:乐队到底行不行? 我能把这个可怜的从未这样演出过的小歌唱队发展到什么程度? 最后,我们演出胜利了。这是一次重大的、荡涤一切的胜利,甚至那些庸俗市民也参加了鼓掌者的阵营。这些人总是心惊胆战地参加胜利的一方, 因为他们生怕别人把自己看作是落后保守或者愚昧无知的人。

我没有很多时间去享受成功的欢乐, 因为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三日,瓦格纳本人来到阿尔滕堡。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也是我终生难忘的。瓦格纳对我说, 他现在使用化名阿多尔夫·瓦

也德曼博士，因为他参加了德累斯顿的革命战斗，所以不得不逃出来，现在没有任何其他出路，只好丢下妻子、家庭、金钱和一切希望，到各国去流浪。我们让他在艾尔布林茨很快安顿下来。卡罗琳和瓦格纳谈了一次话。尽管我曾经有机会同雨果、拉马丁、乔治·桑和拉曼内斯神父坐在一张桌子旁交谈，但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类似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这两个人都散发着思想的火花，倾倒着使人深思的论证，一个人讲完一句，另一个人就接着发挥。如果不是我了解卡罗琳多么爱我，那我肯定会认为他们是在谈恋爱。哦，上帝，这个小个子是多么会讲话呵，他不仅仅具有黎恩济的风度和汤豪塞的感情，而且还具有话剧演员的表演才能。他既能演胆小而又想逞能的平民纠察队员，又能扮粗暴残忍的普鲁士下级军官。他既是回响在德累斯顿上空的钟声，又是在德累斯顿大广场上被刺刀刺伤腰部的革命者。他激动地谈到，疯狂的革命艺术家巴枯宁如何赞美在德累斯顿上空飘扬的、不是用丝绸而是用战火的硝烟制成的旗子，赞美正在诞生的交响乐和墙上的壁画……瓦格纳还生动地叙述了德累斯顿革命是怎样失败的，他自己又是怎么脱离战友们独自逃出来的。瓦格纳至今还心有余悸，对捉摸不定的前途忧虑不安。他也不掩饰因为摆脱了德累斯顿剧院经理而感到的幸福心情。他把这个家伙比作是一头老骡子，又聋又笨，又臭又硬。他说，自从施罗德·德夫琳特离开剧院后，剧院本身成了对真正艺术的讽刺。讲到这里，瓦格纳感动得流了泪："德夫琳特虽然皮肤已经松弛，腰也变粗，腿上长了虚肉，但是只要一开口说话，你就会相信她是真正的、唯一的维纳斯女神，为了她，汤豪塞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幸福。"

爱情是一种奇妙的化学过程，它一开始就会产生相反的变化。我的卡罗琳还只是刚刚爱上瓦格纳，但已经开始在嫉妒他。

她对我说："他占你的工作时间太多了；他使你失去了对自己计划的信心；他总是只讲他自己怎样怎样；他用话来迷人，你在他面前变成了一个被迷住了的小孩。"哦，女人们！我马上可以加一句：哦，男人们！因为现在不仅是卡罗琳嫉妒瓦格纳，瓦格纳也一样嫉妒卡罗琳。他们之间逐渐修筑起相互搏斗的阵地。卡罗琳的法语讲得非常好，甚至比一个巴黎人还要讲得更漂亮，表达得更为细致，瓦格纳的法语则讲得很蹩脚。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足，他很快就转讲德语，流畅地咒骂巴黎、歌剧、梅耶贝尔先生和可怜的音乐出版社。瓦格纳是个异教徒，是古希腊的狂热崇拜者。而卡罗琳却是个盲目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认为瓦格纳的每句话都是在亵渎上帝。两人争论得不可开交时，瓦格纳就坐到钢琴旁(他弹得很糟)去演奏他的新作品：它先是在天堂里，后来降临到人间，最后又回到上帝身边。据瓦格纳后来说，这是他的新歌剧《罗恩格林》的序幕。音乐使卡罗琳的心逐渐平和下来。她也赞成我的计划：把瓦格纳介绍给我们的保护人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让这位激烈的革命者认识一下女王公，了解她之所以能成为统治者，不仅是因为她的身份，而且也是因为她的心灵高尚。这次会见是在一座小型狩猎别墅里进行的。我对宫廷礼节多少还懂得一些。遗憾的是，我知道不仅智力上有等级，而且出身也有等级。在女王公接见时，我鞠了躬，瓦格纳也鞠了躬，不过他的腰弯得那么低，只有一个有经验的宠臣才做得出来。女王公答应尽一切力量帮助失去了面包和地位的瓦格纳。但是她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不久魏玛的报纸发表了追捕瓦格纳的通缉令，宣称不仅对他本人要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而且对那些帮他潜逃和藏匿的人也要判以重刑。我这位德累斯顿朋友以前一直把整个事情看作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冒险，只是现在才开始真正害怕起来。卡罗琳清醒地分析了形势：不管魏玛

宫廷多么喜欢艺术，如果萨克逊和普鲁士对它施加重大压力，它也一定会下令抓人。它会反对暴力，但不管怎样它还是得交出逃犯。必须赶快行动起来，要马上弄到钱、衣服、护照，然后去瑞士。瓦格纳还在犹豫，因为妻子还在德累斯顿，在那里还存放着他的一些书、浮财、衣服，特别是各种乐谱。他希望在出发之前能看到这些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卡罗琳坚定不移地说："赶快逃走，现在还来得及，以后想再打开牢门就不容易了……"这个悲观的预言起了作用。瓦格纳总算动身了。我一直把他送出魏玛边界，在离魏玛很远的地方，才叫马车停下来，让他下车。原先多么自信、有力的小个子现在一下变得那么疲倦无力，象一个早衰的小孩："我神圣的费兰茨，我非常、非常爱你。全靠了你，我才得保持一点信心。一切失望和痛苦都由于有了这样一种高尚的感情而得到补偿：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理解我和相信我的人，现在终于在你身上找到了。"他拥抱了我，但不是一般分别时的拥抱，而是象情人分手、再难重逢和令人心碎的拥抱。他哭了。我敢发誓，这是一颗纯洁的心所流出的真诚眼泪。他上了车，伸出了头，一直在摆手。我心里非常难受。他将是个打开音乐史新篇章的人，至少他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他不需要紧张地逃跑，如果某一个愚蠢的宪兵不打他的话……但也很可能不是打他，而是枪毙他。

肖伯早就停止做笔记。他在思索费兰茨的话，最后冷静地说：

"您不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我不认为我自己有能力成为您和后代之间的联系人。"

费兰茨走到写字台旁，指着摊满桌上的写得密密麻麻的乐谱，说：

“我希望这些音乐符号能够成为联系人。我只希望为后代留下音乐，别的什么也不留。”他看了一眼肖伯，接着说：“我希望您不要认为我这样说是不谦虚：在我身上虽然只能找到这一点点纯金，但是决不会找到废渣。”

约基姆·拉福和青年朝拜者

一八四九年六月，一个莱比锡的年轻人来到阿尔滕堡。他傲慢地告诉门房：“我是《黄昏邮报》的记者……我要同音乐大师谈一谈。”为了强调，他又加了一句：“一定要谈一谈！”门房已经习惯于一些热心的年轻人因为某种非常急迫的事求见费兰茨，所以对这次拜访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

“李斯特先生不在家。夫人也不在家。如果有什么急事，可以同拉福秘书谈谈……”

年轻记者听后马上往楼上跑，很快就见到了拉福。秘书先生现在已经能够经常吃上饭了。李斯特还给他买了新衣服，换下了那套已经破烂不堪、几乎露出肉体的衣衫。尽管他有了这些可喜的变化，但他还是瘦得那么使人忧愁，瘦得那么尊严。他根本不象一个充满罗曼蒂克的音乐作曲家，倒很象一个福音派的神父。

“有什么事吗，我的年轻朋友？”

他只是现在才仔细打量了一下来访者。作为一位有经验的秘书，他曾经为主人挡过许多驾。现在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年轻人大概还只有十七、八岁。他脸部表情坚定，有一种好斗的或者说是普鲁士的特征，但是眼睛却象受到什么强光的刺激，老是一眨一眨的，也可能是因为过度紧张。脸孔上有一些象肺病患者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圣徒脸上才有的火红斑点。手非常细嫩，

是真正的贵族的手。讲起话来显得有些笨拙，有时低声细语，有时却几乎是叫喊，一会儿说得很流畅，一会儿又结结巴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激情主义者。拉福在作出这个结论后又重复了刚才的问题：

“有什么事吗，年轻人?”

“我想认识认识艺术大师。我想为莱比锡的《黄昏邮报》写一篇关于魏玛音乐生活复兴的报道……”

“很遗憾，艺术大师不在魏玛。不过我愿意权且充当主人，请您看看整栋房子。我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李斯特的府邸和这里的生活情况。”

拉福请年轻人先走。下楼后，两人走进了底层最大的一间房屋：

“这是客厅。我们常在这里举行所谓男人集会。您肯定会对去年有哪些人参加过这种集会感兴趣。这些人当中有瓦格纳。著名作家霍夫曼也来过好几次。李斯特所喜欢的画家塔西陀·科尔尼厄斯、吉宁利、建筑家谢多、总导演杰纳什特先生和李斯特最欣赏的歌唱家米尔德都是常客……客厅里面是一个小音乐厅。年轻的朋友，您看，这里有一架维也纳的钢琴和一个四重奏的乐台。在这里，每周都有一次室内音乐会，主角就是艺术大师本人。墙上挂的绘画都是吉宁利赠送的。那里有几张彩色安琪儿画像，是贝蒂娜·阿尔尼姆夫人的礼品，上面写着：李斯特万岁!”

“隔壁那一间屋子，”拉福脸上露出了一丝幽默的神情，“是艺术大师的军火库。他的崇拜者从欧洲、非洲、亚洲，甚至美洲寄来了各式各样的刀剑、匕首和武器缨饰。不过玻璃柜里存放的东西可和平得多了：世界各地的烟具、烟斗、镶着银饰和贝壳的旱烟管。这支旱烟管是苏丹送给李斯特大师的。墙上只挂着

一张肖像……”说到这里，拉福声音有些变了：“是费里克斯·李克诺夫斯基的。这位喜欢冒险的先生，玩世不恭，认为女人、金钱、地位和政治都不过是玩具，结果为此付出了生命。他被委派为驻法兰克福帝国议会的公使，最后在一次街头骚乱中丢了命……”

“一楼我不能进去，这一层的房间全是女公爵的。我们上二楼去吧！这里有一间大音乐厅，摆在里面的是誉满全球的埃拉尔德钢琴。旁边是亚历山大·艾·斐尔斯制造的、综合了钢琴和风琴特点的怪乐器。这部乐器有三套手键、十六种音域和风琴式的脚踩系统。大师特别喜欢这架风琴，因为它弥补了钢琴的不足。在那边窗口下是莫扎特弹过的旧式钢琴……现在请到图书室看看。瞧这些装满了书的书柜。李斯特对什么都感兴趣：世界文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古代人民的生活、对未来的幻想、意大利诗歌、法国散文等等。从伏尔泰到圣西门，样样都有。这里还有歌德的著作和匈牙利文学的翻译作品。这个柜子里收藏有康德、黑格尔、谢林的书，那个柜子里放的是美国歌颂牦牛狩猎者的文学作品。再就是一部一部的乐谱，其中有些今天还很少有人谈到。从劳索到斯卡拉蒂，从敝人约基姆·拉福到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都在上面。现在您应该感动的是，您看到了伟大的布劳德乌德钢琴，这是贝多芬最后一次弹过的钢琴……我们再花几分钟时间参观一下李斯特博物馆吧！这些绘画、广告画和雕塑反映了各个不同时期的李斯特。这是童年时期的李斯特，贝多芬亲过他的小额头。这是巴黎时期的大音乐魔术师。这是巴托利尼和施万特勒为他雕塑的头像。这里还有来自各国的奖章、勋章、奖状、纪念杯，有些礼品是国王、主教、王公、市长、大学校长和美丽的女人送的……她们给他写诗，送来亲手刺绣的手工以及其他可爱的小东西。在这个玻璃柜里，存

放着这栋楼房最珍贵的宝物：巴赫、海登、莫扎特、贝多芬和瓦格纳的手稿。”

年轻人的脸因为激动越来越红，口吃也越来越厉害，但是他的问题还是象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大师在哪里工作？他在什么神圣的地方躲避生活的皮鞭和追求自我发现？”

拉福挽着年轻人的胳臂，为他这些热情的问题所感动，所以回答时也带着感情：

“我把他的圣地也介绍给您看看。尽管他曾经明确指示我，决不要让那些好奇的旅游者看这个地方，”拉福拉了一拉来访者的胳臂，问道：“您不是旅游者吧？”

年轻人因为激动更加口吃，但他仍然表达了不满：“什么，我是旅游者？我是穆斯林，是来麦加朝拜的！我象基督教徒，历尽千辛万苦，为的就是看看圣地！今天，整个德国的青年都在注视魏玛，觉得这里将会发生奇迹……一个来自外国的魔术师正在向德国巨人受伤的血管里注射新鲜血液。我不多啰嗦了，请让我看看圣地吧！”

他们穿过大院，走过铺得整整齐齐的小石子路，来到一座同整个大楼分开的小建筑物。整栋小楼只有三个窗口。墙上贴的是蓝色糊墙纸，上面撒了一些金粉。窗户上挂的是蓝白色的帘布，室内有一架钢琴、一张写字台、一个小沙钟、一张小桌子和几个沙发。墙上有一张丢勒的油画《苦闷》和版画《圣保罗在大浪中》。

“就是这些，亲爱的年轻朋友。这间屋子后面的角落里还有一张写字台，有时女公爵就在那里写作。这里有一个小铁炉，李斯特大师经常亲自烧火，因为他讨厌别人在他工作时打扰他。您还想看看卧室吗？门后面就是。这间屋子不象是一个艺术之王的卧室，倒很象一个教士的卧房。里面只有铁床、十字架、洗

脸盆、扔在地上的书和乐谱。”

红脸的年轻人又发问:“另外一扇门后面是什么?”

拉福稍微想了一想:“我把门打开，您自己看看是什么房间吧!”

门轻轻打开，两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小屋里只有两串念珠和一张圣母像。拉福轻轻地把门关上:

“这是虔诚和怀疑相交的房间。”

红脸人变得更红了:“大师为什么还需要这种过时的宗教?他不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和真正的信仰——艺术这一纯洁的宗教吗?!”

拉福平静地把手放在好激动的年轻人肩上:“让他自己选择吧,年轻人!”

“大师目前在创作什么?”

拉福拉开了写字台的抽屉,拿出几张纸放在自己面前:“他在写一篇关于音乐指挥艺术的重要论文。主要构思已经有了。您想看看吗?”

年轻人的脸上又泛起红润,甚至头皮也开始发红:“哦，上帝,我不就是为这才来的吗……您怎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拉福把稿纸都推到来访者面前,上面写着整齐的蝇头小楷,看来抄写人把每一个字都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努力不抄错一个字,也不写坏一个字。

一、音乐指挥的任务不能只是打拍子。他负有表演艺术家的最美好的任务:发挥音乐世界的内在思想。

二、风格是个抽象的概念。音乐指挥的任务是把风格变成活生生的艺术。

三、风格是人类各个生活时期的产物。音乐指挥不仅要重现各个时期,而且应该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体现出个人的性格,

反映创作艺术家本人和思想海洋中的一滴神奇的水。

四、音乐指挥不能是一个自我表现者。不要迷恋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音乐才能……这个毛病不克服，就会变成一个讲蠢话的雄辩家。

五、只认识音乐符号的人是乐师，但还不是音乐指挥。艺术家应该寻找隐藏在音符后面的东西。

六、如果表演艺术家自已也努力创作，使死板板的符号变成活生生的音乐，他就可以进入更高一层的精神境界。

七、道德的光辉应该象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照亮着绘画上的丰富多采的颜色，只有这样才是有用的东西。没有阳光，提香① 的杰作也会沉睡在黑暗之中。没有道德，最美妙的乐谱也会沾满灰尘。

八、我们不是作曲家的消极奴仆。表演艺术家的呼吸和脉搏应该同创作艺术家的呼吸和脉搏融化在一起。

九、不要忘记了绘画艺术家的经验。如果只是抄袭自然，那还只能算初学绘画的外行。如果把自己内心的感受也画上，这才是艺术家。音乐指挥也是这样。如果只是按音符指挥而不结合自己的生活，他只能是抄录员。只画冷漠无情的轮廓的人忘掉了轮廓内部的东西：心、血管、肌肉、神经、感觉、感情、信仰、爱情……而真正的画家不会只满足于画轮廓。真正的音乐家也不会只满足于音乐符号的轮廓。他要寻找心和人。

十、不要让那些已有的理论对我们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一切都来自音乐本身，来自一些优秀的音乐作品，来自亲身体验到的和已经完成的音乐本身。

十一、一定要同过去几个世纪的伟人们保持联系，但任何

① 提香(Tiziano Vecellio, 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派画家。他的油画技法对后期欧洲油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时候也不要放过最新的、最当前的现实。

十二、声音、音色……是音乐语言最美妙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会产生于空洞的理论。艺术家必须注意：真正的和恰如其分的声音来自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十三、要学会读乐谱。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学会在第一次看到乐谱时就抓住作品的核心，不管它是两行、三行或甚至二十行，都应该如此。

十四、不管在哪个艺术领域里，大师们总会来帮助我们的。米开朗琪罗或者丢勒，罗塞或者施莱格尔，有时会比学究式的说教更使我们接近音乐的真缔。

十五、变奏！这是音乐表演必不可少的内容。朋友，你看看窗外。风摇大树，败叶纷飞，但是树根和树干不动。真正的变奏也是如此。节奏的树干不变，但小叶、小树枝、小树杈、节拍在表演者的激情狂风中自由飘飞。

十六、你永远也不要说：这只能这样或者那样……你应该谦虚地说：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

十七、如果你教音乐，你就应该给学生以最大的自由……这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要求学生追求最完善的东西。教与学是对上帝的尊重。你一定要穿戴整齐清洁，你的学识也一定要整齐清洁……

费兰茨回来时，天色已经很晚。他陪女公爵和小玛格尼到艾尔森疗养浴池洗澡去了。红脸的年轻人坚持要见到费兰茨本人。他要当面对魏玛的新艺术潮流和李斯特·费兰茨表示敬意，并且用他热情得出汗的手紧紧地握一下大师的手作自我介绍：我叫汉斯·彪罗。

戴莱基·拉斯洛

费兰茨第一眼就感觉到，来访者非常象某一个熟人。他的名字几乎要到嘴边，但就是说不出来。过了一会，还是客人先开了口，嘴角挂着可爱的学生式的微笑。这时主人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

“戴莱基……戴莱基·山道尔！”

来客点了点头：“的确，我们是亲戚。我的名字是戴莱基·拉斯洛……”

“您有什么事吗，伯爵先生？”费兰茨这时才开始仔细观察站在自己面前的人。他比壮实的山道尔苗条得多了。不仅肩膀窄，手也白嫩一些。说话的时候常常闭着眼睛，看来象是一个长期睡眠不足和每隔一秒钟就要思考一个问题的人。费兰茨又问了一句：

“您有什么事？”

来访者从黑色礼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证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的脸上呈现出痛苦的笑容：“匈牙利政府任命我为驻在没有王朝的共和国首都巴黎的大使。山道尔要我顺道来一趟。他说，李斯特·费兰茨一定会把我推荐给法国现政府的一些权要人物。”

费兰茨点头说：“我很愿意。”但接着又补充道：“匈牙利大使在国外又有多大作用呢？法国正在发生革命，局势混乱，各党派之间你争我夺。最主要的是贫困越来越严重，它丑化了世界的女王——巴黎。”

戴莱基又闭上了眼睛：“匈牙利革命已经失败了。在德布勒

森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维也纳皇族根据反拿破仑的神圣同盟向沙皇要求援助。华沙的刽子手巴什基耶维奇将军率领二十万军队进攻匈牙利。维也纳也动员了二十万人。他们有一千二百门大炮。而我们只有十五万人，总共才一百门大炮，其中还包括老掉牙的山炮。我们的士兵只是起义者，他们的士兵却都是经过战斗训练的人。我们这里穷困落后，他们有的是金钱、食品和武器。他们那里有暴君的坚决而统一的意志，而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内部却发生了令人悲伤的分裂……”

费兰茨猛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哪里？"

戴莱基沉默良久，然后站起身来，面对着主人，两只白嫩的手按着费兰茨的肩膀：

"没有希望。至少是用清醒的政治家眼光来分析形势，看不到任何希望。不过我们的自由斗争曾打破过一切清醒的计算。我们用锄头击溃了奥地利皇帝的精锐部队，用镰刀夺取了施利克的炮兵阵地。贝姆将军在艾尔德伊地区浴血奋战，重现了大卫战胜戈利亚的奇迹。科苏特在凯奇凯梅特、采格莱德、佩斯—布达、赛格德、德布勒森等地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建立起军队。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奇迹身上，寄托在欧洲的良心将会动员起来的身上。"

费兰茨不再问他这次出使巴黎的政治背景。他只提了几个具体问题：

"您是怎么出来的？从哪条路线来的？带着什么证件？因为您必须冲过皇帝的封锁线……"

戴莱基又疲倦地闭上眼睛："路上不好走，危险不少。皇帝手下的人或者接受证件，或者用枪弹来当邮戳。不管怎么说，反

正我过来了。这比起那些普通的无名战士们的不朽业绩来，根本算不了什么。”

费兰茨在写字台上写了好多推荐信给戴莱基：

“伯爵先生，希望这些信对您和祖国能有点用处。但愿上帝保佑等待奇迹的人真能看到奇迹。这是我全部的愿望。我特别推荐您去找我过去的生活伴侣玛丽·道格尔特。亲爱的伯爵，您将面临许多困难的日子，也许是困难的年月。您需要朋友。玛丽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在信中已经写了，不过您见到她时，请口头上也重复一下我的话：我曾经在很多地方求过她，并且在一生当中得到了她许多东西。现在我最后一次求她：为了您和站在您后面的人，为了我可怜、贫困和弱小的祖国，赶快把整个巴黎动员起来！”

亨利·海涅

期待的奇迹并没有发生。一八四九年六月，巴什基耶维奇的部队占领了艾尔德伊地区，匈牙利的常胜将军贝姆在赛格什瓦尔的一次决定性战斗中终因众寡悬殊而战败。当代的明星裴多菲·山道尔在这场战斗失败后的大屠杀中失踪。八月，科苏特逃往奥尔索瓦。同月十三日，格尔盖伊将军在维拉戈什宣布匈部队投降。

费兰茨连报纸都不敢看：哈伊纳马被任命为战败国的总督。

军事暴政的第一批牺牲者是波兰军团的残余人员。

达姆扬尼契将军和他的战友们被判处绞刑。

匈牙利流亡者漂泊在土耳其。他们也许同当年被终生放逐的拉科齐国王的支持者一样，在同一个地方倾听着马尔马拉海的咆哮声。

费兰茨拼命地工作，不断地创作。他想写出一部好作品，写出一部反映一个国家在进行殊死搏斗的乐曲，让这部象火一样燃烧的乐曲提醒全世界：赶快援助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国家和人民！

费兰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仅双手，而且心也变得冰凉。因为海涅发表了一篇讽刺诗，比利剑钻心还要使他心痛：

李斯特来了，还是那样高雅，
他丝毫也不觉得害怕，
原来在匈牙利的战场上，
俄罗斯或克罗地亚的武器都未曾伤害他。

自由变成了残壁砾瓦，
匈牙利到处都是血洼，
可是费兰茨还是那么健壮，
马车也没有被炸。

费兰茨还话着，
他将挨到年过花甲，
那时再向子孙讲述当年经历：
我在这里动过刀剑，在那里洗过军马。

只要我听到你的名字，匈牙利！
我的德国上衣就会裂炸，
因为大海在我胸中翻腾，
军号催我重上战马！

《英雄的葬礼》

如果不是内心也在责难自己，海涅的攻击肯定会使他病倒。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他和裴多菲这两颗明星本应一起陨落。现在唯一能引以安慰的是，卡罗琳还在他身边。

“你的任务是创作。”卡罗琳说：“现在在你这张小纸片上，就有整个匈牙利。亡国的波兰正是在肖邦的音乐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费兰茨只能拼命地工作。他在写《普罗米修斯》，为一个偷了神火来照亮人类的英雄创作交响诗。他受到了雨果《山中所闻》一诗的启发。他在思索，雨果究竟指的是什么山？指的是日内瓦钟塔下早就被人遗忘了的天堂，还是指的产生《皮特拉克抒情歌》的那座幸福的小山谷？不，这座山指的应该是阿尔滕堡瞭望塔所在的山，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逐渐昏暗下去的欧洲。是的，这块古老的土地象一切着过火、只剩下烟烬和煤灰的地方一样变黑了。这座充满幻影的山就是阿尔滕堡。他听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交响乐，听到了大海的喘息，听到了黄昏时红云乘着风翼掠空而过的声音……他听到了河流摇荡两岸的温顺倒影的交响乐，听到了奇妙而安详的和声。但是这时另一种叽叽嘎嘎的地狱音乐压住了交响乐的和声。这是人的野蛮音乐，是从人生下后的第一次痛喊到人临死前最后喘气的音乐……是人的血腥音乐。这是倒下的旗帜和布满战场的尸体，遭受残害的婴儿和发了疯的母亲，被毁坏的教堂和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融化在一起的最强音。《山中所闻》，对，是不能把这种音乐赶出撒着金粉和贴着蓝色糊墙纸的工作室的，就象不能赶走死亡骑士马捷帕一样。快马在奔驰。诗人同马捷帕的命运一样：他

坐在神马上，不停地飞驰，不停地流血，因为只有在痛苦的鞭策下才能有创作。

和平的阿尔滕堡充斥着死亡的音乐。

这就是《葬礼进行曲》。这是纪念阿拉德（注：匈牙利一八四八年起义领导人被杀害的地方）烈士们的杰出作品。从前，他曾经挖苦过德拉克鲁瓦的乐曲，挖苦过站在波若尼轮船码头上欢迎他的匈牙利人。那时他认为这都只是一些装模作样的姿态。现在他才发现，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这种英雄的“姿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必须写出《葬礼进行曲》，为“美丽而野蛮的祖国”创作哀乐。骑兵驰骋在沙场上，相互撞击的刀剑迸出火星，炮声隆隆，仿佛雷闪电击……他们树起了绞刑架。《葬礼进行曲》是怀念十月六日光荣牺牲的烈士们的哀乐，是对阿拉德十三位英雄寄托哀思的音乐（此外，也是为了纪念难忘的李克诺夫斯基）。

奇特的两面性：他是宫廷乐长和音乐指挥，象已故的歌德一样受到王公的尊敬，但他却在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期间写下了歌颂叛乱、革命和反抗的乐曲。他写了《工人之歌》。小心谨慎的音乐出版商哈斯林格知道后吓得半死，急急忙忙销毁了已经制好的铜刻板。但是音乐的思想是销毁不掉的。他又写了《英雄的葬礼》，继续使用《工人之歌》的旋律。

歌德的继承者觉得自己同飘泊不定的流浪汉一样苦命。他又被“没有家、没有祖国”的思想折磨着。国内同胞还想着他吗？如果还想着他的话，他们是怎么想呢？他们能理解他为什么坚持不懈地工作吗？他正在最后加工《匈牙利歌曲》，整理《匈牙利狂想曲》。国内的人能够理解他吗？这不仅是音乐家的欢乐，作曲家的幸福劳动，而且是一种态度——我和你们在一起，和培养过赛钦尼、科苏特、裴多菲、艾克尔、无名的囚犯以及十三烈士的人在一起。

匈牙利到处是断头台、绞刑架。行刑队不停地往步枪里装填子弹。在这种时刻，人们对他的工作会感兴趣吗？他的《狂想曲》不仅要把农村和菜市场的旋律，而且要把上帝赋予吉卜赛艺术家的音乐手法和风格以及丰富多采的东方色调也移植到欧洲音乐的舞台上……他不仅想把一些旋律象死蝴蝶一样插在科学家的小别针上或者把它们夹在两张乐谱纸之间，而且要塑造一个狂想者，一个忘掉自己的、发狂的音乐家，他不懂得教授们制造出来的神奇世界，但是他能感觉到人在生和死这两块大磨盘石之间可能发现的东西。费兰茨的《狂想曲》比较粗犷，比较重表面效果。他的《^{b}E大调钢琴协奏曲》、《即兴曲》和正在创作中的《b小调奏鸣曲》也是这样，不过更隐蔽和更含蓄一些。在匈牙利国内可能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在魏玛，在这远离"美丽而野蛮的祖国"的地方，所有人都看到他这个狂想者所追求的自由是什么。现在，不管是批评他还是赞扬他，不管是支持者还是敌人，只要谈起他，都一定会使用"匈牙利音乐"（至少是"匈牙利式的音乐"）这个概念。

唯一看到费兰茨秘密创作计划的是约基姆·拉福。这个交响乐计划是：《英雄的葬礼》、《忧郁的灵魂》、《拉科齐进行曲》和《多姆布隆夫斯基进行曲》、《马赛曲》、《圣诗》（乐队和合唱团一起表演）。

这个计划在费兰茨脑中酝酿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不是没有力量，不是缺乏勤奋精神，也不是没有激情和同情心，而是因为"欧洲正处于平静……"，没有一个音乐指挥敢于排练叛乱交响乐，没有一个演奏台会允许他上去演奏这种交响乐。计划只好锁在抽屉里。最后只写成了《英雄的葬礼》。哭是可以的，因为任何人也不能禁止别人哭。

天 鹅 骑 士

一八五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费兰茨！我刚刚读完歌剧《罗恩格林》。我一般是不习惯于阅读自己的作品的。但是这次例外。读完之后，我心中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欲望：必须演出这部作品！因此我特请你设法让它公诸于世。你是我唯一能提出这种请求的人。作品在你手中，我才能完全放心。

你的理查

一八五〇年六月

我亲爱的理查！我对你的天才所持有的严肃而热烈的崇敬，不能只是无为的幻想和空洞的欢呼。只要能为你的盛名和荣誉，为你本人做一点事，我就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为你效劳。不过为你这样的朋友效劳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和胜任愉快的。那些幸运地能理解你的人，必须努力聪明地为你效劳，才能不愧对于你。我们将在最优越的条件和最能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演出《罗恩格林》。剧院经理决定为此投资两千银币，这在魏玛还是从未有过的。我们也没有忘记报刊。演员们情绪高昂。小提琴手由十六个增加到十八个。低音黑管已经买到。我将亲自排练钢琴、合唱团、舞蹈队和乐队，决不使音乐的实质和细节受到任何损

害。我们将竭尽一切力量全部地和完整地演出你的歌剧。

拥抱你
你的费兰茨

一八五〇年八月

我唯一亲爱的费兰茨！我必须当着你的面讲，你是真正的朋友。请不要让我说得更多，如果说两个男人之间有这样的友谊、这种最高尚和最感人的关系，那是你给予的。你不仅给了我友谊，而且使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友谊。我摸到了现代艺术的脉搏，也知道它将如何死去。但是这并没有使我难过，相反给我带来了欢快，因为我知道，死去的将不会是艺术本身，而只是我们当前的艺术——站在现实生活之外的艺术。真正的、不朽的和永恒的新艺术即将诞生！我们将挣脱墨守成规的锁链，挣脱总是想创造什么永垂不朽的大作的自私思想，我们要体现现代生活！你已经把《罗恩格林》交给了世界。我还将为你和魏玛写完《胜利的和平》。就在两天之前，我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将来如果能写出来，那只能归功于你！

你的理查

费兰茨已经四十岁了。他现在找到了年轻时的激情，好象又在亲身参加令人心醉的文学艺术家茶会，听到了海纳尼激动人心的长篇演说。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罗恩格林》的旋律。有一次，一个宫廷大人物在排练休息的时候走进剧场，说了

一句自以为是很风趣的话：

“好是好……不过只有未来才能听得懂！”

费兰茨把手中的指挥棒狠狠地往地下一摔：

“对，我们就是要演奏‘未来的音乐’！”

从此以后，李斯特和瓦格纳经常可以听到人们的议论，有的是讽刺，有的是赞扬，有的怀着敌意，有的充满热情，但他们都谈到一个词：“未来的音乐”！

一八五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歌剧《罗恩格林》终于问世！首演式时，来了许多著名的客人。导演、作家丁格斯塔和敢于讲话的古茨科夫代表着新的德国戏剧潮流。杰尼也来了。看样子，巴黎对这次重大的“冒险”也不是漠不关心的。音乐科学方面的代表布兰代尔和李特尔都在这里。还有一个热情的年轻人。他一声不吭，一坐下就拉起小提琴来，而且拉得那样好，好象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排练似的。这个新的乐队成员名叫约基姆·约瑟夫。

这次演出的反应是很特别的。一般观众昏昏沉沉地离开了剧院。他们只觉得自己陷进了一种头昏目眩的混乱，沉重而厚实的声音窒息了一切诗歌、戏剧和演员的表演。不过他们还不敢表态。他们得先看看报刊怎么反应，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反应。

八月三十一日又演了一场。九月、十月接着上演。第一次战斗（同剧院观众进行的战斗）失败了。但是另一次争取青年、争取年轻一代音乐家、争取“未来音乐”的战斗却大获全胜。

许多最优秀的年轻音乐家都纷纷前来魏玛朝拜。他们都想向敢于把《罗恩格林》搬上舞台的音乐指挥学习。他们要向在成功的顶峰放弃演奏台而去从事教育工作的钢琴艺术家学习。画家塔西陀带来了年轻的侄子彼得。费兰茨很快就发现他是一个

难得的作曲天才。约瑟夫也参加了魏玛乐队。古拉克专门研究费兰茨高超的表演技术。直接从波兰赶来的李托尔夫学习他的《E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其他许多年轻人……魏玛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蓬头散发、喜欢嚷嚷的年轻人，也从来没有在深夜的寂静中听见过这种又吹又拉的练习声。路过阿尔滕堡的人都以为是魔鬼在敲击钢琴。这些年轻人甚至使神父般虔诚的拉福也激动起来。在魏玛附近的小村庄，有一个名叫歌茨哈尔格的神父，他会弹风琴。起先，他还只是偶尔到阿尔滕堡来看看，后来干脆就留在那里了。他经常为那些年轻人办好事。例如有人把正在创作的《浮士德》乐谱丢在从阿尔滕堡到乐谱抄写员家的路上，他就一步一步地在路上找，最后还真把它找到了。红脸青年汉斯·彪罗老是喜欢尖锐地批评别人，使得那些最和气的人也不能不生气。歌茨哈尔格神父经常为他们排解这类不愉快的纠纷。有一次，卡罗琳久病后恢复了健康。她虽是一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但还是要人尊重她的身份。可是年轻的塔西格误解了女主人的意思，对她极为"亲近"，以致费兰茨（这在阿尔滕堡历史上还是没有过的）大动肝火，威胁着要揍他一顿。歌茨哈尔格神父最后还是使他们和解了。有一次，他挽着费兰茨的胳臂，慢慢走上二楼。塔西格正在练习，先弹了《拉科齐进行曲》，接着又弹非常难弹的、由李斯特改写为钢琴曲的《汤豪塞》。弹得非常好。这个顽皮的年轻人看来是要挨打才行，否则他现在不会坐在钢琴旁变成诗人和艺术家。费兰茨在门外站了很久，后来推门进去："过来，卡尔！"年轻人开始不敢过来，胆怯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吗，大师？""没有什么事。我只是想亲你一下，并且告诉你：过去的事我已忘记。我们之间的事算了结了。只要你今后规规矩矩，你就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朋友越来越多，但敌人也越来越多。很多地方都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有时也演奏李斯特的作品，但是反对者的诽谤也日见凶恶。茹利安·施密特从文学角度批评他们。莫扎特传记的作者奥托·琼恩也在报上撰文攻击。库恩、爱德华·汉斯利克、瓦尔索根都在报刊上发表了批判文章。路德维·比斯科夫和从前的好朋友斐迪南·希莱也向阿尔滕堡发起了十字军的讨伐。还有一批无名反对者，也占据了莱比锡和柏林《音乐报》等报刊的艺术版。费兰茨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支持者的队伍也在扩大。杰出的歌曲诗人罗伯特·费兰茨和第一个支持他们的热情女战士路易丝·奥托都来了。特约多·乌利格、理查·波尔、格调细腻的钢琴演奏家路易·科勒尔以及能增加他们社会分量的劳伦金伯爵经常访问阿尔滕堡。罗文贝格的音乐指挥赛佛利斯、松德豪森的乐队队长斯坦因、莱比锡音乐社会的支持者代表卡尔·李德尔、波罗斯洛的乐队队长达姆罗克都在为"未来的音乐"奋斗。（达姆罗克后来在美国实现了"魏玛精神"。）

费兰茨又收留了许多学生，但也招惹了更大的敌人……罗伯特·舒曼和克拉拉·舒曼。费兰茨一再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在魏玛上演了舒曼的作品。他还把自己毕生的杰作《b小调钢琴奏鸣曲》献给了舒曼。他利用年轻的约基姆做"和平使者"。因为这位小提琴家同莱比锡音乐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常有机会带去信息：费兰茨极为推崇舒曼的艺术。后来费兰茨还亲自登门拜访了舒曼。但这些都是徒劳无益的。他在那里受到了冷遇，甚至可以说是受到了粗暴的接待。

费兰茨的回答是写了一篇非常好的研究舒曼的论文：

"在艺术世界中，象作家丈夫和表演家妻子、代表思想的作曲家和实现思想的艺术家之间这样的和谐与

合作是很难找到的。夫妻两人都站在艺术神坛的最高层。这是普通人上不去的地方。两人在感情上都是诗人，都是音乐艺术的虔诚创作者，艺术纯洁性的严正捍卫者和艺术风格的细心宣传者。两颗心都在攀登高峰……可惜的是，后人将只能看到其中一位的优秀作品，而对另一位的功勋只能从同代人的证词中发现。罗伯特的作品是留给后代的。克拉拉的才能只能为自己的时代开花结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别人是做诗，而他们本身就是诗！”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缓和舒曼夫妇同他的对立情绪。巴黎方面来消息说，柏辽兹也在责难费兰茨。他正是从巴黎的消息中才懂得了爱、嫉妒和仇恨之间的特殊联系。舒曼或者柏辽兹并不是因为他关心他们不够而生气。他们气的首先是第三者：他为什么关心瓦格纳？他为什么会犯这种音乐指挥上和历史上的错误，居然把瓦格纳放在他们的前面？他现在才真正明白了这种嫉妒“爱情”的特殊的和秘密的关系。原来舒曼和柏辽兹（也许瓦格纳也是如此）都在要求特权：只许爱我！不许有别人竞争！费兰茨懂得了这种奇怪的友好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同他的基本性格是对立的。他一生都在致力于使世界得到尽可能多的色彩、活力和声音。他在流浪期间既听俄国吉卜赛人的歌曲，也看法国歌剧的演出，既研究匈牙利舞曲，也注意莱茵河谷的音乐，既喜欢帕格尼尼发展起来的魔鬼似的小提琴演奏风格，也欣赏苏格兰的民间乐器。他同时地、没有任何偏见地爱舒曼、门德尔松、肖邦、罗西尼、艾克尔、格林卡、贝多芬和斯卡拉蒂。现在他的朋友要把他拉上只有一种风格的马车，这是办不到的。即使这样会招致别人的反对，他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后来，有一次对话又引起了朋友和敌人、支持者和反对者对瓦格纳问题的争论。对话者是卡尔·亚历山大王子和李斯特。

王子：亲爱的李斯特，我必须告诉您，歌剧《罗恩格林》演出快两年了，但宫廷中有几个人至今还不肯放过这件事。他们说：八月二十八日是伟大的歌德的生日，但是恰好选了瓦格纳的歌剧。瓦格纳可能是很优秀的艺术家，我的妻子也很崇拜他，但是他这个人不配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节日的中心。

李斯特：殿下，请允许我用歌德的话来回答：……他实在是位杰出的天才，你应该以客礼相待……

王子：亲爱的李斯特，您说得很妙。这句话引用得恰到好处。但问题不仅关系到客人，也有一部分涉及到您自己。有些人认为，您使魏玛完全服从于新潮流。一些小心谨慎的人说，再这样下去，比较保守的音乐和歌剧爱好者今后就不敢再进剧院的大门了，既使进去，也会很快逃出来。

李斯特：殿下现在是转达保守派的意见，还是谈自己的看法？

王子：将来我会成为这个小国家的统治者。我办剧院不是为了我个人。国王说话总是爱用多数人称，原因就在于此。您看，不管我怎么努力用单数第一人称讲话，良心和责任总是迫使我说：我们……我们认为……我们希望……！

李斯特：殿下，那我也不能把今天的召见看作是一次普通的社交谈话了，我只好按照我的书面笔记回答：我决没有试图为我和我的朋友独占魏玛歌剧舞台或音乐演奏台。我在这里演出过贝多芬、贝利尼、切鲁比尼、佛罗托、格拉克、格莱特里、莫扎特、尼古拉、斯波蒂尼、威尔第、韦伯的作品……在我倡议和领导下还上演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舒曼的《浮士德》、《天堂与仙子》、《曼弗雷德》。莫扎特、贝多芬、舒柏

特、舒曼、希莱、鲁宾斯坦、门德尔松和柏辽兹的交响乐都演出过。我自己的作品中总共只演了三部交响诗。

王子：我看您有些委屈情绪，这样，我们的谈话就会进入死胡同。

李斯特：我不感到委屈，殿下，我只是维护真理。现在看来这还只是我个人的真理，但过几年之后，它会成为整个魏玛的真理。我想尽力在魏玛建立一个欧洲的中心，欢迎任何艺术流派的人从任何地方来，欢迎他们公开而正派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我想在这里建立一个中心，使它成为过去曾诞生过歌德和席勒的德国雅典。希望从这里出去的东西都是新颖、健康、有力的。如今世界上到处都有受过高等训练的陈规陋习。我要向这些陈规陋习宣战，寻找从人和生活最深的源泉中汲取养分的真正诗人。因此我上演了柏辽兹的歌剧《本凡努托·切里尼》、舒曼的《曼弗雷德》以及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利用歌德诞生纪念的节日光辉来举行这部新歌剧的首演式。我希望瓦格纳的全部作品都能在魏玛举行首演式。这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极大的光荣。《浮士德》是在这里写成的，瓦格纳的艺术也是在这里发展的。殿下，我们不能把这种光荣让给别人。不过我们的经费少得可怜。我必须加强乐队，扩大合唱团，同丁盖尔什泰德先生签订合同，他能为我们带来新戏剧的气息和大胆的精神。我们还想在这里演出《齐格弗里德》。这可能不仅是瓦格纳，而且也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现在，当我在批驳各种责难，提出新计划时，当我对您和整个人民感到沉重的责任时，我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还仅仅是一个更大的计划的开始。我们还想在魏玛根据歌德和古希腊的精神举办艺术和科学的奥林匹克盛会。让画家、雕塑家、表演艺术家、作曲家、作家、思想家、自然科学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都能每隔五年在这

里竞赛一次：最好的艺术作品将存放在魏玛奥林匹克博物馆；最优秀的音乐作品、戏剧将在魏玛剧院上演；最杰出的诗篇和科学著作将由魏玛的印刷厂出版。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需要很多钱，需要很大一笔财产。但是我相信，魏玛的奥林匹克将会为全世界闪现出一个和平小岛的幻影：正如当年相互角斗的希腊人在奥林匹克放下武器、伸出友谊之手一样，驱使法国人同德国人对立、意大利人同奥地利人对立的那种嫉妒和仇恨也将在魏玛云消雾散……殿下，奥林匹克的和平将在这里繁荣昌盛。尽管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敢断定，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王和社会阶层会不心甘情愿地帮助歌德和席勒的城市，帮助这座未来的和平小岛。

费兰茨未能使舒曼、希莱、柏辽兹等活着的朋友回心转意，于是只好去求助于刚刚去世不到一年的伟大死者肖邦。他为自己年轻夭折的朋友写书。可惜费兰茨现在又犯了过去玛丽逼他犯过的错误。他同卡罗琳一起写作。因为写的是波兰人的事，卡罗琳担心他不熟悉波兰的风俗习惯和历史背景。由于是两人合写，所以书的风格很特别。这一页是雨果、巴尔扎克和拉马丁的学生所写，那一页却出于波兰妇女的手笔。她由于热爱祖国，在写作时加了很多形容词，力图为祖国增添光彩。不过这本书中有一页肯定是李斯特自己写的，因为它既是对伟大朋友的颂扬，也是为自己写的自供状：

“我不记得他曾炫耀过自己的爱国主义感情，也不记得他曾夸夸其谈地叙述过波兰的过去、现在、未来和其他类似的问题。仇视征服波兰的敌人，一定要报不共戴天的仇恨，这都是谈论政治的人的话题，但是肖邦

没有时间去学习仇恨，也不幻想复仇。他只是热爱胜利的牺牲者，同受压迫的人民一起流泪。他没有作出任何外交或政治预言，但是他热情地歌颂和赞扬他所无限热爱的人民……”

费兰茨也没有想到要报仇雪恨，作出各种预言，但他非常关心被他找到的而现在正在沉沦下去的祖国。各种各样的新消息使他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戴莱基·拉斯洛来信说，他好不容易才越过奥地利军队的封锁线，逃到国外，但是没有能逃脱维也纳为他设下的圈套，尽管这还不算是致命的圈套。维也纳政府在匈牙利收购了他的债券，在巴黎向他讨还债款，并借此把他关进了监狱。但有位保护神代他偿还了债务，使他获得了自由。这位保护神就是玛丽。

过了几天，阿库斯和热情的音乐学家马特拉伊·加波尔来看费兰茨。接着又来了两个古怪的客人：小提琴家莱梅尼·艾德和爱发牢骚的伴奏布拉姆斯。莱梅尼不仅是一个小提琴家，而且还是一个话剧演员，或者说是一个剧团：他活龙活现地讲述了他们两人在戈尔盖伊将军部下如何英勇作战，后来又如何在矿井下隐蔽躲藏，同十倍于己的敌人拚死搏斗，他那一把孤单单的小提琴又如何歌唱了英雄的战士们。卡罗琳随着他的生动描述而流泪、高兴、悲哀、欢笑。阿尔滕堡的青年人也都围着听他讲话，只有年轻的布拉姆斯躲在一边，对他的表演表示令人注目的厌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事情他已经听过上百遍了。布拉姆斯吃饭时故意慢慢腾腾精嚼细咽，尽量拖延时间。如果轮着他讲话，他就坐下弹钢琴。他伴奏得非常精彩，有时反而使小提琴显得大为逊色。

莱梅尼也不大了解匈牙利国内的情况，因为他并没有经历

过革命失败后的镇压报复。他只是拉小提琴，讲述往事，每天都为自己的英雄史歌增添一点色彩，但是他并不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费兰茨不久前刚发现的一位亲戚——艾德华·李斯特博士也不清楚国内的形势。这位杰出的律师是老李斯特·亚当最小的儿子，按辈份应该算费兰茨的叔叔，但年龄却比费兰茨小好几岁。艾德华非常积极地在拉这个亲戚关系，不仅写信，而且还亲自找到魏玛来。费兰茨说话是很随便的。他对这位叔叔回忆了当年人们如何想使他成为匈牙利贵族，甚至有人想向他提供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贵族证书。他讲这些事只是为了使谈话显得轻松幽默一些，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谁知他这位亲戚在法律问题上特别认真，居然于一八五二年一月七日在《匈牙利新闻》登了一则广告，说费兰茨一八三九——一八四〇年在佩斯逗留时曾想收购证明其贵族出身的证书，请持有上述证书的人赶快同艾德华·李斯特律师接洽有关事宜。

一八五三年六月一日，费兰茨的"大使"出现在佩斯—布达。汉斯·彪罗在艾克尔·费兰茨的指挥下，同匈牙利乐队一起演奏了李斯特·费兰茨的《匈牙利狂想曲》，获得极大成功。彪罗写来了很多热烈的信，汇报他在匈牙利演出的盛况。费兰茨则从魏玛继续指导自己学生的一切行动：可以同什么人接触，不要同什么人来往，在何地演出，演奏什么节目，在海报上应该注意什么，不要使用那些过分的词汇等等。费兰茨还一再要求彪罗去探望民歌收集者法伊·伊斯特万伯爵，并且要他不惜任何代价购买伯爵收集的材料。彪罗对每件事都如实向老师汇报，同时很不好意思地提出，希望老师在经济上帮助他。费兰茨立即愉快地汇了钱去，因为他一生中就是喜欢给别人东西，而且从来不多问一句。

王子和王子的宫廷保持沉默。费兰茨也不再谈过去的问题，而是默默地放下了指挥棒。他把指挥棒交给了第二指挥，要他继续驾驶这条东倒西歪、遍体伤痕的小船。不久，约基姆也离开了乐队。费兰茨没有想到这里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卡罗琳却认为：约基姆肯定是舒曼他们拉走的，他们要约基姆离开费兰茨，靠拢莱比锡派。卡罗琳这种看法目前看来似乎还是过分了一些。因为约基姆于一八五三年十月还陪费兰茨去了一趟巴塞尔。不久，卡罗琳和小女儿玛格尼也到了巴塞尔。在这里，瓦格纳热烈拥抱亲吻费兰茨，好象他们不是朋友，而是一对情侣。他们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瓦格纳同小玛格尼比赛跑步，还教她怎样爬树。他使卡罗琳也着了迷。他回忆了自己的青年时期，说他当时曾把波兰的自由斗争看作是人类的曙光。瓦格纳真是个少有的人才，他居然能使卡罗琳大哭或者大笑，有时他们共同探寻最深奥的佛教秘密，达到精神上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地步；有时又热烈研究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满身是病。这是些令人难忘的日子。费兰茨应瓦格纳的要求弹奏了巴赫和贝多芬的乐曲，然后又同约基姆一起演奏室内音乐。等到人们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瓦格纳身上时，瓦格纳才拿出了自己正在创作的《齐格弗里德》。但是大家很快就发现它太长了。因为巴塞尔的魔术师瓦格纳所计划的已经不是一场歌剧，而是需要连续演四个晚上的宗教圣剧……这部歌剧反映了一切与人类命运、与人类迷茫的过去和可怕的未来有关的事情，描绘了冷酷的命运之神所编织的并且抓住了人和上帝、英雄和坏蛋、自我牺牲的烈士和卑鄙无耻的叛徒的法律。四场歌剧宣扬了无情的法律和不可逾越的命令：谁接触黄金，谁就得毁灭，因为黄金能使明眼人变成瞎子，使聪明人变成笨蛋，使善良人变成杀人犯，使神变成可耻的叛徒；尽管象齐格弗里德这样的英雄和象海根这样

的魔鬼向黄金发起了进攻，但是它最后还是毁坏了世界的支柱；布隆希尔德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消灭恶龙的英勇行为，火帐和战无不胜的利剑都无法挽救世界，因为一切的一切都得毁灭……海里的妖怪抓住了英雄和凶手、上帝和魔鬼，把他们拖进了大海的深渊。这个该死的世界必须毁灭，它在毁灭之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了一眼莱茵河的宝藏——黄金。这么广泛的内容怎能压缩成只演一个晚上的歌剧呢？

夜深了。两人都没有睡觉。

卡罗琳在思忖：瓦格纳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过，一个忘记了人生中最主要的奥秘是救世主的人能算诗人吗？他不是基督徒，而是异教徒，是不信上帝的人。他一次也没有提到能够驱散一切怀疑和动摇的救世主耶稣，这样描绘人类命运的人不会是诗人，只能是令人诅咒的异教徒！

费兰茨也在思忖：五十年来，人类一直在酝酿的思想，现在诞生在一个人的脑中。真是雄伟的计划，大胆的尝试……有意思的是，听了瓦格纳音乐的人丝毫也不怀疑他会始终如一地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他坚持不懈地、不停地搏斗，有时受伤，有时伤人，象一个狂人似地向前走着……。他象一个真正的诗人，不顾一切艰难险阻，不追求金钱、爱情、名誉和地位。他只要求创作，写出社会现实，即使为它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费兰茨还想到：在这种时候，一个正派的人只有一件事可以做，这就是检查自己的良心是不是真正纯洁，有没有力量承认别人创作了超过自己的东西。他唯一的义务就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热情和才能为更坚强的意志和更伟大的目标效劳。现在应该再给卡尔·亚历山大王子写一封信，告诉他：我们正在酝酿瓦格纳的伟大作品。一定要现在就抓住它，否则就太迟了。老鹰现在还没有展翅高飞，还在我们中间，还在地球上。它一旦飞上

天空，就会永无止境，我们就再也追不上它了。费兰茨的思路又转入了另一个方向：魏玛有条件来实现他们的新思想吗？也许不仅是卡尔·亚历山大王子不愿把魏玛的雅典交给瓦格纳，就是瓦格纳本人恐怕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也可能会认为魏玛太小，剧院太窄，不相信他的理想能够在这里得到实现……瓦格纳就在几小时前还抱怨过，他不应该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某些作品交给别人演出，事先也没有检查一下别人是真按照他的思想演出还是歪曲了他的思想。他一直在为自己的轻率感到十分懊恼……也许魏玛——雅典的和平小鸟会同时被两个人遗弃：王子可能害怕小小的魏玛变得过于伟大，从而丧失小市民的清醒态度；瓦格纳则正相反，他可能会觉得魏玛太小、太贫乏，不足以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

卡罗琳和费兰茨躺在床上，都在想问题。多少年来，两人一直在相互注视着对方的呼吸和思想，不用讲一句话，也可以猜中对方脑中在想什么。

卡罗琳：您现在认为自己一生的创作劳动全部是多余的，因为瓦格纳创造了您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象神话中的巨龙一样，吞噬了浮士德和他全部的哲学，甚至吞噬了但丁本人。瓦格纳的巨龙还吃掉了荷马和莎士比亚、歌德和叔本华。《尼伯龙根的指环》对黄金的了解比古代日耳曼人、希腊人和拉丁人更深，比圣西门、瓦格纳的好朋友巴枯宁更多。

费兰茨：看来您不喜欢瓦格纳。

卡罗琳：我只爱您。这是我一生中对任何其他爱情的防疫针。我只是为您担心，因为您的谦虚是真诚的。在您的一生中，有过很多矫揉造作的事，说得难听一些，就是装腔作势。它有时可能披的是最高尚、最好看的外衣……但装腔作势终究是装腔

作势。谦虚不是矫揉造作。您现在觉得最好乘快车回家，把自己的全部计划和作品都撕掉，反正没有您的作品，人们也能写成史诗——现代人的史诗。但是现实并不如此。刚才我谈到谦虚，这是您的良心和人道精神的担保。但是这里还有比谦虚更重要的东西。让我同您谈得比过去任何人都谈得更深一些吧！瓦格纳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分割的人，他象钻石一样坚硬、结实。而您呢？我唯一亲爱的费兰茨，您是由一种比较松软的物质组成的。您是浮士德，他去寻找任何人也没有找到过的生活秘密。也许并没有必要找到它，因为寻找本身才是真正的幸福。您既是浮士德，但又是唐璜。他想征服所有的人，但没有发现最后却是他被所有的人征服。我亲爱的圣人，您常常在花草、树木、飞禽和云彩中，而不是跪在我的身旁，在阿尔滕堡的小教堂中找到自己的信仰。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比瓦格纳更全面、更多才。您别忘了，汉丁、西格蒙特、哈根和齐格弗里德这些人物都来自叔本华……瓦格纳先生总是从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表现了世界的痛苦、紧张和恐惧。而您，亲爱的浮士德—费兰茨，却是充满信心、信念和欢乐的人，因为您不仅仅相信自己……也相信人类。瓦格纳是个德国人，而且是最自私的德国人。他总是想从别人那里拿走什么，譬如从您这里拿走了和谐的世界，从别人那里取走了钱，当然有时还夺走了别人的妻子……而您呢？您不喜欢拿别人的东西，而是喜欢给别人东西，把自己的音乐、旋律、配音方法、良心、热情和忠诚，用双手捧着送给别人。您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别人，我决不说一句话。但是您不能把自己的笔送给别人。或者应该这么说：您不能丢掉自己的笔！相信我，这些话不是一个因为爱您而有偏见的女人说的。您的作品比瓦格纳的作品能够照射得更远。

理　想

卡尔·弗里德里希老王公在登基二十五周年时返回魏玛，其目的之一是借此机会接近出席庆典活动的撒克逊国王，为赦免流亡分子瓦格纳求情。撒克逊国王对李斯特的音乐指挥工作备加赞扬，但是坚决拒绝赦免瓦格纳的请求。二十五周年庆典活动结束后，魏玛的音乐生活停顿了一个时期。不久，老王公去世。在举行隆重的宫廷葬礼后，卡尔·亚历山大继位。李斯特又想重新过流浪生活。他离开魏玛去德累斯顿，在那里同彪罗一起演出。这位红脸少年现在已经成了真正的钢琴艺术家。他演奏《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E大调钢琴协奏曲》时，弹的似乎已经不是钢琴，而是洪钟。报刊评论对他的演出说三道四，讽刺挖苦，但是听众却非常喜欢他。音乐大师和他的学生获得了他们一生中最热烈的成功。接着，费兰茨又赶往卡尔斯鲁厄，在那里指挥演出了《第九交响曲》。乐队由卡尔斯鲁厄、达姆斯达特和曼海姆三个城市的音乐家组成。三个城市的音乐家没有在一起排练过，都是费兰茨一个一个单独教练的。报刊在继续攻击他们，不过听众的热情欢迎弥补了一切痛苦。在音乐会期间，费兰茨发现《E大调钢琴协奏曲》和《A大调钢琴协奏曲》还不够"精彩"。乐器的配备工作大部分是拉福负责的。他工作得很认真、努力，但是只能达到中等水平。费兰茨心中曾经有过一种说不清楚的紧张情绪，不敢去碰一下乐队，可是现在他不得不这样做了。他发现，拉福的配器不能代表他，只能代表另一个作风细腻、谨慎和胆怯的人，而这个人的平淡风格抑制了乐曲中动人的骑兵冲锋。于是费兰茨亲自为这两首钢琴协奏曲重新配器。他的流浪生活和创作活动都未能补偿离开魏玛音乐剧院的损失。

这时，正好年轻的卡尔·亚历山大王公几乎每天都派人来催他回去。实际上，王公是想同他握手言欢，现在就看费兰茨愿不愿意重归于好了。不过王公却用别的借口催他回去，而不是直言不讳地说明自己的意图。费兰茨因此也就故意装着不知道。最后还是卡尔·亚历山大王公胜利了。费兰茨同意重新为乐队排演《俄耳甫斯》，并且还为它写了序曲——新的交响诗。一八五四年春，费兰茨先后访问了德国的科布格、美因茨和荷兰的鹿特丹等城市，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专心致志地创作《浮士德交响曲》。

又是浮士德……

又是歌德的影响。在巴黎度过的幸福日子已经过去二十五年，现在又开始写歌德。他这次阅读歌德作品的时候，内心很不平静，情绪十分焦躁。如同一个流浪者，当他重返久别的故土时，绝望地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变了。现在，精神流浪者正在歌德的故土上寻找自己过去熟悉的人物、思想、英雄和魔鬼，但是年近五十的费兰茨再也找不到青年时代的梦境了。今天，当他重读《浮士德》的时候，感到浮士德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切希望摆脱怀疑、痛苦和折磨，努力爬上生活的乐观之岸的厌世教授；觉得浮士德也不是想摆脱困难，而是想挑起整个世界痛苦的重担。今天的浮士德在玛格丽特温柔的微笑后面看到的，不是女子的献身和男人的荒淫，他看到的是一个永恒的女人，她用自己的牺牲、温柔和至死不渝的忠贞拯救了一切衰落的东西，使凡夫俗子变成了永垂不朽的仁人志士，使总是感不到幸福的人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世界。

他以越来越不平静的心情阅读《浮士德》。他读到的是宫廷如何玩弄政治阴谋和金钱收买手段，欺骗人民，发动战争，看到的是一批凶狠的军事统帅和治世庸医。费兰茨越来越感到痛

苦，甚至对自己提出疑问：他在魏玛宫廷中呆得是不是太久了？是否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而不去完成追求幸福的伟大任务？虽然他尽力想摆脱那些多余的礼仪，但是否还是过多地串演了宫廷宠臣的角色，从而荒废了自己的创作活动？

费兰茨反复地阅读《浮士德》。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在寻找浮士德，但是当他认为已经找到浮士德的时候，却发现浮士德正是他自己。

是谁在提问？是浮士德博士还是他李斯特？你有信仰吗？你还保存着青年时期的梦想吗？你还能听到童年时期那样亲近和熟悉的钟声吗？

这是最令人难受的问题。首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歌德总是爱提问。不过歌德的问题是那样的隐晦，是那样的抽象，使你在回答以前不得不先把问题弄清楚。因为他的问题不是简单地问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而是你信仰什么（费兰茨还为自己补充了一句：或者是你不信仰什么），是自私者的信仰还是另外一种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全人类的浮士德的信仰。

费兰茨知道，他不用去写记叙英雄生平的交响乐诗，只要写三个人物就行：浮士德、玛格丽特和梅菲斯特。浮士德和梅菲斯特这两个男人是用同一种材料做成的。但是浮士德的塑像是温暖人心的阳光晒干的，而梅菲斯特的塑像却是用地狱之火炼成的。在他的人体中还是温柔、感情和仁爱的东西，到了他的灵魂中却全被烧成灰烬。浮士德和梅菲斯特是同一只手创造的。他们的肉是一样的，他们的脸完全相象。只是浮士德身上充满着人的热情，而梅菲斯特身上却全是死的冰冻。在这边是衷心的钦佩，在那边则是讥讽的奸笑。浮士德心目中的崇高梦想是梅菲斯特想象中的卑鄙幻觉。浮士德和梅菲斯特是一个人，是相互的影子。而令人烦恼的问题是：究竟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影子？

玛格丽特的像应该放在两个人之间。这部乐曲作品的架子还没有搭起来，但是费兰茨已经听到了A大调的甜蜜和声。一把低音提琴和一只黑管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在浮士德激烈的冲动之后，响起了平静而亲切的爱情歌声。

费兰茨反复修改表现浮士德的旋律。他在寻求打开一个灵魂的钥匙。他一再撕掉乐曲的草稿。最后只剩下了六个音：G——B——Esz……Fisz——B——D。这是两种古怪的音调，它们相互矛盾，既反映吸引力，又反映排斥力。费兰茨的构思逐渐成型：一段黑管，紧接着是弦乐组的奔放跳动，象征着劳动和胜利；最后就象命运本身以巨人的步伐走过来一样，浮士德出现在用小号和铜管来表现的光环之中。这时候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产生于人类精神炼炉中的伟大思想。

然后玛格丽特和梅菲斯特出场，问题最后得到解答：梅菲斯特歪曲了一切，使一切事物都沉陷在地狱的泥泞之中。但是他能控制玛格丽特的灵魂吗？

经过长期推敲，费兰茨几年之后才确定了最后的结尾部分，决定用男声独唱和合唱来表现浮士德哲学的结束语。

拉福写的《浮士德》交响乐太一般化。费兰茨想要的完全是另外一种音乐。他想起了雨果的话：美与丑，高尚与卑鄙，虔诚与虚假取得了奇妙的平衡。拉福谨小慎微的中庸之道和走钢丝式的平衡主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这样做可以使你避免坠落，但代价是你必须终生放弃飞翔。

不能走钢丝，宁使坠落，也要飞翔！让浮士德的灵魂得到美好的归宿，让地狱的黑暗王国成为盲人之夜……

费兰茨决不想伤害拉福的积极性。他没有批评拉福一句，只是把年轻人的草稿放在一边，自己亲自动手重写。

他下定决心，在最后完工之前，绝对不给任何人看。他要象

一个人在梦中一样飞翔。如果这时有人说一句话，批评一下或者提一个意见，他的梦游就完了。

他真没有让别人看他的稿子。他整天坐在写字台前写着写着……

就在这个时候，阿尔滕堡几乎成了一家客店。来了两个可爱的匈牙利流浪者——多普莱兄弟。人们象下倾盆大雨似地向他俩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国内怎么样？民族剧院怎么样了？国内还有报纸和文学刊物吗？还有社交生活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多普莱兄弟讲了整整两天。他们高兴地谈到，匈牙利成立了业余交响乐团，以艾克尔·费兰茨为首，已经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演出了莫扎特、门德尔松和梅耶贝尔的作品。过些时候，又来了一位客人。按照卡罗琳的说法，这位客人就象是一头来自沙漠的猛狮。他不是在楼梯上大嚷大叫，用脚使劲踢门，有意模仿夏天下阵雨的雷击声，就是在楼上同年轻人高声谈话，用他狮吼般的大嗓门震得楼下发抖和窗户玻璃沙沙作响。等到喊累了，他就开始弹钢琴。当然，他的琴声也犹如天动地摇和狂风暴雨。这位新客人名叫安东·鲁宾斯坦。象他这样的音乐演奏在魏玛是很少有机会听到的。李斯特同鲁宾斯坦展开了音乐比赛。俄国艺术家鲁宾斯坦演奏李斯特写的最难弹的曲子。费兰茨则有意挑选一些雅静的奏鸣曲来回敬。接着，两人又闪电般地拿出了两套节目。鲁宾斯坦弹歌剧《西伯利亚狩猎》中的钢琴曲，费兰茨演奏自己的新作品《节日之声》。尽管他的新作品获得了广大听众的欢迎，但是批评者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费兰茨以基督教徒的忍耐精神听凭批评者对他的鞭笞。他在写给朋友阿库什的一封信中说：

“不仅在维也纳，而且在整个德国，甚至一定程度

上在俄国和美国，也有一些报刊文章对我的作品劈头盖脑地进行攻击。不管是在莱比锡、柏林、莱茵河畔，还是在彼得堡和纽约，都象维也纳一样，批评家们认为，如果对我的作品预先不加以批判就表示赞同或去品尝，那就是对艺术的犯罪，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看来，这种反对我的战争可能会长期继续下去。我已经有思想准备，报刊的攻击不会使我感到丝毫的害怕……我了解自己的艺术任务和使命。如果上帝保佑我并给我力量，我将坚定不移地、耐心地和努力地完成我的任务。”

费兰茨生活在充满了刺激电流的气氛中，也只有象他这样神经坚强的人才能忍受得住如此紧张的压力。他遭受到一系列的攻击，创作过程中又遇有不少困难，此外还加上卡罗琳象磁铁吸引小铁碎片一样给他造成了各种麻烦。他们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六年，这里的社会对他们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和难以捉摸的容忍态度。卡罗琳不是他的妻子，但实际上又是他的妻子。她为了逃出俄国，抛弃了女公爵的爵位，但是她的仪态还是象女公爵一样。卡罗琳聪明颖慧，学识渊博，但是心胸狭窄，不能容人。谁要是得罪了她，那最好还是尽快逃离魏玛，因为卡罗琳不仅会做一个忠实的朋友，也会成为一个无情的敌人。目前，她又在整小小的塔西格。不久前，当她还喜欢他的时候，曾亲昵地称他是“西班牙小贵族”(因为他皮肤黝黑)，可是现在她不但只唤他本名，而且还非得加上无耻、不懂规矩、不要脸……等等形容词不可。作难的又是费兰茨：他必须使脾气越来越暴躁、态度越来越蛮横的卡罗琳同这位富有天赋的青年艺术家和解，至少是表面上的和解。这一件事还算是比较好办的。另外还有一件更难处

理的事。如果说它是容易着火的东西，那是太轻了，应该说它是危险的爆炸物。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个年轻妇女，名叫阿格妮什·斯特里特。到魏玛来看望费兰茨的女人中，她的衣着是最朴素的，但奇怪的是，人们却最注意她的服饰。她并不打扮自己。她身上只有一点英国香皂味。她也很少说话。但是她一旦开口，你就会发现她会好几种欧洲文字，其中还包括西班牙文、希腊文和一种斯拉夫文。她的眼神清澈明亮，透人心肺。男学生们都在极力追求她。作为音乐家，她并不特别突出。但是学习上刻苦认真，勤奋努力。她的耳朵特别灵敏，能够听出任何细微的错误。可是费兰茨一直没有注意她。有时即使看见她，也只把她当作是一个没有性别的生物。他甚至不知道她长得难看还是漂亮。有一次上钢琴课时，"西班牙小贵族"塔西格几乎挨了骂，因为他不肯按费兰茨大师规定的速度弹琴。费兰茨只好自己坐下来弹给他听。弹的是肖邦的《♭A大调波兰舞曲》。费兰茨一边弹一边解说："我这种弹法是从肖邦本人那里听来的，你这个调皮鬼，你应该相信我的速度是对的……"以后他停止解说，一直弹了下去，自己也被音乐的旋律所陶醉。等到弹完最后一节，目光正好同阿格妮什的目光相遇。她正在哭泣。费兰茨现在才第一次认真仔细地看她。美丽而松软的金黄头发轻轻地散在脖子上，变成了又软又细的鸿毛。她有一双绿色的大眼睛。大自然还为她创造了一张能够保守秘密而不是泄露秘密的小嘴巴。"漂亮吗？不，比漂亮还要更多……"费兰茨自己回答了自己。

第二天，全体师生去耶拿为当地的学生演出。接着是郊游。男同学们都直奔树林。只有他们两人落在后面。

"您上次听课时哭了……"

"真正的美会使人流泪。"

“可惜我已经老了，今年四十三岁。马上就是四十五岁的人。再以后就要急转直下，走下坡路了。”

阿格妮什紧紧地盯着他。在她那双明亮的绿色大眼睛里又涌出了眼泪。

“为什么哭？”

“我感到非常幸福。”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从此以后，他们老是躲着别人，这是一种令人疲倦的，也是使人感到屈辱的躲藏。他们先去耶拿和埃尔富特，以后越走越远，一直到了科隆和法兰克福。阿格妮什总是显得比较冷淡，也许正因为这样，费兰茨更加爱她。美丽的金发女人不知不觉地总是使他想起玛丽。同玛丽一样，阿格妮什也有一种喜欢教诲别人的习惯。她不象玛丽那样爱表现自己，但是她也读过很多书。她需要有一个人来分享她无时无刻不在增长的知识财富。费兰茨正是这样的一个好伙伴。他平时专心创作，不大有耐心去读书，特别是那些昙花一现的文章。而阿格妮什主要是由于父亲的影响（他是一个外交评论家，一直按摸着历史的动脉），密切注视着世界政治风云的变化。目前，她正在研究报纸上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各种地图和激动人心的新闻报道。她崇拜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因为他联合了关注自由的各国人民，联合了意大利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共同惩罚欧洲血腥的宪兵和镇压各种自由运动的刽子手俄国。正是在这段时期内，费兰茨收到了戴莱基·山道尔好几封信（他正在同雨果一起饱尝流亡生活的艰辛）。戴莱基和雨果两人都刚刚逃脱拿破仑三世血腥专制统治的魔掌，所以戴莱基的来信自然都是反对“小拿破仑”的控诉书。他在信中写道：自由的法国已经完结；英勇的和敢讲真话的巴黎不再存在；文学艺术家茶会的幸福而叛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小拿破仑用宪兵的刺刀窒息了言论自由，

扼杀了思想解放。不过费兰茨还是比较相信阿格妮什的判断，因为相信历史将会为被奴役的人民主持正义并且使沙俄受到审判，比相信戴莱基这种痛苦的现实更容易使人得到一点安慰。

魏玛气氛十分紧张。塔西格必须离开这里，虽然他将被送到可能学到更多东西的地方。费兰茨请瓦格纳注意培养“西班牙小贵族”。在开始的时候，理查曾为这位“小贵族”的表现写来一些令人沮丧的信：

> “如果你要他去散步，他肯定不会动。如果你让他留在家里，他就从窗口逃出去。当我需要安静的时候，他弹钢琴。当我想听音乐的时候，他却打哈欠，说他现在什么也不想干。总之，我们夫妻两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现在尝到了一个坏孩子给父母造成的一切可怕的灾难。不过他最后还是坐下来弹琴了。只要他一弹，那就是奇迹……真正的奇迹。你没见他是怎样阅读和演奏乐曲的！我相信上帝会保佑我们，我们会经受住这场考验的。”

气氛非常紧张，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卡罗琳已经感觉到费兰茨和阿格妮什之间有什么问题。命运是一种奇怪的和捉弄人的东西。正当女人们向她们的情人提出严重指责，以忠贞和往事的名义要求他们不要喜新厌旧的时候，她们自己却在逐渐失去女人所具有的魅力。这时候的卡罗琳正用布缠着她患有关节炎的小腿和手臂。又黄又黑的脸上不断渗着汗粒，这是因为服用了一个波兰老友远从华沙寄来的神丹妙药。此外，她还老是围着头巾，因为有位医生要她防止“头风湿症”。总之，卡罗琳现在没有什么战斗力，很难同这位散发着英国香皂味、温柔雅静和

窈窕多姿的阿格妮什竞争，也很难同她那一双容易充满崇拜和爱情之泪的绿色眼睛竞争。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紧张气氛在不断发展。费兰茨同卡尔·亚历山大王公之间的关系本来只是一种修修补补的和平条约关系。费兰茨指挥乐队，训练学生，但只是半心半意地工作。卡尔·亚历山大称赞费兰茨的杰出才干，但是对他的关于瓦格纳剧院、奥林匹克比赛和其他宏伟计划连听都不愿意听。除了这些事以外，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运动。魏玛的老居民——“旧世界”的拥护者和披头散发的魏玛青年的死敌坚决抵制费兰茨的剧院。不管上演的是《魔笛》、《神奇的猎人》、《罗恩格林》还是《马尔他》、《露西亚》、《艾尔纳尼》，他们都不进剧院看戏。旧魏玛的拥护者们公然宣称：“我们不需要瓦格纳、柏辽兹，也不需要李斯特……他们不要管我们的事，把古老、宁静而纯洁的城市还给我们！”费兰茨在生活中是从不妥协的。既然有了旧魏玛，那就创造一个新魏玛吧！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七日，新魏玛分子，也就是阿尔滕堡的支持者们都聚集在鲁西希尔·霍夫曼大厅。他们成立了新魏玛协会，一致选举李斯特·费兰茨为主席，霍夫曼·沃·法尔斯莱本为第二主席。协会的报纸主编是拉福。协会之歌由霍夫曼编词，李斯特作曲。

这实际上是公开的挑战。小市民们起初还幸灾乐祸地在背后窃窃私语，认为这些愚蠢的浪荡子自己在为自己挖陷阱，因为他们的行为正好提供了指控他们的证据：建立国中之国，背离魏玛原来的规规矩矩的老居民。开始时，这些老居民还只是对他们进行挖苦讽刺，在墙上刷写大标语，后来有几个特权分子到宫中去告了他们一状。幸运的是这些人告的状没有获准。不过他们终究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使得宫廷中的大人物不得不向费兰茨表示：“革命刚刚过去六年，任何集会结社活动都不会得

到同情。新魏玛协会应该赶快拿出行动来，证明它的目的确实只是为了提高文化水平，进行艺术实践，而不是为了任何其它的东西。”费兰茨马上作出了决定。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柏辽兹出现在魏玛剧院的演奏台上，指挥了《罗密欧和朱丽叶》、《幻想交响曲》和《基督的童年》。在很长时间停止表演之后，费兰茨也亲自出场演奏钢琴，弹的是《E大调钢琴协奏曲》，由柏辽兹担任指挥。这是费兰茨赠送给新魏玛协会的礼品。不要以为只是那些披头散发的青年人才需要这种珍贵的礼品。连那些旧魏玛分子也忘记了自己的誓言，纷纷前来观赏他们的表演。因为这样的阵势是百年不遇的：柏辽兹指挥，李斯特弹琴。卡尔·亚历山大王公第一个表示祝贺。他还说，现在他才真正理解了费兰茨关于举办魏玛奥林匹克比赛的计划……因为在德国的土地上，在歌德的故乡，一位法国天才和一位匈牙利天才比翼双飞，这确实是难得的珍贵的天堂美景。

宫廷和旧魏玛在他面前低下了头。

但是几周前刚在新魏玛协会建立章程上热情签字的老朋友们却不是这样反应的。柏辽兹刚一出门，协会会员之间就开始了争吵、指责和冲突。拉福树起了叛乱的大旗。他宣称：他根本不同意李斯特主席先生的风格，特别是当这种风格不是作为一种意见而是作为一种命令出现的时候；他认为对瓦格纳的崇拜完全是一种人为夸大的愚蠢行为；瓦格纳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应该给他一定的位置，但是决不应该神化他，把他当作音乐界的救世主，认为他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上帝的启示。叛乱的不仅是拉福一个人。好些人都立即宣布退出协会，其中还包括一位十分宝贵的会员波尔。他作为“重型武器式”的记者，曾经为阿尔滕堡，为它的音乐和李斯特，经历了好几场严重的战斗。本来，费兰茨还想在魏玛的船上把这个破洞也勉强修补好，但是不久

读到了拉福的文章，使他不得不最后放弃这种打算。拉福的文章是背着费兰茨写的，是对瓦格纳的无耻攻击。费兰茨面临抉择：要就是做一个灵活的中间人，在瓦格纳派和反瓦格纳派之间进行调停……要就是公开地、坚定地站在自己朋友的一边。

费兰茨选择了后者。他无法同那些攻击瓦格纳的人和解。于是拉福退出协会，背弃了阿尔滕堡，并且带走了波尔。

新魏玛派刚刚诞生，就已经四分五裂。

现在最好是马上离开这里，象年轻时那样再到世界各地去流浪。可是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目前需要的是自我克制和坚定不移。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用金粉粉刷的蓝色房间、写字桌和工作在等着他。放在桌上的韦伯的警句提醒他：坚持就是胜利！

他周围的世界风云变幻，但他还是继续创作，写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他在给阿道夫·斯达尔的信中写道：

> “我正在努力完成我的交响诗。已经写了九部。一八五五年将在莱比锡出版。乐谱约有一千页左右。这是令人疲惫不堪的长期劳动的结果。我还写了一部《浮士德交响曲》。这就是我全部的工作，比这再多、再好的东西我已经写不出来了。”

这里放着李斯特写的九部交响诗：《山中所闻》、《塔索》、《即兴曲》、《俄耳甫斯》、《普罗米修斯》、《马捷帕》、《节日之声》、《英雄的葬礼》、《匈牙利》。这九部交响诗遭到了许多次各种各样的攻击。最常见的说法是：这都是些草稿，只是有着魔鬼之手的钢琴家的即兴作品；这些即兴曲有的写得还可以，有的写得很糟糕。可这都是些奇怪的即兴曲。《山中所闻》整整写了二十一

年，一八三三年开始写第一稿，直到一八五四年才最后完成。费兰茨经过了多少斗争——同自己斗，同拉福斗，经过了多少多余的争论，浪费了多少时间，最后才重新组成了一个真是超越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贝多芬交响乐队的新乐队。演奏《山中所闻》的乐队里有短笛、长笛、双簧管和单簧管各一支，有两支低音单簧管和两支大管，还有四支号角、三支喇叭、三支军号和三台小鼓，另外就是大铜号、大鼓、铜锣、铜钹、竖琴和弦乐五重奏小组。《塔索》虽然只写了五年，但是《即兴曲》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完成大约花了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俄耳甫斯》的思想还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有一次，他陪父亲参观巴黎的罗浮尔博物馆，在古物收藏室里看见了一个古瓶。它也许是古罗马前的艾特罗斯克人的杰作，但也可能是古希腊人的遗物。瓶上画着俄耳甫斯，周围的石头、飞禽、走兽和人群都在听他演奏音乐。费兰茨当时想到：就是今天，人类也仍然需要俄耳甫斯的琵琶。尽管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道德观念、法律、教条、科学和文明，但是野蛮和贪婪还是到处蔓延。俄耳甫斯最终并没有逃脱一个善心调解人的命运，被活活地宰割而死。今天的艺术家也许能幸免这样的灾难，但是他手中的武器也只有一支琵琶。只有《普罗米修斯》真正是由即兴演奏开始的。一八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在纪念赫尔德的节日演出活动中，费兰茨第一次表演了这首曲子。节日讲话都过去了，话剧《普罗米修斯》的布景和道具在魏玛剧院的破旧仓库里也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但是普罗米修斯的音乐旋律还始终萦回在他心间。他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整整花费了四年时间才写成最后的乐谱。这已经不是即兴的作品，而是崇拜英雄的心声。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带来了智慧之火，从而创造了叛逆的生物——有智慧的人、与众神平起平坐共同统治世界的人。《英雄的葬礼》也完成了。这是从伟大的《革命交响

曲》中唯一剩下来的残缺不全的部分。黑色的皮鼓，加上举国悲哀的钟声。乐谱上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音符提到，但是人人都知道，死去的英雄就是匈牙利。这部作品是为自己的祖国而创作的，是费兰茨向自己祖国伸出的手。但是没有人接过他这只伸出去的手。他九部交响诗中的最后一部《匈牙利》，也是为国内的朋友们，为戴莱基们、阿库什们、赛钦尼们、弗斯代蒂奇们以及所有热情支持他的知名和不知名的人们写的。他虽然不认识这些人，但是他们却象亲兄弟一样亲近他。不过，《匈牙利》首先是为维莱什马季·米哈伊写的。他在自己的诗中曾经称费兰茨为世界闻名的音乐家。

就是这样的九部作品。它们是费兰茨青年时期和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的总结。这九部交响诗是一种新体裁，更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音乐史上的新时期。尽管很少有人象李斯特这样热爱和尊敬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形式，但他还是在被粉碎的交响乐基础上，在被推倒的教堂的废墟上，建造了新的建筑物。这种新建筑物的规律、力学基础和平衡结构，同十八世纪音乐建筑物完全不一样。

“我们不能怀疑，音乐也能象当代的诗人一样描绘本世纪。音乐同文学有密切联系，甚至直接依靠文学来揭示我们穷困和彷徨的原因。音乐家也想满足时代的需要，反映时代的努力，因此在音乐厅中表现音乐作品的标题，同在歌剧中采用朗诵的手法一样，都是难以避免的。这两种形式，即建立在标题与思想链子上的交响乐和采用朗诵手法的歌剧，必将胜利地克服一切障碍，不顾人们的反对而胜利地发展下去。这两种形式是我们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去反对标题音乐呢？其实听众在听任何一种交响乐、七重奏或其它音乐作品时，总是根据乐曲的活泼、豪放、欢快、温情或忧郁的感情而联系到

某种标题。他们总是为自己想象出某种同其他标题不一样的标题。我们音乐家要指导听众的想象，告诉他们应该朝哪个方向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这九部交响诗曾赢得了许多掌声和热情赞扬，也遇到过重重障碍和粗暴攻击。费兰茨风趣而挖苦地把这两条战线叫做职业音乐家的战线和能干音乐家的战线：

"在能干音乐家和职业音乐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职业音乐家们——旧约的伪君子们——为了坚持法律的一字一句，甚至不惜扼杀法律的精神实质。职业音乐家们尊敬旧约中宗法制度的家长(就是前几个世纪的那些作曲家)，奴性地模仿他们的空洞形式，尽管这些形式的空气和光线早在当时就已经被大师们吸收殆尽。能干音乐家们承认，宗法制度的家长们已经完全吸取了自己所创造的音乐形式的精华，因此模仿者至多只能作些表面的抄袭。他们认为，如同大音乐家们在自己的时代一样，他们也将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形式！"

九部交响诗……批评这九部交响诗的都是些多么奇怪的人呵！他们诅咒，设置障碍，指责音乐诗人搞低级趣味，向全世界宣布他只是个一钱不值的音乐业余爱好者。可是与此同时，正是这些绝对正确的法官们在一个接着一个地剽窃柏辽兹、瓦格纳、李斯特等开路先锋的精神财富。他们有时偷窃的是某种乐器的配备方法，有时盗去的是某个大胆的变音；从这里偷偷地弄去某种音响效果强烈的节奏，从那里又暗中把别人的某个新旋律据为己有。

"我们对手的嫉妒心情表现得最清楚的地方是：他们从来不肯偿还他们的良心应该偿还给我们的欠债；他们一方面拔光了革命创新者身上所有的毛，并且用它们来装扮自己，一方面却又在公开的市场上高声诽谤他们今天、明天和今后永远也赶不上

的那些大师们及其优秀作品。”

告　别

杜塞尔多夫，一八五六年二月八日

尊敬的李斯特！

舒曼夫人交给我一项不愉快的任务，要我把她遭到的沉重打击转告朋友们，向大家宣布舒曼逝世的消息。您从前曾与这位永逝的大师有过艺术上和友谊上的交往，在得悉这一消息时定会倍感同情，对此我深信无疑。虽然你们各自的生活道路迥异，甚至互相背离，但我可以肯定，对于这位伟大人物的离去，您会比我们谁都更感悲痛。

尊敬您的约基姆·约瑟夫

李斯特三番五次地拿起这封信，反复读着：尊敬的李斯特……往昔的热情、友谊的拥抱、对魏玛泪水盈盈的怀念都到哪儿去了？剩下的不过是这么一点点：尊敬的李斯特。在死亡面前也未曾软化的克拉拉竟连发布讣告都不愿亲自操劳。不！她把这件事委派给约基姆，而约基姆又忠实地按照她的语调通知李斯特！但不管怎样，一定要为舒曼举行纪念周，重新出版有关罗伯特和克拉拉的文章。是的，印刷体字母是可以重复的，印刷机会耐心地听从人的命令而行动。但它能否重现往昔的春天德累斯顿、莱比锡呢？它能否重现那些热情奔放的青年希莱、门德尔松、舒曼和克拉拉呢？……其中的两人已经离去，几时该轮到他自己呢？

布兰丁和科西玛

彪罗紧急来信，要费兰茨立即到柏林去，因为已公布的李斯特音乐会可能是一场硬仗，最好由大师亲自指挥这场战斗。彪罗这次也干得十分出色。他不仅是个钢琴艺术家，而且还是个即兴的演说家。他要求听众中的不安分子和捣乱分子离开大厅，不要去干扰那些在音乐中寻求享受的人们。他象军人一样，声调干脆而果断，仿佛站在他后面的不是一架钢琴和五十来人的乐队，而是一个榴弹营的部队。这一着立见成效，人们喜欢这种出其不意的行动。他们对这种果断性，对这种多数人所缺少的勇气赞叹不已。

演奏会后，在彪罗的直接要求下，李斯特和彪罗步行回家。

"我还未见到孩子们呢……我的女儿们都好吗？"

"我母亲感到十分幸福，因为她觉得再没有比教育您的孩子更为美好的生活目的了。看起来布兰丁和科西玛也是满意的。大师，我希望科西玛能长期地、永远地把柏林当成她的新祖国。"

费兰茨抬起头来说道：

"我不想让女儿们永远离开巴黎，她们可以好好地学习德文，胜过她们的父亲，"他带点自我嘲讽地接着说："当然还可以在我的杰出的汉斯的领导下学习音乐。然后，她们还是要乖乖地回到巴黎去。"

两人长时间沉默不语，只有脚步声在嘎嘎作响。最后还是彪罗开了口：

"大师，我喜欢科西玛，现在正式提出向她求婚。"

费兰茨停下了脚步，转身对青年人说：

"汉斯，你听着！我们不是生活在中世纪。我哪知道我女儿

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东西？也许她已有了意中人。要是没有，她就还在寻找。她是不想在第一个求婚者面前就定下弦来的。”

从前的那种红晕又在彪罗的脸上泛起：

“大师，我觉得您好象把我的真情实意当成一个随随便便的玩笑。我爱科西玛，离了她，我就活不下去！”

“这种话已经有不少人讲过，孩子。你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想。三个孩子的重担落在我肩上。我不是模范父亲，我担心我在任何方面也当不了楷模。作为一家之主，我是做得不够的。我怎么能够在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刻，在紧张的演奏之后感到精疲力竭的情况下，轻率地决定我们两人都非常疼爱的人的前途呢？”

彪罗不再寻根问底，但在几星期后他给李斯特去了一封表示绝望的信：

> “尊敬的大师！您的犹豫不决的态度一直在折磨着我。我担心您在怀疑我的人品和责任感。我担心我在您眼里是个完全无关紧要的人。这使我非常伤心，使我不愿坦率地倾诉我的感情。某种古怪的、天生的生硬性格和一定程度上的胆怯心理阻碍着我向科西玛表示爱情。请你相信这一点而不要报之以怀疑的微笑。这是超过爱情的东西。您是我思想的创造者和灵感。我当前和未来个性的形成都应归功于您。能够靠近您，就是我最大的愉快，至少我是这样梦想的。李斯特·科西玛带给我的将不仅是您的姓氏，而且还包括所有那些在你们两位身上十分相似，并使科西玛成为您忠实的镜子的内含素质……”

几个星期后，彪罗在柏林指挥演奏李斯特的作品和《汤豪塞》序曲。他又象当年紧张不安地到阿尔滕堡去拜访的学生一样，满面红晕。颤抖的双手几乎握不住指挥棒。他吃力地开始指挥演奏，目光不断转向舞台附近的包厢座。费兰茨和科西玛紧挨着坐在那里。乐声总算响起来了，但在第二个节目以后，演出几乎中断了半小时。彪罗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晕倒了：一方面因为他今天指挥的是比较难的新作品；另一方面是听众中有费兰茨和科西玛。

费兰茨当然是第一批冲到后台去的，科西玛紧跟在他后面：

"怎么啦，亲爱的汉斯？"

科西玛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把她冰凉的手掌放在这位年轻指挥家的额上。

费兰茨重复着他的问题：

"怎么啦？"

汉斯微笑着致意：

"哦，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亲爱的大师！"

科西玛直起身来，端端正正地站在父亲面前：

"我们彼此相爱，爸爸，我们打算不久便举行结婚典礼，我希望您不会有什么意见。"

李斯特丝毫也不反对，不过他怀着某种特殊的压抑感觉察到：从科西玛表示幸福的同意那一瞬间开始，这两个年轻人就不再把他放在眼里了。他们不再需要他了。需要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一年，甚至比这更少？那时也许会收到一封汉斯的来信："尊敬的李斯特……"

彪罗的家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彪罗的母亲感到无法形容的幸福。汉斯兴高采烈。科西玛沉默不语，陷入沉思。经过长时间的斟酌才说出了憋在心里的想法：

“我们自然应该单独安家，年轻夫妻可能会给妈妈造成负担，”她羞答答地补充道，“万一还有孩子。”

费兰茨要科西玛放心：单独的住处会有的，一对年轻夫妻开始过日子所需要的一切其他东西也会有的。李斯特还未讲完话就把目光转向布兰丁。确实使人发愁的是：小的一个马上就要当妻子了，可是大的一个至少暂时还未嫁出去。但布兰丁丝毫也不显得忧愁，她的兴致特别高。最后，她跑到父亲面前表示：

“现在可以告诉您了：我是作为未婚妻从巴黎来的，只是当时还不敢承认……”

“那么，那幸福的年轻人是谁？”费兰茨问。

“奥列佛尔先生……年轻的律师，但现在人们都把他看做是法庭的首席发言人。”

费兰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不管怎样，我希望奥列佛尔先生最好能来见见面。”

阿格妮什

阿尔滕堡一片宁静。

彪罗早已离去，布隆沙尔特也跟着走了。塔西格是不得不离开这里，然后是叛乱者撤离：带头的是拉福和波尔。

阿尔滕堡一片宁静。玛格尼也出落成大姑娘了。卡罗琳陪着她遍游了一个个疗养地。传闻有一大群献殷勤的小伙子和求婚者整天围着姑娘转。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有个象金色烟幕一般的传说飘游在她们后面——玛格尼有数不清的家产。

有一天，阿格妮什·斯特里特也走了。

他们一道坐车到了耶拿。两人在那里道别。她那双美丽的绿眼睛全被泪水模糊了。

“我爱您。但不管我多么爱您，也不能再这样不光彩地躲躲藏藏。我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宣告：我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有权在这里，我一定要留在这里。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会杀害卡罗琳，就等于毁灭了您最忠诚的庇护者。”

这次惜别使费兰茨非常伤心：

“亲爱的，您这样冷静，这样清醒地来考虑问题……象您这样明智的人，肯定是不会太爱我的。”

她漂亮的绿眼睛里噙着泪水：

“我在您面前是非常脆弱的。请求您别再挽留我了。因为我害怕仅仅一句温情脉脉的话就会使我的聪明才智丧失得一干二净。”

连阿格妮什·斯特里特也走了。

阿尔滕堡一片宁静。费兰茨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

“难道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故乡？我将在这里结束我的生命？”

年轻的科乃留斯来敲门（他大体上接替了拉福的职务）：

“有信，大师。”

“哪儿来的？谁写来的？”

“是从匈牙利来的。”

费兰茨自己念出了寄信人的姓名：奥古斯·安道尔，佩斯—布达。

弥撒曲

伸出去的手终于被握住了。是奥古斯·安道尔写来的信。他通知李斯特说，曾任佩奇主教，现任埃斯代尔戈姆红衣大主教

的西托夫斯基·亚诺什想把昔日的梦想付诸实现。费兰茨过去曾应允为其即将重建的佩奇大教堂写一个节日弥撒曲。红衣大主教现在想把原来的计划变动一下：李斯特的节日弥撒曲要放在埃斯代尔戈姆大教堂的落成典礼上演奏。

计划是美妙的，任务是艰巨的。问题仅仅在于，这项使命是否能真正使他靠近自己失去的祖国？奥古斯·安道尔是总督管理区议会主席。费兰茨虽然不大懂政治，但连他都知道，总督管理区议会在匈牙利是个不得人心的机构。温和的匈牙利人称议会的领导人为妥协派，激烈的匈牙利人则称之为卖国贼。奥古斯本身是个正派人，他廉洁奉公，有良好的愿望。他总是力求把最卑鄙的指示也变得不那么露骨，使在桎梏下遭受折磨和凌辱的匈牙利民族能够稍为好受一点。他肯定是个心地纯洁的人，但也肯定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不怎么受欢迎的人。而现在要使自己依附于这样一个人，从而依附于一个红衣大主教。不管在个性和人品上多么突出，大主教毕竟还是那个否定民族自由斗争，与科苏特作对，一听到废除帝制就会失魂丧胆的教派的头头。大主教从未放过一个能够表现自己对皇上忠诚的机会。

他要是回国，去创作弥撒曲，那显而易见，他就成了西托夫斯基和奥古斯的盟友。他要是回国，能在佩斯—布达使生活重新活跃起来，那就等于把欧洲迁到了一个惊恐满布、万马齐喑的国家。在那里，五年多来，法律为命令所取代，真理受到暴力的压制。他要是回国，就必须超越习俗，超脱出日常的政治。既不支持右翼，也不支持左翼。既不能装模作样地把自己打扮成从国外归来的流亡者，也不能去积极拥护当局压迫人民，起一种更危险、更恶毒的作用。他要是回国（一旦产生了这个念头，他在思想深处便已作出了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归祖国），便要在欧洲和匈牙利之间重新建起一座桥梁。他要是回国，诗人们、音

乐家们肯定会重新活跃起来，人们也可能呼吸得稍微自由一点，稍微大胆一些，稍微坦率地发表意见。须知李斯特的回国决不可能是出于一个纯粹的偶然，这肯定是历史的春天已经来临的第一个信息。

他不再继续去掂量各种可能性了：我要是回国……而只是简单地作出决定：回国去！

“我最尊敬的杰出的朋友，敬爱的奥古斯先生！今早得悉您的来信，对于您在信中通知我的好消息，不胜感激。西托夫斯基阁下对我的善意使我感到无限的荣幸，但愿我能够如自己希望和责任规定的那样予以报答。我对教堂音乐艺术早有兴趣并有所涉猎。我在罗马曾经深入研究过帕勒斯特里那和奥尔兰多·第·拉索，但还没有机会在我自己的创作中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坦率说来，这是由于创作教堂音乐的可能性不太大……尽管如此，几年前，我还是出版了一部用管风琴伴奏的男声弥撒曲，还写了《天父》和《圣哉玛利亚》。这是为了满足我的一种内心需要，它比一切外在的利益都重要得多。上述作品是今后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实现自己设想的一个思想阶梯。能有比埃斯代尔戈姆大教堂这个基督教和我祖国的古老圣宇的祓除典礼更为理想、更为隆重的机会吗？当我一想到那景象的宏伟，脑际里就出现圣经中古罗马百人队长的语句：天父，我是不配的……

亲爱的奥古斯，尽管如此，对于您转告的主教阁下的建议，我还是万分感激地表示接受。

敬爱的朋友，请您再一次接受我衷心的谢意。借

此机会，我向您保证，我将作出一切努力来证实：你们找到了恰当的、对您十分尊崇的人选。

谨致衷心的问候！　　　李斯特·费兰茨”

费兰茨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这也就是说，他正以孩提般的天真在进行创作和准备实现祖国对他的期望。《爱怜》正在构筑起来。《光荣》的和声如同阳光照射在一个梦想中的大教堂的巨大玻璃窗上，灿烂夺目。《赞美》的钟声在召唤人们去祈祷。《圣灵》披上了赋格曲的复杂外装。《复活》的韵律在跳动……

他在进行工作，勤奋而不知疲倦。他哪能想到，各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的错综复杂的机器正在国内开动起来：一定要把李斯特·费兰茨同他的祖国远远分开，把欧洲同匈牙利远远分开，使那种认为多年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的希望变得遥遥无期，或者彻底破灭。李斯特在孜孜不倦地勤奋工作。他根本不曾想到，正是他从前的老朋友，这个曾经拥抱和亲吻过他、并以亲兄弟相待的菲什台蒂契·莱沃在反对他。他的风言风语充塞了西托夫斯基红衣大主教的耳朵：阁下要是把李斯特放进教堂，给未来音乐敞开大门，那就等于是给理查·瓦格纳，也就是给感官上的、无视上帝的异教徒敞开大门。这些人不敢举起丁字镐来毁坏神圣不可侵犯的墙垣，而是企图从内部来瓦解天国。

但是西托夫斯基不好食言。他迟迟不敢撕毁协议。于是菲什台蒂契继续进谗言：让各种各样的疯狂尝试到剧院或世俗生活的舞台上去竞技吧，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它们进入天主教堂，要是我们把神圣的教会弄得荒唐可笑，就等于侮辱了耶稣的教堂。

红衣大主教的信是一篇甜言蜜语的杰作：

“我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回忆起您在我这里度过的那些日子，那是你取得最美好成就之际，当时您曾经答应我给佩奇大教堂创作弥撒曲。但不幸的命运使得大师的高贵诺言无法实现。当埃斯代尔戈姆大教堂即将落成之际，这一点就越发使我感到不安。祖国的最高教府和教堂之母在接受您的才华、艺术和信仰的盛情上越是当之无愧，我就越是指望这个诺言能付诸实现。我必须承认，我曾多次强调我的这种要求，从而使许多人思想上产生一种我们要用您的弥撒曲来为教堂被除的想法。但是在对情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之后，这一时机就显得并不那么理想。感恩大典要持续四小时，相当使人疲劳。这样，紧接在它后面的弥撒曲音乐势必应该短些，才不致在普遍感到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再去增添疲劳。还应该考虑到进出群众的经常不断的嘈杂声。可以预见，小小的埃斯代尔戈姆市会在这样盛大的节日里拥挤不堪。由于各地主教都在场，我本人也不能尽情欣赏您精彩的表演。以上这些考虑使我不得不把自己这种最强烈的愿望推迟到以后一个更恰当的时间去予以实现。

西托夫斯基·亚诺什”

这无疑是一口苦酒，是他有生以来不得不品尝到的一种最苦的酒。他们让他写了一部大作品，激励他，暗示这次聚会将是整个民族和大艺术家的一次热烈拥抱。然后呢，一封敷衍塞责的信，几句甜滋滋的、彬彬有礼的话，几条东拼西凑的理由，就否认了，也可以说是抛弃了他们的精神之子。

李斯特向卡罗琳抱怨。

这位女人的论点十分明确：

您现在是欧洲音乐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不仅彼得堡有人来求您，而且巴黎、伦敦、米兰、佩斯—布达、维也纳、布拉格和罗马都有人来求您。现在，您是爱好音乐的欧洲的第一号人物。我听到了您无言的反驳：那么瓦格纳呢？他是流浪者、永恒的流浪者。就象他自己创作的那个既不能在天上，也不能在地下找到安宁的沃唐一样。这个流浪的沃唐当然不能成为精神世界的中心。王公们需要有都城、稳定性和环境，需要有他的宫廷生活。但瓦格纳没有，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而您呢？您扎根在魏玛，这样就有可能把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吸引到这个小岛周围。我还听到您另一个无言的反驳：那么，他们用以对付魏玛未来派音乐家的无理仇恨、粗暴批评、蔑视嘲讽和傲慢态度又当作何解释？这也与您的地位有关，亲爱的。只有大人物，只有超出一般水平的巨人才会被人疯狂的仇恨……您懂吗？站在红衣大主教背后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不愿意魏玛的大人物、领导欧洲的精神天才回到祖国去！这次会见潜藏着什么样的危险，您知道吗？维也纳需要您，因为贝多芬在这里亲吻过您的前额。巴黎需要您，因为您在那里长大成人。瑞士需要您，因为您在那里成了音乐诗人。意大利需要您，因为您在那里初次领尝了幸福的滋味。魏玛和整个德国需要您，因为您在这里成为您应该成为的人物：一个世纪的领袖！而您还是要回国……承认自己是匈牙利人，宣传自己是匈牙利人。那些站在红衣大主教背后的人却不断地往他耳朵里悄悄吹风，他们说：不需要李斯特！李斯特只管留在国外。别充当发酵剂，更不要煽风点火。就让他乖乖留在国外吧。感恩弥撒曲将来自会有某个教堂乐师来写的，此人越不知名越好……

费兰茨握着笔艰难地寻找着词句：

"——十分尊敬的朋友奥古斯！我从您的来信中领会到，我为埃斯代尔戈姆大教堂所写的弥撒曲以及我本人亲自参加节日盛会，都将引起麻烦。假如我放弃这一切，也许会使许多人感到舒服得多、愉快得多。"

以后他还用了许多痛苦的措辞，但其主要内容不过是：

我决不把我的友谊和爱强加于任何人！

奥古斯并不罢休。他一次又一次地给红衣大主教办事处写报告。他必须揭露一个真正的阴谋。菲什台蒂契以一封所谓的李斯特信件为借口，说李斯特在这封信中嫌合唱队的人数太少，乐队太小，因此认为还不如取消弥撒曲的演奏为好。伯爵的阴谋又增加了狡猾的一着。他通知李斯特说，他作为民族剧院的全权监管，"已经着手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抄写乐谱，挑选合唱队和组织乐队等。这样一来便捆住了李斯特的手，使他相信事情已经有了某种安排，不需要再采取什么步骤了。奥古斯终于撕开了这张精心编制的罗网，几乎可以说是赚取了红衣大主教的批准。不料红衣大主教又一次收回了自己的诺言。以后费兰茨就只好同西托夫斯基红衣大主教直接通信了。艺术家不卑不亢地坦率陈言：红衣大主教被一群弄虚作假的阴谋家、外行和低能的专业人员包围了，这些人的一点小小的烦恼也要比欧洲或匈牙利的新的教会艺术更为重要。

一八五六年六月十日，红衣大主教通知费兰茨：由于"各种各样的"障碍，大教堂落成时不能演奏李斯特的弥撒曲，而只能演奏由教堂乐队指挥赛伊利尔·尤若夫写的作品。公开的和幕后的斗争进行了整整两个月。费兰茨已经不想再理这件事，但对奥古斯来说，此时已不是保卫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的问题，而

是维护自己声誉的问题。最后总算克服了一切障碍。一八五六年八月十日，费兰茨在埃斯代尔戈姆主教费凯泰·米哈依的住处下榻，他谢绝了各种各样的接待、仪式、宴会和火炬游行，缓缓地步行到大教堂的山冈上，观赏了教堂建筑，试奏了管风琴。八月十一日早上五点乘早船抵达佩斯。他有意挑选了早上的交通工具。因为最近半年那种不怀好意的、侮辱性的斗争还在他背后进行。他不需要任何人接待，不需要人们用越来越令人怀疑的客套话来招呼他。他黎明五时到达佩斯后，就单独一人散步到"英国女王饭店"。夏天虽热，但黎明时分还是凉飕飕的。空旷无人的街道，根本不象他从前同父亲来过，后来青年时代成名时又到过的佩斯一布达。当时那些庆祝活动，那种兴高采烈的气氛和忘乎一切的崇拜火焰，象一道火墙一样把他团团围住，他哪能有空闲去观赏这个城市。现在一切又变得如此宁静和冷清。他独自一人散步到"英国女王饭店"。中午是礼节性的拜访，来的人有艾克尔、莫索尼·布朗德·米哈依、阿伯拉尼·科尔内和中途接替民族剧院领导职务的拉道伊·盖岱昂。他无需害怕艾克尔。此人并没有发表什么节日的讲话，而只是在嘴里喃喃有词，犹如在嚼着一口难以吞咽的苦食一样。最后他十分伤感地说：

"我们真正感到高兴的是多年不见之后，您又重新出现在我们中间。"

阿伯拉尼·科尔内用一口流利的漂亮法语表示欢迎，原来他在巴黎住了整整一年，曾是肖邦和卡尔布奈纳的学生。艾克尔说了两三句话后便沮丧地沉默了。而阿伯拉尼却象一个机灵的吉卜赛人那样，花言巧语地说了一大堆。一点点音乐构思就足够他编一套完整的幻想曲。他提出上百种的计划，但费兰茨一个也没有采纳，而是同意了艾克尔的意见：参观伯利格萨斯地

区的一家钢琴厂。这是匈牙利第一家制造键子乐器的手工场。费兰茨坐到一架最新的乐器前，即兴地演奏起来。他现在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许久没有坐在黑白琴键面前了。现在他演奏起来，一次又一次地重现过去，一直回溯到比豪利·亚诺什，甚至更远一些，回溯到他在四十五年前出走的那个农村。艾克尔是难得称赞人的，但现在他也在拚命地叫好："伯利格萨斯，千万别把这架钢琴让给别人！因为它被世界上无以媲美的一双手弹奏过。"

他们下午也在一起。弥撒曲的排练开始了，艾克尔在下面坐在乐师们中间，不断地自言自语。后来使朋友们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笑了起来：

"李斯特先生可能是一边祷告一边写下弥撒曲的每个乐章的，但要合唱队练会它，他肯定会一边教一边骂。"

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合唱队已习惯于业余合唱团的风格，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习惯于吉卜赛的唱法，十分自由，非常松弛。而现在却要他们掌握节奏，要求嗓音清亮明晰。他们原来习惯于中等水平的合唱团指挥，现在却要适应世界上最严格的指挥家李斯特·费兰茨的风格。气氛紧张到了快要危及共同协作的程度，但李斯特采取了一个驱散冷漠气氛的行动，他邀请全团人员作客，乐师和歌唱家都统统包括在内：要他们现在去听一种亲切的音乐。于是他们一同来到科姆洛花园帕蒂卡利乌斯·费尔科的酒店里作客。这次玩得非常痛快，以致第二天全城都在议论它。李斯特给帕蒂卡利乌斯一百福林（全城都这么说），但后者以一种王公式的傲气如数退还：我怎能要同行的钱！聚会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某种公开的阴谋活动也随之遍及全城，以至全国。街上出现了盘着彩绦的匈牙利服饰。这些是从哪来的？是怎么弄到这些服装的?!因为巴赫时代的宪兵对藏有骚乱

性纪念品，如科苏特皮帽、匈牙利节日服装、盘着彩绦的匈牙利衣服的公民是要处以笞刑，甚至监禁的。是谁在怂恿成千上万的人？是谁在使佩斯—布达的警官感到当着李斯特的面难于对和平的行人采取警戒措施？这些人的唯一过错就是与欧洲的时髦对着干，象我们百年以前的祖先那样，穿着盘着彩绦的坎肩。

许多橱窗中都装饰着李斯特的肖像。这里给他戴桂冠，那里给他献野花，但肖像却是到处都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B大调奏鸣曲》是支撑一个世纪的建筑物的拱廊，而《前奏曲》或《浮士德交响曲》又开辟了音乐史上的新时代之类的道理；他们也很少懂得匈牙利是因李斯特的《狂想曲》才第一次进入欧洲音乐生活的。但正是这些一般的、无名的小人物站在橱窗前，以无限喜悦的心情私下议论着：

"他回国了，就在我们中间，新的世界开始了。"

一八五六年八月十八日，人们为李斯特安排了节日晚餐。致敬的大合唱曲子是热情奔放而兴致勃勃的多卜列尔·卡洛伊写的，歌词的作者是瓦伊达·亚诺什。

永恒的新闻和凯旋载你归来，
我们的心在你血液中跳动。
未被时间埋没的歌声在响鸣：
爱你的祖国为你而骄傲，
胡约第和兹里尼的
祖国向你致敬！

你应该为它感到骄傲，
别忘记，那孕育你魔力的土地，

是英雄和奇迹的祖国，
是举世无双的人民，
她隐藏着无言的悲痛，
也能因欢乐而哭泣。

哦，到我们中间来，留在我们这里！
因为我们还有信念与爱怜。
有信念的人就能生活下去。
为我们奏一曲奇妙之歌吧！
那千百万人不能言传，
而只能意会之歌。

也许你要离去——世界在召唤你，
那就把人民的信息
带到国境之外去：
那在圣洁的歌声中
吐露无尽哀怨的人民
是永生不朽的！

在李斯特第一次清晨散步时所见的死气沉沉的城市佩斯—布达，仿佛又恢复了生机，苏醒过来了，幸福地伸着懒腰。安排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在埃斯代尔戈姆的排练；乘快船回佩斯；出席"圣诞节大厦"的节日招待会；参加音乐学院院长布劳埃尔家中的音乐聚会。魏玛乐队的匈牙利籍提琴手辛格尔当时也正好在国内。他们演奏奏鸣曲一直到黎明。第二天，费兰茨为内城教区的信徒们演奏，亲自指挥莫索尼·米哈依的弥撒曲。一八五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半，《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终

于在民族博物馆内进行公开的彩排。尽管票价大大提高，但人们还是不得不为获得一张入场券而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往往是十来个人去争夺一张票子。

国内的评论界比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和维也纳的音乐专家们对他更为了解。《家庭报》的记者奈伊·费兰茨对这次彩排作了如下的描绘：

“我被那瞬间的力量征服了。你们别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们看我的面孔，就不能不发现它留有最美好享受的痕迹，看我的眼睛就不能不发现那燃烧它的圣洁火花。当然罗，我参加了最庄严的音乐的凯旋节日。鄙人感到无限满足的是能够和千百人一起用掌声来赞美这一胜利。那些只带耳朵去参加这个节日的人是没有讲话资格的。耳朵只能挑剔某个小提琴或黑管是否跑了调，耳朵只能研究音乐中有无赋格曲，耳朵只能判断乐章的比例、结构和作曲的水平。那些只是想批评或专找毛病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此瞬间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我享受了，经历了。我不仅是把耳朵，甚至是把心灵带去参加节日的。一听到那种雄鹰和云雀在空中抖动翅膀赞美世界之主、万物的缔造者的声音，我这颗心也象长了翅膀一样，飞越了世界的一切。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去参加节日的。如果你们带着这样的心情踏进民族博物馆的大厅，你们也会感到无比的幸福。那位音响的大师就站在乐谱架前：他站在台上，在所有人的眼里，俨然是一个领袖。飘动在他头上的诗人般的鬈发已由于岁月的流逝而花白，由于探索的劳累而褪色。但他却因此反而显得更

加精神、更加令人惊奇和更加动人了。他就站在那里，人们迄今称他为钢琴之王……当你们听到他这种最热烈的思想和最内在的感情的美妙作品后，今后又会怎样称呼他呢！

哦，尽管你仇恨他或中伤他，但当你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如果还不伸手去与你的敌手讲和，你就再不可能去热爱任何人、任何事物了。诗人倾吐自己的怨诉，会在千百万人的心中引起回响，演说家抒发自己的崇高感情，会在千百人的心中唤起振奋和决心，激励他们去行动。而当音乐充满魅力的幻想在你心灵上悄悄低语，它的巨大台风震撼着你的头脑的时候，你难道还能不感觉，不感动，不振奋，不变得崇高起来吗？当然，千百万人的回声对音乐作了回答，因为音乐的声音发自大自然的神秘肺腑，音乐的声音解释了那种使千百万人心中暗暗感到痛苦，但又使他们获得安慰、鼓舞和拯救的东西。

向你致敬，著名的音乐英雄！你在圣洁的音乐诗歌中也为匈牙利的名字赢得了地位。李斯特·费兰茨，请戴着音乐诗人的花环接受我们三次祝贺吧！”

他们为费兰茨准备了专门的船只，但他却同乐师们、歌唱家们一起坐“玛利安娜号”汽船去旅行。这里的隆重接待是再也推辞不掉的。帽子上扎着彩带的吉卜赛乐队、致敬的礼炮、节日演讲、接待委员会，还有那些滔滔不绝地念着儿童诗歌的傻孩子们。最后才发现，筹备委员会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唯独一件事被忽略了：没有给费兰茨安排住处。费兰茨快活地耸耸肩，应付了这一狼狈局面：船上总会找到一个角落，我随便睡在什么地

方都可以。

早上七点半开始了感恩大典。十点钟，他们通知乐师、歌唱家和费兰茨作准备。十一点、十二点、下午一点……当《弥撒曲》终于可以开始演奏的时候，时针已指到下午两点。乐师们已等得精疲力尽，歌唱家们热得晕头转向。

下午四点钟是宴会。

又一次出现了安排上的细微"差错"：在红衣大主教的桌上没有为李斯特·费兰茨准备席位。费凯泰·米哈依主教客气地通知他：马上在另一张桌上为他腾出一个座位。平民的血液在费兰茨的脑子里一下子沸腾起来。

"阁下用不着劳神。我在乐师们当中一直感到很自在，今后也乐意和他们在一起。"

他急匆匆地穿过了装饰得花花绿绿的餐厅，等西托夫斯基派人去找他的时候，已经追赶不上了。他几乎是奔跑着向轮船搭板那边冲去。大约已经有百十来人排着整齐的队，耐心地站在帐篷餐厅前面。人们给他找来一只破盘子。他也站在队伍中，丝毫没有受屈和摆架子的表情，反而显得无拘无束，兴致勃勃，甚至还哼起歌来。在帐篷餐厅旁边是一群吉卜赛人。他们吹起了黑管，拉着一把调音不准的小提琴，还弹起一台破旧的洋琴。

哎！音乐响起来了，八月的太阳闪着耀眼的金光，清凉柔和的微风从多瑙河那边吹来……这不是比红衣大主教的午宴更有意思吗?!

红衣大主教阁下看来还是想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一下这次粗鲁的错误。他在第二天安排了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客人有：萨

格勒布、布尔诺和乌迪奈教区的三位红衣大主教、爱尔德伊地区的主教哈伊纳尔德，卡洛伊·伊斯特万伯爵以及不久刚从皇上那里得到男爵称号的奥古斯·安道尔和李斯特·费兰茨。

红衣大主教首先起来讲话：

“上次，先生是那样匆忙地把热心庆祝的众人扔下不管……”

“我不想给阁下继续增添麻烦，本来就已经够使您手下的人惊慌失措的了……”

“先生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因为几十年的斗争经历使我也习惯了严厉的批评。”

“我相信您不会对演奏弥撒曲的因由产生坏印象。我们这些真正的基督教徒总是以宽厚为怀，能原谅人的。”

“我无需原谅任何人，阁下。即使我曾经有过几分钟的犹疑，不想为那些谁都不需要的事情去战斗，去牺牲时间、热血和生命。即使犹疑曾使我有过瞬息间的消沉，但最后我却丝毫没有动摇：我回国了，又开口说话了，我在重新连接那些断裂了的线头，那些对我的祖国——匈牙利的热爱、眷恋和事业心的线头。即使有一些机灵而看不见的手企图扯断它们，它们还是把我和匈牙利连在一起。”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警察能窒息树枝发芽，禁止大地回春和阻挡向往自由的心灵开花。在巴拉巴什·米克洛什家里举行的晚会上，李斯特突然发现，原来佩斯—布达不仅对音乐，而且还对具有欧洲水平的造型艺术感兴趣。费兰茨好象登上了越来越高的山峰一样，感到自己的肺腑无比舒展：这里对德拉克鲁瓦相当了解，他们知道谁是大师安格尔！他们列举了考尔巴赫的最佳作品，还回忆了科乃留斯、奥沃比克和波纳文图拉·杰乃里。

接着在民族剧院举行了音乐会。演奏了两部交响诗:《前奏曲》和《匈牙利》,是由费兰茨指挥的。他不时瞟着坐在院长包厢座里的艾克尔。当然啰,这个乐队是他组织的,是这个忧郁的人组织的。他可曾料到,今天会使他感到多么意外?

两部交响诗演奏完毕后,费兰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乐师们也喘了一口气。接着又演奏了艾克尔的音乐祈祷:国歌。

这是个奇妙的渐强音。一个个热情奔放的人从出其不意的惊异中逐渐清醒过来,起初还有点胆怯,不十分有把握,后来却越来越自豪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千百个人现在严肃地挺立在那里,多年被放逐的旋律,现在又同李斯特一道回来了,它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在大厅中轰响着:

上帝保佑匈牙利人!

费兰茨在圣芳济派修士们那里吃了一顿安安静静的、简简单单的午餐。一盘面糊汤、一片肉、几口酒和一些水果。餐厅内清静而凉爽。谁也不想炫耀自己的聪明智慧,谁也不想装模作样。他们只是围坐在刨光的桌子旁,彼此间很少交谈。

费兰茨感谢主人的招待,然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人怕孤单。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喜欢独自一人呆着的。我老是在想: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一定很愉快,教友们,不过这只有当一个人从一切多余的虚荣中解放出来以后。"

他微笑着,又一次念着近来常常引用的拉丁文警句:我是不配的。

一八五六年九月十三日在圣芳济派修士会的年鉴中记着下面一件事:

"李斯特·费兰茨在圣芳济会众修士面前表示了

他以下的愿望：他想加入第三等级① 的行列……”

一年以后，在圣芳济派修士们的日记中又有了新的记载：

“李斯特·费兰茨已经参加我们的第三等级。”

遗　嘱

阿尔滕堡最后一批客人也走光了。楼上的房间已经封闭起来，公爵夫人的住处上了一把大锁。楼下房间死一般地沉寂，花园里只有后院的一间喷金的蓝色房间里还显得有点生活气息。

窗栓咔吱响了一声，有人在推开窗扇。

接着又是一片沉寂。

宅邸的最后一个居住者李斯特·费兰茨坐在写字台面前书写遗嘱：

“这是我的遗嘱。

写于一八六〇年九月十四日，即教会庆祝圣十字架赞美节的那一天。这个节日同使我一生非常痛苦的神秘感情正好吻合……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虽然多次跌倒过，甚至陷入迷途（我为此在内心深处后悔莫及），但上帝在圣十字架上的光辉从未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泯灭，它有时甚至还以自己的光辉照耀我的灵魂。十二年来，我所做过和想过的好事，都应该归功于我热烈

① 第三等级，指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前有纳税义务的等级。与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的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第三等级参加封建等级代表会议，出席的代表多是富有者，即后来的资产阶级。

盼望能称呼她为妻子的人。但人间的凶狠毒辣和卑鄙的阴谋诡计却顽固地阻碍这一称呼的实现。这可爱的人就是：萨伊·维特根斯坦·卡罗琳公爵夫人，她出生时的名字叫伊万诺夫斯卡。在写到她的名字时，我的手不能不为之颤抖。我的一切欢乐来源于她，一切痛苦在她身旁得到排解。她不仅是完全地、不知疲倦地作我的伴侣，把自己同我的生活、工作、烦恼和使命融化在一起，用建议来帮助我，用鼓励来敦促我，用热情来振奋我，而且她还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卓越的远见和温柔而聪明的话语来支持我。她所做的，甚至比这还要多：她常常否定自己，放弃了她理应享受的一切，为的是能更好地挑起我的整个重担。她把它看作是她生活的财富和唯一的享受。但愿我是个伟大的、创造性的天才，能够用高昂的和声来赞美她！但非常可惜的是，我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声音留给后代。假如我辛勤的劳动还能留下点什么东西的话，那这份功劳都应该记在充分体现了卡罗琳爱的启示的乐谱上……正如我身上的一点浅薄的精神和道德财富要归功于她一样，我所经管的少量物质财富也应归功于她……因为是她在操劳。我身后留下的大约二十二万法郎的资金是她积累和保存的。我请求她把这份小小的遗产平均分给我的女儿科西玛和布兰丁。我亲爱的妈妈李斯特·安娜夫人的年金自然应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

当代艺术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光辉的名字，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闪亮。这位享有荣誉的男人就是瓦格纳。他的天才是我的指路明灯。我曾经追随他。我和瓦格纳的友谊是崇高的。大约在十年以前，我曾

经幻想把新的黄金时代奉送给魏玛，就象卡尔·奥古斯特时代，歌德和席勒的伟大年代那样。这个新的黄金时代的精神领袖本来可能是瓦格纳和我。但由于各种卑鄙关系的代表人物和地方权势的嫉妒和愚昧无知，阻碍了这一理想的实现。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感情和信念：这一理想一定会付诸实现。我请求卡罗琳在我死后也继续与瓦格纳保持通信联系，保护我们之间温情的友谊关系。

留给卡罗琳、玛格尼、彪罗、布隆沙尔特、科乃留斯、布兰岱尔、波尔和塔西格的纪念品，我都一一分好了。

最后，我请求卡罗琳把我嵌在戒指中的护身符寄给卡罗琳·道蒂高克斯夫人，她出生时的名字叫圣·克利克女伯爵。

我请求简简单单地安葬我，免去一切盛大的仪式，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在夜间……”

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在演奏《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之后，他心情开朗地离开了祖国，尽管受到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秋天，李斯特匆匆路过维也纳。后来又在布拉格震惊而感动地听了布拉格乐队的精彩演奏：《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接着他又到了苏黎世。在那里，瓦格纳、费兰茨和海伊姆夫人三人合演了《瓦尔基尔》的第一幕。弗劳·海伊姆演西格林黛，两个男的分别演洪丁格和西格蒙德。实际上，李斯特现在才初次领悟了《指环》的秘密：另外一种射线使金子放射

出的冷光大为失色，这就是爱情的射线。而这种吸引力，这种震撼山河的力量比人的兽性冲动更为强大，要强大千百倍。这种爱情是完全的融合。这种爱情是两个生命的熔融，不仅是肉体上，而且是思想感情上和欲念上的结合。这种爱情是忘我的欲念，它以死亡的永生幸福取代了瞬息间的甜蜜。

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是李斯特四十五岁生日。他的这次生日是和瓦格纳一起度过的。瓦格纳在情绪上显得有点失常，一会儿做些傻里傻气的体操动作让客人们开心，一会儿又好象受了委屈似地溜走了。公爵夫人没有去维护瓦格纳和费兰茨两人体现友谊的亲切聚会，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招待客人。后来，瓦格纳和费兰茨两人单独出去散步。瓦格纳向他谈起一件给自己生活增添新意义的奇妙的爱情遭遇。那个迄今一直向他显示肮脏面貌的世界，现在露出了仙女般的微笑向他走来。那迄今一直以战斗与败北来折磨他的生活，现在正把最温柔的胜利奉献给他。他要去征服一个女人的心，这颗心在他和她两人的视线接触之前早已向他投降了。费兰茨是不太乐意谈论自己的，但现在也不得不讲讲自己的心事：他渐渐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因为有些人是那样卑鄙地，不公平地攻击他，这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只能说明他是在追逐一个由于自己缺少才能而永远无法到达的创作上的海市蜃楼。瓦格纳听到这里突然转身对他说："但愿你还在工作。""当然，在写一个新的作品，而且是写给你的，如果你接受的话……"。瓦格纳在当天晚上就翻阅了《但丁交响曲》。第二天两人一块儿坐在钢琴前。费兰茨弹完了总谱，瓦格纳默不作声地坐了很久，情绪沮丧。后来突然讲起话来，发表了一通即兴演说，其入迷的劲头和强烈的感情达到了非常炽热的程度，真是一篇现成的文学佳作：

"费兰茨，我老早就在寻思，为什么德国音乐界对你作为一

个作曲家的崛起会产生那样卑鄙的、不怀好意的反应？道理很简单：熟悉德国音乐生活及其重要人物和领导机构的人都清楚，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群没有才能的人在相互包庇。不过这个问题不值得去谈论它……我们还不如谈谈这新近完成的巨作《但丁交响曲》。这部作品的性质本身就说明了为什么这样的东西对我们的时代和精神世界是那么格格不入。我并没有指责听众的意思，听众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在目前这一批领头人的底下也不大可能有别的态度。更为重要，更为有意思的问题是，李斯特·费兰茨的创作怎么可能产生在这样一个节奏缓慢的时代。我想，只有当我们置身于一八二〇——一八四〇年间的巴黎时代，才能够理解这个问题。当时，政治家、科家家、作家、诗人、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的精华都云集在巴黎。你这种惊人的创造想象力一定会在他们中间找到有资格欣赏《但丁交响曲》或《浮士德交响曲》的听众……你可以不用担心这部分听众会误解你给他们演奏的乐曲。我想，我的费兰茨，你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是继续体现了那个时代和那个世界的气氛对你的薰陶。但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但丁交响曲》或《浮士德交响曲》产生的原因。我唯一的朋友，亲爱的圣费兰茨，你的英才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同时代人的灵感，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解释，在你的笔下为什么会产生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杰作。亲爱的兄弟、朋友和战友，你千万别忘记了这一点……顺着浪潮游泳的人，容易使自己相信是前进中的冠军。随波逐流的人，不知不觉地就会被日常生活和平庸无奇的海洋所吞没……顶着风浪游泳才是了不起的人，虽然经常受到灭顶的威胁，但当我们精疲力竭地淹没在海底的时候，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成功的高潮抛了上来，这时我们会感到：浪花听到了我们的呼喊声，潮水在一刹那间被吓呆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突然面向宇宙讲话……”

李斯特和瓦格纳一起到了圣克特加伦。这是些令人难忘的日子。他俩交替着指挥乐队：费兰茨指挥《前奏曲》，瓦格纳指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李斯特还作了一次最后的、信心不足的尝试，他给卡洛伊·山道尔大公写了一封信：

> “《尼伯龙根的指环》应该在魏玛有自己的地位……瓦格纳的作品将作为现代艺术的最宏伟的成就统治这个时代。这是奇妙而庄严的。假如平庸无能之辈的势力能够阻止这部作品在世界上传播它的思想，那该多么令人遗憾。”

费兰茨周围的世界仍然是那么明媚，那么晴朗。大公在为李斯特举行的宴会上十分小心地避开了有关瓦格纳的问题，而是要求费兰茨把图林根的守护神——匈牙利女公爵圣·伊丽莎白的形象熔铸在音乐中。这个要求对费兰茨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胜利。紧接着的是又一次辉煌的胜利：布隆沙尔特演奏《A大调钢琴协奏曲》引起了轰动。正好在这“打了胜仗”的日子里，李斯特的希望——唯一的儿子达尼埃尔来到他身边。这孩子象房屋的墙壁一样白皙。他又是多么苗条……窄窄的肩膀……胸腔是那么扁平，的确象安娜常常讲的那样，“灵魂只是到他身躯里睡睡觉”。但这个小小的达尼埃尔比这还要可怕。他好象是一个到大地上来作客的安琪儿似的，迫不及待地要返回天堂的故乡。我的上帝，他懂得多少东西呀：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和匈文。他刚刚准备上大学法律系，就已经是罗马法的专家和那最圣洁的理想——真理的追求者了。李斯特很乐意把他留在魏玛，以便鼓励他多吃点，多到大自然中去走走，多交交朋友，而让书本休息休息。但这根本不可能：达尼埃尔怀着火热的激情，

迫不及待地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自我牺牲，把自己贡献给科学的莫洛克神。另一方面，热心的爱德华叔叔也写信来催促。他事先做了一番渲染，例如为孩子准备了什么样的住处，给他找了些什么样的伙伴。然后一整页纸写的全是当叔叔的一片热忱：达尼埃尔马上来，耽误了课程多么可惜。惜别是带着微笑的，但却是含着眼泪的。李斯特搂着达尼埃尔，多次地亲吻他。小伙子在打开着的火车窗口前站了一会儿（费兰茨生怕他在一月的寒风中着了凉），然后轻轻地念道："世界大名鼎鼎的音乐家！"

火车开走了。生活的脉搏也好象变得微弱无力似的，周围死一般地沉寂下来。

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费兰茨与彪罗一起站在那令人生畏而又十分诱人的指挥台上。汉斯把《^{b}E大调钢琴协奏曲》演奏得多么好啊！该用些什么词来形容这种风格呢：它燃烧起来犹如红炭，冷却下来又宛若冰霜。他们取得了无法形容的成功。他俩并肩站在那里，欠身向听众答谢。下一个节目是《玛捷帕》。演奏过程中出了乱子。这不是听众中自发产生的示威，而是事先经过卑鄙策划的捣乱。李斯特回家便躺下了，又出了一身稀奇古怪的疹子，虽没有引起什么疼痛，但痒得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决不能因此而退缩。他们应下莱茵河音乐节举办单位的邀请到亚琛去，汉斯·彪罗又作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奇怪的是，一个作曲家往往只能慢慢地，差不多是逐渐地明白过来，他在灵感到来的时刻究竟创作了些什么样的东西。李斯特直到现在才觉悟到，即使当他在创作一些最复杂的音乐作品时，他仍然是个匈牙利音乐家。《^{b}E大调钢琴协奏曲》是一种交响音乐，是交响的协奏音乐，它既苗条，又健壮，它象一个来自东方的不速之客，把远东的新音调带到了西方。这次演奏成功了，是一次相当大的成功。老师和学生再次并肩站着，费兰茨又恢复了

从前的舞台经验：一方面在体验表演时的激情，一方面又冷静地观察听众的情绪。楼上第一排坐着希莱，他变得多么苍老，成了一个多丑的酗酒老头呵！希莱……我的上帝，昔日的巴黎：柏辽兹和莫克小姐……四人在一块儿散步，柏辽兹当着她未婚夫的面把这位小姐抢走了，希莱还记得这些疯疯癫癫的青年岁月不?！费兰茨正回想到这里的时候，眼神突然怔住了。只见那肥胖的、醉得满脸通红的希莱从衣袋里掏出一把没有棱角的大门钥匙，把空的一端放到嘴边，吹起哨子来。在他的信号下爆发了一场疯狂的口哨音乐会。这比失败还惨痛。它不仅使艺术家感到难堪，而且使所有那些刚刚热烈支持过作曲家和表演家的人也感到难为情。

受了伤害的李斯特回到家里。他把科乃留斯和哥特沙尔格执事叫到自己的蓝色房间里吩咐说：最好的办法是通知我的朋友们，不要把我的作品强加给听众。把这一切都收起来。我有的是时间，可以等待。时间是会做出判断的：制造丑闻的究竟是我，还是那些把我的作品窒息在丑闻之中的人。

可是时间并不容许他休息。他深感受到侮辱，因而情绪不高，但他还是忠于自己的职守。他是魏玛的精神领袖，因此必须由他来安排歌德—席勒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他发出成百封请帖，其中也给了从前的助手、曾是新魏玛的积极拥护者约基姆。一八五七年八月底他收到了回信：

“尊敬的李斯特：感谢你这个通晓一切的勇敢的精神天才对我所表示的完全信任和持久的好感。你要把我吸收到受你精神支配的友谊圈子里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羞辱，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对你并不是那么坦率的。对这一点，我也并不是现在才第一次感觉到。不够

直率并不算胆怯，它甚至还与我自身固有的最美好的感情是一致的，因为我决不允许把我对真理的热爱和真诚变成伤害你的一根尖刺。但如果我仍然不表明这种感情，那这种感情又有什么价值呢?!我对你的活动所抱的消极态度毕竟还是表明了我对你的工作的反感。因此，我不能再对你隐瞒你的刚毅心灵早就想从我这里了解的东西，即使我坦白得还不很够。我不能不指出，你的音乐离我非常遥远，它和我自青年时代以来就从大师们思想上接受过来的所有精神养料是互相矛盾的。即使有人能从我身边抢走古典音乐家，使我放弃我所喜爱、尊敬并真正感到是音乐的作品，那你的音乐也填补不了这种毁灭所造成的聋哑的空白。我怎么能和那些不择手段地把推广你的作品当成自己天职的人结成联盟呢？我不得不日益疏远他们，而去实现和宣扬我有责任强调的东西。我要成为你们的助手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也不可能在你面前装出一种认为你和你的学生的事业也就是我自己的事业的姿态。所以，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出席歌德和席勒的典礼。由于我对你人品的尊重，我决不能强迫自己去充当伪君子；我对歌德和席勒的尊崇，远比(即使是作为一名观众）对出席这次典礼高得多……”

信的结尾写了一些对这位大师呕心沥血，把青春的精华和“最多产的壮年时代”都贡献给学生的冠冕堂皇的感谢话。这些感人的言词也许会使费兰茨相信：他虽然失去了一位艺术上的战友，但还可以指望他在友谊上的绝对忠诚。但这是一种可怕的错觉，是一种可能使人中毒甚至致死的错觉。正在这时，布兰岱

尔找上门来了。奇怪的是，他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就径直坐火车来到了魏玛。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亲爱的朋友?"李斯特怯生生地问道。

布兰岱尔面色苍白地站在那儿，然后拿出一封联名信放到桌上。原来是约基姆（拉拢了勃拉姆斯、希莱和罗伯特·弗朗茨）反对未来派音乐的十字军宣战书。签名者都一致否定李斯特和瓦格纳的音乐，并发誓要象园丁清除花坛上的杂草那样，把未来派音乐的作品通通铲掉。所幸的是罗伯特·弗朗茨并没有上圈套。这位编辑请求允许他在报刊上发表这份宣战书和当事人的答复。

费兰茨一挥手就扫掉了桌上的信件："这一切都不屑一提，我根本不想知道这些事。布兰岱尔，我只是请你转告我的要求：任何地方都别演奏我的作品。我有时间，能够等待。我相信未来的年代会证明我是对的。"

如果李斯特能够从这种称之为腻味和无聊的苦闷中稍为解脱出来，他也许会得到一点安慰。斯美塔那的热情拜访也许能算是一种补偿。斯美塔那事先写了一封短信，说他即将从哥德堡动身前来：

"尽管我不属于那些能称自己是您的学生的幸福者，但您毕竟还是我的老师，我的一切都应归功于您。"

李斯特和这个沉默寡言、谦虚腼腆的捷克音乐家一起站在参加塑像揭幕典礼的人群中间。有什么办法呢？音乐家的血液和艺术家的脉搏仍在起作用：尽管费兰茨在许多冷漠的（也许是敌对的）群众面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焦急不安的心情仍然使他感到紧张，一直留心着那个将反映他的一切希望和怀念的大合唱作品是否被人注意。

沉寂笼罩着
一个个小山巅，
微风摇晃着
静悄悄的树冠。
长夜在叹息，
苇塘的鸟儿已归去，
不用害怕，
你不久也要安息。

纪念歌德的节日也是李斯特一生中的一个悲剧性的里程碑。宫廷的贵妇们从市政府的窗口上观看塑像的揭幕典礼。其中有个窗口是为卡罗琳准备的。但当卡罗琳走进大厅的时候，贵妇们都纷纷示威性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吵吵闹闹地离开了那个地方，表示她们根本不想与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呼吸同一种空气。费兰茨为人的基本原则是从不卷入任何勾心斗角的阴谋活动。但这一次他不得不去拜访他的年迈而忠实的庇护者——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女大公。费兰茨对她谈了他受侮辱的整个情况。女大公告诉他说：沙皇，即与费兰茨发生过多次冲突的玛利丽·巴甫洛夫娜的哥哥，已经寿终正寝。尽管他生平与艺术家格格不入，但有意思的是，他在最后一分钟还是保护了被放逐的公爵夫人和费兰茨。可是皇位的更替引起了悲剧性的转折。新沙皇宣布剥夺卡罗琳·维特根斯坦的一切权利并永远开除她的国籍。根据国际法，卡罗琳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物，法律使她不能立足于太阳之下，魏玛宫廷“人员”不得与她接触。一系列的侮辱性遭遇并没有到此为止。魏玛的市民们单是为了炫耀自己的高贵行动，也在一个劲儿地模仿宫廷贵人们的举止。宫廷传教士丁坦贝尔格尔曾在一次聚会上被介绍给这位“被驱逐的犯

鄙女人”，他当场就大声表示抗议。不久，马尔蒂茨顾问还带来了正式的文件。接替尼古拉一世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教庭会议上决定：把卡罗琳财产的八分之七判给玛格尼，八分之一判给被她背信遗弃的丈夫；在教庭会议多次召唤下仍不愿回国的卡罗琳本人被宣布为叛逃者。

在这种阴郁的气氛中，李斯特迎接了自己一八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的生日。这一天同时又是他在魏玛生活十年的一个转折点。人们为他发表了非常动人的演说，在市政府大楼为他举行宴会，在阿尔滕堡为他举办庆祝活动，剧院还上演应景剧目：《大师的旗帜》。最精彩的讲演是剧院新的总导演兼戏剧理论家丁盖尔什泰德作的。总导演来到魏玛剧院是由于费兰茨多年努力的结果。他只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弄清了魏玛的各种潮流：什么力量在推动李斯特的船前进，什么暗流在使其倒退；谁喜欢新魏玛，谁在仇恨它，而动摇于两个阵营之间，机灵地等待决定性的变化，以便站到胜利者一边的又是些什么人。丁盖尔什泰德在宫廷的迷宫中颇能辨别方向。谁都不能象他那样去全神贯注地聆听那些仁慈的、尊敬的和高尚的老爷们的英明论断。谁都不能象他那样信服地闭着双眼，不断地点头称是，以表示他的赞同并不是一般地意见一致，而是对上级权力的盲目信任。谁都不能象他那样文雅而谦虚地去敲叩那些软垫门的木框。谁都不能象他那样不声不响地踏遍大公王宫中的厚实地毯。谁都不能象他那样在宫廷中牢牢地站稳脚跟。他好象是大自然特地为这种角色塑造出来的人物：拉长了的脑袋露出一副模范臣仆的面孔，有劲而瘦骨嶙峋的双手总是交叉着，一副卑躬屈膝的姿态，好象在表演一场真实的哑剧似的：请大老爷吩咐，我肯定唯命是从。在宴会上讲话的就是这个丁盖尔什泰德。他在李斯特·费兰茨的头上挂满了诗句的桂冠。但谁会料到，就在第二

天，第三天，一星期之后，一个月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去拜谒卡尔·亚历山大，以精辟的论证阐述魏玛的真正任务及其历史意义：让未来派的音乐见鬼去吧！别再让柏辽兹、李斯特和瓦格纳的演出出丑了！让我们回到歌德的剧院去……魏玛不是《汤豪塞》或《罗恩格林》的城市，而是《浮士德》的城市。

费兰茨对这种精编细织的蜘蛛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即便没有这些阴谋，他自己的灾难也是够多的了。他每天都陪伴着抑郁成疾的卡罗琳和天仙般的小姑娘玛格尼。一方面她还孩子气十足，无忧无虑地享受着自己的青春，同远方的追求者通信，考虑新的旅行计划，甚至还把养父费兰茨拉进来为她工作。她是个好玩的、苗条的、纯洁无辜的孩子。但另一方面她已经象个成人，能够与她的母亲共患难。费兰茨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只是劝她重新出去走走，看看和享受享受广阔的世界，忘掉还有一个什么教庭会议，忘掉中世纪愚昧无知的法律和这个吵吵嚷嚷的马蜂窝：魏玛，尽管出去旅行好了。他自己也不顾彪罗的好心劝告而离开魏玛到德累斯顿去了（汉斯已是科西玛的丈夫，他象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卫护着李斯特）。他在那里演奏的节目中有《但丁交响曲》，但是失败了。也许失败这个用词并不恰当：实际上是一件经过事先周密策划的阴谋。李斯特又回到了魏玛。在这里接待他的是围绕剧院问题所散布的谣言。丁盖尔什泰德已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一个人发号施令，他一个人决定剧院的前途。费兰茨和他的冲突不可避免。剧院又有了新的乐队指挥：爱德华·拉森。他是费兰茨的支持者，他甚至还自称是费兰茨的学生。丁盖尔什泰德宣布，他不是派来代替费兰茨的，而是来协助费兰茨工作的：帮助日益衰老的大师分担一部分任务。费兰茨把指挥棒交给了拉森，自己只指挥了一次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前来祝贺的人群中间

也有卡尔·亚历山大大公和丁盖尔什泰德。不过有些人的握手，不仅是对人的一种侮辱，而且还是一种玷污。李斯特继续他的旅程。布拉格，这个美妙而古老的城市……它是已故的莫扎特最后向往的一个避难处。也许他也会在这里安息。他在这里为医学系的穷学生们举行了一次义演音乐会，然后又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演奏会。类似这样的演奏会，他只有在青年时代，在那最狂热的佩斯、柏林和巴黎音乐会的年代里才经历过。理想的曲子是《但丁交响曲》和《A大调钢琴协奏曲》。阿尔滕堡的幽灵、使瓦格纳夫妇大为恼火的卡尔·塔西格坐在钢琴前。他几乎还是个孩子，但乐器在他手底下就变了样。这个庞大而笨重的乐器一会儿风趣地双双对话，一会儿响亮地纵声大笑。这架黑白键子的乐器既能象竖琴一样发出清脆的叮咚声，又能象长笛那样使人着魔。它一会儿以雷霆万钧之势令人神往，激励人们为革命冲锋陷阵，一会儿又以亲切的抚摸使人快慰，犹如慈父的手在摸着烧得通红的小孩脸蛋一般。几天后，又举行了一次新的音乐会。一个名叫伏洛克霍普特的钢琴家精彩地演奏了《♭E大调钢琴协奏曲》。他一下子就破除了愚昧无知的旧迷信：李斯特的作品只有作者本人才能演奏好，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僵死的纸片，只有经过李斯特哈气后才具有生命。迷信被破除了：彪罗、布隆沙尔特、塔西格和伏洛克霍普特在同一个历史瞬间内，同时都成功地演奏了李斯特的钢琴曲。看来，李斯特在布拉格取得成功的消息，恰如已故的莫扎特在世时的情况一样，也一直传到维也纳。李斯特的朋友们要求在帝国的首都演奏《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

一八五八年三月中旬，李斯特已在维也纳。他在这里遭遇到了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御前办公室禁止宫廷歌剧院的演员们在音乐会上表演。理由是：李斯特·费兰茨曾多次拒

绝为宫廷演出。这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实际上是因为帝国内阁怀疑甚至仇恨李斯特。内阁中那些平庸的显贵人物什么都知道。他们知道《葬礼进行曲》和写给戴莱基·拉斯洛的推荐信，还了解《英雄的葬礼》的写作经过以及他与戴莱基·山道尔之间尽管只是通信但却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亲密友谊。而李斯特先生应该知道，戴莱基·山道尔已被象征性地处以绞刑。内阁并不信任李斯特，不管是对他在慈善团体的誓言和对他的基督教信仰，也不管是对《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中的上帝主题思想，都一概不予信任。他们把李斯特·费兰茨看成一个危险的纵火者。够了，他刚刚一脚踏上佩斯—布达，就马上出现了科苏特的帽子、盘着彩绦的坎肩和带缧的上衣，还奏起了国歌，重新谈论一些危险的概念，例如：欧洲和匈牙利……裴多菲、李斯特、科苏特的祖国在欧洲的天穹下！等等。

宫廷歌剧院方面的拒绝态度太粗暴、太过分。无可否认，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甚至是全欧洲范围内的丑闻。奥古斯·安道尔马上来到维也纳。他并没有找费兰茨，而是与法律系学生爱德华·李斯特进行谈话，其原因是费兰茨执拗不屈。他现在根本不需要宫廷歌剧院的艺术家了，即使他们自荐也罢，央求也罢。必要的时候可以叫佩斯—布达的歌剧团上这里来，好让维也纳的人看看，被他们称之为亚洲野蛮人的民族，在艺术上，在最崇高的人性上是成熟的。这个歌剧团还真的来到了维也纳。这次音乐会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响。奥古斯和爱德华现在又在准备新的军事部署（我的上帝，爱德华与已故的李斯特·亚当先生是多么相象：同样固执，同样勤奋，同样勇往直前）。他们的策略是：要利用内阁的失算。那些人自以为，他们已使音乐会举行不成，实际上却在维也纳的最中心大振了匈牙利的声威。奥古斯从早到晚一直坐在内阁办公室里。一天晚上，他气喘吁吁，汗流

浃背，但却满脸笑意地跑来说：

“皇帝陛下特别恩示，要授给李斯特·费兰茨贵族爵位。”

爱德华仿佛听见一个无形的乐队在演奏帝国国歌似的，马上立正敬礼。奥古斯则象一个刚刚凯旋归来的将领，得意洋洋地挺立着。李斯特不愿破坏这种节日气氛，但也不能仅仅出于客气而违反自己的本意：

“亲爱的朋友们……我不想使任何人感到失望，但这样的奖赏我是不能接受的。”

爱德华急得一个劲儿地咳嗽，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那你的孩子们呢?!”

“两个姑娘已经出嫁了。汉斯·彪罗是男爵世家的后代。他并不需要爵位，他争取的只是艺术头衔。科西玛现在拿到贵族封赐书又有什么用处呢？布兰丁住在法国。不管那里是帝制还是其他政体，法国人将永远是民主主义者。我的女婿奥列佛尔先生会因为我的贵族封号而嘲笑我的。”

爱德华终于恢复了平静：

“那么你的儿子达尼埃尔呢？他不久就要回家了，也总要问问他才好……”

“不需要问他，爱德华。我不只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我的儿子，才不要这样的贵族封号。”费兰茨的面孔严峻起来：“你们应该理解我，我只能接受人的精神的贵族称号。”

爱德华哀求起来：“你这样做，会激怒宫廷和皇帝陛下的……”

费兰茨表示理解地笑了一笑：“好吧，我接受奖赏，但有个条件：贵族封号算是你的和你未来的家庭的，亲爱的爱德华。”

皇上的恩赐起初还不过是一点点毛毛细雨，而现在却变成

了暴风骤雨。皇上陛下赏赐李斯特·费兰茨铁王冠三等十字勋章。爱德华十分敬仰地指出："这种勋章是带骑士封号的。只是必须写呈文，以申请封号的使用权。"但费兰茨出于自己的原则不肯写什么呈文。这样，"封号病"便促使爱德华走别的道路。他的代理人分别到绍普隆、基什马尔顿和波若尼的档案库去查找材料，想找到那些凭借着闪耀发光的伯爵王冠指环印章以及亲属关系而与国内上流人士有着密切交往的祖先。找来找去，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匈牙利贵族登记处的秘书作了如下一段使爱德华伤心了好些天的结论：

"李斯特·费兰茨、小李斯特·亚当和大李斯特·亚当的生平调查一直追溯到一七九三年在莫松州奥伊卡村去世的李斯特·赛拜什金。死亡登记表上记载着：雇农出身，鳏居，无不动产。寄住瓦德拜尔格家中。在地契表上的地位在佃农以下，即穷人中的穷人，一月中必须为地主服十二天劳役……"

旅程必须匆匆结束。家里的人在等待着他。乐队的第二指挥拉森通知说：他的年轻助手科乃留斯已完成了《巴格达理发师》的总谱，整个剧团都等着费兰茨，因为科乃留斯除了老师以外，不肯让任何其他人动总谱。费兰茨只得马不停蹄地赶回去。看起来，魏玛似乎发生了什么"气候变化"，又恢复了过去宾朋满座的状态。"王子饭店"和"俄宫饭店"的所有客房都挤得满满的。巴林·维阿多·加尔西亚、阿尔拜尔·涅曼和玛丽·希巴赫前来访问，他们三人是欧洲歌剧界的三巨星。还来了一个作家代表团：格贝尔、弗里塔格、希伯尔和一个应卡罗琳邀请前来协助创作《圣伊丽莎白的传说》的风趣小个子罗奎特。她和罗奎特经过简短的协商后，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他们商定等待《圣伊丽莎白的传说》的画家施温德前来。这位画家以巨幅壁画装饰

了埃森纳赫的瓦尔特堡。这些壁画都表现了伊丽莎白苦难的命运,为作曲家和作词者提供了构思的依据。

施温德还真的来了。他在宫廷中展出了壁画的草图。第一张画的是伊丽莎白的到来。第二张画:玫瑰花的奇迹。铁石心肠的路易侯爵当场抓住了伊丽莎白，因为这位心地善良的女公爵夫人正在给挨饿的人施舍食物。他怒气冲冲地问:“你把什么东西藏在围裙里了?”伊丽莎白惊恐地回答:“是玫瑰花。”于是老天爷大发慈悲,真把食物变成了玫瑰花。第三张画的是十字军。第四张画描绘路易王之死和伊丽莎白被撵出瓦尔特堡。最后两张画是伊丽莎白之死和升天为神。

罗奎特是个快手，一两下子就把草稿写出来了。作曲家的脑子里已勾画出旋律的轮廓，但创作艺术家现在应该给指挥家让位。这里讲的是科乃留斯的歌剧。这是他在魏玛学生时代写成的戏剧雏型。科乃留斯是个谦虚得有点过分的人。排练过程中，他总是坐在远远的包厢里一言不发。费兰茨很想让他发表意见:这样行吗,孩子……?你真是这样想的吗?来吧，拿起指挥棒,有哪些地方不合适,你就指出来……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使科乃留斯离开他的包厢座。他象一个对幸福既渴望又害怕的新娘那样,坐在那里直冒汗和打寒战。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序曲开始,《巴格达的理发师》举行首次演出。费兰茨凭着多年的指挥经验,几乎能够摸到听众的脉搏。但这时他总感觉到有点什么东西不对头。第一个独唱以后听众中发出嘘嘘声，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文明的声音，故意装出来的、挑衅性的咳嗽声、口哨声、蹬脚声。这哪里是首次演出，而是一场搏斗!大公坐在包厢里示威性地鼓掌，和他在一起的宫廷显贵也学着样，阿尔滕堡的远方来客也在尽自己的责任，但支配群众的却是另外一种意志和企图。费兰茨总算熬

过了这场演出，但他却是在人们搀扶下才回到家的。他由于精疲力竭而处于梦呓状态：听到的都是些口哨声、粗野的蹬脚声和雇来的小流氓们的嘶叫声。等到科乃留斯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了。科乃留斯的脸色死一样地苍白，连话都讲不出来，老重复着一个名字：丁盖尔什泰德……

费兰茨吃惊地问："你要丁盖尔什泰德干什么？"

"示威是他组织的。"

"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和几个小流氓谈了话。是他们供出来的，就象罪犯常常把教唆犯供出来一样。"

几天以后宫廷大夫找上门来："听说亲爱的大师生病了。可以为您效点什么劳吗？"

"谢谢您的关心，朋友们暂时都还在我身旁，他们会照顾我的。"

这位医生说什么也不肯走。看起来，他还有什么事要说："大公关心阁下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参加下星期的贝多芬音乐会。他将招待一些国王、王公，很想请阁下在那次音乐会上担任乐队指挥。"

费兰茨在床上支撑着胳膊肘，考虑良久："大夫先生，我不认识国王和王公，我对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但贝多芬音乐会我是必须去的。节目是我组织的，是我排练的，我也准备去指挥……"

医生现在装出一副好象公务使他忘记了刚才的对话的样子：他摸着费兰茨的脉搏，然后又把耳朵贴在病人的背上。最后还是不得不说话："大公还提到一件事，说丁盖尔什泰德去找过他，并且宣称那些说他插手剧院示威的流言蜚语和不负责任的消息，都纯属捏造，是卑鄙的污蔑，须知他对大师是怀着感激和

尊重的心情的。大公表示，得悉这一声明感到十分高兴，他将迅速地把这一消息转告给最有关的人——李斯特·费兰茨。”

病人从床上坐了起来：“他们现在终于通知我了，敬爱的大夫。我决不贬低您在这方面的操劳，但我根本不把这个通知放在眼里。其实我现在就应该去找大公，把问题摆在他面前：要么是丁盖尔什泰德先生，要么是我！我是应该这么办的。但我不能这样做，敬爱的大夫，否则我就会象已故的光荣前辈歌德阁下所遭遇的那样：他们随随便便地就把事情处理了，接受我的辞职。这样子我是不会走的。我将心平气和地放下指挥棒。然后，我就重新变得年轻起来，再一次成为一支既无窝巢，也无家园的候鸟……”

医生的头从光秃秃的后脑勺倏地一下红到耳根：“您不能离开我们……”

费兰茨温和地微笑着说：“这句话用语不当，敬爱的大夫。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是否可以离开城市，而是我应该离开魏玛。”

费兰茨又重新走向世界。他中途在火车上得到消息说：卡罗琳和玛格尼目前正在慕尼黑逗留。姑娘准备与约瑟夫一世皇帝陛下的侍卫官霍亨洛赫·席林斯弗斯特·康士坦丁公爵订婚。费兰茨躲在车厢隔间角落的座位上反复地看着快信上的消息。身居奥林匹克山上的那些贵族们是些多么奇怪的人呵！卡罗琳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是个被驱逐的不存在的人物。而皇帝兼国王约瑟夫一世和他的整个御用班子则全是些完美无瑕的骑士。他们平时只要稍为受到一点睨视，听到一点不太委婉的意见，或看到一种侮辱性的暗示，动不动就会拔出剑来同你作一番生死决斗。而现在呢，侍卫官老爷竟然闭着眼睛，看不见那坏名声的妈妈，也不去管那大可怀疑的复杂家庭关系……当然啰，玛格尼

有十万霍尔特的土地作为后盾，那都是些优质的、肥沃的腐植土，不用精耕细作也会冒出小麦和黄金来的良田。

费兰茨坐在软席的角落里。火车开向莱比锡，把他带到那个他多次拼搏但很少取胜的战场上去。邀请他去的东道主是《新音乐杂志》的编辑、可爱的布兰岱尔。刊物已创办二十五年，周年庆祝活动岂能没有费兰茨参加？当然不能。他必须去那里，而且必须打完一个莱比锡战役……

令人吃惊的是这次战役未遇到什么风波。四十八岁的费兰茨身躯还象梁木一样挺拔，但头发已全白。他站在台上指挥的时候，连他的艺术对手都为之感动。这已经超出了音乐的范围，是在发表布道演说。

但在后台等待他的却是冷酷的消息：阿尔滕堡的庇护者，费兰茨的保护人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女大公去世了。他要回魏玛去，他必须参加葬礼。“新魏玛协会”举行了纪念会，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新魏玛”已不存在，“协会”只是在行使它唯一的而又是最后的职能：在女大公的墓地上放置花圈。

费兰茨一连数日未公开露面。下决心倒是容易的：“我要重新当一只候鸟”。但现实生活的千头万绪的藤萝却把他和这个苦难的城市紧紧地系在一起。他实际上在这里连什么人都没有了。继彪罗、布隆沙尔特、塔西格、拉福和波尔之后，卡罗琳也走了，玛格尼也走了。科乃留斯名正言顺地告别了魏玛。最后，“协会”的家庭诗人霍夫曼·封·法莱斯列本也弃船不顾。费兰茨在空荡荡的阿尔滕堡内走来走去，研究自己的手稿，但现在他几乎有点讨厌音乐。不，现在这里需要的不是创作，而是在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里建立起秩序。费兰茨习惯于黎明时工作，他现在还是起得很早。第一批邮件总是他自己收下的。爱德华来信说，达尼埃尔身体感到不适，科西玛专门去看了他，并同他一

道上柏林去。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又来了信。信中说达尼埃尔十分衰弱，病情很重，想见见父亲。费兰茨冲上火车，急急忙忙地上了路。下了火车后，懵懵懂懂地催赶着马车：跑快点、跑快点。然后又头昏目眩地上了阶梯，迳直冲进病房。什么话都不需要说了。他亲眼见到：孩子已处于弥留状态。费兰茨把嘴贴在垂危者的耳边说：

“我的小儿子，我在这里。”

两片毫无血色的嘴唇最后动了一下：

“世界大名鼎鼎的音乐家……”

几个月后，李斯特来到巴黎，受到皇上的接见。新的封号，新的授带：荣誉团勋章。这一切又管什么用？娓娓动听的演说、节日的音乐会和热闹非凡的宴会湮没不了孩子低声的话语：“世界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费兰茨还去看望了玛丽。她谈到了自己的文学计划，然后就盘问起他来：上哪儿去，创作些什么作品？费兰茨非常伤心而又非常坦率地回答说：

“我在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笔直前进，谁也不能使我改变方向。”他把玛丽的手握在自己的手掌中，接着说道：“至于您，亲爱的，愿仁慈的上帝多加保佑……”

只是走到街上后，他才突然感到一阵内心的伤痛：玛丽知道，是他给达尼埃尔合上眼睛的，但她连一句话也没有问，他家的唯一男孩，用来当牺牲品的小绵羊羔是怎么死的……费兰茨站在街上，他周围是一个新的巴黎，她的音乐，她的芳香都是费兰茨所不熟悉的。这是一个新的巴黎，连她的音容笑貌甚至黑话都与往昔大不一样……费兰茨站在街中心，感到一阵昏眩，他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一堵墙走去，把背靠在墙上：“我的上帝，我没有让人给孩子请牧师来，以后到上面该怎么交待呵……”

他在奥列佛尔家里才苏醒过来。

布兰丁很热情，奥列佛尔也是这样，但他还是让所有人都离开房间：还是独自一人留在那里更好些。

第二天他拿到了自己新作的法文初版本：《论在匈牙利的波希米亚人和他们的音乐》。

他不无感慨地翻阅着这本书。这是他们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卡罗琳的和他自己的。过分堆砌的形容词是卡罗琳笔下的产物，那些简练而直言不讳的部分则是他自己的。但这并不重要。全书的基本思想还是李斯特·费兰茨的。这本书的目的是：唤起他童年时代的梦想；为那些无名的艺术家、提琴师、吹单簧管的、弹洋琴的人树碑立传（他们大部分人一生的事业都半途而废）；描写吉卜赛人的生活，不只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而且还借鉴普希金、莱瑙、维克多·雨果以及所有对这种飘泊的、不安分的民族曾一度感兴趣的作家的作品；感谢那些他悉心借鉴过的音乐家们，他从他们身上吸取了粗犷而忘形的爆发、摇摇晃晃的节奏、震撼心弦的切分音和柔和婉转的感叹旋律等……；指出这个悲惨的民族，被人瞧不起却又那么逗人喜爱的吉卜赛乐队在匈牙利音乐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虽然不能说整个匈牙利音乐宝库都是他们从东方抢救出来的嫁妆，但他们的作用肯定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国内对这本书的反应是可怕的。

百事通布拉沙伊·萨穆埃尔这样写道：

“您把《梦游女》、《清教徒》和其他歌剧，或者把舒柏特的歌曲和旋律在所谓的幻想曲里打扮得花团锦簇，俗不可耐，这还不算是剽窃原作者的发明和构思的

权利和荣誉？您看看，我们也正好是这样对待吉卜赛人的。我们让他们用提琴演奏歌曲和舞曲，他们可以按各自的喜爱，有些人演奏得简洁些，有些人演奏得花哨些，但我们并不把真正的音乐交给他们……我国的吉卜赛人是同我们在一起，并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民族。他们使用我们的木勺，给我们的教徒卜卦算命，为我们的死马剥皮，为我们的活马掌钉。我们修建房屋让他们制砖，运石头，泡石灰。他们吃我们变了味的腌肥肉，穿我们的破旧衣服，而且还吹奏我们的歌曲供我们欣赏。但这种吉卜赛人就象月亮上的人一样，是我们的同胞李斯特所不认识的。他所称之为吉卜赛人的那种梦景，不过是一个张着大嘴，站在旷野上喝冷风，眼望寒鸦，嘴啃野果的疯子……李斯特的吉卜赛音乐是由一种违反自然的音程（说它违反自然，是因为它好比一个人不吃面包和肉，只靠辣椒来活命一样）和变幻不定而花样无穷的节奏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同胞李斯特作为音乐送给吉卜赛人的东西，是一种由没有节奏和过分修饰两者混合而成的音响堆砌物……我们现在只是请求我们多次提及并屡加驳斥的同胞，不要再把他所描绘为吉卜赛音乐的东西，称之为匈牙利音乐或被匈牙利人视为自己的音乐。否则我们就要严正地提出抗议……"

不可思议的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歌曲诗人西蒙菲·卡洛伊也起来反对李斯特，而且还摆出似乎在同辈作曲家之间进行争论的姿态。那个带领吉卜赛乐队走遍全国的总公证人、"业余合唱队员"西蒙菲·卡尔曼还给李斯特写去了威胁信：

"先生！您在干什么？您在那本小册子里写了些什么？我自己虽然未曾读到大作，但所有的匈牙利报刊都引证了您下面的一段话：'匈牙利音乐不是匈牙利民族的，而是吉卜赛人的……'十分遗憾的是，我必须写文章来反对您，因为爱国者的义务是不能推卸的。我们从现在开始各奔东西。愿上帝永远保佑您。"

费兰茨在经历了这么许多沉重的打击、悲惨的遭遇和致命的损失之后，仍有力量回答西蒙菲的问题：

"放心吧，先生，事情并不象我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我是不公平的。至于爱国心的问题，照情理来说，谁也不能对我进行指责。你要是读了我的全书就会发现，这本书主要还是体现了我对祖国的热烈感情。"

国外也行动起来了。《两个世界》的评论家在骄横傲慢与残酷无情上一点也不亚于布拉沙伊。在这一信号下，匈牙利报刊也开始发表意见了：

"我们只在这里补充一点。被我们的父老在一个神魂颠倒的幼稚时刻里用宝剑装饰起来的艺术家老爷，如果认为在他的祖国长住一段时间比较合适，而且在游玩期间也不觉得这里的低级空气并不比病态的沙龙空气更有害于他的肺泡组织的话，他也许会了解构成匈牙利音乐真正核心的匈牙利民歌诞生的秘密。"

李斯特给他在佩斯的出版商海坎纳什特去了一封长信，显然是想在这样吵吵嚷嚷的气氛下给争论定下个较冷静的调子：

“匈牙利完全有资格把这种用她自己的谷物和葡萄酒培育出来的，在她的阳光和浓阴下酝酿成熟的，用她的惊异加以肯定的，以她的情爱和护佑加以装饰、美化和提炼的，同她的道德如此融为一体的，同每个匈牙利人最亲切和最甜蜜的回忆相一致的艺术，看作是自己的艺术。这种音乐的使命是以其光辉的成果在我国的群花中争艳，它象一颗名贵的珠宝一样，在古老而骄傲的王冠的最瑰丽的宝石中间永放光芒！”

当然，亲爱的奥古斯也表了态。他忧心忡忡地充当和事佬，请求李斯特原谅国内报刊的粗暴言论。

李斯特的回答表现了一个聪明人的冷静态度：

“我坚定地希望我现在也不会抛弃我的任务，而且还要不停息地通过我自己的艺术工作为我的祖国争光，尽管这并不是为某些人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的方式。对这些人来说，《拉科齐进行曲》大概与《可兰经》对阿拉伯人一样。他们甘愿烧掉其他一切，还自认为论据充分：既然《拉科齐进行曲》中已经有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保留了；既然《拉科齐进行曲》中没有，那就说明毫无保留价值……尽管如此，我对匈牙利还是非常留恋的……”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李斯特生日那天，魏玛又举行了火炬游行。大公召见了他，还赐给他新的勋章，然后十分小心地对他提出一个问题：

“您不想与丁盖尔什泰德先生分担管理事务吗？”

费兰茨坚定地回答：

“不，陛下！”

李斯特亲自检查房屋是否已经仔细封闭好了。他最后一个夜晚是在王子饭店度过的。

奥皇驻魏玛大使馆首席参赞肖伯侯爵在离任数星期之后又返回魏玛。一阵阵新风开始在奥地利首都（说准确点是奥皇内阁中）吹起来，维也纳召回了它的驻外代表：对匈牙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策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肖伯侯爵先生因此被召回。他回维也纳之后，附带地得到通知：今后可以重新与李斯特建立联系，因为已经解除了对他的政治封锁，这个铁王冠勋章的骑士在维也纳是受欢迎的人；肖伯侯爵不妨设法巧妙地沟通一下多年的隔绝状态，作为朋友重新接近这位艺术家，试探一下他是否愿意在帝国的任何一个艺术机构里担任某种职务。

于是，肖伯动身去阿尔滕堡。这位外交官具有游手好闲人的那种本领：终日无所用心，不过一年中能做一件什么事，倒也能使他高兴一番。现在他高兴地摇头晃脑，上身紧绷着一件精工细作的英国燕尾服，下面穿的是鸽灰色的裤子和带衬里的亮漆皮鞋。他边走边吹着口哨，脑子里预先设想着李斯特在见面时的惊奇样子。他将对他讲：“老弟，别看我东拉西扯，当着老朋友的面，还是以坦率为好：一句话……过去我是不大好来的。到这里来的，要就是戴莱基·拉斯洛，要不就是我；不是革命的吉卜赛人莱梅尼先生，那就是奥帝国的使者肖伯侯爵……而现

在我正好在这里，让我们来拥抱一下，为纪念从前那些美好的日子，你来弹一曲舒柏特的歌曲吧，紧接着再来一个《匈牙利狂想曲》！”

肖伯侯爵走着走着。他敞开了漂亮的皮大衣，一方面是因为深秋天气还十分暖和，另一方面是想体会一下魏玛的小市民在看到他奇妙的燕尾服时会多么惊奇。最后，（尽管是晃晃悠悠地）总算来到了阿尔滕堡的大门前。

大门紧闭着。他按了三次铃。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从里面回答道：

“艺术家先生搬走了。”

肖伯不由得倒退了几步：“怎么可能就搬走了……那又搬到哪儿去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恶狠狠的声音回答说。

肖伯稍稍往后退了几步，再一次抬头看看楼上的窗户，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向城市的方向往回走去。多么古怪。十多年来他只是远远地看见过费兰茨，知道一下李斯特就在阿尔滕堡窗户后面的某个地方总是有用的。但现在他走了。魏玛衰老了，整个世界仿佛也干瘪了一点；魏玛好象一座雪山，逐渐开始崩塌。

侯爵先生朝着城市的方向往下走。他畏冷地紧裹着身上的皮大衣：

“魏玛衰老了，我们也衰老了。”

第七章　在马利奥山冈上

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一日是福尔土纳托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福尔土纳托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从来不会上杂货店、小贩和肉店的当，因为他的眼睛老是盯在秤杆上（据他自己叙述，他的眼睛是在保卫罗马的光荣战斗中受伤的，但别人却说是在酒店里一次打架时弄坏的）。福尔土纳托能把无所事事发展成一门奇妙的艺术。他蹲着也能睡觉（还装着在食品架子上搜索什么东西），甚至在外面园子里走路过程中也能睡着。他手里拿着工具，本想在黄杨树林子里干点什么活，不料在半路上失掉了干活的兴致，似乎是为了驳倒自然科学在这方面的论断似的，他一边走一边打起盹来。尽管如此，假如由于命运上的一种搞不清的意志迫使福尔土纳托非干活不可的话，他干起活来倒是非常干净利落的：坏了的压水机他能在几分钟之内修理好，断在锁里的钥匙他会以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给弄出来。此外，福尔土纳托很会烹调，甚至还能干点洗洗涮涮之类的活。不过所有这些都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干的。他最乐意干的事，就是把背靠在古老修道院背阴的一面墙上，让身子往下滑，膝盖朝前顶，把屁股压在脚后跟上休息。他能这样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要地蹲上几个钟头。他唯一强烈的本能，就是对主人的热爱。每当大师弹琴的时候，福尔土纳托总是一反他明哲冷漠的常态，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溜到隔壁的单人小房间去

听音乐。在这种情况下，福尔土纳托一会儿哭，一会儿又捂住嘴笑个不停，甚至还自言自语地念着一些虽没有多大意义，但音调柔和、能与音乐的节奏相协调的即兴词句。

一八六七年七月十一日，正当福尔土纳托在马利奥山冈上的罗萨利奥圣母修道院的园子里磨磨蹭蹭的时候，一辆装有弹簧的旧式马车来到修道院的大门前。两个瑞士执戟卫士从马车的前后座上跳了下来，吓得福尔土纳托丢掉手上的锄头，开始打起寒战来。他大叫大嚷地冲进李斯特·费兰茨大师的工作室：

"大老爷……我头发晕！"

费兰茨自从用福尔土纳托作伴以来，不知已经碰到过多少次意外事件，尽管已有这方面的经验，但这种举动还是使他非常吃惊：

"出什么事了，孩子……？"

"什么事也没有出，只是我脑袋发晕。我在外面园子里干活，一个幻影突然从天而降。一辆马车，两个瑞士执戟卫士，然后就是他本人：皮约·诺诺……教皇圣上！"

费兰茨快步走出门外，在石级顶端站了一会，然后上前迎接客人道：

"上帝降圣上于寒舍。"

庇护九世教皇圣上伫立在石级歇脚处，以象征性的手势和动作搀扶屈膝迎接贵宾的费兰茨站起来。他脸上露出一种含混不清的微笑，掺杂了王权尊严、机警的外交官风度、偷闲老人的童心和始终疑心重重的教皇的那种愉快而又紧张的复杂心理。他带着这种古怪的、酸溜溜的微笑说道：

"亲爱的大师，请您忘记我是从梵蒂冈来的。但愿这次拜访会给人留下这样的记载：音乐的热情崇拜者马斯泰伊·费雷蒂伯爵拜访了他最心爱的音乐家李斯特·费兰茨。"

教名庇护九世的乔万尼·马利亚·马斯泰伊·费雷蒂伯爵当年七十一岁。看起来他有摧不垮的健康体质，但年少时却曾因神经错乱和癫痫发作吓坏了日夜为他操心的家庭成员。二十七岁那年才被授予神父称号，一八二三年已晋升为依莫拉教区的主教，没过几年就成了红衣主教了。人们在悄悄地议论他，说他的良心好似一件夹外套：外面象道袍一般黑，里面象炽炭球一样红。人民是拥护他的。那位想利用意大利精神上的优势在欧洲建立理想王国的意大利“第一名”哲学家乔贝蒂，早已把庇护九世看成意大利的首领。一八四八年六月十六日，滚滚的白色浓烟在意大利上空冉冉升起，它表明教皇选出来了。新的教皇是庇护九世。白色的烟雾信号还未来得及消散，整个欧洲就已经地动山摇。革命爆发了。意大利要求统一。根据乔贝蒂的幻想，群众要求教皇来实现统一大业。在那些神奇而恐怖的日子里，群众冲散了瑞士卫队，涌进了梵蒂冈。他们不仅热爱教皇，而且还想占有教皇。他们要接触他，抚摸他，要用自己的感官来验证奇迹：教皇是我们的！庇护九世挣脱了令人窒息的拥抱，逃到那不勒斯。后来他从那里带来法国军队，用大炮加刺刀进攻罗马！围城战进行了一个月。战场上尸横遍野。后来在那些无法接近的地下监狱中死的人更多。罗马人民这时才惊恐地发现，原来教皇外套的里里外外全是黑的。他当选教皇时的“庇护九世万岁”的欢呼声，已经永远销声匿迹。多么奇怪，庇护还特别喜欢这种肃静。他并不把声望这种东西放在眼里，恰恰相反，他害怕声望会使他背离自己的意志。他准备进行一场在一千多年的教皇史上举世无双的斗争。在蒸汽机、瓦斯、电气和汽船的时代里，他要向开明思想宣战，向科学宣战。他准备召集世界上所有的主教，举行教皇御前会议。目的无非是强迫大家承认：教皇的宝座是高于一切的，他的教导体现了上帝的绝对正确。

费兰茨伴随教皇圣上登上石级，迅速穿过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四周有拱廊的庭院，来到修道院主人专门为李斯特布置得比较舒适的会客室。

庇护："让我先说明一下这次拜访的目的。首先，我想了解您的人品和您的艺术。其次，是想澄清和平息那些使您和教会当局分离开来的纠纷。"

费兰茨："其实，圣上只须讲一句话，我就会上梵蒂冈去聆听圣训。"

庇护："真正想要和解的人，就应该首先采取行动。"

费兰茨："圣父，纠纷已宣告结束。这是谁也不能加以更改的。就是梵蒂冈的最高主教法庭，也不能加以更改。"

庇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费兰茨："三年前，一八六〇年九月，卡罗琳·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受到圣上的接见……"

庇护："我还记得这件事。"

费兰茨："圣上在送别公爵夫人时曾对她说：'去吧，孩子，我是会主持公道的。'几天之后，我们果然得到了裁决：经教皇批准，维特根斯坦公爵和卡罗琳可以离婚。这一决定也到了教皇常驻维也纳使节德·鲁卡手里。可是，尽管有教皇的签字，他还是拒绝批准卡罗琳同我结婚。到了十月，根据圣上新的果断指示，终于发出了结婚批准书。婚礼定于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五十岁生日那天，在圣卡洛教堂举行。装饰得金碧辉煌的教堂正在等待我们。不料最后一分钟来了安东纳尔红衣主教的秘书。他向我们讨还结婚证件，下令停止举行婚礼仪式，理由是宗教法庭希望重新审查这件事。但卡罗琳拒不交出证件。"

庇护："为什么?"

费兰茨："她忍不住了。她说，只好听天由命，人在这里已经

无能为力。”

庇护:“我也许能办到。”

费兰茨:“卡罗琳起了誓,就连圣上也解救不了她。她说:女儿已经嫁出去了;她自己则在这圣洁的城市里陪伴着我;我是一个世俗的人,在进行取悦于上帝的工作的同时,当了修道院的自愿客人……她完全摒弃了世上的欲念,隐匿起来,离群索居,把每分钟时间都贡献给未来的超升。”

庇护:“我们非常欢迎您俩居住罗马。正如你把修道院当成家一样,这同样使我们高兴。您周围的环境和我们僧侣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您身上我们有庞大的计划,大师。”

费兰茨:“我听候圣上的吩咐。”

庇护:“我们希望,教会最好能利用古老的伟大传统向冷漠厌世、无神论、科学家们罪恶的妄自尊大以及叛离信仰的愚昧无知发动一次总攻。我们应该更新神父们的词汇,把我们天主教的作家们武装起来,使他们比那些罪恶的鼓吹者显得更有吸引力和更得人心。我们应该创立一种能把宗教复兴的春天风暴带进教堂的新音乐。这种音乐上的复兴只能从罗马这里开始,从帕勒斯特里那的城市开始,从西克斯土什小教堂的合唱队开始。我们希望由您来领导西什丁纳礼拜堂,李斯特大师。您自愿过教堂甚至修道院的生活,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喜的事。您需要进一步采取的唯一步骤是接受圣芳济派修士会三级神父的称号。这样,西什丁纳礼拜堂和您之间的一切障碍就会全部消除,因为那时占据世界教会音乐中心的领导位置的人将是一个神职人员。”

费兰茨:“我参观过罗马所有的教堂,听过一切可以听到的教会音乐。这里有一条我所不能逾越的鸿沟。”

庇护："什么样的鸿沟？"

费兰茨："教会音乐停滞不前。它停顿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的某个地方。大音乐家们纷纷离开教堂，因为教会要求他们否定自己，否定那个哺育他们，把他们培养成为艺术家和人的时代。这就把艺术家们都吓跑了。这种政策只能给教堂招徕那些乐于抄袭和重复别人的外行。圣父，世人皆知的事实是：有才能的人都战斗在外面的演奏台和舞台上，而没有才能的人却躲在教会的神父座位上，养得胖胖的。"

庇护："我要从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消除那些令人难解和无动于衷的照本诵经的做法。我们需要的是信徒、布道者和信奉者。在这方面，我不仅需要神父，而且还需要艺术家。"

晚上，福尔土纳托去张罗马车。费兰茨要去看望住在巴布依诺大街上的卡罗琳。公爵夫人的住宅位于山下的罗马旧城。由于这个圣洁的城市不大清除到处乱扔的果屑、食品残渣和垃圾，在那些歪歪斜斜的古老高楼周围，每逢夏天，常常泛起一层沉重的、令人窒息的雾霭，加上那些流经街面的明沟把堵塞在那里的垃圾团缓缓地推向台伯河，更使这种刺鼻的臭味达到了顶点。费兰茨做了一下祷告，便径直向那歪歪斜斜的三层楼房走去。门铃象一个在杳无人烟的城市中叫喊的警钟一样，响彻了整个住宅，但过了许久才听到里面的回答。卡罗琳带点咳嗽声叫道："来了……我来了，亲爱的朋友。"（她从按铃的声音就判断是费兰茨来了）前厅里放满了枯萎的花束。卡罗琳每隔三天给所有花瓶换一次花，这全是为了对她崇拜的那个男人表示尊敬。但在雾濛濛的、散发着臭味的炎热季节，这些花很快就凋谢了。费兰茨走进第一个房间，迎接客人的是一张张巨大的桌子。家具上的装饰品都是石膏塑像。一模一样的半身塑像就有百来

个，塑造的形象全是费兰茨。卡罗琳买下了一个意大利雕塑家(恰当地说应该是雕塑匠)的所有作品。如有拜访者前来，她总是以塑像相赠。在通往卧室和书房的内室里，东西杂乱无章地摊着。清洁女工全从卡罗琳身边溜走了，但公爵夫人又不许福尔土纳托进门。她说，那些大贼扔下的东西，都会被这个小贼偷走。这样，接待来访者的当然就只能是一些挂满蜘蛛网的角落、未经洗涮的器皿、被尘土染成灰色的地毯和堆积成山的手稿了。公爵夫人从右颊和左颊亲吻了客人（她小声地念诵着一个波兰的祝福词，其内容与其说是天主教的祷告词，还不如说是一种农民的迷信)，然后把堆放在一把绒椅上的书籍、雪茄烟空盒和天凉时用来披在身上的肩巾拿掉（因为她觉得罗马住房的空气对流太大，容易使人患牙疼、头疼、眼炎、脖颈强直等疾病)。卡罗琳温柔地说："请坐，我唯一亲爱的朋友……我希望，您能在这儿多呆些时候，让一个孤独的老妇人重新享受一次节日的喜庆。"

费兰茨坐下来，简短地向她介绍了教皇来访的情况。卡罗琳兴奋起来：

"这才是您真正的使命，亲爱的。请回忆一下，十五年前您曾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为了进行创作而脱离演奏台。还记得在沃罗尼茨度过的美丽的夜晚不？当时我说，您千万别犹豫！要选择工作室，选择创作艺术家的写字台。我唯一的朋友，您现在又面临抉择了：是要外面的世俗世界，还是要教会？十五年前的建议导致一场拚搏和具有永恒价值的创作。现在我建议您选择教会。回忆一下《前奏曲》开始的那一段词吧：'我们的生活不正是这样的前奏曲吗？……'当然是的。亲爱的费兰茨，您一生的作品只不过是那伟大的旋律——教堂音乐的前奏曲罢了。"

福尔土纳托在外面等着，而且气鼓鼓地睡着了(说起来尽管

令人难以置信）。他已把睡觉的艺术发展到极高的水平，学会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睡法：幸福地安睡；厌烦地眯一会儿眼；满怀希望地打盹；气呼呼地打鼾。他在卡罗琳门前总是气呼呼地睡觉的，因为他不喜欢公爵夫人，觉得她象个老火鸡，她没有权利和理由把他那位体格魁伟、目光炯炯，披着漂亮银灰色头发的主人哪怕是留下几分钟。每当那辆老得吱吱发响的马车颠动一下时，他便从气呼呼的睡梦中幸福地醒来：大师出来了，谢天谢地，总算解放了……嘎！福尔土纳托抽了老神马一鞭（别误会，这神马只不过是一匹老掉了牙的、平时只用在山井上车水的骡子），神马便把他们拉到一个舒服得多的地方去。这个地方的主人笔名为埃尔底斯·米兰妮的什瓦尔茨小姐。什瓦尔茨小姐也有点疯疯癫癫（至少福尔土纳托是这样认为的），她的家好象是给那些断了翅膀的小鸟、近视眼的猫、无家可归的狗以及从沉船上逃出来的其他动物开的一所医院。此外，她还公开宣布，只有一种方式能对教皇制度进行有效的斗争：在梵蒂冈下面埋下火药桶，把点燃了的引线放在火药桶里。尽管有这些古怪脾气，什瓦尔茨男爵小姐还是个十分令人着迷的女人。她常常给福尔土纳托送去包括美酒和白面包在内的异常丰富的晚餐。由于这些食品本身不会自己长翅膀从两层楼的高处飞下去，所以，男爵小姐还得派女仆玛利亚送下去。同玛利亚一块儿躲在挂着帘子的马车里吃晚饭和谈情说爱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啊！

骡子兴致勃勃地奔跑着（在它耳边摇来晃去的鞭子与其说是一种威慑工具，还不如说是一种权力象征）。几分钟后，费兰茨已经冲上了阶梯，享受着那种由法国香水、露天阳光从梳成大髻的浓密黑发散发出来的不可名状的、富有迷惑力的香味。他搂过漂亮的黑皮肤女人，飞快地吻了几下（一种久经考验的朋友、老练的情人的亲吻）然后走进灯火辉煌的沙龙……

聚会者的确是五光十色的。在场的有隐瞒了身份的普鲁士驻罗马大使阿尔尼姆伯爵，陪同他来的是大使馆参赞古尔特·冯·施罗塞尔（两人都有点紧张，虽然他们都以为自己的行动特别轻松，甚至是自由自在）。老朋友们也都在这里：画家科乃留斯和另一个画家奥沃拜克；两个仙女般的美人劳乌拉夫人和玛丽·米海蒂夫人。费兰茨进来的时候，著名的但丁研究者塞尔蒙塔公爵正在讲话。他向大家解释说，但丁的组画包括了当时整个世界的哲学、历史、神学、科学、法制和政治阴谋事件，甚至还包括了当时的社交活动和民俗习惯等等。可是现在还有哪个艺术家能够把整个时代都概括在他唯一的杰作中呢？后来，大家又围绕着歌德进行了讨论。接着，谈话就转到在罗马不是被当作艺术话题，而是被当作社会丑闻的瓦格纳的身上。这时，费兰茨正在同那个漂亮的黑皮肤女人谈话，那些艺术家老是怂恿他去当他们的模特儿，尽管费兰茨被人们包围着，但他还是冲了出去，参加另一群人的谈话：

“我相信，瓦格纳是本世纪唯一堪称歌德所说的全才的人。”他稍为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给道德、信仰、占有、法律和上帝这些古老词汇重新下定义的全才！”

新的客人陆续到来，一个个都是老相识。那个从前曾被玛丽称之为“满脸粉刺”的年轻人格莱戈罗乌什，现在已是有声望的在体态和面孔上都显得胖乎乎的教授。他们友好地互相拥抱了一下。格莱戈罗乌什给晚会带来了新的转折：

“我已经二十五年没有听到李斯特·费兰茨弹琴了。他要是能为我们演奏，我是会感到无比幸福的。”

费兰茨坐到钢琴跟前。手到之处，闪现出一幅幅别致的音乐图像——乡村酒店。农民们在那里饮酒作乐。许多钉了掌的皮靴发出沉重的咚咚声，乡村乐师的琴弓下飘出了一阵悠扬的旋

律。后来，门打开了，门槛上站着两位新客人：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嗨，多少漂亮的姑娘，多少个送上前来的嘴唇和富于青春活力的、挺得高高的胸脯，多少丰满的年轻躯体在等待着他们去进攻和占有……乐声低沉下来，姑娘们也缓慢地转着、跳着。梅菲斯特突然夺过乐师的琴弓；嗨！别再折腾这些琴弦了，让我来拉吧！酒店里响起了《梅菲斯特圆舞曲》。这是粗犷野蛮的音乐，是把人们卷入爱情，引诱人们犯罪的音乐！它一刻也不停息，只有死亡才能取代这种疯狂。

人们不让费兰茨离开钢琴。其实，并不需要强留，也不用人们请求，他自己很乐意演奏下去。他接着演奏了肖邦、舒柏特、韦伯和贝多芬的作品，然后又演奏了自己的作品《马捷帕》……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诗人、狂人、音乐家、预言家，我们都是被捆在飞马上的马捷帕！我们被心旷神怡和疯狂的神马带着飞翔，最后要用流血来偿付这美妙而折磨人的奔驰。

费兰茨痛苦地感到，他常常无法抵御那不断侵入修道院孤寂生活中来的成就和威望。摄影师们时刻在窥探他。他们不只一次地连福尔土纳托也加以利用。米由丁夫人给李斯特照了像，科尔姆里夫人还给李斯特雕了塑像。作为“亲切纪念品”的照片最后还是成千上万张地洗印出来散发到全世界。要避开人，特别是避开女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音乐家、诗人、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都来与他交往。格莱戈罗乌什认为，费兰茨正处在十分活跃的状态，处在足以推动任何人去进行创作的电力饱和状态。所以人们围着他转，都想借用他的电流。不仅科学家、艺术家是这样，就连一般的普通人也是这样。

费兰茨高兴地逃回到马利奥山冈，从这里可以看到台伯河谷地的秀丽景色，一直看到更远处的坎帕尼亚丘陵。山上真好，屋子拱廊下面象深井中一样阴凉，在这里可以听到罗马城里非

常和谐的钟声，仿佛是一只来自天上的手在拨弄巨型乐器的音栓。山上真好。他在辛勤创作的幸福时刻还应加上这样一点：只有这山上好！《圣伊丽莎白》的架子搭起来了，而且越来越接近完成。会有机会演出吗？这只有上帝才知道。费兰茨梦想到佩斯—布达演出，梦想再次与祖国聚会。他身上缺少一种记仇的能力。不管他怎样尽力回味当年布拉沙伊缺乏教养的语调所引起的苦味，不管他怎样回忆起西蒙菲大话连篇的言词，他最终也只能笑笑而已，一概都能加以宽恕和原谅。当然，他们都是些受屈辱的人，因为他们除了屈辱与愤怒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正是这种屈辱与愤怒使被各种鸦片麻醉的匈牙利民族保持着清醒头脑。他怎能生气呢？不管对布拉沙伊也好，还是对别人也好，他都不会生气。他正在写《圣伊丽莎白》。每当他把一个个匈牙利的音乐构思作为一根根柔软的、几乎觉察不到的丝线编织到公主斗篷上的时候，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表情。第一景马上就出现了匈牙利式的传说，从多瑙一蒂萨河流域来的大贵族把伊丽莎白送给瓦尔特堡的大公："宝贵的人质就在这里，我祖国匈牙利的圣洁之花……"。接着就是写玫瑰花的奇迹和忧伤的惜别：侯爵到圣地去朝拜，把伊丽莎白托付给一直受她保护的那些人。拉约什请求普通的人民保卫善良的公爵小姐。暴风雨的一章已经写完。这是可怕的雷电交加和火光冲天的音乐壁画。伊丽莎白被撵出瓦尔特堡，但复仇的天庭把坏人都烧死在古老的城堡里……音乐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美丽而野蛮的祖国"，伊丽莎白最后叹息道："祖国，我的灵魂象即将死去的天鹅那样飞向你身边。"

费兰茨还不知道，这部作品什么时候能上演，但他在马利奥山冈这里学会了艺术家最高深的智慧：艺术是既不能用成功和掌声，也不能用赞扬和评论来加以衡量的。内在的心满意足是

艺术家真正的桂冠。"我所承担的任务都完成了"，这才是真正幸福的感叹。

第一份总谱的墨迹未干，另一部巨著的轮廓就已经展现在他面前：《耶稣》。目前还只是处于构思梗概阶段（这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乐曲中的拉丁词句都是他从圣经、祈祷词和教堂的赞美诗中选出来的），但音乐灵感已经抑制不住：《哈利路亚》、《牧歌》和《圣王进行曲》已在他灵魂深处响起来了（那种深沉的、赞许的微笑又重新浮现在他的嘴角上：三个魔法国王中将有一个是匈牙利的。如果说后世能容忍鲁本斯给圣母和耶稣基督穿上安特卫普的豪华服饰的话，那么令人皱眉头的音乐史将来也会原谅他让一个东方国王穿上带有马刺的皮靴，甚至还让他用捻胡须的动作来表达喜悦的心情）。是的，格莱戈罗乌什说得对，费兰茨正处在空前活跃的创作时期。他早上四点钟刚一起床，就已经把总谱摆在面前。他聆听着耶稣在山上讲话的男中音独唱和象山中沉重夜雾一样飘浮在宣叙调周围的合唱。作品实际上还处于勾勒轮廓的阶段，但他已经听到乐队在演奏赋格曲：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接着是两个女声歌唱复活节的沉思：《啊！儿子和女儿》。但灵感（至少是费兰茨的创作灵感）是怎么也驾驭不住的。因为《西班牙狂想曲》也在同一个时候胜利完成（谁也说不好这是第几次改写，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手是受回忆支配的，他回忆起流浪年代和奔波于成百个窝巢之间的那些日子）。他生气地拒绝了钢琴艺术家的称号，说他自己最多只是个已经逝去的能手，只是一个从前曾多次被人提及的钢琴艺术家的替身。尽管如此，他还是写了象《林中风啸》和《山魈圆舞曲》这样的现代钢琴艺术佳作的提要。目前正在酝酿的还有《梅菲斯特圆舞曲》和《保拉伊·费兰茨在波浪上》、《阿西西·圣费兰茨向鸟儿讲道》这两个传说。他在工作的间隙还拚命地阅

读书籍，其中包括十三世纪的意大利文学著作。这里有不少胡闹故事使费兰茨放声大笑。笑声也许会震怒修道院的古老墙壁和费兰茨居室的拱门。但这里也有另一种读物。现在看看费兰茨的笔记吧：

> "圣费兰茨熬了四十个通宵，眼前闪耀着令人振奋的幻影。他在第四十一天命令列纳尔兄弟说：'拿起笔来写吧！'这时，阿西西·圣费兰茨便开始唱起《太阳颂》来，赞美上帝、太阳兄弟、月亮姐姐、火神昆仲和风云朋友。一二二六年十月四日，当圣·费兰茨向生命告别的时候，又唱了太阳的赞歌。这一段与歌德先生阁下与生命惜别时的情景非常相象：'要更多的光！更多的光！'"

他现在虽然还在考虑《太阳颂》，但他的思想却不安地从一个主题跳跃到另一个主题，这样又重新回到歌德、《浮士德》和魏玛的主题上去了。莫非他会再一次回到阿尔滕堡，回到那喷金的蓝色房间，回到已故的玛丽亚·巴甫洛夫娜接待他的沙龙？那次会见到如今已有多少年了？再叹息一两声，再过一、两分钟，就是二十年了……他迫不得已地要同魏玛和德国打交道，因为牢固的纽带把他和这个远方的世界联系起来。汉斯·彪罗来信了。信中充满了那种对父辈惯有的赤诚和对科西玛狂热的爱情。汉斯的信中还附有照片。照片上，一只手拿着指挥棒，另一只攥成拳头的手放在交响诗《理想》的总谱上。照片上的题词是："在军旗下，我胜利了，而且不会放弃胜利……"费兰茨十分感动地抚摸着照片，说："亲爱的汉斯，你想这样来取胜？你要是站到我的敌人一边，不是更好些吗？我当然会原谅你，但你不应

该把拳头攥得象古代的角斗士那样紧，仿佛不是为了取胜，而是为了活命才去角斗似的。”

他把《太阳颂》和《耶稣》放在一边，重新给巴黎、柏林、德累斯顿和佩斯一布达写起信来。他与全世界通信，向权威人士推荐优秀的钢琴艺术家、绝对正确的乐队指挥、杰出的作曲家和具有古典个性的男人汉斯·彪罗。在给汉斯的回信中，他只写了几句话：

> “你很了解，我并不搜集照片。居室的墙壁也不用照片来装饰。我工作室里一共只有两张肖像。其中有一张就是你的。上面还有十分精彩的题字：‘在军旗下，我胜利了，而且不会放弃胜利。’”
>
> （另一张肖像又是谁的呢？是卡罗琳的，孩子们的，或是瓦格纳的？）

马利奥山冈上一片宁静。

李斯特清晨四点钟起床，略吃一些早点，便一直工作到六点钟。福尔土纳托闪电般地溜进来，把一大杯鲜奶摆在大师面前。这是费兰茨必须喝掉的，因为福尔土纳托的独眼一直盯着他，非要他把这杯生命之泉一口一口地饮尽不可。然后，大师便舒舒服服地散步到修道院的小礼拜堂，聆听静静的弥撒。做完弥撒后再回来工作，不到中午是不离开写字台的。中午鸣钟时吃午饭，由福尔土纳托给他盛来。福尔土纳托对待费兰茨就象仁慈的父母对待粗心大意的孩子一样严厉。对费兰茨来说，本来一块肉、一片面包、一两杯葡萄酒就足够了，但福尔土纳托便是毫不留情。他规定，费兰茨必须吃完每一道菜，然后他才把酒端上来。费兰茨午后一直休息到四点钟。在这段时间内，他可以随心所

欲地睡觉或者看书。起床后散几分钟步，然后又回到写字台前。晚饭是象征性的，只吃几口就算了。就这几口也完全是为了照顾福尔土纳托的情绪。因为要是盘子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福尔土纳托就会不高兴。晚饭后到花园里溜达一阵，九点钟躺在床上阅读《圣费兰茨》。

第二天清晨三点半钟，福尔土纳托站在李斯特工作间的门前低声喊道：

“老爷，有信来了……”

费兰茨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拿信：“快拿来！”

福尔土纳托还在迟疑：“是带丧框的信，老爷……”

信终于拿到手，但信里只有一行字：“布兰丁在圣特罗佩去世。葬礼时间已来不及通知。奥列佛尔”。

霍亨洛赫红衣主教在马利奥山冈上拜访了李斯特。他建议李斯特搬到德斯特别墅去住一段时期，那里有新的环境、新的人群和新的思想。他或许（哪怕是几分钟也好）能从那些痛苦的回忆中解放出来。

就这样，李斯特搬到德斯特别墅。在这里，他听到了飕飕作响的松柏和奇妙的喷泉所构成的音乐。就是现在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音乐脑子。在他的思想中老是回响着：布兰丁死了……布兰丁死了……然后又继续变奏下去：达尼埃尔走了，现在布兰丁也走了……但这两个名字只填满了他思想的一个渠道。在思想的另一个渠道里，乐思汹涌澎湃，填满了呼呼的松柏声和喷洒在它上面的水滴声组合成的音乐。

霍亨洛赫红衣主教几乎每天都来找他。起初只是以一个梵蒂冈使者的身份来探探口气：费兰茨对领导西克斯土什小礼拜堂合唱队和加入最低等级的考虑是否抱有好感……后来霍亨洛赫又以闲谈伙伴和阔绰东道主的姿态出现，最后才以一个朋友

的身份来找他。

在一天晚上的散步途中，他对费兰茨讲起一件不平常的事情：

“友谊不是比某种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更好些吗？”

费兰茨起初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弄明白，主教想要说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卡罗琳和费兰茨的婚姻，以及玛格尼和霍亨洛赫·席林斯弗斯特公爵的婚姻，可能在红衣主教以及费兰茨·约瑟夫国王的第一侍卫官、卡罗琳和李斯特之间结成某种亲戚关系。这是一句奇怪的话。这样说漏嘴的话在舞台上倒是习以为常的：“友谊比任何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都更可贵……”也就是说，不排除霍亨洛赫·席林斯弗斯特家族曾插手教会对他们婚姻的处理。也许不只是维特根斯坦家族，甚至连霍亨洛赫家族也为此事进行了咬牙切齿的、残酷无情的斗争！反正都一样。让我们听听亲爱的费兰茨是怎样说的：“我的主啊，为那位出于对您的爱而宽恕别人的人祝福吧！”

一八六四年八月十日，马利奥山冈和德斯特别墅的隐士离开意大利，直接到了德国卡尔斯鲁厄。借口是他必须去那里参加一个节目上有自己作品的音乐节。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关于彪罗和科西玛的不幸消息……科西玛是费兰茨唯一的孩子了，而彪罗是他的学生、同盟者和最忠实的朋友。为了费兰茨，彪罗一次又一次拿自己的成就、前途、神经和健康去冒险。如果所传科西玛和汉斯两人关系破裂的消息属实，同时又不能判断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由于妻子、丈夫或一个第三者的过错，那么他就应该前去把事情的因由弄个明白。尽管马利奥山冈是那么宁静，巴布依诺大街上人们对待他是那样崇敬，风吹在德斯特别墅的松柏竖琴上所发出的乐声又是那么动人，他也不得不去。

科西玛单独一人来参加卡尔斯鲁厄音乐节。汉斯留在慕尼黑，他现在是个躺在床上的病号。费兰茨很谨慎地询问她，因为他了解自己女儿的脾气：她是不愿让任何人接近自己的，就连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也许她最不让接近的正是自己的父亲。

“汉斯到底生什么病？”

“神经衰弱……”

“医生呢？”

“这是不需要医生的，需要的是意志力和自我克制。汉斯冲着乐师们吼叫，捏着拳头对待新闻记者，回家以后又象个发神经病的女人，稍为大声的讲话和碰门的声音都受不了，最受不了的是小孩的哭声。”

费兰茨继续追问：

“只因为这一点，他是不会留在家里的。他并没有放弃卡尔斯鲁厄的演出。相反，在这样的情况下，改变一下环境也许会起到治病的作用。汉斯究竟出了什么事？”

科西玛暂时顶住了父亲的探寻目光，但不久便失去了自制能力：

“爸爸，您问这些干吗？应该说：我错了。怜悯并不是爱情，我只是可怜汉斯，但从来没有爱过他，和这个经常处于痉挛状态和自寻烦恼的人是过不到一块去的。他要作曲，但没有任何才能。他想模仿爸爸，丢开谱子去学会所有的音乐作品。但是，在我爸爸身上象呼吸一样自如的东西，在他身上就只会引起头昏脑胀、心跳异常、汗流浃背、怒气冲冲和昏迷不醒。当然，他是爱我的，非常爱我。但这种爱也起了相反的作用。他总是折磨、冷嘲热讽、影射我……”

费兰茨插话说：“影射……影射什么？”

科西玛倏地一下红了脸：“谁知道？他没有一句话不是带刺

的……但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反复无常的。瓦格纳一来，汉斯便惊慌失措，暗中注意人家的每个声音和语句，嘴唇无声地动来动去，仿佛在模仿标准的发音口形一样。等瓦格纳一走，他便把在慕尼黑搜集到的关于瓦格纳的所有闲话都一个个地抖出来，逼得人发狂发疯，最后只能是吵架、争论和发誓：离婚。”

卡尔斯鲁厄音乐节的第二天，瓦格纳也来了。要是有人透过一家咖啡馆的玻璃窗，透过那吞没所有声音、姿式和面部的细微戏剧性表情的中间介质来观看瓦格纳的话，他就会这样说：瓦格纳已经老了。他显得有点枯干，头发稀疏，眼神局促不安，也许是因为畏惧某个潜在的敌人。但费兰茨并不是通过这种中间介质，而是通过熔化在熊熊烈火中的爱，激动地观察自己朋友的。他所看见的是一个在顷刻之间便会迷惑住朋友甚至敌人的神奇人物，这个人能使他忘掉所有其他的人。和他在一起时，实际上只能谈一个人和一件东西，这就是瓦格纳及其著作。这对费兰茨来说是最不成其为负担的，因为瓦格纳讲起话来能使最冷漠的听众也起来与他一同战斗，一同遭难，一同失败和一同胜利的（至少是在他讲话魔力所能维持的一段时间内）。费兰茨不好意思地承认，他在听瓦格纳讲话的瞬间，把汉斯的事，两个年轻人的婚姻即将破裂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瓦格纳身上。

“《特里斯坦》的最后一次排练是在维也纳，”瓦格纳开始说道，“那些低贱的、执迷不悟的乐师们几乎进行了七十来次排练，但后来都没精打采地放弃了分谱，实在演奏不下去了。于是，一切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来。债务、期票、苦死人的义务，以及正如在这种情况下习以为常的那样，债主也钻出来了。我只好逃到布拉格、苏黎世、柏林，逃到给予温暖和鼓舞的汉斯和亲爱的科西玛身边。后来回到维也纳，才发现负债者的监狱还一直是个

威胁性的现实。这不仅涉及到我本人，连帮我把好些期票转了帐的塔西格也被牵了进去。又得再次逃跑，逃到德国马林费尔德去。最后，我绝望地、一无所有地、怀着自杀的念头跑到斯图加特的马尔奎特旅馆，准备走最后的一条路——死亡。可爱的斯图加特乐师艾凯尔特却把我拖去参加《唐璜》的演出。但这也是死神的音乐，只是那些吊在滑稽戏布幕上的人才不懂得这一点，看不见唐璜额头上的黑色印记：悲剧式的死亡信号。我再一次单独一人呆在旅馆里。早上有人小心地叩门。原来是巴伐利亚国王陛下的正式顾问、内阁秘书封·普菲什台尔迈什特尔郑重其事地来拜访我！我还以为这是在开一种愚蠢的玩笑，但那河马模样的人说话间就走了进来，他把脚跟一碰，直挺挺地弯腰敬礼。他拿出一个衬绒盒子，从里面取出一枚非常好看的红宝石戒指，然后有点害臊地，不自然地带点咳嗽声说道：

‘国王陛下表示，他想亲自会见《罗恩格林》音乐诗人的愿望，就象红宝石般地燃烧着！’

我给自己争取了几分钟的喘息时间，然后当天就坐专列去慕尼黑。国王陛下安排得很豪华。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毕里特伯爵的别墅中为我准备了一套住房。另一套住房在布里纳尔大街最豪华的宫殿中。这座宫殿掩映在散发着清香的胡桃树丛下。第二天国王单独接见我。国王陛下本人就是活生生的罗恩格林。他身材魁梧，一头波浪式的软发。眼神充满幻想，下巴细嫩和嘴巴机灵，说起话来，就仿佛这位梦幻王子不是在王宫里，而是在世界上最有文化修养的演员中长大成人的。他拥抱我，从左右两颊亲吻我，然后用一种很有文化教养的、略感模糊不清的声音说道：

‘我在未认识您之前，就已经喜欢您了。您的《罗恩格林》对我来说，比任何好朋友或兄弟都更可爱……您所写的东西以及

有关您的著作我都读过了。我要您(看，这个富于幻想的格拉尔骑士也能够非常坚决地下命令：我要您)从此永远从谋生的烦恼中解放出来。我要使您在慕尼黑实现您曾经梦想过的一切。我要为您建造剧院和学校，以便讲授您的艺术和哲学……'

年轻的巴伐利亚国王讲话时，根本不顾慕尼黑倒更象一个大农村的事实。在这里，人们穿过满地泥坑的小街把牛群赶到牲口市场去，城里酿酒坊的气味暂时还压抑着象征诗神来临的春天芳香。我飞快地跑回新的住所。多么奇怪：我一生中所梦想的那些家具、地毯、银器、沙发和贵重的青铜器皿全有了。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个人做伴侣。我与妻子明娜早已分居，这个不幸的女人只能伴随我到小城市演出，《特里斯坦》和《指环》她已经看不到了。这样，我只得单独一人呆在神奇的宫殿里，热烈地思念着那些为我所爱和爱我的人。第一批邀请信是向汉斯和科西玛发出的。然后请来了波尔和你的学生——谦虚 可爱、助人为乐的科乃留斯。这个可怜的人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失败之后（指的是演出《巴格达理发师》时的丑闻）真正成了我的兄弟，因为我一生在失败与丑闻上也不知跌了多少跤。但最重要的是科西玛……费兰茨，你的女儿，她眼中闪耀着你坚定而喜悦的光芒，表现出你的教养和才能，使你不仅保留了自己，而且还把自己体现在某个别的人身上。亲爱的朋友，你终于到这里来了。我的圣洁的费兰茨，没有你，我就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你在许多年前就握住了我的手。我向你发誓，我再也不会放开这只手了。”

第三天晚上，汉斯也摇摇晃晃地走进来。他确实是个神经病患者。在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上与人争论不休，其架势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决斗，倒不如说是骂街。他争不过别人时，就请求原谅，难为情地默不作声，然后垂头丧气地坐下来，一坐就是几

个小时。说实在的，大家也并不太注意他。瓦格纳在演奏即将完成的新作《名歌手》中的一些片断。这是汉斯·沙什在挥泪告别青年时代。他听天由命地放弃了亲吻和青春，离开了姑娘艾娃。接着是一支歌唱小斯托尔琴格·瓦尔特的又伤感又快乐的歌子。斯托尔琴格·瓦尔特的获胜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才能和优良品质，因为沙什比他更为成熟、深沉和聪明。他之所以获胜，是因为身边有个伟大的盟友：青春！美妙的音乐，真是尽善尽美。你看，瓦格纳就能够摆脱命运女神的黑网，上升到智慧的最高顶峰：微笑着宽恕一切。

费兰茨正为一个问题感到非常苦恼：瓦格纳究竟是按照谁的原型塑造小斯托尔琴格的，而那被迫离开的沙什又是谁？他开始隐隐约约地猜到了：两个男人都是瓦格纳自己，聪明的沙什和年轻的无赖追求者瓦尔特，都是他……那么艾娃又该是谁呢？

第二天，费兰茨又一次面对面地和科西玛交谈。费兰茨的嘱咐语重心长。他说话非常直率，不喜欢绕弯子。总的意思是不能抛弃汉斯，不能随随便便地就把一个人置于死地而不顾。生活有时要求人们付出几乎无法忍受的代价，要求作出牺牲，牺牲自己的幸福。这并不是什么愚蠢的、过了时的小市民道德，也不是装模作样和假仁假义，而是一种严正的态度。有时候责任感是占主要地位的。这是一种不能回避，不能赖掉的责任：家庭、孩子……

科西玛没有对天发誓，也没有许什么愿。费兰茨还以为她的沉默是表示同意留在两个孩子和生病的丈夫的身边。

费兰茨到法国圣特罗佩去给布兰丁扫墓，在奥列佛尔家里做了几天客。他实际上只是现在才认识他的女婿，并且第一次见到了布兰丁留下的小孤儿。后来他又到巴黎去看望妈妈和老家。家里的每件东西都按照妈妈的意思原封不动地保留着。那

架肖邦和门德尔松弹奏过的钢琴，那张帕格尼尼在上面写过第一张乐谱草稿的桌子，以及那些页边上写满注解的书籍，都原封不动地放在老地方。在书上，两个年轻人的笔迹象两只互相攥住的手一样，紧紧地交错在一起：这就是玛丽和费兰茨。

安娜已经显得十分衰老，她是七十好几的人了。在这种时候，眼前的事逐渐消逝，而往事却以一种迷人的新鲜感展现在她面前，仿佛半世纪以前的东西、人物和景色都染上了现实生活光耀夺目的色彩。安娜在回忆往事。一连串的名字又重新闪闪发光：多波尔扬、基什马尔顿……卡罗琳、车尔尼老师、亲爱的埃拉尔德伯伯，最后，她还非常小声地、以一个老妇人常有的那种腼腆的柔情念叨着：亚当，已故的小李斯特·亚当……

一八六四年十月，李斯特重返马利奥山冈。崇敬者（学生们）把他包围得紧紧的，要他答应他们的请求：重新教他们的课。但不是在马利奥山冈上教，因为他们不愿打扰他的安宁，而是在瓦尔第主教的罗马府邸上课。李斯特在这里接待他的学生。他在教学中提倡最广泛的宗教容忍，因为他喜欢听巴赫、舒曼、贝多芬、韦伯、斯卡拉蒂和门德尔松的曲子。只有当某个学生演奏他的作品时，他额上才出现一片愁云。他不喜欢卖乖讨好的人。他参加一次救济晚会的表演后（为受饥荒的人募集了一笔惊人的款子，约两万里拉）便隐居到多米尼克僧团的修道院去了。沙鲁什神父教导他参加最低的等级，但费兰茨却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是一种新的束缚，甚至还要加上履行诺言的宣誓。费兰茨在信仰问题上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一条非常特殊的道路。他常常对自己所产生的怀疑和向自己良心所提出的问题感到害怕：他在自己周围见到的确实是基督教吗？肮脏卑鄙、愚昧无知、出卖告密、落后保守，难道就是这些东西使罗马成为千百万天主教徒的首府的？他害怕这些束缚，因为他在生活中总是过

于草率地把手伸进枷锁，然后又不得不用十个指甲从自己身上刨掉那些深深勒进肉里的绳索。他动摇不定，忧心忡忡。但霍亨洛赫红衣主教在他身边。霍亨洛赫本身的地位不仅居于费兰茨之上，而且他还是庇护九世的代表。还有那个卡罗琳，她祈祷、央求、论证，在他面前描绘出一幅未来福音的奇妙图景……要是没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在他头脑里回响，即使这三个人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推动他去采取严重的步骤。修道士的黑袍会为他提供一种不仅是对付外界，而且也是对付他自己的保护。尽管他已是五十好几的人了，但身体的感官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脑子和想象力还一直很年轻。他应该在自己身上和周围环境中创造一种宁静的气氛。假如他的意志在这方面显得薄弱的话，道袍是会帮他忙的。

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加入了教会的最低等级。作为他加入教会的第一个表现便是搬进梵蒂冈去住。他的住处离西克斯土什小礼拜堂只有几步路。他的生活制度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变。清晨四时起床，谱写《耶稣》。然后去参加西克斯土什小礼拜堂的弥撒。除了做弥撒的神父以外，在米开朗琪罗画的天花板下面站着的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是由于疲乏还是紧张工作造成的过分敏感，他被一种古怪的幻觉所占据。是的，莫扎特从前肯定也在这里站过，那差不多是百年以前的事了。他听到了《哀求》，这已超过了想象，而是一种幻觉：一个小男孩站在那里，把手藏在他父亲的手心里……过了一会，幻影消散，另一个大师走上前来。这是奥莱格里。是他用音乐的威力降伏了童年时代的莫扎特。这真是一种古怪的联想：这个正在走近他的人，与西克斯丁纳、奥莱格里以及童年时代的莫扎特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正在走过来的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费兰茨现在听到一个巨人的脚步声，一个朝他弯下腰去的巨人的脚步声。

他是贝多芬。大师搂着小费兰茨，亲吻他的前额，就象四十年前那样。

一封唤起希望的信，是汉斯高高兴兴、信心十足地写来的。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五日，他在海牙演奏了李斯特的《死之舞》。内容十分丰富的《末日审判》的变奏组曲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其中宏伟的钢琴声部是由彪罗亲自弹奏的。

接着从国内也来了信：匈牙利准备庆祝民族音乐学院二十五周年校庆。学校创办人是李斯特·费兰茨。以艾克尔、莫索尼、阿伯拉尼·科尔内和回国访问的莱梅尼·埃代为首的匈牙利音乐界感到，应该对李斯特作出某种尊敬的表示。当那些怒气冲冲的文章、传单、信件和挑起争论的攻击性小册子放完了烟大焰小的火炮之后，社会舆论本身也震惊地认识到，决不能让李斯特和他的祖国疏远开来。普罗纳依·加波尔代表民族音乐学院给李斯特写信表示：他们将演出《圣伊丽莎白》，以庆祝李斯特创办的学校的二十五周年校庆。

费兰茨马上写了回信：

"主席先生！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来信所发出的亲切邀请使我感到荣幸，对此我表示热烈的感谢。请允许我以一个同胞的身份，以一个抱有良好愿望的艺术家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感谢。一八四〇年，我在佩斯参加了创建音乐学校的某些工作。如果能与诸位共同庆祝校庆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感谢您那样好心地提到我特别偏爱的《圣伊丽莎白》，我想以自己的作品来赞美生于匈牙利、葬于远离祖国的图林根的圣公主和她的美德。假如我的曲子能在匈牙利受到欢迎，那我将感到无比幸福。但这就首

先需要把德文歌词翻译成匈牙利文。如果诸位想使这一工作达到预期的目的，那就需要有懂行的音乐家把它准确地翻译出来。需要那种能把匈文歌词配在曲子上的音乐家。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必须保证独唱家和参加合唱的艺术家有一种善良的愿望，和建立一个好的乐队……”

这当然不是什么纯粹的客套话和甜言蜜语的献殷勤，而是严肃的指示。佩斯—布达的听众已经成熟了，他们要求的是真正的艺术，不再满足于浅薄的即兴演奏和一时的激动情绪。假如你们要我回来，要我参加匈牙利音乐的血液循环的话，那就不能只要求我到你们那儿去，你们自己也应该承担一点什么，应该努力提高自己，使佩斯—布达能和李斯特的名字相称。

欢乐的夏天。一八六五年八月八日，李斯特从南车站到达佩斯。他穿过隧道一直步行到“英国女王饭店”。几分钟后，就再也不容许他独自一人回忆往事了。普罗纳依、阿伯拉尼·科尔内、莱梅尼·埃代、奥尔茨·贝拉、艾克尔以及两个搞业余合唱团的同事恩格赛尔和沃赫列尔都来探望他。后来，《圣伊丽莎白》的扮演者们也前来致敬。妩媚的佩斯圣伊丽莎白也来了，她的扮演者是保拉伊夫人。扮演凶狠的索菲亚的是可爱的、笑起来满面通红的拉巴丁斯基小姐。宗教界客人、内城修道院神父、高贵的什温德奈尔老爷也来拜访李斯特修道士。道袍并不妨碍李斯特招待客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干杯祝酒。不久，什温德奈尔修道院长要求讲话。他发表了一篇铿锵有力的演说，仿佛现在守卫在匈牙利首都上空的不是两头鹰的旗子，而是科苏特的红、白、绿三色旗。排练在非常良好的气氛中进行。阿伯拉尼·科尔内翻译的匈牙利歌词也不错。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使他在佩斯逗留期间

变成真正节日的意外事。八月十二日，有三位客人来敲李斯特住的旅馆的房门。他们是科西玛、汉斯·彪罗和爱德华·李斯特。费兰茨非常为女儿骄傲。他最了解，被情感和狂热的波涛四处颠簸的她，要对她已经不爱的人保持忠诚不知要作出多么大的努力。汉斯很兴奋，到处和人交朋友(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和谁交上朋友)。科西玛沉默寡言，既不对父亲的作品和事先的准备工作发表意见，也不对她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匈牙利首都发表意见。爱德华仿佛不是在地上行走，而是在天空中、在幸福和荣誉的云雾中翱翔。因为他在费兰茨周围可以看到许多贵族徽记、铁王冠勋章、高级神职人员和政府要员。

作品引起了很大反响。汉斯也把总谱要了去（一八六六年二月，他在德国演奏了这部乐曲)。同时，还收到了魏玛人的来信：他们计划在一八六七年八月演出《圣伊丽莎白》。

又重现了过去的蜜月：祖国把自己的伟大儿子搂抱在怀里，费兰茨激动地回报祖国对他的钟爱。《首都日报》发表了为他写的赞美诗：

维莱什马季给你戴上桂冠，
冠叶还在发绿，但人已在坟墓。
连匈牙利人也没有赢得这样的常春藤，
尽管许多人戴着花环。

俄耳甫斯征服了地狱，
天堂的灵感把你征服，
星星因你的表演而诞生，
一只天上的手静悄悄地为你赐福。

罗马抢走了你，但你还是我们的，
艺术的王国如此宽广，任随你在哪里，
如果你为祖国争光，
人民为你骄傲，世界向我们敬礼。

李斯特在庆祝活动中结交了一个杰出的朋友，这就是爱特沃什·约瑟夫。这人具有一个欧洲型的头脑，不仅能从哲理上，同时还能从实践上考虑问题：

"在听了您的作品的演奏后，"爱特沃什说道："就越发明确了摆在我面前的目标：我们应该建立学院，我指的是音乐学院。这样就可以避免损失。我国有才能的青年出于不得已才去外国上音乐学院。他们起初是学生，后来是别国音乐活动的参加者，最后变成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音乐文化的骄傲。我们就是这样失掉约基姆的。莱梅尼至今还在到处流浪。您也是这样跑到外国去的。我们需要的是一所能够给音乐创作的熔炉维持恒温的学院。闪烁而过的彗星是很少能或者根本不能作出什么贡献的。我们需要的是千百个永远照耀匈牙利天幕的星座。"

蜜月。匈牙利对李斯特的艺术永远也不知道满足。音乐会上演奏了《但丁交响曲》和《拉科齐进行曲》，教堂里演奏了《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接着演出吉卜赛音乐。最后又组织了必不可少的义演音乐会：费兰茨又重新坐到钢琴跟前。票价确实是贵得不可想象，一张包厢票就是五十福林。但费兰茨的捐赠也不是一般的规模：里波特城的教堂得到两千福林，作家救济会得到五百，托儿所得到两百，孤儿院得到三百，女护士协会得到三百，盲人会同样得到三百，青年会得到两百，新教孤儿院得到两百，犹太医院得到两百，圣芳济派女修道院也得到同样的数目。剩下的八十福林周济了经济拮据的人。

蜜月……

全国人都在同国王一块度蜜月。记忆力被麻醉的民族很快就忘掉了一切。人们已记不清匈牙利的阿拉德城和维拉戈什城、奥地利的库夫施泰因城和诺伊格巴德城[1]连隐居在意大利图里城的科苏特·拉约什也被遗忘了。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啜吸要与哈布斯堡签订和约的鸦片。他们不是以愤怒、复仇雪耻和自由斗争战士的坚定姿态去议和，而是象彼此间闹口角的兄弟一样，把双臂伸向对方去表示和解。干戈已化为玉帛，就别再提了。现在和未来都在正在到来的黄金时代的光辉中闪耀。资产阶级充满了幸福新婚的火热劲头：大兴土木，办起一批又一批的新企业，建立了一家又一家银行和吸收成百上千工人的工厂。但市民们还一直把塞格什瓦尔的图片保留在橱柜上方：裴多菲以自己的鲜血在战场上写下了“祖国”二字。他们悄悄传递着描绘科苏特讲话的油画复制品：“向民族的伟人致敬！”自由斗争战士式的胡子、缝了丝绦的短外衣和匈牙利的硬筒靴子重新成为时髦装束。英勇牺牲的裴多菲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时髦偶像。善良的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关圣陶马西城战壕、科马洛姆要塞和布拉尼斯科山隘的文学回忆录……所有这些都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但匈牙利资产阶级毕竟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求与奥地利关系正常化，以便使货币和商品的血液循环沸腾起来，达到能获取大量利润的温度。安德拉什·久拉为此热心奔走，而聪明的戴阿克·费兰茨、爱特沃什·约瑟夫在进行调停[2]。整个教权派，从西托夫斯基大主教、什温德奈尔修道院长到能干的圣芳济派修道士当克·阿加伯都在调停。当克·阿加伯就是第一个提出《加冕弥撒曲》只能由世界唯一的音乐家李斯特·费兰茨来

① 匈、奥人民一八四八年革命遭受失败的地方。

② 这些人原来都是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主张匈牙利民族独立的。

写的人。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西托夫斯基大主教的赞同。后者在用友好的、长辈式的口吻写给费兰茨的一封信中又进而肯定了这个想法。

蜜月的幸福气氛也迷住了费兰茨。既然那么多的人都认为，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冲突之后国家终于走上了和平的轨道，那他也不可能置身于这种社会舆论的影响之外。于是，他接受了当克·阿加伯和西托夫斯基的想法，而且还十分顺从地承诺，一定要以无愧于国王和整个民族的创作，来回报使他感到荣幸的要求：

"上帝，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我要歌唱，我要朗诵赞美诗。"

蜜月的气氛似乎也感染了下层民众。奥古斯把费兰茨和他的朋友们带到塞克萨尔德市。那里也在为新的黄金时代进行准备：烤牛肉，庆祝葡萄节，在奥古斯府邸的窗户下举行民间联欢会和音乐会，不仅让少数特权人物参加，而且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李斯特和莱梅尼的演奏。多么幸福的"新婚"气氛：用匈文、德文、法文和拉丁文致祝词和发表演说，在讲话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加进业余合唱队的节目。把从前的传说和新近编写的神话天真地混编在一起，歌唱英勇的红帽战士和向他所热爱的臣民伸出使徒之手的国王陛下。

难道费兰茨能够置身于这种吞没坟墓、战场、绞刑架和光辉历史篇章的特殊风暴之外？这场风暴看起来至少是一次大喘息：整个民族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费兰茨接受了委托，也表示了谢意。这一个总谱的稿子还没有写好，他就已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了。他准备在《弥撒圣歌》中采用格里高利的旋律，在《信经》中则采用古老的定旋律……让《贡献经》成为一种匈牙利颂歌，如果抽去里面的传统

拉丁文动词，而代之以匈牙利字，它就可能变成为国歌。《祝福经》里的小提琴独奏准备让莱梅尼·埃代去表演。费兰茨面对这个计划宽慰地笑了起来。莱梅尼确实是个具有自由斗争战士性格的匈牙利人。不过他身上还有某些装腔作势和故弄玄虚的作风。他把自己打扮成好象是个烧炭党的头目，仿佛在他的提琴盒里藏有煽动未来革命的燃烧弹。这就是那个可爱的、好吹牛的，摆着加里波的[1]架子的埃代。将由他来演奏《祝福经》中的提琴声部。他会用那种甜滋滋的、谄媚的音调来演奏，这种音调肯定不是从音乐学院学来的，而是从那些既被人们排挤、蔑视，又被人们爱慕的吉卜赛人那里学到的……

费兰茨重新回到罗马的家里。但是福尔土纳托只能高兴几分钟，因为又得完成一项不愉快的任务，把一封带黑框的信转呈给主人。噩耗是从巴黎来的：李斯特·亚当夫人，拉格尔·安娜·玛利亚在巴黎带着送别她的祝福，把灵魂交还给创世主，终年七十八岁。

费兰茨正在谱写《耶稣》“母亲站在十字架下”的一段：

“她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抛弃，
受折磨，焦愁满腹。
………
啊！这是多么大的震动，
独生子的母亲，
是多么忧虑、痛苦。

---

① 加里波的（1807—1882），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革命家，曾领导1849年的罗马共和国防卫战和率领千人红衫志愿军援助1860年爆发的西西里农民起义，为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往事的回忆不断地浮现在拉丁文诗句的字里行间：亚当和安娜从前为他奋斗了一生，他自己经历了焦虑、嫉妒和个人奋斗的过程；为了他，为了李斯特·费兰茨，两个普通人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亚当早早就去世了，母亲远离故乡和亲友，在巴黎过着特殊的流放生活，因为这里有人需要她来照顾，起初是照顾费兰茨，以后是三个被遗弃的孩子。他们会反过来关照她吗？科西玛什么时候想到过祖母？

他回忆起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在法国圣特罗佩城扫墓后，妈妈避开了他提的一大堆问题：怎么样？你不需要什么吗？需要人陪伴吗？需要帮助吗？她只是抚摸着费兰茨银白色的头发："孩子，你感到幸福吗？"

《耶稣》已经完成。他立刻以狂热的速度去谱写《加冕弥撒曲》。一八六六年三月，李斯特不得不中断他的工作。因为巴黎人邀请他到他青年时代常去的圣厄斯特赫教堂里演奏《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演奏的结果是既成功，又失败。他唯一的老朋友柏辽兹示威性地中途退场，一边冲出教堂的大厅，一边骂娘：

"我才不愿为这样愚蠢的表演浪费时间！"

成功。梅特涅公爵夫人在其巴黎府邸中安排了一次家庭演奏会。圣-桑和李斯特在两架钢琴上演奏《圣伊丽莎白》中的片断、《弥撒信经》和《序祷圣歌》。圣-桑热烈称颂李斯特：

"李斯特·费兰茨是我们众人的师表。他的勇气和毫不妥协的胆识激励着我们所有的人。他的音乐成了真正的预言。仿佛雄鹰的眼睛透过了未来时代的云层，他已经看到了下一个世纪的美景。"

成功。但这并不能弥补从他身边夺走柏辽兹那一瞬间的忐忑不安。成功：斯美塔那在布拉格指挥演奏《圣伊丽莎白》；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由彪罗主持举办了李斯特节日音乐会，在荷兰

女王的请求(甚至是央求)下，李斯特也坐到钢琴前。他演奏了贝多芬、韦伯、舒柏特和肖邦的作品，然后也谦虚地演奏了一点自己的作品。所有这些成功并没有使李斯特眼花目眩，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常常表示："我的作品离大多数人还非常遥远。我的音乐还没有什么听众。我并不喜欢在这里或那里都举办李斯特音乐会。我能够等待。我知道，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对的。"

他确实是反对举办李斯特音乐会的，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热心的意大利学生斯加姆巴第去演奏《耶稣》已完成的部分乐章，也不能阻止受欢迎的维也纳乐队指挥海尔拜克和俄国大师鲁宾斯坦把李斯特的作品列入他们的节目。不过，这都不能弥补他在魏玛所经历的苦难时刻。人们准备在瓦尔特堡演出《圣伊丽莎白》。李斯特荣幸地收到了邀请信。合唱队里有几百人，而从欧洲各地前来参加瓦尔特堡盛大节日的有成千上万的人……但他们又是怎样对待阿尔滕堡的呢？所有房间里的家具都必须很快地扔出去。因为大公的经济管家只把那间蓝色的房子留给李斯特作为"永远租房"。他干脆连那间蓝色房间也不要了，他只需要一对祈祷用的小凳和僧侣单人房间那样窄小的卧室。谱写《理想》和《塔索》的那张写字台也不要了。那些谱写《b小调钢琴奏鸣曲》和《浮士德交响曲》结尾合唱："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的文具也不要了。他叫人把一些心爱的随身物品装进箱子，其余的都分送别人和廉价处理掉。在瓦尔特堡城中，是成百的歌唱家、华丽的服饰、令人眼花撩乱的节日午餐……而在阿尔滕堡的古老墙壁上却剥落着浆粉，雾濛濛的窗户被多年的融雪和雨水留下了一条条迹印，搬运工人在大声喊叫："喂！柜子要好好抬！掉下来就散架了，它现在全靠祷告在支撑着。"

不，他不愿再见到"王子饭店"，也不愿看到新魏玛协会会员们曾经聚会过的那张桌子，更不愿再看到他与玛丽亚·巴甫洛

夫娜商谈过魏玛协议的大厅和夏宫……

福尔土纳托感到非常不幸。好动的主人刚刚回到家里，就要准备搬家了。霍亨洛赫红衣主教通知费兰茨，说由于职务的变化，他将被调离梵蒂冈。因此他不能再给他所庇护的人在这块圣地上提供住所了。费兰茨可以重新迁回马利奥山冈。不过，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件调换住处的小事，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看起来，与西克斯土什小礼拜堂合唱队有关的计划是落空了。皮埃蒙特人（罗马教廷国最可怕的敌人）强大起来，成为欧洲的一股势力，越来越威胁到罗马的安全。支撑教廷国家的只是几把法国刺刀。他们假设，皮埃蒙特人一旦进攻罗马，拿破仑三世就会站到梵蒂冈一边。庇护九世现在根本顾不上宗教音乐、新的教堂和声和艺术革命了。一般说来，革命的字眼总是使他感到非常可恨，就连艺术上的和宗教音乐上的“革命”，他也容忍不了。他最希望的是能超过约书亚神：不光是让太阳停止不动，而且还让它往回转，从中午往黑夜转。他不需要任何革新，不需要任何新的法律、信仰和哲学，当然也不需要新的音乐。

奇怪的是，费兰茨喜欢这种“空气的变化”。他感到摆脱了什么东西似的，摆脱了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最自由的、其实却还一直紧紧束缚着他的枷锁。现在他轻松愉快地沿着马利奥山冈的小道和石级向山上走。走在他身旁的是那个忠诚的和形影不离的保镖福尔土纳托。

他又回到原来的单人间，回到写字台旁。现在终于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谱写《加冕弥撒曲》了。在马利奥山冈的宁静中，摆脱了包围他的巨大浪潮，他终于恢复了自信，恢复了在欧洲暴

风雨时代谱写《葬礼进行曲》的李斯特·费兰茨的面貌，恢复了三十多年前用《匈牙利狂想曲》不仅吓坏了维也纳的顺民，而且还吓坏了皇家的那个执拗而勇敢的青年人的面貌。在这不受“民族蜜月”浪潮包围的宁静和孤独中，他才醒悟到他实际上所承担的任务是什么，那个与李斯特·费兰茨相称的唯一正确解决办法又是什么。这就是应该用音乐的语言来说明，这个和约（或者用某些特别热心的国王派的话说，叫做民族和国王的婚礼）只有在我们不忘掉……的情况下才能够加以想象，必须采用贯穿在《拉科齐进行曲》每个节拍中的匈牙利式黑管的那种特殊韵律。

李斯特一生中也许还没有这样快地谱写过曲子。一八六七年三月十四日，他刚通知奥古斯说，乐谱初稿已经完成，不久就寄出了已经写好的总谱，由皇室侍从长办公室转交给维也纳有关方面的专家。可是很长时间杳无音讯。直到最后，官方人士才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地放出空气说，根据皇室内部法律的一条规定，任何时候的《加冕弥撒曲》都必须由资格最老的皇家乐队指挥来谱写。布达的教会音乐协会向爱特沃什·约瑟夫发出呼吁：

“西托夫斯基红衣主教曾约请祖国享有世界声誉的儿子李斯特·费兰茨为国王和民族结合的节日谱写《加冕弥撒曲》。按照常理，在这种民族的、从各方面讲都是匈牙利式的仪式上，应该用匈牙利的音乐。但现在报纸上散布说，根据传统的法律，关于匈牙利国王加冕典礼上的音乐，应该由维也纳宫廷乐队的指挥来考虑，这条法律至今未变。因此，教会音乐爱好者协会怀着无限的信任，向尊敬的宗教和教育部长先生阁下、祖国精神文化的法定守卫者、以自己的著作赢得声望的领袖提出请求，请您运用自己有效的影响，为实现上述目的提供援助。”

呈文毫无结果。现在佩斯—布达的音乐协会也向权威人士发出了呼吁。协会向伊丽莎白王后递上新的呈文，签名者有：奥古斯、恩格赛尔、莫索尼、胡贝尔、艾克尔、阿伯拉尼、莱梅尼和王后的匈牙利教师法尔克·米克沙。这次呈文倒没有石沉大海。宫廷的阴谋家们现在只能搞些小动作。《祝福歌》不让莱梅尼，而让维也纳的海尔梅斯贝尔格来演奏。乐队不用匈牙利民族剧院的乐团，而用维也纳皇家教堂乐队。《加冕弥撒曲》的演奏，不让李斯特·费兰茨，而让老资格的海尔拜克来指挥。由于这位杰出的乐队指挥患了重病，最后决定由哥特弗拉德·普莱耶尔来代替他。尽管这些都不过是旁敲侧击，但就是这样，伤口也是很痛的。他们不邀请费兰茨参加加冕节日典礼，马加什教堂里也没有给这位艺术家留出一席之地。幸亏有一个维也纳的乐师把大师带到合唱队里，掺在音乐家中间，才使他有可能在那里听别人演奏自己的作品。

典礼结束后，他毫不引人注目地走下螺旋阶梯，动身回家（他这一时期住在宣誓广场附近）。道路两旁都是观礼台。他只顾走路，根本不去留心那些数不清的群众和观礼台，也没有理睬那些奔来跑去的骑兵和立正挺立的侍卫。他只顾走他的路，脑子里一直萦绕着刚刚演奏过的音乐：多么有意思，非常古老和非常新颖的东西同在一个无尽头的圆周上运动，它们总会在什么地方碰面，格里高利曲调和崭新的现代和音终究会汇合在一起，中世纪的旋律和一种比莫扎特、贝多芬、舒柏特更为自由地组合与分解的和音将相互结合（这时他的思想停顿了一下），就连瓦格纳的创作规律在某些时候也是允许这样做的。

他孤孤单单地在两排观礼台中间走着走着。

有人认出了他。

有一个观礼台骚动起来。又是鼓掌，又是欢呼。对面的观

礼台也兴奋起来，群情激昂，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声音风暴：李斯特·费兰茨万岁！

直到现在他才吃惊地发现，自己陷进一种未曾料想到的庆祝活动中去了。雷鸣般的掌声，整条奥尔布莱特大街到处都是欢呼声：李斯特·费兰茨万岁！

他现在已经不是在走路，而是在逃跑，但庆祝活动却从一条街往另一条街继续流动。一回到家，便精疲力竭地躺下了。他这时是五十七岁。对这种庆祝欢呼和受人排挤的冷热交替的浴池，他已感到吃不消。他休息了。第二天继续休息。

看来，维也纳的王室有两派。一派在那里利用加冕典礼搞阴谋活动，另一派却让皇帝兼国王在证书上签字：授与李斯特·费兰茨以皇室大十字勋章。

慕尼黑快车的头等车厢全是空着的。只有一个年老的修道士坐在衬有绒垫的软席隔间里。后来在巴伐利亚的边界上，有一群人吵吵嚷嚷地拉开了所有隔间的房门，最后在老人身边选定了座位。这些人是猎手。他们把行囊和武器都扔到行李架上，接着还放了些零碎的猎获物。大部分猎获物都在行李车上，其中有一头野公牛，三只母麂子，大约三十只野兔、野鸡和一大堆野鹅。猎人们津津有味地讲着狩猎的过程，不厌其烦地重述拿枪时的动作，体验着窥探和捕杀动物时的那种喜悦心情。后来，谈话转到政治问题上。正在说话的是个身材魁梧，胖得几乎往下垂肉的男人。他显然是想以自己洪亮的嗓音来弥补他生来就缺少的男人气质(因为这个动作不灵的大个子既没有胡须，也没有眉毛，甚至连眼睫毛也不那么值得他骄傲)。貌若阉人的大块头男人虽然只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但即使那些想象力贫乏

的听众也能马上领会他的意思：

"……你们都知道掷骰子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摇摇杯子，把它往桌上一扣，然后满怀希望地细察慢看：自己的运气到底怎么样！骰子从杯子中倒出来了，法国国王、普鲁士国王、哈布斯堡皇帝都弯下腰来观看。有一个崇高的人物本来也应该弯下腰来注意这场游戏的。我不想在这里指名道姓，因为贵族的风度和必要的谨慎禁止我这样做。这个崇高的人物讨厌政治，他坐着专列在慕尼黑和霍恩施万格城之间颠来跑去，去检查《罗恩格林》里的天鹅够不够漂亮，《汤豪塞》里朝圣者的长袍是否合乎规定。总之，他成了剧院经理……甚至当他亲爱的祖父叫他参加十月十八日的家庭节日的时候，我们的剧院经理既不说明理由，也不出席这次家庭聚会。因为他觉得剧院更为重要，正如他觉得剧院比秋季演习更重要一样。这位崇高的剧院经理当然也没有参加秋季演习。他老是和那个慢慢把整个国家都收进圈套的普鲁士间谍泡在一起……"

这时，一个年岁较大的大胡子猎人眨眨眼睛，示意要大家小声点，以免干扰在潜心阅读的修道士，然后插话问道：

"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瓦格纳？"

"是的，是瓦格纳……"

"他是普鲁士人派来欺骗这个二十八岁就登基的可怜人的。这个可怜人以为，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玩具市场，军队只是一盒锡制的士兵，只有剧院才是降临在人间的天堂。"

大胡子继续问道：

"行，行，这些我都懂。那么这个瓦格纳又是什么样的怪人呢？"

"他是个骗子。他背了那么多债，要是必须在负债人监狱里

坐牢以还清这笔债的话，那他到二十二世纪也还需坐牢。我从我内弟那里得知，他是王室出纳员希色尔的一个什么亲戚。所以国王在不到一年之内就拨给瓦格纳和他那伙人十九万福林……”

现在第三个猎人也在凝神细听。他是个书呆子，戴眼镜的。刚才就是他用一个数学教授或一个复式会计那种业务上的准确性来计算猎获物的。他对刚才的话大吃一惊：

“十九万福林？这是决不可能的事！因为国王陛下的王室开支也没有这么多！”

貌若阉人的人发起脾气来：

“怎么不可能?!既然是希色尔说的，那就肯定没错。但这里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钱。瓦格纳先生是普鲁士的政治家，他想改变法律，改变宪法……甚至：他想要消灭巴伐利亚国。您应该明白，他们把他派来是为了迫使普菲什特迈斯特跳出来……这件事做完后，接着就是要把普弗尔顿的脖子拧下来，并把那个给普鲁士人效劳的纽梅伊尔弄回来，让他去打开边防关卡，把巴伐利亚国连皮带毛地奉送给霍恩佐伦人。”

教师打扮的猎人还是不相信，但那个动作不灵便的大个子只顾给他灌输：

“《慕尼黑新闻报》上发表了瓦格纳先生恬不知耻的文章：要把整个巴伐利亚内阁都扫除掉，因为它是人民与未来时代的敌人。”

貌若阉人的人现在以怀疑的眼光观察着他的旅伴们：

“怎么搞的，诸位连报纸都一点不读吗？”

大胡子和那个书呆子气十足的人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我们不大看……我们确是不大看报。工作很多，加上人又是容易疲劳的。刚一拿到报纸，人就发bad……”

动作不灵便的人又来劲了：

“后来，《人民使者报》也不甘落后：他们想让普菲什特迈斯特离开他的岗位，以便让某些贪财分子能轻而易举地从国王的金库里贪污钱财。当然，瓦格纳先生也是有盟友的。尼恩贝格·安采格尔厚着脸皮地提出问题：内阁办公室的领导人有什么权利信口开河？巴伐利亚宪法中既不存在内阁，也不存在内阁办公室，更主要的是不存在内阁领导人。可《人民使者报》也不让步：难道巴伐利亚宪法就允许我们把一个德国土地上最讨厌的、受通缉的犯罪分子直接安插在国王身边监管戏剧，当家庭教师，主要顾问和总理大臣？瓦格纳先生……也许是那个为了瓦格纳不惜赴汤蹈火的女士。总之，是那个名叫科西玛·彪罗的女士跑到国王跟前去为瓦格纳求情。幸好慕尼黑大主教、卡洛伊公爵、普弗尔顿和王太后也在国王陛下跟前。已经被人称为疯子的祖父也来了。他们禀告国王，这里确实存在大问题。这已经不是什么剧院或什么监管人的危机，而是国家大事。要是把瓦格纳留下，整个政府就要辞职，国会就要自行解散。总之，人们会全面地进行抵制。可怜的年轻国王犹豫不决，束手无策。他只好召集所有的顾问以及那些教过他语法和问答法的教授先生来研究对策，但每个人都向他作了同样的建议：叫瓦格纳滚蛋还不为迟。现在的问题是让谁去通知这个飘泊的荷兰人另谋前途。你们是认识汉斯·鲁茨的。这人从前和我们一块打过猎。他开始当过教师，后来爬到内阁办公室去了。他们选中他去干这件事。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这是他本人讲给我老婆听的，他和我老婆是干亲家。……他好不容易才进入瓦格纳的家，因为必须出示国王的旨令，门房才放他进去见瓦格纳。他开门见山地传旨说：国王陛下命你马上离开这个国家。瓦格纳气得满脸发青，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国王的知心朋友！但汉斯也不

是那么容易就屈服的木雕人。他把胳膊交叉在胸前说：先生同我争论没有用，如果您不相信，就去问国王陛下吧！那飘泊的荷兰人试图再去见一次国王，但未被接待。国王的圣谕只是重复了鲁茨的话，尽管措词比较文雅些。现在魔鬼把瓦格纳先生带走了，我们希望再别把他带回来，至少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一个满面红晕，外表显得烦躁不安的人在慕尼黑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待着年老的修道士，他是汉斯·彪罗。彪罗温顺地把穿着修道士服的李斯特·费兰茨从车上扶下来，一直陪送他登上了等在外面的马车。但两人除了寒暄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

到家后，又只是他们两个人。

“科西玛在哪儿？”

“她到特里布切——瓦格纳那里去了。”

“那孩子们呢？”

“她自己带走了。”

费兰茨愤怒地蹦了起来，用拳头捶着桌子，说：“把你的孩子放在瓦格纳那里？”

汉斯嘴唇发白：“当然这只是走访，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汉斯把一封信摆在费兰茨面前。是瓦格纳写来的：

“亲爱的汉斯，你听着！我非常认真地，怀着最热烈的友情邀请你来。你如果答应我的请求，那就是为我，为我工作的进展，为未来艺术上的胜利做了一件唯一的大好事。你在这里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你可以来去自由。请你把我的家看成你自己的家。我求你的，你会答应的，是吧?!当然你会答应的。因为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而且，我除了与国王还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之外，就只有你和你的家属了……”

费兰茨放下了信纸："你真的要上那里去吗？"

"爸爸，我应该上那里去。我的义务和我的家庭要我上那里去。"

费兰茨近年来改掉了大声讲话和发脾气的习惯，并且总是以极大的自制力使自己冷静持重，但这次却突然爆发起来：

"你们都发疯了？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你和科西玛出了什么事？她还是不是你的妻子？你们已经不在一起生活了？说话用不着绕弯子。瓦格纳干了什么事？我是你的岳父，对我用不着任何虚假的腼腆、虚假的傲气和虚假的骑士风度。瓦格纳究竟干了什么事？"

汉斯的面部表情眼看就起了变化。他的眼睛近来稍微有些肿胀，眼球外凸（费兰茨的一个医生朋友认为这是心脏病初期，也许是病情已有相当发展的征兆），浮肿的眼睛下面还出现了黑眼圈。嘴唇就象涂了粉笔末似地发白。他驼着背坐在那里，把手按在胃部，感到身体不舒服。费兰茨帮他躺到床上，脱下衣服，盖上被子。然后坐在他旁边，象哄一个小孩那样悄悄地对他讲了些贴心话：

"喏，一切都会好的。我还留在这里陪你一两天，然后我反正有事要到瑞士去，那时我再找他们谈谈。"

几天以后，费兰茨真的到了特里布切。当他到来的时候，科西玛不见了，彪罗的孩子们也不见了。他们到邻近的村子里去了，还是到慕尼黑去了？这一点费兰茨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在后来都不知道。总之，他来到特里布切，面对面地同瓦格纳在一起。主人首先带他参观宽敞的房屋。看来，瓦格纳只有住在烈士纪念堂那样规模的住宅里才会感到舒服。主人接着又炫耀周围的风景。最后两人都坐到钢琴跟前。《名歌手》已经脱稿。费

兰茨从序曲的第一小节演奏到最后乐章的最后胜利。多么不可思议，在这部新作品的面前，近五、六十年来的所有音乐作品全都相形失色（费兰茨不带任何假谦虚地把自己也算在其中）。作品和作者使那些带着行会式的偏见把瓦格纳视为微不足道的外行的人都出了丑。这部作品不是业余作者（愿上帝宽恕那些曾经这样称呼过瓦格纳的人），而是一个巨人，是个德国巨人写的。他一下子就暴露了自己是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的学生和虔诚的追随者。特里布切的瓦格纳住宅里乐声回荡。那些略带裂纹，但画得生动活泼、五颜六色的墙壁，那些古老的碗橱，以及贪得无厌的瓦格纳为自己搜集来的那些成千上万的玻璃器皿、瓷器、青铜器和银器，都一起参加了共鸣。房屋象一口巨钟在回响。李斯特在演奏。他把《名歌手》的庞大总谱从头至尾演奏了一遍。

一清早他们又在一起。费兰茨说话从不转弯抹角。他早已怀疑科西玛和瓦格纳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现在再也不能沉默了。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尽量把事情澄清。汉斯、瓦格纳和整个瓦格纳的朋友圈子在慕尼黑的名声已经很坏。国王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威胁那些诽谤瓦格纳和想玷污圣洁仙女科西玛·彪罗的人，结果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

瓦格纳顶住了老朋友的目光：

“明娜去世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想和科西玛结婚。”

“那汉斯怎么办？”

“上天会赋予他纯洁良心所应有的一切美德的……您也知道，只有我和科西玛的结合才能使她感到幸福，也只有她和我的结合才能意味着我的生活目的和生平著作的完成。”

“汉斯正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请您手下留情，让科西玛再

留在他身边一年。让这个英勇无畏的、勇于自我牺牲的人逐渐习惯于作出这种新的牺牲吧！一年，这是你们应该做的。看在汉斯份上，也看在我的份上。”

瓦格纳伸出手来表示：

“那就这样办吧。”

从慕尼黑到维也纳快车上的头等车厢完全空着。只有一个用丝绒作衬垫的隔间里坐着一个老修道士，他正在阅读《神曲》。他不时放下书本，把打开的书翻过来扣在绒坐垫上，转过脸去看窗外的风景。

“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建立和平的。因为生活的可恶法则是：使这一个人感到幸福的东西必然会导致另一个人的不幸。”

车轮咔当咔当地向前滚，窗外的景色在慢慢地移动。一墒墒耕地就象一个巨大轮子的轴条那样在转动……火车咔当咔当地奔驰着。《神曲》里的一行行词句和车轮的音乐交织在一起：保罗与弗兰切斯卡…爱情的诱惑力是如此强大，竟连老年人的心灵也会被侵蚀。亲爱而可怜的汉斯，红脸蛋的小学生，你该怎么办？一年的时间够你去习惯那颠倒过来的神话吗？老头儿瓦格纳成了特里斯坦，而你，年轻的汉斯，反倒成了年老的马尔凯国王。

马利奥山冈上一片沉寂。费兰茨又重新开始了很有规律的生活。一星期下两次山，到瓦尔第宫去教课，接待学生和崇敬者。一天，可爱的爱德华·格里克找上门来。费兰茨弄得他头晕目眩，也可以说几乎使这个青年人感到绝望，因为他怎么也制服不了自己作品的演奏难度，而费兰茨只看了一眼就把全部乐曲都演奏出来。费兰茨弹得是那样炽烈，那样飘逸，那样疯狂，犹如作品就是他自己在奇妙的演奏灵感来临的瞬间一口气在钢琴上写成的。后来，斯冈巴底来了。这位可爱的意大利艺术家

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向费兰茨表示感谢：我们意大利人从您那儿重新学习到，在声乐魔力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现代乐队的音乐。美国诗人朗费罗从美国远渡重洋来看他。诗人这次访问罗马的目的主要是想认识一下欧洲最伟大的人物（至少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面。诗人请人为李斯特画像：李斯特修道士手里拿着灯笼接待客人，好象举着一把处境危急的文化火炬似的。

不久他又回到马利奥山冈上。

他在那里获悉，瓦格纳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费兰茨离开后不几天，科西玛就搬进了瓦格纳的宫殿式的住所，并把汉斯·彪罗的几个孩子也带了去。

福尔土纳托又得意地睡着了。早晨他拿着铁锹到外面黄杨树林子里溜了一圈，没有干一点点儿活。回到食物库房里蹲着就睡着了，但还自以为是在拾掇食品陈放架子。后来他又把背靠在修道院阴凉的墙壁上打盹。现在则干脆躺在仆人隔间里铺着细皮褥的卧榻上，半睡半醒地聆听着透过厚厚的墙壁传过来的音乐：大师在弹钢琴，嘴里还哼着歌词：

> 粉红色的光芒中，
> 闪耀着朝霞，
> 湿润的空气中，
> 飘浮着露珠和鲜花，
> 它使我深深陶醉，
> 胜过任何仙女之家……

费兰茨弹奏的是德国纽伦堡歌咏比赛的年轻优胜者斯托尔琴·瓦尔特的作品。起初，他的思想还跟随着音乐的结构萦绕，但不久就独立地飞向另一个领域：妈妈去世了，达尼埃尔和布兰丁也走了……现在又被科西玛和瓦格纳抛弃，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里。没有朋友、孩子和家庭。命运是多么奇怪，一切都成功了，但什么也没有成功。他组织了家庭，为它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并没有家庭。他穿着神父的衣服，但又不是神父，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细胞能忍受教会严酷的清规戒律。他想写这个世纪的史诗，但却被另外一个人写了。这个人是他喜欢的，同时又是他极端憎恶的。他曾拜倒在这个人面前，而他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个人从他那里吸收了多少技巧，但不管怎样，史诗却是由这个与他隔着一条鸿沟的人写的。遵守对一个不幸的、软弱的第三者的诺言，采取温和、宽厚的态度，这就是信义……正是应该由我们来拼死地保卫信义，应该由我们这些蔑视一切信义经的人来保卫信义。

这时，他弹钢琴的手却在听从另一种意志的指挥：粉红色的光芒中，闪耀着朝霞……

第八章　三城市(佩斯—罗马—魏玛)

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罗马　维珂罗·德格莱西街43号

"亲爱的朋友奥古斯：

在你有空时，请把护照寄来，并在上面注明我的三个头衔：匈牙利国王顾问、魏玛大公参事、高级勋章获得者。在护照的德文页上请写上我的博士衔，即李斯特·费兰茨博士……"

的确，护照是很需要的。常常有不懂事的列车员把他从火车的软席包厢赶到普通车厢，因为没有必要让一个老修道士占据整个软席包厢。在国外也发生过对他不够尊重的事。一些被清晨的快车突然惊醒的海关人员和边防宪兵心情很坏，总是在那些他们不可能遭受报复的地方找旅客们的麻烦。他们对老李斯特也很不客气。现在他的嘴里已经少了好些牙齿，脸上长着不少老年斑，仪容也不是那么整洁，因为他在火车上还带着油灯看书，衣服上免不了要沾上一些油渍。所以不能不搞一个高级护照：国王顾问、大公参事……李斯特·费兰茨博士。

他已经不大喜欢照镜子，因为镜子太不留情面。它向他呈现了令人痛心的现实：不仅是青春时期，就是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也已成为过去。现在他是个老头。但生活就是那么奇怪、疯

癫，女人们始终不让他得到安静。梅耶多尔夫侯爵夫人（做姑娘时被称为奥尔加·戈尔恰科娃女公爵）根本不顾驻在罗马的、喜欢古董的外交官丈夫的面子，干脆搬到李斯特附近来住。每天一大清早就来听他的课。然后在一起吃午饭。她亲自过问仆人是否让艺术大师得到足够的午后休息，向福尔土纳托发号施令。后者起先是发牢骚，后来开始骂娘，最后象头发怒的狮子一样进行反抗，但全是白费，因为侯爵夫人还在做姑娘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对付仆人。她坚定无情，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象鸽子一样圆圆胖胖的奥尔加侯爵夫人在费兰茨的身边温顺得如同一只小鸟，但对福尔土纳托却十分凶狠，几句话就把他赶出房间，并且当面告诉他，她了解他贪污买菜钱的情况，她一定要把他轰走。福尔土纳托象一粒被忘掉在支架上的秋葡萄一样，开始是发蔫，不久就掉落在地下。有一天，他突然不辞而别，以后再也没有露过面。总之，梅耶多尔夫侯爵夫人使费兰茨感到幸福和倒霉，因为对一个六十三、四岁的老头来说，燃烧着青春火焰的热情，迷恋的吻手，从早到晚的关怀，狗一般的忠诚和愤怒的吃醋，实在是难以忍受。他只好暂时搬到德斯特别墅去住几天。他带了几个特许的学生，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这些年轻人在规定的日子和严格限定的时间里去听他的课。他们为他安静的工作室带来了一些欢乐。在这间工作室里，他不停地创作。在《圣伊丽莎白》、《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和《加冕弥撒曲》之后，又写成了《圣桑尼斯洛圣曲》和《耶稣》。这些作品比较朴实，但更加大胆。它里面酝藏着深刻的教训，是非常古老的东西和非常新的东西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圆形轨道上的汇合。它们统一在一种令人烦恼的、现代的和谐中，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了瓦格纳、柏辽兹、舒曼或者仇视费兰茨的勃拉姆斯的世界。就这样，他躲在德斯特别墅里。到这里来探望他的，有忠实的斯加姆巴第、可爱的索尔法

奈里神父(他在宗教史、教会法、考古学、哲学和语言学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知识)、费奈里伯爵和虔诚的青年学生奥尔加·雅尼娜。雅尼娜是个无拘无束的姑娘。她弹起钢琴来也是这样。但她是个有天才的学生,有时也会使老师大吃一惊。在这种时候,她可以得到传统的奖励:大师吻吻她的额头。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是象小孩一样亲亲老师的手来作为报答。一个春天的上午,德斯特别墅百花盛开,春意盎然,小鸟不停地盘旋在喷泉上空,相互追逐伴侣。这天正该奥尔加上课。费兰茨真想把这堂课推掉,因为他已经到了这样的创作时期: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想做任何其他事情,甚至吃饭时也带着纸张,下午不休息,继续修改早晨写的东西。他现在对上课毫无兴趣。可是奥尔加是从罗马来的,上课的时间也是原先规定好的(十时到十二时)。奥尔加准时到达,分秒不差。今天,她情绪很不好。她练习的是老师的作品《圣费兰茨神话曲》,本应该好好弹,可是今天怎么弹也不行。房间里十分闷热。他们打开窗户,花园里的春意立即挤了进来。当花园的春天音乐冲击着陈旧的墙壁,潺潺流水的节奏象一颗不平静的心一样在跳动的时候,精巧的钢琴、印刷的乐谱、人为的音乐都显得那么无聊可笑。窗户又被关上,继续上课。可怜的《圣费兰茨神话曲》还是弹不好,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有毛病。奥尔加脸上开始流汗,眼睛里充满着向老师求援的神情。费兰茨也觉得姑娘挺可怜,于是说道:"行了,亲爱的。我过去还是个钢琴家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弹不好。"他顽皮地眨了眨眼睛:"这种时候,我脑子里往往是在想谈恋爱的事。心被一个美丽的金发姑娘或黑发姑娘吸引去了,因而也就忘掉了音乐的魅力。我相信,您这个可爱的小脑袋现在也被春天所陶醉了。"

下课了。雅尼娜吻手告辞,心事重重地走下楼,穿过春意浓郁的花园,离开了美丽的喷泉和松树。费兰茨又回到桌旁开始

工作。突然天空中雷电交加，雨点象小石子一样洒在玻璃窗上。这时，听到有人沿着木板楼梯向上走的脚步声，接着就是敲门声。站在门口的原来是雅尼娜。可怜的姑娘全身都淋透了。被雨水浸透了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更加衬托出二十来岁的少女的诱惑力。“我觉得浑身发冷，可能是得了肺炎，大师。”她的牙齿直打战，两只手臂紧紧抱着自己。费兰茨从柜中拿出一件晨衣，是他平时清早天气较凉时穿的。“您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吧，把湿衣服都脱下来，穿上这件衣服，我去叫仆人把您的衣服烫干。”奥尔加一边哆嗦一边披上费兰茨递给她的晨衣，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似乎马上就要承受悲惨的结局：肺炎、高烧、疼痛。半个多小时后，费兰茨来敲门。没有任何回答。这真是令人难堪的事情。最好还是把老管家叫来。也许还是让姑娘自己离开好。象这个样子，不管他以后怎么解释，消息传出去都是不好听的。于是他再次敲门。还是没有反应。他只好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只见奥尔加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一件在地上，一件在椅子上，另一件挂在桌边，一双秀气娇小的皮鞋象被海水冲到岸上的破船一样倒在床前。床上躺着奥尔加，晨衣一直盖到头顶，脸朝墙壁，显然是睡着了。费兰茨向前走了几步。他想听听姑娘的呼吸，究竟是发高烧的喘急声还是均匀正常的小鼾声。他刚低下头，突然被一双年轻的胳臂抱住脖子。姑娘轻声地陈述思念之情：“自从我认识你，老远地看见你，感觉到你的脸型以来，我就一直在发狂地爱着你，有时满怀希望，有时又沉浸在绝望之中。你现在什么话也别说……你别说你比我老，也别说你受神职的约束，这样传出去会成为丑闻，害了我也害了你……我什么都不怕，只要你爱我、拥抱我，让我知道什么是疯狂的、自杀的、幸福的爱情就行……”

奥尔加还跟着他一起去魏玛，因为费兰茨最近几年经常去

那里。大公一再请求他回来，索菲亚大公夫人、魏玛剧院经理和一大群德国朋友也都不断地请求他回来，因为自从费兰茨离开阿尔滕堡后，德国就失去了精神中心。

一八六九年，他又在魏玛住下。但提了三个条件：一、不要强迫他搬进阿尔滕堡（后来安排他住在一座带花园的小楼房里）；二、不要妨碍他自由活动（他的时间要在罗马、佩斯和魏玛之间平分）；三、不要干预剧院的工作。他自己已经老了，没法指挥乐队了，但这时欧洲各国涌现出一批新的音乐指挥家，都自称是李斯特的学生。奥尔加也跟着来到诞生第一个乐派的魏玛。她在这里折磨着大师，嫉妒他所有的其他学生，即使他上佩斯或者在塞克萨尔德市奥古斯朋友家过几周安静的日子，她也决不离开他一步。不管李斯特怎么劝说，怎么坦率相告："我的孩子，我已经老了，你的爱只能是我的负担，而不是幸福……"全都白费。当奥尔加被人发现她并不是出身高贵的小姐而是加利西亚一个工厂主的名誉不大好的女儿之后，她也坚持不离开大师。后来李斯特让她去整理新的钢琴乐派的手稿，借口是有些手稿不见了，出版商预付的稿费也丢了，奥尔加才暂时离开了一阵，但过不久她又象复仇女神一样回到李斯特身边。她在佩斯找到他，并且宣称，她是来找他算账的。她给这个没有良心的男人带来了匕首和手枪，给自己带来了毒药，因为按照她家乡的冷酷习惯，她一定要同自己的恋人一起死去。这可是一件桃色丑闻。即使是奥古斯的冷静脑袋也受不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警察局派人来。幸好奥尔加只吞了一点不碍事的感冒药，所以没有闹出人命案，最后被驱逐出匈牙利。实际上，她这种为了爱情敢于杀人和自尽的复仇方式并不符合她家乡的冷酷习惯，只是令人想起了她的工厂主父亲的讹诈行为。后来奥尔加写了一本自传体的《少女日记》，使喜欢打听别人丑闻的读者得到很大满足，她自

已则赚了很大一笔稿费。

罗马　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奥古斯：

最好是不要去谈论《少女日记》这部小说。正象圣徒巴尔所教导的，有些卑鄙龌龊的事最好不要去提它们。但对几个朋友，我同他们有特殊的关系，而他们又写信来问我，我有义务回答他们。本来，把这种事公诸于世对我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有人利用小说中的谎言来侮辱我在塞克萨尔德市和卡洛桥市的朋友，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任何辱骂都不会使我如此痛心！作者想把我描绘成一个可笑而卑鄙的人，这是她的自由。对作者的有些话根本不值得我去驳它。"哥萨克女人"在诽谤和污蔑方面超过了所有人，对此我倒觉得无所谓。过去，她在无数的信函中把我的为人和品德捧上天，我没有驳过她。我愿意赞扬她的艺术描写才能。今天她用这来反对我，只能令人感到遗憾。现在出版的这部书将永远是对我过于宽容她虚情假意的警告。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我最后被她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我本应当在她第一次倾吐爱情的时候就马上把她赶走，不应该给她以我可能会满足她愿望的任何幻想。我本应当从一开始就按照圣徒道玛什的榜样，用燃烧着的病菌把这个坏女人赶出圣约翰的城堡！遗憾的是，我对圣徒道玛什的教导懂得太少了！

向您和您的家庭致以热情问候

您的老朋友　　李斯特·费兰茨

可是这位“哥萨克女人”奥尔加·雅尼娜并不肯就此罢休。她还编造了一些对本来就已经够丑的《少女日记》的回答。她的捏造手段很巧妙，很容易骗人。她把这些回答的作者说成是李斯特的一个老朋友、歌词诗人罗伯特·费兰茨。“哥萨克女人”为了复仇，不怕一切艰难困苦，找遍了李斯特的朋友、支持者、学生和信徒的地址，打听到他们的名字，然后向这些比较有声望的音乐家和社会人士寄去她的书。费兰茨选择了最正确的态度：对她的无理攻击置之不理。尽管他怒火中烧，有时真想狠狠地揍她一顿，就象揍一个不听话的、因为不满和虚荣而反对自己亲人的坏孩子一样，但过了一会他又冷静下来，原谅了她，并且把整个事情忘掉，因为他曾经原谅过比这更令人恼火的事。这些事虽然没有造成丑闻，可比奥尔加·雅尼娜的恶毒攻击更为令人痛心。他原谅过科西玛，也原谅过瓦格纳。他不仅宽恕了破坏他家庭秩序的背信弃义，而且也宽恕了反对他的第二祖国、他青年时代的幸福暖窝和学校——巴黎和法国的背信弃义。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土崩瓦解了。谁又能去责备费兰茨，说他没有发现表面强大的拿破仑背后是摇摇欲坠的土墙，没有发现这都是些随便拼凑起来的戏台布景，远看稳固强大，近看日暮途穷呢？费兰茨喜欢拿破仑三世，因为他的最后一个首相是奥列佛尔律师，而这位律师又曾同布兰丁结过婚，一直到布兰丁死后还在叫费兰茨“爸爸”！拿破仑三世帝国的崩溃使费兰茨感到难过，也可以说，这是由于家庭关系和同情心。但如果说费兰茨是在为自己家庭成员的失败而感到沮丧，那是小看了他。他痛心的是普鲁士人对巴黎城的围攻，他们给亲爱的巴黎带来了饥饿死亡、瘟疫疾病和杀人炮弹。他痛心的是十几万年青人在色当战场上和巴黎四周的平原上被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武器打伤杀死。他痛心的是一个民族受到蹂躏。尤其使他痛心的是一个恶毒的谣言——

这种谣言总是不胫而走，远传千里的——，说是瓦格纳和科西玛都参加了取得战争胜利的普鲁士部队，并且傲慢地宣称，法国人只是暂时存在的民族，是苟延残喘的向日葵，德国人才是在历史上永存的民族，而领导德国军队的则是战无不胜的普鲁士。这使费兰茨感到特别心痛。连科西玛也……科西玛是在巴黎长大的，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在巴黎慈母般的怀抱中生活过，现在连她也反对遭到致命创伤的战败者，连她也参与宣传罪过、卑鄙和恶毒的谎言：法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经诞生过伏尔泰、拉辛、卢梭、大革命、拿破仑、雨果……的人民是摇尾乞怜的人民……（费兰茨激动地读着他的老朋友维克多·雨果从被包围的、永不屈服的巴黎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信：即使全世界都袖手旁观普鲁士人的野蛮破坏，巴黎也将在弹尽粮绝、遍地硝烟、颓垣断壁和被人出卖的情况下继续战斗，捍卫祖国，因为这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全人类而战！）可是随着岁月的消逝，他越来越难以继续保持对科西玛和瓦格纳的愤慨。对他们的叛卖也宽恕了。他不能不这么做，因为他们给他生下了一个孙子西格弗里德。他们没有通知他，他也没有向他们表示祝贺。又有什么必要去祝贺呢？这些非常幸福的人肯定早就把老头忘掉了，他们听到的只是"哥萨克女人"式的丑闻。不久，魏玛新剧院举行奠基典礼。费兰茨第一个站出来购买剧院的股票。如果说他现在还有点生气的话，那主要是生一个男人的气，而不是生音乐家的气。

理查·瓦格纳来信写道：

亲爱的费兰茨：

科西玛说，我邀请你是枉费心机，你肯定不会来的。我们只好承受这种痛苦，正如我们已经承受过很

多痛苦一样。但是我还是不能错过机会邀请你来参加奠基典礼。我还能说什么别的呢？我向你大声疾呼：来吧！你是作为最伟大的人进入我的生活的，我对你永远是信任、友好的。你脱离了我，也许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你同我是那么相近，就象我同你是那么相近一样。你不在我身边，但是你新生的、最内在的东西却在我身边，我希望你在我身边的这种愿望已经实现了。你完完整整地生活在我的面前和我的心中，将来在坟墓中我们也会变成一个整体。是你的爱首先使我变得高尚起来的。现在我在另一个更高级的生命中同你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又有了我单独一个人所没有的力量。你给了我一切，可是我给你的却是那么少。我占了多么大的便宜啊！现在当我叫你来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你到自己这里来，因为你将在我们这里看到你自己。不管你如何决定，我都将祝福你，祝你一切都好。

理查

费兰茨一边看信一边流泪，但还是决定不去参加奠基典礼。这并不是因为骄傲，因为只是在最后几分钟才收到邀请信，而是因为他受不了那些隆重节日的讲话、五彩缤纷的焰火、随风飘扬的旗子和震耳欲聋的礼炮声。另外，他还得去习惯这样的想法：又同瓦格纳在一起了，又得把自己融化入瓦格纳的意志和生命力的急流翻滚的浪潮中了。瓦格纳夫妇也知道，仅仅靠这封信是医治不了过去的创伤的。他们去魏玛探望了费兰茨，并且得到了费兰茨的誓言：他一定到拜罗伊特回访他们。他还真地去了。他穿着沾有油迹的修道士黑袍，在他们宏伟巨大的府邸里游来荡去。这不是一套住宅，而是一座巨大的坟墓。这已是

最后一站，再也不能前进了。他们还在走来走去，欢笑哭泣，但坟墓的重量已经压在他的身上。

费兰茨的生日越来越近。科西玛想尽一切办法把老父亲留在自己家里。但费兰茨还是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他们。他乘火车经过雷根斯堡。列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他就下了车。他在这里找了一家旅店，独自一个人度过了十月二十二日的夜晚。六十多年来，他一直盼望着这一孤独的时刻。没有女人，没有朋友，没有学生，也没有亲戚，完完全全单独一个人。他坐在冷冰冰的旅店客房里，借着小油灯的亮光翻看但丁的《神曲》。他并没有阅读。他只是独自一人在思考：人们抛弃了他，把他看作是下等人，考验他是不是能够忍受住这些侮辱。他忍受住了，忘掉了，宽恕了，现在又回到魏玛。但他究竟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来呢？魏玛中心还有什么意义吗？现在不是已经燃烧起新的火焰，崇拜艺术光辉的蝴蝶们正围着拜罗伊特飞舞吗？最后，他终于发现，原来拜罗伊特永远也补偿不了魏玛的瞭望塔，因为瓦格纳是个自私的人。这种自私既不是出自恶意，也不是由于艺术家的一般颓废情绪。瓦格纳之所以自私，是因为他只有在以我为中心的紧张情绪下才能把别人的世界抬起来，然后把自己的世界放在那里。瓦格纳的自私不是冷酷的恶意。这是他使自己相信值得把每一分钟时间、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滴血汗和每一滴眼泪都用在伟大创作上的唯一办法。实际上，他对任何人也不感兴趣，所以他不能教学生！他同任何人也不能合作，所以他没有成为任何一个乐派的领袖！他从来不相信别人的智慧，最多只是利用别人的火焰供给他热量。正因为这样，拜罗伊特只能成为臣属附庸们的汇合地，而不能成为平等的艺术家们自由竞赛、争论探讨、相互切磋、互相敬仰和共同提高的中心。为了艺术的耐心（与瓦格纳的火暴急躁相反），需要有魏玛。

另外，由于一个更神秘的原因，也需要有魏玛。拜罗伊特是已经结束、不可改变和永世长存的现实。瓦格纳认为，他的作品可以把音乐艺术坟墓中所有名人的牌位完全翻过来；他的作品就是音乐艺术的终结，不可能再前进：《尼伯龙根的指环》、《特里斯坦》、《名歌手》等等，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唯一尽善尽美的艺术结晶。但是他应该想一想，别的地方也会诞生新的东西……就在这个神圣的时刻，也许在匈牙利、法国、俄罗斯或者意大利……新的年轻的力量正在成长，他们将用自己的肩膀抬起坟墓的顶盖，因为他们要生活、要创作。他们创造的东西将不同于我们创造的东西。作为革命者的瓦格纳取得了权势，或者说是爬上了预言家的地位，竟由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变成了旧世界的支持者，成为一种把经过千辛万苦的斗争才取得的胜利成果固定起来的保守力量，这真是怪事！正因为这样，所以需要有魏玛。费兰茨从来不认为(不管是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自己代表着最终的真理。费兰茨总是相信未来，相信通过自己的手指和神经感觉到萌芽的、不断向上的未来。现在虽然老了，但他仍同五十年前在巴黎艺术家茶会的听讲席上一样地感觉到雨果宣扬的精神自由。总之，需要有魏玛。为了自由，需要它。因为拜罗伊特(尽管还只刚刚奠下基石)已经为人们规定了成百上千的清规戒律、教条神话、哲学道德和冷酷无情的创作法律。而在魏玛，不会有任何清规戒律，只会有才能、自由和智慧。老艺术家、油迹满袍的李斯特修道士，不要害怕未来，站到未来的前面去吧……！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按照人所计划的那样完全得到实现的。他在魏玛只占了三个房间。这对他来说还是太多了。这里需要有佣人和各种设备。他又得同新来的女管家巴里娜·阿

皮尔商量中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新近聚集在他周围的青年人吃什么。每天下午，他在斯泰尔姐妹那里教弹钢琴。星期日上午，使可怜的李斯特感到最可怕的是，梅耶多尔夫侯爵夫人——出嫁前是奥尔加·戈尔恰科娃女公爵——也出现在小楼房。她变得比过去更胖更娇了。说她"出现"是不确切的，应当说是她"搬进"了小楼房。因为她的丈夫、驻罗马的外交官、各种硬币的业余收藏家、闻名欧洲的考古学家梅耶多尔夫侯爵已经去世，留下了侯爵夫人和四个没有教养的孩子。于是女公爵又坐在钢琴旁，折磨着女管家巴里娜，参与斯泰尔姐妹的行列。尽管她非常怕热，但仍然不知疲倦地跟着李斯特，哪怕再远，她也跟着去，使人得到的印象是，她并不是费兰茨的看护，而是李斯特的卫士。从表面上看，李斯特被三个女人或者说三群女人盯着，实际上还有第四个。她是阿黛尔·斯孔小姐。她在李斯特住所对面租了一套房子，在各个窗口前放着小梯子、沙发或椅子，以便可以随时随地侦察对面房子里面的任何人的一举一动。斯孔小姐是卡罗琳·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派来的。她用女公爵给她的一台活动望远镜窥探对面的秘密，每天向卡罗琳写一些加油添醋的内部报告，读了都要叫人脸红。费兰茨知道这件事后，只是淡淡地笑了一笑，觉得无可奈何，不过心里也得到某种满足，因为女人们至今还在追求他这个老头。

阿尔滕堡似乎又焕发出昔日的光辉。卡尔·塔西格来了，还带来了他漂亮的匈牙利妻子。带花园的小楼房已经显得拥挤。李斯特、新近参加魏玛学派的青年艺术家斯特莱尔茨基、波兰人萨莱姆布斯基和塔西格四人只好轮流着弹琴。李斯特一下子又变成了年轻人。他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表面上只是手在打拍子，实际上整个心都在倾听别人弹肖邦的《A大调钢琴奏鸣

曲》……过去肖邦曾亲自给他弹过这首曲子，以后他又手把手地教会了塔西格。在塔西格的手指下，肖邦纤细的曲调变得丰满，发展成为乐队的风暴。接着就是掌声。过去曾经使卡罗琳生过气的、瓦格纳夫妇的顽皮养子现在站在钢琴旁向听众鞠了一躬，然后走到李斯特身边吻了吻老师的手。阿尔滕堡的光明时代好象又来了，但可惜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在魏玛举行的这次家庭音乐会后不几天，塔西格夫人写信来说，塔西格病了，他热切盼望见见老师。

李斯特赶忙去探望生命垂危的学生。他不久前刚满三十岁，病重得已经无法挽救。他的脸、毫无表情的向前凝视的眼神和无精打采的略为张开的嘴巴已经没有生命。只有手还能动。他抓住费兰茨的右手，把它放在自己嘴边："我非常爱您……我过去常常使您不高兴。现在我们可以言归于好了吧?!……"

的确，现在应该言归于好了。好动的、不受拘束的"西班牙小贵族"安静了下来。他同死亡搏斗了好几个星期，在细嫩的脸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肉。现在他静静地躺在棺材里，好象又变成了小孩，变成了一个瘦弱的少年。两只神奇的手交叉放在胸前。费兰茨向灵柩告别时碰了碰死者纤细的手指，自言自语地说道："西班牙小贵族"，上帝保佑你。真希望还能见到你。

在吊丧的人当中有一张非常熟悉的脸：玛丽·卡莱基斯。现在的名字是玛特罗娜。只有过去认识她的人还能从她的脸上发现从前的美貌痕迹。费兰茨几乎同她擦肩而过。她的声音使他站住了。从前的美妇人现在热情地向费兰茨吐露一直闷在心里的感情："凡是您过去喜欢过的人，我都支持过。我为拜罗伊特征集了很多股票。我在塔西格的病床旁边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支撑不住了。"

李斯特直了直身，从黑袍上很快地掸了掸尘土和沾在上面的烟灰，文质彬彬地挽着玛丽·卡莱基斯的胳臂："我希望您能到魏玛来看看我……"

他也出席了《耶稣》在魏玛的演出仪式。还有科西玛、瓦格纳和一些新结交的匈牙利朋友：阿波尼·奥尔拜尔、米哈洛维奇·欧登、阿伯拉尼·科尔内。拉福也来了。起初，他犹豫不决地伸出手，最后他得到的回答不是握手，而是热烈的友好的拥抱。拉福脸带愧色，良心不安，扑在费兰茨身上，眼泪直流。

瓦格纳和科西玛也从头到尾听了《耶稣》的演奏。科西玛表现谨慎。这并不是由于她不喜欢或者故意表示冷淡，而是她的真实态度。实际上，她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她这种人总是满足于一种信仰、一种爱情，只钟情于一个男人。这种满足的心情使她排除了一切其他方面的兴趣。科西玛只关心涉及到瓦格纳派或者宣扬瓦格纳思想的文学艺术。她也不大有反面意见，这并不是因为礼貌不允许她提反面意见，而是因为她根本不承认自己有反面意见，就象声音振幅超过一定限度后，人就听不见一样。科西玛对信仰不感兴趣，她只承认瓦格纳的错综复杂的(费兰茨越来越认为是混乱不堪的)"宗教"。实际上，科西玛并不真正懂得音乐艺术。她只仰慕瓦格纳大师的音乐（她在同朋友们私下谈心时也十分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叫做大师)，因此她对《耶稣》神曲没有兴趣。只是在瓦格纳承认了李斯特的作品，讲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科西玛才开始称赞。瓦格纳亲切地、象小学生一样顽皮地宣称，他在这部乐曲中又发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东西，如曲调、和声以致神话故事的编排等。只是在这以后，科西玛才很谨慎小心地说了几句好话，并且声明说，"父亲不喜欢过分夸张，讨厌阿谀奉承……另外我觉得自己还太小，不配批评

或赞扬什么……”

他同拉福一起度过了幸福的、满含眼泪的几小时。两人都在回忆往事，几乎象是在召唤鬼魂。临别时，拉福把一首科乃留斯的诗赠送给费兰茨。这首诗他一直保存在身边，现在他把它放在费兰茨的收藏品之中：

人们对你的爱慕发自内心，
因为迷人的品德聚集在你一身，
自觉的严肃，自发的善良，
再加上永世长存的美丽青春。

关于汉斯·彪罗的消息越来越少。费兰茨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到他正在以惊人的努力进行工作。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每天都在演奏台上指挥、弹琴。工作起来是那样愤怒、勤奋，似乎他要向全世界证明：把他扔在一边是不公正的。彪罗还说他发现了音乐史上的新星球！（费兰茨带着宽恕的笑容阅读他的文章：他象哥伦布一样发现了威尔第和格林卡。我的上帝，李斯特认识格林卡和威尔第的音乐艺术已经有四十年了。在费兰茨周围的这些孩子都是过分热心的小伙子，他们老是嘟嘟囔囔，牢骚满腹……费兰茨把永垂不朽、万世流芳的门开得太大了……他不加选择地放进了所有的人！现在彪罗发现了格林卡和威尔第！没有关系。就让哥伦布的光荣属于他吧！）

费兰茨从维也纳又回到佩斯。在这里，他收到了愁眉苦脸的艾克尔·费兰茨的信。这封信显然不是他亲自写的，而是阿波尼或者米哈洛维奇代笔的，因为这个爱咬人的老头从来不会

写这么长的信：

“尊敬的大师：

现在维也纳又能幸运地招待您，向您奉献新的桂冠了。您现在离开您亲爱的祖国是那么近。我们借此机会以爱国者的仰慕之情和虔诚之心恳请您光临我们的首都，让我们能够以最真诚的爱国感情和崇敬心情，在所有匈牙利人心目中为您建造的永不熄灭的圣坛上向您祝福。我们热切希望，我们的诚恳请求将会得到您的同情。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爱国主义敬礼和问候。”

收到这样的信，的确是无法拒绝邀请的。他坐上轮船，并随身带了一个新发现的人材索菲亚·曼特尔。她是继克拉拉·舒曼之后出现在欧洲演奏台上的最伟大的女钢琴艺术家。第一次见面时曾使费兰茨大吃一惊：维也纳宣告演出他的《E大调钢琴协奏曲》，可是弹钢琴的却是一个小姑娘。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的。就是彪罗、布隆萨尔或塔西格弹这个曲子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这个小女孩能行吗？费兰茨出席了音乐会。当然，他又得被人强迫坐在第一排。乐队已经就位。指挥海尔贝克和小姑娘索菲亚也先后出场。弹琴的可不是一个大手宽肩的老处女，而是一个小鼻子、带酒涡、梳辫子的漂亮小姑娘，大概还不到十八岁。费兰茨眼盯着地板。他不想参加这次注定要失败的战役，因为这个脆弱的可爱姑娘不可能战胜庞大的乐队和钢琴协奏曲中的重重困难。幸运的是，费兰茨写的这部协奏曲里没有冗长的乐队序曲，仅仅几个小节之后，钢琴就开始演奏。她弹的声音是那么响，就是钢筋铁骨铸成的听众也不能不为之感到震惊。幸亏如此，不然的话，小姑娘很难马上就冲过火线。这时，

费兰茨已经不再看地板了，而是紧盯着神奇的孩子。她鼓舞、感动着听众，最后胜利地抓住了听众的心。费兰茨冲进了演员化装室，接二连三地亲吻女孩的小鼻子。从此以后，小姑娘同他寸步不离。这次她跟到佩斯来了，在船头上同大师一起接见了前来欢迎他们的代表团成员：艾克尔·费兰茨、马特劳伊·加波尔、莫索尼·米哈依、莱梅尼·埃代、阿波尼·奥尔拜尔、阿伯拉尼·科尔内和许多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年轻人。几天之后，在匈牙利首都举行了一次空前的音乐盛会；交响乐协会、佩斯国家音乐学校、音乐爱好者协会、布达歌咏音乐学院以及布达合唱团联合演奏《但丁交响曲》和《匈牙利》。艾克尔亲自担任这个庞大乐队的指挥。艾克尔和李斯特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关系。两个人的"精神气质"完全是矛盾的，相互排斥的。愁眉苦脸的艾克尔喜欢下棋，有时会整天地摆弄那些破旧的木头块。而李斯特却一天到晚被一些达官显贵包围着，从安德拉西·久拉到戴阿克·费兰茨，从最上层的贵族到整个王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佩斯一布达时，单独接见了他。接见时的安排也相当特别：先是演奏贝多芬、韦伯、肖邦和瓦格纳的作品，最后演奏李斯特的狂想曲。女王要单独一人当面听李斯特弹琴，不让任何人分享音乐的美好艺术。总而言之，艾克尔退隐在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里，而李斯特尽管穿着修道士的黑袍、已经老态龙钟，却还是站在生活的顶峰上。这是两个矛盾的对立面，可奇怪的是正是艾克尔能够成功地指挥演奏李斯特的杰出作品。他要求准确，态度坚定，纪律严明。正是在艾克尔的指挥下，表现出李斯特作品的结构是坚定不移的，它的窈窕秀丽不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它的狂想精神不是钢琴的即兴表演，而是匈牙利的狂想、古典式的吉卜赛音乐。艾克尔认真的、崇高的艺术劳动表现了李斯特的天才逻辑：从唯一的一个核心思想、音乐旋律和典型节

奏，可以产生出宏伟的乐章（李斯特为了这一点曾受到多少攻击啊，人们说他是经典音乐家们的掘墓人，其实也许任何人也没有能够象他那样接近贝多芬的思想体系，因为贝多芬是最希望从唯一的一棵根苗中培育出树干、树枝、树杈、树叶以至树芽的）。愁眉苦脸的人对李斯特的思想心领神会。他可以深入到李斯特作品的最小的细节部分。他在排练的时候表现出无限的、毫不马虎的耐心，结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整个佩斯再次充满了李斯特的精神，重新排演《加冕弥撒曲》。这次由真正的小提琴手莱梅尼·埃代参加演奏。小提琴声既象金黄的麦浪一样随风飘荡，又象刀刃一样坚韧而富于弹性，挺立在听众面前；既能催人流泪，又会使人欢乐……它不仅是欧洲音乐和匈牙利音乐的汇集，而且是这两种音乐不可分割的融合……对了，李斯特就是这么想的。

又是活动排得满满的日子。在佩斯、塞克萨尔德、卡洛桥、纳道什德等城市见到了许多新人。热情的霍尔瓦特·波尔蒂沙部长因为不懂法语，只好用维莱斯马季赞颂李斯特的诗来欢迎客人。莫索尼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美丽的伊隆卡》。成百的诗人、作家、作曲家、歌唱家、洋琴演奏家、铜管演奏家和钢琴家都想在李斯特身上来测量一下自己的才能。只有一只手的基希·盖沙伯爵也来了。他是在一次打猎时失去另一只手的。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志力和雄心壮志。他想用这一只剩下来的手至少暂时先当一名闻名世界的钢琴家。以后，当他掌握了音乐知识时，还要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作曲家。这个年轻人精明能干、自尊心很强，尽管自己只是部长的小小助理文书，但却雇用了私人秘书和仆人。费兰茨只需要听几个音就能看出这个青年人的才能如何。应该说，他的音乐才能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费兰茨有些

可怜他，对他的意志力和自信心也怀有好感。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爱特沃什·约瑟夫侯爵家里，因为基希正是侯爵的助理文书。

"您过去是跟谁学的？"费兰茨问。

"跟沃尔克曼·罗伯特学过。"

关于这个讨厌别人的性情古怪的老头，费兰茨已经听说过许多事情，现在他想进一步地了解老头的情况。基希很愿意予以介绍：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他那儿去的。那天，在他住所门前有一个佣人似的人在扫地。我问：教师先生在不在家？他盯着我说：当然在家。我请他去禀报一下。他说：报告什么呀，我就是教师先生……我想从他的手中拿过扫帚，帮他扫地。他差一点没有用扫帚砸我的脑袋：别动我的扫帚。说吧，您有什么事找我？我说：我想学音乐。他从头到脚看了我一遍：是您自己？您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基希·盖沙伯爵。他说：音乐不是伯爵们学的东西。学音乐只能啃干面包，不会买得起高级马车！我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找到他，而且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他声明道：您听着，伯爵先生！我不要钱。因为您若给了钱，您就可以支配我。如果我免费教课，我就可以想什么时候教就什么时候教。以后怎么上课呢，伯爵先生？您得先敲三下门，如果敲了第三下后还不见我出来，那就说明您可以自便了……我敲过好多次门，但他出来的时候不多。"

费兰茨对老头的兴趣越来越大：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音乐家？他翻阅了沃尔克曼的几部作品后，向爱特沃什侯爵推荐道：

"如果有一天在匈牙利建立音乐学院，必须聘用沃尔克曼。他虽然不是音乐伟人，但是一个根底很厚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他将成为一个严格的园丁，匈牙利正需要这样的人。匈牙利有许多人才，可惜没有人去培养、浇灌、剪枝。"

一次重要的赔礼会见也是靠基希才促成的。约基姆在布达佩斯举行音乐会。约基姆大致上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间成为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的。他听佩斯的朋友们说，基希伯爵同李斯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头两天，约基姆赶到佩斯后，马上去找基希："伯爵先生，我唯一的请求是请您安排我同李斯特见一次面。"基希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第二天一大清早，李斯特正在工作的时候，他去拜访了老师。李斯特马上就明白，他肯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因为李斯特的学生都知道，不管他是多么亲切和气和平易近人，但不能容忍别人在他工作的时候去打扰他。既然基希来了，那肯定有什么重要事。基希伯爵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老师，请您闭上眼睛，请您闭着眼睛、张开双臂接待一个人。"

过不一会，两个男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接着又是一个震惊人心的消息：莫索尼去世了。费兰茨不久前刚研究过《美丽的伊隆卡》，并且从这首歌曲最优美的调子中得到了启发。可现在莫索尼也走了。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坚定、严肃的人，本来可以成为未来的佩斯音乐学院的主要支柱。

匈牙利音乐的一个强大支柱离开人间了。现在连安德拉西·久拉总理也开始明白，建立佩斯音乐学院已经刻不容缓。现在只剩下了沃尔克曼、艾克尔和李斯特自己。年轻人当中只有米哈洛维奇，也许还可算上阿伯拉尼·科尔内。费兰茨考虑把汉斯·彪罗也吸收进来。但是在最高当局（李斯特没有想到，连国会也得动员起来）没有批准建造音乐学院之前，用一般教师或者院长的职务是留不住这个久经磨难的艺术家的。

彪罗正在世界各地漂泊，至少目前还不能指望他。不过汉

斯·里希特暂时还在这里。这位匈牙利出身的、见过大世面的乐队指挥，曾属于伟大的慕尼黑乐派。他跟瓦格纳、科乃留斯、彪罗和其他杰出的德国音乐家学习过。也许可以向里希特试探一下，他是不是愿意参加创办佩斯音乐学院的工作？里希特还不到三十岁，充满着自信心。他是民族剧院的首席乐队指挥，但只是暂时的。他在布鲁塞尔、巴黎、拜罗伊特都呆过，这里只是一个小池塘，是很难划船的。他只讲了几句普鲁士式的话（这一套显然是从另一个汉斯，即彪罗那里学来的），就勾销了费兰茨的希望。尽管里希特生于久尔市，完全有权把自己看作是匈牙利人，但他不愿参与这个小地方的小事。他虽然在民族剧院领导乐队，但演出的是瓦格纳的《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汤豪塞》、《罗恩格林》、《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及《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一听说瓦格纳将要到佩斯来，汉斯·里希特阴沉沉的脸马上就开朗起来。瓦格纳在佩斯将为建造拜罗伊特剧院筹款而举行音乐会。音乐会是由布达佩斯瓦格纳学会举办的，为首的有阿波尼·奥尔拜尔、米哈洛维奇·欧登、瓦格纳的虔诚拥护者胡萨尔·伊姆雷、阿伯拉尼·科尔内、戈比·奥拉若什、里希特·亚诺什、音乐出版商达波尔斯基以及一切高尚音乐事业的支持者李斯特·费兰茨。

尽管米哈洛维奇和阿波尼为这次音乐会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票还是卖不出去，可能要空一半的座位。费兰茨给音乐会组织者写了一封短信，通知说：他也将参加音乐会的演出，弹奏施特劳斯《钟声》和贝多芬《E大调钢琴协奏曲》。信上的墨迹还未干，重大的消息就已经传出，听众立即向售票处发起了进攻。刚才还愁票卖不出去，现在却在为每一张票进行肉搏战。但是乐

中有苦，瓦格纳的正统支持者提出意见说，加上贝多芬和李斯特之后，音乐会"被冲淡了"。费兰茨一听到这种反应，就通知音乐会组织者，收回施特劳斯《钟声》的节目，免得增加好不容易才组织起来的音乐会的负担。这件事马上传到国外。瓦格纳亲自出面干预，坚持要演出《钟声》。这是在最恰当的时间里作出的一个漂亮姿态，因为费兰茨在考虑退出音乐会的问题。

一八七五年三月八日，在民族剧院一楼排练厅里举行了第一次排演。前半场由瓦格纳亲自指挥，后半场由汉斯·里希特指挥。脸色阴沉的年轻人不大看得起匈牙利音乐，对匈牙利诗歌也采取鄙视态度，甚至连裴多菲、奥拉尼、维莱什马季的诗也认为不屑一读。这个傲慢的年轻人现在象是长了翅膀，热情地围着瓦格纳飞旋。排演的最后一个节目是《E大调钢琴协奏曲》。费兰茨已经是六十四岁的老人，眼睛也不大好，稍不注意，腿和手就会红肿。医生们苦苦劝他注意身体，尽量少喝、最好是不喝白兰地。在这种时候，费兰茨总是强装笑脸，说葡萄酒是男人喝的母奶，白兰地则是老年人不可缺少的奶精。他的身子也不象过去那样挺拔了。同朋友们聚会时，有时候——虽然时间不长——还会打瞌睡。可是现在，他坐在钢琴旁。指挥台上站着的是汉斯·里希特。瓦格纳代替里希特击鼓。里希特向费兰茨使了一个眼色，钢琴就开始响起来。演奏人忘记了自己的年纪和手上的红肿。第一段快板是那样激动、迅猛、热烈，乐队几乎都跟不上节奏。费兰茨的指法非常简洁，就象伟大雕塑家一样，大刀阔斧地切割、雕刻，甩掉一切细微末节，紧紧抓住核心，以表现崇高的音乐内容，忘掉人的一切软弱缺陷，歌颂人的伟大胜利。弹到第二乐章时，那几个有幸参加这次排演的人都惊呆了。这已经不是钢琴的声音，而是虔诚的圣歌。在第三乐章的风暴中，他挺直身子，又恢复了从前的李斯特·费兰茨。指挥棒在空

中划来划去已经毫无意义，现在是他在指挥乐队，他弹得那样坚定熟练，好象昨天刚刚结束巡回演出。第一个跑过去祝贺的是瓦格纳。接着是里希特，这次他显得比较谦卑了。费兰茨的心又充满了过去的温暖：在他周围都是激动的红脸、含着泪花的眼睛，胜利了！

根据《团结报》一八七五年三月十二日的报道，这次音乐会成了音乐灵感之神的胜利节日。但报纸没有写音乐会后的情况。费兰茨建议举行一次简单的宴会，慰劳无私的乐队和热情的组织者，因为他们不仅动员了首都，而且使全国都动起来了。瓦格纳和捍卫着他的安琪儿科西玛拒绝接受邀请，说是他们需要休息，因为下几个星期还有很多艰苦的任务要完成。结果只好在没有瓦格纳的情况下庆祝瓦格纳音乐会的成功。所有人都出席了宴会，唯独没有瓦格纳夫妇。瓦格纳按照自己的习惯做法又写了一封非常动人的信来为自己开脱：

> 感谢你对我的宽宏大量，感谢你善良地默许我不参加这次宴会。我至今仍为我当时没有立即同意实现你的愿望而感到后悔。当时促使我采取这种不友好行动的原因，主要是我坚信你并不是出于真心才为举行宴会奔波的。我认为你这样做是迫于各种关系和周围环境，因为你的生活原则是要在我们两人都永远格格不入的世界里找到一个位置，即使会遇到难忍的反对，你也要设法这样做。不过我还是承认，我没有在这一点上顺应你的愿望，采取谅解的态度，是我做得不对。请你再次原谅我过去曾经多次得到你宽恕的过分行为和缺点。正因为如此，我将永远会比你能爱我的那样

更加爱你，而你永远会比我想表现出来的善良来得更为善良。我将知道如何在爱的方面超过你，并且利用这个优势恢复我们之间的平衡。

衷心地向你问候

你的理查

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于拜罗伊特

过了一个星期，爱特沃什侯爵的继任、文化部长特莱福尔·阿戈什顿来拜访费兰茨。费兰茨家在豪尔广场。尽管崇敬者们赠送的沙发靠垫、人造花、银器、牙雕、装帧精美的纪念册、画像、刺绣壁毯、人影像和虔诚制作的音符塞满了他的住宅，但对来访的部长来说，这还是显得太简陋了。

费兰茨：阁下的光临使我感到莫大的愉快和荣幸。

特莱福尔：我这次是来向新的音乐学院刚刚任命的院长作礼节性拜会的。

费兰茨：总算有了这个决定！小婴儿降世多么困难，不过在这个愉快的喜庆日子里，我们不要去谈过去的事。

特莱福尔：至少同新音乐学院诞生一样重要的是领导音乐学院的将是世界上第一位音乐艺术家李斯特·费兰茨。国王陛下命令我亲自向您通报这一任命。国王陛下非常关心尽快地发展匈牙利的文化教育事业。

费兰茨：我总是以基督徒的耐心承受岁月的消逝和老年人的十字架。但是我现在真想变得年轻一些，以便能对音乐学院的工作有所帮助。我希望能培养出新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艺术家。我担心我已经老了。我不仅不能领导青年人飞翔，甚至连走路都跟不上他们。

特莱福尔：我可以禀报国王陛下说您已经接受了任命吗？

费兰茨：可以。我接受任命，阁下！（这时他开始改变正式谈话的调子）我同我父亲第一次到佩斯—布达来，离开现在已经五十年。那时候，从城里穿行的牛群到处扬起尘土，鞭子声不断地响着，似乎这里要开始打仗了。当时，这个地方是多么贫困呵！现在，我亲爱的佩斯—布达终于象蚕蛾一样地飞出了茧子。有了民族剧院，交响乐团，现在又有了音乐学院……（他又突然清醒过来，恢复正式谈话的语气）不过，阁下，请告诉我，会不会有人给音乐学院扔炸弹？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某些人很难或者说根本不会容忍我们同维也纳、柏林、巴黎进行竞赛，在同一个世界上创办音乐艺术学校……

特莱福尔：国王的旨意正是如此：不许任何人搞破坏活动，对阴谋分子必须严加管束。

（李斯特讲的是什么破坏活动？特莱福尔部长说的是哪些阴谋分子？这件事是刚去世不久的爱特沃什·约瑟夫侯爵讲的，到一八七〇年二月才真正公诸于世。曾为匈牙利国歌作过贡献、热情可爱、命运乖舛的巴尔道伊·埃代给被国人称之为“民族贤士”的戴阿克·费兰茨写了一份备忘录。戴阿克把这份建议创办音乐学院的备忘录提交国会并且把音乐学院的费用列入内政部的预算。在国会讨论中，钱盖利·安道尔发了言。他的讲话令人赞叹不已，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国会最后居然以七十三票对六十八票否决了音乐学院的建造计划和预算计划。以后又有人提出新的热情洋溢的备忘录。戴阿克又在国会提出建议。作曲家、国会秘书长西蒙菲·卡尔曼、年轻的阿波尼·奥尔拜尔伯爵都发言支持。只有议员杨科维奇·米克洛什反对。他说：不需要这种德国鸦片，匈牙利人没有音乐学院也照样会拉琴唱歌；如果这样还不够，可以派人到国外去学。在他的冗长发言

之后，不少人发出了笑声，表决结果更难预料了，因为相当大一部分国会议员的想法同这位高贵的、自称爱国的杨科维奇差不多。这时，议员海尔菲·伊格纳茨站起来发言：即使只是为了把当代世界的第一名音乐家李斯特·费兰茨留在匈牙利，也需要创办一所音乐学院。这个发言决定了战斗的命运。不过最后的炸弹还没有抛出来。在下一轮讨论时，音乐学院的微薄预算被削减了整整八千福林。发言的是议员塞德尼·埃代。他说：雇用李斯特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从来不住在国内，不是去巴黎，就是上德国；他为匈牙利培养过一个钢琴家或者歌唱家吗？会场上哄堂大笑，好多议员都讽刺挖苦他，可是表决时却支持了他的意见。这样一来，音乐学院只好关门，因为预算拨款太少，最多只能聘请几个普通教员，根本请不起教授。但这只是暂时的停顿。"民族贤士"戴阿克没有参加会议，文化部长特莱福尔正在什么地方休假，他们没法动员自己的人。就这么一下子，音乐学院几乎完了，一个标志着匈牙利文化史转折点的机构差一点就没有了。但是维也纳内阁比塞德尼或者杨科维奇这些自称爱国的先生们更懂政治。他们决定由国王金库里拨款来弥补音乐学院支出的不足部分。这是国王的姿态。这是同当年国王代替约卡伊·莫尔[①]付清债务相类似的姿态。这样一来，一般老百姓都说，瞧，建立奥匈帝国的协议还是有用的，是历史现实，是国王和匈牙利民族之间的真正蜜月。于是消息传遍全国：国王陛下拯救了音乐学院。）

开始的时候，所谓音乐学院实际上只是费兰茨在豪尔广场的住所，再加上一、两间其他教师上课的小房间。艾克尔、沃尔克曼、阿伯拉尼和尼科利茨·山道尔都是音乐学院的老师。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举行开学典礼。费兰茨从罗马发来贺

① 约卡伊·莫尔，十九世纪匈牙利著名作家。

信。他并不是因为高兴或者不满而离开匈牙利的。他是想通过某种方式向那些有关的人表示一下，这么一栋小破房子是不配称之为音乐学院的，所以他走了。但是这种沉默的抗议并没有什么用处。音乐学院只是在四年之后才搬到舒加尔街和维莱什马季路的交岔路口。以后又过了好多年，才聘请到一些新的教员：戈比·亨利、艾克尔·久拉、科什莱尔·亚诺什。

总之，他没有参加开学典礼，但他的思想越来越怀念音乐学院。有些人说这所音乐学院是因为他才创办的，他则想证明，创办音乐学院对国家、对未来大有好处。

在一八七六年的学期里，他已经在努力教学生，并且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凡是上他学校的人不交学费。他从来没有为钱教过学生，在音乐学院也不能例外。从一八七六年开始，他经常来往于佩斯、魏玛和罗马之间。从秋到春，也就是在学年期间，他留在匈牙利首都，然后在罗马和魏玛度过春夏。这一年，佩斯也在庆祝他从事艺术工作五十周年。费兰茨在佩斯游艺场的一间小厅里接见了佩斯市长拉茨·卡洛伊和基阿伊·巴尔。前者致贺词，后者转交了匈牙利音乐家们共同赠送的金花环。在这里，维也纳、魏玛、耶拿、绍普隆、莱比锡都派来代表向他表示祝贺。海伊纳尔德红衣主教亲自登门祝福。瓦格纳发来贺信。

他同佩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个可爱的佩斯女作家沃尔·杨卡和斯黛法尼娅精心照料着老艺术家，借给他大量的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书刊。费兰茨同作家约卡伊和约卡伊夫人拉波法尔维·罗莎的关系也很好。费兰茨和约卡伊的亲切友谊诞生了共同的作品：歌剧《亡故诗人的爱情》。他同布尔斯基一家的友谊也许是最深的。同费兰茨一样，布尔斯基也是个流浪汉，既是世界公民，又是热情的匈牙利爱国者。他最美好的壮年时期是在流亡中渡过的，因为他要为一个至少看起来是完

全没有希望的事业奋斗。两人的旅程是交错的，都去过巴黎、罗马、伦敦、米兰、佛罗伦萨，但从来没有在这些地方见过面。现在，他们的关系变得特别亲密。李斯特同布尔斯基的小女儿波利克塞娜也结成了好友。在一个幸福的下午，费兰茨为小姑娘弹琴，她把自己的儿童画作和诗歌拿出来给他看。谈话中说起已故的布尔斯基夫人。小姑娘说："我父亲那时住在佛罗伦萨，因为他是被驱逐出境的人，不能回国，所以只好让我母亲回佩斯来，处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母亲刚入国境，就传染上霍乱病，最后不幸去世。全靠戴阿克·费兰茨帮忙，让我们回国参加葬礼。国王发出赦令，所以我们就留居国内了。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瓦尔特·泰娜丝……"

费兰茨的脑子还象精巧的仪表一样。他开始回忆：瓦尔特·泰娜丝……维也纳……一八三九年……为救济水灾难民举行的音乐会。

小女孩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妈妈也常常谈起您。"

费兰茨清了清嗓子：

"我隐隐约约地还记得她。"

"我保存着她的日记。她把日记本留给了我。最后一页上有些话是对您讲的，大师。"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可怜的李斯特！当我看到他超人的同时也是非人的成就之后，我心里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叫起来。焰火是好看的，热烈的掌声是令人心醉的。但是别人的惊叹就足够使自己得到幸福吗？我希望别人对我感到惊叹，尽管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惊叹很容易冲昏我的头

脑。但不管怎么说，我不能把它当作是自己生活的主要追求目标，而且根据我多次的经验，它也不会满足我们的生活要求。

可是，当我每次听李斯特演奏的时候，我又常常陷入矛盾之中，很容易就把自己忘掉，完全去为他高兴……

他越来越不愿离开佩斯，尽管在这里也碰到不少不愉快的事。仆人米斯卡(代替了原来的福尔土纳托)因病留在罗马，另外一个仆人切布莱基·安德拉什把他家里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全偷去典卖了。幸亏大部分东西都在当铺里，所以他的朋友们想方设法帮他赎了一些回来。有一天，一个脸色阴森森的男人到李斯特家来找大师。他的自我介绍非常简单：

“斯皮里第翁！”

“怎样称呼您的名字？”

“克奈塞维奇。”

“您讲什么语言，朋友？”

“我什么语言都讲。”

“您是哪里人？”

“门的内哥罗人。”

“谁派您来的？”

“卡罗琳·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

费兰茨背上立即出了一身冷汗：

“夫人并没有通知过我这件事。”

来人象木头一样的脸一动也不动：

“这并不重要…夫人严令我，每天必须让您吃三顿热饭，不给喝白兰地，只能喝红葡萄酒。夫人还说，一天只许抽六支雪

茄烟，最迟九点半一定要上床睡觉……”

“我又不是小孩，谁也不能这样管我！”

“我也是这样对夫人说的，但她对我摆了摆手，说您已经习惯于别人这样照管您。”

罗马传来了米斯卡不幸去世的消息。费兰茨通过电报安排了他的葬礼，为他建造了墓碑。从此以后，斯皮里第翁就成了他的正式管家，住进了豪尔广场的住所。他嫌房间太小，楼道太窄，把食品库的东西全给扔了，说这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和主人的健康。

费兰茨讨厌争论，卡罗琳的信使他感到非常疲劳，所以还不如让斯皮里第翁就这么呆在这里。这位管家用费兰茨最好的英国刀片刮胡子，洒最好的香水，当然更不用说他总是喝主人的酒了。他非常愿意转达主人的吩咐：今天不上课，因为昨天我们会见了特莱福尔部长，谈话时间太长，我们累了……

费兰茨竭力逃避最大的敌人——孤独。他有时住在布尔斯基家，有时到约卡伊家过夜。以后又同总检察长贝克·亚诺什(虽然是律师，但非常喜欢音乐)交上朋友。贝克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道尔恰伊、费尔德瓦利、马特莱科维奇和杰出的音乐指挥胡贝尔。胡贝尔老是爱讲自己儿子的事，说他在柏林学习，教师是约基姆，人们说他将会名扬四海。一天晚上，大家正聚在费尔德瓦利家中，来了两个外国客人：胡贝尔·耶诺从柏林来，维尼埃斯基直接来自巴黎。这位走遍世界的波兰大师正处在荣誉的顶峰，而小胡贝尔(不久改名为胡贝伊)才刚刚登上荣誉的第一个阶梯。两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使人们忘掉了费兰茨。维尼埃斯基介绍他新近获得桂冠的经过，小胡贝尔则大讲他的老师约基姆的各种警句名言、惊人行动和基本原则。费兰茨默不作

声地坐着。当然，客人们都想听听音乐，但是怎么好意思请老艺术大师来当钢琴伴奏呢？小胡贝尔弹巴赫的奏鸣曲。维尼埃斯基演奏帕格尼尼的随想曲。李斯特坐在沙龙的角落里，热烈地鼓掌……尽管他一再命令自己不要动弹，让年轻人去征服听众、出风头，但最后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使他站了起来，几乎是把他推到钢琴旁，然后似乎是另外一个人（至少他感到不是他自己）在代替他说话：

"让我们一起来表演一下吧！"

很快就拿来了乐谱。维尼埃斯基拉小提琴，李斯特弹钢琴，胡贝伊·耶诺翻谱。

老神马、音乐和魔术的老精灵，谁能同你比赛呢?!他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但维尼埃斯基就象是他的老学生一样，也走过去亲吻他的手。

斯皮里第翁管家向卡罗琳·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写了很多诉苦的信，用的是他那象肮脏的小溪一样收聚起来的各种胡拼乱凑的词汇，其中有意大利文、阿尔巴尼亚文、德文、匈牙利文、塞尔维亚文。这些都是精明能干的斯皮里第翁在工作中学来的。管家在信中说，只是崇高的良心才使他没有离开这里，否则他早就抛掉主人不管了，早就在舒加尔街的某个地方开理发馆了。但他不忍心看到别人滥用老艺术家已经越来越少的时间。现在他正在为匈牙利作家和艺术家协会义演，不久还要为农村妇女救济协会演出。接着要在老布达纺织厂获得职工们赠送给他的荣誉职工证书。然后再为穷人收容所进行募捐演出。老艺术大师还用自己的钱为儿童收容所、难儿休养所和托儿所买了第一批砖瓦。他为科马洛姆、埃斯代尔戈姆、新佩斯、老布达、布达和佩斯等地区的水灾难民举办音乐会，募集了几万福林。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身体越来越感到疲劳的主人今天招待约基姆，明天宴请胡贝伊·耶诺，后天又是巴尔罗·沙拉萨特、维尼埃斯基、哥德马尔克、圣-桑、德利贝斯和马塞尼特。李斯特住在佩斯，可是他把年轻的首都推进了欧洲音乐生活的潮流。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音乐指挥家、作曲家接连不断地来探望他。一些想用李斯特的名字为犹太女童孤儿院、佩斯修道院、英国女修道院、盲人收容所、男童孤儿院以及无数的其他慈善机构募捐的人，络绎不绝地来求他帮忙。斯皮里第翁的诉苦信一封接着一封，说他太累了(可是老艺术家却不觉得累)。他还写信给奥古斯·安道尔，要他们赶快派女仆人和女厨师来。奥古斯一家立即采取措施，几个小时以后李斯特的住宅就变成了一座被包围的、被征服的和被胜利占领的堡垒。每一个角落都在大扫除。仆人们烧饭做菜，翻箱倒柜，擦洗地板，开窗通风，从早忙到晚。

毫不奇怪，老主人只好逃走。他先去杜塞尔多夫、汉诺威、魏玛，然后又折回汉诺威。在这里，他经历了一次一生中最痛苦的会见。汉斯·彪罗身患不治之症，没有家，孩子不在身边，忠实的朋友和崇拜者都被他得罪了，现在只好住在汉诺威音乐指挥家布隆沙尔特的家里。这是他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医生要他在床上静躺不动。脑溢血，后果严重。一只眼睛不能动，嘴巴歪扭，右胳臂瘫痪，舌头已经不灵便，说话困难："上帝把你送来了……我的父亲……亲爱的老师！"刚过几分钟，病人又不行了。他另一只还能动的手不断地敲打毛毯和床沿，呻吟地喊道："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啦……他们榨干了我，欺骗了我，现在又来要我的命。"

费兰茨从布隆沙尔特的介绍中大致上了解到病前的情况。汉斯花了八个月时间走遍了美国，共举行了一百四十场公开音乐会，大部分音乐会上都是又指挥、又弹琴。没有乐谱，全凭脑子紧张地劳动。布隆沙尔特请来了柏林最有名的医学教授。他吩咐

立即送病人进戈德斯贝格疗养院，因为如果没有医生的严格监督和看护，几个星期之内，甚至几天之内就会死去。费兰茨亲自把他护送到疗养院，然后又坐上火车去拜罗伊特。

有七百人出席的隆重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瓦格纳的支持者庆祝新建音乐厅的揭幕典礼。瓦格纳向李斯特·费兰茨献了最美好的祝酒词：

"这里有一个人，他还在谁都不了解我的时候就相信我；没有他，你们今天不可能听到我作品的任何声音。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朋友李斯特·费兰茨。"

老艺术家致答词时声音很低，只有坐在他身旁的人才能听得清楚：

"谢谢我亲爱的朋友对我的赞誉。我一贯真心诚意地敬重他。就象我们必须向但丁、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的天才致敬一样，我要向瓦格纳的天才致敬……"

费兰茨又继续旅行。他想起了躺在戈德斯贝格医院病床上的汉斯。这时，他通过间接的途径得到了一个迟到的消息：玛丽去世了。从此以后，玛丽·道格尔特和李斯特·费兰茨之间的争执永远结束了。他现在一个人坐在丝绒垫上，想起玛丽对他来说实际上早就去世了。他一直没有想过她，既不爱，也不恨。但是这次得到的死讯却又使他回忆起花园……第一次令人陶醉的、几乎是发狂的亲吻……私奔……日内瓦的安静……钟声……玛丽走了，这是在默默地提醒他：你也该准备上路了。

老修道士有时就在座位上打瞌睡，列车员替他灭了油灯，把从他手中掉在地上的《神曲》捡起来，放在他的座位上。他的呼

吸有些困难，腿越来越容易红肿，有时候还会觉得头晕，使他看不清书上的字，甚至看不清乐谱。他在大街上不止一次地要倒下，靠陌生的行人扶他过街。尽管如此，他还在继续流浪。

一八七七年八月，德斯特别墅的小石子路在他的脚底下发响。他一边散步一边创作：他在描写德斯特别墅的松树林，《耶稣》的乐谱也在加厚。在工作过程中，他的笔有时会停下来：如果我把这些特殊的音节给瓦格纳看，他会喜欢吗？老修道士以略带讥讽的表情眯上眼睛，似乎在同一个看不见的、但实际存在的对手争论：你喜欢吗，瓦格纳？过了一会，讥讽的微笑慢慢变成了梅菲斯特的挖苦：你懂得这些音节吗，瓦格纳？（因为老艺术家现在爬的山坡对同代人，甚至对瓦格纳来说也是太陡了。首先，他离开了大调、小调这一套音阶，又重新回到格里高利圣歌和古希腊的音乐。他正在考虑，也许可以完全离开现有的音调，创造一种新的音乐，这种音乐的音调、基音和音色是不肯定的。）

一八七七年八月，李斯特在德斯特别墅的小石子路上散步，但觉得在这里也得不到安宁。于是他又去维也纳、魏玛、罗马和巴黎。在巴黎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在这里，他又同汉斯里克碰在一起。在两人老是闹矛盾的气氛下，费兰茨的精神反而好了。他现在才发现，老是点头表示赞成会使人感到腻烦。他同汉斯里克可以随便争论，可以狠狠地挖苦对方，批驳他饶有风趣的指责，还可以予以反击。他们对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和瓦格纳都有不同的看法。两人都非常愿意进行思想交锋。最后还是汉斯里克让了步，这并不是因为他没话可说了，而是因为他谦卑地提出了一个要求："算了，争够了，现在你坐下来弹弹琴吧！"修道士毫不推辞，顺手就弹起舒曼、瓦格纳、鲍罗丁、莫索尼、贝多芬、

肖邦、斯卡拉蒂和斯美塔那的乐曲。各地派驻世界博览会音乐馆的代表们围着钢琴，以仰慕的心情注视着稍为有点红肿的手：李斯特·费兰茨的学生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老艺术家仍然是地球上第一名钢琴家。

世界博览会音乐馆举行节日晚会。前面走的是“国王”李斯特修道士，后面跟着的一大群支持者是他的“臣仆”。为了对大师表示格外敬重，人们在匈牙利展览馆前面当然得多呆一会。匈牙利展览馆的正中央陈列着罗沙沃尔基公司出版的乐谱。什么样的乐谱都有：恰尔达什舞曲、圆舞曲、歌剧、轻歌剧、军乐曲、匈牙利民歌等等。还有很多作曲家的名字，例如艾克尔、米哈洛维奇、莫索尼、奥格哈茨。唯一缺少的就是李斯特·费兰茨的作品。

老修道士感到很不高兴。当天晚上就给罗沙沃尔基写了一封情绪愤激的信。但他刚把信寄出，就开始后悔：他想同谁吵架？同塞德尼·埃代、杨科维奇·米克洛什，同自己的知名和不知名的盟友吵架？信已经收不回来了。几分钟后，他又忘掉了这件事。当一个少年敲他住的客房门时，他哪里还能去想这些愚蠢的事情呢？进来的是一个少年学生，他自我介绍说：“我找李斯特修道士先生。我是最小的埃拉尔德。祖父要我通知您，他正在从前的住所等着您……”

陪同李斯特到巴黎来的胡贝伊·耶诺记载了这次会见的情况：

“埃拉尔德富丽堂皇的住所现在又加上了一间宽敞的音乐厅。鉴于很多人都想见到李斯特，他举行了一次午后茶会，邀请了巴黎精神世界和艺术生活中的不少杰出人物：维克多·雨果、阿尔丰斯·达乌德、沙多、古诺、托马斯、雷耶、圣-桑等等，另外

还有一些宗教界和政界的重要人士。令人惊异的是，我们的老师具有多么难以置信的威望，他在这样一个由闻名世界的特殊人物组成的社交场合中具有多么吸引人的力量。”

接着又是孤独的铁路火车厢。一八七九年一月邮局又送来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奥古斯·安道尔和爱德华·李斯特也去世了。这是他两个知心朋友。就在这时候，斯皮里第翁管家正式通知主人：他自己年纪也老了，不愿再听从别人的吩咐去奔忙(必须指出，实际上是他指挥老修道士，而不是老修道士指挥他)，因此现在准备实现多年的梦想，开一家理发馆……。显然，斯皮里第翁估计年迈而孤独的大师会挽留他，甚至可能答应给他什么物质鼓励。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费兰茨听后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就说：“去吧，我的孩子，没有您，我一个人也能活下去。”老头在吹牛，实际上费兰茨处境相当困难。女厨师和女仆人早被斯皮里第翁打发走了，因为他不允许在自己的垃圾堆里还有别人拣破烂。管家走后，舒加尔街的住宅就没有人管了。幸亏许多年轻人，例如一只手的基希和音乐学院的学生们都来帮忙照顾老人。他们给他找来了一个教名叫米斯卡二世的仆人。他是匈牙利平原地区的人，德语说得很不好，但同费兰茨能讲得通，相互都很清楚对方要说什么。卡罗琳不管用什么文字写信，法文、意大利文、德文、波兰文或英文都行，米斯卡二世反正也看不懂。他收到信后，总是满怀敬意地卷一卷大胡子，然后原封不动地转交给费兰茨：“这是罗马夫人来的信，请您看看，该我做的事，反正您会吩咐我的。”这样一来，费兰茨就可以直接聆听卡罗琳的复杂指示了。这里面有非常奇妙的素食谱，可以防止肝、胃、脾、肠、肾出毛病。这里面还有讨伐葡萄酒、啤酒、白兰地、雪茄、烟斗等伤人身体的秘密十字军的计划。从信中可以看到一

个忠实灵魂对他始终如一的崇敬：每封信都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差不多已经没有肉体的情书。

惊人的好消息。汉斯·彪罗离开了疗养院，直接去威斯巴登担任音乐节的巨大乐队的指挥，胜利地演出了《浮士德交响曲》。正在这时候，传出了各种各样关于汉斯的谣言。说他反对瓦格纳，否定李斯特，参加了勃拉姆斯的阵营。当然，每个人都想唆使李斯特出来反对汉斯：您还在自己的写字台上放着他的照片，甚至象个宝贝一样随身带着它去罗马、魏玛、佩斯，这是多么死心眼呵！可是费兰茨坚定不移：只要我还活着，汉斯的照片就会和我在一起，他是我的孩子、朋友，也许甚至是我的牺牲品。

一八七九年九月一日，他在莱昂内上课。他又在钢琴旁打起瞌睡来。过了一会，他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坐在钢琴旁。在这种时候，谁也不会离开拥挤的小教室。髭胡子的米斯卡二世满怀敬意地站在发黄的、过去曾经是棕色的房门外。只是当最后一个音节的余音也逐渐消失之后，他才打开房门，恭敬地轻咳一声：

"霍亨洛赫红衣主教阁下驾到……"

费兰茨立即起身迎接客人。两个人都老了。红衣主教可能显得比他更加苍老。走路时背有点驼，有一条腿不大灵便。他热烈拥抱并且一再亲吻李斯特修道士，以此表明他带来了非凡的消息：

"我带来了教皇圣上的亲切问候……我写报告建议任命您为阿尔巴那教区主教的名誉顾问，已蒙圣上恩准。圣上亲笔签了字。现在让我第一个荣幸地向您表示祝贺。"

费兰茨在奥尔贝里哥的“奥尔贝尔蒂尼旅馆”租了一间普通房子。自从爱德华·李斯特（他掌管卡罗琳和李斯特·费兰茨的财产，一直控制着费兰茨乐善好施的行为）去世后，费兰茨的钱花得象流水一样。他不久发现，自己必须节省用钱了。过去住富丽堂皇的宫殿、府邸、大楼，现在只能住在奥尔贝尔哥的一家小旅馆里。周围都是些普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向意大利的饥民捐赠了几万福林，还给了耳朵完全聋了的斯美塔那一大笔钱。他写了一封信，把这种义举当成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

“我尊敬的朋友斯美塔那：

您身体尽管遭到了困难的考验，但希望您能幸福地想到，您为艺术，为捷克的光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贝德里希·斯美塔那的名字将永远活在自己的祖国和世界上。”

在这里，他每天早晨去教堂祈祷，住在附近地区的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子总是跟他到教堂门口。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几分钱，受到他的抚摸。从教堂回家后，就一直工作到晚上。如果没有人提醒，有时连饭也会忘记吃。晚上，朋友们来看他，大家一起打牌。费兰茨学会了一个非常美的匈牙利词：只玩不赌。尽管如此，老修道士打起牌来还是非常紧张、认真，深怕输掉。每输一场，心就得痛半天。所以朋友们总是弄虚作假，有意让他赢牌。每晚九点钟或九点半钟左右，他向大家告别，而且还要先安慰大家几句：“运气好，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今天我赢，明天幸运女神也许会降临到你们头上。当然，打牌还得要靠本领。行吧，下一次我来教你们几手绝招。”

他常常去探望卡罗琳。老妇人目前正在从事佛学研究，顺带也探讨老子的学说。此外，她还研究古埃及、亚述——巴比伦和希腊的宗教神学。费兰茨总是忘我地倾听她讲述宗教历史。在卡罗琳朗诵两千年前的诗歌和经文的时候，有时偷偷打瞌睡，至于什么时候惊醒过来，那是无所谓的，因为卡罗琳的话就象人的命运一样永无止境。然后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和朋友们一起玩牌，显露本领。牌局散后上床睡觉，但总是长时间睡不着。他又在读但丁的《神曲》。如果有一天卡罗琳知道他读的尽是些不敬上帝的书，准会大吃一惊。放在他床头柜上的是叔本华、尼采、拉萨尔、巴枯宁和雨果最新的作品——支持巴黎公社英雄们的辩护词。

卡罗琳想把费兰茨拴在罗马，甚至还考虑让他辞去佩斯的职务，借口是他年迈体弱，眼神不好，手腿越来越容易红肿。可是老修道士是用任何链子也拴不住的。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卡罗琳写来一封充满感情的生日贺信：

> “最宝贵的灵魂：愿昔日在沃罗尼茨过生日时的太阳继续照耀您七十岁的寿辰。让我们一起永存……您在永存中渴望我占有您，以便交还给上帝。那是些多么幸运的年代呵！我唯一的伟大人物，祝您再度过许多幸运之年。”

费兰茨读到这封信，心中感到无比温暖，但他还是同五十年前一样，坐在丝绒铺垫的车厢里，带着油灯和《神曲》，听着火车轮子滚动的音乐，继续奔向无边无际的远方。他又去了柏林、弗赖堡、巴登巴登、安特卫普、马格德堡和布鲁塞尔。他的视力越

来越差，因此必须给他配个随从。这次是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胡贝伊·耶诺陪他走了全程。

胡贝伊记载了难忘的比利时之行：

“安特卫普所有的上层人物都围着李斯特转。他以国王的姿态接受了人们的崇敬。第二天晚上，在能容纳三千人的大厅里举行盛大音乐会来欢迎他。在节目单的顶端用大字母印着：李斯特·费兰茨。音乐会的乐队指挥是安特卫普王家音乐学院院长彼得·比诺伊特。当李斯特走进大厅时，全场起立。乐队演奏比利时国歌。演出的还有比诺伊特儿童乐团，有一千个身穿白色制服的男女少年参加。第二天在埃斯科河的游船上。我站在大师身边，一起欣赏河面上洒满阳光的美景。突然，李斯特感叹地说：‘这地方真美，不过我们的多瑙河比她更美！’当天晚上，安特卫普最大的富翁李南举行音乐晚会，这是欢迎李斯特的最高峰。我们演奏了《加冕弥撒曲》中的一段和《#c小调狂想曲》中的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女人们吻李斯特的手、脸甚至黑袍。李斯特感到心满意足。为了表示感谢，再次坐在钢琴旁加演了肖邦的一个曲子，结果又激起了听众的欢呼。他以惊人的热情和年轻的活力弹琴。他的兴奋情绪战胜了就是青年人也受不了的极度疲劳。”

胡贝伊只注意到老修道士的英勇表现。可是魏玛的“卫兵”巴里娜·阿皮尔、“密探”阿黛尔·斯孔和斯泰尔姐妹却吃惊地发现，这样下去，这个老头一、两天内就会累垮。有一次，他从楼梯上向下走，一不小心滑了一跤，严重摔伤。首先出来帮助他的是爱发脾气、好生气的彪罗。他派自己的女儿达尼埃拉从拜罗伊特赶来服侍摔伤的老人。现在，他只能由达尼埃拉扶着在花园里散步。他老是鼓励姑娘说话……这些银铃般的年轻声音，使他由别人扶着散步或者站在花园小道上的时候不断地想起玛

丽、乔治·桑、肖邦和缪塞……一些衣着不整、蓬头散发的人，艺术家茶会的野蛮年轻人，一场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又都重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不断地敦促小达尼埃拉：你说呀，接着说下去呀！……（孩子哪里知道，老人不是想听她讲的话，而是想听她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使他回忆起自己整个一生的钟声。）

当然，他受不了这种长期的“囚犯生活”。不久又继续旅行。刚刚告别达尼埃拉，马上又见到了彪罗。汉斯·彪罗先在维也纳，后在佩斯—布达举行音乐会。尽管他多次在很多人面前宣称，他对李斯特和瓦格纳的音乐已经完全失望，但在维也纳时，他却只演奏贝多芬和李斯特两个大师的作品。在佩斯，还单独举行了一次李斯特音乐晚会，演出了一些由于技术上太困难而被专家们认为不可能弹的曲子。他演奏了《b小调钢琴奏鸣曲》。这是希腊神话中的巨大的斯芬克斯，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几个人了解她的秘密。这部杰出作品是为舒曼谱写的。舒曼对李斯特先是怀疑，继而愤恨，最后则是蔑视。李斯特坐在第一排，思想又在飞翔：这部作品实际上总结了他自己的一生。开始是逐渐降低的沉闷音调，在走向地狱的深处，因为想了解生活的人必须遍尝最大的痛苦和磨难。接着是唱过多次的甜蜜旋律，在颂扬美好的青春，这是用鲜花铺满青春之路的妇女们和能为别人战斗的英雄们的歌声！她们无私地、激情地歌唱，完全超越了人的自私的自然界限。英雄的歌声响起了，它使人站得越来越高，从高山之巅看到了整个世界……这就是《b小调钢琴奏鸣曲》！不知道人们是否听出了他躲躲闪闪的暗示和隐隐约约的匈牙利音阶？不知道人们是否发现（他自己是几十年以后才发现的），这部奏鸣曲不仅是走向未来的桥梁，而且也是回到贝多芬后期的奏鸣曲甚至巴赫音乐的桥梁？这是忘恩负义但又忠心耿耿、叛离老师但又同他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汉斯·彪罗在演奏《b小调

钢琴奏鸣曲》。弹得真好。他的动作是那样严格，好象他准备在听众面前用自己的双手堆砌起音乐教堂的沉重拱顶、巨大柱子和宏伟塔尖。他演奏的时候态度严肃，毫无笑容，几乎是残酷无情。用形象化的说法，他想使听众都跪倒在地上。他今年五十岁，度过了丧命的危机，战胜了脑溢血的病痛，摆脱了三次严重的精神过度疲劳，只是靠着医学科学的奇迹和钢铁般的意志才挽回了自己的生命。他今年才五十岁，弹得那么好，使老修道士心里感到特别温暖：看来我给予世界的比我自己想象的要多。老修道士低下头，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他润湿的眼睛：也许这部奏鸣曲不仅是我一生的总结，也是这个世纪的总结。

他迅速走上演奏台，长时间地拥抱汉斯。汉斯·彪罗虽然已经不是年轻人，但还是那样顺从地向他鞠了一躬，亲吻他的手。

《妇女信使》送来了纪念李斯特狂想曲的精彩文章，作者是戴莱基·山道尔。李斯特立即给他写了信：

> “尊敬的朋友：您非常出色地解释了我们的《匈牙利狂想曲》。您二月一日在《妇女信使》上发表的文章使我感到无限的欣慰，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亲爱的朋友，您什么时候到佩斯—布达来？我在这里将呆到三月十日。最近身体不大好，感到十分疲劳。热烈盼望能同您一起写第二十部狂想曲，而主要还是希望能同您重温我们之间的忘我情谊。”

两人来回写信，其结果是李斯特决定动身去科洛日瓦尔。在这里，好多朋友都来看他。其中有基希·盖沙伯爵、基希·埃

尔诺、维切·亚诺什、闻名全欧的大钢琴制造商伯山多尔菲、西门、科洛日瓦尔市长埃斯代尔哈茨·卡尔曼公爵、戴莱基·多莫科什。当然还有戴莱基·山道尔。尽管他们一再动员，费兰茨坚决不同意参加演出，因为他是探望大家来的，不是表演来的。在晚上的音乐会上，由他的学生、一只手的基希·盖沙表演钢琴。李斯特在演员休息室里陪着他。基希非常紧张，他后悔不该同意在要求最严格的匈牙利听众面前弹琴，这实在是太冒险。现在离开场只有几分钟时间。费兰茨一再鼓励、安慰他，都没有效果。究竟是由于害怕，还是真地病了，谁也说不清，基希自己更说不清，最后不得不把医生请来。因为一只手的年轻人头发晕。幕外的掌声越来越响。科洛日瓦尔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医生认真仔细地检查了病人的身体，最后坚决主张病人卧床休息，绝对不能演出。

病人被抬走。医院准备专门为他开一个房间。李斯特抚摸了一会他发烧流汗的脸，然后走向表演台。因为基希突然病了，只好由他的老师李斯特代为演出。

第二天，戴莱基·山道尔几乎是一把抓住朋友，拉他上马车往科尔多奔。戴莱基满怀激情地从头至尾陪着老朋友。匈牙利著名革命诗人裴多菲·山道尔就是在科尔多度过蜜月的，这是裴多菲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春光明媚，令人心醉。费兰茨似乎又恢复了活力。他在大树的树荫下散步。昨天的花还只是含苞待放，今天却已经是一片花丛了。房前放着一张小桌子（裴多菲和他的妻子桑德莱伊·优丽娅曾坐在这张桌旁共赏春色），上面铺着农家粗制台布，放有一些酒瓶和杯子。

费兰茨说道：

“我正在编写一组序列节目。都是纪念匈牙利人的。我已经

老了，无力象一些老掉牙的、过时的艺术家那样写回忆录，但我还是想描绘一些我看到过的或者想象中的人物，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思念。第一个是命运乖舛的赛钦尼·伊斯特万。我设想，在我的作品中将会有他在链子桥[①]上散步的情景和他用以结束自己生命的子弹。我还要写戴阿克·费兰茨，就单凭他在争取创办音乐学院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也值得我写一篇。他还使匈牙利民族同国王讲了和。（戴莱基用匈牙利语嘟囔了一句，费兰茨并没有听懂，但是可以猜测出他讲的意思：匈牙利民族从这种和解中没有得到多少东西。）我还长期保存过您的亲属戴莱基·拉斯洛的文章、著作。我不知道卡罗琳离开魏玛、大整行装时是否把它们给弄丢了。没有关系。我还记得他的眼神和漂亮宽阔的额头，上面有一些细细的皱纹。那时他正处于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可是生活给他脸上刻上了岁月过早流逝的刀痕。我还要写爱特沃什·约瑟夫，因为他首先提出了建立国家科学院的创议。在我的肖像馆里还有维莱斯马季·米哈依和裴多菲·山道尔。这两个人的像是最难画的。因为我不会匈牙利文，所以只了解他们写的诗的内容，而不懂得诗中的音乐。就象想从一部东拼西凑的、干巴巴的钢琴曲草稿中了解某种优美的交响乐旋律一样，我难以体会到其中音调、色彩和节奏的美感。不过我要尽力而为。最后一张需要画的像是莫索尼·米哈依。”

第二天，两个人又坐在老地方。又是费兰茨在说话：

“不久前，我在巴黎见到了雨果。我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见到他了。他很快就认出是我。而我只是从他轻微的讲话声中才敢肯定，站在我面前的正是当年艺术家茶会的领袖。亲爱的山道尔，他读了很多关于您的事，说你们当年为了躲避当局追捕而

① 布达佩斯链子桥是赛钦尼所建造。

经常呆在一起。他还讲述了巴黎公社和公社分子的情况，追忆了人民群众可怕的、难以想象的贫困生活：他们被困在地下室里，挤在郊区贫民窟里，闷在遥远的矿山里，命定饿死在小城镇里；他们的周围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火灾，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都在燃烧。有时候，我一回忆起雨果讲过的话，就觉得我们背离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我们已经变得娇生惯养了。想当年，我曾经为您写了一部乐曲《友谊和博爱》。许多受苦人期待我们给他们带来友谊和比友谊更深沉、更真实的博爱。”

戴莱基·山道尔的脸红了：

“我曾经在《人类》报编辑部工作多年……马志尼、赖德律一洛兰、雨果、阿诺德、科苏特、赫尔岑都为这家报纸工作过。报纸的代号是：团结和友谊。”

多么美好的日子。彪罗也来信祝贺他七十寿辰。罗马也在祝贺，演出《但丁交响曲》。德国驻罗马大使馆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李斯特庆祝会。魏玛和莱比锡分别上演了《圣伊丽莎白》和《耶稣》。巴黎举行了一系列的李斯特音乐会。伦敦也组织了类似的庆祝活动。德国音乐协会选举他为名誉主席。

可是匈牙利交响乐协会却由于令人遗憾的疏忽忘记庆祝李斯特·费兰茨的七十寿辰。在这种情况下，佩斯一布达市长卡迈尔马耶·卡洛伊的贺信显得只是一块遮羞布：

“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不在您生日之际向伟大的艺术家、人类真正的朋友表示最热烈的良好祝愿，没有一个民族的最优秀分子不向灵感之神的宠儿致敬。高龄也未能夺去您崇高的精神。佩斯一布达市

政当局怀着对大师艺术的崇敬和对您高尚品德的感激心情，在您七十寿辰之际，谨向您表示最衷心的良好祝愿。”

只有佩斯没有举行李斯特庆祝活动。老修道士并没有因此而闹情绪。音乐学院开学的时候，他准时赶回佩斯，并且整整教了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他继续为建立——至少是协助建立——佩斯一布达的精神生活而辛勤工作。匈牙利作家和艺术家协会举行会见。出席的有匈牙利著名画家蒙卡奇·米哈伊、作家约卡伊·莫尔、音乐家艾克尔·费兰茨、基希·米哈伊和李斯特·费兰茨。他们在讨论绘画艺术的巨作《耶稣在彼拉多前》。蒙卡奇是个红人，是欧洲艺术天空中的一颗明星。他自学成材，即使在成功的顶峰上也未能改掉爱出风头的习气。蒙卡奇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这并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因为艾克尔顽固地保持沉默；约卡伊表面装着在倾听，实际上却在想自己的心事。只有李斯特以真诚的感兴趣的心情注视着他：象费兰茨过去一样，他也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是他的额头上写着“注定夭折”这几个字。

最后约卡伊总算从自己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又回到朋友之间。基希·米哈伊也发了言。晚会圆满结束：李斯特把狂想曲献给蒙卡奇，蒙卡奇则邀请李斯特，准备为他画像。基希送给李斯特一张画：从摇篮到坟墓……费兰茨刚刚接过画，耳朵就已经听到了新交响诗的和音：从摇篮到坟墓……

已经年过七十，但还在过两种生活。一种是音乐学院老院长的生活，一种是没有年龄限制的生活。他还在紧张、热烈地探索和试验，似乎现在才刚刚开始生活。有些作品他不敢拿出来

给朋友们看。他把它们全部锁进抽屉里。其中有《恰尔达什舞曲》、《恶运之星》、新的《梅菲斯特圆舞曲》等等，还有一些没有基调的短曲。这都是些令人无比激动的旅行，好象人摆脱了地球的吸引力，飞向冰天雪地的高峰，在这里，生活和存在有着自己的新规律。这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音乐。看不到令人激动的李斯特焰火，听不见使人喘不过气的快板和黄莺般婉啭动听的颤音，感不到狂放的雷鸣电闪和钢琴的其他表现奇迹。这些作品简单朴素，笔直挺立，不加修饰，都是秘密的自白（老修道士不愿把这些最新的精神产儿给任何人看），已经到了本世纪宽广道路的终点。再也走不下去了。这里已经没有路，只有空白。我们必须返回山谷，重新开始。新的道路也许不象十九世纪优美曲径那样具有吸引力，铺满着鲜花，使人向往，但还是要走下去，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和未来的理想，人是无法生活的。老修道士在探索、试验。如果有人偷偷地看他如何工作，或许会大吃一惊，因为老人的脸上又呈现出浮士德的大胆和勇敢性格。这是不停的追求、探索，是现在的宗教徒，但以后又不信宗教的人的性格。老修道士在寻找音乐的新规律、新规则、新真理和新艺术。

他很少拿出新作品来给别人看。如果发现有人在搜索他的著作，他就把它们藏在新的地方。他只想把这些作品给唯一的一个人看，这个人就是瓦格纳。

这是从拜罗伊特来的信。里面是瓦格纳收集起来的一些文章和诗。信中邀请费兰茨到威尼斯去找瓦格纳一家。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日晚上十点钟，李斯特抵达威尼斯。瓦格纳夫妇租的一艘小船在岸旁等着他。他们住在万德拉敏宫。所有窗台上都点着蜡烛，整个建筑物被照得通明透亮，为的是让这位亲爱的朋友知道，他的光临无异是个盛大节日。费兰

茨刚下火车，疲惫不堪，风尘满面，已经不大整洁的黑袍同万德拉敏宫的金碧辉煌显得很不相称。瓦格纳不顾妻子的反对，为李斯特租下了十八个房间。室内陈设非常豪华，还保存着原主人拜里公爵家族的遗风。墙壁上贴的都是精美的深红布料，银灰色的皮沙发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各个大厅里。老修道士只占了三间房：卧室、工作室、会客室。他觉得自己错进了一所奢侈豪华的宫殿。这里是一面神奇的镜子，也许一个人为制作它要花好几年的时间，那里挂着出自名家之手的老公爵夫妇画像。地板上铺的是鲜艳夺目的东方地毯，沙发上垫着精致珍贵的威尼斯花边。而老修道士宁愿走出宫殿，坐在马尔克广场的石凳上。鸽子在他的周围无忧无虑地飞来飞去，走来走去，有时过来向他乞讨食物，有时又相互为争一点食物而打起架来。瓦格纳也和他坐在一起。两个老人。一个即将七十岁，一个已经过了七十个年头。

瓦格纳说道：

“我们把小伊丽莎白嫁出去了。她的婚礼非常热闹。丈夫是格拉维纳伯爵，他出身于欧洲一个最古老的家族。八月二十五日是双重节日……我和科西玛也是这天结的婚。从意大利、德国、英国、匈牙利，当然还有法国，来了很多很多客人。几个有名的法国音乐家肖松、丹第、德立勃、圣-桑也出席了婚礼。实际上是三重节日。因为这一天演出歌剧《帕西法尔》第十五场。音乐指挥出了什么问题，不知道是感冒还是头昏，我也说不清楚。我代他指挥了最后一幕，演得很不错。本来都应该由我来指挥……但我身体吃不消，科西玛也不允许。”

费兰茨问道：“你还有什么新打算吗？”

瓦格纳艰难地换了个姿势：“新打算？你以为还值得吗？”

老修道士因为激动而变得年轻：

“值不值得？你提这样的问题?! 那还不如我来提这样的问题……”

“科西玛还不知道，你也不要对她说。在我们回来之前，我在剧院里晕倒过。我的乐队指挥莱维和一个歌唱家把我拖进了演员化装室。好几分钟时间没有苏醒过来。是别人把我救醒的。我担心……”

他们又坐在一起，这次是在钢琴旁。费兰茨先弹了几首把他们两人紧紧连在一起的曲子：《漂泊的荷兰人》和《罗恩格林》的婚礼进行曲。过了一会，他不知不觉地弹起新的作品《耶稣》、《匈牙利人物》和《恰尔达什舞曲》……

瓦格纳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走出房间。

两人好几天没有见面。李斯特不想勉强自己去见瓦格纳。他在宫殿里来回踱步，和孩子们交朋友，遍访各个教堂，寻找四十多年前与乌格尔·卡罗琳娜同台演出过的破旧剧院。更多的时间是独自一人坐在家里。当然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弹钢琴上。彪罗来信了。彪罗在准备出版贝多芬的乐曲。在他的手下，三十二首奏鸣曲就象太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照在五颜六色的宝石上一样闪闪发光。彪罗什么事都得管：踏板、连线、指法、渐强记号、颤音符号以及区别各种断奏的符号，都得他校对审查。这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可是几天后他又来了一封信，宣布撤销合同，不予出版……说是这本书还不成熟、不深刻，编得太仓促。也许以后会出版的，那时头脑会更成熟、更冷静一些。彪罗还宣告：他很快就要同一个年轻的女歌唱家结婚……这时，信的内容突然一转，说只有几个倒胃口的人所拥护的艺术（即便这几个人聚在拜罗伊特），连一个铜板也不值！真正的艺术是人类的。信

的最后附了一句：你对我的婚事感到高兴吗？

费兰茨怎么会不高兴呢？他对出版贝多芬著作也很高兴。费兰茨狠狠地批评了这个年过五十的顽固学生，要他头脑清醒清醒，不要求全责备。指出大家都是凡人，总会有些工作需要留给后代去做，世界上没有任何最终的、完美无缺的东西。谁要是以为自己创造了什么终极的至善至美的作品，取得了某种被歪曲的上帝信仰，那就等于孤芳自赏、不懂人生和追求死亡。

他又坐在钢琴旁，练习贝多芬最后一首美妙的《c 小调钢琴奏鸣曲》中的小咏叹调。结尾时是进入天堂的颤音，越来越轻，越来越低，就象黎明到来，群星失光一样，逐渐消失在遥远的地方。

房门被轻轻地打开，他一点也没有发觉。只是感到似乎有个人坐在自己身旁。原来是瓦格纳。

"费兰茨，再弹吧，我渴望听听巴赫和贝多芬的曲子……"

钢琴声又响了起来。瓦格纳站起身，慢慢后退了几步，躺在大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脑后，望着画满金色图案的天花板发呆。屋子里到处是音乐。划船人的呼喊声通过开着的窗户不断传进屋来。奇怪的是这两种音乐不但互不干扰，而且使人似乎感觉到了贝多芬更深沉的思想：奏鸣曲的背后也有日常生活的音乐，有时相互启迪，有时互相排斥，但这两种音乐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费兰茨感觉到瓦格纳把手放在他肩上：

"你要能长期同我们一起生活，那该多好。"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要能永远同我们在一起，那该多好。"

费兰茨把钢琴盖好。科西玛敲门进来。

"亲爱的，你该休息了。你今天脸色很不好。爸爸等会儿上

楼去看你。你们可以谈谈。但现在最好不要再劳累自己了。”

费兰茨真地去探望了，并且坐在床前。但是两个老人都默默无言。他们都在思考，不过谁也没有胆量交换思想。瓦格纳虽然只关心自己，但也有些可怜费兰茨：“可怜的老修道士，他已经是一头没有牙齿的衰老狮子……谁敢对他说他现在写的东西只是老年人可怜的尝试呢？”

费兰茨也在想：“从卡塞尔、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汉诺威、纽约、伦敦、佩斯……等地的来信象雪片似地落在我的写字桌上。小音乐指挥、音乐教师、作曲家、钢琴家、教授、音乐业余爱好者十次、百次、千次地重复写瓦格纳早就写过的东西。这是瓦格纳洪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瓦格纳作品中的人物越来越多，就象复写纸印出的原稿复印得越多越不清楚一样，这些人物的形象反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没有价值。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东西，因为‘未来’将会在瓦格纳的洪水中被淹死。”

两个老人都沉默不语。

不久，瓦格纳安静地睡着了。

老修道士轻轻地溜出房间，走下楼梯，回到自己的卧室，拿出油灯和书，看了一阵，觉得看不下去，就拿出乐谱纸来。他的视力已经很弱。脸几乎要贴在纸上。尽管如此，他还是勤奋地写着。乐谱纸上画的音乐符号越来越多。题目是《丧船之歌》。或者更应该说是《死亡的小船》。今天清晨，他看到了威尼斯式的葬礼。小船这次载的不是叽叽喳喳的旅游者和欢度蜜月的新婚夫妇，而是一口棺材。他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幅图景。载着死亡的小船在水面上漂动，它上面不仅是一口棺材，而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尸体：整个世界，或者至少是整个世纪都被埋葬，他自己也在其中。瘦弱的小孩芨芨和父亲亚当、母亲安娜……他们惊恐万分地站在一个陌生世界的旋涡之中，站在一座城市

的正中央，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闪烁着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的巨影。世纪逐渐告别，小船慢慢远去。新世纪的小船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人物和命运，要是现在就能知道，那该多好！

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三日，李斯特告别了瓦格纳一家，启程去佩斯—布达。瓦格纳只送到大门口。临别时，他紧紧地拥抱，长时间地亲吻自己最忠诚的支持者、兄弟和朋友。

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个月后，理查·瓦格纳去世。

李斯特是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科西玛没有给他写信。不仅没有给费兰茨写，也没有给其他人写。她一直躺在黑暗的房间里昏迷不醒。

可怜的奥古斯。甚至死去之后还在帮助朋友。他为李斯特弄来了以后越来越需要的护照。李斯特每次带着灯和书坐上自己的座位时，板着脸的火车列车员总是用怀疑的眼光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他。被早班车从沉睡中惊醒的海关人员和边防宪兵因为情绪不好，常常有意找他的麻烦。在这种时候，奥古斯弄来的护照显得更加有用，因为上面写着：国王顾问、大公参事、高级勋章获得者李斯特·费兰茨博士。

李斯特准备去魏玛，那里几乎聚集着他所有的学生。当然，这些学生当中良莠不齐，滥竽充数的人也不少。有一次，彪罗象守护天堂大门的天使一样突然出现在魏玛，检查了每一个学生的水平，把那些不够格的人无情地赶出了音乐天堂。就这样，他不是清理了个别的亚当和夏娃，而是清理了一批亚当和夏娃。彪罗对自己的工作成绩十分欣赏，而且花了好几天时间检查老修道士是否坚持原来的判决，然后才离去。可是他离开魏玛一个小时后，那些被贬出天堂的亚当们和夏娃们又都回来了。

于是他又计划搞一次新的清洗。可是他实在太老了，这样的工作使他疲劳不堪，尽管他现在已有几个帮手：秘书奥古斯·戈莱里克是个可爱的年轻人；女秘书莉娜·斯马尔豪森实际上成了他的养女；一个名叫沃伊特·基塞劳的姑娘自称是匈牙利人，尽管她的祖先当中有不少德国名字。当然还有梅耶多尔夫侯爵夫人。魏玛内阁曾把她"劝出"李斯特的家，但她不久就同别的夏娃一样又回到了音乐的伊甸乐园。匈牙利学生主要留在佩斯音乐学院，他们一听到有人招呼，马上都聚集到魏玛来。其中有具有哲学家气质的天才尤哈斯·奥劳达尔、沉默寡言的桑第·阿尔巴德、一只手的基希·盖沙、两个久经考验的朋友阿波尼和米哈洛维奇。此外，阿伯拉尼·科尔内、维格·亚诺什、奥格哈茨·卡洛伊，象影子一样跟着大师的托曼·伊斯特万、日夜梦想做音乐指挥的马尔古什·德热、才华出众的萨巴多什·卡洛伊、在记忆力和幻想方面堪与彪罗匹敌的尼基奇·阿尔土尔、机灵敏锐的克莱尔·贝拉等等也经常到这里来……

老修道士昏昏欲睡。列车员进来，仔细检查了门窗，不让老人受凉。

边防军官却没有这样殷勤。他两只脚后跟一并，敬了一个礼。被惊醒的李斯特递过自己的护照。

边防军官大声地、一字一字地念护照上的名字："李斯特·费兰茨博士……谢谢阁下，请原谅我打扰您了。"

天渐渐发亮。他打开书，想读几页。然后又倒在座位上继续打瞌睡。座位上挂着一盏油灯，还点着，但只是冒烟，不见火焰，不见光亮。天亮了。

第九章　间　奏　曲

阿伯拉尼·科尔内之所见

在魏玛期间，每次午饭后，李斯特都得睡一会儿。他这种习惯甚至连魏玛大公也不得不予以尊重。清晨起身，一起床就开始工作，中午需要休息一下。九点钟一到，米斯卡二世开始讲匈牙利语。这不仅意味着这个能干的人在骂娘，教整个魏玛学匈牙利话，而且包括他对早晨的第一批来客的欢迎和不欢迎。这些人也必须讲匈牙利话，例如“早安”……“米斯卡二世，您好吗？”……用匈牙利话问候，这是米斯卡二世严格要求的买路钱，否则就进不了李斯特家的大门。许多德国人对这一点感到特别伤脑筋。从早晨九点钟一直到深夜，许多来访者和学生陆续不断地进进出出。作曲家把自己的作品带来请他看，音乐表演家在他面前献艺求教，歌唱家不停地卖弄自己的嗓子，在伊甸乐园里音乐之声连绵不断。李斯特在魏玛的房子是一栋普通的小楼房。里面没有大厅，一点也不豪华，只有三间普通屋子。沙龙的中心是一架被红色家具围着的钢琴。这间屋子里一次最多只能容纳十个人。工作室里有很多图书和两张写字桌，其中有一张桌子每年都由大公妃派人用新的花布装饰起来。外间用来作餐厅。贵客们来访时，米斯卡二世立即送上白兰地，作为受到主人欢迎的象征。

钢琴上摆着许多新音乐作品，因为数量太大，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放。李斯特对新的德国音乐作品评价并不很高，倒是对另外一堆厚厚的、约有十多本乐谱的包裹十分重视。我们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这是新的俄罗斯音乐！""还有这种音乐？"于是我们贪婪地打开包裹，每人手里拿了一本，真想一口气就把它吞下去。几分钟后，大家都带着惊奇和探询的眼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象是在问，我们这里谁懂俄文呀？因为乐谱上写的是斯拉夫字母，这对我们来说就象看象形文字一样，一窍不通。上面没有一个德文、法文或意大利文字母。"难道俄国的音乐家与众不同吗？""难道俄国的诗人、音乐家不爱虚荣，不想出名吗？""他们的名字都叫人看不懂，那人们如何知道哪部乐曲是哪个音乐家写的呢？如果我们看不懂他们的说明，那我们怎么能理解作曲者的思想和感情呢？俄文中的钢琴、渐强音、最强音、强音是怎么写的？"

有人坐下来，想在钢琴上试试俄国音乐弹起来究竟怎么样。他弹不下去，至少是刚看第一遍时弹不出来。李斯特着急了，亲自坐到琴旁，一段一段地边看边弹。他的视力已经很弱，只好低着头看，离开乐谱很近，但弹得非常出色，好象已经练过一年多似的。任何善于读书的人也不能象李斯特这样善于识谱。他能够一目十行，并且同时在钢琴上把它们表现出来。他根本不看自己的手，手上似乎长着眼睛似的。有时候因为速度太快，几乎就看不见手。除他以外，只有塔西格能做到这一点。人们会觉得，不是人在弹琴，而是琴键自己在跳动，似乎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在指挥着它们。

我们听到了朴素的俄罗斯民歌和悦耳的乌克兰音乐，华丽的服装并没有能够掩盖住她们的自然美。这些俄国人有力地批驳了一种狭隘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音乐节奏都

不能成为经典音乐加工的目标和手段，不能建立在广泛的音乐基础之上。我们如果把汪洋大海似的俄罗斯音乐一段一段剖析开来，就可以发现，里面全是民间音乐的旋律。我们敢于肯定地说：自装受苦的匈牙利世界主义者，你们到俄国人那里去学习学习他们的民族感情吧！你们不要抄袭，而应该创作！不要把民族音乐之水往海里倾倒，而应该从大海中为民族音乐汲取更多的水源。整个上午，我们都在研究俄罗斯的音乐诗人。最后进来了一个出身于俄国的学生，他帮我们认识了这些音乐诗人的名字：达尔戈梅斯基、柴可夫斯基、巴拉基列夫、吉洛和鲍罗廷。

（摘自阿伯拉尼·科尔内《五光十色的生活》）

从秘密日记中看李斯特

你应该走在时代思想的前面，这样，思想就会紧跟和支持你。你要是跟着时代思想走，它们就会带着你一起前进，你要是违背时代思想，它们就会把你踩死在路旁。

社会伦理的屏风后面，隐藏着统治者的愚蠢无知。

暴君的帮凶——罗马教皇被迫逃难，远离被他长期破坏的地方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成千上万遭他无辜杀害的人的鲜血将会象复仇女神的宝剑一样，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追捕他。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将手拉着手，共同朝人类的伟大目标前进。

我们要求面包、工作和博爱，可得到的回答却是致

命的子弹、炸药和战舰！

（以上系李斯特摘自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加里波的《致巴黎工人的信》）

如果教皇错误地规定扬恶抑善，那么教会为了不犯罪，也只好相信，罪恶是好事，善良是邪魔。

（李斯特引自贝拉敏的《罗马教皇》）

即使上帝主持正义，人间的不正义仍然是不正义。

罗马是制造永恒不变的工厂。

我们应该不倦地努力，使我们的信仰变得有意义，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值得信仰。

金基是罗马人，是个不好也不坏的人。由于这两点原因，他也许可以成为教皇。

教会如果能够扎根于世俗社会，用进步的指南针航船，同时代一起向永恒之星前进，那教会将会变得多么令人信服而把自己置于永远不败之地呵！

（以上系李斯特引自达尔冈特的《法国争取宗教自由史》）

第十章　葬礼进行曲

安东·鲁宾斯坦和欧根·道拜尔特在魏玛大公宫殿举行的钢琴音乐会上作了精彩的表演。李斯特在音乐会上开始打瞌睡，但后来仍然经不起钢琴的引诱，自己也弹起来。他怀着老年人特有的愉快的虚荣心听着鲁宾斯坦的赞扬：在李斯特身旁，我们都只能算作小学生。

李斯特接着又赶乘早班快车到莱比锡。在这里，钢琴家希洛蒂演奏了他的《死之舞》，获得了极大成功。从此以后，许多艺术家都爱演奏这首曲子。汉斯·彪罗虽然公开咒骂、讽刺、挖苦他，但在迈林根音乐节上还是演出了他的《理想》，而且非常成功。不仅乐队祝贺他，连彪罗的年轻助手也祝贺他。这位年轻助手很怕难为情，以致费兰茨不得不两次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轻声答道：理查·施特劳斯……理查·施特劳斯……

老音乐家疲惫不堪地从这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从这一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他内心怀着一种忧虑心情：一旦停下来，定居在某个地方，不再乘坐火车，那一切就都完了。

又到了佩斯。他同国家歌剧院的建造者有点小争吵。老修道士顽固地坚持歌剧院里不要只放李斯特和艾克尔的塑像，还应该陈列莫索尼·米哈伊和两个多布莱的塑像。

学生音乐会。老修道士明白，艺术家真正的学校不是教室，而是演奏台。他不管怎么疲乏，总是从头到尾仔细观察学生们

在音乐会上的表现。他衰老的四肢常常僵在椅子上，最后必须由别人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

尽管如此，他还是顽强地、不倦地来回旅行。这只流浪鸟不敢收起自己的翅膀，因为他担心一旦收起就再也张不开来。他继续向前走。魏玛、卡尔斯鲁厄、巴登、施特拉斯堡、安特卫普、亚琛，最后又回到魏玛。他还常常站在乐队指挥台上，但这只是象征性的。他的真正任务是主持音乐节日的开幕式，然后由他的学生演出。报纸上常说，这些学生又重现了青年时期的李斯特。他坐在第一排。心中毫无嫉妒之意。因为他热爱青年、有才能的艺术家、勇敢的人……他心中明白，报纸讲的话不对。因为青年李斯特·费兰茨并不象报纸所说的那样。青年李斯特是哥伦布，他乘坐一艘小船去寻找新的世界，并且发现了新大陆，而现在这些年轻人是在已经发现的航线上航行。他们走得更快，胜利的把握更大，航行的方向更明确。

他丝毫也不嫉妒他们。相反，他的掌声总是最响。

当魏玛大公和一个名叫马尔丁·克劳斯的教授通知他，说魏玛成立了李斯特·费兰茨学会时，感到最意外的是他本人。

在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演讲人关于伟大艺术家李斯特的介绍令人激动和愉快。令人愉快，但也使人痛苦，因为他们在谈到他的时候，似乎他已不在人间，不是一个活人，而是音乐的历史人物，是贝多芬、舒柏特、凯鲁比尼、柏辽兹、肖邦、梅耶贝尔、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的同代人。的确，他走过的路程是漫长的。已经七十多年，实际上应该说是几个世纪。听这种节日讲话是愉快、幸福的事，但要强忍眼泪却也是非常困难的。幸亏火车又在继续向前开。小油灯不亮了，他的宝书也休息去了。因为他的视力已经非常弱，很难看清什么东西。他再也不能去损害这唯一的一点微弱视力了。他到了慕尼黑……可怜的宝贝科乃留

斯演奏《巴格达的理发师》，受到热烈欢迎。可惜彼得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天，而他却又亲身经历了热烈掌声和巨大成功所带来的愉快。但是这一切都要过去了，他将成为音乐历史人物和纪念品，不再冒烟、燃烧。

前进，前进……不能停下来休息。又到了罗马。他几乎都爬不上旅馆的楼梯。全靠几个学生扶着他或者说抬着他才勉强走了上去。他马上写信通知卡罗琳。他已经看不清室内的陈设，只是感觉到一种令人陶醉的香气包围着他，使他想起许许多多往事……这些花的香味是多么浓郁呵，好象有人在墓室里向他抛扔花圈。

“把窗户打开，亲爱的，我感到很闷……”

卡罗琳在身边答话，可是声音似乎来自极远极远的地方：

“不行，亲爱的朋友，外面在刮风……”

他们两人坐在令人窒息的花香和沾满灰尘的石膏像之中，沉默无言。卡罗琳觉得这样坐着也挺好。但是老修道士很快就觉得受不了，又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晚上还有音乐会。由他的学生演出。人们让他坐在荣誉席上。掌声一半是给青年人的，一半是给他的。斯泰文哈根演奏肖邦的曲子。弹得不错，也可以说弹得很好，但似乎还是缺少点什么。也难怪他，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见过肖邦亲自弹琴。他没有同他们一起呆过，没有见过乔治·桑，没有被肖邦的美妙琴声拨动过心弦。

音乐厅里死一般的沉寂，一点声音也没有。老音乐家自己大概也不知道，他是在半醒半睡状态下走上演奏台的。他弹的是肖邦的曲子。他的手也老了，弹起琴来有些痛，但是弹出来的琴声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动人。这是真正的肖邦。这是梦幻的音乐。它刚刚接触到一点现实世界，马上又象仙女一样展翅飞向无边无际的天空。

不管他走到哪里，信件总是源源不断地接踵而来。索菲亚·曼特尔来信说，彼得堡的听众都想见到大师。音乐会组织者寄来的是空白合同，老修道士认为应该给多少酬金，自己往上面填好了。阿代里纳·佩蒂也来了信。他请老修道士到美国去作巡回演出，酬金可以是几十万，也可以是几百万。费兰茨对这些邀请都置之不理。但是有一封信他却读了十遍、百遍，原来是莱比锡的李斯特·费兰茨学会给即将进入七十五个年头的大师送来了桂冠。

他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接待客人了。他只想同自己所喜爱的几个学生在一起。他的视力用来打打牌还勉强可以。这是他最主要的娱乐。拿牌的手哆哆嗦嗦，看牌的眼睛迷迷糊糊，但牌瘾不能不过。

他已经不欢迎客人来，但是一看到名片上写着“我从巴黎来”，还是不忍心拒绝会见。来访者名叫德彪西，是罗马奖金获得者。他为大师作了表演。他不仅弹了自己的作品，还弹了许多名家的乐曲。

老修道士长时间地紧握着德彪西的手：

“我们在巴黎再见面……我在死以前一定还要看看巴黎。”

一八八六年三月九日，匈牙利作家和艺术家协会请阿伯拉尼·科尔内做关于李斯特生平和艺术的报告。李斯特大师坐在第一排。他已经七十五岁。他现在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可是生命在消逝，已无法弥补这个错误了。李斯特不会匈牙利语。在他的记忆中，或者说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几个匈牙利词汇，但这实在太少了。他距离自己出生的祖国从来也没有象最近几年那么近过。他在佩斯郊区瓦尔加·维尔马家作客。先是隆重的午宴，接着是音乐，然后在果园里休息。主人

专门为他准备了躺椅，上面垫着软枕。美丽的下午，悦耳的音乐，微风摇晃着树枝，蜜蜂在嗡嗡飞舞，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在打井水。这一切都象甜蜜的乐声。过了一会，风大起来，发出了弦乐的声音。这里最好再加上黑管，就会真的象乐队演奏了。在邻近果园的地方，一个农妇一边锄地一边轻轻地哼着歌：

软软的面包，无法烤炸，
娇娇的少女，难以出嫁，
先得问问姑娘；
你愿不愿意离开老家？

老修道士半睡半醒地听着歌声。晚上，他对瓦尔加家里人说：这个农妇唱的歌同我从吉卜赛人那里听到的歌不一样。歌的节奏不时停顿，间隙时间很长。歌的声音同一个老实正派的农民一样纯正无邪。

小维尔马——费兰茨的得意门生之一——和他的父母都微微地笑了一笑。瓦尔加说："您现在就象一千年前的盖莱尔特主教一样，发现了匈牙利人的交响乐曲……"

是的，他确实发现了。他的脑中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想法：已经晚了，他再也不能背起小包到匈牙利各地去遨游了，再也不能跟着歌声去寻找理想的音乐了。已经晚了。他没有学会匈牙利语，因此现在没法听懂阿伯拉尼·科尔内的报告。他坐在第一排，只能通过法文翻译来理解美妙而陌生的匈牙利话。阿伯拉尼激动地讲到，李斯特同法国浪漫主义派的巨人雨果、柏辽兹、缪塞、肖邦一起开始他的艺术生涯，以后又受到帕格尼尼光辉的影响，但是他成百倍、成千倍地加强了帕格尼尼的光芒，成了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莱茵河的山谷教他学会了唱歌，

魏玛的宁静使他创造了交响诗，他把富饶、崭新的世界花园里的幼苗移植到各个地方。但是，最美好的音乐还是在这里，在自己的祖国学会的：《匈牙利狂想曲》、《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加冕弥撒曲》以及许多其他杰出的匈牙利乐曲都是这样。《圣伊丽莎白》也只能产生在这里。这里的土壤还培育了《英雄的葬礼》……

晚了。阿伯拉尼的报告他一句也没有听懂。他吃力地边听边看法文译稿，眼睛很快就累了，于是只好放下译稿，闭上眼睛养养神。

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一日，他出席了托曼·伊斯特万的音乐会，然后在西火车站的餐厅里请朋友们吃饭。

他的学生们还从来没有见老师这么忧郁过。只是在他们把他送上火车之后，他才打开车窗喊道："上帝保佑你们！"

"再见了，亲爱的大师，冬天时再见……"

从车窗里传来了平静而悲伤的声音：

"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那儿相见，我只要走一步就行了，可你们还要走好多公里。"

几个小时后，李斯特到达安特卫普。他又成了李南家的客人。一个目击者这样写道：

"李斯特精疲力尽地靠在椅子上。他请萨莱姆布斯基弹些什么。后者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担任王家乐团的钢琴教师已经好几年了。尽管他具有典型的波兰人特征，但外表还是很象李斯特。萨莱姆布斯基是个病人。肺结核破坏了他整个机体。

他关了灯，坐到钢琴旁开始弹一首李斯特的练习曲，接着谁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内心感情，又弹起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来。在座的人都深为震惊，大家默默地、心情沉重地听完他的演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大概还从来没有这样令人感动

过。”

三月十八日，李斯特修道士已经到了伦敦。《音乐时报》报道说，李斯特在这里受到了一个国王才能受到的隆重接待。“李斯特一走进来，群众马上全体起立，热烈欢迎当代活着的最伟大的音乐家、欧洲的音乐之王。”

伦敦一所中学的学生们专门选派代表团来请他去听他们排演的《浮士德交响曲》。这样的请求怎能拒绝呢？《浮士德》是他青年时期最喜爱的读物。一些曾经同他一起读过《浮士德》的人的脸形又模模糊糊地呈现在他的眼前：柏辽兹……玛丽！他当然要去看《浮士德交响曲》的演出。他自始至终都在热烈鼓掌，最后还坐到钢琴旁为孩子们演奏。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又要即兴弹琴。也许这是一种怀念，因为他回忆起《浮士德交响曲》和它的一段圆舞曲。

他在温泽别墅做客。被他弹过近五十年的钢琴还放在那里，一直没有人动过。现在他再一次弹起这架老钢琴。当时在场的贝蒂纳·瓦尔克回忆道：“他坐下来弹了一首很长的曲子，也许是他自己写的练习曲。亲切而清脆的琴声和崇高的激情动人心弦，使人陶醉。下午的阳光正好照射在他长长的披在肩上的银发上面。我只是现在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是个老人，不久就将离开我们。我真愿把我自己的寿命分给他几年。”

他又来到英国的锡德纳姆。主人是李特尔顿。老修道士刚刚休息了一会，威尔士公爵就派人来请他到马尔博罗宫去。接着又是一场又一场的音乐会。他已经非常疲劳，但是又怎能拒绝王家业余音乐协会送来的邀请信呢？这个音乐学会的会长是

英国王太子。他的几个学生先后在伦敦演出他的作品，他都得去参加。

在李特尔顿家举行的音乐会上，他亲自弹了几首曲子。在座的费勒·梅特兰德记载道：

> “……他的演技是令人难忘的，任何艺术家也不会达到他那样的水平。他那独具一格的、和平的艺术光辉和把音乐的深刻意义揭示给我们的高尚感情，是令人永世难忘的。”

在巴黎，接待他的主人仍然是埃拉尔德一家。匈牙利的著名画家蒙卡奇同埃拉尔德争着要接他去，因为李斯特在佩斯时曾经许下诺言，只要他一到巴黎，就住在蒙卡奇家，并且为蒙卡奇当模特儿。就为这事，两家吵起来了。最后，蒙卡奇家取得胜利，老修道士搬到他家去住。在蒙卡奇夫人陪同下，他参观了音乐大厅。后来在这里，他在七千听众面前指挥演出了《圣伊丽莎白》。

没有人陪同，他是从来不出门的，但是陪同的人还是没有照顾好他的身体。从音乐大厅出来时，巴黎正刮着四月的凉风，他没有穿大衣，结果着了凉，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即使这样，他也没有耐心呆在一个地方。他又继续旅行。下一个目的地是魏玛。在多年不见之后，这次科西玛总算出来了。她亲自来帮他料理家务，很快就把女管家莉娜·斯马尔豪森打发走，对其他仆人也教训了一通，然后对父亲说：“达尼埃拉不久就要嫁给历史学业余爱好者亨利·托德。您作为她的祖父最好也能出席婚礼。夏天，还要演出瓦格纳的作品……。这是件神圣的事，李斯特一定要参加音乐剧院的开幕式。”

费兰茨推托道：

“我感到非常疲倦，亲爱的。身体也不大好。在巴黎着了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恢复过来。”

科西玛不喜欢多费口舌。她请来两个医学教授给他看病。教授们说他的心脏不好，必须马上治疗。不是明天、后天，而是现在马上。眼睛要动手术，否则可能完全失明。

老修道士请求宽限些日子。因为他需要到德国宗德斯豪森市去参加李斯特节日的活动。科西玛心软了下来。宗德斯豪森确实在等待着他。他一生曾经遭受过这么多攻击、侮辱、诽谤和误解，现在到了晚年，应该让他到充满颂扬和崇敬的阳光下去沐浴一下！

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必须赶回来参加达尼埃拉的婚礼。

老修道士老是咳嗽，尽管他一再掩饰这一点。整个婚礼过程中，他不停地咳嗽，所以他也不好怪别人不想留他多住几天，于是又回到蒙卡奇家。

在森林公园里散散步该有多好，可是他没有力气，只好让别人把他的坐椅推到窗口，呼吸一些被清晨的露水浸湿了的草木的香气。

蒙卡奇在为他画像。幸亏他看不清甚至根本就看不见画的是什么。在蒙卡奇的笔下，他是一个疲惫的老人，一个再也不需要宝座和权杖而只需要宁静的老国王。

蒙卡奇夫人想为他请医生来检查身体，他推辞了。他还要到拜罗伊特去，听几场音乐会，然后再进疗养院治病。到那时候再让医生们去检查他的身体，动手术，开药方，随便他们去折腾好了！但是现在还不需要他们。

老修道士在管家的护送下上了火车。他想找一间空车厢，可是运气不好。这次有一对年轻夫妇与他同车厢。也可能是因

为夏天，也可能是因为爱情，他们感到太热，所以拉开玻璃窗，让夜风冲进车厢里来。

他换了一个位置，但是到处都可以感到凉风。他怯生生地建议，是不是可以把玻璃窗往上推一点，可是这两位年轻人装着没有听见老年人的咳嗽声。

等火车到达拜罗伊特的时候，他又发烧了。费洛利克先生为他租了三间房子。房门还没有来得及关，忠实的学生戈莱里克就已经赶来了。他热烈拥抱老艺术家，把他送进卧室，亲自为他脱衣服，盖被子，站门岗，不许任何人打扰他。

晚上，病人稍为好了一些，烧退了。他刚起身坐在椅子上就开始兴致勃勃地指挥戈莱里克给他拿衣裳，因为他要出门。正在准备的时候，小外孙女夏娃和小外孙西格弗里德请他来了，说是母亲科西玛正在等着祖父的光临。

老修道士硬撑着到了女儿的家。他已弄不清楚周围的情况，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说话声，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件一件颜色鲜艳的女人衣服。男人的燕尾服和女人的夜礼服的黑色同他发烧时感到的昏暗越来越融化在一起。还是戈莱里克把他送回家。整个夜晚，他在床上翻腾不安。咳嗽、发烧，汗流如注。可能是戈莱里克催请来的，也可能是第六感觉驱使来的：莉娜·斯马尔豪森又回到他的身边。

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他又在听音乐演奏。一会儿声音显得特别响，一会儿声音又变得很远很远，不知道他究竟能听见多少。

他在半昏迷状态下被送回家。

戈莱里克也在发高烧。科西玛又把莉娜赶出了家门，只有上帝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说是怕她会增加李斯特家的丑

闻吗？看样子不会是这个缘故。因为老修道士昏迷不醒，躺在床上。一个快要死去的人还会闹什么丑闻呢？莉娜在其他家里人的协助下偷偷溜进病房去看了看病人，然后马上赶到戈莱里克那里去求援，请他马上去照顾李斯特，就是发烧也得去，因为她要再去的话，科西玛准会大吵大闹，把她赶走，这样病人就没有人照管了。戈莱里克挣扎着起身，拖着因发烧而颤抖的身子赶到李斯特的住处。这时，米斯卡二世和托曼·伊斯特万也赶来了。

垂亡的病人非常痛苦。巨大的躯体怎么也不肯向死亡屈服。

科西玛最后总算来了。她也精疲力尽，因为从早到晚都忙着处理音乐剧院开幕的事，她既是经理、总导演、戏剧主任，同时也是会计、广告科长和杂务主任。她带来了两个医生。

一八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科西玛也搬来同父亲一起住，在他身旁守夜。

垂死的老人在说胡话，过了一会，似乎有些清醒过来：

“把我的衣服拿来……今天晚上有演出……我必须去……”

如果不是别人硬让他躺下，他真会起来穿衣服。他在床上挣扎说：

“你们应该明白，今晚演出《特里斯坦》……科西玛等着我去，我必须到场……”

病房逐渐安静下来，只能听到病人困难的喘气声，他还想说一个字，但是只发出一个音，以后就再也说不清楚了。

过了一会，他终于说出了这个字，声音是那样的尖利、坚定，好象又恢复了神志：“特里斯坦，特里斯坦……”

一八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夜十一时四十五分，他终于与世长辞。

科西玛的脸象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她必须迅速料理后事。德国皇太子的快车中午就到。必须尽可能向高贵的客人保守秘密，不要透露出李斯特逝世的消息。葬礼也得推迟。可是天气那么热，尸体很难保存。科西玛很快作出决定：先把尸体浸泡在药水里。

在拜罗伊特车站上正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皇太子驾到。这时，在灵柩旁守灵的是斯特拉达尔、戈莱里克、斯泰文哈根、弗莱德希姆、希洛蒂、托曼和米斯卡二世。

晚上，匈牙利文化部的特派代表米哈洛维奇和维格·亚诺什也赶到拜罗伊特。接着来的是魏玛大公的亲信维德尔参事，拜罗伊特剧院的代表、音乐指挥莫特尔，德国作家协会的代表沃尔索根。梅耶多尔夫侯爵夫人也出现在灵堂前。可怜的莉娜·斯马尔豪森跌跌撞撞赶来守灵，她现在不需要再躲躲闪闪了，她可以跪倒在棺材前痛哭一场，表达自己沉痛的悲哀了。

最后，科西玛的计划完全失败。送灵的人非常多。送灵的队伍前面有两面黑旗开道。接着是身穿隆重礼服的消防队。(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无人能解释，当年为什么要由这些人来参加李斯特的葬礼。)然后是两个高举十字架的圣童。在这些人的后面是天主教神父和扎满鲜花的敞篷灵车。盖在灵车上的黑纱由米哈洛维奇、剧院院长乐恩、音乐指挥莫特尔和德国作协代表沃尔索根举在手中。灵车的两旁是李斯特的学生。西格弗里德·瓦格纳、托德博士跟在灵车后面。最后一辆马车上坐着科西玛和她的几个女儿。

拜罗伊特市市长穆克尔在墓前致悼词。他向死者宣誓：人们将永远怀念李斯特。斯泰文哈根代表大师的学生们讲话。第二天，在天主教教堂里举行了送葬弥撒。弹管风琴的是安东·

布鲁克奈尔。

托曼·伊斯特万刚一回到家，就马上求见海伊纳尔德红衣主教。他是李斯特的崇敬者，因此立即接见了青年艺术家托曼。托曼报告说，魏玛和拜罗伊特（包括科西玛）都把大师看作是自己的亡人。请红衣主教出面，让大师同自己的朋友和战友瓦格纳安息在一起，以后再同科西玛安葬在一起。如果匈牙利政府提出要求，科西玛也不反对让李斯特安眠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

在托曼和海伊纳尔德红衣主教的倡议下，不到几天工夫，匈牙利就展开了一场签名运动。牵头的是匈牙利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匈牙利全国音乐家协会。组织工作和征集签名的工作进行了很长时间。一八八七年二月十七日，他们向匈牙利国会提出了运回李斯特遗体的要求。在这一次值得纪念的国会会议上，政府也派了许多代表参加。

会议大厅坐得满满的。坐在楼上旁听席上的是匈牙利艺术界的代表。

国会秘书蒂巴德·安道尔向国会报告：

“匈牙利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匈牙利全国音乐家协会要求政府运回李斯特·费兰茨的遗体并埋葬在布达佩斯的合适地方。”

这项议程的报告人高雅里·欧登讲话说：“勤奋工作，用上帝赋予的迫切感进行创作，为了报答民族恩赐给他的天才，为民族争得了用血汗和力量都争不到的光荣和赞誉，为民族文化博得了其他有文化的民族的尊敬和赞扬，这都是李斯特·费兰茨的功劳。因此他应该享受到民族尊敬和感谢的权利……”

议员泰里·卡尔曼高声插话：“把拉科齐[1]的遗体也运回

[1] 拉科齐，十八世纪匈牙利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自由斗争的领导人，死后葬于国外。

来！”

高雅里·欧登继续说：

“这次请求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把对伟大艺术家的怀念变成政治争论。正因为如此，申请委员会提出决议草案如下：为了在道义上支持运回李斯特·费兰茨遗体的社会运动，这些请求书将转呈匈牙利国王的宗教和教育部长。”（会场上发出赞同的喊声）

泰里·卡尔曼又插话：

“我丝毫也不怀疑李斯特·费兰茨的功绩。但我必须指出，拉科齐为匈牙利民族保住甚至争回了宪法。如果不是他拿起武器，就不会有匈牙利民族的存在，因为它可能已经被侵略我国和夺去我国宪法的奥地利所融化。李斯特·费兰茨只不过为这位伟大的人物谱写了进行曲。关于运回李斯特遗体的请求只是来自一些协会团体，而要求运回拉科齐遗体的却是五十几个议员……”

议员阿伯拉尼·科尔内发言说：

“我知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国会才会讨论某个问题并作出决议。我知道，只有特殊的功勋才值得国会讨论和怀念。事实是，象李斯特·费兰茨这样的天才是本世纪少有的。他的艺术的灿烂光辉照耀了全世界。东从俄国西到西班牙，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向他献过花环，为他推过凯旋归来的战车。全世界的艺术界都把他看作是第一流的大师。匈牙利民族的伟大诗人维莱什马季曾经写道：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总是我们忠实的亲人……

“让受到全世界尊敬和推崇的伟大人物安息在自己的祖国，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重视并且引为骄傲的事。意大利为迁回罗西尼的遗体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德国对待韦伯也是这样的。拜伦在世时，受到英国的迫害和咒骂，但是死后，英国以极其庄严、隆重的仪式把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尊敬的国会！七十年前，匈牙利没有条件把李斯特·费兰茨的整个生活和成长发展同自己联系起来，但如果今天匈牙利还不想把这位伟大人物的遗体迁回来，那将会失去国家的尊严。文明世界将永远怀念李斯特的伟大，它会不断地提出问题：他葬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是说他埋在异国，还是说他安息在自己出生的地方？”

下一个发言支持迁回李斯特遗体的是德国族议员斯泰耐克尔·欧登。情况就是这样奇怪而惊人：一个德国族的议员在教育匈牙利国会，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多数人都站在李斯特一边。但政府却很不高兴。议员泰里想方设法把迁回李斯特遗体的问题同拉科齐的自由运动联系起来。这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两个死人当中还有可怕的第三个死人。如果将来伟大的爱国者科苏特·拉约什死在国外怎么办？既然李斯特和拉科齐可以回来，那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匈牙利民族要求科苏特回来。这可是个严重的矛盾。政府首脑不得不表态了。匈牙利政府总理大臣蒂沙·卡尔曼曾经处理过无数次难办的事，足智多谋，善于搞政治诡计，所以这次也没有失败。他实际上否决了这个崇高的运动，但却把责任推给了国会：

“尊敬的国会！首先我必须表示，我个人是同意申请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的。当艺术界和社会人士想纪念一个杰出的、罕见的天才的时候，政府有义务在道义上——但只是在道义上——支持他们。在我说明这一点的时候，我请求议员先生们不要提出更多的要求……不要强迫我违犯这个规则。尊敬的国会！我同意申请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这并不等于我赞成议员先生们发表的每一句话。我同意决议草案，因为他在艺术上是伟大的，除此以

外没有必要再去研究他的其他功绩。当匈牙利人除了匈牙利音乐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李斯特在世界各地一边推广匈牙利音乐，一边却说这是吉卜赛音乐。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意决议草案。我再重复一遍，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意决议草案，但请先生们不要把弦绷得太紧，否则会断掉的。”

这一席令人颇费理解的演讲告诉大家：匈牙利社会可以要求迁回李斯特遗体，但蒂沙政府不会支持。

科西玛以石头般的脸孔接见了匈牙利全国音乐家协会、匈牙利作家和艺术家协会的代表团。她的回答简单而坚定：“我只能把父亲的遗体交给匈牙利政府，而不能交给任何别人！”

从此以后，她再也不同任何人讨论这件事。

在蒂沙·卡尔曼总理大臣讲完这番可耻的话后几个星期，一八八七年三月七日，维特根斯坦·卡罗琳公爵夫人也与世长辞。

李斯特的复活

老修道士不在人间了。他的魅力不再发生影响，他的风度也不再吸引人。人们再也看不见他，也不大谈论他。尤其是在这种突飞猛进的时代里，佩斯、魏玛、罗马很快就把他忘掉，因为每分钟都在出现奇迹：一八八七年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奥赛罗》，一八八八年奥地利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唐璜》，一八八九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意象》，一八九〇年俄国作曲家鲍罗廷的《伊戈尔王子》，一八九一年德彪西的《牧神午后》，一八九三年威尔第的《福尔斯塔夫》，一八九六年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艺术家的生涯》，一八九九年奥地利作曲家勋柏格的《升华之夜》，一九〇〇年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萨尔丹

沙皇的故事》和普契尼的《托斯卡》等等，都是音乐史上的奇迹。

看样子人们已经忘记了老修道士。那些曾经多次吹熄过李斯特油灯和帮他盖好毛毯的列车员把他忘掉了。他的学生都在追求新的理想和海市蜃楼。代表当局的匈牙利政府也把他忘了，不再去考虑在什么地方埋葬他的问题。诗人和评论家也不再提起他。在他的遗产周围嗡来嗡去的小作曲家们，从他的作品中挑选出最容易挑选的东西：匈牙利的节奏、吉卜赛的装饰、恰尔达什舞的飘带……他们只注意这些形式，而且一再重复（这是当代第二流的裴多菲、假造的约卡伊、次等的奥劳尼和自吹的李斯特们干的），这些华而不实的花哨，使得那些曾经相信过李斯特的品德、艺术和创作的人也不想再听李斯特的音乐。

直到本世纪初，才有一个年轻的匈牙利艺术家巴托克① 仔细翻看了李斯特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发现了隐藏在这部曲子后面的奇妙世界。几年之后，音乐学院正式建成开学。学院的大门拱顶上雕着李斯特的塑像。但令人怀念李斯特的并不是这座塑像，而是学院的各个教室和在教室中的艺术生活。这些都是他过去在初建音乐学院时梦寐以求的现实。现在的教师都曾是他的学生。大理石的走廊是他的梦想，音乐厅里响起的乐声是他的灵魂。他继续活在学生们的心里。他的永不熄灭的追求欲望，他对新鲜事物、现代精神和美好未来的渴望，他对艺术的不断探索和永不满足的强烈愿望，继续活在学生们的心里。

几乎是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建成的同时，老朽的魏玛也在李斯特精神的影响下得到了新生。这座曾经接待过德国画家克拉纳赫和作曲家巴赫的古老城市，这座曾经住过海尔德、歌德和

---

① 巴托克（Bartók Béla，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和音乐学家。欧洲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匈牙利民族音乐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为抗议希特勒法西斯而流亡美国，死于贫困中。

席勒的大公宫殿，这座曾经拥抱过洪梅尔、柏辽兹、瓦格纳、斯美塔那、鲍罗廷和许多天才的艺术城堡，现在又从梦中醒过来了。指挥魏玛乐队的是理查·施特劳斯。音乐学校的校长是李斯特的学生安索尔格……魏玛这颗冷却了的星体，这颗已经陨落但由于大自然的奇迹而又重新爬上天空的星球，现在看来又在发光了。

古老城市重新开始兴旺起来。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布索尼被聘为音乐学校校长。李斯特又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目。布索尼弹李斯特作品时，是那样动人，同李斯特的感情是那样融合，以致一些迷信的人以为李斯特又复活了。

到魏玛来朝拜的人流源源不断。他们都想听到布索尼和胜利复活的李斯特的琴声。

新的艺术大师，新的艺术杰作……一九〇五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两个年轻的匈牙利天才实现了李斯特周游整个匈牙利国土的梦想：先是柯达伊①，一年之后是巴托克。

所有这一切非但没有减弱，相反只是加强了李斯特·费兰茨的光辉。一九一一年，全世界都在纪念李斯特诞生一百周年。出版社宣布要出版李斯特全集。各国纷纷举行李斯特音乐会。匈牙利民族博物馆举办了李斯特纪念展览会。展品中有李斯特的书信、报刊、批评他的评论、称颂他的诗歌、乐谱手稿、纪念碑、一根旧拐杖、礼剑、褪色的金银花环、肖像、海报以及一本又破又旧的书：但丁《神曲》。有如熄灭多年的小油灯也在慢慢发出光芒一样，艺术家们又逐渐想起他，怀念他。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

① 柯达伊(kodàly Zoltàn, 1882—1967)，匈牙利作曲家、民间音乐研究者。与巴托克同为匈牙利二十世纪音乐的最杰出代表。为发展民族音乐，挖掘民间音乐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日上午，在马加什教堂响起了《加冕弥撒曲》的乐声。当天晚上，国家歌剧院演出了《圣伊丽莎白》。第二天，在埃斯代尔戈姆大教堂演奏了《埃斯代尔戈姆弥撒曲》。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他的学生在各地分别举行隆重的音乐会。

一九三六年，匈牙利为纪念李斯特逝世五十周年，举行了国际性的李斯特音乐会，印刷出版了大量的李斯特画册、小说、短文、评论和回忆录。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我自不量力地开始了一项巨大的工作，撰写李斯特的生平传记小说，书名是《胜利的小车》。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一个青年作家的处女作。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写出这样一部书，我的能力是很不够的。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任务竟会是那样的艰巨。

从那以后，又过去了三十年。我阅读了无数的有关李斯特的书籍和所谓"填补空白"的研究论文。我从匈牙利人、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英国人的有关著作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收集了大量资料。我对他们感激不尽。但是使我受到最大教育的还是李斯特自己。悲哀沉痛的《死之舞》，宏伟壮观的《浮士德交响曲》，表现了音乐魔力的《俄耳甫斯》，代表着时代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等等，对我都是最好的教育。它们促使我再一次去完成这一项美好、诱人、困难重重然而无比光荣的任务，再一次动手写李斯特·费兰茨的传记小说。

这个任务完成得好吗？

恐怕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说完成了一半。在李斯特的千姿百态中，我也许只看到了某几个方面。我相信，在他的身上，既笼罩着过去的动人传奇，也放射着现在的绚丽光彩，更闪烁着未来的不朽光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李斯特传记小说
作者＝（匈）加尔·久尔吉·山道尔著　　朱安康　　李孝风等译
页数＝６６９
ＳＳ号＝１０８３４７１８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第１版